我方的历史

陈平

一位在马来亚森林里领导反英反殖战争 12 年的游击队领袖的回忆。

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是小心翼翼，以免自己掉入美化过去的陷阱，我的生活毕竟也太少事物能让我为陈年旧事撒谎。"

陈平，《我方的历史》

《我方的历史》不与记载显赫功业的当代名人自传作任何形式的比较，也不在于炫耀什么令人惊叹的才干或展示什么天赋能力。

《我方的历史》是一份特殊且稀有的历史文件，它记载一个与同志们并肩携手向日本及英帝国宣战的人。

二战结束之后，重返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者应伦敦的指示，授予陈平两枚奖章及一枚大英帝国功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OBE）。这些所谓的殊荣是颁给日治时期在马来亚为英女王服务的有功人士。

然而，这些诱惑毕竟无济于事。

为了扑灭陈平率领马来亚共产党燃起的革命火焰，英国发动了历时 12 年的打击共产党运动，而且为了合法化它的行动，英国不以"战争"称谓这场不折不扣的战争，而是称之为"紧急状态"。英国曾表扬陈平为抗战英雄，如今却将他重新标签为"恐怖分子首脑"，并重金悬赏缉捕他——无论死活。

超过半个世纪之后，陈平依然坚定如昔：

"我无法将 OBE 勋章当作生命的重心。我那年代的人梦想着消除马来亚的英殖民主义。对此，我感到自豪。"

我方的历史

陈 平

伊恩沃德 (Ian Ward)　　著

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4 JAN 2005
CHINESE LIBRARY

新加坡

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

.h2441115
1040K94901

我方的历史

Copyright (c) 2004 by Media Masters Pte Ltd

原著： My Side of History

作者： 陈平

翻译团： 伊恩沃德 (Ian Ward)
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

翻译团： 方山、黄国芬、黄永安、李万千、李亚遨、林金树、林友顺、彼岸、杨培根、叶瑞生、郑昭贤、庄迪澎

美术： 叶玉佩

出版： Media Masters Pte Ltd,
Newton Road PO Box 272, Singapore 912210
Email: medmas@singnet.com.sg
Fax: (65)64842559

封面及封底彩色照片： Demetrio Miraflor

印刷： Mui Kee Press & Co. Singapore

初版： 2004 年 10 月

凡本著作任何图片、文字及其他内容，未经本公司同意授权者，均不得擅自重制、仿制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

ISBN: 981-05-2075-1
Printed in Singapor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1998 年夏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英国。我花了一些时间先后到坐落在克佑区的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 Kew）及牛津大学的罗得家族图书馆（Rhodes House Library）查阅马来亚紧急状态文件。这些工作是为了能让我更清晰了解那场牺牲了我四、五千名同志的战争。

发掘 1940 年代末叶及 1950 年代伦敦的政府官员究竟在策谋哪些反叛乱运动以打击马来亚共产党，至少可以说是一项求证工作。正当我和我的同志们在祖国的险恶森林里艰苦跋涉之际，英国的政治宣传已在全世界流传，而这项求证工作让我得以评价这些宣传。

在丘园及牛津查阅档案之后，我收集了大量解密报告书，但这些文件不只取自档案局，也取自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院（Imperial War Museum）及堪培拉的澳洲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这些文件成了我的个人存档，我也因此愈加肯定当初不急于讲出我的故事是个明智的决定。1989 年 12 月 2 日在泰国南部的合艾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有些人即刻游说我出书。我没有同意。这有两个原因。当时，我只说出较明显的一个理由。我说，我需要时间。我首先必须调整和平协议签订之后随之而来的新的安排与规定。我一生的岁月都于在野政治中度过，我得确定我们与泰国及马来西亚共议而成的和平新概念，能让所有人受惠。

第二个原因不容易说清楚。我同意我们必须说出我方对紧急状态的看法，但时机还没到。我还在领导武装斗争的时候，伦敦及吉隆坡的权力中心说些什么，有些什么决策，以及下了什么命令，我只能接到含糊的报告。我要求自己重新检验那场战争时，能有文件佐证我的看法。缺乏这些文件佐证，那些居心不良的批评者便能轻而易举地反驳我的分析，并将之贬为毫无确实证据的愤恨及无中生有的谎言，再不然就像杰拉尔德邓普勒（Gerald Templer）的嘲讽口头禅："共产党人的典型废话。"像我这样陷入困境的人，尽可能保持平心静气，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排山倒海的宣传材料已成功将我刻画成一个“恐怖分子首领”。紧急状态是纷至沓来的宣传所营造而生的一场冲突。我绝不以任何方式自我开脱，说我们从不偏爱游说工作。我们肯定曾经做过，但是丘园的文件证明了，马来亚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简直微不足道。原因很简单：我们并不是在宏伟建筑物里的办公桌上伏案疾书之辈。我的军队不停地颠沛流离与重组，又要承受粮食短缺的折腾。可以这么说，我们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理想主义了。我们毫无诡辩的技巧，在一个又一个栏目里撰写花言巧语误导读者。我们只是粗通文墨、性急及缺乏经验之人。我们的公告行文朴实无华，而且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2000 年初，伊恩沃德（Ian Ward）联络了我。我记起读过他在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署名报道。他已经退休 12 年了，而且还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我知道他曾是一名战地记者。我想起他发自越南及“第二紧急状态”的报道。他没必要对我提起我们政治立场的差异。他在上述死硬派保守党的英国报章工作了 25 年。沃德说，他一直对紧急状态深感兴趣，而且实际上过去多年来也断断续续地加以研究。既然那是一场游击战争，就其本质而言，紧急状态必有未为人知的一面，而我正是探索这个未勘察过的地带的钥匙。他要听听我的故事，但他补充说，他的政治立场并没有改变。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段复杂且时而激烈争论的合著过程。从一开始，我们就约法三章，谁都不成为彼此的“配角”。例如，我煞费苦心向沃德解释，为何革命同志不会将革命运动中遭遇的挫败当作“浪费时间”。沃德则坚持本书不能让人读来像是一本宣言。

本书另一位作者兼编辑诺玛米拉弗洛尔（Norma Miraflor）的加入，对已延误了的撰写工作大有助益。米拉佛洛尔自称为“嫁给沃德的‘顽固资产阶级分子’”，她总是保持冷静，并且扮演鲁仲连的角色。然而她发挥的作用却不仅如此。她不厌其烦地参与冗长的讨论，然后提出值得分析及记载的观点。她和丈夫一样，是个懂得聆听及善于提问的人。

沃德及米拉佛洛尔开门见山地说，他们对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不感兴趣。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紧急状态中的人性因素，以及这场历史性的冲突之中，究竟有多少真相被犹如雪崩而来的宣传所掩盖了？沃德尤其致力于搜索在武装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媒体未能涉猎的情节。我们讨论及检验了这些情节，有些他接受了，有些他否决了，因为他认为将道听途说的情节或谣言编撰入书毫无意义可言。对此，我们达成共识。

读者或许会问，本书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吗？不是。理由很明显，因为它并不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我也没有声称它是陈述紧急状态的一项接近全面的记录。本书只不过记载了一个选择走不同道路的人为他理想中的祖国奋斗的历程。

其他恐惧与恐怖如今蔓延全球。“紧急状态”这头怪兽乃东、西方对立——共产主义对垒资本主义的产物。当然，这个世界已有莫大变迁，与当年我选择挑战的那个世界大不相同。技术一日千里却也将大屠杀带往令人惊恐不已的田地。然而，我始终相信，再精良的武器也无法剔除人们心中对正义与尊严的渴求。

我打过两场仗，并多年以森林为家。本书既非自夸，亦非道歉。本书邀请读者理解信仰如何形成，以及冲突又是怎样开始并僵持着。同样，它也让读者透视和平如何得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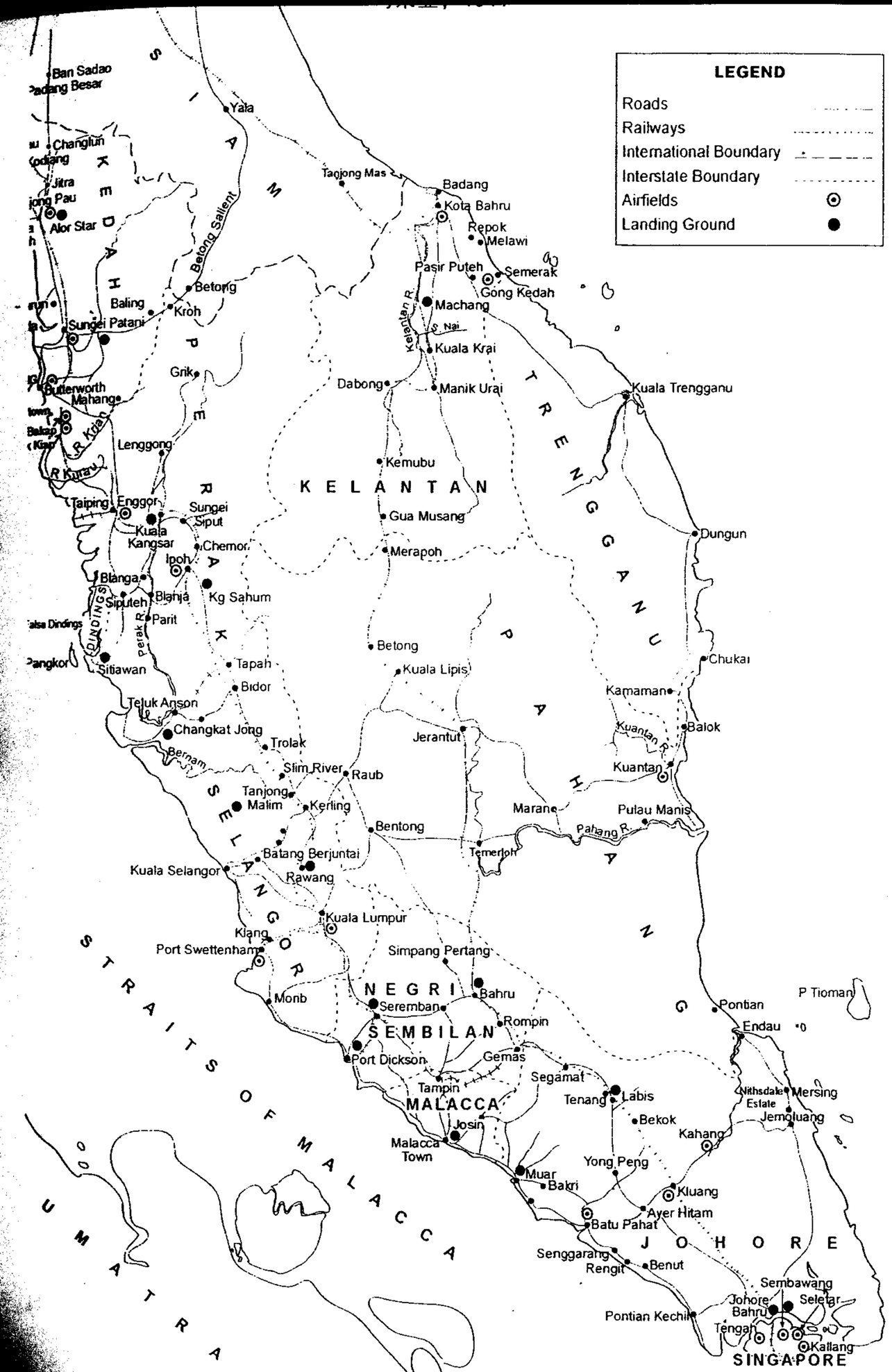
Chin Peng 陈平

陈平

2003 年 7 月

目 录

第一章	不大可能的联盟	9
第二章	一个华人男孩在马来亚殖民地的童年	27
第三章	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37
第四章	地下分子成为抗日游击队战士	51
第五章	接二连三的出卖	65
第六章	与莱特面对面	75
第七章	与 136 部队合作　成立流动部队	83
第八章	打不打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	101
第九章	全国翻滚的怒火	119
第十章	获奖——一封道歉信——加速政治对抗	133
第十一章	策划推翻叛徒	149
第十二章	消灭英国间谍——紧接而来的是 OBE 勋章	161
第十三章	被迫发动武装革命	171
第十四章	和丰——紧急状态颁布——20 秒钟脱险记	185
第十五章	峇冬加里屠杀事件和英国人的宣传	199
第十六章	重新考虑是否让澳洲派兵	219
第十七章	布里格斯计划的打击	235
第十八章	在甲甫路的伏击行动——虚张声势的邓普勒到来	257
第十九章	移向北方，英国打算入侵泰国南部	287
第二十章	李明传奇	301
第二十一章	最初的和平建议	317
第二十二章	华玲会谈	331
第二十三章	戴维斯的献议，胜利的东姑，以及仍然满怀希望的政治局	349
第二十四章	战略性逆转	359
第二十五章	北撤中国	373
第二十六章	恢复武装斗争	389
第二十七章	驱逐出境者、广播电台及讨价还价	401
第二十八章	森林谍影与骇人的审判	413
第二十九章	和平之门打开	429
第三十章	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437
第三十一章	履行和平协议	447
第三十二章	流放生涯	455
尾注		463
额外参考资料		465
图片提供		466
编者说明		467
名词对照		468
谢辞		480



第一章　不大可能的联盟

每个时代，打造着属于它的梦想。如果你渴望有所作为，你就需要对那时代的呼声作出回应。我那年代的人梦想着消除马来亚的英殖民主义。对此，我感到自豪。

但你需对你的梦想付出代价。我们确实付出了我们的代价。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被驱逐出境。在伦敦殖民部（Colonial Office）所设计的程序下，我们被逮捕，根据种族被隔离，被抛弃到他们认为我们应去的地方。在进行武装斗争的那几年内，我们对敌人炮火的威力没有反击的筹码。我们也没有技能，手段或时间去应付大量的政治宣传机关。他们最初只是把我们描绘为普通的土匪，随着敌对行动升级后，我们就被指为共产党恐怖分子了。我有不少同志因而牺牲。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惦记着他们。

政治宣传说我尚不悔过。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是，不悔过的是什么呢？我扪心自问过。我为我所认为——到现在还认为的正义事业而斗争，从不后悔：英国人应该离开，停止剥削马来亚的资源与人民去为她偿还债务及维护她的帝国地位。现在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的时候了。我对这个信念坚信不悔。亦不曾对我的社会主义信仰后悔过。

生命在战争中消失。宣传运动说我对此无动于衷。这怎么可能呢？官方的数字显示，我方共有六千名军人被杀。我可以较准确地的说是四至五千人之间。约有 200 名我的追随者被吊死，其中有不少是妇女。英国轻易的忽略了这战争的数据。可是并没有人把他们称为不悔过的杀手。

历史是活存下来或继承其战利品的人对事件的文字证词或诠释。在军事冲突

上，历史必然是胜利者最终留在图书馆及档案室的观点。支配者及较强势的那方，至少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总有办法阻止人们窥视那些把他们描绘为他们不想要的角色的文件。所以你会有许多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五年的机密文件。有些甚至从不曾被公开过，避免让胜利者面对历史反省时的难堪。这是为什么胜利者很少被嘲弄的原因。

所以在紧急状态时期——为了申索保险目的，也因此为了金钱的因素，英国不把它称为战争，而我与我的同志们就被套上了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恶名。我们是共产党恐怖分子，这就是我们何以从记录这段严峻及恐怖时期的书本中消失的原因。我的手下死了，因为我们要结束殖民主义，并以我们相信较为平等的政治理念取代之。另一方失去大约 2 千人命，其中许多是非英国人，他们是为了帝国——那已经不相关的理想而战的人。

殖民主义已经过时了。英国优势的说法，早在那年日本军人骑脚车由马来亚公路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丘吉尔（Churchill）的“新加坡堡垒”的时候给粉碎了。1941 年 12 月 10 日在关丹海外的南中国海，英国皇家海军战舰“击退”号及“威尔斯”号在短短的一小时半的战争中被击沉，大英的海上霸权因此成了回忆。

但英国人不愿面对这些事实。日本投降后，他们当着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要回到马来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回复他们过去的光辉日子。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把“只限白人”的俱乐部开放给一些拥有特权的本地人，委派一些本地人担任中层政府工作，或以头衔收买他们。对褐色和黄种人“比较好”或“投其所好”等。但他们依然保有主人及恃强凌弱的地位。如果没有任何事情把他们从醉梦中唤醒，所谓的友好与和平的谈判将年接一年，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

那就是我与同志们的成就了。我们促使英国正视及明白他们必须听从于马来亚真正的主人。我们在他们还未准备要谈判前，便逼使他们到谈判桌去。

* * * * *

英国人有句形容词，eating humble pie，即做了错事而被迫低声下气赔罪道歉的意思。英国人早就应该赔罪道歉了！早在 1941 年 12 月，日本第 25 军团在

山下奉文（Tomoyuki Yamashita）中将率领下抵达马来亚之前，殖民政府已剥夺我们的法律保障，逼害我们。对於他们可以捉到的，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华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驱逐到中国去。我们的印度裔追随者也面对同样的处境，被遣送到印度。虽然，你事实上可能是在马来亚出生，更不曾离开过这片土地，但这并不重要。许多家庭，在父母被放逐，孩子被安置于亲人家之后而宣告破裂——这都是常见的惩罚。

然后，在 1942 至 1945 年间，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在那数年内，英国事实上的确认为我们是挺不错的家伙。我们是他们的同盟。那时，他们从不曾认为，杀死日本人会让我们成为“杀人凶手”。

我那时很深切地了解到，英国要在太平洋战争胜利后回到马来亚，重建他们的殖民霸权地位的决心。为了做到这点，她当然必须要制伏残暴的日本人。在她要重占所失去的区域及重拾失去的尊严的决心中，英国意识到，除了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打交道之外，她没有太多的选择。马共当时是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作为代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他们时时刻刻都必须承认，我们是唯一在这个半岛上操作的抗日运动。

我对与英国结盟对抗从日出之国来的入侵者，从不曾存有任何幻想。我的联盟地位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我知道这前帝国主义主人，最终将再成为我的敌人。英国人在没有其它的选择下利用我们。我想我们也一样可以利用他们。对两方面来说，都是与魔鬼共事。我必须说我对这个联盟尽了我应尽的责任。两个战功勋章，及一个大英帝国功勋章（OBE）— 你可以说，我一定是做了一些他们必须认同的事。

在整场战争中，英国人完全不信任我们，我们因此在很多事件上都不知情。我感觉到，事情总往他们要的方向发展。英国人，在某些阶段，甚至会摒弃与我们在森林里的密切伙伴关系。他们不会与我们完全切断关系—因为我们毕竟需要受到监视。而且他们还需要利用我们，不过是从安全及可接触的距离内。如果，他们对马来亚国民党华人的期望都实现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摒弃我们。我亲眼看到英国人如何努力尝试建立他们的国民党网络— 他们把一些人秘密训练成无线电操作员，并让他们扮演间谍的角色。但那些努力都化为零，因为他们被马共缠着了。他们发觉到他们必须严格遵守 1943 年 12 月 31 日的协议条文。

* * * * *

Record of Conference held at Camp
22, 31, 1.C 4.5. between Messrs CHENG HONG,
CHEN CHIN SHENG; Messrs BROOME, DAVIS
LIM CHOO LIN, Major F.S. CHAPMAN.

No. A

A. Terms of Cooperation.

1a Mr Cheng Hong (CH.) is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the Anti-Japanese Force and the Anti-Japanese Union, and can put into force any decisions agreed to in these meetings.

b Major J.L.H. DAVIS, Captain R.N. BROOME and Mr Tan Choon Lim are th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M.R) of the Allied C in C, South East Asia, and are fully empowered to cooperate with any anti Japanese party in Malaya.

2 CH agrees that his party will fully cooperate with the Allied forces while retaking Malaya and for this purpose will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Allied C in C in so far a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Malaya are concerned.

B. Details of Proposals and Decisions.

1 After giving a summary of the numbers and resources of the various Anti-Japanese organisations in Malaya, CH asked in what way these organisations would be expected to cooperate.
The MR summarised the military and Fifth Column activity hoped for and it was agreed that at present, beyond continuing to keep the people anti Japanese, the only possible action would be to foment Labour trouble and carry out sabotage against Japanese naval dockyards etc. For the [illegible] was agreed that a time of operation for future combined action. CH also undertook to emphasize, in their present propaganda the need for complete cooperation with Allied invading forces.

2. Asked what kind of help CH expected, CH replied (a) Arms and ammunition (b) Medical supplies including doctors (c) Military training (d) financial assistance.
The MR stated with regard to (a) and (b) that the Allied C-in-C will undertake to despatch to Malaya, by all possible means, the arms and supplies needed for effective coop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doctors from overseas is difficult at present but the possibility will be investigated.
(C) i The Chinese instructors who are now in India will be introduced as soon as communications permit. ii Chinese students will be sent from Malaya for training as instructors and will be returned to Malaya. A party of 6 should be prepared to proceed to India shortly. iii The question of introducing European instructors at a later date will be investigated. (d) The MR have already asked for authority to finance. The reply is expected within a month. CH's estimate that $50-70,000 per month will meet present requirements.

3 After the MR had stressed the urgency of setting up the wireless installation, the details of para 2 (above) were discussed and an immediate detailed plans for the first shipment of arms and medical supplies was drawn up. Investigation of further specific supply routes was [illegible] agreed upon.

The above is subject to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mbined headquarters of the H.C.P., A-J.F. and A-J.U. and is subject to agreement on the following or similar clause to be added. "That cooperation shall continue during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arm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in Malaya".

J Hotwaers Major
R.N. Broome Capt.
Tan Choon Lim

这就是于 1943 年 12 月的一个早晨，在不兰丹营地里把我们弄得目瞪口呆的文件。真本收藏在英国，伦敦克佑区档案局①。

我对它仍记忆犹新。那是一张从一本学校练习簿小心撕下来的纸。一丝不苟的英文笔迹从左边的页边写起，几乎填满纸张两面的每一寸空间。置放在我们森林营内，亚答会议棚里那张粗糙的桌子上，它看起来是如此的不起眼。

六个大男人像被磁铁吸引着，围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盯着那看似毫无害处的文件。我们都一致的认为它将决定未来。它，的确是的。尽管，我们间中没有任何人在当天－无论对它如何妄加猜测－会预见到它里面的条文，在全然不同的拥护下，会为英殖民历史写下如此令人敬畏的一章。

我还清楚地记得整个会议棚的情景。周围的森林在突来的倾盆大雨后显得湿漉漉的。现在阳光正猛烈的照耀着灌木丛，腐烂植物发出的熟悉潮湿气味飘到我们集合的地方，那张由我的游击队员用节节疤疤的雨林树桐所制造的长桌。我们端坐在桌子两侧，以同样材料制成的长凳上。四个人坐一边，两人坐另一边。

事情摆得一清二楚。坐在桌子旁的三位英国军官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至为重要的念头：洗雪英国 13 个月前投降时的耻辱。粉碎日本帝国。在盟军要把入侵者从马来亚赶走的策略上，马共游击队－至少在那时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跟我们的短期目标不谋而合。长期目标在严重的冲突下显得渺茫。英国人一心一意要重夺无价的殖民地，我们的目的则是不让他们得逞。双方都清楚将有不可避免的分歧。

* * * * *

英方的三人组是由 33 岁的戴维斯（John L.H. Davis）少校为首。在马来亚山林高处，那个潮湿的早晨，他在棚内正式大声朗读文件内容。我回想他那从容不迫的音调与森林内吱吱不停的蝉叫声形成强烈的对比。每过一阵，戴维斯就会停下，转向一位看来相当年轻的华人。华人点头，接着把声明翻译成华语。

戴维斯坐在我的正对面。我们在第一次会面后的 3 个月左右，戴维斯已成了我所遇见的欧洲人中，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健壮及灵活的体格，说得几分流利的马来及广东话。他曾经是殖民地警察，在日本入侵后不久，被召入英国的特别行动执行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

戴维斯的右边是布鲁姆（Richard Broome）上尉，35 岁，一个文静的前殖民地县官。这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与严重的热带热病搏斗。前一天冗长的谈判之后，当天晚上，他总算还有足够的力气把我们的商议结果浓缩在一张双面的纸张上。但今天在病痛的折磨下，上尉已经没有能力发表意见。他整个人缩成一团，不断的前后摇摆，冒汗，发抖，勉强跟随着会议的议程。虽然在我与戴维斯初次的会议时，就认识了布鲁姆，但我们的关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知识分子出身的布鲁姆，对待人一贯冷漠。然而我还是喜欢这个人。他流利的广东话，无疑有助于我们的沟通，因为那时候我的英语水平是有限的。

坐在布鲁姆右边的是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少校。英国的非常规战专家。他在马来亚的抗日功绩，为他带来一生的传奇。新加坡在日本入侵后的第 70 天突然沦陷后，查普曼曾经在敌后成立游击队及为有意“留下来”的突袭队行动提供补给品。对查普曼而言，日军的入侵是那么的排山倒海，以至于要撤退都来不及了。他原先的“有意留下”，结果变成了“被迫留下”！

英国投降后的两个月，我曾见过查普曼。通过秘密的中间人，我了解到他的敌后活动，并邀请他为我那时刚成立的第一支游击队提供武器训练。那支部队当时是驻扎在霹雳乌鲁仕林(Ulu Slim)以东的森林里。我个人与查普曼最初的讨论，或许可以说是英军与马共在合作挑战日本军事占领的第一次交流。双方有很多可以相互协助的地方，然而，我们都没有被授权谈商建立正式关系。

戴眼镜的陈春林，是我们 12 月协议的翻译员。他说得一口纯正的华语。他与英国人坐在一起，在戴维斯左边稍远的地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七星期前，在护送他经过日本巡逻范围到我们山中安全的营地来时，我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我自愿乘搭一艘捕鱼帆船到公海与盟军潜水艇会合，带进一位被称为“重要的华人特工”。当这位特工自我介绍时，我知道他用的是化名。我根本不能抗议，因为我也是如此。一开始，我就把他当作国民党支持者。总而言之，我和陈彼此都不大信任对方。

* * * * *

戴维斯与五名华人特工于 1943 年 5 月 24 日，大胆地在沦陷的马来亚作第一次的“盲目”的登陆。他从锡兰乘一艘荷兰潜水艇，经过 10 天的行程，再划船到邦咯岛（Pulau Pangkor）以北四英哩外的丹绒汉都（Tanjung Hantu）上岸。他

到沦陷了的马来亚的初步尝试，主要是为了侦察及搜集情报。一个月后，戴维斯乘另一艘潜水艇回到位于科伦坡外的特别行动执行部的马来亚组办事处(Malayan Country Section)。在那儿，他立刻开始为在马来亚森林更长久的逗留做准备。

他的最先任务已经确定，马来亚全境都有抗日的马共游击队在活动。他所收集到的情报，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共产党看来有意愿与英国人合作对抗日本人。这需要与马共，比较理想是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小心的谈判。在后来数个星期的准备中，这个谈判成了盟军马来亚组办事处战略家的主要目标。

1943 年 8 月 4 日晚上，戴维斯第二次以潜水艇登陆霹雳海岸，这次是在丹绒汉都以北的昔加里（Segari）地带。正如第一次那样，他带来大量的供应品。这些供应品妥善运送上岸后，就暂时埋在靠近海岸的下层灌木丛中。

布鲁姆在一个月后以同样的方式抵达，与戴维斯会合。通过当地华人渔夫－他们是马共忠实的支持者－的关系，他们抵达的消息传到了我位于美罗(Bidor）的司令部。那时，我刚被委任为霹雳州代州委书记。在日本当局逮捕了我的州领袖及其副手后，我在当地党内很快就升上了领导的地位。

日本人在收到有关盟军潜水艇在霹雳海岸活动的情报后，明显地加强了他们在那里的保安措施。无论如何，由于迫切需要与刚到的英国官员尽快取得联络，因此我选择踏脚车到昔加里。我经过安顺（Teluk Anson），在那儿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再开始我一整天的行程，经过峇眼拿督（Bagan Datoh）及甘文阁(Kampung Koh)。为提防经过家乡被人认出，我决定避开实兆远（Setiawan），取道园丘小路到红土坎（Lumut），然后到昔加里。1943 年 9 月 30 日迟午，马共，由州委员会代表，与英国驻扎在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蒙巴顿海军上将（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的代表展开首次正式的谈判。

我自我介绍为陈金生。戴维斯向我出示由东南亚司令部任命他代表最高司令的授权书。他向我解释，他如何参与 101 特别训练学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 101 STS）的过程。我知道 101 STS 曾经在沦陷前后时刻负责征募 165 位共产党员，为他们提供武装配备及训练，使他们成为敌后的游击队员。戴维斯能清楚地叙述，他与几位曾在该校受训的霹雳州同志们的交往情况。他那封授权书，及他所谈及的故事，很快地让我相信他的真实身份。

从一开始，戴维斯及布鲁姆对尽快与马共高层，建立稳定联系表现得非常

渴望。他们也向我询问有关马共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势力情况。他们问我关于我们的军备及游击队的能力。我反过来说，我只能对他们的个人安全给予意见。不过我向他们保证，我会把他们的所有信息及要求，传达到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三人后来便把时间花在安全问题上。我最终是建议他们最好离开昔加里。整个海岸平原地区都已经不安全了。我促请他们移向内陆，到中央山脉那儿，敌人较不容易包围他们。那里的森林茂密，地形险峻。我特别建议，他们移到美罗后面的山区，因为那里相对上较接近我的基地。

所幸的是，戴维斯及布鲁姆对我所说的地理环境熟悉。战争爆发之前，戴维斯曾任金宝（Kampar)警长。金宝是美罗以北，坐落在南北主干公路上的城市。布鲁姆则在怡保（Ipoh)一带当过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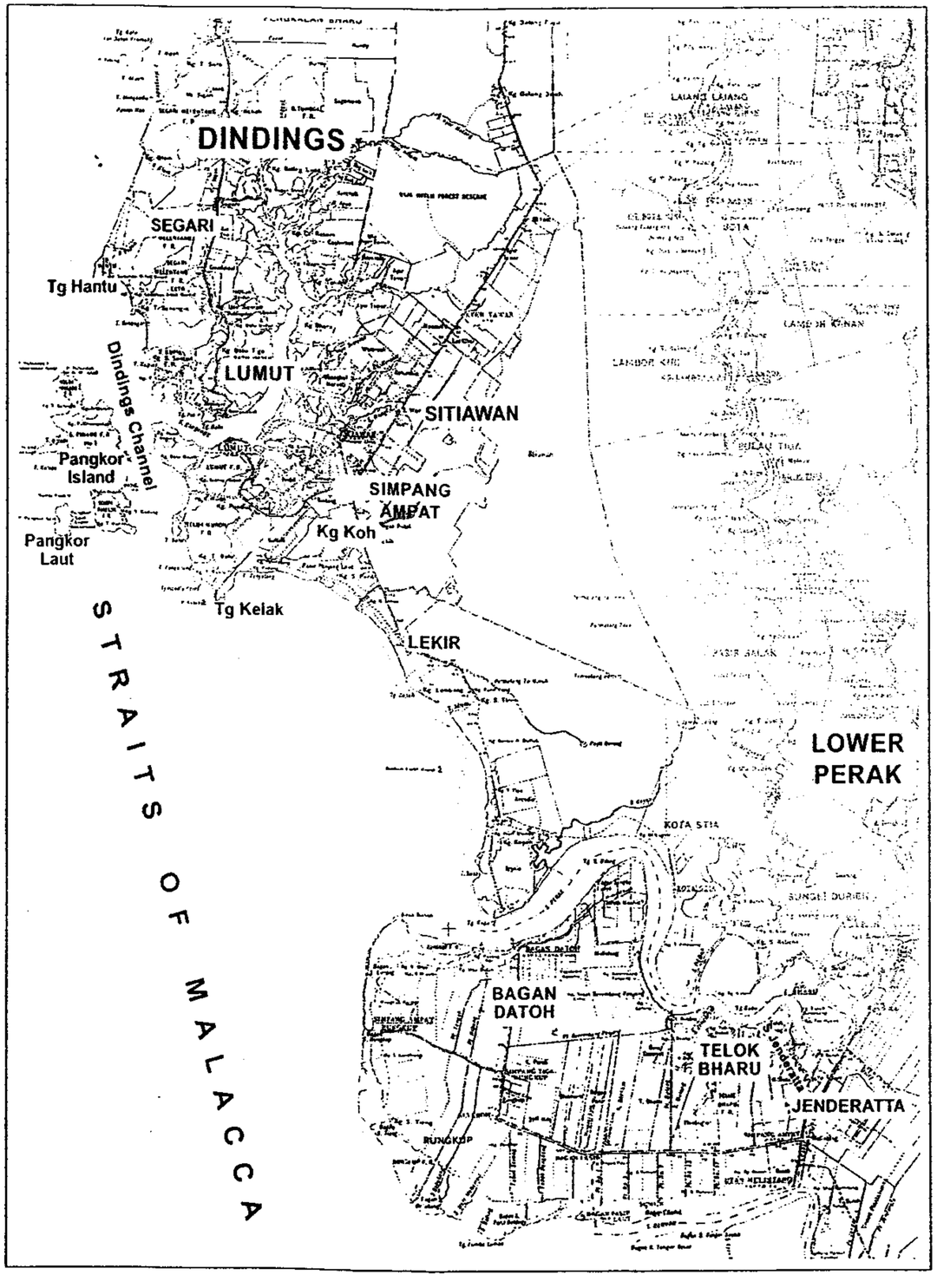
这两位官员仔细地聆听我的建议，在简略商谈后即刻表示对我的建议具有信心。他们要求我进行安排，为他们选择一个适当的营地。这事谈妥后，我们的讨论立刻转向把他们移到内陆的最佳途径。起先，我们研究从昔加里到美罗陆路输送的可能性，越过大片沼泽地，但还是得经过日本军定时巡逻的人口集中地区。我们也检讨了另一个选择路线，乘船从海岸南下到霹雳河口，从那儿再向上游安顺前进。我可以在那儿与他们会合，继续驶向上游，到一个我们可以由陆路到美罗的地点。

两个英国官员选择海岸路线。他们告诉我可以利用他们一位国民党熟人的渔船。他们建议从靠近丹绒汉都的一个海边起航。那是一个接近昔加里南部的海边。这将导向与霹雳海岸隔了一个狭窄的天定（Dindings）海峡的邦咯岛海域。我反对这个想法。我知道那个地方的日本巡逻艇不时会对怀疑的船只进行检查。除了有情报显示盟军潜水艇的活动，也有不明的消息散布有关欧人登陆的事。因此，我肯定一只绕行于邦咯岛海域的渔船，会立刻被日本巡逻艇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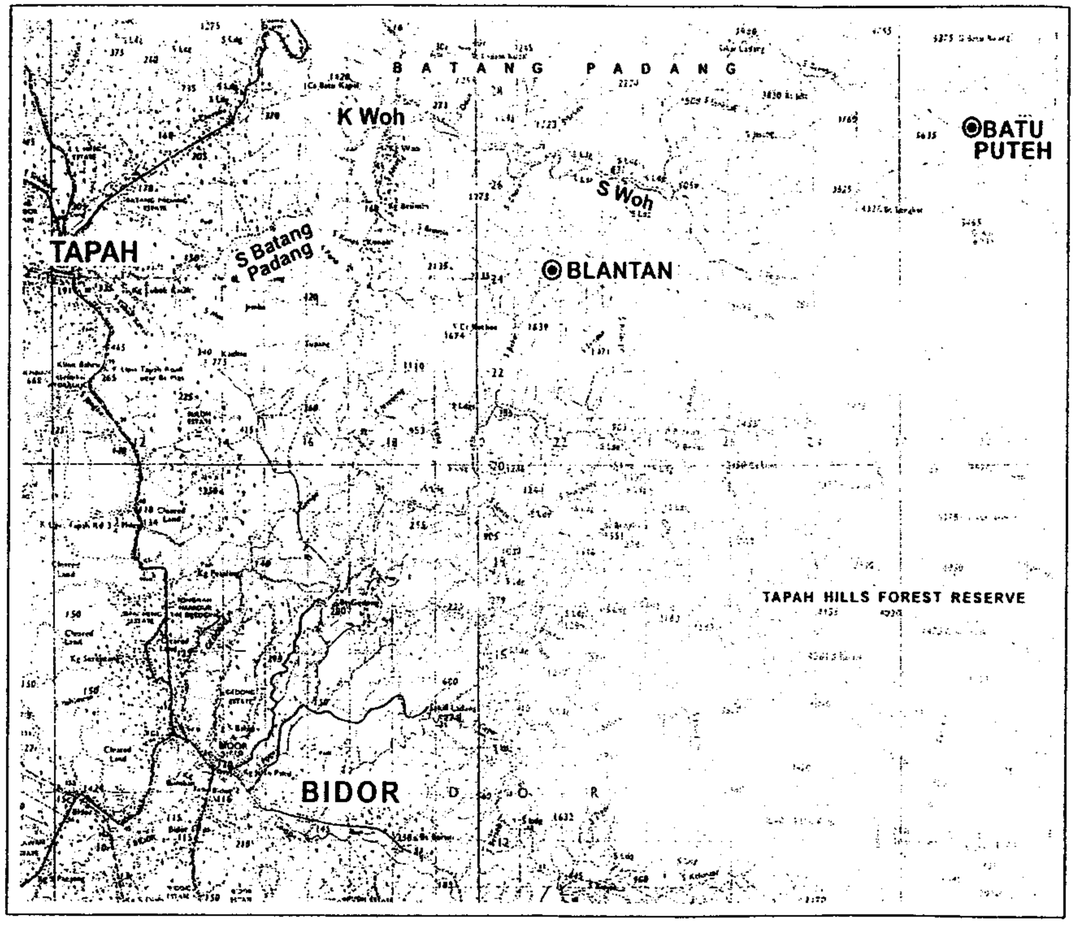
我提供另一个选择，即是当着敌人面前，以渔船直接通过天定海峡。在这里，我说，得完全依赖我们的冒险精神去完成了。尽管如此，我的计划也提供了一个潜逃路线，以防万一。要通过这海峡，我们必须一直保持在沿海。如果遭到日本巡逻艇进行拦截，我们可以选择，与船员一起跳下水，游向不同方向的海边。在黑夜中，多数人都可以游上岸。我们过后可以重新集合，通过重重的海岸丛林继续逃跑。私底下，我知道我可以依靠马共在海边平原地区，华人农村大批追随者的协助。

戴维斯与布鲁姆在考虑了几分钟后，就同意我的方案。我们就定下了时间

1943 年，接头地点一带。



我们安置 136 部队的营地。



◉ 营地

及安排以后的联系方法，以确保向内陆迁移的行动，在绝对保密与完全避免与敌人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我回到美罗后，便开始为我们刚到的英国人伙伴建立营寨。重要的是，我须在森林找一个地点，以便将来建立任何营寨都可以在紧急时得到我们游击队第五独立队的支援。五独当时是驻扎在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附近。我选择的营地接近不兰丹（Blantan），一座 2 千 200 尺高山的山顶。它位于美罗镇东北部大概七英里。从保安的角度来看，不兰丹营无疑是个可以避开日本军地面包围的好地点，因为周围地势崎岖，森林茂密。从最接近的道路进去，则是一条需要耗尽力气，经过荒凉乡区的两小时上山路，即使是对我们最强壮的游击队员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

虽然不兰丹是偏远孤立的，但它让我们能够纵览海岸平原及后山地区。在良好的可见度下，我们可以看到西北面，朦胧的蓝色马六甲海峡上，50 英哩外的邦咯岛轮廓。西面的九屿岛（Sembilan Islands），包括布罗岛（Pulau Buloh），拉朗岛（Pulau Lalang），仑比亚岛（Pulau Rumbia），尼比斯岛（Pulau Nipis)及阿加斯岛(Pulau Agas)等，在一般的天气下亦可清楚的被认出来。从不兰丹，可鸟瞰辽阔的霹雳河，弯弯曲曲的向南伸延，到了中部的海岸平原后，再向西转，许许多多的急弯，经过安顺后，再倾注海峡。

我为不兰丹营组织了一支警卫队，并下令他们开始进行所需要的建筑工作。我委任了阿杨为警卫部队指挥。他是一位熟悉英语的党员，在当时算是个拥有鲜有才华的人。阿杨对共产党学说非常了解。但英国人却以“过度认真”，近乎狂热为由，想把他打发走。事实上，明显地可以看出，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内，几个来过不兰丹营的欧洲人都觉得阿杨实在是相当难以忍受的。作为警卫队指挥，阿杨严格执行所有的营地安全指示，并直截了当拒绝任何性质的交谈。他是故意而固执地不与人交往。欧洲人对阿杨的看法并不重要。我的人只是在执行任务。对我来说，阿杨是一个工作卓有成效并受部队成员尊重的指挥，即使是戴维斯、布鲁姆和查普曼也承认这点。没有人在日本军攻击不兰丹营，及后来两个营地的事件中丧失性命。我相信，这就是对阿杨的能力最好的证明。

在我们为迎接英国同伴做好准备后，我就遣送一位交通员到昔加里。他的简要任务就是护送戴维斯，布鲁姆及他们的五位华人特工，乘帆船渡过算是危险的航线，通过天定海峡，到霹雳河口南岸港湾的峇眼拿督。我的估计对了，由于渔船靠海岸行驶，极近处的两艘日本巡逻艇都没有对它采取什么行动。我

在同一个时候，在靠近峇眼拿督，一个丹麦人拥有的仁特拉打（Jenderatta）园丘内的工人棚下等候他们的到来。渔船最终在白天抵达。由于当时在光天化日下走动，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自寻死路，英国人只好在我们集合的地点休息，等待黑夜的来临。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戴维斯及布鲁姆简述接下来 40 英里，两天两夜的陆路行程。我也向他们介绍将带领他们长途跋涉的另一名游击队员。我解释说我需要乘车先行离去，为他们路过敏感的美罗及接下去前往不兰丹路程的安全进行安排。当晚，那两个英国官员，他们的华人特工，及我所安排的向导开始了他们漫长迂回的内陆行程。他们将经过树胶园，沼泽及海岸丛林，绕过数个马来及华人乡村，当然，也包括美罗市镇。

安全的抵达不兰丹后，戴维斯把我带到一旁，大事赞扬我所准备的营地。那天，我们谈至深夜，我向他谈及我之前接触到的查普曼，描述关于他如何协助训练我的第一个森林司令部的游击队。戴维斯问我是否可以找到查普曼，并把他安排到不兰丹来。我表示将尽我所能。我从我们交通员系统中知道，查普曼曾经在彭亨中部，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为我们的人提供训练。

我收到的消息说查普曼病重，感染了多种热带疾病。我遣送了一个交通员把信息传达到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后来命令彭亨州军事总司令，将查普曼护送到美罗地区。这个英国人在数星期后才收到要他迁至西部的要求。为安全起见，我们不能告诉他这指示的原因，也不能让他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地。由于查普曼病重，加上他的向导们在险峻的中央山脉行走时面对问题，查普曼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我为他安排的集合点。这是一间荒废的公司屋（kongsi house），离开不兰丹有半天的山路路程。

1943 年的圣诞，我走进那间植物蔓生的木屋去问候查普曼，令他感到吃惊及高兴。滂沱大雨把我们弄得湿透，在森林内艰难跋涉了数小时后，他终于与他在特别作战部的同事，戴维斯及布鲁姆相聚。查普曼在后来写到，他在不兰丹接下去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他生命中，其中一段最快乐的日子。

我每一次顺路到不兰丹营会见英国官员时，他们总提醒我，有关他们要见马共高层商讨及签署与东南亚司令部军事协议的迫切性。我与戴维斯第一次在昔加里见面时，他就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立刻发了一封信给当时据我所知身在新加坡的马共总书记。我在信上详细描述我与戴维斯及布鲁姆的会议，及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然后，就等待他的回复。

日复一日，数个星期过去了，英国人开始不耐烦，并认定是我在阻碍他们接触共产党高层的管道。没有任何事比这更加不确实了。事实上，我们马共的联络系统，完全依赖为我们负责传达消息的交通员。日本人早就对准我们的交通员网络，使我们必须不断的寻找各种避免受到他们攻击的新方法，这造成了许多不可避免及令人恼怒的延误。

我最终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告诉我他正在安排 12 月杪的霹雳之行。总书记将亲自与东南亚司令部官员会谈的事实，让我觉得他非常注重这会议的成果。他指示我不可向戴维斯及其同伴透露他是马共最高领袖的身份。我只可向英国人表示，一位可以对联盟事宜全权作出决定的中央委员将在圣诞节后到不兰丹来。

我依约定的时间，在美罗北部会见了我们的领袖。他是在见面的前一天，驾驶他的黑色奥斯丁（Austin 10）从新加坡北上。事实上，我们集合的地点是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乡村，接近前往不兰丹山路的路口。我即刻发现他有病在身。他显得衰弱及呼吸困难。到不兰丹营两小时的登山路我们竟然花了四个多小时。大约每 30 分钟，我们需要停下来，让他休息。到达营地后，他大概休息了一个小时，恢复了精力及沉着后，再会见英国人。

* * * * *

对一个献身于共产党事业的人来说，我对这个我所安排的会议既期待又害怕。虽然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我们的总书记，我们两人的关系看起来也很友善，但在党的严格等级结构下，我在他的到访过程中都由他指挥。我入党已有四年了，党领袖依然是神秘莫测的。很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姓名。全部人都知道他在党内的化名：莱特（Lai Te）。任何来自莱特，或与他有关的命令都必须立刻被关注，得到绝对的尊重及毫不质疑的服从。他是一名越南裔，却掌控一个完全属于华裔的运动，这事的确存在着一种奇异的矛盾。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党内日常的活动中，它竟然不曾成为一个课题。

在不兰丹，莱特继续维持他的神秘感，指使我介绍他为张红，他的另一个化名。我照着做了。在会议棚内，我就坐在“张红”右边。

会议开始了，戴维斯首先展示了他那封东南亚司令部的授权书。他接着表

示，他本身，布鲁姆及陈翻译员都是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海军元帅的军事代表。因此，他说，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与任何马来亚抗日组织合作。

张红方面则表示，他是以马共委任的代表，马共军事部门—抗日军，及马共的政治运动－抗日联盟的代表身份出席这个会议。他完全没有提及他是一个中央委员。尽管如此，他很清楚地表明，他有权力履行会议上所达致的任何决定。

那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面。这边坐着的，明明就是马来亚战前最大的通缉犯，一个被前殖民地政府冠为非法组织的共产运动领袖。而正在与他讨论着合作条件的却是那些通常对付共产党，监禁及驱逐我们的人。

戴维斯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整体计划，建议由东南亚司令部来指挥我们的合作行动。作为交换，英国则将为我们的游击队提供军事训练及军火。另外，东南亚司令部准备提供运作基金。戴维斯表示他已经提出这项要求。张红提出了每月 5 至 7 万叻币（马来亚货币单位）的要求。这预算看起来并没有吓坏这个英国团。

会议初步阶段的进展，让我很清楚地觉得这些谈判对我们党的将来非常的关键。英国人非常需要我们的协助，我们在讨价还价上占很大的优势。

结果，戴维斯在会议一开始就清楚的表明谈判仅限于军事事务。他，布鲁姆及陈并不代表英国政府或其他盟国政府，包括苏联。他们在那儿，完全是代表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张红并没有针对这个立场表示异议，并向我暗示，只有他将代表马共说话。我坐着安静的聆听。

我记得很清楚，会议的第一阶段讨论到一个要点。当他们在为英国最终重回到马来亚的地位定义时，张红对英国人所用的“重新占领”（re-occupying，re-occupation）的字眼提出了抗议。在这儿，他们你来我往的讨论了很久，直到达致妥协，最终以“收复”（re-take）的字眼解决，纳入协议中。在历史的语义学中，“重新占领”应有永久及合法的含意。而“收复”，至少在张红看来，较属于一个暂时的状态，暗含本来就不应该“夺取”（take）的意思。

在第一天的第二段为时两个小时的商议后，双方大致上达成了协议。他们决定当晚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这记录将在第二天早上正式签署前提出。

第二天，当戴维斯高声朗读由带病的布鲁姆于前一晚所起草的“合作条款”

及“建议与决定详情”时，我非常仔细的聆听。我发现到引言把在场的六个人的名字都写了上去——四个英国代表及两个共产党员。戴维斯念完了文件后，便把它交到共产党的这一边来。张红快速地签了名，便把它交回去。他认为我的签名是不必要的。

戴维斯立刻签上了他的名字，接着是布鲁姆。陈，是最后一个在文件上签名的人。查普曼因为不是锡兰东南亚司令部委派的成员，所以无需签署。

大家握握手，会议上所有的紧张及不愉快暂时都缓解了。这一切完成后，我想可以合理地指出，我们都相信这份文件将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 * * * *

我们最终对抗英国的武装战斗的种子埋置在这份 12 月的协议里。英国那方，由于必须履行协议条文，做了他们原本不打算做的事。太平洋战争结束不到 3 年，马来亚即陷入紧急状态。我们要终止殖民统治的抗争把英国及英联邦军队引回到马来亚战场。这一次，他们打了 12 年累人的漫长战争。

英国共部署了 41 营的作战部队来对付我的军队。本地警察，皇家马来军团，及各种军事单位，包括澳洲，纽西兰，东非及斐济等国的军队都被召到马来亚为英帝国打仗。总的来说，数十万来自海，陆，空军，其中不少是国民服役军人——都被派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当时，我们的部队势力大多时候维持在 3 千人左右，最鼎盛时有大约 5 千名男女队员。

但，那些都是未来的事了。

* * * * *

我离开会议时，对会议的成果心中暗自高兴。因为最终有了一个正式的协议，原则上定下了我们的合作方式。实际上，我们将有机会获取所有“我们”游击队需要的配备，包括武器，弹药，医药供应，制服及财务支援。

所有协议的正面意义，并没有掩盖了这项交易中阴暗的一面。英国人和我

们大家都看到这点，彼此都不相信对方。

三个出席会议的亚裔都使用化名，就是那阴暗面的表征。陈春林事实上就是林谋盛。据我了解，他是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地区的首席特工。他曾负责在重庆国民党情报司令部甄选及安排适合的特务，潜入沦陷的马来亚。这点，英国人很明显地隐瞒了共产党。

我自加入马共后便一直在地下活动，因此并没有必要向英国人透露我的真正身份。

查普曼非常精明地隐瞒着他知道张红真正身份的事实。1941 年 12 月 19 日，他曾经出席在新加坡芽笼区，一间暗淡二楼办公室内与莱特－不兰丹的张红－的一项会议。当时，莱特清楚向他表明自己是马共的总书记。更何况，当时与莱特一起的两名政治部官员事先已向查普曼报告有关这名共产党领袖在英国情报机关内的角色，这个惊人的事实。查普曼被告知，莱特在 1930 年代初，在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已经是一名英国特务了。他是一个被安插在共产党内的间谍。

作为一个忠于党的同志，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也不曾怀疑什么事。事实上，莱特在不兰丹出现的时候，他的双重身份已经升级，变得更具破坏性了。他那时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收罗，并积极的在为日本军事情报部工作。

虽然他已从双重特务变成三重特务的身份，莱特在党内还夸大其词的说，他在强大的国际共产党圈子里有广泛的联系。他自称是共产国际（Comintern）的代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骗术简直让他为所欲为。它们保护他不受英国人的伤害，也不受日本人的侵犯。在不兰丹会议后的四年，他依然获得同志们的信赖，而他为了个人利益，则继续冷酷无情的利用党。

我在开头时说过，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现在要补充一句，叛徒最终也必须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代价。

门牌 36 号的店屋——我出生的地方，如今还坐落于实兆远市内。悲哀的是，它就是那间底层经营多多博彩的店屋。

第二章
一个华人男孩在马来亚殖民地的童年

我在 25 岁生日后不久，才发现到我的实际年龄只有 23 岁。那是 1947 年，我刚被宣布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基于非常重要的理由，我受委为党最高职的事，在起先的好几个月内，一直都是我们中央委员会严守的秘密。理由就是，我所取代的那个人——莱特，已经神秘失踪了。更严重的是，他卷走了几乎所有的党基金——金钱及黄金，总额超过叻币一百万元。

我被党委托的第一份任务就是追查莱特。我知道我们的叛离者已从马来亚及新加坡消失。要追查他，我需要一个护照，而要申办护照，我则需要到我的报生纸，一个我从不曾正眼看过的东西。我通过合法的政府管道拿到了报生纸的副本。令我惊讶的，报生纸上写着，我，王文华，生于 1924 年 10 月，而不是别人一直让我相信的 1922 年 10 月。

在某一程度上，这报生纸至少也让我了解到，为什么我年轻的外表，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话题。在我求学时是如此，在党内早期的活动时是如此，一直到日据时期与英国人交涉时也是如此。当我成为党总书记时，许多同志都比我大十至十几岁。因此，很难消除一些人对我这年纪成为总书记的保留态度。或许对于这个职位，我实在是太年轻了。我那时看着我的报生纸副本，我觉得关于我的实际年龄，最好还是把它当成自己的秘密。我把我的感受告诉党内要好的同志。毕竟，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坚定的信仰，及我愿意为它付出多少。

我年龄上的混淆是这样来的。在华人的传统中，我出生满月后即为一岁。依照风俗，在接下去的华人新年——三个月后，我又添加了一岁。所以，对我家

人来说，那时我已经两岁大了，虽然在西方计算法下，我只有区区四个月大。在我们的大家庭中，并没有所谓的生日庆祝会。我们依照出生次序称呼一例如大哥，三姐 / 妹等。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从没在意你出生于龙年或什么生肖，只是知道你比谁大或比谁小。我原来的报生纸在我还小的时候就遗失了，这事实更促使大家接受了这个华人计算法的年龄。

不久之前，我阅读到一份已被销密，试图形容我及描绘我的背景的“最高机密”文件②。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为了协助各英国军事当局，策划重新占领马来亚而整理的。在整个日据时期，在与那些英国人打交道时，我都非常小心地隐瞒我真正的身份及家人的关系。特别是对戴维斯，那位 136 部队的老特工，更是如此。他就是积极策划使我们抗日军与英国东南亚司令部得以于 1943 年 12 月签署“合作条约”的人。戴维斯在 1945 年 8 月 21 日发给总部的电报如此写着：

> 名字：陈平。福建人。年龄大约 25 岁。华文中学教育。英文中等。理解强于会话。家庭背景不清楚——大概是中产，可能富裕。体格强壮，圆形孩子气面孔。非常勇敢并博得尊重，不拘小节或形式。性格文静，思想敏锐及能力非凡。坦诚及可信赖。非常随和。由于年轻及社会经验不足，因此不善于辞令及不杰出。

在戴维斯的信息于 8 月 23 日，从锡兰东南亚司令部总部转达到伦敦时，那句关于我“性格文静，思想敏锐及能力非凡”的形容被删了，结果更加突出了我的“年轻及社会经验不够”。

所有的印象一直萦绕…圆形孩子气面孔…忠实，可信赖，随和…但是，最终这个孩子还年轻，缺乏经验。戴维斯通过我，与党密切合作两年后，还是弄不清我的化名及完全不了解我真正的身份。然而，我还是感谢他给予我的恭维，虽然他对我背景的评估完全不准确。

我于 1924 年 10 月 21 日，出生于霹雳南部，离怡保大约 50 英里的实兆远镇，甘文阁路门牌 36 号，一间双层排楼店屋楼上的后房。那店屋，就与今天在镇上那些主要经营小本生意的商店一样。

我的父母于 1918 年，在媒妁之言下于新加坡结婚。婚后不久就移居马来亚半岛。我的父亲当年是万丰隆公司的雇员。万丰隆后来在新加坡惹兰勿刹（Jalan Besar）及美瑶街（Mayo Street）交接处设立了其汽车及脚车（自行车）零件总部，那建筑物即是今天的白宫酒店（White House Hotel）。

我的母亲是居住在梧槽区（Rochor）的关家的长女。关家在兴化帮有显著的地位。我的外祖父经营双轮人力车出租生意，出租给那些大多数刚从中国来的人力车夫。这些人都是帮派内的成员，我的外祖父成功地利用他的帮派关系，巩固他的家族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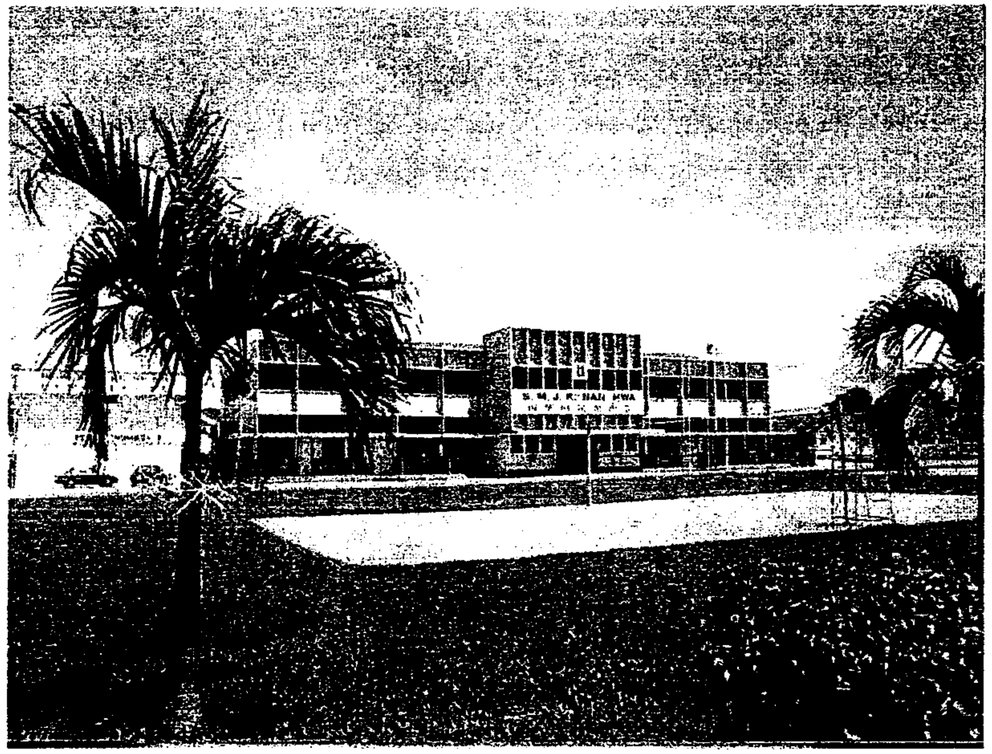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出生于江兜（Jiang Dou），福建省会福州往厦门市半途中的一个靠海的村庄。他的母亲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已经逝世。我祖父长久地面对家人每天糊口的基本问题。在亲人，即是万丰隆贸易新加坡总部业主的庇护下，父亲在年幼的时候就南来新加坡。我父亲与万丰隆的商人都来自同一个村落。村落里的人都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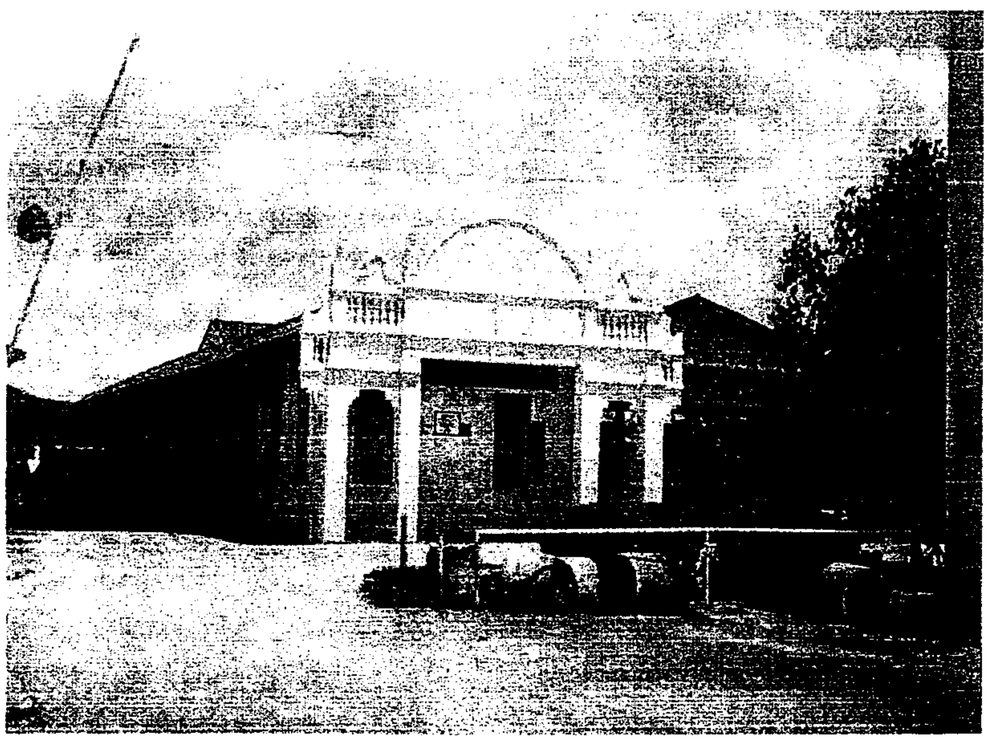
王业主很快的便聘请了我父亲，就这样开始了他在那公司的学徒生涯。父亲是一个勤奋的年轻人，我认为这是他小时家境贫苦所激发的。他到黄昏班学习打字及基础英语。他在万丰隆工作的时候遇到了许多媒人。婚后不久，父亲就北上安顺，在一家由叔父经营的万丰隆分店工作，并在那儿住了一阵子。这对年轻夫妇后来搬入了实兆远附近，甘文阁路，门牌 36 号。就在那儿，他们在安顺叔父的协助下，成立了另一间万丰隆公司。

我父母的婚姻，在最初的十年内算是幸福的。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文静的人，和我交谈时总是言之有理。对第一代中国移民来说，他拥有异常广阔，跨越各种族的社交圈子。我记得，他日常生活的朋友中有两位印度医生，数位马来公务员及一些印度运输工人。他看起来也相当的多元，他可以说马来语，虽然在英语的表达方面有些困难，但在阅读方面还相当不错。我与母亲是以厦门方言沟通，但当祖父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用正式的兴化话交谈。

我父亲对政治有中等的兴趣，他有一两本有关孙中山的书。他也有有关国民党军事事迹的书。在小时候，我喜欢陪他到我们店屋附近的露天咖啡档去。我坐着静静的聆听，大人们所谈论的中国局势发展令我着迷。我父亲看来相当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但在谈到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最高权威的斗争时，都避免表态。他认为这两个都是重要人物。但我父亲看来较关心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多过于达致这个目标所应采取的确定政治路线。

我在被送到实兆远基督卫理公会幼稚园上课时，应该还未满四岁。在那儿，我通过歌曲“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学会了我最早的几个英语词汇。我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可以说是从这学校短暂的上课时间开始。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在几个月后就停学呆在家中，直到“适合上学”的年纪。我的





我曾就学的南华学校还在同一个地点，在实兆远重新命名的甘文阁路上。临街正面已是现代化的建筑物，但建筑物后面部分（下图），那些我曾经坐在里面上课的课室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

正规教育是由华侨小学开始。华侨小学与我家同条路，但还有一段相当的路程。华侨在开办时只有小学，后来扩展为中小学合一的学校。我喜欢上学。我应该稍作解释，作为一个小孩，我享受坐在课室内上课和学习新事物的乐趣。但是，我并不喜欢穿着整齐的校服鞋袜，背着书本，汗流夹背，步行大概一英里往来学校的那种感受。

总的来说，我在实兆远的童年，与一般马来亚殖民地郊外市镇长大的华人小孩一样。我有很多朋友。我们一整年内都有根据热带季节变化而改变的游戏季节，有玩弹珠、踢足球、放风筝及掷陀螺的季节。我们有自创的击球游戏，那是实兆远特有的——一种结合了板球与棒球的游戏。我必须承认，我在这些游戏中并不是高手，然而我非常投入其中，并从中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不少后来加入了我所参与的抗日运动。

在朝向怡保的大路上，离我们的店大概一英里的地方，有一间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施幼守牧师在这间设计纯朴简陋的教堂内，尝试向实兆远大多数信奉佛教的华人传布基督福音。施牧师也活跃于年轻人中，推广运动及休闲活动，他唯一的儿子事实上也成了羽球冠军选手。

在施牧师的催促下，我与我的几个朋友，参与了教堂的唱诗团。我必须强调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唱歌或归依基督教，我们只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在寻找一些有趣及不单调的事做。我们在圣诞节及复活节都会唱一些适当的诗歌。男唱诗团一共有 10 位成员。我们唱的是福建歌。我们在每个星期日早晨，在牧师助手的风琴伴奏下练习。如果我把生命交付予它，我想我现在还在唱那首福建歌“Yasoh ai gua- 耶苏爱我”及英文歌“前进吧，基督的士兵！”(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练习后，我们会参与例常的礼拜，唱诗及读经。过后，牧师太太会在教堂隔壁的住家提供茶点，我们唱诗团的出席率基本上都是看在这茶点的份上。她是一个文静，端庄的乡村妇女，对我们尤其友善。吃完后大概已接近中午时分，我与我的朋友们就会跑到教堂对面，种植园主俱乐部(Planters' Club）旁的大草场玩。那是一个只开放给欧洲人的俱乐部。

我们这群年轻朋友们相当了解俱乐部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我们知道，炎热的正午时间，特别是星期天，洋人是不乐意出来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花四小时在俱乐部周围喧扰一番。我们知道，我们须在午后离开，因为那是欧洲人出来玩耍的时候了。

我从小学开始，就对与中国相关的东西如中文、文化、风俗及她的历史等

产生了兴趣。我们的课本都是从中国来的。然而，都需要经过英国殖民地当局严格的审查。英国人不让我们读到“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侵略”或“侵占”等字眼。有些时候，他们会把课本的几页课文撕掉。有时，这些页数会以一些经过修改后的课文取代。当我们看到这些课文时，我们就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如何，我们的老师们都会告诉我们课文的原本内容。虽然，我只是七、八岁的小孩，我对中国发生的事感到着迷及震惊。我对日本人于 1931 年入侵满洲，及 1932 年初进攻上海事件深感惊讶。虽然殖民当局禁止在华校讨论这些事件，然而这些课题还是时常的在“常识”课中谈到，中文课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的中文老师都是中国来的。唯英文老师由本地华人担任。

那时，马来亚中文背景的小孩除了受学校教育的影响，也都受成人间的闲谈影响。我们的长辈从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中读到有关中国的各类报导。他们通常都对这些报导，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渲染。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贫穷及金钱的力量。在我们店屋附近就有四至五家放高利贷的印度人（Chettiar）店铺。在经济大萧条冲击时，我家人成了这些店铺的常客。我的父母常常在被逼的情况下，将土地抵押贷款。他们最艰难的时期是从 1930 至 1933 年。当时家里一共有六个小孩。最大的是我哥哥，文荣。我排行第二。我之下是两个妹妹，然后再有两个弟弟。

我父亲因为大萧条而差点儿破产。万丰隆新加坡总部送来了超过一万元的零件。在当时，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我们所售卖的货物，并没有太大的市场需求。福特公司以寄售的方式，将大量即将结束生产的汽车款式的备用零件丢给万丰隆。万丰隆并没有察觉到所发生的事，便将这些备用零件推到它的分行去。这些没人要的供应，只有给我们带来财务问题。幸亏，这家新加坡公司明白我们的处境，对于付帐的事，并没有太过苛刻。

我父亲，在渴望尝试赚快钱及解决财务压力下，受到地方上一群华人朋友的影响，企图设立一个中间人经纪业务，他们的计划是向独立的小型橡胶园园主买园，再转卖给大型橡胶园。我父亲在这行尝试了两年。但他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只有加剧我们的财务问题。

由于父亲长时间不在家里，母亲，过去只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在这个时候被迫学习经营脚车及零件的生意。虽然她是个文盲，但她很快的掌握了“阿婆算”——客家人所说的“老妇人的计算法”，指的是“心算”的意思。尽

管母亲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很逞强，但她还是维持华人的传统。我父母亲的封建背景，使父亲一直是一家之主，家也就以这样的方式扩展下去。接下来几年，更多弟妹们相继出世，把原本已算拥挤的屋子都要挤破了。我还记得，当母亲在楼下做生意时，我就要照顾刚出世的小弟弟。她一共生了 11 个孩子。

母亲的伟大功劳就是，以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功地挽救了我们的脚车店生意，使它可以维持一家的生计。我们的脚车店后来成了县内最大的脚车店，我的父母就把它转变成批发兼零售的生意。当他们的信心增加后，我们成为了南洛（Dunlop）汽车轮胎的代理。虽然我们是南洛在实兆远的独家代理，但我父母也卖其他牌子的产品，我们最终售卖几样互相竞争的产品——兀业（Goodyear）、派士盾（Firestone）及米士林（Michelin）等。南洛对这样的情况当然表示不满，但是他们迁就我父母亲的坦率。毕竟，在那水深火热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父母亲认为文荣和我应该在我们完成学业后接管家里的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让文荣到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受英文教育，而我受华文教育的缘故。在我开始上中学后，母亲就放弃尝试吸引我对脚车机件产生兴趣的努力。我想我可能是太懒了。但我实在是对修理脚车、修补穿孔的轮胎及更换破旧的轮胎等没有兴趣。所以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我愿意协助处理生意上的簿记及会计，我就不需要去碰脚车的骨架、轮子、辐条、链条、踏板及其他等。

店里一整天的收入都投入一个收存现金的抽屉内——一格是硬币，另一格是纸币。每天结束营业后，我们就从抽屉内把现金拿出来计算，并与当天的收据核对，最后才存入一个钢制的保险箱内。保险箱有两套锁匙，一套由母亲保管，另一套应该是由父亲保管的，但是父亲因为经常不在家，因此便交给了我。我每天放学回家后，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启这个保险箱。我负责把钱存入银行。每当我们累积足够的钱后，我就把钱提到靠近法庭转角处的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把它存入我们的户口。当时的银行经理是一个英国人。他有两个助手，一个是华人，另一个是印度人。

幸亏我的哥哥文荣对机械领域的东西有强烈的兴趣。他是一个学习速度很快的人，并已决心朝向从事这个行业。文荣熟练的维修技能包括了脚车及汽车。他可以将整副复杂的机器拆开，修复它的功能后，再完整装配起来。他可以给最复杂的电动机重新配线，让它可以像新的一样操作。结果文荣最终继承了整个生意。问题是，我的哥哥是一个心地过于善良的人，他对提醒顾客有关他们

的欠款及收帐都感到困难。在我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通缉犯后，一些顾客甚至占他的便宜。常有一两位顾客这样嘲弄他："你要钱，就叫你那位共产党弟弟来收吧，我们会把钱交给他的。"我哥哥常常需要使出全部的信心，才能开始收账。

令我母亲感到不安的，是我对阅读非常地兴趣。在我 11 岁时，发现到我的父亲及在我们实兆远店里工作的一名书记共同收藏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开始阅读这些书，并对中国古老的冒险故事内的复杂情节非常熟悉。我认识了中国的各个朝代。我贪婪的阅读有关战役的细节，朝廷的对抗及战争的策略。《三国演义》是我后来最喜欢的书。我对传奇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读与战事有关的书，为什么一些朝代会分裂，而另一些却扩大；它们的军事首领所采用的战术；正邪的交手，正派如何攻击邪派；贫苦大众如何对抗暴君。

我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使我的思考更加敏锐，使我了解到我在学业上的不足。我的成绩，包括我的中文能力，也开始进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加剧后，我也很自然地关心起中国的未来。

我升学的课题令母亲十分忧心。文荣以好成绩完成了关键的教育阶段。如果需要，他可以随时进入生意领域。我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在我完成小学 6 年级时，母亲非常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否有能力让我升上中学。

碰巧实兆远天主教神父，一位骑脚踏车的中年华人，偶尔到我们的店来修补或更换轮胎。在修理的过程中，母亲通常都会与他以福州话聊天。传教士总会察觉到任何归依为天主教徒的可能性。一名有一群孩子，艰苦努力以维持一家生计的妇女的困境，明显的是一个可争取的对象。神父在数星期后再回到脚车店，并提出一个正式的建议，教会可以送我到霹雳北部城镇太平，或槟岛上的教会中学读书。母亲与我讨论了这件事。她说，那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决定在于我自己。母亲是一个佛教徒，那时并不虔诚。她后来确实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当时大概有点担心我会信奉天主教。但，我想，如果可以从众多繁杂的问题中，解决了我的升学问题，也应该会让她感到安慰。

我对信奉天主教一点兴趣都没有。事实上，在儿童时期，我与我在实兆远的朋友们玩游戏时都尽量远离那个组织。它对我们来说，太过的严肃及令人感到害怕。我们较喜欢在当地的回教堂周围玩耍。我们知道教堂内祈祷的地方是禁区。但那供冲洗的水池可以让我们尽情地玩。那童年时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潜意识内，大概也造成我直截了当地向母亲表示，对神父善意的提议没有兴趣。

拒绝了天主教会的提议，母亲节俭地让我完成了 3 年的初中教育。尽管如此，我的求学生涯后来面对另一个财务危机的威胁。在我高中半途时，学校没有了运作基金。我与母亲商讨这个问题，并告诉她既然学校不能让我完成学业，我选择到新加坡去，与那儿的外婆及亲人一起住。那时，我母亲娘家已经出售了人力车的生意，但仍居住在梧槽区。我当时希望可以到金炎路（Kim Yam Road）新开办的中正中学就读。

我在实兆远的一些旧老师都已移居到新加坡了。我希望可以再见到他们。然而，对于离开，我还是有种矛盾的心情。那是一个情绪复杂，彷徨的时期。我参与了实兆远区内的华人民众活动。我当时是 13 岁，虽然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以为我已 15 岁了。那时，我对左派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即使是后来的一段时间亦是如此。

回首逝去的岁月，我总是小心翼翼，以免自己掉入美化过去的陷阱。我的生活毕竟也太少事物能让我为陈年旧事撒谎。但是，我没有依计划到新加坡升学的事，成了我后来决定人生方向的关键因素。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策划我的一生。

事情的演变，决定了我这一生的事业。

陈嘉庚，他是新加坡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领导中国筹赈会。

第三章
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在整个 1930 年代，你可以从悬挂在住家和店屋墙上的照片看出实兆远一事实上整个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倾向。1931 年 9 月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攻打沈阳）之后不久，墙上所悬挂的照片是针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第二年，他们攻打上海。

在 30 年代初期，一些家庭把国民党的蒋介石大元帅视为中国的真正领袖。他的照片悬挂在这些屋子的墙上和走廊。但几乎每一间店屋都有悬挂孙中山的照片。每一个人都把孙中山当成中华民国国父。

一般而言，实兆远的居民似乎是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整个市镇的房屋都有悬挂国民党著名战争英雄的照片。我特别记得两个人：在东北领导抗日的马占山将军以及上海地区的指挥官蔡廷锴将军。我们家中没有悬挂蒋介石的照片。我的父亲只选挂孙中山、马占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的照片。

我们一年之中在中国的几个国耻日佩戴黑色臂章以示纪念。例如，在 5 月份有两个国耻日。5 月 3 日是纪念日本军队于 1928 年 5 月 3 日在山东省省会济南攻打蒋介石的军队。那次事件导致 3 千 500 名中国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在 5 月 30 日，黑臂章是纪念“五卅”惨案。在 1925 年的那一天，英国警察朝在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局外面抗议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开枪。那次屠杀事件在中国各地掀起罢工浪潮，也演变成全国性反帝运动。

在 30 年代下半期，祖国事态的发展，使到在马来亚华人中出现明显的政

新加坡总督托马斯爵士和夫人，这张照片是在新加坡沦陷之前拍摄的。为了避免为殖民地政府带来政治难堪，托马斯使到陈嘉庚同意五项重要条件，限制中国筹赈会的范围。

治分化。开始时，这种分裂发生在国民党在马来亚的支部的左派和右派之间。当时人们并没有支持正在崛起的毛泽东。

1936 年的西安事变，使我们对中国政治演变的情绪性反应增加。分化加剧，因为中共的论点变得更强有力。东北著名军阀的儿子张学良元帅遵守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如此，他奉令把麾下军队往南撤。张学良的行动受到严厉批评，但他没有透露造成他采取那样的行动的背景。不过，他后来了解到，蒋介石是要利用他去粉碎中共。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欺骗行为感到愤怒；他挟持了蒋介石，成为轰动的国际新闻。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和中共高级领袖周恩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达致了妥协。一系列幕后安排巩固了妥协方案，使中国避免了灾难性的内战。

另一方面，在实兆远，我记得长辈们给这些事件弄得不知所措。在他们还未能完全弄清楚蒋介石被俘和最终获释的影响之前，1937 年 7 月 7 日的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北京附近永定河上的芦沟桥，以及永定河上游不远处的一条火车桥展开配合性进攻。那项侵略引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

在整个马来亚——事实上，是整个东南亚，号召华人救国的呼声此起彼落。这种救国热忱引发一系列行动与会议。一些人号召中止对日贸易，许多人呼吁华人技术人员回去中国协助迁移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件特别重要的事项，是筹款团体动员起来，筹款协助中国抗战。

在殖民地的权力走廊，警钟响起。英国人担心马共会在日益蔓延的鼓动中得到好处，他们暗中操持，以控制迅速高涨的情绪，及确保所出现的任何组织都是得到政府批准的。中国筹赈会于 1937 年 8 月在新加坡成立。这个基金会由陈嘉庚领导，他是著名企业家，得到当地人拥戴，在新加坡中华商会举行的一项集会上，他当选该基金会会长。

在集会之前，陈嘉庚会见新加坡总督托马斯（Shenton Thomas）爵士。为了确保政府批准该基金，陈嘉庚同意总督所定下来的五个条件。它们是：（1）筹募到的一切款项，只能作为民事援助用途；（2）在筹款时不能有强迫行为；（3）只能有一个中央机构负责调拨基金；（4）该基金不能与任何挑衅性的反日声明有所联系；以及（5）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任何援助是导向军事计划的用途。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马共成立抗敌后援会——这引起英国当局的恐慌。这和陈嘉庚所设立的基金完全相同。在几个星期之内，后援会的支会如雨后春笋

般在半岛各地的市镇纷纷成立。

从一开始，后援会就宣布它是为了促进中英友谊。然而，它最多只是半正式、半合法的机构。殖民地当局一直阻止它获得正式注册。为了避免受到政府的全面镇压，后援会把本身描绘为筹赈会的坚定支持者。

筹赈会和后援会同时鼓吹的论坛，提高了我的政治醒觉。我还是小孩子时，沉迷于古典小说，我希望我是中国古战场上的爱国英雄，见证正战胜邪。在青少年时代，我深受中国当代历史影响，但对于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缺乏方向。

1930 年代末期，蒋介石政府派军官来到马来亚，唯一的目的是召募华人青年抵抗日本侵略者。英国殖民地当局没有反对这项人力动员；他们也不介意国民党募兵队的到来。募兵队成员在马来亚执行任务时穿平民服装。募兵队的活动受到本地中文报章大事报道。我的一些同学受到招募，前往中国受训。服兵役者的条件相当基本。他必须年届 15 岁，念完初中，当然身体必须相当健康。申请者一旦被录取，将在广西南宁步兵学校受训三年，毕业后成为低级军官，有资格担任排长。

这种性质的招募行动至少持续到 1940 年。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这些受到招募者的其中一些人奉蒋介石政府的命令回到马来亚，加入英军的 136 秘密部队。

我对比我年长的同学方守义所作的决定特别感动。他乘坐货船到中国，最后加入中国空军。方守义后来寄照片回实兆远。在照片中，他穿着飞行员制服，看起来很帅。我很羡慕他。我一向身体壮健，但就是没拥有像方守义那样的体育身型。当募兵运动开始时，我只有 14 岁，而事实上只有 12 岁，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当兵。

不过，我决心成为有用的人。某些事情发生帮助了我。我有一位同学杜龙山，比我高两班。龙山刚刚毕业，担任教师。有一天，他来到南华中学，他介绍说和他一道来的是张黄石。龙山和张黄石是代表后援会到学校来。他要求让张黄石在学校的集会上发言。校长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分子，抱持自由态度，比他的大部分同事更加开明。他决定，可以让张黄石向学生发表演讲。

张黄石谈到历史的戏剧性转折以及中国的可能命运，我听得入神。他呼吁

这张照片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照片中英俊潇洒的实兆远青年是方守义，他是比我年长的同学，到中国受训为战斗机机师。守义在战后成为成功的资本主义商人。我们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我最后一次见到方守义是在 1938 年。我是在开始写这本书时才知道他还健在。我很高兴地报告，他现在八十多岁，健康良好，和家人住在新加坡。

年轻的听众们参与抗日斗争。不过，他没有鼓励我们去中国。他是出色的演讲者，我对于能够成为他的听众感到光荣。

第二天，龙山回到学校。他带来一本正式的登记簿，让有兴趣参与后援会工作的人登记。有将近 200 名师生报了名。我的名字也在内。过后我们根据后援会的需要分成小组。我们定期开会，在会议上讨论祖国的形势。过了一段日子，后援会以激进主义闻名，政府开始展开镇压行动。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少。在我那一班，只剩下 12 名左右的活跃分子。

我发现，我越来越积极参与学校的学生事务。在报名参加后援会之前，我已经是学校的学生会—学生自治会—的一分子；学生参加自治会是强制性的。在 1938 年，我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学生会主席是女生，她打算成为教师。副主席是我班上的同学，是当地的男生。

我们的学生会的操作方式是，身为第三号人物的总务做最多工作，负起学生事务的日常工作。我安排每一件事，从图书馆事务到成立读书会到筹备学生的各种比赛。在我担任学生领袖期间，读书会非常出名。会员必须不时捐钱。所筹到的钱用来买书，都是从怡保买来的。我们购买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原理的中文书。在我们读完那些书之后，把它们仔细地排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让其他同学借阅。大约在那个时候，我读到美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书 Red Star Over China 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

我发现我横跨三个组织——后援会、筹赈会及学生会。最令我着迷的是后援会，我也知道它只是半合法。学校当局知道后援会有政治意图，因此，学生会应该禁止与它有所关连。我不加理会。事实上，我承认，我利用负责学生事务的有利地位，去做对后援会有利的事。

* * * * *

直到 1939 年，我才了解到后援会的民族主义爱国倾向背后的真正动机。学校的老师们了解到，政府正在压制后援会的活动。殖民地当局逮捕了后援会在新加坡的一些活跃分子，把他们驱逐到中国。这一切导致后援会在实兆远的支会会员大减。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必须离开后援会。我认为，它的目标看来健全，英国人似乎太过多疑。

信仰共产主义就像信仰宗教那样强烈。它提供对一种制度的信仰与信任，而这种信仰至少对信仰者来说，似乎是通往使人类享有权利与公平的毋庸置疑的真正道路。我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和左派的著作，但回顾过去，我现在了解到，我个人会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从阅读一个人—毛泽东—早期的著作开始。我发现他所写的小册子《论持久战》令人折服。那基本上是讨论如何战胜日本人的一本小册子。在《论持久战》中，他号召动员人民，以及采用游击队战术。在读完那篇文章之后，我再也不想去国民党开办的军事学校念书了。相反的，我开始考虑到中国去参加毛泽东的队伍。我那时被认为是 15 岁。我敢肯定，我那时还没有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但我敢肯定，那时我对令英国殖民地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共产主义哲学十分着迷。

后援会日益变成非法并未使我的热忱减少。但那时我已扩大阅读范围，日益受到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包括国民党的和中国共产党的）的著作所影响。在 1938 年，那些军事家发表无数研究文章，讨论如何最佳的击败日本侵略者。使我深受震撼的是，国民党的军事家就是无法掌握中国所面对的威胁。共产党的军事家除了消息灵通之外，似乎也更有远见。我比较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的演讲词。蒋介石的演讲词尤其没有说服力，他太过强调需要西方的援助，以及这类援助所可能产生的冲击效果。国民党的战略，似乎是建立在西方援助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可靠的方式。接着，我从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著作《苏维埃民主》中发现她的亲共思想；我读的《苏维埃民主》也是中译本。斯特朗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坚定，她住在苏联，甚至嫁给一位俄罗斯人。她在前往中国后访问了毛泽东，并因而成名。毛泽东告诉她，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成为名言。

后援会在实兆远的支会由县委员会控制。后援会按照会员的职业分成几个小组。他们包括店员、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后一类包括教师和记者。1939 年，我被委任为后援会县委的一名委员。我也担任后援会在当地的学生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在后援会架构内进行的小组讨论，通常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我们所关心的集中在中国和她的日本侵略者。但我们也讨论我们周围的白人殖民地主人的特权地位。我们对他们的固有傲慢和在社交中“不准亚洲人参加”的态度感到生气。我们的讨论经常探讨殖民地宗主国对亚洲和亚洲人的剥削。对于把外国资本主义原则引进到本地经济，我们强烈质疑。这种哲学似乎只是为了助长不平等，特权基本上由种族决定。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期及其影响，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殖民地主义对东南亚的入侵以及伴随而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必须加以挫败。我们的长辈眼巴巴看着英国当局围捕印度契约劳工。这些印度人原本被带来在树胶园丘工作，现在他们失业了，睡在五脚基，对他们的白人主人不再有用，他们受到围捕后立刻被当成舱面货物送上货船，驱逐回他们的祖国。情况必须有所改变。但如何改变？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仍然没有答案，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在实兆远，我们采用中国的校历。在 1938 年 7 月至 8 日的暑假，我有一个月的学校假期。和往年一样，在那段时间内，气候潮湿。在暑假开始前不久，一位老师把我拉到一旁，主动要把他书房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其中一部分借给我。我选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作者写的书。它们全部是中文本。这些书将是我在假期中的读物。

我的母亲在那之前不久在离开实兆远不远的红土坎（Lumut）开了一间分店。她委任她的一位男性长辈亲戚打理分店的业务。我问母亲我是不是可以去新分店帮忙。她很快就答应，可能是寄以一丝希望，这个一向对做生意没有兴趣的儿子，最后终于明白过来。事实上，我不想做其他事情，只想阅读我刚刚借来的书。

欧洲的全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德国在上一年 3 月占领了奥地利。事实上，在我的假期结束之后一个月，在 1938 年 9 月 30 日，慕尼黑条约（Munich Treaty）崩溃，德国在第二天闪电占领捷克的苏台德区（Sudetenland）。在地球的这一边，日本加紧进攻中国。世界是令人既兴奋又害怕的地方。我对这一切都显得知识不足。我声称要去帮忙的亲戚，很快就不得不接受现实，即不管在任何方面，他都是我母亲派驻在红土坎的唯一代表。

每一天，尽管天气炎热，我单独一个人留在店屋楼上，一连看几个小时的书。我第一次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在傍晚时分，我照样是一个人，沿着附近的河边散步，享受傍晚的微风吹拂。这成了习惯。在阅读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在混凝土小码头的末端进行冷静的思考。我在思考，来自实兆远的一位华人小伙子，应该怎样适应在这样动乱的时刻的各种事件。我现在认识到，是在红土坎的那一个月假期，在店屋的一楼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在小码头偷闲和放松心身之间，使我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在 1939 年接近年底时，我的华文古文老师陈景云安排我和陈路见面。陈景云来自中国的书香世家，他是当地后援会的领导成员。陈老师形容陈路是设在怡保的霹雳州后援会的高级执委。据说陈路所关心的主要是工人事务，我不大认真看待这项约会。我代表学生。陈路关注的是工人。除了后援会的筹款集会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因此，我没有出席那次会面。第二天陈老师查问我。他表明，我已失去一个重要机会。他特别感到失望，因为他和学校的教学合同已经满期，他即将离开实兆远。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怀疑，有人要招募我加入马共。

不久之后，我的朋友杜龙山来探望他的父亲。他的家庭在实兆远南面大约六英里的甘榜力侨（Kampong Lekir）拥有和经营一间杂货店。杜龙山要我去他的家，我在他家中和他长谈，才得知马共在后援会扮演的角色的详情。

首先，他告诉我有关张黄石的事。张黄石就是在南华中学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的那个人。他说，张黄石原本是中国的一名共产党县委。在一、两年前蒋介石展开清除共产党的镇压行动时，张黄石差一点被警方逮捕。过后他来到马来亚，这儿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张黄石在和马共联络上之后，采用党名“黄诚”，这个名字在多年后在马共内成为传奇。事实上，他将成为马共党内仅次于总书记莱特的第二号人物。龙山解释说，事实上，张黄石开始静悄悄地在怡保的霹雳州福建会馆担任受薪秘书。较后他在当地的一家华文报担任记者。他在担任记者时，成为霹雳州后援会的领导成员。

我们喝了几杯当地的咖啡，我得悉，马共的确试图招募我。据披露，我没有去会见的陈路是马共霹雳州州委。他特别来到实兆远，是为了初步接触我。龙山承认，他本身是马共党员；并且表明，现在由他负责招募我加入马共。

龙山透露，我的华文老师陈景云是马共在实兆远的唯一代表。由于陈老师已经离开，实兆远已经没有马共代表。他们要我取代陈景云，领导实兆远的政治活动。龙山进一步告诉我，会有其他党员从其他州调派到实兆远。龙山保证他会在几个星期内派人联络我。

因此，可以说，根据记录，我在 1940 年 1 月成为马共的候补党员。那个时候，我不必签署任何文件或发表任何誓言。我在口头上同意就够了，而我愿意专心于后援会的活动，以便初次尝试成为秘密的马共活跃分子。

学校在 1940 年 1 月底开课时，我发现有三名马共党员刚刚注册为南华中学的学生。两名男的来自和丰，一名女的来自槟城。我的母亲对我取消前往新

加坡升学的计划仍然不满，她希望我转去英文源流的英华学校就读；我的哥哥文荣就是在那间学校念书。那间学校的学生不准旷课。如果他们缺课，必须出示家长的解释信。

这种情况当然对我非常不适合，因为我正要过作为马共党员的生活。我需要时间从事课外活动，而要获得家长的信解释旷课原因令人不胜其烦，连想都不要去想。为了摆脱困境，我告诉母亲，我已经超龄，不能在英华学校念书，我只能在英华补习学校报名就读。那间学校不注重纪律，这对我有利。

母亲并不知道，我在南华中学的最后一年，成绩一落千丈。在那之前，我一向是班上前十名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到英华学校就读的我的同学以及在附近的英华女校就读的女学生，都因为我到英华补习学校念书而嘲笑我。

总的来说，我的新学校的老师不理会我。他们认识我以及知道我之前念过些什么。因此，我的数学课大部分不必上。我偶尔有去上数学课，但都没有专心听课。我只是坐在后排，看我的社会主义书籍。

有一次，我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靠近课室门的地方，聚精会神地在看中文版的《联共党史》（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在殖民地的马来亚，那本书当然是禁书。我没有注意到，校长已经走进课室，他走到我的座位边，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抢走那本书，把书本摔在我的桌面上，过后他改变主意，没有等待我的答案，就快步离开课室。我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看禁书时必须更加小心。

我发现本身处境尴尬。转到实兆远的三名学生是正式党员。我只是候补党员，却负责领导实兆远小组。也许在怡保的霹雳州委考虑到我来自实兆远，比较熟悉当地的情况。

当时殖民地当局加紧展开反共运动。在 1940 年 3 月至 4 月间，我的几位前同学兼后援会成员被捕。当地的一队警察搜查他们的家，找到与后援会有关的文件。到那个时候，后援会被视为完全非法。不久之后，我被捕的朋友被控上法庭受审。

盛传我将是下一位被捕者。在危机的高潮时期，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从怡保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我随时都可能被捕。他劝我立即离开实兆远。

母亲知道我有激进思想，但不晓得我和马共有联系。幸运的是，母亲刚好去医院生下妹妹。那一天是 1940 年 7 月 4 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母亲当时

是在离开我家约一英里的接生医院。父亲和平时一样，在和朋友喝早茶。这使我可以丝毫不受阻碍地离开。我把几件衣服放进帆布手提袋内，搭上开往巴力（Parit）的巴士。到了巴力，我将搭从巴力开往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的巴士。我所得到的指示是，到了瓜拉江沙，会有人跟我联络，告诉我最终的目的地。

以往我不曾长期离家，有几次我曾经离开实兆远，那是由于无足轻重的原因——例如，跟班上同学到怡保旅行，或是到安顺参加叔叔的婚礼。我也曾几次到槟城作短暂的逗留。当然还有我到红土坎阅读的那一个月的时间。

我第一次尝试参与马共的地下活动，几乎立即以惨败告终。当时我 16 岁，不再视自己为小孩。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正当我乘坐的巴士经过两旁是胶园和锡矿场的次级公路朝北和朝东开去之际，我的一位妹妹在实兆远店屋的家里，发现我们孩子共用的大衣橱内我的一些衣服不见了。父亲在不久之后回家，妹妹立刻向他报告说我逃走了。

父亲立刻通过他的商业交往网络追寻我的下落，他很快就确定，我是乘坐开往怡保的巴士。我父亲的其中一位朋友是木威（Bruas）镇的巴士车站站长，我乘坐的巴士必定经过木威。我抵达木威时，站长上到巴士和我谈话。他说，“孩子，对不起，你的父亲打电话给我，要我阻止你，把你送回家。”他是一位很慈祥的人，在中国时参加过农民运动。他补充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年轻时在中国也做这样的事。”他吩咐我打电话给父亲。父亲问道，“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我解释说，我必须迅速离开，否则很可能被捕。我告诉他，我将去一位朋友的家藏匿一阵子。我没有提到过后将延续的旅程。

父亲建议，“如果你要躲藏起来，何不住在你叔叔在怡保的家？他可以安排你搬到安顺去。”我不可能说“不”。因此，我去叔叔在休罗街（Hugh Low Street）的店屋。我很不情愿地在那儿住了三、四天。

在叔叔的店屋对面是一间脚车店。我认识其店员。他是我在实兆远的同学，也是当地后援会的成员。我向他求助，要他协助我去瓜拉江沙。他向我指出去火车站的方向。我单独一人去火车站，买了火车票，上了下一班的火车。

在瓜拉江沙，当地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和我联络。他通知我，我必须等待几个星期才能转移。我和他一起住在他所租的小房间。他是当地华文小学的采购员，其中一项工作是操作学校的蜡纸油印机。到了晚上每个人都回家之后，我

协助他用油印机替后援会印传单和小册子——这是非法活动。

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奉党的指示，转移到太平郊区，担任那儿的乡村小学的唯一教师。学生们全部都是农民的子女。课室是用亚答盖的小寮。学生每人每个月交5角。我的工资大约是一个月6元。

在实兆远，警察并没有搜查我的家，我猜想，原因之一是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我已经逃走，另一原因是父亲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他们不想使到他更加难堪。

党最后指示我转移到怡保，担任那儿的后援会秘书。这不仅是非法的工作，也是不正当的理想追求。最终，我觉得我在党内有点作为了。我租了一间小房间住，而且很高兴发现到，我的前同学龙山是秘书处负责人，而我将在秘书处工作。

在怡保，我成为正式党员。对我来说，那是重大的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入党仪式在一间三房式屋子内进行，地点是在怡保——文冬路一个市场旁边。那间屋子是当地一名党员的母亲的，我们秘书处的一名成员租下大房，我们在那间房间内开会。屋主相当了解我们是在做一些激进的事，但不晓得我们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在我宣誓入党的那一天，我填了入党表格，宣誓，取了一个组织名字“王平”。按理，以后在党务上提到我时就是使用这个名字。

成为正式党员之后，我被委任为负责整个霹雳州学运的负责人，以后援会的活动作为掩护。当然，我不能冒着被捕的危险回到实兆远去。我把当地的学运交由那儿的党员去负责。从那时起，我亲自负责从怡保到和丰华人人口集中的地区马共渗透中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和丰被认为是整个马来半岛马共政治活动最集中的地区。

我最初的任务之一，是收集捐款，给据说是患病的马共总书记治病。中央委员会发出名为《援助莱特运动》的指示，分发给各州的支部，要求动员党员和同情者捐款。这被认为是需要的，以应付莱特在养病期间的开销，指示中包括列出莱特的简短生平，其中特别提到他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到处去收集捐款和给他的慰问与致敬信。捐款来自各领域。学生、文员、劳工、农民——全部都捐款。我总共替莱特养病基金筹到约50元。那笔捐款及时被送到新加坡去。

从我离开那天开始，母亲不肯相信我不会回到实兆远。她出了接生院以后，

开始寻找我。她询问和纠缠我的朋友们。其中一个人最终联络到龙山，然后告诉我那焦虑不安的母亲，说我人在怡保，活得好好的。但她只知道我的下落还觉得不够。她再一次不断纠缠我的朋友们。直到其中一个人-就是在我叔叔位于休罗街的店屋对面的脚车店工作的店员-最终安排我和母亲见面。他坚持我必须这样做，以使她少操心。我经过多次的推搪之后，同意和母亲会面。

会面于一天傍晚在那位店员租来的住所内进行。在那间狭窄和闷气的房间里，母亲哀求我回家。我告诉她那是办不到的。她开始哭泣和请求。她说，在我离开实兆远之后，她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哭泣看来无效之后，她改变策略，提到一件特别的事。她声称，在我离家之后不久，她中了彩票。她用其中一部分的钱买了一部新车。她再次开始哭泣。她恳求我在两件事中选择其一。一是我回家继续学业，因为家中现在能够轻易支付我的教育费。二是她买一片小胶园让我管理。我提醒她，如果我回家，肯定会被捕。

这导致第三个选择。她将送我去中国，我可以上大学，同时追求我的民族主义理想。几年之后，我可以回到马来亚，那时可以安全的恢复在实兆远的生活。母亲认为，几年之后，一切会被遗忘。由于我所受到的教养以及我对她的尊敬，我不能对她讲对抗性的话，我不想伤她的心。我必须小心讲话，措辞谨慎。我触摸她的手臂，感谢她给我的选择，但我向她表示，现在我很难改变生活的方向。她看着我，眼中含着泪水，“你真是铁石心肠。”她沉默一段长时间，用福州方言的词句形容我，说小鸟的翅膀长硬了。我懂得她的意思。她已经认识到，再试图控制我将是徒劳的。不论流了多少眼泪，她还是必须接受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她在离开房间之前，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吩咐我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向她保证会照顾自己。她把300元塞到我的手中，并且交代我小心，“不要被捕。”

我向她保证不会被捕，而尽管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终于遵守了诺言，没有被捕。虽然我必须承认，这么多年来，有无数次几乎被捕，使到我认为会再一次对母亲食言。

“我与坤华相爱时，我是霹雳州委代理书记。为了严格遵守条例，我向莱特报告这件事。他批准了。我知道他会批准，因为我的未婚妻有忠于党的良好记录：两度因搞活动被学校开除，父亲被驱逐出境，目前她又是党员。不过，我们是在两年半之后才结婚。”

第四章
地下分子成为抗日游击战士

我在 1940 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还未足十年。马共是在 1930 年 4 月底，于森美兰州瓜拉庇劳的树胶园内正式成立。出席创党会议的核心人物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阮爱国：他是越南人，就是后来越盟领导人胡志明。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也出席会议。较早时，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马来亚共产党，因此才召开这次会议。

多年后，首次访问河内时，我有机会与胡志明主席本人讨论这事件。我们一起推算马共成立的准确日期。胡志明记不起准确日期，不过他记得他走出会场时，见到街上挂著红布条，迎风飘扬。这显然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布条。在那个时期，当局不准五一劳动节悬挂布条，视为非法活动。但是，工人不理禁令，还是在五一前夕，悬挂红布条和红旗。节日过后，就立即收起来。根据胡志明的记忆进行推断，我们马共便定 1930 年 4 月 30 日为创党日期。

初期，党自然地是以新加坡为活动中心，因为新加坡的工运发展远远超越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的工运。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警察很快地对马共的成立作出反应，他们的情报准确，在 30 年代上半期，经常突袭搜捕马共分子，使马共深受打击。回应马共的挑战，警方也作了一些改组，调整各部门要对付的目标。政治部于 1933 年成立，接管刑事犯罪情报部（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的职责。在 1930 年与至 1935 年之间，警方在突袭行动中逮捕了不少过六名马共领导人。法庭宣判将其中五人驱逐出境，遣去中国。

莱特是在 1940 年，我开始在怡保从事地下活动还不足两年的时候，成为党

领导人。他正式的职位是马共中委会书记。不少历史学家写了这位神秘人物的书。我们在党内的人对这个人物感到费解，同样地他也令战前的英国，占领马来亚的日本当局和战后返马的英殖民地当局感到难以理解。很奇怪地他选择“WRIGHT”作为他的党名。用华语念这个英文名字就变成了“莱特”。不同的人写或念这个英文名，就有不同的变化，有人念“Loi Teck”，有人念“Lai Tak”、“Li Tek”或“Light”。他还用“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这些名字。

一些著名历史学家指出，莱特不是华人。他是越南人血统。没有人准确知道他抵达新加坡的日期。不过，1947 年，马共展开特别调查，当时由我负责，结论是几乎可以肯定莱特是在 1932 年底到新加坡。有人说，年轻时，莱特曾留学苏联。回到中国，他成为上海共产党委员会的成员。20 年代，他追随胡志明回到印支半岛，并前往西贡发展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展开的调查无法证实这些臆测。

来新加坡之前，莱特是西贡共产党的中级干部。虽然他的母语是越南语，但他也讲腔调很重的广东话和华语。我们展开调查时，越南共产党告诉我们，莱特遭法国人逮捕后便失去踪影。我相信，法国情报局发觉莱特对他们已无使用价值，便与英国人串通，安排莱特到新加坡。

他先在新加坡充当码头工人，参加工运，过后就加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1934 年，警方突袭逮捕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人，一网打尽全体五名市委成员。这给莱特提供很大的方便，让他有隙可乘，立即在党组织内冒升上来。不久他便扩大他的势力，在残余的领导层内步步高升。

当时马来亚共产党的组织下有两个市委会，一个在新加坡，另一个在槟城。在全马各州，马共的组织是以“地区委员会”为单位。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州和柔佛州内就设有两个地委会。彭亨有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委会，柔佛州有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委会。

根据官方的统计，单单在新加坡，从 1931 年至 1935 年，警方总共向马共展开 432 次突袭行动，逮捕了 226 名共党嫌疑分子。过后，大部份被捕者被驱逐到中国。在这些镇压行动当中，以 1934 年新加坡市委会遭扫荡，最具戏剧性和破坏力。党领导层这麼多人被捕和被驱逐出境，这名越南人很快地就递补为市委会新成员。几个月后，他受委为党最高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38 年，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像我这类刚参加共产党的人，一听到有人提起莱特的名字，就肃然起敬，

对他无比的忠心。1940 年，我专心执行我的任务，扩大对霹雳州学生组织的影响力。通过抗敌后援会，我的工作重点集中在怡保至和丰。

我以此方法展开工作还不到四、五个月之久，党中央事先毫无警告，突然发出指示停止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党的指示说，由于“局势起变化”，抗日后援会的活动应停止。

然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上级党领导注意到我的工作表现，1940 年结束之前，我升为马共怡保县委员会的委员。这个由四人组成的委员会是在霹雳州地委领导之下。我照旧负责学运工作，但现在我还要领导较次要的工会，诸如店员、理发师和砖厂工人的组织。店员工会的会员包括餐馆工人、厨师及其助手。这是我参加地下组织以来，吃得挺好的一个时期。那时候，我们常在怡保天主教学院秘密开会。校长有一名专长于烹调西餐的海南人厨师，他是党的同情者。每次在他的厨房开会，我们都享受名副其实的大餐。

重要的锡矿、园丘和交通工人工会是由年纪比我大，经验丰富的党委会成员负责。作为记录备案，我要指出，虽然在 1941 年年初，我和同志们成功争取到怡保地区华人的支持，但当时在怡保市区的党员人数不超过 60 人，而且实际上全部都是华人。在霹雳州，我们的主要势力是来自南部近打河流域的锡矿工人。全州大约有 500 名党员。全国有稍微超出 3 千名的党中坚分子。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展开巴尔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挥军攻打苏联。正如希特勒所预测的，举世屏息以待，苏联的防线受到攻击，苏联空军还未及起飞就损失了约 1 千 500 架飞机。

我们马共对英国的态度立即大转变。欧洲的战火使局势突变，莱特和在新加坡的党中央重新拟定马共的政治立场。8 个月前，党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无关我们的事，现在却视之为重要的反法西斯斗争。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支持英国不仅可以接受，更是十分迫切的事。尤其是日本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张，侵占太平洋边缘地区国家，使这件事更为迫切。日本已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署柏林条约后成为德国轴心国的伙伴国。

在德军发动巴尔巴罗萨军事行动的几天之后，莱特便与他的主子，指挥他的新加坡政治部官员接触。莱特献议，马共召募人员，英军负责军事训练。他建议，把这些人组成马来亚司令部属下的特别防卫部队，直接由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Arthur E. Percival）指挥。

新加坡总督托马斯一口绝拒了这建议。我们在新加坡的地下报纸《自由报》以显著版位报导托马斯的决定，当地的《海峡时报》也公开报导这消息。不久新加坡总督对自己的决定深感后悔。事过半年，托马斯爵士不得不尴尬地改变他的决定。

当时我的处境颇为特殊，让我能获悉这些事件的发展。六月初，我被调动职务，改为在怡保及和丰地区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当时，我负责出版地下报纸《人道报》，定期报导地方上事件的发展和发表评论，同时也刊登欧洲的政治和军事新闻，当然还有中国的新闻。由于警方决心取缔所有共产党刊物，我们必须不断地迁移我们活动的基地，在警方突袭之前早一步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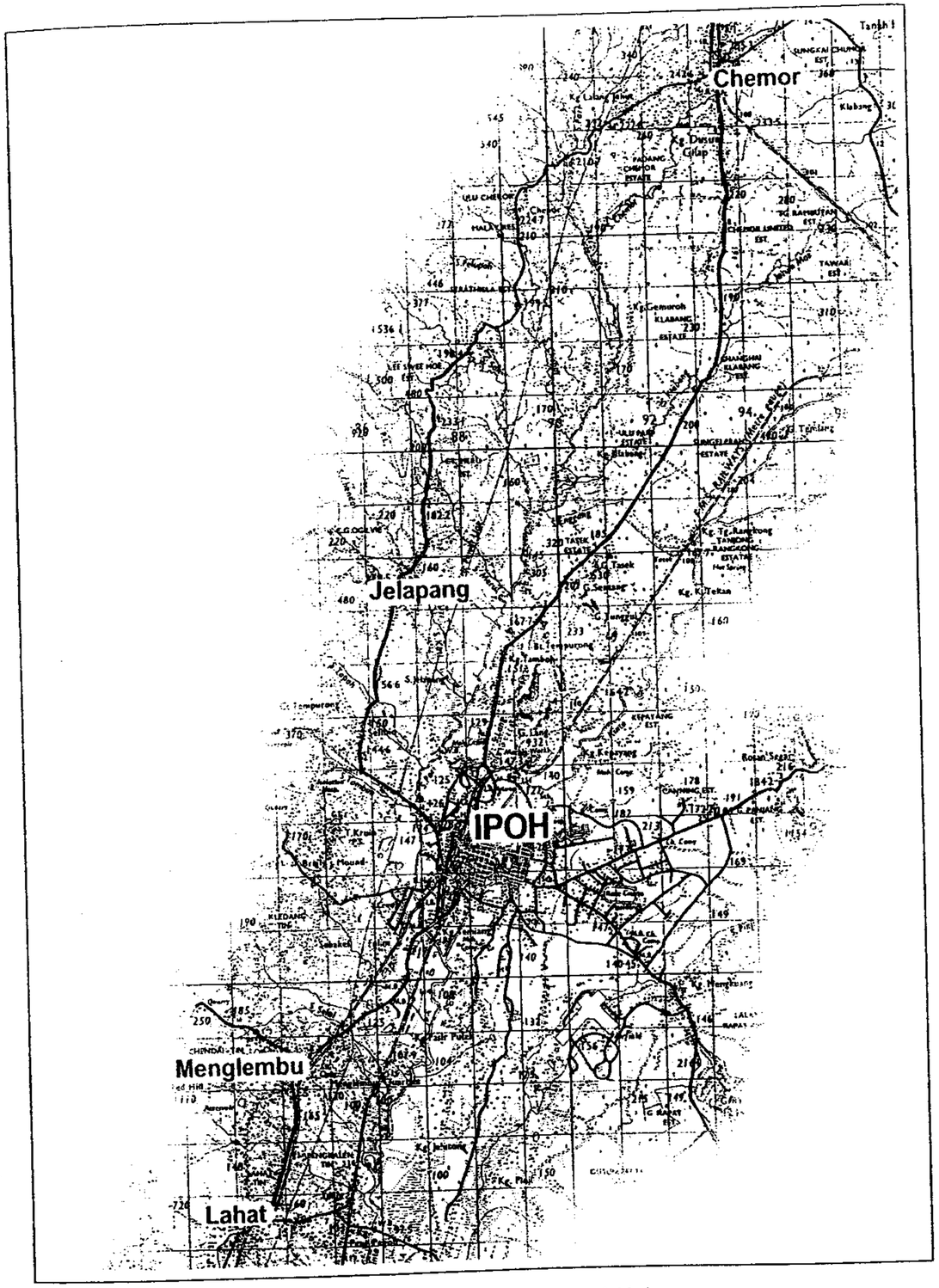
我们发觉，怡保西南面出产花生的万里望的半城乡地区比较安全。几个月之内，我们从锡克人奶牛场的牛棚搬至废矿场的一间破旧的茅屋，接著又搬到南面两英里处拿乞（Lahat）的一间亚答屋，地点偏僻。第三个地点有很高的茅草芭掩护，一边是华人的菜园，另一边是马来甘榜。从安全角度来看，拿乞毫无疑问是三个地点当中最好的一个。警察经过时，会以为这是一间马来甘榜的屋子。马来人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而马来村民会以为我们是华人菜农。

可是，后来这个地点却滋生蚊子，对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最后我患上严重的疟疾。一个星期我卧床不起，不能走动，一阵发冷，接著又是一阵发热。上级领导听到我病重，一位州委领导来探望我，下令立即送我进医院。

我被扶上脚踏车的后座，我的两名印刷部人员在两旁扶著我。脚踏车行经华人的菜园，走过一英里长的泥路，到达通往怡保的公路。他们叫了一辆的士，送我到怡保中央医院。我住院五天，病情严重，有时昏昏沉沉，就在这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 月 8 日凌晨，日军第 25 军在山下奉文中将的指挥下，从泰南的宋卡和北大年，以及马来半岛东北端海岸的哥打峇鲁登陆，并开始朝南向新加坡挺进。

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印度医生为我注射奎宁，然后就要我出院，因为医院的病床要让给伤兵。这是在北部前线作战的英军伤兵。有几天，我住在一名同志的店里疗养，这里离医院不远。我逐渐复元后，重新与党联系。在党的指示下，我前往怡保北面的朱毛，成为州委的助手，负责宣传工作。

* * * * *



日本入侵早期，我的主要活动地点。

在朱毛工作期间，我首次遇到了李坤华，后来她成为我妻子。李坤华来自槟城，父亲是海南人，母亲是广东人，她能很流利地讲这两种方言。她很早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所影响。十多岁时，她已在组织内很活跃。槟城女校校方发现这名 13 岁学生的政治思想。他们认为她参与的活动对其他学生有不良的影响，对学校不利，因此要她离校。

关心女儿教育的父母立即安排她进入槟城女修道院。他们认为，在爱尔兰修女的严格管教下，他们的女儿会很快地学好英文，本来她对语文就很有兴趣。坤华的学业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就遭到逮捕。当时德国已入侵苏联。组织内的一位朋友去了新加坡，成为马共一份亲苏、反德刊物的编辑，并寄一份给她。警方因此找到坤华的家，以拥有非法书报的罪名逮捕她。

家人聘请律师为她辩护。辩护律师指出，这位 15 岁学生因拥有所谓的非法地下刊物而被捕，但是刊物的内容完全没有反英。反之，却是强调反对希特勒。法官同情这名十多岁的学生，宣判释放，但须守行一年。不过修女却对坤华参与活动，导致她轻微犯法的事无法接受，从而不想再拯救她。结果她第二度遭槟城的学校开除。

虽然不是完全陷入绝境，但求学路途上她处于十字路口。坤华就到吉打州与当教师的姐姐住在一起。她住在那里才两个星期，日军便入侵马来亚。两姐妹想回家，但槟城已爆发战争，渡轮中断。她姐姐的一位男同事来救她们，护送两人南下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霹雳州。他是党员，是位有钱人家的儿子，家人在朱毛郊区开采锡矿。他把两姐妹暂时安顿在矿场的办事处。

当地的党组织获知这对姐妹的困境，便安排她们住进一家农户。当时当地的农民都在党的影响下。那场疟疾，又由于太早出院，我的身体虚弱，还未完全复元。当我慢慢投入新的宣传工作时，我得知有一对不久前从吉打到来的姐妹。因此我们就认识了，并很快地发现我们志趣相投。她告诉我有关她父亲的事。她的父亲是抗敌后援会的忠实支持者，在几个月前遭英国人驱逐出境，要送回中国。过后她接到消息，知道她的父亲所乘的舢舨遭到日军袭击，他跳海企图游回马来亚，结果惨遭溺毙。我们两人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一年之后，我们才开始谈恋爱。

男女党员可以谈恋爱，这不成问题。只要他们选择的谈恋爱对象不是被列为“反动分子”或“国民党同情者”就行。政治上中立者也行，当然是同情者更好，如果是忠心耿耿的党员那就最好。然而有一条严格的条例须遵守，你必

须把两人的情况向党报告。在获得党的批准后，才能进一步发展关系。一旦获得上级同意之后，就能毫无阻挠地发展关系。有时候有些人没有按规定向党报告他在搞恋爱。这经常会引起麻烦。当党发现你未获批准就在搞恋爱，处罚轻的话，你必须在同志们面前接受公开的批评。我们经常开会讨论这类事件。

我与坤华相爱时，我是霹雳州委代理书记。为了严格遵守条例，我向莱特报告这件事。他批准了。我知道他会批准，因为我的未婚妻有忠于党的良好记录：两度因搞活动被学校开除，父亲被驱逐出境，目前她又是党员。不过，我们是在两年半之后才结婚。

* * * * *

我到朱毛还不到一星期，日本军队就开到。他们士气高昂，因为在北部的日得拉（Jitra）打了胜仗，又占领了槟城，再沿霹雳河包抄进攻英军，迫英军退至怡保北面的瓜拉江沙。英军印度部队第六和第十五旅于圣诞节前夕，在朱毛地区与西村中将（Takuma Nishimura）率领的日本精锐部队，近卫师团展开激战。英军为了要阻挡日军的挺进，拼死作战，双方死伤惨重。这些英军是要让其他英军部队有足够的时间于近打河流域南端的金宝建立防御工事。

局势急速变化。12 月中旬，新加坡总督珊顿托马斯爵士改变了早先他拒绝马共献议的决定。马共曾通过莱特建议由马共提供志愿人员协助英军。总督是在聆听了白思华将军向他汇报马来亚英军北部防线崩溃之后，才改变态度。北部前线的英军印度部队已溃不成军，山下奉文已将其指挥部迁移至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Alor Setar)。他和他的军官就在英军刚弃守的皇家空军基地的军官食堂举行庆功宴。

在新加坡，双方匆忙地设法做补救工作，执行马共提出的建议。政治部高级官员，也是莱特的主子，特雷姆利特英尼斯（Innes Tremlett）安排马共总书记和特别行动执行部队长查普曼于 12 月 9 日在芽笼一地点会面。特雷姆利特的广东话十分流利，查普曼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参加这次重要会谈的还有政治部警长王振玉。会议是在一间火炭店楼上举行。那间店是我们的人用来藏身的场所。

在新加坡，英国的特别行动执行部是以“东方任务团”为名，展开活动。特别行动执行部建议，以新加坡的 101 特别训练学校的能力所及，尽量召收共产

党志愿人员去受训。当时，查普曼是这所军校的司令官。英国人又同意被捕的共产党人如愿意成为志愿军就能立即获得释放。首次训练课程于 12 月 22 日开课，地点在丹绒巴莱（Tanjong Balai）的军校总部，一座征用的大洋楼，位于裕廊河（Jurong River）口的海角上。

莱特许诺，首批 15 名志愿人员会在约定的十字路口等待，以便送往丹绒巴莱。英国人的计划是要训练和武装他们，使他们成为游击队员，可能的话，在日军开到之前，把他们送到森林里的营地。查普曼向首批受训人员致开幕词。过后他在写给特工部队总部的报告中说，这批共产党游击员都“年轻、强健、士气高昂，是历来这所学校最好的学员。”在这份报告中，查普曼还作出重要的评论。他说，由于警方已与莱特建立了友好关系，英国人与共产党人之间能和睦相处。

查普曼与莱特会谈之后，马共中央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并发出指示，号召新马各地的党州委会和市委会准备展开游击战，对抗日本侵略者。新加坡的党总部清楚地发出这项命令。日军已开抵霹雳州北部，莱特还亲自远赴霹雳州金宝北面的双溪古月（Malim Nawar）召开紧急会议，与霹雳州州委会高级领导干部开会。他再次明确发出命令，号令全马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作好展开游击战的准备。他特别指示与会者更努力地召募志愿人员，去接受特别训练，以展开非正规战争。莱特透露，吉隆坡即将开办这类特别军事训练课程。

英军特别行动执行部官员立即著手工作，与吉隆坡地下高级共产党员取得联络。马共很乐意协助这项计划，进行训练 15 支共产党游击队，然后派他们潜入霹雳州各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断日军的交通线，搜集军事情报，以及救出迷路或掉队的英国士兵。吉隆坡市中心的循人中学被选为主要的军事训练场地。马共立即从霹雳州党员当中挑选百多名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前往受训。

至少可以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时期。一个月前，怡保警方才四处搜捕被指为共产党员的华族青年，现在这些人获得释放，并获得提供交通工具，送往吉隆坡受训。与此同时那些先前被捕，并被送往吉隆坡进一步盘问和扣留的马共党员，也获得释放。进入军校，接受军训，并送回去他们原本犯法的地方，但这回他们是全副武装、受过训练，要去杀人。我在党组织内的指导者杜龙山，就是在第二批人当中。

吉隆坡军训学校受训完毕的第一批人共 20 人，主要是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其中有两、三人是在槟城活动的党员，为避免被捕，南下逃到新加坡。但不幸，

他们还是在新加坡被捕。他们在 101 特别训练学校受训完毕后，按计划，他们是要派往吉打州和霹雳州北部，部署在日军前线的前方。但是日军快速向南挺进，第一批受训人员在部署时，战争的前线已变成位于丹绒马林以南的地方。结果，这批刚受过训练的共产党员被送到吉隆坡北面还不到 15 英里的双文丹（Serendah）郊区。因此，马来亚人民历史性地在双文丹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部队，日期是 1942 年 1 月 10 日。大约十天之后，第二批受训人员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部队，并渗入了柔佛州的金马士（Gemas）地区。

在这个行动计划下，游击队要分布到全国各地的森林里，避免与日军接触，等到战争前线已远远越过他们的各个营地。我们成为真正的敌后部队。我们要避免与敌军全面交战。建好基地后，我们就找寻机会，突袭和破坏日军的后勤供应线。英国人主要是教导我们如何使用炸药，以及莱福枪和汤姆枪的基本使用法。每个独立队都获得两挺汤姆枪，他们不发给我们布伦式轻机枪。受训人员获得分发一把手枪和一些手榴弹。炸药方面，英国人就很慷慨。他们给我们大量的葛里炸药和 TNT 烈性炸药。

我们的人是要在敌人后方活动，不同于英国突击队，因此活动方式也不同。

1942 年 1 月 2 日，霹雳州马共州委会开会，讨论如何与南面马共组织更好协调所有抗日活动。我们与丹绒马林地区的查普曼部队取得联系。当时金宝区的战役进入第四天。战斗进入最剧烈时，当晚英国守军接获的消息，吓坏了他们。消息称，日军已从海路向南包抄，威胁英军后方重要的供应线。日军原本已精疲力竭，准备撤退，没料到英军走得更快，让他们喜出望外。

六个星期之后，州委会再度开会，决定派我去华都牙也附近的督亚冷（Tanjong Tualang）锡矿区，充当马共与查普曼之间的联络员。与此同时，党也派我领导丹绒马林地区的一支游击队。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一。我接获通知，查普曼会在下午三时，于某个会面地点等我。但我的脚踏车数次出现毛病，结果迟了两小时才抵步，查普曼已离去，留下他的一部份武器。

在这之前，我在仕林河地区忙著捡拾武器。英军在金宝突然败退之后，仕林河成为英军在南北公路上另一条重要防线。日军以坦克开路，步兵步步挺进，刚开到的守军立即溃不成军，到处遗弃他们的武器。有汤姆枪、布伦式轻机枪、.303 莱福枪、弹药和各式各样的战场军事配备。武器太多了，我必须动员

当地一批志愿人员协助收集武器。在激战后的混乱中，没有人注意我们这些活动，即使看到，也不在意。战区内数以百计的难民流离失所，在找寻安身之处。开往南部前线的日军增援部队经过时，捡拾武器的人就躲进乡区的草丛中，等危险过去了，又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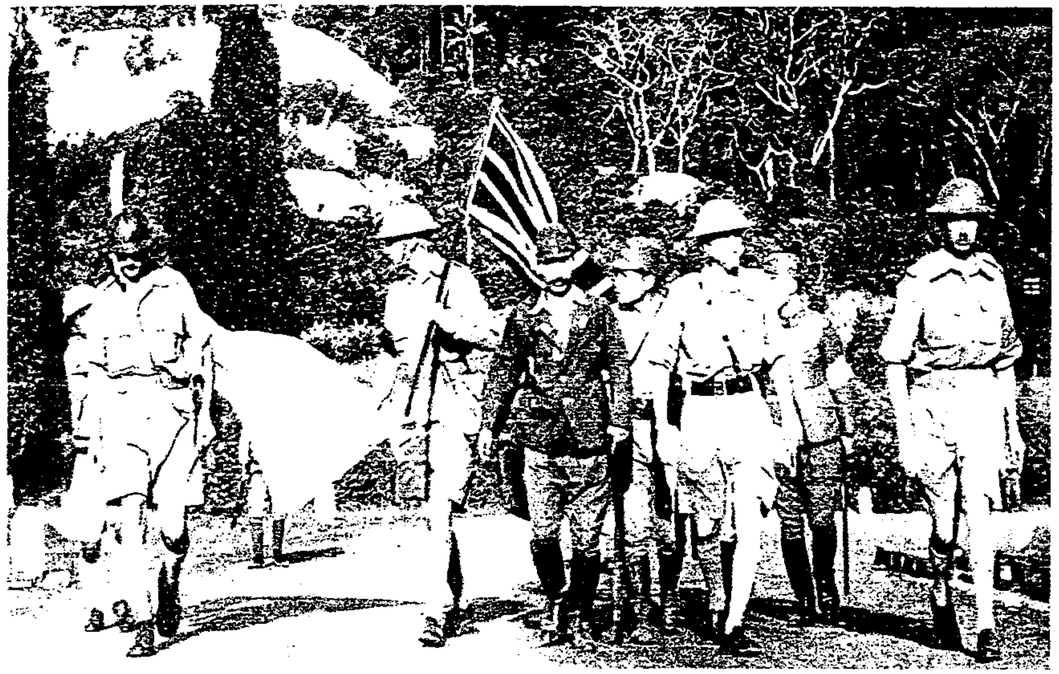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第一次目睹参与正规战争部队战败后遗弃在战场上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配备。战火向南推进之后，逃难躲藏起来的当地农民和甘榜居民再度出现。他们也捡拾大批的日军和英军的武器，有莱福枪、迫击炮、机关枪，以及配合各种军火使用的军械。我心想，这麽一来，在我们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取之不尽的军火供应。

在接获指示，要前往与查普曼会合时，我把人员分成两组。我们就这样骑著脚踏车，沿主干公路前往会合地点。沿路我们不时看到一批批日本兵。我们骑脚踏车经过时，他们高喊“万岁”。我不明白他们为何一直在欢呼不停。在2月16日当天较后时，我才知道沿路日军不停欢呼的原因。原来新加坡在前一晚沦陷了，马来亚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无条件地向山下奉文投降。投降地点是在福特工厂正门办事处，位于武吉知马山（Bukit Timah）西坡的山丘上。

后来我才知道，查普曼等不到我，就动身前往古毛（Kuala Kubu）和福隆港(Fraser's Hill)地区，他的人员在那一带的森林里设有营寨。查普曼这队人员有五、六人。其中一人是纽西兰的矿业工程师弗兰克奎勒（Frank Quayle）。日本人登陆马来半岛时，他是在暹罗工作。另一名是英国人罗宾逊（Bob Robinson），以及曾在怡保婆罗洲摩哆公司工作的克里斯特（Chrystal）。我派一名交通员去通知查普曼我已抵步，并解释为何我迟到。通过交通员我终于与查普曼取得联络，查普曼紧急地问我能否派一名能讲一点英语的响导到他那里。我找到了一位，并立即派他前往福隆港，协助把查普曼的下属，三名病重的欧洲人带回丹绒马林。

我们继续收集武器。我们向村民解释，我们在组织一支游击队，并要求他们把在战场上所捡获的武器捐献出来。通过解释说服，通常我们都能拿到武器。但有时我们必须拿钱向他们买。我们的基金是来自人民支持抗日的捐款。我们向参加过中国筹赈会、抗敌后援会的活动，以及参加过马共活动的人捐款，实际上我们向所有华人募捐。

交通员去了丹绒马林查普曼的营寨，我在督亚冷等他回来时，霹雳州州委会代理书记劝我回去探望我母亲。她中了彩票，可能她会再给我一些钱。很多人



英军的最大耻辱，侵马日军第25军情报首长杉田上校（中）押送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右一）步行到武吉知马山日军司令部向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投降。

马来亚战争期间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见证了英军史上遭受的最重大挫败。他在耀武扬威的山下奉文面前签署降书，意味著英帝国的告终。

知道她中了彩票，并送给我 300 元的消息，我立即把这些钱捐给党。她会再给我钱吗？

我听他的话回家，看到母亲身体很好。家人为了逃避日军抢劫，搬到实兆远郊外的农村。上次我与母亲见面时，我有点尴尬，因此这回我不好意思一回来就马上向她开口要钱。我在家过了两、三个晚上。母亲在谈话中无意间谈到她听说我在怡保已有一名女朋友。这是我的好机会。当然那时我还没有女朋友。我忙著搞地下活动，那里有心思去谈恋爱。但我知道，作母亲的人，当儿子有了女朋友时会特别关照他，尤其是当儿子已在考虑结婚，又担心钱不够的时候。我们继续交谈，我作出暗示。我离开时，她拿出 800 元塞进我的衣袋。告别时，她可能认为我会安定下来，过正常的生活。她甚至怀著她即将要当祖母的希望。

回到督亚冷，我把钱对半分，一半交给等我回来的一名马共高级干部。这样一来，霹雳州南部的两支抗日游击队都有了活动基金，可以继续展开活动。那名马共干部带领一支游击队，我带领另外一支。

我经常在想，如果母亲发现我是假装要结婚，她给我的钱是拿去作为两支游击队的基金，她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正如我大部份的活动一样，她是不会发现的。

我们大约花费两个星期，建立我这支游击队。一个月内，我们在霹雳州内就成立了四个中队，形成一个组织网。它们分布在北霹雳和中霹雳，我的部队是在南霹雳。后来我们夸张地称它们为“大队”。我领导的这支游击队是第四中队。

一般上，游击队是在大森林的边缘设立营地，可以攻击南北主干公路上的敌人。每支部队都是由一位霹雳州马共州委领导。初期，他们是独立地活动，与受过英国人训练，由马共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组织的游击队无联系。

在战前的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宣布我们是非法组织，因此组织内部的通讯非常危险。在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抗日军的内部通讯更是双倍危险。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我们的发展是远远超越中央的指示，但我们与新加坡失去了可靠的联系。虽然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游击队纳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但我们还未获中央批准。我们决定暂时把我们的部队命名为“霹雳州人民抗日军”（PPAJA）。

我选择在大芭边缘处建立营地，步行只须十五分钟，就可到达美冷（Behrang）火车站东面不远的一个华人小村。当时，南北主干公路与铁路平行，

距离很近。这个偏僻的乡村被一片茂密的丛林把它与公路隔离。我们要建住所，发现那里没有我们常用来盖屋顶的亚答叶，但那里有很多竹林，我们队伍内有一位前农场劳工，他教我们如何把竹劈开，用晒干的竹片编织一张张竹席，盖成不怕风雨的屋子。

我们严格遵照党中央先前发出的，有关游击队组织结构的指示。每支独立队或大队都由一名政治委员和一名军事司令领导。军事司令负责军事战略，在战斗时是总指挥。政治委员事实上权力更大。我是部队里的政治委员。老实说，当时我们都是新手，完全没有经验。然而我的军事司令是一名十分勇敢和坚强的人。正月间，日军挺进时，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亲手举刀杀死一名与日本人勾结的中医师。事件发生在端洛（Tronoh）市中心。

我部队内的军事副司令以前在怡保当白铁工匠。安顺一名理发师当我的助手，是我的政治事务干部。

第五章
接二连三的出卖

当时我们都没有手枪，虽然我们都想要。手枪短小，比较轻，容易使用。亚洲人的身材较小，随身佩带手枪自卫，信心更强。我们拥有大批.303 莱福枪，但以我们的体形，这种枪太长又笨重。我们也有大量的汤姆冲锋枪。我们学会熟练使用这种枪。虽然我们也有为数不少的布朗式轻机枪（Bren）。对我们而言，这种枪笨重，未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不易使用。与其浪费时间，尽力学习使用这种枪械，不如把它们收藏起来。后来大部份的布朗轻机枪送给北部我们的部队使用。

为了方便我们的游击队员保持社会凝聚力，我们发觉最好把他们按不同方言分组。最初我们分成三组，一组是客家人，一组是潮州人，第三组是海南人。后来，新入队的广西人组成第四组。我们仍然全部住在一起。

在这个初期的摸索阶段，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当地民眾的支援，对游击队最为重要。我们的第一个营地所在处，最靠近的华人乡村里，成年人只有百来人。显然，这里的村民太少，不足以作为我们一支 40 人游击队的后援。我向前来巡视的霹雳州州委提出这个问题，商讨后，决定部队向北迁移至华人人口较多的仕林河。

因此，我们撤营，迁移到乌鲁仕林扎营，位于南北公路东面。营地离公路颇远，有一条泥路通往大路，任何天气都可通行。对这地区进行初步侦察，我们发现，离乌鲁仕林不远，有一家规模很大的铁船锡矿场。在铁船公司附近，住着不少工人和技工，设备齐全。

在东面约半小时路程的森林边缘，有两座石山洞。大山洞可容纳四、五十人居住，小山洞可供 10 至 15 人居住。洞口都有茂密的树木遮蔽，看来十分理想。我决定让来自督亚冷的四名客家妹住小山洞，这是最理想的安排。这四人不久将接受救护训练，成为护士。她们当中的三人是矿工的女儿，另一人是女学生，出身富裕的华商人家。男游击队员就住进大山洞。

一条清溪流经我们的营寨，为我们提供充足的食水。我们在溪流下游搭建浴室和厕所。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只需要另建一座亚答棚作为我们的总部。很快地，我们就在小山洞入口处附近搭建亚答棚，作为总部。

大约是在 1942 年 4 月，当时在丹绒马林一带活动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通知我，他们已经与查普曼取得联系。他们说，这位英国军官和两位同僚要来见我，与我商讨问题，我应设法协助他们。为迎接英国客人的到来，我们在总部附近另建一间亚答棚。

这次会面对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对英军双方都非常重要。我和查普曼回忆这段历史时，在某些重要的片段，有些出入是毫不出奇的。重要的是我们两人相处得很好。1947 年初，他开始写回忆录时，形容我是位年轻、吸引人的福建人，后来成为最受英国人信赖的游击队代表。我必须马上指出，查普曼的书是在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之前出版的。

历史学家和作家多数是根据西方的观点解读这段历史。他们有偏见，恬不知耻地偏袒西方，经常还带有种族色彩。如果你阅读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这本书-无庸置疑，这是描写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游击队生活的最好的一本书-你会发现书中用了不少诋毁亚洲人的词句。有趣的是，显然查普曼对他能与我们建立起关系深感自豪。在他和多数其他西方人所写的日治时期的历史中，亚洲人都是叛徒，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是一样。亚洲人无知，对打仗一窍不通。

然而，当你回顾日本挥军侵占马来亚的情景，事实又是另一回事。当时英军和共和联邦的盟军节节败退、仓促逃跑和投降。他们利用我们，他们抛弃我们。当他们秘密地回来重新与我们接触时，他们期望我们一心一意效忠他们。当他们得不到他们所要的全部，他们就窜改历史。

以下的言论显示出他们当时有很深的偏见：

为了英国的军事利益，应该扶持亚洲人组成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马共游击队的确是当地唯一的能抵抗敌人占领的可靠部队。共同的敌人使我们走在一起。尽管如此，共产党人经常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他们从不完全信赖我们。简而言之，他们不值得我们信任。

这种想法没有把一些重要的因素考虑在内。例如，它忽略了，直到英国人向日本投降的最后一刻，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推行他们精心策划的分等级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是以种族为基础，而白人享有绝大部份特权。例子很多，那时候发生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日本人发动攻击后不久，槟城的英国当局发出疏散令：只是疏散欧籍妇女和儿童。

英国人决定把我们的人从狱中释放出来，并训练他们作战。这些都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毫无私心。英国人陷入绝境，并发现我们对他们很有用处。正好我们双方都要打败日本人。然而，共同的敌人这件事并不能改变英国人的长期目标——恢复原有的殖民地统治状态。共同敌人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议程，我们期望摆脱殖民地统治和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至今我仍然认为，在日治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与英国人更紧密合作。由于我们不愿对所有的事都全力与英国人合作，经常就有人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加入这场游戏。我觉得，从历史来看，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参与这场游戏，那麼英国人也同样没有。他们很清楚，他们起先突然把我们从牢狱中释放出来是为了要我们协助他们打日本人。一旦他们恢复殖民地统治地位，他们就会毫无内疚地重新把我们关进牢里。事情的演变正是如此。

因此，我准备迎接查普曼和他的随从到我的营地时，我觉得为这些英国人另建一个居住地方，一点都没错。他们的习俗与我们不同。他们的食物也与我们不同。他们所操的语言与我们日常在营寨内活动所用的语言不同。我们作为分开的个体共处，这样更方便、更合适。

会谈开始时，查普曼说，日军迅速地攻占马来亚，英国人在新加坡投降，导致他孤立无援。原订计划是，他和他的特别行动执行部成员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为马来亚共产党人员提供军事训练，目的是开展非正规战，拖延日军的挺进两、三星期的时间。他们估计，这样就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刚抵步的英国第 18 师和预料将抵步的澳洲第 9 师部队可以全面投入战役。

特别行动队大约有 12 名人员。他们有一项后备的应急计划，让他们可以从霹雳州西面的直弄（Trong）渔村上船，沿河开往马六甲海峡。这是项明智的安排。他们希望可以从那里横越海峡，抵达苏门答腊，或者直航前往印度。查普

曼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抵达半岛西海岸而又不遭日本兵俘虏。我们能提供协助吗?

我告诉查普曼，我们会尽力帮助，但当时我们在霹雳州沿海地区的势力不强。我答应他会通过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组织，去了解我们能提供什麽帮助。与此同时，他们能协助训练我们的人吗？几天后，查普曼这支非正规军的另三名白人队员也抵步。依照我的要求，查普曼很快地委派这三人负责军事训练课程。接著他就离开，前往另一个马共游击队基地。

日本人在新加坡实施军管数星期后，就对马共领导层展开一系列的闪电扫荡。一些党重要的领导人在突袭逮捕行动中被捕坐牢。中委会宣传主任黄诚被人出卖，最后遭处决。他是马共的顶尖知识份子，理论强，深受人爱戴，人们广泛认为他是最可能的领袖继承人。我认为黄诚遭处决是党最严重的损失。四年前，在南华中学的学校集会上，就是他动人的演说，打动人心，引起我认真地思考人生应走的道路。莱特是在非常幸运的情况下逃脱，未被逮捕，当时看来是这样。显然党领导层现在迫切需要改组。

四月下旬，我升为霹雳州州委。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我首次以州委身份参加在朱毛附近森林里召开的州委会议。主要的议程是讨论马共在霹雳州成立军事组织。当时在霹雳州境内，我们的营地有约 300 名志愿人员。我们打算把我们的队伍扩大至 500 人。我们有人员，我们也有武器和弹药。查普曼和他的非正规部队人员正在训练我们的人。我们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军事组织，有明确的指挥系统，更重要的是获得党中央承认我们的地位。

刚好中央一名成员小忠也出席在朱毛举行的会议。他公开承认霹雳州游击队是马来亚境内活动的最强和最有效率的马共武装部队。他同意下次他会见党总书记莱特时会支持我们所有的建议。

小忠向我们汇报了数周前莱特在柔佛北部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党领导人莱特在会上向来自柔佛、马六甲和森美兰各地的代表发表演说，促请他们加强党基层组织，更加重视发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是，他预测，盟军展开反攻后，将会出现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的理想条件。他说，马共欢迎盟军的反攻，但反对重建英国殖民地控制权。

接著中央代表小忠传达莱特的建议。莱特认为，应该解散一些游击队单位，然后，游击队队员把武器藏起来，返回各行业，成为工人。这样做对党更有好处。当时的霹雳州党书记阿南强烈反对，因为当时霹雳州很少工业生产活动，

因此，这项指示不实际。最后小忠同意霹雳州马共可以按照当地实际情况的需要，来制定军事政策。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华人群眾拥护马共的抗日活动，各州领导人很清楚这种情况。因此，当时只有森美兰一个州遵照莱特的指示，解散他们仅有的一支游击小队。结果，不少遵从指示，把武器收藏起来，恢复平民生活的游击队员惨遭日本宪兵队-类似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组织－杀害。森美兰州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不得不迅速地恢复原有的军事组织。

在朱毛会议上，小忠分发一份有八个人名字的叛徒名单，他们被指叛党，导致新加坡的马共遭到镇压。同时，党下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宽恕其中的任何一人。此外，各州州委员会获指示全力追捕这些叛徒，一旦擒获，要立即处决。

小忠告诉我们，总书记计划在年底之前召开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们认为，这意味著当时的党领导层准备公布全盘的军事行动计划，反抗日本军占领马来亚。另一重要事项是，在新加坡党组织受镇压，遭严重打击之后，党领导层必需著手重组。

朱毛森林会议后，霹雳州人民抗日军成为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此后，我们的游击队必须在中央的指挥下。然而，新的组织结构严重妨碍了我们的军事行动。新制度带来官僚控制，束手束脚，很快地令部队陷于瘫痪。最后，我们只好另觅途径克服困难。在州内我们秘密成立平行的游击队组织，称为“流动队”，完全归霹雳州州委会指挥。

党中央的命令不仅夺走了我们的游击队领导权，同时也把霹雳州州委会分成两个部份。军事事务由两名州委负责，政治事务则由另外三名州委负责。我被安排在政治事务方面，负责霹雳南部地区。这地区从安顺和金宝伸展至丹绒马林。事实上，当时我成为州内马共的第三号领袖。

我身负三重任务。第一是招募党员，扩大我们的党核心组织。第二是发展更多同情者加入支持我们的群眾运动组织。这个组织起初称为抗日同盟，后来在紧急状态时期称为民运组织。第三项任务是招募年青人，加入马共后备部队。一旦需要，这种见习部队的成员便能加入我们的游击队主力部队。后备单位的另一个角色，是负责警卫工作，加强偏远地区小村庄的保安。

我骑著脚踏车在我所负责的地区内奔波，按工作的需要，不停地转移过夜

地点。我先到金宝，接著又到安顺。我清楚记得我骑脚踏车的路途距离：从金宝到安顺是 30 英里；怡保到务边是 12 英里；务边到金宝也是 12 英里。

我租一间房住、也在锡矿公司办事处过夜、也曾和学校的教师住在一起。为了安全，我采用多个化名。很快的我的努力就见到成果。例如在金宝，在我的策划下，抗日同盟组织以惊人速度发展。美罗和安顺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日本人为了阻止我们的势力的蔓延，他们成立了他们的华人组织，称为“华侨维持会”。但是，在所有人口眾多的市镇，我们的势力都很强，任何人与敌人勾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对那些与残暴的日本宪兵勾结的人，我们极为反感。

为了方便我们的活动，我们决定迁移霹雳州委会总部，改设在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金宝地区。我在那里与群眾有密切联系，这项工作就由我负责。

*　　*　　*　　*　　*

过了几个星期，莱特发出的中央指示完全没有提到加强党领导层这重要事项。反之，他一再强调必须广泛地组织工人。我们这些在马共最前线活动的人都认为，这指示毫无意义。战争造成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工业生产活动陷于停顿。铁船、矿场和树胶厂都停工，工人都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组织工人运动？

七月底，我们获知莱特计划在九月间召开十分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时间与地点一时无法知道。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令派出两名最高级领袖作代表，出席会议。各州州委会获指示派出一名代表。他通常是州委高级成员或州书记。

最后莱特亲自发出开会命令，会议地点订在雪兰莪州黑风洞地区的森林边缘，离开华人称为“石山脚”，马来人称为双溪多“Sungei Dua”的农村不远。日期是 1942 年 9 月 1 日。40 名党高级领袖接获出席会议的命令。

与会者全部要武装。雪兰莪游击队派出 10 人充当会场的警卫。雪州游击队派 4 名女游击队员负责烧饭煮菜。会场搭了一座亚答棚，让所有与会者住宿。

莱特预定 9 月 1 日早上十时左右抵步，出席主要部份的会议。其他同志被命于 8 月 31 日下午和晚上举行初步会议。

日军于 8 月 31 日午夜过后不久包围会场。双方爆发剧烈枪战，我们的人拼命冲出日军的包围。警卫战士殊死作战，坚持至最后一人。在场的人约半数当场牺牲。日军也伤亡惨重。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在交战中被打死。他们的官阶显示日军多麼重视这次黑风洞突袭行动。

这是日治时期日军首次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展开重大军事攻击行动，使党遭到了灾难性打击。党中央立即指责森美兰州一位代表背叛，才导致这事件的发生。这名代表在赴会途中遭日军逮捕。

黑风洞事件过后数周，霹雳州州委会接获召开另一次重要会议的指示。莱特也将出席会议。因此，我们自然地认为，脱险逃生的中央委员和党总书记，急于召开另一次会议，讨论遭日军破坏的黑风洞会议未讨论的议题。虽然党是指示州委会负责筹备召开会议，但由于我十分熟悉这个地区，所以筹备会议的重任便落在我身上。由于上次会议保安的疏忽，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我决心要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党领袖提供最严密的保护。

我选择在美罗郊外的树胶园深处开会。代表各州的 20 多名高级干部和游击队指挥员将出席会议。我采取特别严格的防范措施，代表们需依照十分复杂的程序参加会议。

按照我的安排，最高级的党领导人应分批先后抵步，尤其是总书记莱特、党高级领导人蔡克明、霹雳州州委书记阿南和他的副手。他们四人先到金宝，然后在适当时刻分别被带往会场。其他的与会代表必须通过美罗前往会议地点。我希望，这样的安排能防止保安的漏洞，万一日本人要攻击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高级领袖。

蔡克明约 30 岁，是中央委员，最受人尊敬的党理论家。按照计划，他乘火车抵达金宝，然后与霹雳州两名党领导人在一个安全藏身处会合。安置好蔡克明之后，莱特才于隔天抵步。

我费尽心机确保严格遵守时间表。在蔡克明预定抵达藏身地点之前不久，日本宪兵突袭该处，逮捕了霹雳州两名高级共产党人。幸亏蔡克明坐的火车误点，较迟开到。蔡克明发觉金宝街上到处是日本宪兵、军队和警察，最后他与当地一名同情者取得联系，后者告诉他日军的逮捕行动。蔡克明快速离开金宝，到黑风洞地区甘津（Kanching）一个华人农村躲藏。这是一个我们的势力很强的地区。在九月的黑风洞会议时，蔡克明平安冲出日本人的包围。这一回他又差点落入日本人手中。如果被捕，他肯定会在金宝被处决。

开会计划全部取消。莱特未遇到危险，其他代表也设法安全分散。日本人再度挫败我们要召开讨论重要政策的会议，更多疑问无从解答。霹雳州的情况尤为严重，州内两名最高领袖被捕，遭到日本宪兵严刑拷打。党州委书记阿南最后遭处决。他的副手变节，替日本人效劳。

显然，日本人的目标是要在美罗会议之前或期间消灭党理论家蔡克明。在除掉蔡克明的同时，他们也想除掉另一批党领袖。

在日本统治初期，日本宪兵针对马来亚共产党展开一系列的突袭、逮捕、酷刑和处决。在分析这些事件时，没有人及早怀疑总书记莱特这个人，颇不寻常。我们很自然地只想到可能是其他人背叛。

事后看问题当然比当时要容易。

* * * * *

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著日本宪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设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两个月后，日本人对新加坡的马共组织展开更多扫荡行动，全党上下深受冲击。接著，发生黑风洞大灾难。事后死里逃生的同志却深感庆幸，因为我们的总书记逃过一劫。我们被告知，他在赴会途中汽车抛锚。

我们一直忠心耿耿地支持党中央拥有绝对控制权，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对所有事务，中央委员会有最后决定权。中央拥有绝对的权力。为著组织安全的需要，我们完全接受。我们也欣然同意绝对保密，严格执行隔离各个党组织，互不知道对方的事。这是为了要保护党，实际上却变成掩护莱特。

在我们知道真相之前，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牺牲了。真相是这样：

1942 年 3 月 26 日，新加坡沦陷后一个月又 11 天，日本宪兵扣留了一位像是华族的男子，名叫黄绍东。逮捕黄绍东的日本宪兵军官大西觉（Satorou Onishi）少校在英军投降后，负责新加坡的“大检证”行动，追捕华人抗日份子。41 岁的大西觉少校是一位老练的日本宪兵，有 18 年的经验。他曾为中国伪满洲服务，日军侵马之后，他被调来马来亚。

受拷问时，黄绍东首先承认他是马共中央委员。接著他宣称自己的真名是黄金玉。进一步受拷问，他承认他确确实实是马共总书记，马新两地的马共活动都在他的指挥下。因此，他可以向日本人提供难得的服务。经过一番谈判后，该名老奸巨滑的日本宪兵大西觉和黄绍东，又名莱特，达成交易。

大西觉少校立即发出扣留令，囚禁莱特一个多月。他同时发出指示，必须善待这名囚犯。莱特于四月底获释放，便迫不及待地履行他的承诺。他向日本宪兵透露马共新加坡市委的成员，让日军有一份黑名单。每两周，他必须直接向大西觉少校作一次报告。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定时为日本人提供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和雪兰莪州的马共活动情报。在马共召开黑风洞会议前夕，莱特向大西觉提供会议地点、时间和与会代表的详尽情报。接获情报后，日本宪兵官员乔装成休假的日本正规军人，在吉隆坡的舞女的陪伴下，到黑风洞地区喝酒，寻欢作乐。但他们时刻监视著出入预定会场地点的人士。8 月 31 日晚，日军已全部准备就绪。9 月 1 日凌晨时分，他们开始围攻。

大西觉少校后来被英国的战争罪行法庭判决终身监禁。这位日本宪兵这样描述他的这个珍贵的俘获物：“首先，他想保住自己的命，即使出卖他的同志也在所不惜。其次，他想通过与我合作，以达到保住他在党内的地位，并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他所出卖的人显然是那些能威胁到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权威的人。现在我知道，有好些事情他不让我知晓。”

莱特是个既恶毒又神秘的人物。多年来，情报界人员和史学家为解开有关他的阴谋诡计和谜团，费尽心机。今天，我是唯一仍然在世的人，能够提供有关这个人的冷酷无情的真相。

在日军占领马来亚的最初几个月，局面混乱，我们的交通线受日本人切断。马来半岛各地的党组织几乎都与新加坡失去联系。莱特在新加坡搞出卖活动。事实上，莱特与日本宪兵勾结，有系统地使党中央领导层瓦解，结果只剩下莱特一人在演独脚戏。

我们花了七年的时间才看清了神话与谎言背后的事实，而在那之前，我们的队伍已遭到巨大的破坏。然而，最终他罪有应得地遭人唾弃。我的责任是确保他有这样的下场。

莱特是英国人在东南亚栽培的一名最惊人的间谍，他成为马共的总书记。这个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甘心情愿为日本人效劳，定期会见日本宪兵高级情报官员大西觉少校，提供有关马共的情报。

莱特的主子，日本宪兵特务头子大西觉少校（左二，胸前6号牌子）1947年3月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受审，罪名是屠杀华人。大西觉的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在新加坡坐牢五年后，大西觉被遣送回日本，过后获得释放。

第六章
与莱特面对面

1943年初，霹雳州马共组织与新加坡马共中央组织完全失去联系。我们在隔绝的状况下，独自行动。在马来亚各州的马共组织当中，以党员、支持者和游击队人数论，无疑地我们的组织是最强大。由蒙巴登指挥，设在锡兰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不久将开始展开“盲目”登陆行动，派遣华人特工在霹雳州海岸登陆。

当然那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让我们能够向那些乘盟军潜水艇登陆的人提供宝贵的协助。我们能保护他们，能安全地安顿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向他们提供日本军事设施的最准确的情报。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处在孤立状态下活动。我们迫切需要与更大的群体建立联系。

霹雳州内的党员人数剧增。例如，在华都牙也，我们的党员就超过100名。在实兆远，我们有40－50名党员。在近打河流域的矿工当中，很快地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党员已多达500多人。我们的基层组织日益壮大，令人鼓舞。尽管如此，我发觉州级的党组织脆弱。我们不够团结，方向不明。多个因素严重削弱我们的组织。日军侵马，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又在日治初期大事扫荡马共，这不只切断了我们的交通线，同时也捣乱了我们的指挥系统。党中央1942年的指示所产生的反作用，使情况更加混乱。在此指示下，我们的游击队如愿以偿的被纳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内，可是实际的指挥权却落入新加坡党中央的手里。

我决心整顿这种混乱局面。我特别担心城市地区的政治组织与森林内的游击

队之间失去协调。有几个地区，他们之间已完全没有联系。游击队的活动没有明确的方向。情况严重到政治组织方面，完全无法依靠游击队采取快速又有效的武装行动。那时，霹雳州州委和区委已经发出暗杀敌奸的命令。有些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为获得个人的好处，与日本当局（民政和军事的）合作，我们命令我们的人员密切监视这些人，并向组织报告。

我们搜集亲日分子的名单，按他们对我们的威胁程度，进行分级。那些充当日本人奸细，监视马共和人民群众的人，都成为我军消灭的目标。久不久，我们就找寻目标，干掉一些日本军人及平民。对歼灭敌奸，我们有很高的热忱，但在日军侵马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在组织上不够严密，无法有计划地开展灭奸行动。

曾参与这种活动的人都知道，这可不是带著枪四处跑动，一有机会就杀人这麽简单。如果要达到预定的目的，给残暴的日本占领军及通敌者狠狠打击，报复性的灭奸行动必须严格选择目标，敢于心狠手辣，绝不手软。同时，动手时要具有专业水准，要高度准确。

我们首先在抗日军内部成立一般性的暗杀队。目标是针对地方上那些为日本宪兵效劳的人，地方上的通敌者和奸细，以及一小撮一度是党员，后来背叛、出卖同志的人。拟定了行动计划，执行时由谁指挥却不明确。执行暗杀任务的暗杀队不满由政治组织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他们觉得这些领导不了解执行任务的实际情况。事情越来越严重。最后人民抗日军引用 1942 年的中央指示，坚持不听指挥，坚持游击队只听从由获授权的军事组织发出的命令。他们不听从区委发出的剷除敌奸的命令，也不听从州委发出的命令。

为了要克服官僚组织体系造成的困难，我费尽心思，想了几个月，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要在我们的主要部队之外，成立一支平行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是在 1942 年指示之外运作，并归我们的区委和州委指挥，但能获得有关各方所接受。这件事不容易做。我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实行我这个办法。

日本宪兵在金宝的突袭行动，除掉了我们的州书记和他的副手。因此，在没有更好人选情况下，我于 19 岁便成为马共霹雳州代书记。由于担心与党领导组织失去联系，我认为必须设法与党中央重建联系。我相信党中央还在运作。为此，我派一名交通员南下吉隆坡，与仍然躲藏在甘津村的蔡克明接触。不久，我南下吉隆坡会见蔡克明。这是我第一次到吉隆坡。

我在甘津一间脚踏车修理店的后房等候蔡克明。两名警卫员进来，我以为

他们是前来护送我到蔡克明藏身之处。在我明白出了什麽事之前，我看到枪口已对准我，他们愤怒地命令我举起双手。一名警卫员以枪指著我，离我的额头仅数寸，另一人进行搜身。我被解除武装。搜查完毕，他们开始盘问我。其中一人问我为什麽还活著！不久我就明白原来他们怀疑我出卖，造成金宝那场灾难。他们认为，如果我没有与日本宪兵合作，出卖金宝会议的话，当时我一定被捕，并早已被处决。我申辩我是无辜的，我有力的辩护说服了他们。最后他们命令我在脚车店里等，就离开了。

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带我去见蔡克明。蔡克明在一间村屋内等我，到那里只需步行 20 分钟。我进入屋内的前房，蔡克明微笑地走前来，伸手问候我。他为他的警卫员以不寻常的方式迎接我向我道歉。他解释道，因为警方加紧追捕马共份子，所以他不得不要这麽做。接著他很快地转入正题，讨论党的事务。

他透露，数周前，在 1943 年 3 月最后数天，莱特从新加坡来甘津，临时在那里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莱特、蔡克明和小平三人出席这次会议。马共高级领导人小平与党首领莱特的关系密切。军事司令阿仲无法离开关丹前来开会，其他有资格出席会议的人，不是已在黑风洞事件中遭杀害或已遭处决，就是被关在狱中。去年 5 月到我们那里出席朱毛会议的中央代表小忠已在黑风洞事件中遭杀害。

尽管多人未能出席，会议照旧举行，并正式通过一份称为《九大纲领》的文件③，定下党的抗日行动纲领。蔡克明交一份给我。《九大纲领》全文如下：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2. 建立有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业，建立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言论、出版、组织、信仰的自由，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释放囚犯及抗日俘虏。
4. 改善民生，救济失业难民，普遍加饷加薪，取消苛捐杂税和高利贷。
5.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国防正规军，优待抗日士兵、恤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发还被日寇没收的人民和各

友邦人民的财产；

8. 实行关税自主、建立与各友邦的友好条约与商务关系，承认友邦贸易自由。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被压迫民族独立，赞助日本人反法西斯斗争。

蔡克明同意为重建党中央与霹雳州马共的联系而努力。我带著这份纲领回到金宝。不久，莱特传召蔡克明返回新加坡。这位党高级理论家回新加坡之后，便神秘失踪。蔡克明在黄诚遭杀害后，已成为极有可能出任马共领袖职位的人选。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蔡克明遭遇的真相。莱特出卖了他，当他到新加坡爱同小学会见莱特时，遭日本宪兵逮捕。过后，日本人处决了蔡克明。

实际上，当时党中央只剩下莱特和彭亨州老同志阿忠两人。阿忠远离中央所在地，未能真正履行他身为党中委的职务。因此党中央已完全操在莱特一个人手中。

我回到金宝还不到两周，小平便从雪兰莪到来，宣称莱特派他来接管霹雳州州委会领导权。我是在抗敌后援会的时期认识小平。他一度是在怡保一家印务局工作。小平年约三十岁出头。他要我为他安排住处。我很快地就安顿他与他妻子住在双溪古月附近的一间屋子。他们在那里住不久。还不到两周，小平突然告诉我，莱特传召他到新加坡会见他。他坐火车路经吉隆坡南下，在雪州某处，日本宪兵登上火车，逮捕了小平。

后来我们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莱特向日本宪兵提供小平坐火车南下的详细情报。负责逮捕行动的日本军官不认识这位刚上任的霹雳州马共首领，便召来一名落在他们手中，受过酷刑的前马共交通员。由他指认出小平，并秘密通知日本宪兵，当时火车继续从吉隆坡南下。

抓了人，日本宪兵把囚犯双手绑在背后，带他到吉隆坡的宪兵总部，直接交给宪兵司令。宪兵司令还未开始盘问，小平便望著他说道："你们要我与你们合作吗？"这名日本高级官员立即解开这位共产党人的双手，邀他去喝茶。通过当时我们在日本人中间安插的一名双重间谍，我们知道这件事的过程。

小平的第一项"贡献"是首先向日本人提供雪州州委会办事处地点的情报。马共雪州总部当时是设在吉隆坡市郊外的农村地区。小平被捕的隔天，日本宪兵便做好部署，准备突袭有关地点。那是在一片木薯芭边的一间亚答屋。三名

雪州马共领导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开会。日本人打算穿过木薯芭，扑向这间小屋。但他们发出吵杂声，惊动了屋里的人。他们立即冲出屋外，钻入屋旁另一边的茅草芭，逃之夭夭。他们已知道小平被捕，但没想到小平会出卖他们。小平在思想上是位很坚强的人，体格又强壮。黑风洞事件时，他带头冲出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死里逃生，还带领一批领导干部安然脱险。他们是唯一丝毫未受伤，又安然脱险的一批人。

获释后，小平回到党组织。当时党有一份消灭严重叛党分子的追杀名单。这些人全部要被干掉，但小平的名字从未列入名单内。的确，党组织对小平的案件态度不坚决，没有断然行动。在那个战争时期，党内有条十分有趣的惯例。党组织接受，在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之下，人承受痛苦有一定的限度。有鉴于此，被捕同志在严刑拷打下屈服，但他又回来找党组织，报告他被捕后的详细情况，基本上他可获得宽恕。当然，他们返回组织是有条件的。首先他必须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的有价值情报。此外，他们必须尽力去追拿和杀死一名高级叛徒。虽然获得宽恕，但他们被禁止再成为正式党员。从此，他们只被视为支持者，不能再接触党内部的机密。

小平的案件颇为奇特。他自愿与日本人合作，免受酷刑拷打。然而他带回宝贵的情报，这可减轻他的罪状。他说，他尽力去遵照党的规定，想要杀死一名高级叛徒，但他没有机会下手。对此，他表示道歉。他带回一把日本人给他的手枪。日本人想用他当双重间谍。受党盘问时，小平从容地承认他向日本人供出雪州委会办事处的地点。问他为何要出卖，供出总部地点，小平的回答惊醒了我们，从而汲取了宝贵的教训。一向来，我们有一项大家遵守的紧急应变措施，每当马共党员被捕，并有向敌人屈服的风险时，最靠近的党大本营必须立即迁移。小平这样为自己辩护道：你我都知道，我被捕了，党条例规定总部必须立即搬迁。我只是以为你们会遵守党的紧急应变条例。为什麽你们没有采取所需的搬迁行动？

小平这番话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我们的紧急应变安排。我们的总部也因此迁移到日治时期最安全的地点。幸好，马共在雪州的影响力强，尤其是双溪毛糯地区。我记不起是谁想出的办法，把州总部搬进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内，不过这是在小平受盘问过后不久的事。这可能是我们的同志作出的最明智选择。他们做得很好，渗透了麻疯病院的职员，因此我们能用两间院方供职员居住的独立式小洋楼。这成为我们的州委会办事处。情况需要时，我们的人甚至在那里住下。过后，雪州党州委会就一直藏身于几百名麻疯病人当中，指挥活动，

从未受到干扰。所有日本官兵都怕进入这个麻疯病人地区。日本警察与军队都要与这地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 * * * *

小平被捕后不久，莱特于 1943 年 6 月决定直接见我。我依照安排，先到甘津村与一位女交通员联系，然后由她带我去见党最高领袖。她带我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抵达一间菜农的亚答屋。按指示，我在菜园屋里过夜，因为莱特要在明天才见我。屋前有一片平坦的菜园，背后山丘上有一间双层的大洋楼，从那里居高临下可望到南北主干公路。四周的山林地区就是“邓普勒国家公园”。

隔天，女交通员前来带我到山顶那间洋楼。我比莱特先抵步。莱特约定于十时准时驾车抵达。当时我以为他是住在一位有钱的华人商人家里。过后我才知道，实际上他是住在吉隆坡的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每次他到首都，通常都是住在那里。出于安全理由，我不准看到他的汽车，也不可知道他的车停在何处。女交通员出去接党领袖时，我与他的女秘书在洋楼里等。客厅中央摆著一张大桌子和三张椅子。女交通员带领莱特进来，为我们作了介绍之后就离开。只有莱特、他的秘书和我三人在开会。我们是用华语交谈。

我发觉，这位总书记的华语有很重的越南腔。显然莱特不是华人，长得不像华人，口音也不像华人。对我来说，他像一位欧亚混种人。他的肤色黝黑，身材不高，不到 1.65 米。看来他有病在身，一瞬间，我想起了大约在三年前的一场“资助莱特运动”，当时我为协助莱特治病筹到了 50 元。

会议开始，我首先汇报了党在整个霹雳州的活动情况。我的报告仅限于小平离开后所发生的事件。小平南下，结果不幸被捕。我对小平遭日本宪兵逮捕的详情了解得不多，只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作了报告。会议进行了两天，每天分两阶段举行，中间是午餐休息。会议必须在下午 5 时之前结束，让莱特可返回吉隆坡，因为日军在夜间实施宵禁。

我汇报完毕后，莱特便详细地为我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我必须承认，他滔滔不绝的谈话，对国际事务的知识丰富，了解深入，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会后离开时，我庆幸党有一位很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何其荒谬。

会后约四、五个星期，莱特正式委任我为霹雳州党书记。委任状是通过秘密组织的地下交通管道传来。此后，莱特与我之间建立了双程通讯管道，我们以罗马化华文通讯。但是他的信件中经常有些内容我很难明白。后来，我到了越南，并学会一点越南话，我才知道原来莱特给我的信中经常掺杂罗马化的越南文。

当时我认为，第一次与莱特会面非常成功。他很满意霹雳州党的发展，称赞我作为代党州领导在困难时期处理党务的能力。这次会面令我确信，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当然我也决心要跟随党的指示，不过我觉得莱特的谈话，是清楚向我表示，作为前线人物，我应自己主动展开工作。

此外，我觉得，在我与党领袖会商之后，一些政治僵局会获得解决，看来这并不是过高的奢望。不久中央可能发出指示，促使大家作好准备，争取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返回霹雳后，我每天面对许多问题，不久前敌人的逮捕行动使州党委会困难重重，我必须加以处理。在我必须优先处理的事务当中，以为霹雳州党筹募活动经费最为迫切。到泰南进行走私白米活动是我们在推动的一项重要计划。我们从实兆远派一个代表前往泰南的董里市（Trang）。很快地，我们的人获得了当地泰共的信任，不久就有机会见到泰共总书记李启新，化名“老黑”。

双方建立了联系后，老黑于是写信给马共总书记，表示为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希望莱特协助，使两个邻国的共产党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我们的人亲自携带这封信回到实兆远，交给地方党委，最后信送到我的办公桌。我没有打开信，于隔天在离美罗八英哩的乡村会见莱特时，亲自把信交给收信人。

莱特拆开信，茫然看了一遍，就把信交回给我。他说：“你自己读。”我觉得他这样大方，颇不寻常。通常大多数事情他都保守秘密，尤其是来自兄弟党的信。老黑已成为本区域共产党人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于海南岛，年轻时移居新加坡，在那里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32 年，他已被委为在新加坡的马共总书记的私人助理，同时也是共青团领导人。同年，新加坡警方逮捕老黑，并把他驱逐出境。到了香港，他与当地的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几个月后，他被派到曼谷工作，最后他成为泰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在给莱特的信中，老黑提到在他被逐离新加坡之前，他实际上从未听过党内人士提过莱特的名字。然而过后其他人告诉他，我们这位领导人对马来亚的

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很大的贡献。老黑是在香港遭遇到新加坡驱逐出境的前马共中央委员，从他们那儿获得这些消息。

读完信，我将信还给莱特。接著他所说的话露出了马脚。莱特夸张地说道："这个老黑，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已多年。"

马共总书记竟然看不懂华文！

如果他看懂华文，他一定知道老黑明明是写信给一位他未曾相识的人。我决定将这件小事深藏心中。反之，我继续向莱特报告白米走私活动取得的进展。我预测，走私米的活动将让我们赚大钱，对党的财政会有重大影响。

莱特对老黑的信所作出的反应，也对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第七章
与136部队合作——成立流动部队

1943年12月31日我们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于不兰丹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的士气立即大振。然而，我们的兴奋很快地就烟消云散。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才明白，除非不兰丹营能与科伦坡的盟军总部建立无线电联系，双方达致纸上协议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短期或长期的目标，将会困难重重。我们无从有效地策划联合军事行动，没有药品供应，没有战争物资的供应，没有武器，没有弹药，没有金钱，也没有黄金。

三个月前，我们在昔加里首次开会时，戴维斯和布鲁姆向我强调，尽早安装好电报机，使它操作，最为重要。他们带我去看收藏电报机的地方。

英国军事策划人员，获得奖学金，在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军校接受训练，但还是经常犯上严重错误。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海边的矮树林里，挖个像墓穴的坑，埋下一个大货箱，上面作好伪装掩饰。箱子里装著英军MK III电报机，还有一台特制的发电机。两台机器的总重量超过400磅。最糟糕的是戴维斯和布鲁姆在开会时，很为难地承认，他们怀疑这台电报机能把讯号发射到科伦坡。我问他们为什麽要那麽辛苦地把一台很有问题的电报机送来？为什麽不送来比较容易搬运，发射力比较强的电报机呢？他们的答覆是，他们仅有这一台电报机。

护送戴维斯和布鲁姆安全抵达不兰丹营并不容易。因此我断然拒绝让他们带著笨重的电报机同行。商讨之后，大家同意把MK III电报机埋藏起来，由马共同情者看守，等以后我们才来处理。

抵达不兰丹营一个多星期后，戴维斯和布鲁姆紧急约见我，详细告诉我盟军另一艘潜水艇就要开到。他们计划派布鲁姆到海边，像先前那样，雇一艘华人渔船，送他到霹雳河河口以西的拉朗岛海域与潜水艇接头。戴维斯说，有两名白人和一名重要的华人特工，共三人要登陆。布鲁姆要陪同这三人回不兰丹营。他们请我提供合适的卫兵和响导护送。

我立即反对他们的计划。首先，布鲁姆有病。护送有病的欧洲人，经过日本人的防线，前往海边。我们不能接受，让我们的人员冒太大的风险。我说服这两名英国人改变主意，放弃去迎接新人的计划。最后，我们决定由我亲自出马，前往迎接潜水艇上的人。马共有一名经营无执照出租车的同情者，老练又可靠，我估计可安全地乘计程车，前往海边把人接回来。新人在登陆后，我们才决定如何安排他们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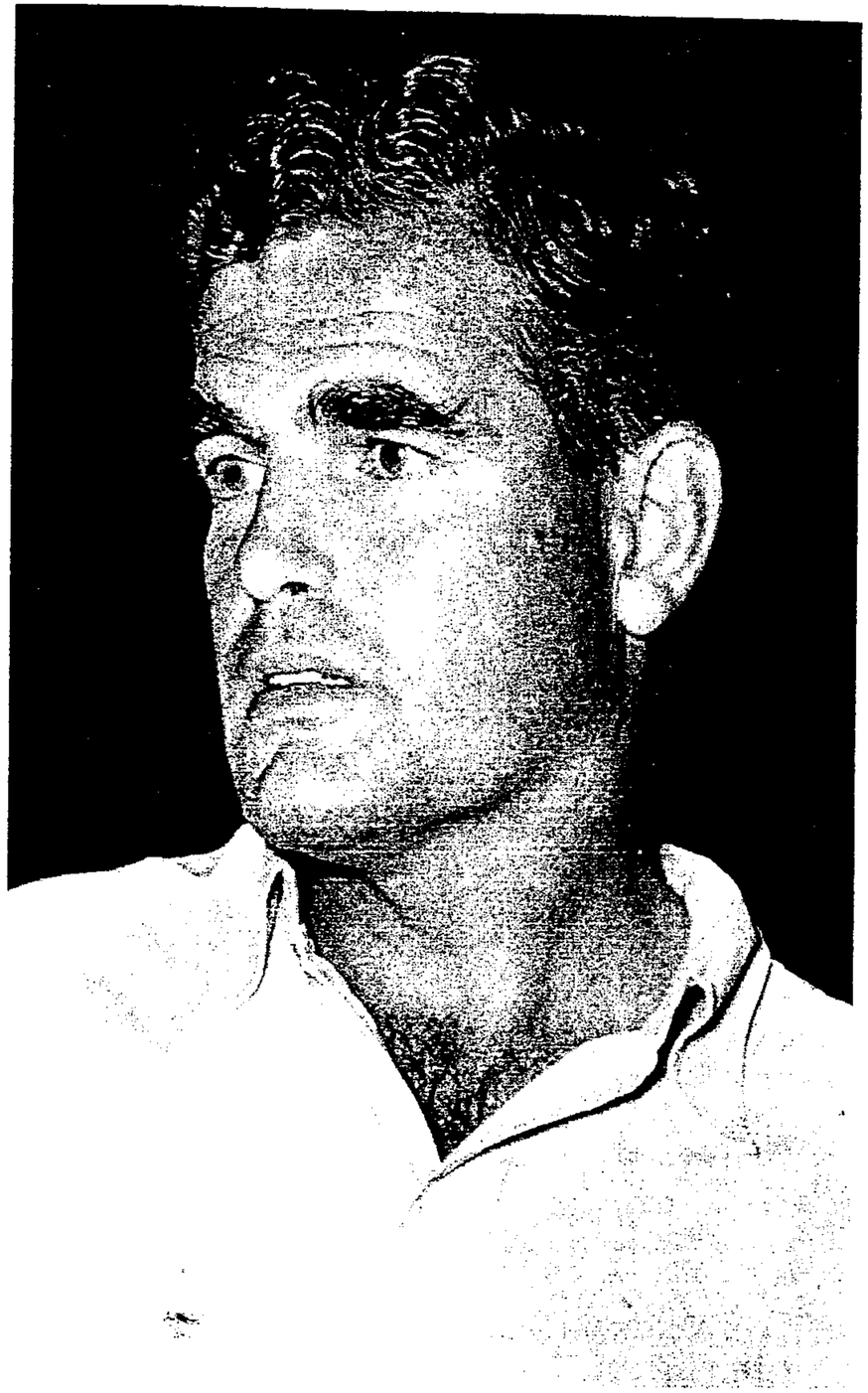
戴维斯交给我一封密件，交代我上了潜水艇，证实对方的身份后，把密件交给这次行动的首领。他也交代我，把对方送来的信，拿回来交给他。当时依靠潜水艇传送信息是戴维斯和盟军东南亚司令部通讯的唯一管道。

在前往海边上船的地点途中，所看到的情况令我更确信我拒绝带布鲁姆同行是对的。从美罗到海岸线，沿路出现了许多路障检查站。看到这种危险的情况，我认为，无论用什麼办法，通过公路，顺著河道，或抄小路走芭场，都无法把欧洲人带回营地。不过，只要周详地计划，再靠一点运气，我有信心能把新来的华人特工安全地带回不兰丹。

我在预定的时间与船夫会面。中午时分，我们已离开霹雳河河口，朝公海约定的地点驶去。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在船尾甲板上挂一条红被单，这预定的讯号是要让潜水艇知道我们的身份。傍晚时份，我们发现，几百码外的海面出现一个潜望镜，环绕著我们移动。很快地，潜望镜又消失了。

我们在晚上 8 时接头。那是 1943 年 11 月 2 日。黑夜中，在朦胧月光下，我用望远镜看到百码内潜水艇的钢铁船身慢慢地从水下冒出来。我们的船有点摇晃。我只能看到潜水艇上放下一艘小船到海上的轮廓，接著有个人跳下小船，朝我们的方向划来。不久，小船上的人沿著绳梯爬上渔船。他是名水手。我们交换暗语，我上了小船，他掉转船头，划回潜水艇处。

这是荷兰皇家海军的 0-24 号潜水艇，舰长是德维里斯海军少校（DeVries RNLN）。在潜水艇上，我见到两位拟登陆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英国军官。他们是芬纳上尉（Claude Fenner）和哈里逊上尉（F.P.W.Harrison）。（哈里逊属于



因形势需要而与我一度结成盟友的约翰戴维斯。这张照片的极像当年在 136 部队一起工作时，我所认识的他。

英军印度部队辜卡兵莱福枪兵团。芬纳战前是在英殖民地当局的马来亚警察部队里服务。战后，芬纳重回马来亚，加入警察部队，最后擢升为总警长，被封为爵士。）芬纳是这次行动的首长，在他表明身份后，我把戴维斯的信交给他。

他们介绍马来亚区特工陈春林给我认识。他也要与芬纳和哈里逊一起，由我带他们登陆。芬纳和哈里逊两人坚持要登陆，尽力说服我，解释他们登陆的必要性。我委婉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向他们解释带领白人进入内地太过危险。

只带华人就没有那麽危险，因此我坚持我只能带领陈春林回营，这样此行才有成功的把握。芬纳和哈里逊没办法，只好接受我的解释。因此，当晚只有陈春林一人带著他的配备与我回到渔船上。看到他带来功能强大的无线电配备，英国陆军的 B.MK II 型电报机，我心里高兴。

我们把电报机搬下船舱，船慢慢地开回霹雳河河口。船长开著船，沿著一条有许多小渔船的航线回程，这些渔船上都点著一盏煤油灯。在小睡数小时之前，陈春林和我坐在甲板上聊天。我怀疑我所护送的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结果获得了证实。陈春林热心地与我谈中国和蒋介石，盛赞重庆政府。有时，他的谈话变成了演讲。我静静地听。我的原则是绝不与这种人进行任何争论。争论是无用的。谈了好久，看来他放弃了要说服我的希望。从此，他不再与我谈论政治课题。

隔天清早，我们的船回到霹雳河南岸，另一艘小船在那里等我们。小船转入不远的一条支流，抵达一个偏僻地点，那里有间渔夫的茅屋。我们不能住在仁特拉打园丘附近的乡村里，那里对我们是很危险。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我们藏身在这间茅屋，以便作好安排，让我们续程进入内地，到达比较安全的不兰丹营。

在仁特拉打，我又面对怎样处理电报机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电报机。这台电报机比前一台小得多，分成两部份装箱。尽管 B.MK II 型电报机有这些优点，但要运送也是十分困难。用汽车运载，沿路上日本人设立很多检查站，可能会被他们查获。为了不冒这个风险，我们安排仁特拉打地区的支持者为我们收藏电报机。我打算另找更可靠的办法，把珍贵的电报机运到不兰丹。

隔天早上，我们在预约的地点与无执照出租车司机会面，然后开始回内地的行程。我选择最直接的路线，不过却要避开所有主要市镇。启程前，我先告诉陈春林，我们可能会遇到麻烦，可能会遇到敌军驻守的路障检查站。如果遇到日本人检查，我要陈春林不讲话，只是对著日本人笑，一切让我与日本人谈。

这个时候，我已学会了几句有用的日本话。我的同行伙伴对日语一窍不通。我们很幸运，只遇到一个检查站，顺利通过。我们在美罗郊外铁道越过公路处下车，在西海岸平原上，骑脚踏车前进。到了中央山脉山脚，我们走两小时的山路，才抵达营地。

回到不兰丹营，我过于草率地许诺我会很快地把电报机运到营地。本来我能遵守诺言，但是在我和陈春林离开仁特拉打后，当地一名马共党员遭日本宪兵逮捕。整个搬运电报机的计划受阻，那个地区的交通线不能再使用。我们被迫放弃使用森林里的山路和园丘里的小路。我几乎花费一年的时间，才实现诺言，把电报机运回来。

电报机问题引起我与戴维斯之间产生摩擦。每一次我来到营地，他就追问这事情有何进展。我看出他十分沮丧。他会问我：“如果像你所说那样，那里有你的人，那麽你一定可以要他们帮忙。”似乎以这种语气羞辱我就能使这件事容易办。我已尽我所能处理，我这样告诉他。我发觉他不相信我，并怀疑我会认为不让这批英国人与盟军总部建立联系更好。当然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越早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我们的游击队就越早能获得他们答应给我们的供应品，我们就能越早展开工作，争取实现我们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

日本人在接获有人从潜水艇登陆的消息后，加紧突袭搜捕行动，展开逐户搜查。受我所托，替我收藏第二台电报机的党支持者十分害怕，不敢继续把一大箱东西收藏在他的木屋里。为遵守对我们的承诺，乡民秘密地把电报机藏在沼泽地带附近。

仅是策划把电报机运回不兰丹就花去几个月时间。我们不能暴露所运送的物品。最后，我们把机器拆散，主要的部件由脚踏车运送。这是件危险的工作，丝毫不能出差错。一支日军巡逻队或一个公路检查站，都会让我们的任务失败。我们的搬运人员必须作无数次的绕道，穿过树胶园和森林。他们经常必须把物件和脚踏车抬在头上，涉水走过沼泽地。

搬运人员终于把电报机送到不兰丹营，然而我们又发现主要的机件已被水渗透。整台电报机的电线必须重新装置。幸亏营内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懂得修理。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国民党支持者，曾在加尔各答接受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训练。接著我们又发现发电机不能操作。我负责去找一个二手的旧发电机来换。我送到营地的第一个旧发电机不知何故不能用。我找到的第二个发电机就行了。电报操作员开始要与科伦坡取得联系。不过现在他们又发现蓄电池坏了，必须

更换。我有办法找到一个来换吗？任何汽车的旧电池都可以。提出这个要求很简单。不过要带个汽车电池悄悄地走过森林是十分容易引人怀疑的。这段期间，大家都十分苦恼。

数年后我才知道，原来盟军在陈春林登陆过后，六度派出潜水艇到霹雳州海岸外，企图再送人登陆。除了一次达到派两名特工“盲目”登陆之外，其余几次全告失败。在执行最后一次登陆任务时，特工遭到日军巡逻艇猛烈炮火攻击。返回科伦坡后，马来亚区特工组就放弃再派特工乘潜水艇至马来亚西海岸登陆的计划。

依靠潜水艇保持零星通讯之办法行不通之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与戴维斯之间，只剩下以无线电进行通讯这个办法。他们设法于预定的时间，与戴维斯这批人取得无线电联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都毫无结果后，马来亚区特工组只能假定戴维斯和他的特工队员已被敌人消灭。他们本来有特别安排人员监听来自戴维斯的无线电讯号，最后他们只好放弃这项代号“盖世大务”(GUSTAVUS）的行动。

无线电联系终于在 1945 年 2 月 1 日接上了。从 B.MK II 型电报机搬到仁特拉打算起，已有 14 个月之久。他们告诉我，无线电联系是无意间接通的。在科伦坡，一位受训的女电报操作员漫不经心地收听一些未使用的特工电报频率，她突然收听到微弱的讯号。她无法确定讯号的来源，便请求教导员帮她辨认是谁发出的讯号。几分钟后，各自身份获得确证，双方建立了联系。

* * * * *

在无线电通讯无法接上的那段日子里，这批英国人的处境不仅是困难，他们简直是痛苦万分。戴维斯和他的人员必须尽力设法保持士气不要低落。查普曼的性格孤独，无法闲著无事，经常独自一人到森林里乱闯，与其他马共游击队接触。他到中央山脉四处找寻森林里的原住民，设法熟悉霹雳州大森林的地理环境。这期间我到不兰丹营时，发觉戴维斯十分重视发展国民党的情报组织。我知道他们在人口稠密地区建立地下小组，发展到北面的怡保。他们依靠由潜水艇送来的华人特工，以及在当地吸收的特工展开工作。陈春林成为这项活动的重要人物。

地下组织日益扩大，戴维斯和他的欧籍队友担心不兰丹营的安全。他们觉得不兰丹营太靠近美罗，而日军正加紧于美罗地区展开巡逻。此外，他们也担心这个营寨没有大树林掩护遮蔽，飞机在空中可侦察到。有一次查普曼到大森林里跑动，回来后宣称，找到一个更安全的地点，位于白礁山（Batu Puteh）的山坡下。从不兰丹可望到白礁山，这里的地势比第一个营略高，靠近原住民村，不远处是双溪阿依布索（Ayer Busok River）和双溪渥（Woh River）的交接处。1944 年 2 月底，不兰丹营里的人搬到东北面的新住所，走山路要两天的路程。然后，他们又再像往常那样忙著发展国民党的地下组织。

以我所知，国民党特工活动的最大成就是特工阿吴在怡保开一家米店，作为他们活动的前哨站。阿吴在颇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供应市内日本官员米粮的合约。阿吴是福建人，身材中等。毫无疑问，阿吴为戴维斯取得一些可贵的情报。问题是戴维斯失去了无线电联系，无法使用这些情报。

怡保及其周围地区有我们强大的基层组织。他们传给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组织内毫无纪律。我们认为，戴维斯安置在怡保及其周围的特工很快就会暴露身份。我们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我十分忙。我一方面要负起霹雳州党书记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与英国人和国民党人沟通的联络员，我还要负责不兰丹的保安工作。此外，我尽量设法满足英国人提出的要求。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无法应付。我派人去通知莱特说我无法有效地扮演所有的角色。我建议党派一个人来当我的助手，分担我的党务。莱特同意，他从雪兰莪州调派一个人来霹雳州协助我。我的助手是爱克，我听过他的名字，但未见过他。他比我大了约十岁。他从中国南来马来亚，在锡矿场充当书记。爱克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负责工运的工作。他于 1940 年被调到雪兰莪州，担任州委。

我与新来的助手讨论如何分配工作。除了英国人从山区通至海岸的供应线之外，我把大部份地区的活动直接交给他领导。华都牙也、怡保、和丰和北霹雳这些地区的活动交由新人负责。我保留领导南霹雳地区，包括美罗、丹绒马林、安顺和实兆远。多年后回想起来，我要求派人来减轻我的党务，但又保留充当盟军特工联络员的责任，显示我重视与英国人的合作。我认为，我们应扩大与英国人的合作，这是现实的需要。

战争结束时，由于我的工作表现，马来亚组办事处首长特雷姆利特在他的

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他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写了一份总结 136 部队活动的机密报告④。报告写道：

CTP（当时 136 部队称我的代号）是霹雳抗日军的首领，在过去两年，他断断续续与戴维斯在一起。他是一位有能力，明智，讨人喜欢的人，给戴维斯个人极大的协助，也对我们的整体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几乎完全是因为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能有 30 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连队，随时可以攻击日本人的交通线。也是由于他，抗日军连队首长们才能与和他们在一起的英军联络部队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

几乎从一开始，戴维斯和布鲁姆就向我强调，马共游击队不要大事扩充，只需注重作好充份准备，迎接盟军的到来。盟军的登陆意味著英国人把日本人赶出马来亚的开始。从军事观点而言，这忠告有其道理。但是这也是英国人的阴谋，他们要确保在过渡期间，他们还有办法控制我们。英国人紧记他们的长期政治目标，因此他们不愿看到我们的军力太强大，不能超出他们反攻登陆时，我们给予配合所需的军力。我们确信，这是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发出的政策性训令。我们表面上是同意戴维斯他们的看法，给他们的印象是我们的游击队仅是留在大森林里的营寨进行训练。我们不让英国人知道我们在发展秘密的流动游击队。

除了彭亨州之外，马共在马来亚其余各州都有设立流动游击队。这些流动队是由各州党领导人自行组织，非依照中央的政策性训令成立。因此，流动队是由前线现场的人指挥行动。

在霹雳州，我们成立了五支流动游击队，其中一支由我亲自指挥。开始时，每队只有三、四名特别挑选的游击队员。随著时日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我的流动队队员随身携带手枪，腰间挂著手榴弹。大型流动队除了有手枪和手榴弹之外，还拥有汤姆枪和莱福枪。霹雳州五支流动游击队当中，以怡保地区的流动队势力最强，最令敌人丧胆。怡保是全国人口眾多的城市之一，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目标，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的除奸黑名单。

地方上那些为日本宪兵部效劳的人，犯罪调查局的人，以及那些为日本人收集情报，违反人民利益的当地人，是我们对付打击的主要目标。马共称这些人为“敌奸特务”。他们主要是华人。别忘了我们在马来人地区几乎没有这类活动。至于那些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他们主要是亲英的，他们愿意同我们合作。他们认为，我们的活动能更快地打败日本人，早日让英殖民当局重回马

来亚。

州委或地委发出灭奸命令，地方干部选定对付的目标。在农村地区和偏远的乡村执行灭奸命令并不难。但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行动，就必须作好周密的策划。流动游击队在怡保展开活动，名声大振，队员人数随之增加。队员的武器有汤姆枪、手枪和大量的手榴弹。流动队最英勇的一次行动是突袭九洞（Jelapang）警署。警署设于怡保至朱毛间的一条小路旁。四名游击队员乔装成日本兵，进入警署，假装是要来巡视警局。驻守警署的马来警官认不出来者全是华人，迎接他们进来。一入警署，流动队首领立即下令所有警员携带武器列队，接受检查。假日军检查人员逐个检查，把他们的武器——拿走，拿到外面等候著的车上。军械库的武器全搬空。然后，流动队驾车扬长而去，惊愕的警员还在列队等候。

这次行动十分成功，我们获得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这类行动事先必须做好大量筹划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突发性的，我们的流动队必须快速行动。我清楚记得发生在美罗东北面一间路旁小咖啡摊的事件。那里靠近通往不兰丹营的路。马共的支持者在那里经营茶摊，作为我们营寨警卫队的前哨侦察站。这不寻常事件与九洞突袭行动刚好相反，有趣的是这回是日本宪兵情报官员乔装成华人来这间咖啡摊。他腰间佩带一把德国毛瑟手枪。当他坐下来，他的衬衫往上拉，露出手枪，让咖啡档里的人看到。他用不流利的华人方言，带著明显的日本腔，与在喝咖啡的人交谈。我们的流动队接获通报，赶到咖啡摊，要逮捕这名日本人，可是他作出错误的判断，企图反抗，结果当场被击毙。我们拿了他的毛瑟枪，把他的尸体埋掉。

我不用“恐怖行动”这个词来形容流动队所做的事。我们是在打一场不受约束的战争。对我们马共而言，这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我们的游击队是独立的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我们与英国人有协议，大家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战争的目标是消灭敌人和那些协助敌人的人。事实就是这样。“军事行动”这词更适合于形容我们的游击队当时的活动。

我们的流动队并不是如一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杀害了很多无辜百姓。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认错人。但这是特殊情况，并非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流动队从来就没有大规模的杀人。他们是按照明确的命令，有节制地行动。

这是项争论性的课题，也是很重要的课题。紧急状态实施后，英国人开始用“匪徒”称呼我们。接著，英殖民地当局认为，应该用较煽情的字眼，他们便发

署的所有警方人员，都成了人质。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市镇。接着，展开了5天的战斗。英军增加援兵，进行反攻。同志们宣布解放话望生，这是我们行动的最高潮。战斗结束时，这个市镇又被英军占领了。因此，整个紧急状态时期，这是我们宣布的第一个解放区，也是唯一的解放区。

当时，这事件除了给我们带來心理上的优势以外，这为期五天的解放，对我们长远的事业毫无帮助。

这个时候，英国人在马來亚这个殖民地，有自己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严重的领导危机。我确实为联合邦第一任钦差大臣甄特感到难过。他突然间被召回英国，而不幸在7月4日下午伦敦郊区诺厚特机场（Northolt Airport）上空，发生的一宗飞机相撞的空难事件中丧生。事件发生后的几天，我才听到消息。载他回国的皇家空军约克（York）运输机和瑞典的空中霸王客机发生相撞事件。他是在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的屡次催促下被撤职的。马共在马來亚活动日益频繁，英国束手无策，甄特成了代罪羔羊。⑩

最近，我所阅读到的销密文件透露，麦唐纳受了良心责备之后，对甄特如何被召回国一事，尽量推脱罪责，以保全自己的地位。⑪然而，在英殖民部大臣克里奇琼斯（Arthur Creech-Jones）早些时候向英国内阁所作的陈述对照下，甄特死后，麦唐纳写给伦敦的大量信件，显得空洞无物。1948年7月1日，当时，甄特正在飞回国土，琼斯对内阁说：

“这几天，大总督马尔科姆麦唐纳，向我表露，联合邦的公众人士以及部门首长，已对马來亚联合邦钦差大臣，爱德华甄特爵士，失去了信心。他在报告中说，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立即把爱德华甄特爵士召回英国，是至为重要的。甄特不应该回到马來亚去。麦唐纳建议时的措词，是那么强硬，我不得不立刻同意。现在，甄特爵士正在飞回国的旅途中。7月3日，他将抵达英国。在还沒委任另一人为钦差大臣以前，马來亚联合邦的首席秘书（Chief Secretary）纽博尔特爵士，就是代钦差大臣。”

我对甄特的看法，跟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极为不同。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殖民地行政官。他不动声色，等待时机，让我们暴露自己。他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谋略很深。一路來，他知道紧急状态一定会实施。但是，他要确保，镇压的时机到來的时候，他们进行镇压看起來是因为我们先向英国人宣战而引起的。的确，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而我们自己却措手不及。

有好几个月，甄特面对欧洲种植人和锡矿执行人员的冷嘲热讽。他们主张，在面对我们日益频繁的职工会活动，英国人应展示力量。在他们眼中，甄特是软弱无力和犹疑不决的。这点，我不同意。如果种植人和锡矿场主的主张得逞的话，英国人早就向马共公开宣战了。这么一來，在宣传战中，我们在群众的眼里，就立刻成了受害者。反过來说，英国人就成了众矢之的。即使我们犯下了他们所指的过错，我们将被当作是真正为被剥削的工人而奋斗。甄特意识到了这些微妙的政治含义。

带着狭隘的殖民主义思想和潜在的种族主义意识，那些种植人和锡矿业主是无法理解这点的。英国人沒受到挑衅却镇压我们的话，这将正中我们的下怀，为我们争取到马來亚各民族对我们极有利的同情。这种局面所带來的政治副作用，可能给英国人带來灾难性的后果。

不要忘记，在紧急状态最高峰的时候，种植人和锡矿业主主张恢复军事统治，采用他们在上世纪所使用來镇压印度起义的类似措施。对我们來说，不幸的是，当局不理会这个主张。当时，如果当局同意了，那么，他们就掉入了我们的圈套。

甄特由亨利葛尼爵士所取代。他50岁，是个经验丰富的行政官。他曾经当过巴勒斯坦政府的首席秘书。

* * * * *

从金马仑高原的临时营地，我组织了北马局，控制北马的霹雳，吉打和槟城三州。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坚持对这个运动作个评估。虽然发生了话望生事件，或许是因为当时，我对不合时宜地过早进攻话望生所产生的影响，还未完全了解，所以我还是赞成在吉兰丹建立解放区。与此同时，根据我8月的指示，杨果已进行筹备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他已通知所有的参加会议者。

接近开会日期的时候，显然，我不能抵达原订的地点，也就是靠近森美兰知知港（Titi）附近的森林营地。知知港坐落在三州，即雪兰莪，彭亨与森美兰的交界。

到了这个时候，为了确保安全起见，高级党负责人转移时不得乘车沿着公路走。从金马仑到森美兰的路途太远了，靠步行是不可能在在预定时间内走完的。

林谋盛化名为陈春林，于 1943 年 12 月在美罗地区森林里参与签署不兰丹协议。较早时，我曾在邦咯岛岸外海上接应从锡兰乘盟军潜水艇到来的林谋盛，并带他到不兰丹营。

戴维斯的委任状作抵押，向富有的华人借大笔款项。他们需要钱来展开他们的活动。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计划。但我也可怜戴维斯。他和他的伙伴士气低落，有任何机会都想抓住，作最后的挣扎。我说，我会处理这件事，事实上，我不想去做。

现在戴维斯部队参与反日战争只剩下这份 1943 年 12 月的协议。然而没有接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实际上，这纸协议毫无作为。他们只有在与科伦坡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之后，才能收到盟军司令部的命令。这方面，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后来，查普曼写道："我们十分感激游击队在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刻仍然收容我们。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与陈平这位杰出人物，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任何时候，他们都不让我们觉得我们对他们是一项负担，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

我们与英国人相处在一起比较容易，但与国民党人相处绝不简单。与国民党人交往，我必须持有两种不同的心态。我们与国民党特工同住营寨内。然而在外面，我们正与一群宣称他们是支持国民党的土匪展开激烈战斗。这些土匪散布在彭亨、吉兰丹、霹雳和柔佛州各地。在靠近金马仑高原的吉兰丹南部地区，有一支三百人的土匪在活动，他们的营寨设在大森林里。这批匪党直接威胁到我们对金马仑区的控制权，我们必须驱逐他们。

这地区有国民党土匪，还有一批长久定居在吉兰丹州的华人，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华人有所不同。他们的祖先于 200 年前，就是满洲人占领中国时，从中国来到马来亚。起初，当地的苏丹允许他们住在吉兰丹河口地区，后来苏丹又同意让他们移居内地从事农耕。由于男多女少，移居到那里的华人便与当地原住民妇女通婚。一代代传下去，那里的华人肤色较黑，不过仍然保存他们的语言，主要是客话。他们被称为海客家仔。随著时日的演变，政府逐渐管不了他们，只要他们象征性地向政府缴租和纳税。他们便一直生活在边缘化的环境中。

这些人居住的地方是我们设立永久根据地的理想地方。我们在那里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也经常能获得粮食供应。可惜，土匪已渗透这个地区。土匪是在后期才从中国南方到来。他们在中国结党打家劫舍，最后政府展开围剿，他们被迫离开中国。到了马来亚，这些土匪替英殖民地当局和华族商人打工。他们在锡矿场和园丘里充当合约劳工。由于他们已习惯于中国那里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住在乡下，尤其是大森林的边缘处。他们保留他们的方言，同时逐渐地散布到半岛各地。在霹雳、彭亨、吉兰丹和北柔佛，都有这类人聚居的小村

落。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法治一般良好，他们也就奉公守法，不敢为非作歹。

日本入侵后，局势改变，治安恶化。这些前土匪故态复萌，又再干起犯罪勾当。他们走出森林，搜寻武器。有了武装后，他们就打家劫舍，胡作非为。马共主动与他们接触，希望与他们结盟。我们的队伍比匪徒强大，政治上组织良好。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头脑根本不考虑原则。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势力强大，有办法要他们守纪律。他们同意我们派政治指导员到他们的部队里，作为交换，我们供应他们资金和粮食。这些工作全是由州委执行。

土匪逐渐地不听从我们的指挥，也不听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的教导。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年人，鸦片烟瘾很大。他们把钱乱花在毒品和女人身上。当钱花光了，他们就抢、劫、奸、杀，胡作非为。起初，他们企图隐瞒，不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罪行。我们发觉后，公开批评他们，处罚他们。他们逃进深山营地。

时间久了，各个小匪帮结合组成更大的队伍。例如在霹雳州，他们合并成立一支大队，迁移到暹罗边界的宜力一带活动。那里是一个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们加以利用，在宜力那一带活动，造成极大破坏。

可以理解，当地的马来居民不喜欢这批外客，便向日本当局通报。土匪不甘心，展开报复，洗劫多个马来乡村，杀死了约400名村民，包括妇女和婴儿。此外他们还绑架不少妇女，带回森林营寨。暴行令人发指。日本人嫁祸共产党人，宣称是“三星军队”杀人和干下暴行。我们立即发文告否认是我们所为，并指出真凶。

土匪对中国怀有狭窄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他们不喜欢我们。当我们向他们灌输政治思想时，他们会说：“你们是中国人，但是除了孙中山之外，你们的店和住家挂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我们只尊敬国父孙中山。我们不要大胡子和光头的外国人。”

为了粉饰他们的犯罪行为，土匪公开宣称他们效忠国民党，突显他们的政治形象，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人尊敬。因此，我们称他们是“国民党土匪”。当然，我们认为林谋盛和他的队友完全是另一类人。

* * * * *

随著太平洋战争形势的演变，莱特调整他的政治立场。缅甸前线战事的发展，一般人认为英国人已做好准备，盟军即将在马来亚登陆，显著地影响莱特的看法。1944年10月，他在吉隆坡北面，雪州的双文丹附近森林里召开马共高级干部会议。我出席会议。我的亲密同志，霹雳州人民抗日军司令廖伟中也出席会议。通常英国人和马共人员都称他Itu。我们两人被迫从霹雳州步行至双文丹，整段路程费时两周。为了安全，当时我们决定不用正常的交通工具，包括不骑脚踏车。

出席会议的干部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莱特在会上发表重要谈话。他预测盟军即将从海路登陆，党必须对此作好准备。这位总书记告诉与会者，他已同英国人签署协议，同意马共与登陆的盟军配合。显然他是指1943年12月的不兰丹协议，不过莱特未详谈，只作一般性报告。他告诉与会的高级干部，他答应与英国人合作，换取他们的协助。他说，英国人将向我们提供武器和金钱，这些援助即将送到。

接著，他提出，为配合今后的发展，我们的游击队军事组织必须以新的结构出现。今后我们应把军事组织分成两个部份。一部份是“公开的军队”，这支军队将与英军合作，实际上是在英军属下运作。另一部份就是党的“秘密军队”。时机成熟时，秘密队将能独立操作。莱特清楚地向我们表示，到时我们的秘密队将与英军开战。

期待中的盟军登陆一旦实现，我们将更改旗号，从抗日军改为民族解放军，从抗日同盟改成民族解放同盟。当盟军登上海岸时，游击队应尽可能占领土地。莱特谈到我们应尽量夺取中、小市镇。大家都清楚，我们无望占领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如怡保、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他认为，我们的游击队可接管小市镇的银行、邮政局和火车站。他没有提到占领警察局，但我们心想，警察局自然是我们占据的目标。我们期望在占领市镇后，成立我们的政府。莱特的演说等于是号召革命，振奋人心，我们的士气高涨。

党的政策是组织工人运动不是发展武装斗争，这是日本人下的命令，我们是在三年后才知道。为什麽这名马共领袖突然间又改变政策呢？整个太平洋和欧洲战场上的发展现在已清楚显示日本人即将战败。莱特明白，不久后他必须投靠英国人，必须调整党的政策，防备出现这种局面。那麽为什麽要设立秘密军队呢？莱特是在要弄手段，使两边对立，自己获益。召开双文丹会议时，他已经知道全党上下，包括人民抗日军，情绪高昂，希望加强武装斗争。当时他

的权力基础薄弱，他别无选择，只能迎合领导层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双文丹开会时，大家完全意想不到日本人会无条件地投降。我们都以为日本人会作战到底。当然我们没有想到原子弹会有这麼大的威力。

莱特的建议获得党的大力支持。接著我们讨论日本人战败后的局面。我们预料英国人会掉转头来对付我们，要求我们交出武器，解散我们的组织。这个预测完全正确。我们不会理会他们的要求，反之会把斗争矛头转向英殖民地当局。在这件事上，莱特保密，没有向日本人透露党的这项机密。

因此，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各地代表返回各自的营寨总部，开始组织马共的秘密武装部队，不久被命名为我们的“秘密队”。我们十分小心，不让戴维斯和他们的人知道我们的秘密活动。我肯定他们会怀疑我们在从事某些活动，但我不认为他们会完全知道我们在干什麼。

1945 年 2 月 1 日，戴维斯成功地与锡兰总部建立起无线电联系，令人难以置信。戴维斯因此能够把自 1943 年以来他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发送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新的发展需要英方和马共立刻召开正式会谈，讨论执行 1943 年 12 月的协议。戴维斯要我尽快带“张红”前来会谈。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安排会谈。与此同时，由于有了电报联系，皇家空军的“解放者”型飞机开始陆陆续续运来空投物品。

1945 年 2 月 26 日，戴维斯邀我亲自观看霹雳州最早的空投活动，地点是在打巴通往美罗公路郊外的开采锡矿地区。当两名 136 部队白人军官，两名电报操作员和两吨的物资准确地降落在空投目标地点，周围的人发出一片欢呼声。之前的供应品空投都是“盲目”投下。戴维斯通过无线电协调空投任务。我告诉他我们所控制的地区，尤其是霹雳州和吉打州的地点。他以无线电把情报传到锡兰总部，他们就根据情报展开空投。

英国人与“张红”在 4 月 16 日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如何履行不兰丹协议。为了这次会议，我特地在离我们最初的不兰丹营不远处，山脚下的矮青芭，临时建立一个游击队营寨。刚好那时我患上严重的疟疾，正在康复中。莱特和布鲁姆的状况比我更糟。由于感染各种热带疾病，布鲁姆的身体虚弱，必须拿拐杖，并由戴维斯和查普曼扶著走路。“张红”不能走远路。为了他，我把会议地点安排在离道路不远处。这麼一来，我们被日本巡逻队发现的风险很高。

尽管与会者的健康欠佳，会谈十分融洽，充满乐观和喜悦，几乎是兴高采

烈。这一次英方的代表是戴维斯、布鲁姆、查普曼、136 部队军官汉那中校 (James Hannah) 和带著电报机出席会议的电报操作员汉伯里曼下士 (Humpleman)。七周前，我看到汉那和汉伯里曼在霹雳州第一次空投跳伞行动中降陆。“张红”、廖伟中 (Itu) 司令和我代表马共。英国人就要登陆马来亚，像廖伟中这些游击队司令必须作好准备。会上完全没有提到已失踪的陈春林。

戴维斯要求我们扩大我们的部队。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军官逐州检讨扩大游击队的可能性。例如，他们认为，霹雳州马共游击队的人数应增至 800 人。当时我们的霹雳州游击队总人数只有 500 人。英国人的目标是要在半岛西海岸南北主干公路和铁路沿线，要有游击队组织。日军是以新加坡作为后勤供应基地，依靠主干公路和铁道运送物资。按照计划，一旦盟军登陆反攻，我们的游击队就配合袭击日军这两条主要供应线上的目标。戴维斯还建议空投武器，武装我们的游击队，并详细列出所能供应的武器和游击队所需的军火。他补充道，盟军还会空投金条，假日本钞票，让我们的部队囤积粮食。我们每个月将能获得高达 3 千英镑的资金供应。此外，他们还会空投更多粮食。

英国人的主要条件是，马共必须接受他们派来的联络官。东南亚司令部准备派遣联络官跳伞降落马来亚。每名联络官都带著一排的辜卡兵。我们也必须在原则上接受每一中队都有一个（州级）联络官（GLOs）驻扎。成立了联络组过后，他们才开始空投武器。联络组的人员将监督和分配武器、弹药和其他各种军需品给各个游击队单位。

会议休息期间，Itu 司令在英国人听不见时问“张红”，游击队接受辜卡兵是否会严重危害双文丹会议的计划。“张红”立即答道，不用担心。他说，每一州只有一排辜卡兵，而我们每州的军力都超过一中队。

简而言之，“张红”接受所有条件。英国人无比兴奋。

“当我正在主持党内日常工作的一般讨论时，我的秘书闯进房间告诉我们日本宣布投降了。他是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发射到马来亚的强劲广播时，听到一则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新闻。那是在8月16日的下午。”

第八章
打不打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

当和科伦坡的无线电通讯已经畅行无阻，而我们的游击队和东南亚司令部之间的合作也焕发出新的热忱，于是将戴维斯部队中的至少其中一人偷渡出马来亚变得异常重要。一位长官所能提供的情报，对英军在策划最后阶段所预期的海面进攻以夺回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封锁行动”（Operation Zipper），是非常关键的。在无线电还未取得联系之时，我们老早已经决定了由布鲁姆前往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

当布鲁姆启程的时间来临时，戴维斯认为因感染多种热带疾病而紧急需要医疗的查普曼，应该陪同布鲁姆一起离开。我再次被要求安排前往海边的行程。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跟科伦坡通讯之后，皇家海军同意在半夜派遣一艘潜水艇潜于邦咯海位于邦咯大岛西南部小岛的附近。会面地点约在一个叫做丹绒布朗雅（Tanjung Blangah）的沙滩海湾，这个地方过去被到此度假的外国人称为绿宝石湾。我的任务是确保布鲁姆和查普曼在5月13日的半夜安全及准时的抵达绿宝石湾，以等待依约出现的潜水艇。

我把这次的行程分成三个部分。两个是到海边的行程，第三个部分是布鲁姆和查普曼在绿宝石湾的等待地点。这不同阶段的行程需要一组带路人及武器配备良好的游击队护行。我陪同他们数天后，在4月28日的下午离开了他们，让他们留在打巴（Tapah）市外的一个小村庄。当我和两位和我共同相处了接近两年的欧洲人握手道别时，我对他们所流露的感激诚意，毫不质疑。那无疑是让人感伤的时刻，虽然我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议程。他们俩都是杰出及勇敢的

克劳德芬纳看起来比在 1943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我在邦咯岛接头潜水艇上拒绝领他上岸时开心。芬纳，战前是森美兰州的一个殖民地警察高级官员，1945 年 7 月以降落伞再回到马来亚来，这回是当与我们游击队合作的联络官。战后，芬纳重新加入马来亚警察部队，并升级为总警长。他随后被封为爵士。

人，我真诚地希望他们，无论那一个，都不会在日本战败后，被送回马来亚来维护英国的利益。

根据计划，两个欧洲人离开后不久，一个重要的空投将会在霹雳州中部山区的一间锯板厂内降落。为了确保能够在日本搜寻部队来到之前，在很快的时间内收集这些由降落伞送到的补给品并搬离现场，这需要动用我部队内最能干的 150 位游击队员。一般上，在空投的两个小时之后，敌军都会派出搜寻队。这些空投最常发生的问题是皇家空军不断地使用白色降落伞，而不用有伪装作用的其他种类。白色降落伞非常容易被侦察机发现。遗憾的是，皇家空军显然拥有太多白色降落伞的存货，而严重缺乏能起伪装作用的种类。

布鲁姆和查普曼在五月底安全抵达锡兰，“封锁行动”的军事策划者也恰好在这时候戏剧性的指示把准备工作期限从十一月底提前到八月中。所有旧的计算都必须抛弃，并为一个大幅度加速了的计划所需的全新安排所取代。从锡兰送来的补给品，在 6 月 6 日开始密集送到，三个刚抵达的皇家空军“解放者”中队成为空运的主干。记录显示，以锡兰为基地的“解放者”空运机，从米勒里亚和中国海湾的跑道起飞，必须在任何气候的情况底下作 2 千 500 到 3 千英里的来回飞行。因天气而取消的飞行行动，少之又少。飞机师常在马来亚上空的空投地带碰上暴雨及浓雾。

当空投的次数越来越密集之后，英军联络官及他们的辜卡保安部队的前来也已经是时候了。从 7 月 1 日到 7 月 15 日，总共有 111 人成功地以降落伞进入马来亚，显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幅度之大。在可行的时候，英军也在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空投下联络官。例如在森美兰，英军安插了曾在大战前在这里担任高级警官的克劳德芬纳。每一个联络官都带齐了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因此几乎在他们降陆的那一刻起，就可以和科伦坡取得直接联系。

皇家空军所执行的任务非常精确，这使到寻回空投的武器变得相对地容易。马来亚组办事处对这些行动作了这样的记载：“因为无法找到空投地带而不成功的飞行行动的百分比，是非常微小的，虽然有些行动实际上被形容为把手帕塞进山区。”

无论如何，在某些空投地带，大风的确会把降落伞吹离其路线，使到搜寻它们非常困难。遇上这种情况，我们的游击队被鼓励从中混水摸鱼，把寻获的武器存入我们的秘密军火收藏处。

马共在紧急时期所用的军火来自 136 部队的空投这个事实，已多有论述。这

的确属实，但是并不多。事实上，它们在我们大战后所收集的所有军火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我们早期所收集的军火，主要来自日军侵略马来亚时，英军退守南部时在战场遗留下的武器。在马来亚被日军占领时期，我们也从日军手中取得微量的军火。但是，在东京宣布投降不久之后，我们才真正地获得了大量军火。这些军火，有些是日军部队所遗弃的，但大部分是通过和日军守卫部队的高级军官所商谈的结果。总结起来，我们的秘密部队在森林所收藏的军火共有5千支枪，其中从136部队空投所获得的武器还不到10%。

* * * * *

在一片士气高昂的情况下，我在离开金宝不远的阿逸君令（Ayer Kuning）小镇召开了霹雳州党委员会的8月会议。当我正在主持党内日常工作的一般讨论时，我的秘书闯进房间告诉我们日本宣布投降了。他是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发射到马来亚的强劲广播时，听到一则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新闻。那是在8月16日的下午。当胜利的亢奋稍微平伏后，我立刻把会议议程转到如何实践莱特之前的10月指示的讨论上。在过渡时期，我们依照指示进行工作，把我们的游击队和政治单位改名，以反映一个全国的革命解放运动的形成。我们在使用秘密队加速我们的武器收藏方面也进展神速，现在是把所有的工作重新划一，让我们整装起来，以迎战卷土重来的英军的时候了。

会议的第二天，我们霹雳的交通员，一个住在吉隆坡的中年华裔妇女，带来了莱特的信息。他指示我立刻动身到首都和他会面。所有出席的同志都了解到事态的紧急性，并同意在我回来后重新召开会议。我乘搭了我所能乘搭的第一班火车，一名同志在吉隆坡的火车站接待了我，并陪同我一起到党的雪兰莪新总部。它刚从双溪毛糯的一个荒凉的地点，搬到附近一间英国人的园丘内的经理独立式洋房。那是在8月19日。

我并没有见到莱特。我被告知他在数小时前赶回新加坡去了，但是他通过杨果，一个和我拥有同等职权但负责雪兰莪州的同志，给我留下了详细的指示。

我初次和杨果会面，是在我还是后援会的学生活跃分子的时候。当时在槟城有一个为霹雳、吉打及槟岛干部举行的会议。杨果出席了这个由后援会北马分部主席黄望青主持的会议。杨果是他的助理。（黄望青在1973年到1980年成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杨果很早就成为马共的全职工作人员。聪明、充满活力及意志坚定，他很快就被委任进槟城市委员会。党过后把他转移到新加坡，同样的成为市委员会的成员。英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之前，曾经在新加坡逮捕过杨果。当时的殖民政府决定驱逐他，把他和一群被驱逐的党员及支持者送上一艘开向中国的船上。在船开向香港的半途中，日本侵占了这个殖民地。该船立刻掉转头开回出发的港口。杨果再次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但已经重新变成一个自由人。他立刻在日本军还没有抵达新加坡之前，转入地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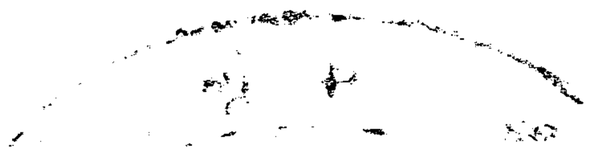
我们于1945年在雪兰莪的会议，是我和杨果第一次一起工作的机会。在这次会面中，他给了我两份文件。一份是党的《八大主张》，以备日本投降后使用。另一份是莱特在双溪毛糯所作的发言大纲。这两份文件，和杨果所提供的解释笔记一起交给了我。

这位雪兰莪州书记向我形容了莱特如何在前一天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雪兰莪党部仓促召开了一个三人会议。出席者包括莱特本身、杨果及一名雪兰莪州的高级党干部。莱特在向后二者发言之余，也提呈了《八大主张》⑤并获得会议的同意，把有关文件发布下去。马共则将在8月25日正式发布这份文件。

当我阅读这份还没发布的纲领草案时，我的心开始下沉。它指示党：

1. 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联盟，拥护新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
2. 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所普选的民意机关。
3. 废除日本统治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法令、法律。
4. 实现言论、出版、组织、集会、信仰的绝对自由。
5. 振兴工商业，改善民生，加饷加薪，救济失业者和难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6. 实行民主教育，废除旧教育，用各民族语言发展民族文化。
7. 平抑物价，审判贪官污吏和投机黑市分子。
8. 优待抗日士兵，救济死亡将士家属。

我意识到这个纲领明显是个为了讨好重返的英军的无趣动作。它遣词用字过于泛化，完全没有提及马共要为国家争取民族自决的基本目标。它对所有在日据时期为党在危险前线工作的人员，是一项严重的打击。杨果的笔记及他的



槟城中学毕业时的杨果。这是他毕业证书上的照片。他与我一样，在年纪很小时就成了热衷分子。我在槟城，后援会干部的一个集会上第一次与他见面。

口头解释加深了我的失望。他说莱特在会议中提呈了一份指示，该份指示基本上和他在十个月前于双文丹所说的是 180 度的转向。党总书记现在坚决反对党所采取的军事立场。他认为这个时候选择转向政治斗争是适宜的。他提出和英军合作，同时积极组织劳工团体及渗透工会。换句话说，是重新从零开始。更糟糕的是，他也考虑了公开解散我们游击队的公开队及私底下解散我们的秘密队。唯一仅存的一线希望，是他对秘密队所做的指示，要他们把所拥有的武器保存及储藏在森林内。我们要进行和平斗争。

我同时对莱特在双溪毛糯会议中仓促成立的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感到不解。从我接触戴维斯、布鲁姆和查普曼开始，三个英国人就已经不断的要求我替他们安排和党的最高司令代表接触。除了在英军向日本投降后的一段短暂的时期，在整个日据时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马共最高司令的存在。许多次我都以通讯问题使到和最高司令取得联系非常困难的理由来回避这个问题。为了党的荣誉，我时常都小心不透露我们军事缺乏协调的问题。现在，在大战结束之后，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成为了三星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总司令是莱特，我是他的副手，然后是刘尧，被称为第一独立队的雪兰莪部队的司令。带着我最新的军衔，我被莱特指示在第一时间到双文丹和戴维斯会面。再一次，没人质疑我们总书记的意见。他曾是共产国际的人，这些魅力并没有因为共产国际在 1943 年解散而从他身上消退。

当我抵达双文丹并以游击队的第二号军事人物的身份和戴维斯见面时，他显然对我在马共内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困惑。当我们第一次在 1943 年 9 月的昔加里会面时，戴维斯刚从潜水艇登陆不久，我介绍自己为党霹雳委员会的代表。在 1943 年 12 月和戴维斯及张红的重要会面并正式达成和东南亚司令部合作的时候，我当时是以中央委员会联络官的身份出席，并于后来成为戴维斯联系党高层的管道。现在在双文丹，随着日本的投降，我成为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事实上，我在军事政策上根本没有任何决定权。戴维斯到底是否意识到这一事实，我完全无法知道。

戴维斯自己，也处在一个非常为难和微妙的地位。他无法预测在马来亚的日军会对日本天皇的投降指示作出如何的反应。他肯定已经接到某些情报，某些日军部队羞于成为战俘，正认真考虑不顾裕仁天皇的命令而继续战斗。同时，戴维斯对马共的最终意图有很深的怀疑。这位前殖民地警官在马来亚的地下活动及和我们密切接触的日子里，已经让他完全了解到党上下对争取马来亚独立的认真程度。

他从无线电电报中被告知英国的进攻军队——现在成了重新占领的殖民部队，将无法在至少三个星期内于马来亚登陆。在这段过渡时期，谁将控制这个地区？戴维斯知道至少在英军来到之前，马来亚及新加坡将出现管理的中断，正处于高度危机中。英国及其英联邦的军事伙伴，尤其是澳洲以及纽西兰，在刚刚庆祝了联军在太平洋的胜利战役后，随时可能要面对一场马来亚的反殖民游击战。

以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同意继续战斗的看法，但是莱特在双溪毛糯的指示已经扑灭了这样的希望。虽然如此，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要以最快的时间回到霹雳。我现在得向我们在霹雳及吉打的部队，传达他们至少必须暂时解散的为难任务。

当我在 8 月 22 日和戴维斯于双文丹会面时，我当然藏起了自己焦急的心情，他告诉我说他会立刻启程到吉隆坡，继续尝试联络雪兰莪日军总督，Shoura Kakama 中将。他希望可以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维持某种程度的过渡期管理机构，一直到英军抵达为止。戴维斯要我陪他一同去首都一趟。他承诺，我的住宿将由东南亚司令部负责，并表示他需要我的帮助，以便从日本转到英国的控制权能够顺利进行。这其实是一种托辞。我知道他的意图，更倾向于防止马共游击队对付重返的英政府利益。我以霹雳州有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来推辞了他的邀请。在离开之前，我答应在处理我北部的事务之后，将尽快到行政首都和他会合。

那是 8 月 25 日。党内的革命情绪从来没有如此沸腾高涨。我们大多数的游击部队，在过去的七天内，已经作好准备继续战斗，只不过这次的对象转成了英殖民军队。

就在裕仁天皇于 8 月 16 日的电台广播宣布不久，日军在马来亚的各司令开始伸出触须要求和马共会谈。他们清楚表示他们极其焦虑，想不顾投降的命令，而寻求和党及我们的游击队成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继续战斗以对抗重返的殖民军。如果我们决定如此做的话，他们已经准备好宁愿加入我们，也不肯成为战俘。这些明确的建议，从森美兰、霹雳及吉打的日军最高司令部传来。在柔佛，同样的建议来自中阶的日本军官，并因此而在马共州委员会中触发了激烈的辩论。持平而言，当时游击队中可以说是一边倒，希望向英国殖民军宣战及接受日军的献议。我不在的

那一个激情狂飙的星期里，许多日本军营放出讯息，他们愿意转到我们这一边，并把大量的军火武器一起带过来。

例如，我们在吉打的军队领袖阿和，和该州的日本最高军官进行过特别的谈判，目的是为了在该区成立马共 / 日本的联合作战部队。在霹雳，谈判在日军位于太平的总部展开，日军代表是一位军衔陆军少将的高阶司令，而我方的代表是我的州委员会副书记爱克，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代表了我。日军的总部，过去都在新加坡，当他们的情报分析预测英国的军队将从马来亚的北部开始进攻，于是在几个月前把总部移来太平。因此实际上，我的副手是在和控制马来亚和新加坡整个日本军队的总司令直接谈判。

在这次的会谈，这位日军陆军少将向爱克提出了同样对我们吉打军队司令提出的建议。“如果你选择继续作战，你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的副手毫不犹豫，立刻答应说原则上，马共将继续战斗。他告诉该日本军官他需要数天的时间以处理工作的细节。

因此，当我回去告诉爱克一切已经改变，他极度沮丧。日本的突然投降给予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整个局势扭转成我们的优势，然而我们却没有好好把握它，我们还把它给丢弃了。和投降的日军成立大联盟的前景在我们自己的眼前烟消云散。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静悄悄地接受了约 400 名日军加入我们的军队。这些日本军人认为向英军投降是难以承受的耻辱，这和他们在军校接受的一切培训和所建立的信仰完全背道而驰。作为天生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对于将要成为白人俘虏的前景感到愤怒。也有一些宁愿选择了传统的日本切腹自杀，也不愿承受这种羞辱。那些加入我们的日本军人，显然已经准备好如何合理化他们的困境。他们认为和我们的游击队合作，并不代表他们加入了敌人。反之，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亚洲人之间的联盟，以共同对抗白人殖民侵略者。这个发展在英国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各州的地方上进行，但最后却将为我们带来可怕的后果。

在经过几乎半个世纪后重新看回这段历史，许多人也许会难以接受一个曾经在日据时期如此顽强抵抗日军的马共，在日本投降后的转霎间，却准备好接受敌人进入自己的军队成为战友。这个有违常理的转变，更因为我们的流动部队在日据时期尝试射杀任何与日军通敌的人的这一事实而加剧。考虑接纳战败的侵略敌人进入自己的队伍，这岂不是和考虑通敌同罪？

事实上，我们的游击队和日本军队成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在我们党内高层的干部之间已经辩论和分析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党内的感觉是真正的战争还在进行。我们争取马来亚独立的目标还很遥远。和重返的英军比较，我们现在只有大约 5 千人的游击队，在数量上相对的弱小。我们的分析是英国人最终必会对付我们这个曾经是他们战争中的盟友——而事实的演变也的确如此，然后重新实施他们在大战之前就已经用来对付我们的各种严刑峻法。先发制人所考虑的是战略上权宜之计的可行性。作战期间盟友之间的荣誉和道德是不在考虑之内的。同样的，这些观念也不曾阻止英国人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作出对付我们的决定。

但是我们的理由还不只是这些。裕仁天皇的无条件投降完全改变了整个局势。之前，日本是控制马来亚的当权者和敌人。他们杀我们。我们杀他们。他们战败后，不再是我们的威胁。如果他们要加入我们，他们就必须遵从我们的政治意志及接受我们的指挥。没有这些，也就没有联盟，我们在所有的谈判中都清楚的向他们说明这一点。

东京投降后紧接下来的数天内，局势的不可预测性越来越加剧，党发现它正面临一个越来越大的两难。如果我们的游击队和日本军合作的问题不尽早解决的话，马共极有可能分裂为二。如果这个情况出现的话，依我看来，赞同和日军合作的人将是人数超多的最大派系。但事实上所发生的是，莱特要我们解散军队的命令解决了此问题，而同志们毫不怀疑地绝对服从最高领袖的命令，确保了党的完整性。

为了保持客观，我们有必要看一看马来社会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所发生的事情。在整个日据时期都有马来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合作。日本人帮助马来人成立了三个基本的军事组织。第一个是兵补即辅助部队(Heiho)，成立于 1943 年 6 月，目的是为日本部队提供人力服务。在同一年年末，日本人协助成立了一个全部由马来人组成的自卫部队和后备军。义勇军（Giyu Gun）的成立是让它能够在英国进攻的时候进行海岸防卫作战。志愿后备队被称为义勇队（Giyu Tai）。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马来人实际上被接受进入日军，但不是在作战的部队内。马来人自卫部队和后备军团的队员都得到军事训练，同时武器配备良好。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像这样的马来人大约有 2 千名左右，却无处可去。

一直到裕仁天皇在 8 月 16 日的电台广播为止，日本统治当局都在向马来人承诺给予马来亚独立。有两个主要的建议被提了出来。马来亚自己独立或让马

来半岛在民族主义者苏加诺所领导的大印度尼西亚的概念底下独立。日本人曾在吉隆坡的火车站酒店召开会议以商谈及敲定此课题。被邀请出席与会的马来显要都是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包括了柔佛的拿督翁惹化。这个会议的参与者都强烈倾向加入印度尼西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威胁论流传说，如果马来亚参与印度尼西亚的计划遭到反对的话，日本将把马来亚交给中国成为其领土之一。事情的演变拯救了这一切。会议才刚刚开始，裕仁天皇作出了投降的宣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有的协议都化为乌有，与会者各自散去。

8 月 21 日，在柔佛北部的麻坡市，一队为数 280 人的马来义勇军从新加坡移往吉隆坡，和我们控制了这个地区的其中一支游击队接触。这些马来人相当明确地表明立场。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对抗英军，他们愿意加入我们。就因为这个课题而在党北柔佛委员会中触发了激烈的辩论。是幸抑或不幸，莱特的命令解决了此问题，而所预期成立的华、巫、日军事联盟，也因而夭折。当时的义勇军即将解散。他们其中的一些领袖，清楚了解到英国人必然把他们抓上战犯法庭，于是都决定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去。

那是非常混乱复杂的时期，许多由白人在 1960 及 1970 年代所撰写的书籍，在套上西方混淆黑白的精巧概念后，无可救药地过于简化了所发生的事件，而且显然是为了西方在此区域的利益辩护。

在日本投降后到英军在三个星期后抵达以成立军事管理的“政权真空”期所发生的所谓“种族冲突”，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些冲突在东京宣布投降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甚至很怀疑日本军官本身知道是他们的部队挑起了华人社群和马来社群之间的紧张情绪。

早在 7 月，两颗原子弹还未投下日本的时候，日本军人假扮成抗日军游击队，到柔佛的一间回教堂中屠杀一头猪。这个事件立刻燃起马来人的愤怒情绪，并把矛头指向当地的华人村民。

拿督翁在当时是日据当局峇株巴辖的县长。当时的事态已经从峇株巴辖蔓延到永平。马来人都以巴冷刀武装起来。成为报仇目标的华人村民手无寸铁，于是紧急向抗日军求援。我们无法忽视他们的危境，于是命令我军的一支部队前往担任防卫军。当时的英军联络官尝试阻止我们前往，他们不明了问题的根源，也不肯听我们的解释，我们并没有理他们。最后，所有的联络官在毫无选择的情况底下，只好和我们一起前去。我们设立了一条防卫线，禁止马来人越过此界限。这些深信有魔法护身、刀枪不入的马来人，还是往界限冲刺。我们

开枪，有些人倒地，其他的开始犹豫、退却。我们追逐他们到附近的马来村庄并逮捕了他们的组织领袖。同时，我们也展开搜索把可以找到的每一把巴冷刀没收起来。

这一起攻击峇株巴辖的事件，导致我们的军队逮捕了拿督翁及其助手。最后，拿督翁出面和马来人商谈，才化解了这次的冲突。那是充满激情的时期，没有人愿意冷静地聆听种族冲突如何开始的细节。这次的屠杀规模非常大，至少1千人死亡。自然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宣传为冲突的主要起因。这根本是不正确的。

在这时候所发生的许多其他的种族冲突事件，华人土匪才是背后的真正主谋。马共却也因为这些事件而背上黑锅。安顺和阿逸君令就是我们背上黑锅的地区。许多历史书籍——大多时候都在西方极端反共的时期所撰写，几乎无一不把游击队当成种族冲突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是涉及者之一，但是我们是为了保护无辜者。我们并没有挑拨和煽动情绪。我读过许多这些事件的记载，大多数的作者根本不在事发现场，也对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毫无头绪。在所有我阅读过的资料，只有一份由名为阿历山大的英国联络官所撰写而目前存于伦敦克佑区档案局的报告，反映了我认为是对当时动乱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报导。

当谈到马来部队非常亲日本的时候，西方人无不再次困在把事情过于简化的陷阱里。当我们以共产党游击队的身份与英国人合作，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刻，认为自己是亲英的人。我们的确是盟友，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议程。同样的，随着日军的投降，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呈现在我们眼前。每次谈到马来人和英国人及日本人在大战期间的关系，我都认为他们和我们处于同样的处境。

* * * * *

就在这紧要关头，确保马共上下服从命令，在政策上大转弯，舍弃更多人所支持的继续战斗的责任，降落在我身上，而我当时没有任何一刻质疑莱特指示背后的动机及智慧。我一直以来以为这些指示都来自一个尚有效运作的中央委员会。

即使在谋求联合投降后的日军以对抗英军的这个个别课题上，我最终也合理

化莱特的理由。他坚持，党在马来亚的影响力只是在华人社群较强。相对的，在马来社群中是薄弱的。他把这个问题形容为“不平衡”。他说，如果我们选择继续战斗的话，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有华人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得到许多乡区马来人的支持。我们当时已经在霹雳开始召募及培训马来人，但是日本的投降扰乱了这个计划。

把莱特指示的详细情况转告霹雳及吉打的各委员会的任务，落在我的身上。更大的问题是吉打的同志对1944年10月在双文丹的指示毫不知情，因此完全没有成立秘密队。因此，他们的游击部队都还在和英军及其联络官紧密合作。当我向吉打的党领袖解释新指示的含义时，他们立刻采取行动。但其结果是只有一半的公开队根据要求公开解散。

大约有300－400名游击队员突然失踪了。最后，吉打州委员会安排让失踪的游击队员把武器藏起来，再把他们解散。在霹雳及吉打，只有少数的地方挂上了我们的政治及军事组织更换名字的告示牌。我们的旗子也换了。在9月的首数天，我完成了把党处于继续备战的情况翻转过来的任务。我必须保持冷静克己地安抚、说服战友。我身心极度疲累。然而，凭坚定的感觉印象，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不会立刻和英军展开武装斗争，但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未来的五年至十年中做出此行动。

也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中，我回到了吉隆坡。刘尧，我们新委任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已经在首都办事。他是和戴维斯及他的联络官道格拉斯布罗德赫斯特（Douglas Broadhurst）陆军中校一起到的。布罗德赫斯特是以降落伞降落在雪兰莪，准备和我们的第一独立队配合的。（1946年，布罗德赫斯特被委任为新加坡政治部的头子）东南亚司令部已经征用了靠近最高专员官邸附近环境优美的肯尼山的数间独立式洋房。其中一间是给予马共的高级领袖。我和刘尧一起搬进去了。我们两个都获得车辆，我们从游击队中找同志来当司机。

就在我搬进不久之后，戴维斯来到洋房邀请我到摩立观看英军部队从雪兰莪的西南部海岸的登陆。这些部队原本是反攻马来亚的军队的其中一部份，他们从科伦坡出发还在海上航行的途中，日本却宣布投降了。与其停止他们的行动，英军继续根据计划登陆，但把它搞成一项庞大的宣传活动。第一支重新占领的部队是于9月3日在槟城岛滩头登陆的。

数天后，戴维斯和我沉默地肩并肩站在摩立海滩观赏了一个戏剧性，但毫无疑问是个反高潮的转变场景。在当时的某些时刻，我心中必然在想：我们就

这样轻易的让他们毫无阻拦地占领回他们长期蹂躏的这个区域？这个情绪，自那天杨果在双溪毛糯把莱特的指示交给我之后，就一直在我心中盘旋不去。在摩立，我根本没有注意发生在我四周的事情。我听到许多祝贺的话语。赞美和欢欣的情绪在交融。一脸倦容而年长的人们都在欢呼战争结束是多美好的--件事情。

而戴维斯脑海中又在想些什么东西呢？

现在被解密的文件显示，就在日本投降的数小时后，东南亚司令部通过无线电发送了两则电报给他。其中一个的部份内容⑥是：

“我们已经胜利，您的贡献无比重要，我们非常感谢。”

第二则指示戴维斯：

“联军的部队将在短时间内到达，在这段时间内，为了避免冲突及不必要的流血事件，您和您属下的成员都应该避开日军还在的城市和县区。”

我想戴维斯一定很生气。8 月 19 日，他回复⑦说：

“您最近的电报非常让人不安。以下的情况我想你再了解不过。受控制的抗日同盟军的军人归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SACSEA）所管辖，他们在期望及等待清楚的命令，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指示。我很满意他们会服从指示，如果这些指示是合理的话。但是命令他们在深山中半饥饿的情况下等待联军慢条斯理地从日本手中接手管理权，是不合理的。如何让抗日同盟军在过渡期间从山中出来，是有必要和日方做出妥善安排的，而他们也不会插手日方的行政。抗日同盟军必须分享到对等的胜利荣誉。被控制的抗日同盟军现在必须仅限于那些由我们武装及肯接受我们指挥的人。他们必须得到充分的武装配备、补给品，并在最快的时间内由我们使用一直到解散为止。良好的对待所控制的抗日同盟军，将对不受控制的抗日同盟军产生良好的效果，并可以于较后把他们吸纳进来。请尽力维持及加强中央控制权，不然的话纪律将分崩离析，而其可能的结果是，用数十年都可能无法铲除的动乱和无政府状况的出现。这件事情非常紧要。祸害巨大的反高潮是目前最大的风险。”

千里以外的伦敦，特别行动执行部的谢里登（L. F. Sheridan）上校把戴维斯的电报，附加一份阐明“高度机密”的信件传给甄特（G. E. J. Gent），他是当时伦敦殖民部的高级官员，后来出任大战后英国第一任驻马来亚的钦差大臣⑧。志期 1945 年 8 月 27 日，谢里登的信件说：

致甄特，

随函附上来自马来亚 136 部队高级代表的电报一封，以作为您个人的参考。

我不想让您以为我们过分看重戴维斯的观点。他在该国家居住了好一段时间，而且无疑的，是在极糟糕的气候及困难的情况之下，面临各种挫折。

我们对于类似个案的经验是，联络官在和抵抗运动相处一段长时间过后，会对他们的观点产生认同。

无论如何，他的电报值得注意，因为我想它也同时显示了抗日同盟军领袖们的想法。

真诚的，

谢里登上校

对于伦敦来说，戴维斯在热带森林待了太久，因此思想显然的已经本土化。谢里登的看法无疑是一种耻辱。他不屑的态度，包含了英国对它在马来亚进行重新殖民所必须面对的课题的无知。

甄特在 8 月 29 日回函说⑨：

多谢您志期 8 月 27 日的简函及戴维斯的电报。他的反应，无疑是忠实的反映了他过去长时期一起生活的圈子的想法，而且必须让那些处理新局势的人注意处理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我想那些不想沦落为土匪的抗日同盟军，一旦他们发现有机会赚钱及更舒适的就业条件，将会很快地自行解散并寻找正常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一组核心队伍，而处理他们时必须关怀和小心。

真诚的

甄特

如果当时我能够阅读到这些来往的信件，我也不会对它们的内容给予太多

的关注。所谓‘赚钱及更舒适的就业条件’，根本就不在我的思考之中。现在我才开始认识到这些无知的英国人，即使是从地球另一边的奢华办公室讨论亚洲的时候，也是何等的自以为是。谢里登的自命不凡以及甄特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语气只不过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个。

这时候，我脑海中充满了许多东西。再过几天，我将乘搭火车到新加坡和莱特面谈，因为他要重新组织党的政治结构以应付不断急速改变的局势。

* * * * *

我在实利基（Selegie）路，靠近竹脚医院（Hospital Kandang Kerbau）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办公室过了一夜。当时这个新加坡总部拥有几个分队，是我们在日本投降后从柔佛派来维持公共秩序的。这两支分队在 9 月 10 日于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所举行的群众大会中获得高度的荣誉。当时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穿起他们的三星军装及军帽，立刻成为了热烈欢迎的群众的焦点。

原来莱特正在策划成立一个五人临时中央委员会。他在会议上，在没有反对的声音中通过了他的议程。莱特继续维持党领袖及临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其他的成员是来自东彭亨、脱离很久但仍然生存下来的资深中央委员会成员阿仲、雪兰莪州书记杨果、南柔佛书记陈勇和我自己。

我从来没想过担任如此高荣誉的职位。自从抗战开始，尽管我在党内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担当起领导的角色。我完全没有这样的雄心。大战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到 21 岁。在我少年的时候，我所梦想的是到中国参加国民党军队，也准备好壮烈捐躯。我知道要从刚毕业的年轻军官爬到排长的地位，其淘汰率是 90%。过后，当我被共产主义所影响，我计划去中国参加毛泽东的游击战。同样的情怀仍然存在。但并不是要成为一个雄心壮志的职业军人，我只是准备为一个我未曾到过的祖国捐躯。

我非常信服于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而且相信这是唯一让中国可以击败日本侵略者的办法。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游击抗战。中国在短期里根本没有可能有胜利的希望。过后战局改变了。当时还在攻打中国的日本，侵略了马来亚。日本投降后，轮到了英国人。如果我准备为中国捐躯，为什么我不能为马来亚捐躯？同时，共产主义的教义告诉我，我是在参与一个国际性的斗争。

英国人在 9 月 5 日开始重新占领新加坡，当天下午一队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在苏塞克斯号战舰及克娄巴特拉号战舰的保护之下进入该岛的水域。这个舰队曾因为马六甲海峡的日本水雷清除工作而被延误了二到三天的时间。当从印度第 15 兵团抽出并由陆军中将菲利普克里斯蒂森爵士（Sir Philip Christison）所统帅的第一支部队登陆，英国宣布成立管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临时政府，称为英国军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

我们被邀请派出三个党代表进入英国军政府的顾问委员会，此举明显是为了安抚马共的举动。于是，我们从新加坡、雪兰莪及霹雳的委员会各派来一名代表。这并不是英国军政府的什么宽宏大量，它只表示，我们在 64 个代表中只有三个声音。

同时，大战以前就存在的《社团法令》及《驱逐法令》（Society and Banishment Ordinances），并没有被废除，英国人对于它是否会被使用以威胁马共的活动，也没有表示清楚的立场。其结果显示英国军政府意图把我们排挤于政治之外，使到我们的半合法 / 半非法的地位，可以轻易为他们所操纵与控制。

“杨果为我在吉隆坡寻找住处。我和坤华于是搬进了在吉隆坡安邦路的一间独立式洋房，这里成为我们婚后的第一个住家。我们在那里生活了超过两年。杨果也住在同一条路但离开我们不远的房子。”

第九章
全国翻滚的怒火

1945 年的 9 月尾，我回到了霹雳处理数项治安问题，这与英国军政府在首数个星期内让人难以置信的无能表现有关。它的高级官员，根本在政治上缺乏训练，对于一个政府应该如何运作完全缺乏概念。

英国的民事事务局的第一项措施是宣布日据时期所使用的货币无效。这个非常不成熟及严厉的步骤暴露了他们对财政管理的无知。它立刻使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陷入困境。他们在过去三年半来所积存的仅有储蓄，都是日本钞。当英国军政府的错误一宗接一宗的接踵而来，食物的供应下降、价格却暴涨。犯罪率急剧上升，治安措施举步维艰，贪污活动却猖獗横行。毫无意外的，人民对卷土重来的殖民当局越来越不满。不久之后，马来亚陷入滚滚沸腾的民愤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缓和冲击及确保公共秩序，马共在半岛的所有州属鼓励成立人民委员会、工人、妇女及青年的工会、妇联和青联及其他社团。这些组织大多数都由党控制或影响。在当时英国人刚夺回来的殖民领地内，马共是唯一还在运作并受到承认的一股政治力量。

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实际与革命无关，但那是十分合理的。人民要米粮，因为他们面对饥饿。他们要求工作，因为他们家徒四壁。他们强烈反对英国军政府不合理限制食物供应的暴政。在没有了收入、工作及食物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在战后的三个月内，获得政府的援助提供免费的食水及电流供应。他们希望过后能够自力更生。最后，他们要求英国军政府协助把树胶及锡米的价格稳定于合理水平，以支持这两项对劳工市场非常重要的工业。

在莱特于双溪毛糯发出指示之后，我们已经转向接纳英国军政府，并由此寻

求政治发展的方向。由于日本投降后英国人承认马共，我们都期望党现在可以获得合法地位。对应于我们的乐观，党的支部办事处便在半岛各大城镇公开成立。同时，我们也以为，可以通过我们的人民委员会和有关当局合作，成为赈济人民的管道。这个行动的背后是，期望人民委员会最终将会有机会扮演其政治角色。

在这个时候，我非常关注政府如何控制整个食物进口的机制。英国军政府昏庸无能，它根本无能力，也不能有效率的控制由它自己的决策所衍生的贪污泛滥。它有许多官员直接涉及这些贪污。我知道英国军政府所给予的食物分配准证，都垄断在数家公司手中。英国当局把食米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归罪于战后世界性的食物短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黑市却能够拥有充足的货源？其实你只要有钱并愿意付出高价即可。战前恶名昭彰的黑市网络，已经重新完整地建立起来。我完全同意当时亲马共的报章《新民主》在当时所作出的观察：

"如果人民的日常用品都要由政府来进口，并由批发商来分销给人民，已经一贫如洗的老百姓势必面对更艰难的困境，因为他们始终无法逃出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掌控中。"

卷土重来的英国人只有一个政治目的，那就是重组及重整其过去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至于和任何本土政治力量，尤其是和马共分享权力的想法，大概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党内温和派希望殖民者会被说服以让马共扮演辅助的角色，根本是误导性的。

当公众对英国军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的时候，我再次被莱特召见。这次我被紧急要求到新加坡出席莱特所提出的五人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会议。这个委员会的原本目的是个应急的措施以密切关注及回应当前局势的演变，一直到一个永久性的领导架构被组织起来为止。我的老朋友，廖伟中（Itu）司令，也被通知出席这个会议。

从美罗到新加坡的路程，我们分配到一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从日本高级军队司令那儿充公回来的豪华房车。车头盖配上非常引人注目的军官标志。Itu 司令显然决定利用这黄金机会以宣扬他所献身的事业。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拿出了一面大红的三星旗和木制旗杆。他利用铁丝把我们的军旗绑紧在车头，包括那个为之失色的军官标志。Itu 司令是个鲜少出外跑动的人。但是他是个勇

敢、有担当的人。在日据时期，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悍的游击队的威望。简而言之，Itu 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

我们在大清早的热带晨雾中启程前往参加战后第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会议，红旗在车前迎风飘扬。我们打从心底希望该会议将会是讨论如何在未来把刚回到马来亚岸上四个星期的英军驱逐出国土。在我们的车后紧随着一辆载满了精良武器配备的警卫队的车子。

坦白说，我对 Itu 如此大肆炫耀其对党的忠诚感到无比难为情，然而我也谨慎地保留了我的看法。从美罗到吉隆坡，我们一路从霹雳南部的橡胶园驶入雪兰莪北部的自然森林山区，途经无数个由日军把守的路障。敌军有一些部队还未完成投降的安排，而被用来执行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幸运的是，我们从这些路障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惊愕的注目。没有任何人举起武器。在我们所经过的数个小镇，当地人还给予了我们掌声和欢呼。

我们在吉隆坡过夜，而我们的车队也在这里加入了第三辆同样要开到新加坡出席会议的车子。这部车子，跟在我们警卫队车子的后面，载了来自彭亨的资深党员阿仲、雪兰莪州书记杨果和他的部队司令刘尧。

大红旗仍然在我们的车头前迎风狂舞，我们沿着主要公路南下新加坡。一路上平安无事，一直到我们抵达士乃附近、大约离开新山还有十五英里的地点。在这里，把持路障的其中一名日军守卫举起了武器并命令我们的车子停下。原来这里的日军司令和我们在这里活动的游击部队有着很深的交恶。我们的警卫队立刻从车子跳出来，他们手上的机关枪、手枪和手榴弹已经准备好开火。Itu 以客家话强烈的反对停下来的命令，而那名日军立刻获得他武器配备良好的其他部队成员的支援以日语高声辱骂回应。双方都不明白对方在说些什么东西，大家都向对方手中的武器做了一轮担心的巡视。

所幸的是，大家的理智很快就恢复过来。我们同意把红旗拿下以换取过路权。当我们的三辆汽车驶上新山衔接新加坡的长堤的时候，我和 Itu 静默地坐在第一辆车的后厢。Itu 把他心爱的红旗放在大腿上折叠，我很肯定，他心中大概还满腔怒火。至于我，心中无疑是松了一口气，因为避免了车子仍然插着大红旗一路张扬驶进新加坡繁忙市区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位于实利基路总部的尴尬。

那晚，新加坡的街上很安静。一路上，可以看到英军，以及我们以新山为基地的游击队。我们在实利基路的办事处过了一夜，这个建筑物在战前是基督

教青年运动协会的支部。日军把它转成警察局。第二天，我们安排在芽笼的秘密屋中和莱特见面。

该会议事后证明是相当扫兴，尤其是在我们前两天兴致勃勃的南下路途之后。莱特集中处理正式成立临时委员会的事务，同时自己同样出任党领袖。没有新的或有创见的政策被提出来。总书记显然满意于他在双溪毛糯所提出的八点纲领被接纳成为党的纲领。

作为一个新任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辞去我的州委书记的职位以集中处理党中央的事务，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而每一天情况似乎都变得更加混乱。本地和区域所发生的事件交错导致了经济、社会及政治紧张的日益提升。把霹雳的事务顺利移交给爱克之后，我重新回到吉隆坡的独立式洋房。

在十二月之前，我们的军队必须解散，这对所有期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能够被编入国防军的党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失望。这是个极其微妙的过程。我们的部队在半岛从南到北举行阅兵式，在公众的欢呼中完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武装部队的解散。这当然是我们的公开部队，依照条规，及履行把所有的武器交给有关当局的任务。

在这所有的典礼中，英国军政府的高级军官都在现场盛赞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功绩。另一方面，我们的‘秘密’部队却悄悄地溶入了群众之中。这些游击队队员，也缴了械，只不过这次是缴交了给党。大约有 4 千支枪支必须正式交给英国人。至于另外的大约 5 千支枪，被收进了我们在森林内的埋藏处。

如果说人民普遍的在九月的时候已经觉得英国的军事管理当局表现乏善可陈，那么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内，其表现可说是极端恶劣。1945 年的十月，是马共的转捩点。当时的英国军政府不断公开否认马来亚及新加坡正陷入通货膨胀的危机。然而街上每一个人都因物价比战前暴升数倍而生活陷入困境。当局只批准增加薪金最高 33.5%的决定，引起广大的民愤。很快地，就爆发了新加坡战后的第一次码头罢工。于 10 月 21 日，丹绒巴葛（Tanjong Pagar）码头的大约 7 千名工人拒绝上船工作。当时涉及了两个主要课题，要求加薪以及抗议船只运载武器给荷兰军队以镇压邻近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民族运动。

英国军政府的回应是把日本战俘及一些英军部队带进码头以取代罢工的工人。两天后，工潮使到新加坡的主要巴士经营者，新加坡电车公司（Singapore Traction Company）停止服务。工人要求加薪 40%及享有年终花红。英国军政府

这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团体照是在 1945 年 9 月拍摄的。那是在我们的军队奉命解散之前三个月。

（前排左起）霹雳州第 5 团指挥官烈阳。他参加紧急状态的战斗，但很早就在吉兰丹牺牲。刘子忠，日本占领时期的连队指挥官。他在紧急状态之前离开马共。不过，英国当局后来还是逮捕他，把他驱逐到中国。

（后排左起）白丝木，吉打州第 8 团指挥官，在紧急状态期间，他在吉打领导第 8 独立分队。黄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连队指挥官，他在紧急状态之前退党。他后来也被英国当局逮捕。李东林，化名扬林，霹雳第 5 团总部成员，也是 Itu 上校的助理。他战前在上海德国人办的大学念书。独立之后，他接受政府的大赦，被遣送到中国，与妻子及儿女团聚。

我们“公开”军队的单位，在 1945 年 12 月尽责的遵守解散的命令。

再次把其军队调入以提供巴士服务。虽然这两次的事件，英军都成功地破坏罢工行动，但它们对改善英国军政府的形象，却一点帮助都没有。英国军政府的官员都感到吃惊。

10 月 25 日，超过 2 万工人挤进了岛上的快乐世界（Happy World）娱乐园，出席新加坡总工会（Singapore General Labour Union,SGLU）的成立典礼。新加坡总工会宣称它代表总共约 20 万工人，会议宣布了对码头工人的支持以及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及印度支那（Indo China）独立运动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主办当局并没有邀请英国军政府派代表与会。

越过长堤，在马来亚这一边，动乱的威胁更加日益明显。人民进行了反饥饿游行。妇女展开群众示威要求供给粮米以及政府拨出 20 元以救济他们的家庭免于饥饿。锡矿和园丘工人也上街要求工作、有工作的则要求更高的薪金。参与游行和示威的人数剧增得非常惊人。全半岛内的许多城市，随时都可能出现数千人在愤怒的游行集会。

在恐惧及羞愧之余，英国军政府现在明白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它的权威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些示威者中所提出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考虑到本地人民在英国于 1942 年被日本打败后所遭受的困苦与灾难，争取生存根本就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英军当局原本可以轻而易举的安抚这些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只要它的官员集中精神处理人民的投诉，然而它却专注于粗暴的群众控制措施。

西方历史学家在撰写紧急状态的故事时，时常都以 1948 年 6 月三个英国种植者在和丰被杀死的事件开始，似乎暴力是从那一刻开始的。这无疑是个方便的开始，但就历史而言，是不正确的。

屠杀是在 1945 年 10 月 21 日开始的，当时英军被召来镇压、驱散在霹雳和丰、怡保及华都牙也所展开的上万人的大型示威。在和丰及怡保，英军被命令直接向群众开枪。十名示威者在和丰被射杀，而在怡保则有三人被杀死。在华都牙也，群众的情绪高涨，使到英国人的民事官员遭大约 500 名的愤怒群众围困在法庭。英军被命令前去解救他。

即使是华人社会的重要领袖陈嘉庚，也对英军的滥杀无辜而震惊。他严厉谴责了英国军政府对和平和不带武器的示威者所进行的镇压暴行。他相当正确

地指出当局只需使用催泪弹就能够控制群众。无疑的，这场屠杀的背后还涉及了种族歧视的因素。

这些向群众瞄准的军人、他们的司令官以及最终要负责的英国军政府，相信他们自己是优秀的，而把亚洲人的生命视如草芥。如果在英国，例如约克郡或康华尔有白人示威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英军被召来向没有武器的群众开枪，这必然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们却可以在遥远的马来亚对亚洲人采取如此的行动，甚至认为这些策略不只是可以被接受，而且是必须的，充分显示了这些卷土重来的殖民者的思想意识。

在那个充满动乱的月份内，英国军政府除了命令向群众开枪之外，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的镇压措施，特别是针对马共。这似乎是他们展示权威和力量的行动。同情我们的左派刊物被关闭，一些员工甚至被逮捕及以煽动罪被提控。这些被逼关闭的报纸包括了怡保的《时代日报》、太平的《北马导报》。两份在怡保出版的英文报—《北马来亚新闻》及《时代》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如果要我挑出一个事件使到马来亚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游击抗战的道路，那就是 10 月 12 日皇家空军警察对雪兰莪资深共产党党员宋光的逮捕。宋光曾经在怡保为我工作，我对他非常了解。从他的逮捕，可以追踪数项最终使到这个殖民地进行暴力反叛的事件。宋光是个受到广泛尊重的马共人物，他拥有骄人的游击抗战记录。皇家空军警察的上头对宋光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英国军政府的批准，也不曾向它照会。

到底宋光有没有如所指控的企图向一名华裔日军走狗勒索 30 万元，是无关紧要的。该指控所指涉的事件，发生在英国军政府所设定的可以提控的最早日期 9 月 12 日的前两天。在这分界日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应该被视为作战时期的行动而不能予以提控。这也是党对此事件的基本立场。我们公开的表明立场。但是英国军政府却许可皇家空军警察上头的做法，坚持它无法插手该事件，只能由法庭来裁决。

宋光被指控于 9 月 4 日至 10 日之间，非法扣留一名华裔商人陈绍明（译音）。在这段时期，宋光被指控以死亡威胁，向该名商人勒索金钱。在被囚禁之下，该名陈姓商人写了一封承诺将付出 30 万元以换取其性命的同意书。在他被释放的时候，他付给了宋光总共价值 3 万 2 千元的现金、珠宝及其他贵重物。

马共公开的揭露陈姓商人是日本宪兵队所收买之人，并在日本军警的保护之下，搜刮了价值不菲的财产。更何况在这段时期维持公共秩序的马来亚人民

抗日军，有逮捕并惩罚陈姓商人及其他通敌者的职责。这些人刮取暴利的手法，使到许多人民受尽困苦。陈姓商人所受到的惩罚——周的囚禁及罚款，是相对的轻微的。

作为历史记录，我满意于宋光对陈姓商人的逮捕及向他索取金钱，一如他所被指控的。我同时也认为该惩罚太过轻易放走了陈姓商人。如果他因为在日据时期所进行的刮钱方法而被我们逮捕的话，我们早就把他给杀了。党所持的立场，即英国当局利用宋光的案件来展示其日益下降的权威，作出选择性的司法裁决，向明显支持共产党立场的广大群众作出杀鸡儆猴的警告。我相信这是合理的分析。使到整个事件更加糟糕的是，我们获得证据显示宋光成为逮捕的对象，是本地国民党为其利益而从旁挑拨的结果。

当宋光被逮捕的消息成为头条新闻三天后，示威在吉隆坡的中央草场展开。主要的抗议课题是英国军政府的恐吓及司法不公。英国军政府软弱无力的辩护完全被群众拒绝。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抗议集会、游行、罢工及小冲突，在全马来亚各地的城市发生。

宋光的极端不公审讯开始于 11 月 1 日，案件由一名英国军政府的官员及两名陪审员听审。两名陪审员裁决宋光无罪。英国军政府官员不同意，同时命令在不同的陪审团前进行重审。在这次的重审中，宋光再次被两名本地的陪审员裁决无罪，而英国军政府的法庭主席裁决宋光罪名成立。第三次的审讯再次召开，这次的陪审团全由英国人组成，理由是本地人太过害怕作出宋光罪名成立的决定。这一次，三名英国当局的官员一致认为宋光被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刑监禁 4 年。宋光在被带离法庭之前，把他的拖鞋丢向审判官，以作为他最后的控诉。宋光是由吉隆坡律师，杨世谋作为辩护律师。马共以为他是个进步的思想家以及同情我们的斗争而出钱聘请了他。我们显然错了。杨律师最后成为英方的大力支持者而被委为立法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奖赏。

另一个促成走向武装斗争的事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实兆远南部的甘文阁发生。当英国人还未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占领了该市的中华公会会堂以作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办事处。11 月间，当地的国民党组织要把我们驱逐出会堂并占据该会堂。他们获得英国军政府的支持而开始摊牌。国民党要求我们离开。马共不妥协。就如往常的事态演变一样，英军被召来进行唯一的任务——以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去。他们全副武装，其中一名英军士兵更把其莱福枪举起瞄准我们驻在那里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当地领袖。该游击队领袖举起

一枚手榴弹在头上挥动，警告该英军士兵如果他开枪的话，两人将同归于尽。在他还来不及拔除手榴弹的保险计之前，该士兵开了一枪把他打死。

我获得了此事件的报告，并把详情转呈给莱特。他命令我尝试安抚群众，向他们解释这只是个别的事件。我依照命令做了。即使是如此，霹雳州委员会的一、两个成员还是决定要进行报复并通知了我们秘密部队的游击小组。他们还未解散及收藏他们的武器。霹雳州内不同地方的两队英军，被投了手榴弹。我并没有花时间去调查这两项袭击，因为我完全同情那些寻求报复的人。这是在战后马来亚马共首个针对英军所发出的袭击事件。它是直接反击我们在甘文阁的游击队员被无辜杀害的行动。两项事件都没有被当地的报纸报导。有趣的是，当时和我有密切接触的戴维斯，完全没有提起这件事。英国人以为把这些资讯封锁就可以让事件慢慢被遗忘。他们错了。暴力事件随后开始增加，而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广大群众对英军当局的仇恨也越来越多。

在吉隆坡，我管理三个办事处的操作。一个是党的办事处，另一个是抗日军退伍人员的办事处，我们称之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第三个是抗日同盟。退伍同志会是莱特所发起的。我把他对此计划的热诚解释为他用以安抚党内基层对解散游击队、交出武器的不满的一个方法。我们没有了军队，但是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同志会。这是莱特的想法，同时明显的，也是英国人的观点。马共其他的领导层却有着不同的想法。我们认为退伍同志会有极大潜能延续我们的斗争。它可以是一个现成的工具以保持和前游击队员的重要联系，同时维持他们的战斗士气。退伍同志会的雪兰莪分部的办事处设在吉宁街（Klyne Street）的一栋三层楼的建筑物内，和福建会馆遥遥相对。我当时下定决心要让退伍同志会蓬勃发展。

1945 年末的最后数个月内，贫穷及食物短缺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日益加剧，对党的多项计划产生严重打击，而最悲剧性的，无疑是我们刚收编进来宁愿对抗英军而不肯投降的的日军志愿者。当马共不会再继续打仗的趋势越来越清楚之后，许多日军志愿者开始消失。他们不再回去他们的小组。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往北越过边界，以陆路取道暹罗、寮国及中国南部回归家园。大约有一两位被英军逮捕。很多大概都死在森林内，但是那些坚持者继续和我们在一起。

这一批人的军事技能及战斗意志，对我们的斗争无疑是有利的，但是他们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极困难的时候，有时也为我们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初我们

决定接受这些日军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已经拟出措施以掩护他们的身份。他们被分散安置在我们住在乡村的支持者中，希望他们看起来和华人相似的脸孔，能够逃过任何的检查。这些只是暂时的措施。当时机成熟时，这些日军将跟随我们进入森林。

在许多地方，这个不寻常的安排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日本人的数目一般上都很小，把他们混进我们的种族环境并支持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难的事。然而，瓜拉江沙的情况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这里被收编的日军志愿者特别多，约有 100 人左右。这个情形对霹雳州委员会形成一个大难题。即使当他们大部份人在了解到不再有战争而超过一半的人离去后，我们还是需要为约 20 至 30 名的日军安排在瓜拉江沙以掩护他们的身份。他们没有一人可以讲华语、马来语或英语。

明显的，我们也不能把他们交给英军当局，要不然我们将被牵连在这项动机可疑的事件之中。但是，我们也无法再继续支持这些外国人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我们的农民群众已经面临为家人寻找食物都困难的境地，更何况是额外的食物给这些不速之客。然后，又有要求要把这些日本人隔开，这将导致一些奇怪而尴尬的社区安排。

最后，霹雳州委书记爱克被逼直接向莱特请示。他解释说当地的共产党员面临窝藏日军被揭发的风险。莱特答应尽快对这个两难给予一个回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命令下来了：消灭瓜拉江沙的日本人。这无疑是一项糟透的决定。这些日本人已经向我们宣誓效忠。我们也接受了他们帮忙的献议及处理了掩护他们的工作。他们也很合作的跟我们的支持者住在一起。

爱克根据命令指示数个武装小组把日本人一次以两、三人一组的方式带出来，以避免引起怀疑。命令清楚地指示当这些日本人抵达练习场所时，他们将会被个别带到森林内处决。

必须记得的是，这时候的莱特一定已经和英国特务重新取得了联系，并如战前一样成为他们的间谍。我们所要收编的日军志愿者的屠杀，是发生在 1945 年底或 1946 年年初。当时，英国军政府已经控制了局势。

毫无疑问，在当时那么敏感及动乱的时期，莱特如果没有和他的英国人特务头子彻底的讨论过这件事情，他是不可能发出这样的指示的。

因为这样的做法，将产生许多严重的后遗症。我到现在仍然坚信英国军政

府的某一个官员对莱特处理日本人的手法给予了官方的许可。这无疑是在事态发展的重大压力下，干脆和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和丰及瓜拉江沙地区的英国人特务更是不可能没有接到有关日本人被集体屠杀的消息的。英国人对该事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在我看来，更加证实了英国人的同谋角色。

我对莱特命令的冷酷无情感到震惊。

就加入我们的其他日本人而言，在吉打有 20 人以及霹雳另有一个 10 人的小组。除此之外，在柔佛也有一小组人。在战后的最初时期，他们都被隔离掩护在乡村内。这些日本人因为人数极少，不形成负担而逃过了一劫。州委员会也没有必要向莱特请示处理方式。当紧急状态开始后，他们加入我们的游击队，再次成为战士，只是不再为他们的天皇而战，而是为共产主义而战。

在随后的数年，他们有些人阵亡。有一些不能承受生活的艰辛而向英军投降。那些被英军认定为和我们的游击队一起打仗的人，则成了英军大型心理战术的锁定对象。在这些个案中，他们在日本的妻子、姐妹、父母及朋友会被联络并被劝诱写信给他们要求他们投降及回到他们的家庭去。这些信件然后印刷成传单，并被散落在英军所认为的日本人游击队员活动的部份森林地带中。同样的，这些家庭成员及朋友，也在指示之下录制了个人的录音带。这些录音带作为心理战的信息，被带有扩音器的飞机低飞在森林上空大肆广播。这些传单、录音带以及讯息导致一些日本人向英国人投降。但是以它所花的费用以及所投进的努力，我相当肯定其结果是划不来的。和我们一起战斗的日本人，大多数人死于战斗中。

在整个紧急状态的时期中，只有两名和我们在一起的日本人存活了下来。桥本惠之（阿富，Hashimoto Shigeyuki）及田中清明（精德，Tanaka Kiyoaki）和我们一起退守到泰国南部，并在 1989 年，终于低调的回去日本。在日本，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战争英雄。他们俩都由家人照顾，并活到八、九十岁。现在他们俩都去世了。其中一人逃过了 1995 年神户大地震，但还是逃不过年老寿终的归宿。

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正式解散之后，我就和李坤华结婚。我们需要通知她当时居住在槟城丹绒道光的母亲。根据传统，我的岳母将会举行一个小型的婚宴宴请亲人及熟络的朋友。很不幸的是，我因为党务太忙而无法出席。我在怡保介绍坤华给我的母亲认识的时候，已经是婚后的一段时间了，因为那时恰好我和妻子路过怡保。母亲还特别为这个事情从实兆远上来。我的父亲，从来对

这些社交场合不感兴趣，所以并没有来。

杨果为我在吉隆坡寻找住处。我和坤华于是搬进了在吉隆坡安邦路的一间独立式洋房，这里成为我们婚后的第一个住家。我们在那里生活了超过两年。杨果也住在同一条路但离开我们不远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内有一座钢琴，是从一个日本人的家庭中充公来的。党把它放置在那里，虽然我抗议把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摆在我住家的不适当性。党还是推翻了我的抗议，坚持如果我要使到我的掩护身份——一个新发迹商人的身份有效的话，我必须看起来好像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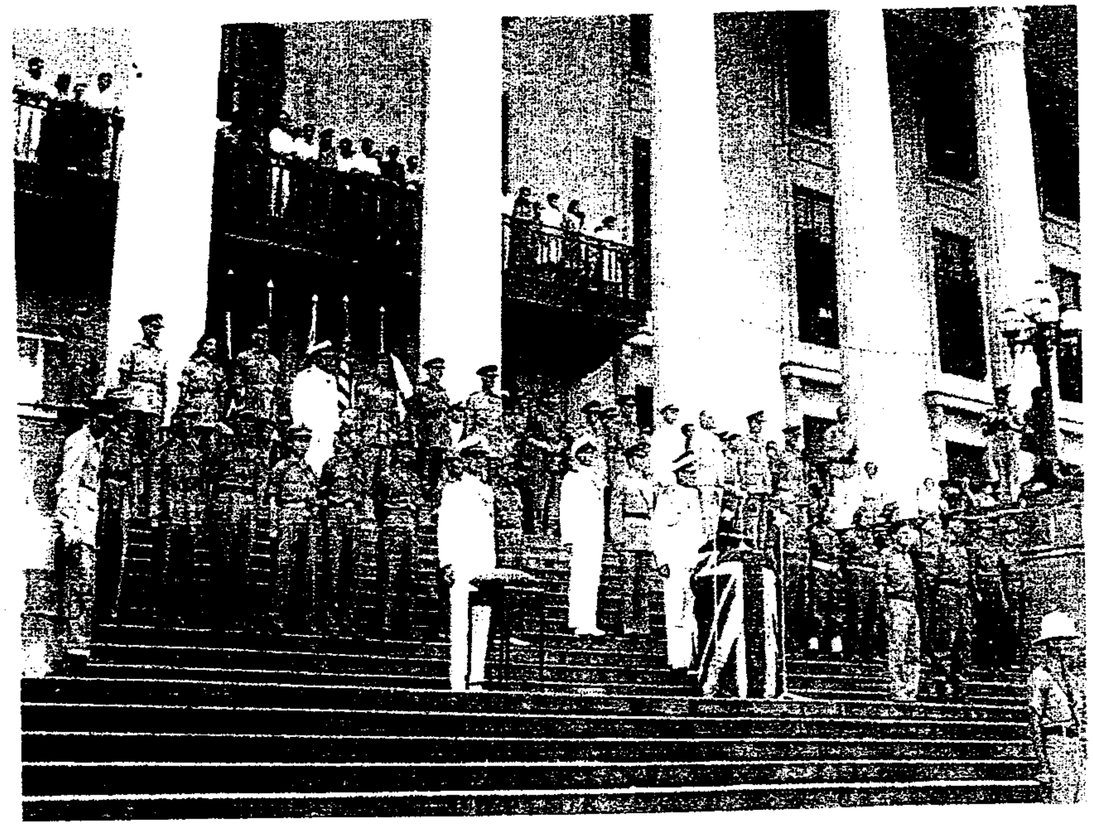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我们都得穿著军装出席在新加坡政府大厦（现在的总统府）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蒙巴顿也有到会。我们都发现，在他所佩戴的形形色色勋章之中，有一枚是蒋介石大元帅颁赠的特别勋章。他再次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每一位代表握手，并亲自——向大家道谢，这次更讲了几句特别为这个场合而学的华语。”

第十章：
获奖——一封道歉信——加速政治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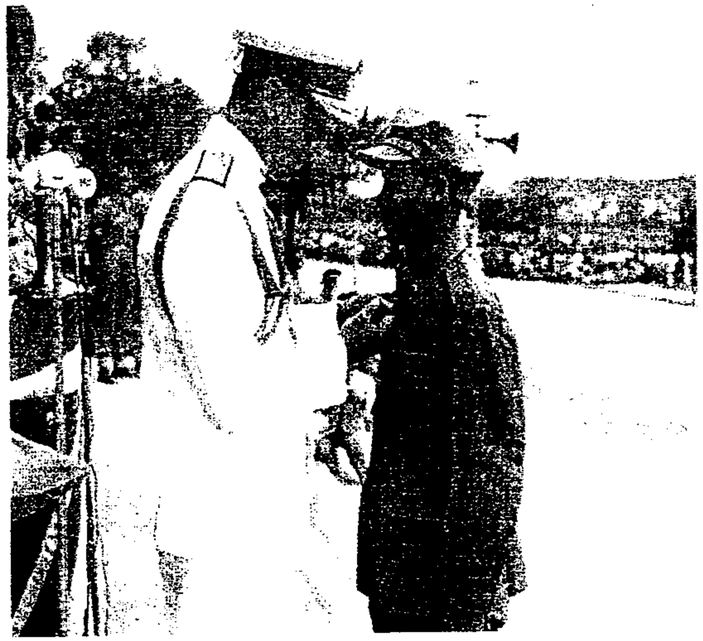
1946 年正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七名抗日军代表从吉隆坡南下新加坡，专程出席一项由英国海军上将，也即是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上将主持的颁赠勋章仪式。我们八人都会获得颁发两枚奖励我们对战争所作贡献的勋章—“缅甸星”勋章和“1939 / 45 星”勋章。

英国军政府安排我们住宿著名的莱佛士酒店的豪华客房。1 月 6 日，摩哆警卫队护航开道，我们乘车经过圣安德鲁教堂，到同路不远处的市政局大厦（现在的市政厅）。抵步时，皇家海军乐队已在奏乐。我们身著军人制服，被带到接连市政局大厦阶梯前草场上的座位就坐。通往市政大厦正门的阶梯上摆置著一个悬挂英国国旗的讲台。讲台旁安置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个垫枕，我们要领取的勋章就安放上面。

为什么？你或许会问，在日本投降将近五个月后，英国要如此不嫌麻烦，耗费钜款，大事铺张地公开奖励我们？毕竟，在 1945 年 9 月 12 日，我们的 16 位游击队员已参加了同是在这里举行的官方胜利庆典，而且被安排坐在显著的座位。尤有进者，有关方面邀请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个代表队参加 1946 年 6 月 8 日在伦敦举行的胜利检阅礼（Victory Parade）的安排事宜已经敲定。1 月 6 日的这种排场，是否是另一项宣传运动？这是否意在抑制我们，以期从中破坏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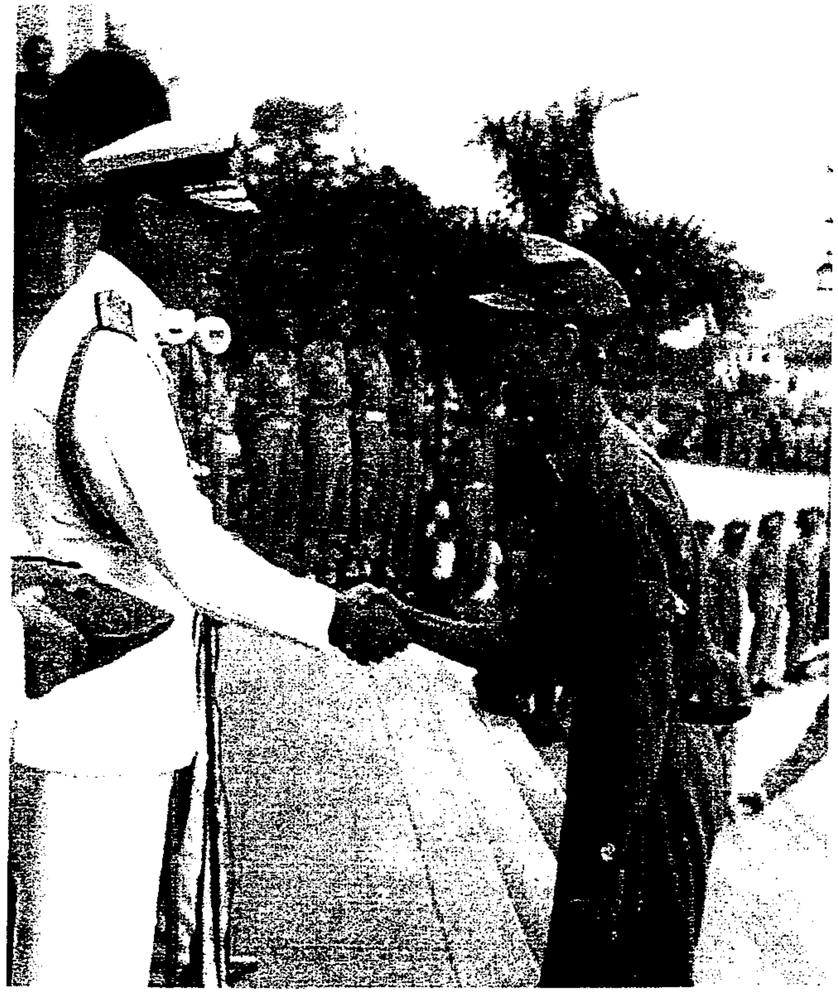


1946 年 1 月 6 日，我们接领东南亚最高盟军司令蒙巴顿统帅颁授予我们的战争勋章。地点是当时的新加坡市政局大厦（现在是市政厅）。照片显示我们的八人队伍是站在左边第八级的台阶上。左四是我。



蒙巴顿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刘尧别上两枚勋章。这位杰出的游击队司令是莱特在 1945 年临时宣布成立的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刘尧在紧急状态实施仅一个月后，即在加影附近的一场警方突袭行动中因警卫员背叛而被杀害。他的牺牲使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蒙受很大的挫折。

我接受勋章："缅甸星"和"1939 / 45 星"。



蒙巴顿向在日军占领时期在森美兰指挥我们的第二独立队的司令邓福隆祝贺。在紧急状态时期，邓福隆继续指挥森州的第二支队。这位勇敢的游击队领袖在50年代中期的一次行动中遇害身亡。

决定采取的反殖民地立场？如然，蒙巴顿海军上将和他的最高统帅部所接获的情报是太不准确了。

当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市政局大厅外等著领奖的还有两位中国国民党员，以及其他不同组织的三位马来人和一名星华义勇军（Dalforce）代表。他们也要领取与我们一样的勋章。这是展示英国愿意平等对待所有不同政治派系的一种指导思想不正确的姿态？或是英国要从种族方面纠正事物？解密文件如今揭露，是戴维斯在抗战一停止后，马上施压要求颁授勋章给马共分子。但是，英国却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相信戴维斯所提建议的价值。他出的主意最初并未广受欢迎。如果全马来亚的内乱没有升级的话，它多半会被束之高阁。一些人士必定认为一旦我们受到安抚，则事情就会好办。

蒙巴顿畅谈我们对盟军打倒日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贡献良多。在他赞赏有加的演讲结束后，他离开讲台，步下阶梯，并向我们走过来。他停下来与马共的每位游击队员谈话、握手，以及亲自感谢大家无畏无私，勇往直前。接著，这位统帅又重登台阶到摆放勋章的地方。我们逐一被请上台，而他——为我们别上勋章。我们每个人都行军礼向蒙巴顿致敬，这位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也回以一般的皇家海军敬礼。

当天晚上，我们都得穿著军装出席在新加坡政府大厦（现在的总统府）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蒙巴顿也有到会。我们都发现，在他所佩戴的形形色色勋章之中，有一枚是蒋介石大元帅颁赠的特别勋章。他再次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每一位代表握手，并亲自——向大家道谢，这次更讲了几句特别为这个场合而学的华语。会上，我混在许多英国陆、海将领中间，并与第14军前任司令迈尔斯登普西(Miles Dempsey)中将寒暄几句。这位中将来头不小，如果不是日本军投降的话，他便会率领英军长驱直入马来亚攻打日军。结果，登普西统领的是重新占领马来亚的英军，我曾看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摩立登陆。他现在是盟军东南亚陆军总司令（ALFSEA）。

在离开鸡尾酒会会场后回到莱佛士酒店，我们知悉英国军政府已安排我们在次日出席参与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节目。有关计划是要让马来亚共产党代表以及国民党和马来人代表参观新加坡岛上的英军基地。这项隆重的游览分明是另一项宣传活动。从马共角度来看，英国军政府的用意是要让我们知道，一旦我们选择挑战英军的战后重返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权利必然要面对的后果。访问行程也列明我们得参观三巴旺海军基地（Sembawang Naval Base）的皇家海军远东

总部、皇家空军的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 Base），以及亚历山大营房（Alexandra Barracks）的陆军总部。在每个中途停留地，有关基地司令，都会按英国一般接待贵宾的礼仪，著全套官饰礼服接待我们。

马共代表当晚商谈到深夜，结论是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对英国军政府对待宋光同志的方式表示不满。第二天清早，当戴维斯和官方护卫到来时，我们断然拒绝离开酒店房间。我向戴维斯解释杯葛游览活动的原因。我们的立场显然令他勃然大怒。他费尽唇舌游说我们改变初衷。根据我曾多次与他在我们的霹雳森林营地接触的经验，我可以感觉到他一直在努力抑制失望之情。

但是，我们决意不让步，并照会莱特我们的坚决意向，但只给他很短的时间通知，让他没有机会驳回这主意。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中国国民党和马来组织的代表则依照原定计划游览去了。

戴维斯并不甘罢休。回到吉隆坡，他很快就促成了一项与莱特、刘尧和我在我们的总部举行的会议。就戴维斯而言，这可是非常恰当的场合，因为马共的全体前军事委员会都集合在一间房内，他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它。他温和而扼要地发表开场白后，便以我们的游击队代表怠慢新加坡的英国三军司令为由，建议我们理应致函向他们道歉，而道歉信最好是直接致给蒙巴顿本人。

我对这非份的要求大吃一惊。更惊讶的是，戴维斯竟出示一封致给这位最高统帅的打好字信件，内容正是英国要我们讲的一切，这封只有一页长的信的下角空白处，则等著我们签署。我由惊愕转为愤怒。刘尧和我都望向坐在对面的莱特，等他发出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但是，这位马共最高领导人却坐著不动，一味地低著头，也不发一言。

依我的看法，英国是在下马威，要把我们当顽皮学生对待，这分明是在侮辱我们。我再望向莱特，他依然没有反应。刘尧和我别无选择，只得签名。我们勉强从命。我们的用意是通过杯葛方式表明党对英国在马来亚实施选择性执法及发出的威胁讯息等行动的极端不满。英国殖民地政府显然是被刺痛了，在这种情形下非要羞辱我们不肯罢休，才会闹出这侮辱性的道歉信事件。据我所知，这封信被英国列为高度机密，此后不曾公开地作出任何暗示，更甭说是作出公布。这是导致马共走向武装斗争之路的一连串事件中的另一起事件。

迫使我们在拟好的道歉信上签名，是戴维斯与我们进行的最后一项官方活动。不久后，他来与我们道别。他要回去伦敦，他说他要从军中复员回家，但

暗示有意以平民身份重返马来亚。

恼人的道歉信事件发生整整两周后，莱特召开他所谓的“第八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在吉隆坡举行，他邀请各州代表与会，每州委派多名高级干部到会；会议结果是选举 12 人中委会，再由它推选成立才四个月的临时组织的五位成员担任常务委员会委员，成为党的政治核心班子。这个五人组织后来成为政治局。不久后，马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活动区分成三部份。来自柔佛南部的陈勇负责南马区，管辖范围包括新加坡和柔佛州的两个地区——柔南和柔北。我们的中马区是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和雪兰莪——由杨果负责。我被委任管理北马区：霹雳、槟城和吉打。

在这项于正月举行的会议上，莱特向大家介绍党的新策略阵线，并称之为“马来亚民主统一阵线”（Malayan Democratic United Front）。它的主要角色是寻求与其他政党进行广泛的结盟。此外，它的宗旨是扩大我们的前线活动。这与马共在数周前支持成立两个政治组织，即马来国民党（MNP）和马来亚民主同盟（MDU）的行动密切配合。莱特也努力地安抚我们这些坚信“与英国和解及合作将令我们无立锥之地”的党员。

他建议我们应从两个方面来看待我们的斗争。我们可以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为榜样，它们的民族运动已分别对卷土重来的法国和荷兰殖民地政府发动武装起义。他说，这项选择的代价将是马上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或者是我们可以等。莱特承认英国军政府的镇压措施是越来越严重了。他辩称与其作正面的对抗，我们不如通过统一阵线方法来操纵政局，从而促成他所形容的“政治高潮”。

明显地觉察到整个党的情绪正因不断增加的示威死亡人数及其他许多镇压行动而不断高涨，莱特同意武装斗争是无可避免的。虽然如此，他认为这是个长期的目标，却不设定任何期限。

我对莱特的保留态度，始自之前八月政策方向的骤然改变，后来更因他对那封道歉信的认同而加强了。不过问题之真正困扰我，则是在吉隆坡的会议上。在一次与一位与会者私下交谈时，我知悉在莱特大力促成下刚刚被委任为中委的两名男子竟然已经不再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其中一位是一度担任森美兰州书记的罗须磨（化名），另一位则是他的副手阿山。

罗须磨和阿山两人都曾遭日军逮捕，并在严刑拷问下透露党的情报。他们较后在与日军达致充当日本特务的谅解下获释。（日本）宪兵队配给他们每人

一把手枪自卫。根据党处置被日军拷打的党员的政策，罗须磨和阿山最终被接受归党，但只当同情者而已。

莱特利用党组织的严密取向，得以操控中委的委任事宜。保安预防措施规定任何马共党员都不得查问超越他们直接职务事务的详情。州委员会也如此行事，从不过问其他各州组织内政。因此，没人曾听闻罗须磨和阿山与日本之间的瓜葛，以致这两个曾与敌人合作及本应被禁终生不能恢复党籍的人竟然被推举成为最高机密决策组织的成员。每一项委任都等同对保密原则的破坏，肯定熟知全体同志一切详情的总书记怎能如此恣意地无视党规的存在？罗须磨和阿山晋身中委，以及他们现在明显地对莱特感激不尽的事实，都教我深深关注。

"八扩"与我们发起在1月29日展开的24小时全殖民地大罢工的日子撞期。罢工是为了抗议宋光被定罪及其他霹雳州工会执委被判刑。在蒙巴顿当时办公所在的新加坡，我们估计有约20万名追随者响应我们的罢工号召。由于获得热烈的支持，英国军政府深信一旦我们登高一呼，有叫新加坡瘫痪的力量。蒙巴顿本身也承认马来亚共产党的办事效率，以及在新加坡岛的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马来亚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虽然如此，警方却以高压手段和巡逻方式强制一些人口集中区的商店开店做生意。

很出乎意外的是，在我们的大罢工行动展开五天后，英国军政府释放了被判监四年、还得服刑3年又9个月的宋光。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我们的1月29日大罢工行动所直接带来的结果。他们当然对道歉信一事毫不知情。我一直怀疑莱特与英国进行一项秘密交易。如果他成功地取得这道歉信，宋光肯定将会在第一个适当时机获释。宋光重获自由只属短暂。在紧急状态期间，他在共产党员罪名下再次被捕并驱逐往中国。他于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逝世。

在工人动荡不安的局势加剧之际，来了个不速之客—东南亚最重要的共产党人物泰共总书记李启新。在日本占领期间，他曾与我们联络。李启新当然就是两年前通过我的办事处写信给莱特的"老黑"，也是我们的总书记声称很熟悉的人物。在这趟到吉隆坡短暂停留的期间，与他同来的是另一位本区域的共产党名人阿里敏—印度尼西亚（印尼）共产党的三位著名前领袖之一。阿里敏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较后转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总部任职。

李启新和阿里敏一起从曼谷到来与马来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讨论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暹罗的共产党之间建立更强协调关系事宜。我负责安排他们与也在市内的莱特面晤。会议在刘尧的豪华洋楼进行。当我向他们作正式的介

绍时，非常明显地，李启新之前从未与莱特见过面。我默默地回想两年前在美罗时，莱特说过的令人迷惑的话……他如何如何地认识"老黑"这么久……还有老黑是多么的有才干。

接下来是介绍阿里敏，他是同时隶属于上海和莫斯科两地办事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东方执委。现在，非常明显地，阿里敏也与莱特素不相识。这时，我的好奇心又起。在莱特离开后，我忍不住追问两位客人是否曾与我们的领袖见过面，他们异口同声表明这是他们第一次有这荣幸。为甚麼我们的领袖要说谎？

一如在美罗的做法，我决定不把会令人分心的矛盾放在心上。或许此事已有一种解释，可能也没有答案。我再次把这个发现置之脑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紧要的党务上。

* * * * *

如果1月29日的组织严密而有力的罢工已使英国心烦意乱的话，他们也没有对杀伤力更大、将在2月15日爆发的第二场大罢工作好准备。所选的日子击中英国要害。它恰好是白思华向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的四周年纪念日。显然，这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者憎恨他们的疮疤在这失败纪念日被揭开一毕竟，这耻辱已筑成纪念碑一而他们，必定会对被迫记著他们放弃保护"新加坡堡垒"已经有多久而感到绝望。

英国官方记录说明蒙巴顿在2月9日会晤盟军东南亚陆军总司令登普西和东南亚司令部参谋长弗雷德里克布朗宁（Frederick Browning）爵士等人商议此事。他们对2月15日行动所实施的禁令，分明是因明显的意见分歧而绞尽脑汁想出的办法。结果一我对此完全不感意外一蒙巴顿必须保护英国利益，因而相信如果他们要继续牢牢控制马来亚和新加坡，那英国军政府便得从源头，即马来亚共产党和它的麻烦领袖著手。值得赞扬的是，蒙巴顿反对防范性的逮捕行动。他个人认为，把马共驱逐去中国对英国的殖民千秋大业并无帮助。他赞同伦敦方面的指示，即驱逐行动不应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政策。

无论如何，在罢工的前两天，这位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统帅被迫采取强硬的立场，发出禁止2月15日游行和群众大会的禁令。他恫言任何人若挑战有关当

局，将会被遣送出境。尤有进者，在蒙巴顿发表正式声明的数小时后－以及尽管他反对诉诸防范性的逮捕行动－英国军政府逮捕了 24 名被指涉及罢工阴谋的共产党员。

党的主要反英示威地点是勿拉士峇沙（Bras Basah）路的圣约瑟学院对面的草场，与我们的新加坡总部（当时已搬迁至奎因街，Queen Street）只有一箭之遥。群众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唤醒公众关注领土自主的需要。如果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和领土的话，便得抱持自己争取的立场。这意味著我们必须战斗及寻求自治。我们须提醒民众我们在国家被占领的多个年头里，即使面对一些难题，我们是如何自己进行管治，而今，在和平年代里，我们将能管理得更好。

要如期展开示威行动的决定并没有获得马来亚共产党新加坡市委员会，也即是唯一发起组织的委员们的一致支持。新加坡办事处主任伍天旺大力反对挑战蒙巴顿命令之主意。在一项筹备会议上，他力争说一旦罔顾禁令的存在，党将会招惹不必要的对抗和流血事件。党内随之出现意见不一致现象。伍天旺退出，而他的副手林亚亮承担他在党组织的责任。

抗议行动如期展开。我一直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在莱特批准下进行，仅知道英国召来陆军，而军队又再次向人民开火。这回，他们杀害两人，致伤 19 人。英国事后很久才辩称人民持械－瓶子和铁棍－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海峡时报》翌日或其后对这起事件或伤亡人数都只字不提。

半岛民众对我们所号召的 2 月 15 日罢工行动反应尤其振奋人心。在柔佛州昔加末南部 20 英里的拉美士（Labis），大批群众踊跃到场聆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前会员王坤山（译音）和张瑞（译音）的演讲。再一次，英军被传召来驱散出席群众大会的人，并向群众开火，有 15 人被枪杀。三个月后，承审王和张案件的推事韦布（J.U. Webb）判决他们各监禁六个月兼罚款 200 元。韦布在下判时发表惊人言论："发生了丧失人命的事实必须受到考量。"不知就里的人看了这一评语会以为是王与张向人群开枪呢！数天后，又有五人死亡。这回是发生在丰盛港（Mersing），军队被指示枪击示威抗议拉美士屠杀事件的人群。用水喉已足以驱散参加槟城 2 月 15 日群众大会的人群而未酿成死亡事件的事实，显然并未对英国军政府起任何警戒作用。

当英国军政府决意以武力增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权力之际，在伦敦的政治家们却在热心地推行一项没有希望的计划。他们无知地相信，只要在马新实施政治改革就能万事大吉。他们提出这项所谓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之计－马

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建议。英国殖民部大臣乔治霍尔（George Hall）于 1945 年 10 月 11 日在英国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国会首次宣布这项措施。

联邦的构思是把马来半岛的九个州属与两个海峡殖民地，马六甲和槟城组成一个实体。至于作为贸易中心的新加坡，则保持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显然，在英国蓄意把新加坡与马来亚分开的背后，新加坡的经济潜能和其作为军事基地的战略性重要位置是主要的考量，如此一来，发号施令就更容易了。英国宣布："吾皇陛下的政府深知新加坡与半岛大陆有许多联系，而这些联系可以对最终统一发挥作用。不过，这将是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政府到时所要考虑的问题。"

殖民部自 1944 年初即开始构思马来亚联邦的建议，并对发出公民权给各种族持更开明态度。全面评估这项计划的蒙巴顿从早在是年 7 月便开始敦促殖民部公布有关的详情。他认为对与其属下进行合作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来说，这将会鼓舞人心。政界人士反对这项计划。蒙巴顿在致予殖民部大臣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的信中指出："想来，在过去，当我们准备占领他们的领土时，并未发现有殖民地人民挺身而出为我们而斗争，对我们来说，在我们被指责为了要再统治殖民地人民而再次征服他们之际，他们今日的这种做法是一个可以向世界、尤其是美国广为宣传的大好机会。"

马来亚联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各马来苏丹必须同意让英国人改写部分与他们有关的宪法，而这涉及重新谈判他们个别与英国订立的条约。苏丹们激烈反对，不只针对新的变更，也针对英国代表哈罗德麦克迈克尔（Harold MacMichael）爵士的高压手段。麦克迈克尔到马来亚，以为可以用尽各种明示和暗示的手段强硬地威胁苏丹。苏丹的不满之言一经公开后，马来人群起支持他们的统治者。在拿督翁惹化领导下，他们开始成立后来命名为马来人全国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的由 41 个马来人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英国绝无法预见这种马来人团结的效果。

马来亚共产党也强烈反对马来亚联邦的构思。我们尤其攻击它们所提出的公民权建议。它们对华裔限制多多。我们反对成立立法和行政议会的条文。我们向报界发表声明，宣布这些议会将受到英国政府全面监督和控制，而它们也将不会有丝毫的民主色彩。我们也表明："我们认为，马来亚的政治框架应建构在全面遵守大西洋宪章及联合国宪章上。"

一片反联邦之声阻挡不了英国顽固地执行它要以马来亚联邦的非军事机构来

取代英国军政府，而新加坡则继续保持殖民地地位的计划。1946 年 4 月 1 日，英国前首相拉姆齐麦唐纳（Ramsey MacDonald）的儿子马尔科姆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到来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督，并兼任兼管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的大总督。

在吉隆坡，刚受封为爵士的甄特在半空置的立法议会上出任马来亚联邦总督。巫统杯葛全面撤换的行政当局，而众苏丹则抵制总督的就职仪式。巫统的杯葛行动一直持续到马来亚联邦于 1948 年 2 月 1 日解散，并由马来亚联合邦(Malayan Federation）取代为止。

* * * * *

一连串的工人罢工行动在 1946 年展开。当然，一切的罢工行动都是由党的各州委员会、而非中央委员会所发起。中委会从来都不处理这类活动。与英国军政府的指责恰好相反，我们并不一味地到处制造麻烦。我们所做的每样事都专注于迎合工人阶级的已经存在的和真正需求。是工人们为了改变命运，鼓动采取行动。他们正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困境中。各州委员会所获得的热烈反应，正奠基于这种绝境上，没有它，自发性的群众大会绝无法实现。

当罢工行动展开时，英国军政府也在忙于对策。殖民地高级专家所做的评估显示，除非采取行动平息罢工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暴力，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很快就会陷入混乱中。它们无疑已考虑到马共可能从混乱中坐收渔利。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英国军政府对公平分配财富绝无兴趣。这是种严重的腐败行动。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发现在这段时期，英国殖民地所控制的一切不外是贿赂、剥削、欺骗和普遍的渎职行为，无所不有。法庭腐败、民政官员腐败、军队腐败、警察腐败、军人和他们的指挥官们动辄开枪。

园丘暴力蔓延到马来亚各地，也渗透新加坡的工业部门，但我发现，莱特竟还是保持极低调。他极尽隐名能事，并享受它的保护作用。但现在，他无疑已意识到他因偷偷摸摸充当英国特务所招致的怒气。在日军占领期间当同志们要施压要求增强军事行动时，他坚持我们应更集中于把工人组织起来。如今，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已发挥他们的作用，并管理他们的组织。莱特的长期政策已被证明是具有不寻常的预示性。他应该感到心满意足才对，但他却明显是个忧

心忡忡的人。他的英国上司必定曾向他大力施压，要他平息罢工行动。

在中委会议上，莱特只是一两次提出罢工活动的课题。他选择不与我们对抗，他已感觉到他几乎不能扭转他首次提出时备受争议、但如今却非常成功的政策。他知道，这麽做的话，将会引爆反对他领导的造反事件。为了避开这势头，他口是心非地大赞特赞正进行中的行动，绝不表达丝毫的负面看法。

他觉察到他在党内的受欢迎程度已减退，这位总书记决定打出在过去无往不利的国际牌。毕竟，他的声望都建立在声称与世界共产党组织有联系，并且是共产国际成员的基础上。为了方便出国，他需要证件，1946 年中，有次在我们的吉隆坡会议上，他要求我替他弄本中国护照，并且给了我一张在吉隆坡一家相馆拍的近照。

吉隆坡苏丹街（Sultan Street）有一间由活跃政坛的富甲一方的李孝式先生家族经营的酒店。李孝式较后出任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政府的财政部长。李孝式的祖父以引进契约劳工－我们所谓的卖猪仔－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门路致富起家。较后其家族业务转向锡矿，也越来越富裕。到了 1946 年，该间苏丹街酒店为往来马来亚和中国的商家提供膳食，在这方面，它与当地的中国国民党领事馆有特别的安排。我们的一位同志碰巧与酒店管理人有交情，因而得以把附上一笔款项的莱特照片交付酒店，不久后即为他取得一本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 C.H.Chang，或是张灿红。不甚合法，但很管用。

在此时的党领导机关，莱特是坐第一把交椅，陈勇受公认为第二号人物，我被视为第三。在 9 月于新加坡举行的全体中委会议上，莱特本身便建立了这种权力等级次序。他的旅行计划是离开新加坡到香港，最后直接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莱特宣布陈勇也随团同去，并委任我为代总书记。

我现在相信莱特开始担心如何继续与英国情报局保持定期会议。这些，当然得继续在香港、甚至可能也在上海进行。他怎能在不会引起同行的伙伴陈勇怀疑的情况下做到这点？他于是安排他们两人分道而行。他乘船直接到香港。乘搭另一班客船的陈勇被告知取道曼谷转至这个英国殖民地。莱特坚持，基于保安原因，他们的行程必须分开。

陈勇的船在曼谷被耽搁，他因无法与莱特取得联系而乘火车到新加坡。我们当时没有怀疑什么，但明显地，这是莱特的诡计之一。

其实，总书记按计划如期到达香港和上海。但当他回来时，却只字不提海外

的会谈，甚至也不向政治局同僚说明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的忠告。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他肯定没有纠正这一点－他已在上海会见周恩来。我较后证实这并不正确。事实上，他的确与周恩来的老副手董必武交谈。

当莱特回来时，马来亚共产党对群众所持的整体哲学和方法是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们从此以后不以自己是海外华侨自居。相反地，我们应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华人。我们是马来亚的其中一个族群。我们效忠的国家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我们开始在党讯和报章上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却立刻受到老共产党员的反抗。这些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中国到马来亚的中国共产党员全都有抱怨。他们大力反对把他们的命运与马来亚结合，断绝与中国的联系。他们为文强调他们是中国人，祖国的利益至高无上，并应致力于协助中国。他们决定保持海外华侨的身份。

另一重大的变化是莱特从上海回来后，对党务进行了改变。他告诉我们中委会应发挥更有效的功能。在这托词下，他把中委会分成两个平行的小组，以加强工作效率。作为党最高领导层的五人常务委员会从此以后停止处理组织工作，纯粹扮演政治局角色，只对政治事务作决策。我们受委负责宣传任务，今后负责监督新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推动统一战线的活动。

中委会的非政治局成员则被委任为党的组织局成员。政治局和组织局都直接隶属莱特。他认为政治局和各州委员会的联系如果没有完全避免的话，也应有所限制。现在，只有党组织局才处理州委员会的事务。所有这些限制政治局权力和权限、以及断绝它与党基层联系的新安排立即生效。这证明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干净利落的方式。

虽然如此，莱特的操纵行动并不能阻止从当时（1946 年 9 月）直至 1947 年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罢工行动的势头。数月后，非常明显地，英国和华人商家、园丘老板和矿场经营者在聘请工人时，都歧视前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员。他们将一度是共产党森林斗士视为潜在的闹事者。这，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呈交中委会的报告表明我们的广大党员对此深感不满。他们要求党采取强硬的行动，并加强对中委会施压，要求它寻求一项解决方案。

再次，莱特独揽大权，特别挑出雪兰莪州领导层进行批评和指责。莱特罔顾遍布马来亚和新加坡各个角落的党员都感到焦虑不安的事实，单挑雪兰莪，尤其是对兼任政治局五人成员之一的书记杨果加以指责。在一次于吉隆坡举行

的中委会会议上，莱特直指杨果不能胜任愉快，以致雪州的党组织一片混乱。

杨果被激怒了。明知这些指责全无根据，他还是不愿在党领导机关里的同僚面前为自己辩护。莱特继续指杨果必须对所谓的党内“组织危机”负责，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他建议这位雪州书记被降级，同时所担任的所有中委会职责也一并被撤除。在党内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的下场。

莱特要求委员会成员发表意见。一些人热烈地附和他的建议，其他则不发一言。我站起来为杨果辩护，无论如何，我承认，我在这么做时是非常小心的。我从一开始便表明我的看法，即我们所讨论的党危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普遍存在，并不只限于雪兰莪。我主张中委会，包括我自己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我言下之意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莱特本身也应受罚。

全体委员都在等著我们的领导人发作，但他并没有。莱特改变看法，是因为我的谈话或者是由于感觉到当时的气氛不对，这不得而知，但是，莱特在全体中委会面前公开表达不满后，决定杨果可以不必降级，但应受到严厉警告。杨果两者都不接受。他自愿辞掉在中委会和政治局的职位，要求降至州级。

会场随之陷入一片尴尬的沉默中。其他在场的中委逐一地劝阻杨果不要离开中委会；即使是莱特本人，对他的批评也转为温和。中委会最后决定杨果继续留在中委会和政治局，但可以如他所愿，允许他调回他的槟城老家。莱特清楚地认识到杨果背后有一股强大的舆论支持力量。与其挑战它，他选择只对这位雪州书记施以象征式的惩戒。

不久后，杨果离开雪兰莪，回去乔治市。事实上，他回返槟城是一个有用的“冷却”期。但是，这也引发一连串事件，最终摧毁所有主张与英国殖民主义妥协的党内思想。

“在我发完脾气之前，莱特突然哭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骤变，叫全场惊慌失措。他双手抱头，坐在桌前默默拭泪。他一直在啜泣，也不断地低声抱怨：“你误会我了……你误会我了！”如果他的一流演技是为了搏取同情的话，那他马上就取得惊人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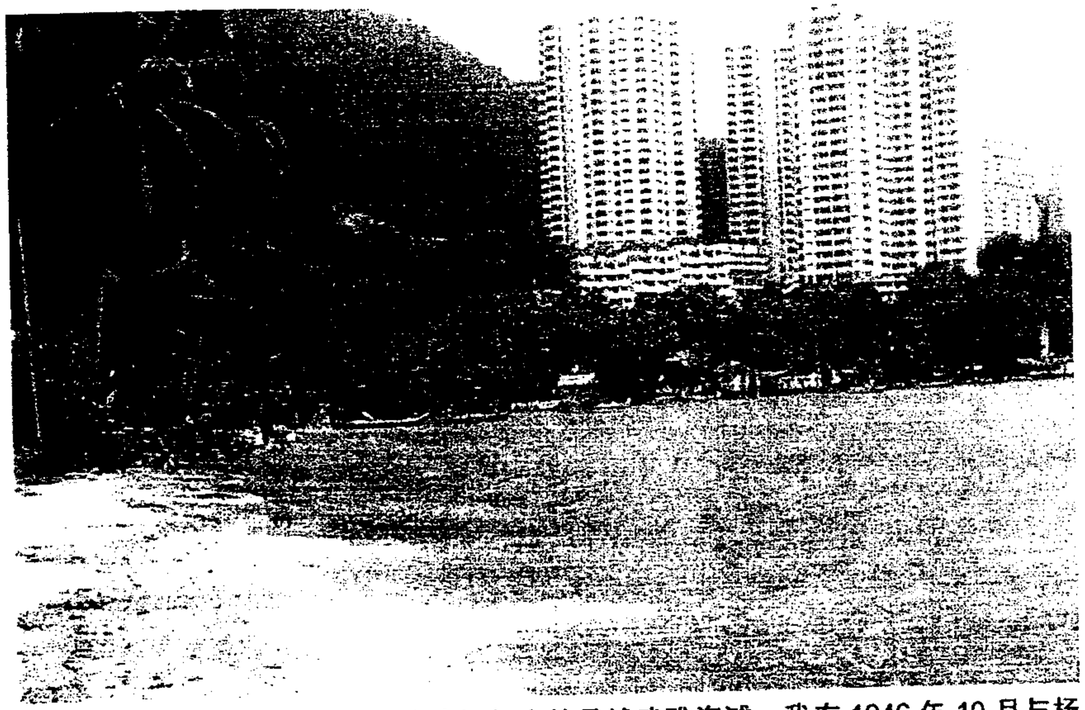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策划推翻叛徒

在党面对英国军政府越来越强的压力之际，莱特也趁机蓄意在这最坏的时刻在中央委员会搞分裂。他并无法掌握有关杨果的充足资料。他需要一个目标来转移大家对党组织混乱局面的注意力；但是，把目标对准杨果却是严重的失算。

是什么令到莱特突然间对这样一个长期为党效劳的同志发怒？为了执行政治局成员的有所限制的任务，我尝试分析这位总书记的动机，这时父亲的电话来了。他要北上槟城，途中会来吉隆坡，问我是否能陪他北上。当时是1946年10月中旬，正值西南季候风转向东北季候风的季节交替期，热带雨云密布天空。到槟岛小住几天的计划是太妙了。再者，坤华和我俩新生的女儿最近刚送到槟城给我的岳母照顾一个时期。父亲叫我载他去槟城。当时，党供应我一辆奥斯丁8型小汽车驶用，那是日本人投降後得来的战利品。

我就住在岳母家。我们才抵步不久，杨果的电话就来了，我们约好两天后见面、一起吃早餐。我们乘搭巴士到槟岛东北海岸的丹绒武雅。其时正值工作日，丹绒武雅海边空荡荡无一人。渔夫赶在退潮前停泊在海边的五颜六色的渔船，如今都无力地瘫靠在沙滩上。我们各自叫了一碟炒面和一杯咖啡冰，就在食档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起初，我们的谈话尽往一些小事上兜转。然後，杨果突然正面看着我，问道：“你到底怎样看亚列？”亚列是莱特在党中为人所熟知的别名，是“列宁”的简称。



镜头角度可以令人受骗。上图为我记忆中的丹绒武雅海滩，我在 1946 年 10 月与杨果坐在这里喝咖啡，讨论莱特的背叛及如何除去他对马共的控制。下图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丹绒武雅，同样的海滩，却有戏剧化改变的背景。

我谨慎地思索我的反应，然後小心地回答："像往常一样，我视他为我们的领袖。"

我意识到我这位朋友还在生莱特的气。我不知道他还想谈些甚麽。事实上，以党的标准而言，我们这席谈话显然非常危险。

杨果不理会我的迟疑，单刀直入说："他是国际特务。"

我的眼睛看着杯子，我的手慢慢地搅拌冷饮，心中却在思索着要如何应对。我可以感觉到杨果的紧张。我问："你有甚麽证据?"

"我很肯定他是特务!"口气是斩钉截铁、不容异议。他又补充说："他在战前曾为英帝工作，而在日本侵略时期，他又当日本走狗。这我都知道。现在，他又为英国人工作了。"

当杨果继续列举莱特在战前时期多次在警方到来突袭之际，总是恰如其时地缺席会议、巧妙地逃过被捕劫数的种种行迹时，我则意识到他所说的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太常出现所以不可能是一种巧合。有一回，警方在莱特在场时又展开突袭和逮捕行动，但他们在审问时竟然也不加多问，就很离奇地只释放他一个人。当时，"盘问"是殖民地警察对所有被扣留的共产党疑犯所采用的标准程序。

我承认我曾听闻这些事件。我的任务局限在霹雳州，其他州的情报到我的手时往往都是过时和不明确。我回忆起莱特每次都能逃过被捕的命运，当时总以为主要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机灵。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的神秘。

杨果颓丧地摇头说："看看日军铁蹄下的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继续说下去。"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接下来又发生（吉隆坡）黑风洞日军围剿屠杀事件，莱特本来也应该在场的，但是，他再次离奇地被耽搁了。日军袭击、杀害我们这麽多的高级干部，这难道又是另一个巧合吗?"我的老友以嘲笑的口吻这么问道。

在仔细聆听和权衡一番后，我决定向杨果提出我对莱特所谓的与共产国际高层有接触的关注。这些显然都是编造的。我回想起我在美罗会见这位总书记的情况，以及他对老黑（也就是李启新）通过我交给他的一封信所表露的反应。

接着，我再细想老黑和阿里敏在今年初到吉隆坡时，两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先後告诉我他们与莱特素未谋面的事。事情的出入很大。他是不是为了巩固作为党领袖的地位，而编制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有好一阵子，杨果和我都默默地不说话。

後来，我打破缄默，口气坚决地向我的同志说："我们得揭发他！"此刻的朝阳已经高挂晴朗的天空。压抑的空气静止不动，海面上几乎激不起半丝涟漪。早前还在附近闲着无事的渔夫，全都回到他们的小木屋去了，除了我们两人之外，整个海边可说是空无一人。

我的眼光从海上游移到大陆，接着便停留在远处的吉打州连绵起伏、蓝得峥嵘的群峦叠嶂。在越来越潮湿的空气中，充满凉意。我的眼光又向东远眺，那是从暹罗（即泰国）南部的（马泰）边境地区一直往南伸展到马来亚半岛脊椎的主干山脉的最北端。在这披着茂密森林的一重又一重高山里，我们的游击队员一直为了保护我们备受疟疾侵袭的营地而前仆后继。我们的斗争武器，就藏匿在我们煞费苦心经营的沿着这主干山脉的众多洞穴和地下密室之中。到底莱特向英军泄露了多少秘密？

杨果和我都非常明白我们要做的事所存在的潜在危险。我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快速及果断。否则，我们恐怕无法活着看到结果了。党会对付那些策划推翻高层领导人的密谋者。

我们两人都同意应密切地监视我们这位总书记的动向，伺机出击。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如常地执行党务。

在离开丹绒武雅之前，我们也对每位中委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最後所达致的结论是：除了莱特不按党规安排的两人之外，全体中委都是好人－他们一心一德为党谋求最佳利益，只要证据充足的话，他们都是我们可信赖的支持者。我们又得见机行事。

机会比我们预期中更早出现。在杨果和我於海边商议不到两个月，莱特便召集我们在吉隆坡举行中委会议。这回，他表现得很古怪。

会议在原为已故百万锡矿家陆佑建於安邦路的大洋楼后面的一幢双层木屋洋楼底层的饭厅举行。中委们沿着长形的饭桌而坐。会议才开始不久，莱特便宣布另有要事，不得不中途离席。他指示我们继续开会进行初步的讨论以及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拟定主要会议所要讨论的议程。真是奇怪。他向来都坚持由自己来拟定议程的呀！

在我们的领导人突然离开会场后，我们即席推选另一位主席来主持会议。有人提议来自柔佛的陈勇——名政治局成员、我们的南马局首领、及被众人视

为党领导机关中的第二号人物。提议获得附议，会议也继续进行。莱特正在办理的事看来很花时间。在没有莱特的两天会议中，我们的初步讨论都只是在漫谈。

第一天会议午休时，我和杨果步行回我在安邦路、路程不到十分钟的家。我和坤华当时的居所一带共有六间房屋，隔壁邻居是在树胶研究局任职的中层官员，娶了位马来太太。这位邻居曾在日治时期沦为日军的阶下囚。

在慢步当儿，我可以感觉到杨果的兴奋。我还没关上大门，他便脱口说道："莱特不在，所有党领导人都来开会。机会来了！"

整个午餐，我们都在讨论行事策略。自从丹绒武雅的交心详谈后，我们两人都不放过任何机会来研究莱特处理党务的行事方式。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达致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他最容易受金钱的诱惑！自从日本投降后，莱特并不曾提呈有关党基金状况的任何报告。我也发现，他甚至连在日据时期也从没提呈财务报告。这意味着在这四年多以来，他虽然掌控党的资金，却从来都不必向谁负责任。

经过磋商后，我们决定由我在下午复会时，立即提出党财务的问题。我要提的重点是基于党的准确账务，各州都得申报一份它们在战后时期的财务总账报告。这些账务当然得包括呈交党总部的基金详细报告在内。既然大家都同意州委员会必须向党中央捐献基金充作运作经费，这项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没有人能够提出争议。事实上，捐献最多的州属还可获得表扬呢！

只要我们打下基础，并在议程中规定提呈财务报告方面获得大力支持的话，我们认为我们便能在挑战莱特时占优势。根据我的粗略计算，自日军投降以来，莱特所经手的马共各州委会款项大约有 100 万至 200 万叻币。

在确立了查问财务状况的论据后，我们计划让杨果提出有关领导人作风的敏感课题。他得小心行事。我们都知道，这项发难可能会反而使莱特轻易获得同情与支持。等待财务结论的中委们，可能会对讨论领导人作风的议题小心翼翼。由于领导人作风所牵涉的范围广泛，我们得针对中委会过去从未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密谋好后，我和杨果回到会议地点出席下午的会议，并开始按计划行事。我们的问题一经提出，中委会便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傍晚。主持会议的陈勇得进行总结，解决会议的议程。

会议同意讨论的第一个事项是，莱特在马来亚共产党正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所提呈的国际局势政治分析，竟然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所作的分析迥然不同，这一点得寻求解释。莱特显然并未掌握国际发展的最新情报，这反而令人对他本人声称出任国际职位产生很大的疑问。

议程的第二个讨论事项是领导人的作风。在初步讨论时，会议同意党内出现了封建式的领导权威。此外，会议也讨论了其他附加的事项。最後的议程是全按我的建议，要求各州逐一提呈他们的财务报告。

在第三天的主要会议开始时，莱特适时地出现了。他先是要求看我们所定下的议程。他读出议程，脸上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有一阵子，他试图对他的政治分析作出辩护，但发现无法说服听众。接着，他突然见风使舵，并影射主导拟定议程的同志涉及一项阴谋。陈勇只是我们按计行事的主持人，他（当然）激动地矢口否认这项指责。最后，他大发脾气，提出辞职。

莱特对陈勇的冲动吃了一惊，并再次改变手法。“我老了，你们也都知道我的健康长久以来都欠佳，我希望你们允许我请假，或许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改进我的华文能力。”他这席话使我猛地再次想起美罗的会议，以及老黑托我交给莱特的信。我们都知道莱特身体不太好，也知道他需要加强对华文的掌握。但是，我们确实对他要求请假感到困惑不已。

我们的总书记坐在长方桌上方，我则坐在对面直视着他。由于受到莱特的指责和攻击而感到难受的陈勇则坐在我右边。

接着，莱特指着我，说他把我视为最能干的同志。他说我这十年来一直勤奋不懈地为党付出。“陈平同志将来会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因此，我有信心在我渡假期间把党交付给他。”

他一直不断地对我大表赞扬，当然，这一切的用意都是故意为了贬低被视为其副手的陈勇。在别人眼中，我向来不是个动辄发怒的人，我一直按捺着性子来听莱特对我的虚假赞美，最后终于忍无可忍。这一回，轮到我发火了。当莱特还在喋喋不休时，我突然猛敲桌子，跳起来喊道：“够了。别再称赞我了。我配不上这些赞美。”

陈勇是我的密友。在马共的霹雳宣传部，他一度是我的直接上司，而我则听命於他。他当时是州委员会的委员，我虽然美其名是党讯“主编”，负责的工作却是刻写油印用的蜡纸。回顾起来，我们两人认识已经很久了。

在我发完脾气之前，莱特突然哭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骤变，叫全场惊慌失措。他双手抱头，坐在桌前默默拭泪。他一直在啜泣，也不断地低声抱怨：“你误会我了……你误会我了！”如果他的一流演技是为了搏取同情的话，那他马上就取得惊人的成功。会上，埋怨我不该攻击莱特的怨声四起。小章，黑风洞围剿事件的幸存者，也是西彭著名的游击队领袖，更是马上热情地为哭泣的莱特辩护。

他间接地指责我，故意在此刻没有什么会比团结对马共更重要的时刻，在党内制造分裂。“我们的领导人是个病人！”小章在怒吼，“他得休假养好身体。我们应支持他！”

一场反领导人的阴谋被拆穿了！真是铸成大错！但是，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得道歉。便保持缄默。杨果和陈勇也一样默不作声。最后，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散会，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复会。

当天傍晚，杨果来到我的洋房，他严斥我的鲁莽行径。“我们之前已说过不要暴露身份。现在你看你做了什么事。”他抱怨道。“我们俩现在已成明显的暗杀目标。你最好作好防范措施。我已作好我的防范措施。”他补充道。

会议如期复会。杨果也出席，不过我旁边的座位空着。明显是胆怯的陈勇选择不出席会议。陈勇的住所就在会议地点的附近，被派去找他的交通员带回他签名的辞职信。他的辞职信在会议上被大声地念出，然后传给大伙看。我们的第二号人物表示已失去信心，并认为没有意思继续担任中委。他好像是在等待不可避免的事发生。

莱特把此事搁置一旁，并指示讨论其他与议程无关的事项。在会议结束时，他宣布有更重要的事务待处理，此次是在新加坡。就如往常般，没有人询问详情，聚会随即解散，下次会议定在三个月后于同样地点召开。

1947 年一月底，马共高级干部们再次在吉隆坡聚会。由于较早前发生的事件，当我们在坐落于安邦路旁同一间洋房的长桌坐在本身的位子上时，会场有股不安的等待气氛。然而，没有人预见到当日发生的事件，对东南亚及英国与其全球的共和联邦国家所产生的重大后果。

陈勇再次没有出现。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感到意外。让我及所有出席会议者感到意外的却是，桌子前端应由莱特坐的座位却是空着。党为莱特在吉隆坡提供永久的住所。那是位于文良港（Setapak）——鹅麦（Gombak）的一间单

层砖墙小洋房。总书记是出名的准时的人，他很注意抵达约会的时间，往往不早也不迟。我想他是以列宁为榜样。莱特主持的会议经常是在上午 8 时召开，在中午 12 时休息用午餐，下午 2 时复会并在当天下午 5 时休会。莱特每次皆在会议前 10 分钟离开家。

在此次的正月会议上，我们等了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已是 9 时了，会议最终建议必须有人到莱特位于鹅麦路的家，并沿着莱特使用的路途走，以确定他不会在途中发生车祸。柔佛州委阿电被委派执行搜寻任务，不过他不会驾车，我自告奋勇以我的奥斯丁载他。

在陈勇的缺席下，阿电执行柔佛州书记的职务。他是最受陈勇信任的助手，但仍旧非常效忠于莱特。我们慢慢的开着车朝莱特住家十分钟的路程驶去，我们仔细注意路面及路旁，寻找任何车祸的迹象。不过我们未能发现任何迹象。在我们前进时，阿电温和地劝告我此次不能再像上回般与领袖冲突。

我们最终抵达莱特的住所，我们见到莱特的太太江雪蓉，她是马共党员，当时正怀孕在身。四年半前，她是一名交通员带领我到山顶的洋房与莱特会面。我问她莱特的去向，她感到非常吃惊，并坚持莱特已准时离开，以确保准时抵达安邦路的会场主持会议。我与阿电非常忧虑，我们游说莱特的太太陪我们到会场向与会者说明情况。

抵达会场后，她反映莱特何时吃早餐及何时驾车离开家。随后她就离去。中委们关切地讨论此事，莱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名中委认为莱特可能已被英国人绑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选择不发表意见，当然也不解释为何我持不同意见。

我与杨果相信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于午后散会前，会议决定成立调查小组追查此宗神秘事件的根由。会议选出三人，在陈勇自我选择边缘化后，我就被委派领导这个小组。另两名调查成员是阿电及杨果。

当晚，杨果再次来到我的住所，我们讨论莱特失踪所可能出现的所有后果。我们很迷茫，不知从何处着手调查。我们在政治部没有任何联系，此外，我们不敢到当地的警局投报，指受人畏忌的马共地下领袖失踪了，并相信是被政治部绑架。

我与杨果变得很忧虑。我们感觉到莱特与其政治部控制人肯定会对我们展开反击行动。我们可能已被列入被干掉的名单。当我们消失后，莱特就能复出

及重新出任不受人挑战的马共首领。我们决定应该消失一段日子，让一切恢复平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定是否有人在找我们。离家前，我向太太说明情况，并劝告她最好是回返她妈妈在槟城的家住。不过，她决定继续留在吉隆坡。

当晚深夜，我与杨果敲打一间位于吉隆坡甘榜巴鲁住家的门。这里住着两名马共党员，他们是关系亲密的朋友。两人在马共半月刊《战友报》编辑部任职。这份半月刊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中流传。我们要求在这儿居住，并要他们保守秘密。起初几天，夜间我们在这里躲藏，白天则在书店及电影院溜达，偶尔也回返原本的住所，以确定是否有人曾经尝试联络或追踪我们。最终我们发现我们的躲藏行动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让我们成为更明显的目标。因此我们决定不再躲藏，恢复执行正常的党务。

现在，其他中委正吵着要知道已采取的行动及要求作出解释。气氛充斥混淆、紧张及潜在的愤怒，这主要是因为担心若莱特的失踪不迅速解决，中委会可能瘫痪。

我肩负的任务是双重的。我必须首先解开莱特失踪的神秘原因，其次我需要收集所有与莱特失踪有关的证据，呈交给中委会。然后由中委会决定要采取的行动。

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打破 15 年来在党内滋生的个人崇拜。莱特刻意塑造个人崇拜，这是他持续控制中委会的手段。这已成了他最有力的武器。历史大格局为他制造条件，让他成为斗争的英雄。当他加入马共时，党正处于混乱的处境，他成功把党带回正轨。随后日本侵略中国，莱特动员群众支援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生活费高涨，莱特则转向注重改善工人的收入，在当时，组织罢工是容易的事。虽然这一系列的高调斗争造成本土共产主义活动快速扩展，莱特在基层则赢得赞赏。

我们失踪的总书记给党领导层的印象是，他曾在法国、苏联、中国及印度支那（印支）共产主义运动工作过。他的说法是，在中共上海市委会工作一段日子后，他被派回法国，途中他在新加坡逗留。在新加坡时，他接触到毫无组织的马共。他的计划随即更改，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留在新加坡为当地的革命指引方向及确立秩序。他展现了组织地下活动的能力，他的身份似乎无瑕可击；他所具有的越南背景及接受法文教育也为他增添光环。他被全党毫无怀疑地接受，并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我与杨果现在心里已知道莱特的故事是大骗局。可是，又要如何揭穿假象

呢？我们又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证据以提呈给沮丧的中委会呢？

在尝试所有的管道后，我们的第一个突破是在数个星期后来自越南人。一批越南共产党人在事先的安排下，从曼谷的基地通过陆路抵达吉隆进行访问。他们是前来寻求我们支援印支战争，之前他们也曾提出类似要求。自印支革命在日军投降后爆发，马共欣然给予越南的同志财务支援及与越盟运动维持密切关系。每一回越南地下组织到访，他们都会与同是越南籍的莱特相聚。

近期来，莱特也是支援印支革命的幕后动力，他动员 600 名在新加坡的志愿人员赴战场支援越盟，英国当局在最后时刻干预，阻止这批志愿军前往越南。

在此次的特定访问中，我们的越南同志有意接受莱特较早前的献议，为越盟提供军火。马共已特别拨出 400 支枪械给他们，它们置放在柔佛东海岸介于丰盛港及哥打丁宜（Kota Tinggi）之间的三个秘密贮藏处。我们也准备了一艘舢舨及船员运载枪械，以通过南中国海运到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Cam-Au Peninsula）。

越南人自己安排细则。他们将在丰盛港上船。然而，当他们在吉隆坡等待时，他们接获曼谷总部的通报，指原定卸放军火的地点正受到法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以致军火输送计划被迫取消。

就如每一次的访问，到访的越南人要求会见莱特。起初我告诉他们莱特不在市区，他们接受我的答复并南下新加坡数天。回返吉隆坡时，他们再次要求我安排会见莱特。过了几天，自认充分认识到访者后，我便很尴尬的向他们坦白相告，我们的总书记失踪了。我也向他们表示，人们普遍上相信莱特是被英国人绑架。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访者却向我反映他们所知道莱特在新加坡的数个事件供我评估。他们相当肯定英国人并没有扣留莱特。他们在离去前留下一名在新加坡的越南人的名字及地址，他们认为这个联系将对我收集莱特的消息有很大的帮助。

我赶到新加坡会见该名男士，他是一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年近四十。在战争时期，他在“全印度电台”海外广播网从事翻译工作，把英文新闻稿翻译成越南文。他也曾任播报员，战后其广播小组停止操作后，他跑到新加坡来。他是一名民族主义者，有意返回越南参与抗法战争。以其背景，曼谷的越南共产党人认为他是可以信赖的。

我的新联络人证实我之前听到的故事，莱特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与日军有联系。他指出新加坡的越南人社区很早就怀疑莱特为日本及英国人服务。新加坡的越南商人社区在当时约有 300 人。在几个星期内，我就收集到一大叠的证据，详细列明我们失踪的领袖的各项活动。有一项证据还显示，莱特甚至向当地越南社群夸耀，英国人欲颁发特别战争服务勋章给他，不过他拒绝这项献议。

我也接获有关莱特私生活的情报，这令人心烦，他明显在隐瞒我们。来自槟城的江小姐是客家人，她是当天向中委会说明莱特在吉隆坡失踪的情况的妇女，她竟然变成了总书记的第四任太太。在新加坡时，我了解到莱特的第一任太太是越南人，她是政府承包商的女儿；该名承包商为家人在加东的海滩购置一栋洋房。莱特另有一名漂亮的情妇，她在一起车祸中失去一只手。她住在新加坡禧街的一个组屋单位，并由莱特支付。我们的总书记也提供资金，让她在禧街经营酒吧与餐馆。第三个女人是广东人，也是住在莱特支付的房子。日军投降后，他与我们的同志江小姐结婚。

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以越南文书写，我随后找人翻译成华文。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后，我收到有力的证据证明莱特事实上卷走超过 100 万元的党基金。1947 年 3 月 6 日，我带着文件召开马共中委会会议，并向会议提呈我的调查报告。

这帧照片造成多年的混淆。这是我在患严重疟疾之后大病初愈时拍的。它后来被政治人员从吉隆坡的一间照相馆没收。我没有用这照片申请护照，因为它与我出国时要以年轻商人作为掩饰的身份不符。后来政治部在公开场合用这张照片当作是我。

第十二章
消灭英国间谍
——紧接而来的是 OBE 勋章

日益接近定于 1947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中委会会议，我开始收到莱特发出的令人忧虑的指示，要求提供党的秘密武器贮藏库的详情。这些要求是秘密地通过新近成立的组织局发出的。在六个月前总书记为了整顿中委会职务而被调任政治局的我并不了解组织局的活动。

我察觉，所有州委被要求提供武器的数量、详细的子弹贮存量及最令人惊心的，我们在各个森林的军火贮藏库地点。为了本身的目的，莱特也要知道负责掌管各个军火贮藏库高级干部的身份。

有关要求肯定是直接违反我们的最基本保密条规。我现在终于明白莱特划分中委会职务的动机。在这种安排下，所有有关受质疑的指示的消息，皆是组织局独有，我们在政治局则全然不知。这是个非常好的操纵党的伎俩。与此同时，它也确保将那些具有权威和信心去质疑指示的人，隔绝在日常的进程之外。

碰巧的是，我们的主要武器军火贮藏地点在柔佛、霹雳及雪兰莪。幸运的是，在这种时刻，这些州及其他地区的党分部皆回避提供所需的资料。他们并不是因为怀疑莱特为英国人工作而不愿行动。而是因为这些同志明了一旦遵守这种不可思议的不当指示，它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州及区级实行的惯例是，这类保密的资讯从不写在纸上。特别是有关武器及弹药的贮藏资料只藏在脑中。

当时，而且至今我还是相信，莱特试图一次过索得我们的武器供应重要情报，这是党生存的根本基础，有关行动肯定是来自英国情报主子的非常大压力。我认为这是一项能在我们的武装斗争处于萌芽时期就捏死它的计划。

然而英国人对他们的行动想得不够周到。他们把莱特逼得太紧。为了听从指示，莱特被迫采取令人警觉的行动。如果英国人更细致地行动以获取我们的武器贮藏情报，他们可能会得手。一旦英国人成功了，马共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被瓦解。就算是党侥幸得以生存，那也肯定不会有游击战。没有武器你就无法打仗。

所有这一切最新的报告列明莱特不寻常的要求了解我们的武器贮藏资料，增添我在3月6日于吉隆坡召开的中委会会议上提呈报告的证据。除了陈勇，所有中委皆出席会议。虽然其他中委同志皆非常清楚马共正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但他们并不了解莱特出卖组织的程度有多深。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向中委会汇报所收集到的资料后，就坐下，会场是令人害怕的寂静。显然，出席者很难接受我们的潜逃领袖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哪一项罪行破坏性最大呢？它对我们进行革命运动能力的破坏有多深？哪一项修补破坏的措施最好？过了一阵子会场打破寂静，我们开始交换意见。会议对莱特事件作出三项决议。第一，我们确认他为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其次，我们开除他出党。最后，我们确认他必须受到最高的惩罚－死刑。

会议作总结时也正式委任我成为马共领袖。我随后发言，指明巩固力量的需要，以使党得以重生及进行重组。会议最后也决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之后，我认为我们有责任通知莱特的马来亚籍华裔太太，我们的同志江小姐，有关其丈夫的犯罪证据及会议所作的决定。我们十分尊重江小姐。莱特在吉隆坡失踪后不久，她就迁往槟城父母的住处，并在该处诞下一名女儿。我与杨果讨论以怎样的最好方式向她通报这个消息。

基于江小姐在学生时期就已认识杨果，由他亲自会见她是最好的选择。我对这项安排感到松了口气。由于花了多个星期收集对其丈夫不利的信息，我与整个事件的关系太密切了，这对听到消息后无疑将会极度悲痛的同志是没有帮助的。江小姐的父亲在乔治市槟城路附近经营裁缝店。杨果在店里会见她并向她解释我们的调查发现。他也从头到尾向她讲解其丈夫的背叛行为－从英殖民统治战前时期、日军占领年代至英国人在战后重新占据时期。他向她说明越南共产党人如何协助揭发莱特的双重身份及我们如何对其罪行置信无疑。

杨果估计，她会近乎发狂地痛骂及痛苦地要求宽恕莱特。然而，江小姐静静地接受被告知的一切，不做任何提问。在双方保持沉默一段长时间后，她细声地说到："那么我相信你们必须杀死他。"

杨果回答说："我们必须那么做。"他补充道，"我们正在寻找他的下落。"一年后，英国当局逮捕江小姐并把她遣送到中国。70年代她因肾脏衰竭而病逝中国。

在处理了莱特华裔太太的问题后，我们开始了追捕叛徒的行动。我们清楚的知道其岳父在加东海边别墅的坐落处，我们派人紧密监视，寄望他会重返该处。

新加坡市委书记马丁领导追捕行动。他曾在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训练，在日据时期查普曼对他很熟悉。马丁受指示成立一支特别除奸小组，在第一时间消灭莱特。每一名小组成员皆持有被追杀目标的照片。我们对加东别墅进行了超过两个星期的秘密监视。我们追踪无数进入及离开别墅的车辆。然而始终没有成果。最终马丁报告所有追查莱特在新加坡行踪的行动都失败了，我们推测此人很有可能已离开这个地区。

当我们思索下一步追杀行动及采取控制破坏措施的时候，我们开始收到各州有关莱特侵吞党基金的数额更准确的评估。从最新收到的资讯，我们得以计算在莱特掌控时期，各州呈交给新加坡党总部的准确捐献。此外，我们也了解在同时期马共捐给在暹逻及印度支那兄弟党的准确基金数额。我们也得以确定新加坡办事处的真正开销。以简单的加减法计算，我们得出侵吞基金的底线，它比原先估计的数额更庞大。新数字是接近200万元，而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莱特不仅把马共的钱用在自己的投资，也花在多个女人的身上。根据当时的计算标准，他的欺骗行动所涉及的数额之大是令人吃惊的。

我必须在这里先解释马共如何得以累积那么多的财富。它是在日军投降，我们的游击队复员前累积的。一项单独自发性的充公囤胶的行动引发半岛马共支部展开同样的夺取胶片的行动。有关行动肯定不是一项指示，不过却获得党领导层的欢迎。我们的同志发现自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充公日本人的囤胶，这些囤胶也是日本人从英军夺来的战利品。

日军战胜后夺取英军逃离时留下的大量囤胶，可是他们面对安全运回日本的难题。当时缺乏商船，而川行的商船经常会面对盟军的潜水艇及飞机的攻击。日军试图在槟城建造大型木制舯舡，以它运载胶片沿着中国海岸线到日本。吃

力的打造舢舨工作及难题多多，使运胶片到日本的整个过程证明是没有效的。这导致数量庞大的囤胶留在被占领的马来亚，直至日军投降时还是如此。

在日军投降的狂欢日子，华裔资本家企图操纵树胶存货市场，并与日军进行秘密交易。我们并未进行交易，我们干脆充公胶片。我们充公日军的胶片，我们也充公资本家的胶片。我们把这些胶片运到我们控制的货仓贮存。我们拥有足够的人手处理，有足够的武器保护我们的利益。资本家完全无法与我们竞争。进驻的英国军政府官员太忙于重新实施殖民统治，我们的游击队员则忙于夺取国家的树胶。我们守稳胶库后，我们就等待着战后市场的调整。随后我们出售这些胶片，超过 200 万元就这样筹得。

我们相当准确知道，仅仅从售卖树胶所获得的 100 万元已交给莱特。其余的款项则被各州花掉了。党高级干部欲在日军投降后的混乱局面中获取更多的收入，然而他们的努力很多时候皆以失败告终。他们是优秀的地下组织人员，比一般的游击队员更优秀，然而不是商人。

随着多个星期努力解决莱特危机后，我决定把在 3 月 6 日会议中提议的中委会扩大会议展延至 6 月召开。这个时刻我对三名中委对党的安全的威胁感到担心。其中一人是理想已破灭的陈勇；另两名叛徒是阿山及罗须磨。

陈勇显然仍然决定与马共脱离关系。然而他及我们皆明了，这不是他可以一走了之那么简单的问题。身为中委，他掌握太多党的机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了解到陈勇尚欠我们 5 万元，他是在日军投降时从柔佛州委提取这笔基金。他把钱投资在个人企业不过却失败了。其中一项投资是番石榴园，另一项投资是太平印刷厂。他只摊还一小部分的“借贷”数额。

陈勇事件令我们非常难做决定。对我们来说，他借去的钱必须摊还。党将会坚持这点。在我们最终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带着一个这么难搞的人进入森林将只会增加安全风险。同样的，如果让他脱离党，离开我们的圈子成为商人，他将继续成为一项威胁。我们决定给陈勇一个机会，让他成为一名普通党员不再担任任何职位。我们希望如此能继续密切监视他。我们也获得他的保证摊还拖欠的党基金。这项宽待，对我们所有的人，在未来年头带来严重的后果。

至于阿山及罗须磨，我们觉得很难判断到底他们效忠于谁。两人皆出席 3 月 6 日召开指证莱特的会议。如果他们继续效忠莱特及与莱特维持联络，那也同样将构成严重的安全风险。更棘手的问题是，无可否认我们没有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他们有不忠或细微不检点的行为。我们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对他们采

取行动。我们决定密切监视两人及孤立他们，不让他们获悉只有党领导核心知道的事情。

面对这类安全问题，我们为 6 月中委会扩大会议制定不寻常的防范措施，包括分两个地点同时举行会议。我主持在怡保举行的会议，约一半的中委出席该次会议。杨果则主持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议。我们这么做是要确保若其中一组人出事，仍有一半的中委留存。阿山及罗须磨出席怡保的会议，两人皆对吉隆坡会议不知情。

分两个地点举行的中委会扩大会议的目的是要向领导干部解释领导层危机，及让他们知道所采取的纠正措施。我与杨果根据预定的议程行事，并提呈预定的决议交由会议接纳。决议内容与中委会较早前所接纳的非常相似，它确定莱特的间谍活动，确认开除他出党及重申对他的死刑判决。

决议也提升两名新中委，取代被开除的莱特及辞职的陈勇。中委会扩大会议也委任新政治局，其成员为我、杨果、阿仲、阿电及小章。

新组成的政治局另外召开会议，并授权我出国访问，俾与本区域兄弟党取得联络。杨果在我出国时担任代总书记。我被赋予的任务是与泰国、印度支那及中国共产党取得正式的联系。我将向这些组织汇报我们经历的危机、说明我们的补救措施及寻求他们的协助追查前领袖的下落。与此同时，我也寻求他们的协助确保莱特被消灭。

我急急忙忙地通过一年前为莱特弄来旅行证件的特定管道弄到一本护照。我到李孝式家族在吉隆坡苏丹街拥有的酒店附近一家像馆拍护照照片。一两天后我倒回头拿照片，我认为不适合拿去申请护照。由于我刚刚患疟疾康复，拍出来的照片显得消瘦无力，这与我出国时装扮成年轻华裔商人的身份不符。我决定多等待两个星期，好好休养及吃胖点。我随后再拍照，这次显得比较适合。

我提及此事，是因为它影响未来的日子。显然，我第一次到像馆拍照时被人跟踪，一名政治部人员会见摄影师，要求冲洗多几张照片给他。满意于完成的任务后，有关政治部人员并未去确定我是否有拍摄其他照片，就把拿到手的照片交给当局。被我视为不适合作为护照照片的虚弱、受疟疾摧残的人像，却变成紧急状态时期为了通缉我，无论是生或死，唯一刊印在海报、传单及报章上的照片。这张不像我的照片让我经常感觉到是一项意外的好处。

健康的王文华符合我的旅游证件的职业说明。拿着这份护照，我乘搭火车

北上北海，随后更换火车至曼谷，走上我的第一次海外出访。7月初抵达泰国首都，我住进市区一家廉价酒店并开始联络在市区活动的越南及泰国共产主义运动。我对他们详细报告莱特事件及我们对此事所做的决定。

越南人已在较早获得今年到马来亚接收武器的代表团成员的预先报告。我正式向越南及泰国共产党要求协助追查我们的前领袖。我根据预定行程在曼谷停留两个星期后，急切地希望确定飞往香港的班机。泰国同志热心地帮我买到机票。在泰国停留的最后几天，一名泰国共产党高级成员陪同我乘坐三轮车离开他们设于四丕耶（Si Phaya）路的一间木屋党总部，前往苏里旺（Suriwong）路的国泰太平洋航空公司。

从航空公司乘坐三轮车回返时，我们的车夫悠哉地沿着一条大道靠左而行。机票拿到手后，我的心情也很轻松，观望沿街的风景，我的眼睛望着对面街的车辆及行人。我的视线忽然被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影所吸引，那肯定不会是莱特吧！当我初初看到这个人时，他站着背向着我，似乎正在向小贩购买香烟。他的身体语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们的三轮车继续往前走时，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人影。当我来到一个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人的脸孔的角度时，他是莱特无误。他正抽吸刚刚点燃的第一口烟。他抬起头来望向我的方向。我急忙闪进三轮车的遮盖后，狂乱地对我的泰国同伴喊道："停，停，停。叫司机转回头。我看到了叛徒。"由于转达指示及等待其他车辆通过，我看着莱特乘搭电动都都车，喷着黑烟离开。脚力无法与电动比，很快地我的追捕对象消失在中午的交通中。

送泰国同志回返办事处后，我赶到越南共产党设于素坤逸（Sukhumvit）路，离英国大使馆只有约一英里的党总部。我告知联络人我看到莱特，他劝我不要担忧。他表示，他的办事处有办法追查任何在曼谷逃难的越南人的下落。他向我保证，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知道越南共产党当时在市内拥有一支庞大的半军事化地下力量。他们将先派遣人员到所有中价至廉价住宿的酒店检查。我将在48小时内离开曼谷。越南人向我保证他们将立即行动，并可能在我回返时完成任务。

我乘搭国泰太平洋航空，在当时最好的飞机一四引擎空中霸王飞机飞往香港。抵达香港，我起初住进铜锣湾一家相当豪华、新建的酒店，隔邻就是越南最后一个皇帝及勾结日本人的保大（Bao-Dai）在法国统治者于1946年3月重新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殖民统治时住过的酒店。我的酒店收费太贵。最后我搬到

九龙弥敦道较便宜的酒店居住。当时我与香港共产党运动取得联系，再次详细报告莱特事件，并由他们通报上海中共中委会总部。我当时准备等待回复，由于需要一些时间，我在香港逗留了五个星期。

那段时间我皆用在阅读报章及到戏院去。有时我则乘坐渡轮到香港岛游玩。我在湾仔及中环一带行走，乘搭渡轮回返，然后躲进酒店阅读英文及华文报。就在我翻阅《南华早报》时，我的眼睛注意通过海路及航空抵达及离开的乘客名单。在那个时候，报章不时刊登前一天的搭客名单。名单是依据英文字母排列，而且轮船与飞机乘客的名单是分开刊登的。

我非常机械地扫过来自新加坡、东京、加尔各达及曼谷的乘客名单，而在来自泰国首都的飞机乘客"C"字母名单中，我发现张灿红的名字。那是我认识的名字！名如其人般虚假。我肯定认识他。是我用这假名为他获得中国护照，让他得以出访的。

看来越南人在曼谷无法找到他，他最后来了香港。隔天，我向在华文经济日报《华商日报》工作的当地联络人报告此事。这家报馆被视为是中共在香港的接头点。数天后，我的联络人通知我莱特顺道访问《华商日报》并与其一名同事谈话。莱特向此人编造故事，指他在吉隆坡被英国人逮捕随后被遣送到曼谷。

我了解在香港的中共代表不愿在殖民地行政区涉及可能发生的暗杀行动。他们必须与英国保持灵活平衡，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冲突，特别是这类暴力行动。无论如何，我的联络人为我提供一些珍贵的情报。他指莱特事实上提呈一份报告给中共，表明有意回返曼谷。他也计划随后回返新加坡，重返当地的组织。莱特获得一笔钱充作个人开销，并准备离开香港。虽然我的联络人无法提供准确的离开日期，我多少能够收集到资料，莱特准备何时飞离。我估计他会在一、两天的时间内离开，我随即乘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的班机回到泰国首都，并急忙通知越南人。他们展开第二次逐间酒店的追查行动。

两天后，越南人的追查取得成果。他们确认莱特住进一家中级酒店，他们进入其房间时，他当时不在房内。巧合的是，逃难中的莱特在前一天联络泰共。在越南人的追查队抵达酒店前不久，他正好离开酒店到一个定在店屋的约会地点会见泰共联络人。

在我之前的要求下，泰共同志派出三人行动组会见莱特，行动组成员显然是年轻及没有经验。他们不是静悄悄地趋前及通过交谈吸引目标，而是在莱特

一踏入店屋时即刻猛扑上前。一个夹住他的头，一个扼住他的喉咙。扼住他的颈项的人一再出力，被攻击者起初还扭动挣扎，慢慢就变形，口吐白沫，全身无力及停止呼吸。三人在店屋后轻易找到制造麻袋的麻布，他们用麻布包裹尸体，等待黑夜的降临。当晚，肯定是英国人最大间谍战功臣但被罢黜及被消灭的马共领袖，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抛进位于曼谷，水流湍急的昭披耶河（即湄南河）中去。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隔天我顺道到越南人办事处，他们告知已发现莱特居住的酒店并在当晚进行秘密监视，不过莱特并未回返酒店。他笑着说道："他可能已找到同伴。"

在回返马来亚前几天，我会见泰共同僚——总书记李启新，并向他告别。当我提起莱特事件时，李以华语平静地回答道："他已不在人间。"我要求他详细说明这点，不过李礼貌地拒绝。我是在三年后才知道莱特已去世的整个真相。1950 年，一支马共代表团抵达北京会见泰共的高级干部。其中一名成员是当年被派遣在事发的上午在接头点会见莱特的年轻组员。

多年后我也了解到，莱特被干掉不久后，英国情报部的报告指出一名非常高级的政治部官员从新加坡飞到曼谷，出席与莱特事先安排的会面。该名官员根据一项情报，来警告莱特，他正被一名马共高级党员到处跟踪。有关情报很准确。显然，英国人差点就成功了，不过还是功败垂成。该名官员回返新加坡报告说莱特并未在约会地点现身。

坦白说，我对处理莱特的方式感到失望。基于我当时在曼谷，我倒希望能在莱特被干掉之前亲自面对他。我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取很多情报。一般上，当我们扣留叛徒时，我们生擒他迫使他透露情报。以莱特案件来说，塞住他的口就能让他停止说话。他们动用过多的暴力对付一个虚弱的人。泰共起初不愿透露此事的详情，也许过于笨拙的行动令他们感到尴尬。

莱特被干掉后，我乘搭火车回返槟城并在岳母家过夜。我拨电给住在实兆远母亲家的太太。8 月，当我不在时，坤华诞下男婴。我是那么渴望见到她俩。我的哥哥文荣接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即刻高兴地叫到："你被封赐一个很高的英国勋衔。英王封你 OBE。"

我想哥哥必定是在开玩笑，因而脱口而出："英王给我什么？"我并不知道什么是 OBE—大英帝国勋章，文荣看来也不知道。

我随后与太太交谈，问及儿子的情况。放下电话后我开始思索。我刚刚完成抵销也许是英国皇家政府在远东最成功的间谍行动的任务返家。我确保他们的首要间谍被消灭。可是英国却选择颁我一个特别高的勋章。这真的讲不通。

隔天我乘火车下到怡保，文荣愉快地在车站迎接我。当天傍晚，一名叔叔带我到怡保一家西餐馆用餐。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提及 OBE 的事，不过他选择的餐厅说明了这点。我的勋章对家人来说很特别，它可以用来反击长久以来环绕在我身上的争议。

第二天文荣与我驾车到实兆远，我与太太、儿子及父母团聚。我刚好赶得上儿子的弥月送红鸡蛋庆典。

我在实兆远写信给杨果通知他我将与家人一起住几天。他回信表示接受这项安排，并恭贺我获颁勋章。我与家人团聚约一个星期后驾车到吉隆坡，并向党汇报我在曼谷及香港的行程。我与杨果私下会面，亲自告诉他莱特已被除去。我尽可能向这位朋友提供最多的消息。

等待我抵达吉隆坡的是英国当局通知我受封 OBE 的信。这封信已在我不在时被拆开，办事处里的每个人皆知道此事。我在日军投降后不久也接获类似的信，伦敦陆军部在信中表示，基于我在被占领的马来亚参与东南亚司令部的活动，我在战报中受到表扬。

我对受封 OBE 的事感到犹豫不决。当时我们有两名会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在党内为我们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双月刊《民主报》。一名是葡萄牙后裔欧亚混血儿杰拉尔迪克鲁兹（Gerald de Cruz）。我接触迪克鲁兹听取他的意见，如何处理我的 OBE。

迪克鲁兹是本地人，拥有令人感兴趣，即使是不寻常的背景。在日军占据时期，他被带到西贡并在日本电台当广播员。日军投降后，他回到新加坡并接触我们的总部。他表示欲为我们工作。我们正缺乏会说好的英语的人。他很坦白地相告与日本人工作的事及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受雇于日本人。莱特是在 1945 年底接受他入党。在紧急状态初期，迪克鲁兹失踪了，并在捷克出现。他必定对在布拉格所见到的情况感到理想破灭。他随后移居英国，接着回返新加坡，并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工作。

我告诉迪克鲁兹，我倾向于回复接受勋章。他劝告我等待英国人做跟进行动。他表示最高专员署将会通知我颁发勋章仪式在何时举行。我听从他的劝告

并搁置此事。英国人显然认为这是我不理睬他们的表示。相反的，如果我有意拒绝，我将会即刻写信通知他们。无论如何，颁发者不久后就改变主意。他们处在一个奇怪的处境，需要取回我从未正式表明接受的勋章。

搁置 OBE 事件后，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需急于处理的问题，重振马共的组织与士气。我的最基本工作是及时向全党解释及传达莱特事件。

政治局决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我们通知州委，并由州委传达给区委，再一层一层地传达下去给所有党员。这是个耗时多个月的程序，我们也以此获取回馈。直至 1947 年 12 月我们才收齐回馈，并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制定马共政策，以符合时代的要求。

西方历史学家断言我在这段马来亚历史时期，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鼓动武装斗争。这是全然歪曲事实。他们是根据情报单位的报告，指马共分裂成“鹰派”及“鸽派”而得出这种错误想法。当然我也被历史学家描绘为鹰派头子。

从曼谷回返挑起党最高职务，我发现自己成为马共不受争议的领袖。我得以发出任何合理的指示，包括号召武装斗争，并有信心能够获得支持。我承认莱特在 1945 年 8 月改变政策转向与英国合作令我身心交瘁。然而，正如我所说明，我理性地面对这个课题，并努力地工作，把组织群众及以和平的政治鼓动作为我们的努力的奠基石。

我已是总书记，无论是我或任何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有需要转移我们的工作重点。事实上，由莱特倡议的 1945 年 8 月宣言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马共控制了全马及新加坡的劳工组织。我们的政治影响力及追随者从未那么强大过。我们不仅没有鼓吹武装斗争，我与政治局及中委会仅决定加强我们所走的政治路线。我认为，它只需要些微的调整。

这并不表示我们拒绝武装斗争。我们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保存森林的武器贮存库。然而在 1947 年最后几个星期，我们预估被迫展开游击战争之前，我们会有 8 至 10 年的准备期。我们的脑海中并未有急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念头。

第十三章
被迫发动武装革命

194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晚上，42 岁的蒲莱山胶园经理，尼科尔森（Archibald 'Archie' Nicolson）在妻子的陪同下，驾着一辆喜临门轿车，沿着柔佛州西南方向的士古來一笨珍路，赶着回家。这对夫妇刚在新山和“柔南县种植园协会”主席博伊德（A. J. Boyd）及其夫人共进过晚餐。

大约在 10 点左右，就在尼科尔森正要转过第 14 个里程碑两个弯的时候，大路两边都是橡胶树。他车的大灯照亮了前面 50 码外一个粗制滥造的路障：一棵橡胶树桐和三块木板横放在路上，只留下两边长满青草的狭窄空隙。

尼科尔森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这年头，整个柔佛州的盗匪活动率急速上升，私会党也在横行霸道，近乎消遥法外。罪案日愈增加，可以说，警方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突然出现的危境中，尼科尔森得当机立断，为自己和妻子作出抉择。于是，他决定闪过路障，想从树桐左端的空间沖过去。但是，他失败了，因为车右前轮陷入软泥中。

车子失去控制，被抛向车轮着地的路右边，忽然又猛烈地沖向左边。车子跟着打滑，滚向右边，终于掉落到路边不太深的沟渠里。

失去控制的车子不断旋转。尼科尔森的头部猛烈撞击车子的内部，他立即气绝身亡。

四个蒙面人走向四轮朝天的汽车。种植园主的妻子“梅”失魂落魄地躺在毁

一个令人辛酸的历史标志－将在城市发展的名义下永远地消失。在新加坡比达达利坟场被人忽略的阿奇傅尔德‘阿奇’尼可尔森的墓碑。在 1947 年 10 月，它成为马来亚外国种植人社群的反共吸引力。齐集在这块坟墓前出席葬礼的种植人誓言向马共报复。然而，如果人们了解事实，尼可尔森是死于土匪手下，非被马共游击队杀害。

碑文写着：

永远地怀念我亲爱的丈夫阿奇傅尔德‘阿奇’尼可尔森，他在 1947 年 10 月 6 日被杀害，时年 42 岁。永恒的爱，无限的悲伤。

坏不堪的车内。其中一人从她的手腕上，强行剥下金手表。不过，她并没有受伤。

持着轻机关枪的另一名匪徒，命令尼科尔森夫人交出镶着单独一粒鉆石的结婚戒指。她一口拒绝。结果，她的头部遭到轻机关枪柄敲破。幸好，她还能够渡过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这事件发生的 30 分钟前，有两名计程车司机，遇到这个路障時，没冒险沖过路障，而选择停车。他们只损失了一点小钱，却得以安然无恙地离开那个地方。

第一辆计程车车上，没有顾客。第二辆计程车，匪徒抢了一个印度人身上的 20 元，和一名马來兵团的前士兵的 70 元。同在第二辆计程车的搭客中，有一名华籍妇女和她的孩子，什么都没损失。这位母亲很机警地把她的 100 元藏在车座下。司机连同所有的搭客都被释放了，大家都安然无恙。

看來，当天晚上在士古來－笨珍路上，尼科尔森作了錯误的抉择。他是來自斯凯（Skye）岛的苏格兰人，自 20 年代尾开始，他就在马來亚当种植园主。他曾经是新加坡樟宜监牢的囚犯。他也是服役于臭名昭彰的泰缅死亡铁路的生还者之一。

从某个角度來看，那是一个无谓的牺牲，原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接下來的几个星期，尼科尔森的不幸遭遇，却成了白种人种植园主们情绪上的凝集点。这也导致了外国人种植业、矿业与商业界，同新马殖民政府之间的政治两极化。

从马共的角度來看，这次的政治两极化对殖民政府形成了一种压力，导致殖民政府从 1947 年末到 1948 上半年，在各方面骤然采取强硬的态度。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直接受到这种发展的影响的人士当中，党是最迟作出反应的。

当然，我们很了解，1947 年的一整年，工业不安宁的趋势日愈紧张。在新马两地，总共爆发了 300 次工潮。我们完全不否认，在这期间，罢工行动造成了 70 万人日的损失，导致马來半岛的胶园和锡矿场，以及港口來往商船运输，遭受严重破坏。毕竟，我们是这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支持者。在这期间，外国商业头子多次向政府首长陈情，要求采取紧急补救措施。

沒有一个高级行政长官，尤其是马来亚联邦总督，爱德华甄特爵士会以过

分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越来越严重的事态。从总督开始，上下一致的态度是，必须坚决而谨慎地使用专横权力，不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工人，将作出剧烈的反应。还有，甄特对外国人的群体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厌恶感，因为他认为，他们太过顽固，执意要恢复战前殖民地时代，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

在马来亚，英国人对总督的办事能力向来持有怀疑态度。不久，这种怀疑态度演变成了极端仇视的心理。这种演变最终注定了他极其悲惨的命运。他颁布紧急状态不到三个星期，就发生了事件。

我们只要阅读当时的本地报章，就能明白总督所面对的外国人问题。但是，我们所毫不知情的是另一个日愈擴大的裂痕，那就是，马来亚政治部和警察总监兰沃西（H Langworthy）所管辖的正规警察部队之间的裂痕。

从政治部方面来说，他们要总督大事逮捕身份已公开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在整个半岛的城镇中进行活动，政治部会提出这样的忠告，那是因为根据他们的估计，马共有能力号召 5 千人的武装游击队和获得 25 万人的民运队的支持。

警察总监则向总督上报说，在他看来，政治部在夸大其词。看来，至少在 1947 年的大半段时间，甄特较倾向于接受没那么夸张的警方顾问的指导。

尼科尔森的棺木还没放入新加坡比达达利（Bidadari）墳场的墓穴以前，他的种植业的同道就已经在计划进行一场冷酷无情的煽动。在尼科尔森发生意外事件那个晚上，和他们夫妇共进晚餐的种植园主协会的负责人博伊德打头阵。

“别着急”，他告诉记者说，“肯定会有行动的”。他们一伙人已立即向马来亚联邦政府投诉，要求政府立刻采取步骤，遏阻柔佛州境内的犯罪和土匪活动。

即使在墓地，很少人谈起尼科尔森的身世，以及大家失去一位朋友的事。其实，50 多名前来所谓吊丧的种植园主，更关心的似乎是，尼科尔森的死，对他们个人在马来亚种植业的将来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一人预测：“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变化。”另一人说：“我再也不想把我的妻子留在世界的这个角落。”第三个人则威胁说：“如果再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我就会离开这里。”第四个人说：“我们连自卫的武器都没有。但我们手上若有武器的话，我们至少得坐牢。”这些人在墳墓旁所做的评语，都显著地刊登在 10 月 8 日《海峡时报》的头版。

九天后，总督接见了“马来亚种植协会联合会”（United Planting Association of Malaya）和“种植园主协会”（Incorporated Society of Planters）代表。总督答应，住在边远地区的所有种植园主，都可以拥有持枪执照。甄特也答应，在危险区，军方将同警方合作，加强巡逻。他们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没有间断过。

10 月 20 日，这天所举行的罢市非常成功。（罢市的概念，取自印度所爆发的总罢工，目的在于停止所有的商业活动，长达 24 小时。）号召罢市，目的是为了抗议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的宪法建议。组织这场罢市的是中华商会、职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和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AMCJA）。

我们马共对罢市给予坚决的支持，并在幕后工作，以确保取得优良成果。24 小时罢市前夕，大总督麦唐纳在马来亚电台的特别广播中，对举行罢市的想法冷嘲热讽。

“不论公众反应大或小－不要被误导而认为，他们代表着关于宪制问题的广大和统一的舆论。他们并不代表什么。”大总督在罢市开始前几个小时，向新马两地发表这样的谈话。

結果，罢市那天，整个新加坡的商业活动完全停止。全岛非白人的商行停止营业，市中心的街道空无一人。马来亚所有大小城市，情况也是如此。所有胶园和矿场都被闲置。

马来亚的主要港口，瑞天咸港口（现已改称“巴生港口”）见不到一个港口劳工和装卸工人。在码头的五艘商船，预定的工作不能完成。国家主要的煤矿场－煤炭山（Batu Arang），所有 2 千名劳工，宣布放假一天。

第二天《海峡时报》头版刊登的新闻指出，罢市主要是恐惧心理所造成的。新闻报道说，那些参与罢市的人受到威胁，害怕被对付而不得不参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同一份报章的社论却这么评述：“新加坡呈现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关门不做生意的商店，多到长达数英里，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辆通行。负责组织罢市的人，工作的确做得不錯。”

这份报纸的同一篇社论留意到，“昨天，新加坡沒发生明目张胆的威胁事件。肯定也沒有因为发生无赖行为而需要劳驾警方干预。街道是平静的；人民是和平的。”

显然，预言当天会有重重危机的麦唐纳，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新马两地

政府得重新认真估计和平抗议所产生的课题。经过检讨，有一点是明显的：在公民权等问题上，英国人将不会让步。

对罢市这个事件，历史上有一个饶有趣味的侧面记载。罢市抗议事件的主要发起人，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原本是在 1946 年 12 月成立的联合行动理事会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CJA)。原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阵线的运动，反对建议中的马來亚联合邦宪法。在这之前，马来亚联邦计划惨遭失败。英国人试图推行马來亚联合邦的建议。我们马共虽然同情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但是决定不直接参与。中华商会也支持行动理事会的宗旨，但是也选择不正式参与。马來亚印度国大党（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正式成为行动理事会的成员。在新加坡，由非马來人左派人士组成的马來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MDU）也参与。著名的百万富翁，华人政治家兼商人，陈祯禄，以个人身份参加。马來左派政党－马來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 MNP)，担心被巫统打上亲华人的标签，所以沒参加。

具有左派思想的马來团体成立了一个平行的组织叫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PUTRA），人民力量中心则同行动理事会合作，草拟了一份人民宪法，以取代英国所提出的联合邦建议。1947 年 8 月，为罢市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期间，陈祯禄和布哈奴丁（Burhanudin）医生成为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AMCJA-PUTRA）所公认的两位领袖。行动理事会和属下团体则在这改组过的联合体旗帜下活动。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其实不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是，说他们是深受我们的影响，那可沒錯。曾经是马來亚民主同盟特出的成员，迪克鲁兹，这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在陈祯禄还未成为整个运动的联合领袖以前，作些说服的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迪克鲁兹终于说服举棋不定的陈祯禄，公开为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而奋斗，并且和他们并肩作战。迪克鲁兹这边廂则保证，他将发动左派舆论支持陈祯禄。我可以肯定地说，陈祯禄本身从來沒想到要成为马共的傀儡。但是，情形的确是这样发生的。

每个人都看到了，英国人是顽固不化的。本地民众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共身上，认为马共是新马两地唯一能够向帝国主义提出挑战的本土政治运动。殖民政府对我们的怀疑开始加深，并且，现在肯定把我们当作是他们利益的主要威胁。

《海峡时报》打头阵，在报章的新闻栏，再三暗示，所有跟罢工和示威有关的暴力事件，都是共产党所为。战后，捲土重來的殖民地主子对工人进行严重剥削。从英国军事统治时期开始，马共所组织的罢工和示威，都是基于工人的真正痛苦。

当我们在劳工战线上节节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和平示威队伍，到处受到破坏。他们通过特别的承包商提供劳工。承包商则雇用暴徒來威胁和粉碎我们的示威行动。英殖民政府不采取行动对付承包商和暴徒，而这些暴徒大都是私会党出身，这等于是默许他们采用强硬手段來对付我们的工会。人手不足而又颟顸无能的警方，也乐得放任这类事件的发生。

雇用暴徒进行威胁，长期以來成了我们要面对的日益恶化的问题。1947 年接近尾声的时候，这问题演变成一个重大的课题，因为许多资方和他们的劳工提供者普遍沿用这种措施。

一路來，我们都在展延采用类似的手段，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为了避免和暴徒正面沖突。我们担心掉入英国人的陷阱。马共领导层深信，我也认为这想法是对的，如果我们采用以牙还牙的手段，來反击暴徒的话，只能为政府制造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以压制和最终宣布我们的党非法。

1948 年 3 月，当我们决定采用自己的一套激烈手段的时候，这项决定给我们带來了严重的后果。

与此同时，大罢市显示，社会各阶层人士不分种族，对英国人在本区域所提倡的逐步民主化过程普遍失望。对群众來说，这民主化过程太过缓慢了，肯定是不够民主的，因为它迂回曲折地维护殖民主义者的利益。

尼科尔森事件刺激了种植园主们，使他们进入备战狀态，轻易地扩大他们对锡矿业和普通商家的影响。还有，暴力事件有增无減。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呢？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罪于共产党。政府行政官员自然很乐意这么做。亲政府的政客们也跟风。《海峡时报》早已这么做了。我们是最理想的代罪羔羊。

从莱特时代开始，党的主要考量，就是要摆脱英国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半合法地位。对于我作为党的新领袖來说，官方正式承认党为合法组织，是马共的基本目标。

我们讨论了达致这目标的最佳办法。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对我们私人住址放弃保密。我们设立公开办事处，我们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易于辨认，也方便我们和人民联络。

有一个时期，我实际上住在新加坡办事处。那个时候，我们正设法在奎因街的房屋设立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地址就在公教中学毗邻。

搬迁到新加坡去，实际上，比我们所想像的更艰难。1948 年 2 月，我们的总部仍留在吉隆坡吉宁街的马來亚抗日军旧办事处。尽管政府把负面的宣传强加在我们身上，其宣传伎俩包括无中生有地说，我们从莫斯科获取大量经济支援。事实上，党中央当时正面临财经困境。

为了协助解决这问题，我自己安排离开安邦路的独立式房子。自 1945 年尾开始，我和坤华一直都住在那里。后來，一名皇家空军中队长和他太太搬进來住。他给我 800 元“茶钱”。我乐得有这项安排，而那名空军中队长也不亦乐乎。我还记得，他太太特别感激我们把党配给这独立式房子的一架钢琴留下。我把 800 元交给党中央。这笔当时算來数目不小的钱，给我们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 * * * *

马來亚联合邦于 1948 年 2 月 1 日成立。在官方庆典前夕，我们在吉宁街总部举行事先安排好的政治局会议，以确定党对新政府的宪制进程所应采取的立场。从此以后，将由钦差大臣署治理马來亚。甄特的总督衔头则改为钦差大臣。

联合邦成立日当天，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我们听到英国的轰隆大炮声，伴随着甄特正式就任为马來亚第一任英国钦差大臣。

当大炮声停止后，现已取代陈勇成为政治局委员的阿电（他原本是陈勇的副手）向其他委员说：“我觉得我们已尽了我们的能力了。我们已利用各种和平手段來促进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实际上，整队种植业劳动大军都在我们控制之下。锡矿工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码头，公共交通公司，以及其他重要服务行业的情况也是一样。宪法在这一个时刻就要实施了。但是，我们对宪法的条文丝毫沒有一点影响。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运动还有什么前途呢?”

阿电在这时刻提出马共所面临的困境，那是最切合时宜的了。的确，和平的宪制斗争有什么用呢？当时，我主持会议。我说：“那好，既然你提出了这个课题，我们就讨论吧。看看在座的各位，有什么话要说。”

当时，我还沒完全决定，要采取哪一种特定的行动。肯定的是，我心里暗中感到气愤，因为我觉得英国人实施联合邦计划，太过草率。显然，党必须想出一个应对这新环境的政策。不过，我很想听听政治局内部的看法。

武装斗争的课题被提出來了。接着，就进行一场冗长的讨论。虽然沒达致什么结论。但经过讨论，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一点，即在这时刻，我党在财经等各方面，沒有能力展开游击战争。过了不久，我迁移到新加坡，在奎因街办事处办事。

我抵达新加坡沒几天，澳洲共产党总秘书，劳伦斯夏基（Laurence Sharkey）在前往加尔各答（Calcutta）参加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路经新加坡而在此处逗留。根据行程，他得在新加坡換船只，因而有两天的空档。于是，他到我党奎因街办事处來进行兄弟党联系。

他的來头不小，他是新南威尔斯中部奥兰治县(District of Orange)农场小园主的儿子。1922 年，他参加了澳共，很快就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 年，在莫斯科，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

我和夏基交谈了几个小时，谈的都是一般的课题。当他正想回莱佛士酒店时，我问他是否能在他回程中路经新加坡时，抽空给我们汇报一下加尔各答会议的情形。我解释我党沒被邀参加这个会议，也许是因为，根据国际共产党的标准，我们党仍然是一个年青的党。夏基乐意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有预感，加尔各答可能会产生某种戏剧性的結果。那之前，我曾阅读到苏联《真理报》评论员的谈话，公开攻击印度领袖尼赫鲁（Pandit Nehru）的政策，指责尼赫鲁和他的国大党向英国人妥协。我肯定，《真理报》的评论会刺激印度共产党采取新的方向。

3 月间，我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和平与宪制政治活动，或者应该恢复武装斗争。会议还在进行中，澳共领袖从印度回來了。我邀请他出席了我们的其中一个会议。

夏基对加尔各答大会的情况作了报告。显而易见，该大会的确作了明确的决定。从此以后，印共将攻击尼赫鲁的国大党出卖印度国家利益，向英国人妥协。

不过，这个决定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不可公开提到武装斗争。

我把它的含义解释为：虽然他们不愿公开谈起，但是，印共肯定已把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这次的诠释相当准确。

印共在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省进行起义，但是，最后被军队镇压下去。印度的局势发展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吗？我认为会。然而，对于在印度发生的事件，一些中央委员看不到我所能看到的含义。

夏基报告完毕，就问我们是否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有一两个人要求夏基，就加尔各答大会的召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何影响，作些澄清。他的答案很直接，很一般，没什么惊人之处。后來，有一位负责工会事务的中央委员向我们的贵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问题的答案我们已找了几个月。他问："同志，你们澳洲人如何对付破坏罢工者？"

长期以來，我们都在注意澳洲采取长期工业行动的新闻报道。我们感到惊奇，罢工工人如何能连续坚持数月。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澳洲码头工人如何一口拒绝为荷属东印度搬运货物，而在不断的罢工行动中，屡次使所有和贸易有关的船只，动弹不得，而取得非凡胜利。

月初，《海峡时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共产党已侵入昆士兰州"的头条新闻。州总理在布里斯本市宣布"紧急狀态"，并在宪报公布"严格检查报章和电台的罢工新闻"。2 万 3 千铁路工人拒绝工作，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码头工人与海员工会"指示他们的工会成员进行同情罢工。

新闻继续报道说：布里斯本海港现在已瘫痪了。19 艘船只被闲置。其他所有的昆士兰海港也将完全瘫痪，这似乎已成定局。"州总理汉隆（Hanlon）宣称："共产党最高司令部已侵入昆士兰"。

这一切辉煌发展，令我们神往，而有关负责人就在我们面前，正要给我们提供他的丰富知识和经验。首先是他的组织天才。我们都知道澳共在 1940-1942 年间被宣布为非法。夏基不单是保留了这个被宣布为非法运动的控制权，同时，实际上领导它取回合法的地位，并且还增加了党员人数。我们为了能请來这么一位贵宾而感到荣幸。

大会热切地等待着夏基对破坏罢工者的看法，以及他的党如何对付这些人。当问题提出來的时候（原本是用华语提的，然后翻译成英语），夏基靠向他的椅

背。停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桌前一排的亚洲面孔，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把他们干掉"。

有一名讲英语的同志紧跟着说了话。他还以为听錯了这句夏基用很重的澳语口音，慢吞吞地讲出來的话。"同志，你的意思是说，你把他们消灭掉…杀掉？"

夏基慎重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不过，不是在城市里。只在城市边沿地区。乡村地区、锡矿场一带。"

等到这些话翻译出來的时候，夏基的言论在与会者中鼓起一股高涨的情绪。

我要澄清的是，夏基在向我党中央委员会谈话的时候，从未特地鼓励我们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但是，他所说的话所产生的整体效应，是关键性的。

夏基离开会场，步行回莱佛士酒店时，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向澳共领袖提出问题的同一个人，交出了一份法案的草案。这法案是马來亚联合邦所建议的，旨在限制我们工会的权力。

在政府印刷馆工作的一名印度工友，偷偷拿了一份法案草案交给工会负责人。那位工会负责人是一名马共党员。他把法案草案转交给一名党中委。这法案是在吉隆坡印刷的，将在联合邦立法议会中讨论后，最终通过。

我们很了解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态度。提出來讨论的法案几乎都会通过。只有几项法案的辩论，能受到既得利益者（如种植园主组织和锡矿业主集团等）的影响，而得以修改。本地普通市民对修改法案，是沒有影响力的。

那份偷來的文件，在大会上宣读了。对所有出席会议者來说，显而易见，这项立法，不仅限制工会的权力，同时也势必剥夺马共领导工会运动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预见，下一个步骤，必然是全面禁止我党的活动。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万一党被禁止活动，我们将沒有选择，而必须进行战斗。后來，所偷取的文件所叙述的法律，未经修改就一字不漏地通过了。

如果事先我们不知道有这么一项法案，法案一旦宣布，我们会乱成一团。我们肯定无法立即召开政策会议，以采取对策。即使有了对策，那也肯定是太迟了。应该明白，当时，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承认，我们对运动还很陌生。我们希望党外有人能为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向澳洲、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中国"取经"。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知识方面，比我们丰富得多很多。

关于印共党内最新发展的新闻，肯定会产生影响。劳伦斯夏基的到访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偷取的文件暴露了一份影响深遠的法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沒有选择而不得不坚持原则进行战争。这个课题已辩论过了，每位出席会议者都有机会发言。每个人似乎都同意重返森林去打游击的原则。不过，大家都把它当作是“原则上”的决定。至于时间和付诸施实等复杂的细节，以后才处理。

作为主持会议者，我问大家，是否有人对这动议持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沒有人表示不同意。于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致通过的决定。

我们的讨论会，很自然地转移到预测我们的反英战争将维持多久。有一两位说两、三年。另一位认为会更长。我则预测可能会延续至少十年。

后來，又对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作了一般探讨。大家大体上同意，战争可能同日治时期所采取的路线相似。所以，战争会打得很凌乱，至少头一年是如此，可能是一州又一州地进行。州委联合军事指挥员，决定日常的行动，发出命令，独立工作，就像我们在日治时期所做的那样。我的看法是，在这个阶段，我相信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毛泽东所提倡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传统游击战术。对于这点，沒人反对。

当会议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出席会议者之中，有人坚决要采取强硬政策路线对付破坏罢工者。这是因为受到劳伦斯夏基的话鼓舞所致。他们最关注的是劳工承包商雇用來的暴徒。这些人一心一意要破坏我们在整个半岛的种植业和锡矿业的工会工作。

因此，我们同意发出指示，在马來亚乡村地区，把破坏罢工者和利用暴徒破坏罢工的承包商作为消灭的对象。这个行动当然是受到我们澳洲同志所采用的手段的影响。是他告诉我们采用这种手段的。

因为这项指示可能引起严重反响，所以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相信沿着这条路线所发生的事。中央委员会是授权和起草指示的组织。文件是写给各州委书记，要他们传达给州委员会。我们的原意是这项指示要传达到区委级，在区委级给予充分解释。

我相信我们在起草指示方面，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误：在指示中，沒有交代清楚要消灭的对象。还有其他的錯误。这意味着在监督方面，过于疏忽。当指

示传达到下线的时候，他们对指示作出各自的诠释。根据这些诠释，他们采取了不应该采取的行动。

当这最为决定性的会议终于在 1948 年 3 月 21 日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步行到我在新加坡奎因街同一个建筑物的办事处。当时，我因同志们表达了一致的看法而受到万分鼓舞。

我刚刚坐在椅子上，杨果就走进房门。他好像有心事。我从他脸上表情看出他有点焦虑。当我问他有什么烦恼时，他回答说：“我还是不大肯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作好准备了？或许，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情况。”他接着表示怀疑，新马武装斗争的条件是否已成熟。困扰着他的不是策略问题本身，而在于我们展开武装斗争的时机是否适当。

这真气人。我一时失去了耐心。我说：“在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疑问呢？一切都已决定了，为什么现在才來找我？”杨果并沒坚持他的反对意见。在接下去的谈话中，他表示不再提起这件事。

但是，不久，我又听到另一个中央委员也怀有疑问。同样地，他不是在质疑应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而是在于选择的时间是否适当。两人终于接受我的看法，也就是，在奎因街会议中，已经达致共同协议，再來反复，因而使党的立场飘浮不定，那是毫无意义的。

新加坡会议结束后不久，我们召集各州的书记到吉隆坡來，好了解一下他们各人对武装斗争的反应。他们表示支持，意见也一致。我和阿电代表中央出席了会议。

我记得在会议开始阶段，我得了重病。我只待了几个小时，就不得不离开。阿电取代我主持会议。我患的是严重的胃部痉挛。我不能坐，不能躺。我不懂怎么办好，当时，我不知道，那是长期胃溃疡病痛的开始。胃溃疡往后在整个紧急狀态时期一直纠缠着我。

准备展开武装斗争的势头越來越猛。我担心英国情报局也许已渗透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一些决定可能已被当局所探悉。一想到这些，我们就加速我们的活动。5 月 5 日，我再次召开了中央会议，这次在柔北举行。出席会议者基本上就是上次出席新加坡会议的那一批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展开武装斗争。

我们决定一州一州地设立核心游击队。我们接着分析把他们送入森林营地

的最佳方法。我们也讨论要如何善于从森林里设立的贮藏处(或者，至少从英国人还未发现的贮藏处)，挖出武器和弹药，然后，把它们交到我们的游击队手中。我们制订关于在营寨进行军训的指示，并考虑我们的人长期在森林地带生存的问题。

根据一般估计，每州将先自行成立一两个游击分队作为核心。至于要组织一队或两队，以及每队的队员人数多少，主要看各州委员会的经济状况而定。实际上，每个州委员会必须支援自己的游击队活动。每支分队的队员人数介于20－30人之间，这要看他们所负起的任务而定。柔佛，雪兰莪，霹雳的州委员会，有经济能力组织两个分队。其他州只能先组织一支队伍而已。

与此同时，我们得计划如何把我们的公开干部。从各市镇和大城市撤退到乡村去。在日治时期，我们完全控制了森林周边的农村地区。干部们在村里为党工作，同时，当起农村的劳工。这样，他们就能掩饰他们真正的活动，而且可以帮忙村民。我们大多数在民间搞活动的人，就是隐藏和潜伏在这种环境里。

如果我们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心、报章和印刷馆等地方搞公开外围组织，我们则只保留基干的办事人员。我们的指示是，办事处只由一两个人操作，其他的人则避免露面，转入地下，躲开政府的镇压行动。

結果，我们估计錯误，以为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迴旋，到时英国人才会动手。我们还沒來得及讨论好游击战争的筹备工作，我们还原订8月在新山召开另一个会议。这是为了把计划最后定下來。我们预测，如果英国人决定向马共展开一致的镇压行动，最早的时间也要在9月。

万一我们对英国人的行动估计錯误，我们已商量好了一个有迴旋余地的计划。如果他们在这期间，向我们展开全面镇压措施，下一次会议将不在新山，而在我的总部举行。我们认为，彭亨州能提供最好的条件，方便我们集会。不只是因为它是沒有人烟的大森林区，而且地理位置也最理想，因为它就在马來亚半岛的中心。我要负起的任务就是：转移到彭亨州去，以便视察在那里建立起來的主要森林根据地。

第十四章
和丰——紧急狀态颁布——20秒钟脱险记

为了完成建立永久森林总部的任务，我不得不考虑为中央委员会筹款的事。各州委员会似乎有足够的经济來源，可以支持我们所设想的游击队活动。但是，中央委员会的资源已減少到1万元左右。要设立一个活动中心，那区区1万元是万万不足够的。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让我们高层政治和军事策划者进行活动和交流。我们希望，这样可以确保党的政策得以协调。我们确实有点天真，我们的筹备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但是，却还沒解决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要维持一个总部，首先必须为这总部安排好持续不断的经济來源。

刚在柔佛州举行了策划工作会议，我就想到一种快速的筹款办法，那就是恢复马共两年前和一位知名华人资本家合作的锡矿生意。显然，当我决定向那商人讨回他欠我们的一个不小的人情时，那实在是我沒有办法中想出的办法。我预算即刻加入资本2万元，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

那锡矿场位于金宝市以北约四英里处，锡矿业主是李东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继承了父亲的东发錫矿场。日本入侵以前，锡矿生意经营得相当成功。过后，由于我国经济停滞不前，东清宣告破产。日本投降后，他家庭急需现金來恢复生意。刚好那个时期，我们的州委员会因买卖树胶而突然富裕起來，所以正在寻找投资机会。

在日治年代，我和东清一家人有过密切的接触。当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时

候，他大哥在上海念工程系。不久，他大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游击战士。当中国共产党得知他是锡矿业主家庭中的大儿子时，就派他回马來亚來为祖国的党筹款。他在日本侵略马來亚前几个星期抵达金宝。由于无法潜回中国，他参加了我们的抗日运动，成为我们的游击队指挥员。

东清是他弟弟。不像其他兄弟姐妹，东清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当地学校念书，过后，他父亲替他安排婚事，然后把他送到中国去深造。他的新娘子则安排留在金宝。为此，她到处投诉。只要有人愿意听她诉苦，她都不厌其烦地讲述她的处境。与此同时，在中国，东清不注重学业，显然是在尽情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自命是个花花公子。尽管如此，我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日本入侵时期，他曾经是本地的一个防空袭民防员（Air Raid Personnel，ARP）。当其他大部分资本家正赶快逃离金宝，而英军正设法建立一个重要防卫据点，以抗拒日军进击时，东清站稳立场，选择不离开。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尽其所能协助防卫军。东清是个热心的资本家，而我则是一个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却成了相当好的朋友。

1946 年，由于我帮东清说话，所以霹雳州委员会同意党和锡矿公司合作。马共将资助 5 万元，使锡矿场恢复生产。公司则同意往后付给党一定比例的利润。因为党注入大量资金，工程师和锡矿工人很快就使机器重新操作。幸运的是，复工没几个星期，他们就寻获了极其丰富的锡矿藏量。一些党同志，后來知道了这件事，开我的玩笑说，我应该当场放弃政治，做起锡矿生意來！其实，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

由于我们注入现金，东清这次在一夜之间，又变得非常富有。但是，他并没遵守诺言和党分享锡矿场所得的利润。在战后的混乱局面中，我们正忙着应付眼前的问题，对于争取合理回报的工作，就暂时搁置在一旁。不过，我们在密切关注锡矿场生意的发展。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我们有几个党员是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这些同志按期给我们提供关于生意活动的信息。因此，我们对锡矿场的经济状况了若指掌。

当我们根据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和他摊牌的时候，东清一口否认锡矿场有盈利。他甚至向高级马共负责人出示一盘账目，來证明锡矿场的收支还无法平衡。当然，这些都是假账。我们得到情报，所以知道这盘账目是怎样做出來的，什么时候做出來的，以及为什么会做出來。经过我党施压后，东清不得不同意让两名党负责人参与锡矿场执行人员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代表还没來得及开始

工作，我们就得悉这个资本家在孤立他们，使他们不能参与公司日常的操作。

我后來接获关于东清不合作的全盘报告。想起他在最需要援助的时刻，我们如何信任他并助他一臂之力，他当时所采取的态度，确实令我感到惊讶万分。我决定，这个时候应跟他当面摊牌。1948 年，我和父母与家人回到实兆远过华人新年。当新年快过去的时候，我上金宝准备和我的所谓锡矿合伙人摊牌。这次摊牌是党事先安排好的。在爱克和另一名霹雳州马共负责人阿海陪同下，我拜访了东清。他仍然坚持公司没盈利。他出示窜改过的账目，想矇混过关。

经过一番游说，这个资本家终于承认，实际上，公司已经在赚钱，并且，从年中开始，有能力付给党 50%的净利。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在我们没离开以前，我已安排好在 6 月间回來领取第一期的利润分配。

* * * * *

按照事先的安排，6 月 12－13 日，我又在爱克和阿海同志的陪同下，到金宝去。为了安全起见，安顿爱克和阿海住在锡矿工人宿舍，离开东清住家一段距离。

我则不得不要到东清家作客。东清家是在金宝郊外，建立在山顶上一间宽阔的大洋房。为了党的需要，而钱又不能立刻到手，我不得不在这富裕的、生活悠闲的资本家家中等待。他看來还在凑钱，所以我暂时住在他的客房。我对这种安排感到不安。时间太紧迫了。我没有意思要逗留在霹雳州。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到柔北跟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其中一人是小章)会合。然后，跟他们一起到彭亨州去设立我们的总部。但是，这些钱对完成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也相当肯定，这次，东清一定会实踐他的诺言，交出钱來。

我极不耐烦地打量着东道主的游泳池。我坐在宽敞的客厅里看书。一批佣人走來走去，不停地在工作，琐碎的工作似乎做不完。

因无所事事而闷得慌，我不时漫无目的地在园地走走。园地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园地里有个私人的玫瑰花园。衔接洋房后面的道路，是一条大弧形的车道。车道绕过游泳池，穿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地，环境优美，再转到屋前的大门口。

这里的物质享受并没使我放松警惕。我过惯的马共地下生活以及经历过的游击队员的生活，令我对不熟悉的环境和可能出现的危机，保持高度敏感。

在这李家的洋房，6月16日，星期三，是个平静和相安无事的日子。早上我边喝咖啡，边看最新出版的《星洲日报》和《海峡时报》。新闻报道说，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前天已从中国回返新加坡。在南京，他曾和蒋介石委员长进行过一番讨论。

《海峡时报》头版头条新闻谈到英国“密切关注”仰光來的报告时说，缅甸在考虑转投苏联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曼谷通讯员只有八行字的新闻报道说：“这里的苏联使馆出版的第一份新闻简讯今天上市了。预期简讯每天出8版。不久，苏联的电影也将在这里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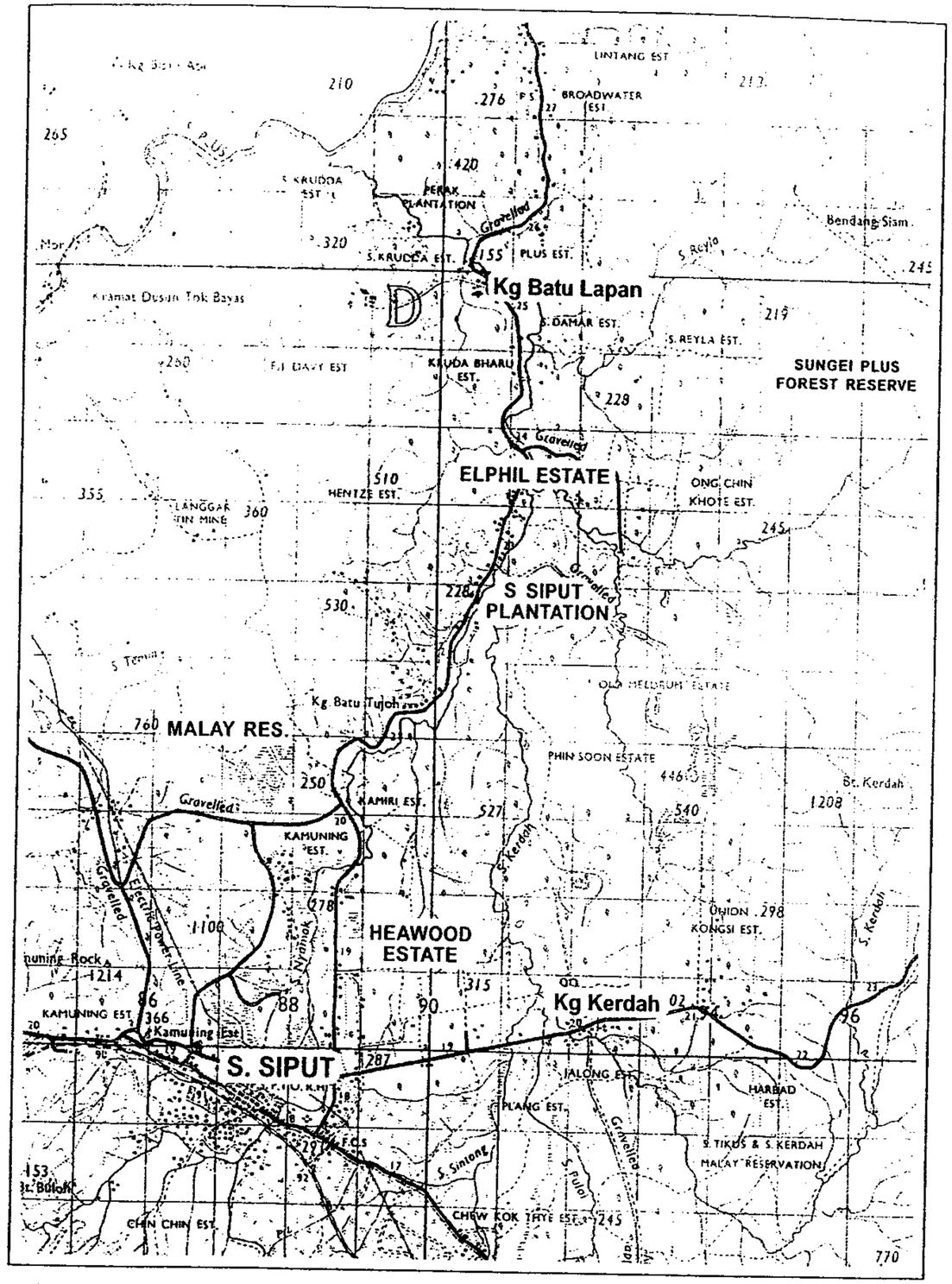
两份报纸，我从第一面看到最后一面。没有什么其他事做，我又一次独自留在那间大房子里，只有佣人在家。那天早上，东清离开前，向我保证，党那份利润不久就能到手。他说，当天傍晚，其实他已经安排好了一个重要会议，很可能会带钱回來。一整天，我都在希望早点离开那山顶上的住处。我万万没想到，后來我是在那样不寻常的情况下离开的！

当我期待在24小时内完成筹钱的任务的同时，我仔细思考过我延迟转移到彭亨州去的事，并且也考虑：到了那里，如何才是分配款项最好的方法。今后的任务是明确的。我必须在森林里启动一个据点。这样，我们前三个月所作的一切行动计划和决定，可以顺利地结合起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武装革命。

* * * * *

我全然不知的是，当我安祥地在东清家走廊籐制的躺椅上，认真思考问题的时候，几个党员在离开我坐的地方以北几乎不到40英里的地方，在干着一件坏透的事。

早上8点半，三位同志骑脚车到离开和丰约七英里，连登（Lintang）路雅菲园丘（Ephil Estate）的大门口。50岁的英籍胶园经理沃克（Arthur Walker），正埋头赶完他的文件工作。他曾经在樟宜监牢关了多年。他和妻子计划好，要在下星期启程返回英国渡假。那三位华人同志推开沃克的房门，其中一人用马來语向他打招呼：“先生，早上好”。正当沃克的爱犬向不速之客狂吠之际，这胶



当时的一张地图表明，在和丰以北的连登路边雅菲园丘与和丰园丘的位置。

园经理回应说："早安。"

顷刻之间，同志面对面向沃克开枪，子弹射穿沃克的头部和胸部。他们來得快，去也快，踏着脚车扬长而去。留下那位胶园经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的保险箱的锁匙就在他身边。奇怪的是，胶园的保险箱原封不动。

三十分钟过后，在沿着连登路走不到两英里的和丰胶园内，另一支游击队，总共约有12人，其中一人持有冲锋枪，攻打胶园总办事处。55岁的经理爱利生（John Allison）和21岁的副经理，克里斯琴（Ian Christian）正开始一天的工作。克里斯琴是一个前辜卡军团的军官，刚派到马来亚來。隔天，他正要调到甘丹园丘（Kantan Estate）去。甘丹园丘是在南下几英里，靠近怡保市。这名后起之秀的种植人将被调升为胶园代经理。

这第二次的袭击计划得更好，更周全，显然是为了配合对雅菲园丘的攻击。爱利生和克里斯琴两人手被反绑，立刻动弹不得。其中一个同志在爱利生身上找到了一串钥匙。他们打开两个保险箱，拿走了1千元现金。两名种植人仍旧被绑着双手，在办事处职员众目睽睽下，被押送到附近的独立式洋房。游击队员则在寻找武器。两人被押回到走廊上去。就在走廊上，又在工人众目睽睽下，两人各自被绑在椅子上，在冲锋枪扫射下处决了。

他们并没匆忙离去，而是从容地在胶园储藏室里搜找到煤油。他们把薰胶片的烟房整个泼上煤油。烟房里囤积了5万6千磅的胶片，已包装好准备要船运出国。同时，烟房还囤积了两吨还未包装的胶片。他们用一把火点燃了囤积的胶片，火势猛烈，升起一股浓烟。在还没骑脚车离开以前，前来攻打的游击队领袖，用马来语慢条斯理地告诉胶园书记主任："我们只是来对付破坏罢工的欧洲人。"

当地报章报道说，囤积的胶片被烧了36小时，过后其残余还在冒烟。

在攻打和丰的同一天，其他的马共除奸团也行动起来。他们在柔佛州新山以北15英里的士乃胶园，处决了一名国民党工头，也处决了霹雳州靠近太平市的胶园里的一名华人包工头。诚然，这些行动完全符合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们在新加坡发出这个指示，以对付破坏罢工者。

我个人总觉得，很对不起那年轻的胶园副经理克里斯琴。他还在实习期间，也刚到这个国家。不应该把他当作是一个曾经伤害过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沃克和爱利生两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有过一段不光采的历史。当时，工

人无法通过合法程序或其他方法，争取到任何形式的公正，只好采取罢工行动。为此，他们两人曾经对工人采取严厉和欺压的手段。只要得到殖民地政府及其贪污腐化的部门撑腰，只要当局对破坏罢工行动故作罔闻，这两名高级种植人就会继续采取高压手段，雇用暴徒破坏罢工行动。从当时的革命观点来看，杀害克里斯琴是不合理的。不过，对另外两人的死，我们没有异议。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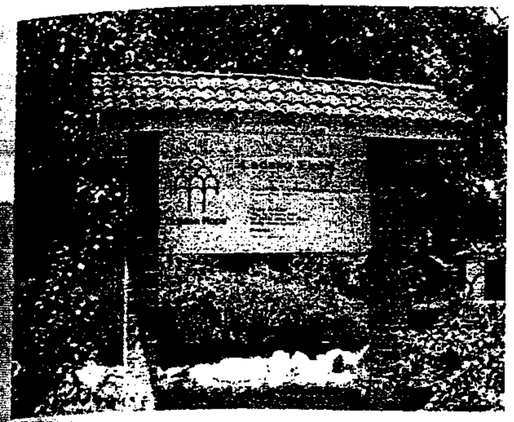
虽然我距离袭击和丰的地点只有40英里，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因为那天我在等待着东清回来。别忘了，那是1948年，还没有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亚洲新闻波道（Channel News Asia），互联网和即时新闻。如果马来亚电台当天有报道这事件的新闻，我是错过了这个广播。早些时候，东清回来吃晚餐，没提起什么。大约是6点半，他离去，准备出席他曾提起的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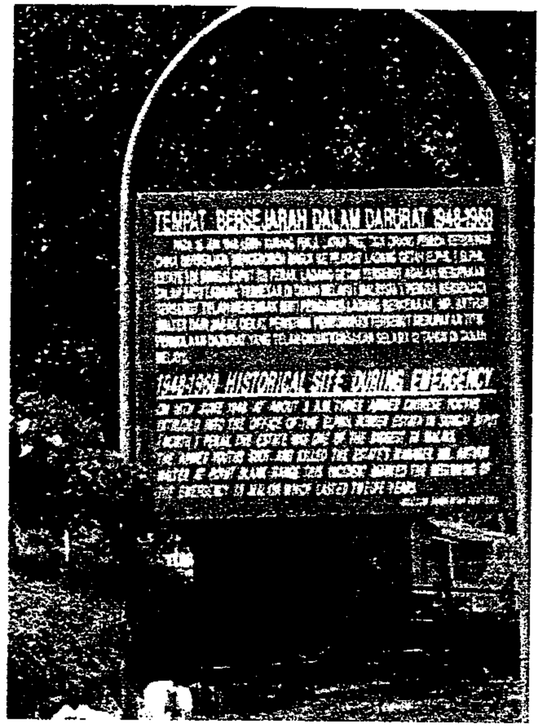
天还沒暗下來。那是一个宁静的热带夜晚。我在屋子的前房。我听到有车辆到來的隆隆声。车正在上陡直的斜坡，向屋后驶去。我细听那加快转速的引擎声。有两辆车，都是罗里。我警觉到可能是军队或警察，不可能是从錫矿场來的，因为錫矿场这个时候已收工了。我预感到危险。一刹那间，我想回客厅去收拾细软，我的护照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我从香港带回來的两套西服，原本想留在实兆远，却又忘了。

时间已來不及了。引擎声的转变告诉我，两辆罗里已到了屋后山丘的顶峰，正向洋楼大柵门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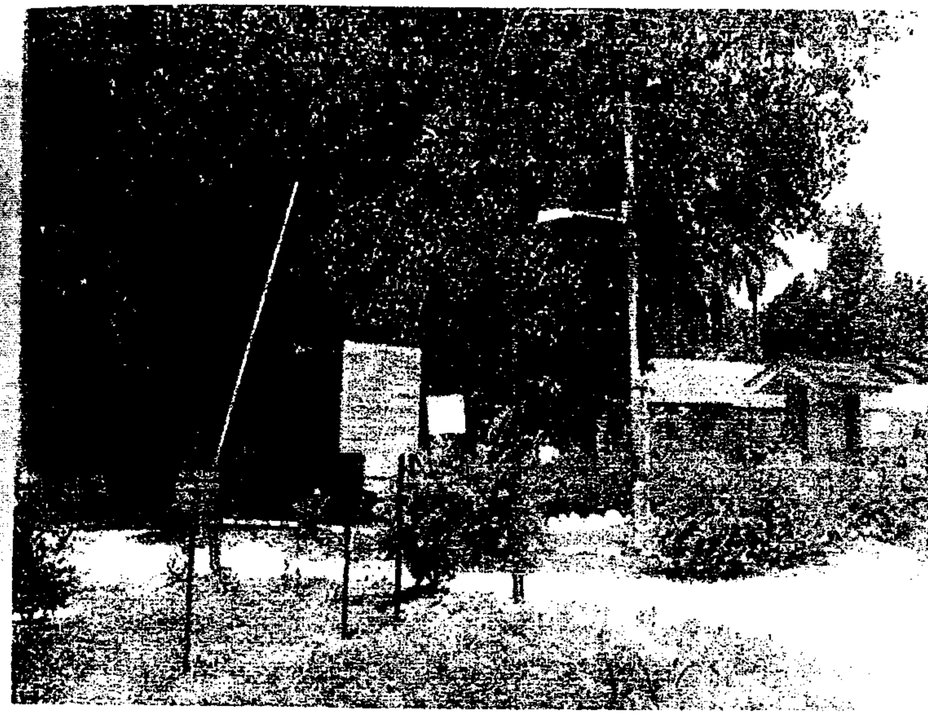
我沖到前门，越过走廊，再越过车道，立刻躲到对面的灌木丛的一个角落。从那里，我回头看，车辆的两对小灯从大柵门转入车道。那无疑是警察。我仍隐藏在灌木丛后，看到罗里停在大门口。两名欧籍警官从车头下來。一批马來警察则从帆布盖着的罗里后半部，跌跌撞撞地匆忙下车。每个人都沖进屋子里去。

在我背后，是玫瑰花园。过了玫瑰花园就是一堵有装饰的石墙。我蹑手蹑脚地穿过玫瑰花丛。在暗淡的光线下，我看到了一棵水翁树紧靠着那堵墙。我把握住机会，爬上那棵树，翻过墙，安全地落到墙的另一边去。翻过墙后，我发觉到前面地势崎岖。一堆堆起伏不平的錫矿矿渣。它无从让我隐敝。我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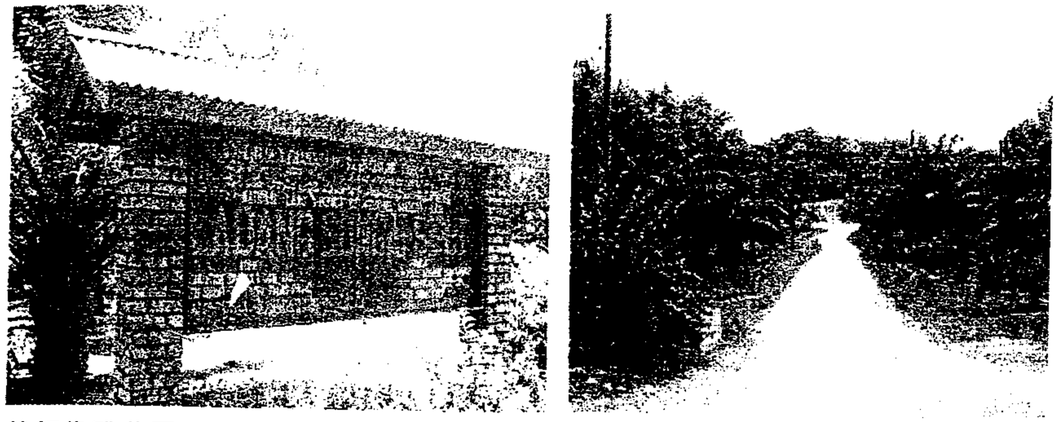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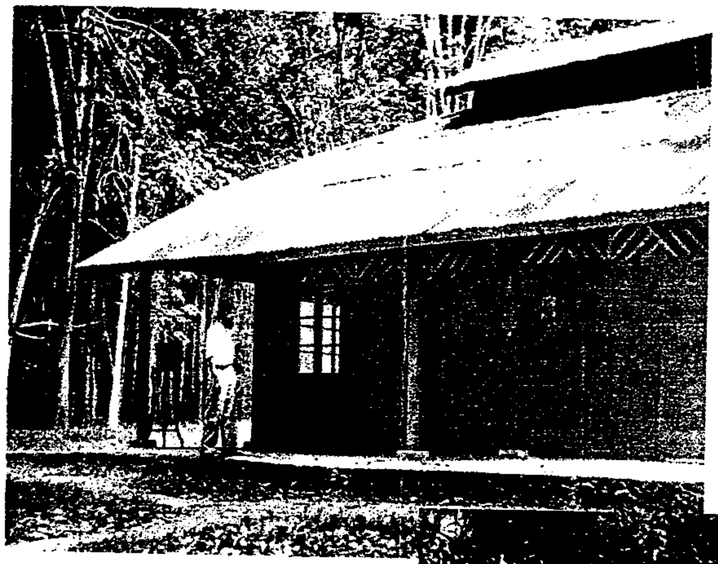
这是现在的雅菲园丘入口处，没多大变化。1948 年 6 月 16 日，三名武装同志，骑脚车到这里來进行袭击，导致英籍园丘经理沃克的死亡。匾牌上写着：这是个历史故址。



新的行政部就在沃克办事处旧址。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它非常靠近路边，在公司招牌的那一边。很明显的，这次的袭击，早上八点半开始，和 30 分钟后攻打和丰胶园互相配合。和丰胶园就在离此一英里半的连登路旁。



就好像雅菲园丘入口处一样，岁月的流逝几乎完全沒改变那条砂土路的模样。这砂土路通往现今的和丰园丘。当年，12 名意志坚强的同志，（其中一人怀着沖锋枪）骑着脚车沿着这条路，找他们相信是搞破坏罢工的园丘经理层算账。



（左图）和丰胶园旧办事处的建築物和走廊。來自英国的园丘经理爱利生和刚刚來马的 21 岁助理克里斯琴，被捆绑后，死在一阵沖锋枪的子弹下。

（右图）用木板和锌片建的旧办事处已被拆除，但仍保留混凝土地基。今天，它则方便职员停放摩哆车。旧地基的另一边是园丘的新行政部。小型巴士后面是重建的烟房。在 1948 年被袭击时，烟房给一把火烧了。

移动了一段距离。这个时候，天已黑了。黑暗笼罩着我，护卫着我。远处，我可以听到呼喝声、命令那些警察搜查整个洋房。

我决定等到天亮，才走下一步棋。我认识一个东清家退休的女家庭工，住在顺路不远的木屋里。如果我能到那边去，我就安全了。我相信她会帮忙我。

通过这名老妇女（她儿子在锡矿场工作），我不久得到消息，我的东道主，东清被抓了。我也确定了爱克和阿海，就像我一样，在警方搜查锡矿工人宿舍时，侥倖逃脱了。

阿海的妹妹是一个锡矿场的淘洗矿沙的女工。她前來告诉我，阿海和她另一个哥哥在怡保躲藏起來了。阿海留话说，我应该想办法和他在他隐匿处会合。我呆在老妇人的木屋的第二天，从《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上阅读到政府对和丰偷袭事件的迅速反应。在几小时之内，殖民政府在霹雳和柔佛州的好几个县宣布“紧急狀态”。

很明显，我的处境极其危险。报章报道说，和丰的突袭事件，表明马共已向英国人公开宣战。那是荒谬的，因为我的危险处境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

如果我作为马共领袖，在 1948 年 6 月 16 日，批准党向英国人宣战，那么，24 小时过后，我为什么要困在老妇人的木屋里呢？我侥倖刚逃脱一次搜捕行动。结果，我的护照被充公了。我完全和党的机关失却了联络。我单身只影，沒有警卫员，置身在进入紧急狀态的地区。

我唯一的生还机会，就是想办法到怡保重新和同志们联络上。我很幸运，有阿海的勇敢的妹妹自告奋勇來护送我。我们伪装成走访亲戚的一对年轻华人夫妇。但是，走在路上，我们要怎么样才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呢？看來沒有其他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于是，我们乘搭巴士，从金宝北上 25 英里到怡保去。

在旅途中，我亲眼看到了英国当局对民众如何施加管制。当巴士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靠近务边的时候，车突然停了下來。从车上往外望，我看到了警察检查站。穿制服的武装人员登上了巴士，从容地在通道上來回走着，查看搭客的面孔。我想起我的护照，是放在我香港西装的内袋。看來这次劫数难逃。我感到审查的时间，似乎特别长。我和同伴，尽量装得像一对正要回乡，和家人团聚的年青夫妇。那名警察觉得巴士车上沒有可疑人物，就命令司机开车，顿时令我们松了一口气。显然，我的护照，虽然贴有较新近的王文华的照片，

但是，这照片还沒和影中人的化名，陈平，衔接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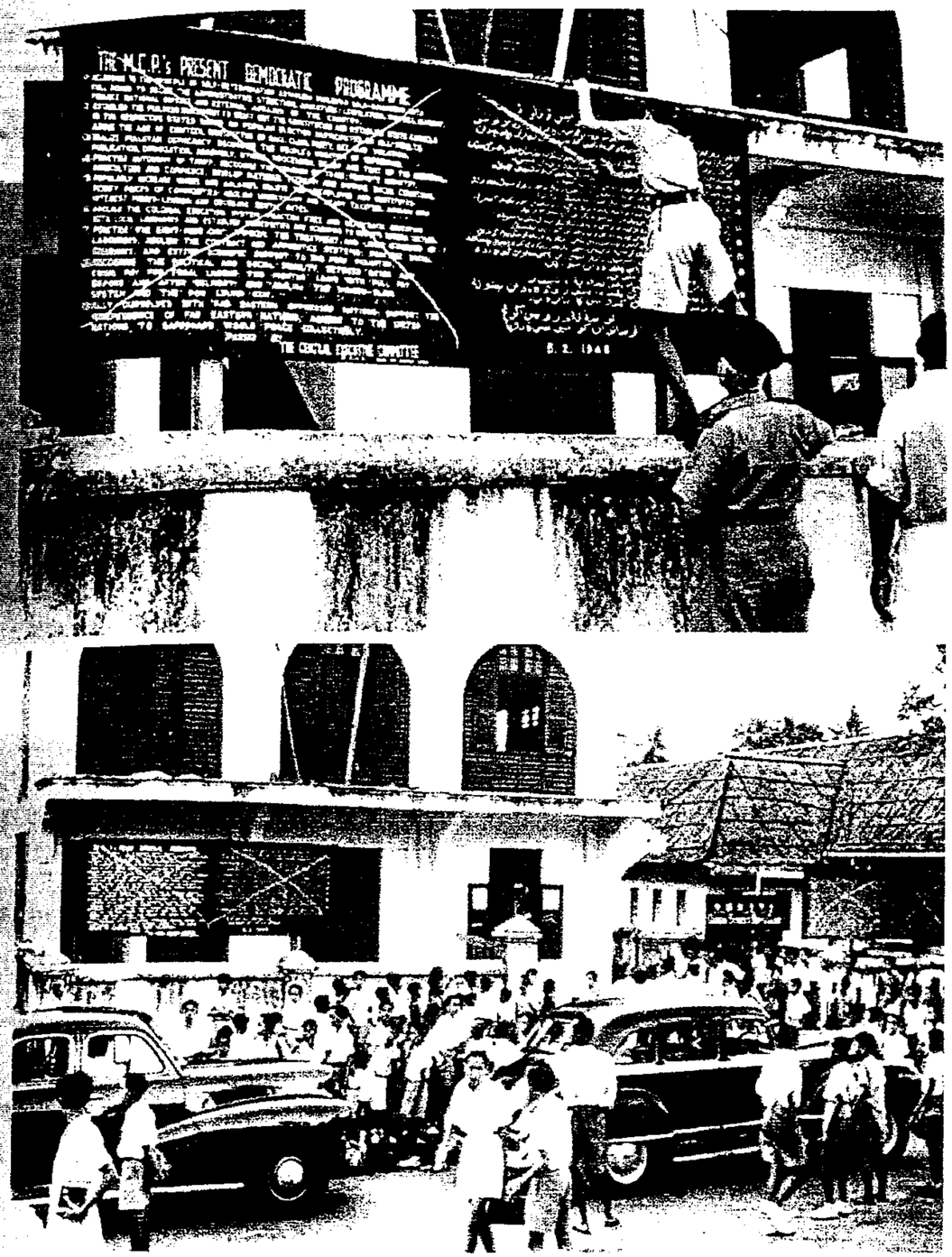
接下去的日子，我常幻想：一个聪明的年轻警察，在休息日，穿着我仅有的两件西装其中的一件，扬扬得意地在金宝市的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走着。除了这些幻想，我还希望，这年轻警察偷偷地把我的护照扔掉，把我的西装佔为己有。那天晚上，在锡矿业主的洋房里，我的细软被拿走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都无法查明真相。我曾经尝试了解真相。在 1980 年代末“和平谈判”的过程中，我问大马政治部代表，当局事后是否知道，在紧急狀态颁布后的头几个小时，他们几乎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也查问，是否有人辨认出我的护照，而我的护照后來的命运又是如何。可是，沒有人能够提供任何答案。他们似乎沒想到这些事件的重要意义。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是在同第二代的政治部官员谈话。

到了怡保，阿海的妹妹帮我联络她的两个兄弟，而他们俩又帮我同党内部重新联系上。我在市区边缘还未发展的地区的一个隐藏处住下來。自从逃离东清的洋房后，在这个地方我才有机会，进行分析和丰事件所激起的重大事态发展。

当地的日报成了我主要的信息來源，虽然不时有同志到访，给我带來了详细的消息和当地党委员会对消息的诠释。起初的有限度紧急狀态，擴展到了霹雳州和柔佛州各地。在 24 小时过后，在整个半岛强制施实。

我们各地的党办事处，和我们的日报《民声报》吉隆坡办事处都被搜查和封闭。当局紧急派遣特别的警察增援部队到整个霹雳州的战略性地点。他们一口咬定，和丰谋杀三名种植人的案件，是以某人为首的马共特定“除奸团”所干的。有人认出这名领袖是雷东台（译音）。为了确保霹雳州所有欧藉胶园经理能得到特别护卫，当局已采取一些措施。与此同时，当地警察的休假一律取消。在英国渡假的欧籍警官，也接获命令，立即飞返马來亚，回到岗位值班。

6 月 21 日，星期一，清晨 2 点，在整个半岛，警方展开联合搜捕行动，搜查房屋、胶园、锡矿场和办事处等被怀疑窝藏马共党员的地方。在搜寻的目标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设立在怡保澳斯本路（Osborne Road）的马來亚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它离开我躲藏处不远的地方。尽管这次警方的一致行动受到大事渲染，其成果似乎微不足道。我接获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胶园工作遭受严重破坏。被吓破了胆的种植人纷纷离职。园丘沒有经理，洋房无人居住等等。怡保的火车站酒店挤滿了胶园经理和他们的家眷。



紧急狀态颁布后，殖民地保安当局即刻采取行动，关闭新马两地马共所有的办事处，并停止他们的有关活动。以上的照片，是在警方关闭我们在新加坡奎因街的办事处时拍下的。这办事处就是我最后正式展开公开活动的“总部”。上面的照片显示，一名高级警官在指示年轻警察，涂污我们街边的告示牌。告示牌上写着的是我们所说的马共《民主纲领》。下面的照片显示，奎因街建築物被查封后，一群人聚集在那儿。

《海峡时报》怡保特派通讯员的一篇报导指出，在他称为“霹雳一战”中，马共旗开得胜。通讯员说，这场战争是一场神经战。报章都认为，马共的胜利，应归功于“共产党除奸团”。

当作历史的注脚，我要重述《海峡时报》头版和丰枪杀案的新闻旁边刊登的另一则报道。这则报道的标题是〈持枪歹徒的受害者〉。新闻列出了，从1948年5月初到6月16日这一段时间内，华人持枪歹徒在园丘所干下的工业和政治谋杀事件中的受害者名单和职业。除了一个园丘工人（他被人误认为是他当包工头的兄弟）被误杀以外，名单上其他九个被清算的，都是新加坡党指示下的指定对象。被指定的对象都是罢工破坏者，尤其是破坏罢工的包工头。

我重述这则新闻，不是为了自圆其说，而是为了证明，在这个斗争的阶段，我和中央委员会，都沒下命令杀害欧籍种植人。尽管当时和后來引起诸多猜疑，但是，在紧急狀态时期，马共从來沒列出要杀害的种植人的黑名单。其实，如果当时我有权决定一切的话，和丰射杀事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件会发生，那是因为当地的人过于热衷于报仇，并且严重缺乏州级领导的控制。

这些年來，学术界和历史学家都认为，起初，那些射杀事件使我们占尽优势。实际上，和丰事件的发生，是我们犯下的一个严重錯误。当时，我们正设法把我们的干部撤退到有良好组织的地下网络去，并且也要把我们的游击队伍，撤回到秘密的森林基地去。同时，我们正在巩固民运支持者同我们的重要联络。但是，这个部署却给他们破坏了。我们最基本的计划是：在进行武装起义以前，尽量为革命运动的平民和军事臂膀，创造自供自给的条件。我们完全预料到，英国人会先动手，对我们的运动展开大规模的镇压。然而，和丰事件使我们的队伍自供自给的计划，在战事爆发前落空了。从一开始，我们就被迫处于被动。要花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才能采取主动。

战争，就如生命一样，充满变数。有时，我在想：如果当时，在金宝那间洋房，搜捕队伍到來前，我沒早20秒钟离开，事情会如何发展。毫无疑问，我将经历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紧急狀态时期。相当肯定的是，英国人将把我送上绞刑架。也许，有许多人会猜想，如果事态真的这么发展，马共将崩溃，瓦解，紧急狀态很快就会結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只能说，王文华，化名陈平，消失了。我的副手，杨果，会取代我。武器在手，运动将会坚持下去。斗争也将会继续下去。

“作为起义行动的领袖，在这时刻，我还在怡保躲躲藏藏，既脱离了其他领导同志，也联络不到党中央的总部。日报成了我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战事报告來源。要天天发出指示，那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两个月，我们才建立起秘密情报传送系统。即使有了这个系统，也需要几个星期才能传达信息。”

第十五 章
峇冬加里屠杀事件和英国人的宣传

我们对设立根据地总部地点，作了许多考量，个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起初，我们曾考虑到要把总部设立在柔南某个地方，那是为了方便我们接近新加坡这个人口中心。但是，检验了所涉及的安全问题后，我们决定放弃这个想法。

我们又想把总部设立在柔北拉美士和昔加末之间的地区。这么决定，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总部移到彭亨州中部，那里偏远的大森林。结果，紧急状态一开始，局势就急速发展。这决定了我们在战争中的战略细节以及我们活动的中心枢纽位置。

我原有的计划是：从金宝市的资本家那里，收到了锡矿公司生意所得的利润后，就到拉美士召开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为转向武装斗争作好一切安排和指示。其实，我们一些主要负责人早已料到这些发展，因而事先已移到柔佛州的一个临时根基地。

原來，杨果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几乎和我一样，差点被捕，但总算侥幸脱险了。虽然，在这个阶段，他已长期移居到雪兰莪，但是，他在6月中，曾回到槟城见他妻子和刚出世不久的女儿。一听到和丰已宣布紧急状态，他觉得，最好离开乔治市（George Town）岳母的家，在附近躲藏起來。警方搜查他岳母家居，逮捕了杨果的妻子。后來，他妻子被驱逐到中国去。

杨果决定设法搭火车到雪兰莪去。他安然抵达吉隆坡后，就到安邦区重新和当地的同志取得联系。由于在日治时期以及在紧急状态前的几个月，他长时间

呆在吉隆坡，所以许多人都认识他这个人物，政治部就更不必说了。但是，他发觉到，在混乱的紧张时刻，他能相当自由地活动。

警方在初期虽然显得颟顸无能，但是，宣布紧急状态的头几天，他们计划和部属了两次大逮捕。我们认为，这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第一次大逮捕，我们很快就设法化解了。但是，第二次大逮捕给我们带來的严重后果，我们得面对它将近 10 年。

就在紧急状态前夕，30 岁的彭亨州委黄立被秘密扣留。他开始和英国人合作。当我们在讨论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时，他要求调到霹雳州去。在日治时期，黄立曾经在霹雳州布先(Pusing) 锡矿区担任抗日军领袖。正因为他曾经为抗日部队忠诚服务，所以他被提升为州委。黄立说，一旦展开抗英游击活动，他对布先区的了解，将对党很有好处。

我们批准他的要求，把他派到靠近布先的森林营地去。他抵达营地不久，营里的同志注意到黄立的举止有点古怪。不管他到哪里，他似乎都在画地图，做笔记，收集资讯。这令他的属下百思莫解。

我们可以理解同志们当时的处境。后來，同志们把心中的疑窦反映给负责该区的中央委员。

黄立开始受到观察。结果，他藏在衣服里，准备从营地送出去的情报被截获。他立即被逮捕，等候审判。他里通敌人的证据确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认罪。

以中央委员为首的森林法庭，判他罪名成立而处死，这名中央委员，就是接获关于被告举止怪异的投诉的领导人。黄立即刻被带走，过后被枪毙。这件事算是了结了。

英国早期逮捕的第二个人，给我们带來了更多的问题。紧急状态宣布不久，陈勇曾经是马共的高级负责人。我们已给了他第二次的改过机会。

他被政治部侦察员扣留。他很快就和他们合作。有好几年，陈勇是英国人控制下的最高级的马共党员。因为他曾经是州委，后來成为中央委员，甚至是 5 人政治局委员之一。现在，他却在协助英国人拷问被捕的同志。由于他对英国人很有利用价值，英国人安排给他固定的薪酬。除了负责拷问工作，他也被英国人利用來说服被捕的同志和政府合作，并成为政府的代理人。

陈勇的变节（这不久就成了事实）对我们來说，使情况变得恶劣。他的作

用远远不止于拷问工作，以及把被捕的同志转化为受薪的情报员。他能为英国人提供马共领导层心理状况的重要资料。并且，他对我们的个性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敌人对我们将來的政策和反应作出有价值的评估。这些可用來作为将來应变计划的根据。

我们这位政治局委员替政治部服务了将近 10 年。我错误判断了陈勇的性格。我过于重视他曾经是我的上级这一点。我误信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基本的忠诚。其实，我已意识到他为马共献身的精神已逐步消减了。不过，我仍然深信他还有自尊和强烈的道德观。

时间逐渐消磨了陈勇对政治部的利用价值。他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最后通过关系，探听到当局安排这叛徒和他家眷移居到澳洲。他和妻子，儿子与女儿在澳洲定居了。他还活着，用了一个化名，在墨尔本郊外居住。

* * * * *

5 月间，我们在柔北召开会议。在会议所产生的计划中，我们设想，我们的游击队将在 1948 年 9 月对准英国人的各个目标，展开大规模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测，近似紧急状态的局面将随后即刻出现。我们尤其看好，还有 3 个月（7 月至 9 月）的时间，准备干部的撤离，以及把我们的游击队分别被派到各个森林营地去。筹备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对我们建立森林游击队核心的总策划，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预测到，我们打响的第一砲将面对英国强烈的军事反应。不过，有了充分准备，我们有信心能够挫败敌人的反攻。我们的经验已证明革命战争理论的正确性，那就是，在决定进攻时间和地点方面，以及随后在采取行动的急缓方面，游击队伍将占尽战事优势。敌弱我攻，敌强我退，退到我们所熟悉的森林地区。因此，我们坚信，我们不但能够控制初期的战斗，而且也能扩大我们所占领的森林地带。

在策划阶段，我们大概有 3 千件武器随时可分配。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日本投降后的 3 年内，有几处主要的军火储藏库已经被英国人发现了。我们会损失掉这些军火储藏库，不是因为上级莱特的出卖，而是因为委托保管储藏军火的游击队员的出卖。我们发觉到在丁加奴、吉打北部、雪兰莪州的万挠和黑风

洞等地区，以及霹雳州的实兆远--带，众多军火被取走了。

由于我们的原意是，要在一州一州展开初级阶段的武装斗争，我们必须计划在 9 个不同地点同时进行武装起义。我们相信，在随后的混乱中，我们能够取得重要的初期战事优势。对我们來说，下一个阶段，我们的军队将再次采用一个全面的战略，森林里的两个基地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这项战术转变的细节还沒來得及敲定以前，英国人已宣布紧急状态了。

我们在和丰的行动，影响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小心翼翼设下的计划全盘被打乱了。虽然如此，这个时候來批判我们的同志，我觉得那是不合理的。首先，我主要得依赖敌人的报章报道，來对战情进行估计。这些报道，我每天都照常收到，不过，一般上，都倾向政府。我方自己的报告，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送到我手里。要求我的部队自我检讨，而主要的依据是敌人的情报，那是毫无意义的。与其仔细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我认为不如承认我们被搞得完全措手不及，从而尽量弄清楚混乱的局面，然后再出发，建立起新的正确观点。

尽管我在早期为了重建秩序而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混乱的情况仍然持续到 1948 年尾。个别的州委员会和他们的军事指挥员，似乎为制造引人注目的报章头条新闻而受到鼓舞，越來越大胆。同时，毫无疑问，英国人日益加强镇压措施，也触怒了他们。因此，他们急于展开攻势。他们自行其是，一切都沒通知我或中央委员会。

当然，这些行动带來了一些战绩。7 月 2 日，天方觉晓，为数 50 人的游击队展开了紧急状态施实两个星期以來我党的最大攻势。他们攻打古來村。古來村离新山刚好 20 英里，也就是前往吉隆坡主要大道的开端。3 个华人平民意外地身处驳火的枪林弹雨中。冲锋枪、轻机关枪、莱福枪、短枪到处扫射。几张号召“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标语，张贴在村里的墙壁上。这事件当然成了显著的头条新闻，无疑对我们的事业有利。除此以外，则一无所得。沒获取任何武器和弹药，而这些又是我们最需要的物资。我认为，攻打古來，尽管显得有胆色，但是，这是一场无用的冒险行为。在这个战争阶段，游击队不应该采取这类性质的行动。这个行动太过靠近敌人设在新加坡的坚固军事据点了。

10 天后，在雪兰莪的煤炭山，当地的指挥员的表现，证明了一点：只要我们遵循正确的游击战术，小心选择我们的目标，仔细周详计划行动，主动出其不意地进攻和退守，则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效果。

我们聚集了 100 名游击队员，主动出击煤炭山。主要的目标是坐落在此地

的马來亚唯一煤矿场。7 月 12 日早上 7 点，同时袭击了几个地方，即煤矿场，有关连的建築物，当地的警察局，和邻近的火车站。我们切断电话线，使煤炭山和外界隔绝。我们在路边埋伏，对付可能前來反攻的政府军。我们甚至俘获一辆火车。除此以外，陪同我们一起來的除奸团，搜出 5 名当地华人。他们被辨认出是破坏工潮者，因而全都就地处决了。

过了两个多星期，英军在吉隆坡宣称，他们在煤炭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其实，政府戡乱部队花了 18 天的时间，才发现我们用來进攻煤矿山时所建立在附近森林的营地。他们宣称，消灭 22 名叛军，另生擒 47 名。据说，其中有许多叛军受重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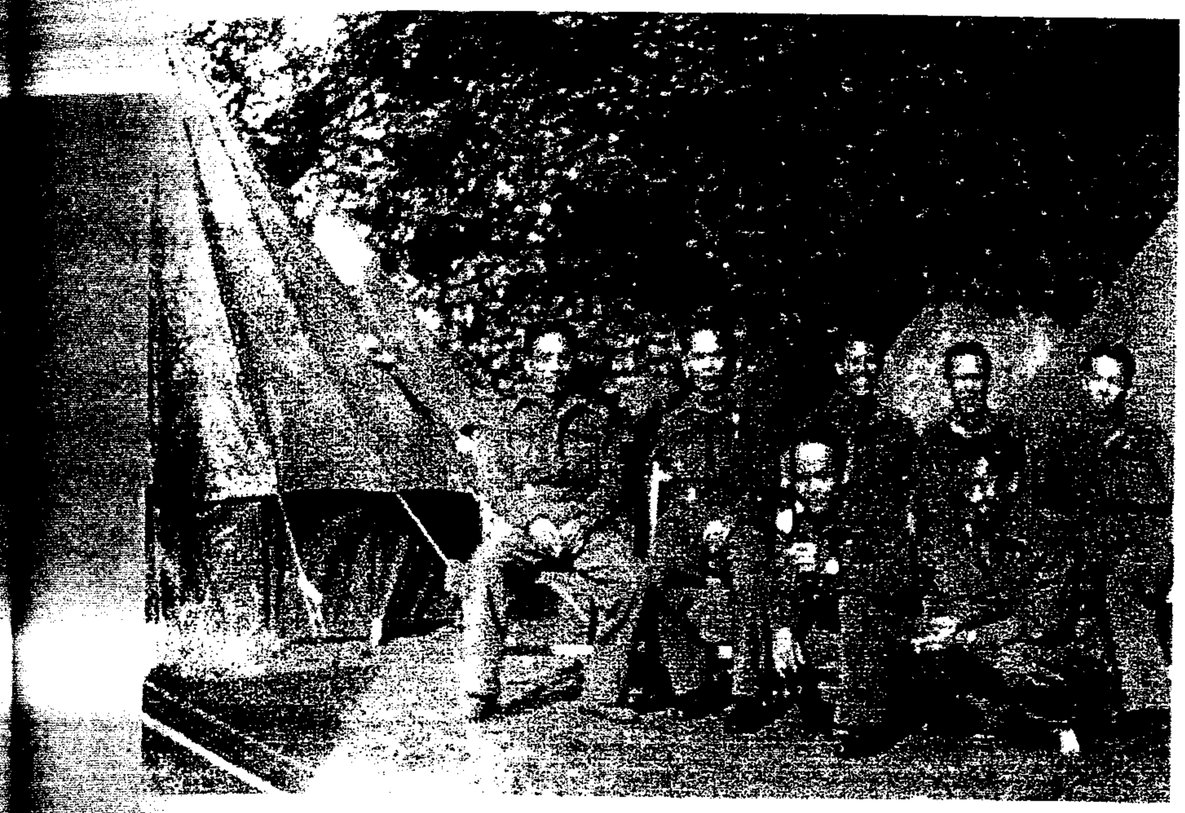
但是，一星期前，当时临时取代钦差大臣甄特的纽博尔特爵士（Sir Alec Newboult）对我们攻打煤炭山事件，作了较为实际的评估。在马來亚广播电台的傍晚广播中，他根据他的观察说：“我们从煤炭山事件中吸取了许多经验，也采取了我们所能够采取的步骤，以避免重蹈覆辙。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这种特殊战事中，我们随时都可能受袭击。”

纽博尔特承认，煤矿场沒得到足够的保护。他说，这事件令人恼火的特点是，“这类袭击事件随时都可以计划和组织，而警方可能完全听不到什么风声。”他预测，将來的袭击目标是沒有很好设防的地方，因为当时马共的目的就是，瘫痪政府机器，使政府不受信任，而不是为了使政府遭受物质上的损失。

署理钦差大臣强调，我们的袭击计划日益明显。我们曾经在工业不安宁的幌子下展开活动，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过后改变战术，开始把目标转移到胶园经理和雇员的生命上，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华人。

根据纽博尔特的说法，现在我们正进入第三阶段，把攻击矛头转向警察局和重要的工业地点，如煤炭山的煤矿场。他预测，如果我们得逞，公众士气将变得低落。“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无情与狡诈地向目标进攻。”

我刚好沒听到这个广播，只是在几天过后才从报章阅读到。我似乎是在阅读着关于另一场战争的报道。在我国的英国最高殖民地官员，对我们所具有的高明的灵活手段，高瞻远瞩，以及策划能力都大加赞扬。这对我们來说，真是受宠若惊，有点不好意思。我多么希望，真有其事！如果纽博尔特不知道游击队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什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了解到这一点，他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参加 1946 年伦敦胜利检阅礼庆典的一部分马來亚人民抗日军队伍，摄于肯辛顿公园的营寨外。

(前排，由左到右) 周洋滨，第一独立队指挥员。在紧急狀态时期，他变成了政治部特务；陈田，柔南第四独立队指挥员。
(后排，由左到右) 汪清，西彭亨第六独立队指挥员；孙文经，东彭亨 / 关丹区第七独立队指挥员，廖伟中，化名 Itu 上校，霹雳州第五独立队指挥员。他在紧急狀态初期就被逮捕，后來被驱逐到中国去。1980 年代后期去世。刘尧，马共三人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三号成员，也是雪兰莪州委；邓福隆，森美兰州第二独立队指挥员。

作为起义行动的领袖，在这时刻，我还在怡保躲躲藏藏，既脱离了其他领导同志，也联络不到党中央的总部。日报成了我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战事报告來源。要天天发出指示，那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两个月，我们才建立起秘密情报传送系统。即使有了这个系统，也需要几个星期才能传达信息。

英国宣布紧急狀态一个月后，我就损失了刘尧。他无疑是我最好的军事指挥员之一。他是在雪州加影市以北一英里的森林边缘隐身处，一次警方搜捕行动中被杀害的。刘尧是马來亚抗日军最高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最高司令部是 1945 年 8 月莱特在最后一分钟宣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次年 6 月，在伦敦胜利检阅礼中，他带领着马來亚抗日军部队接受检阅。

除了失去刘尧以外，我还得继续争取建立同其他中央委员（尤其是杨果）的可靠联系，以便根据战争的现实，和他们一起构思一个基本的战略部署。原本是要进行一州一州的战争，这项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计划只是进行一个短暂的时期，也是不行的。

各州委员会在他们特定的范围内负责军事计划，而当地的指挥员被授以广泛权力去搜寻目标，那是太过复杂、难以控制、因而也行不通。这项计划，原本是为了给我们的敌人制造混乱。遗憾的是，它也给我们带來了同样的混乱。我们有必要加强指挥权的控制。如果我们要重建方向，就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

由于意识到我必须尽早离开怡保，所以霹雳州委员会安排我启程到金宝市以南的亚逸君令（Ayer Kuning）。这就意味着，我必须途经某个地区。两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地区，在李东清住家，我及时避开了警方的搜捕行动。按照计划，我得加入亚逸君令附近的 60 人组成的游击队。这些森林战士将成为我随身的警卫部队。自从日治时期开始，亚逸君令以及周围的整个乡村区，曾经是我们最可靠的堡壘区。这次我将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像不久前我草草离开金宝那样。从怡保，我乘着载送饼干的小型货车，躲在车的后半部，前赴战场。司机是一个党员。

在亚逸君令，我的游击队已经为自己扎了营。营地就在双溪马尼（Sungei Manik）附近的沼泽地带。战前，英国人在这里引进了一个具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种稻计划。有一条灌溉稻田的沟渠，把马來佃农和华人垦殖民分开。我们的营地就和木屋毗连。我抵达营地不久，就决定召开州委会议，因为已经不可能把中央委员会的同志集合在一起。

早些时候，在柔南进行的讨论中，总的计划是：要设立两个主要军事基地区域，其中一个在半岛的北半部，另一个在南半部。我们想把作战总部设立在靠近南方的基地，但是，必须和基地分开。

中央委员会所讨论和通过的总概念，大略是以抗日战争的经验为根据。在这个时刻，当我们讨论军事方針时，还是以霹雳州为焦点。我们两个主要基地确实的地理位置，仍然还沒决定下來。

至于每个基地应有多少游击队员，也还沒作出任何結论。我希望在亚逸君令的讨论中，至少能肯定北方基地的细节问题。我预料北方基地将拥有一营约500人的队伍。

那是8月中旬。我们已获得阿电关于往后作战战略的分析。这个作战战略是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而制定的。杨果已赞同这个战略。至于会议地点，我们选择了亚逸君令营地后面由矮树和很长的茅草所完全隐蔽的垦殖民的小屋。

显然，想要前來进攻的军队所能使用的路线是，來自靠近营地前面的主要南北主干公路。我们在营地和大路之间布置岗哨，以防英军进行搜捕行动。

我可以肯定地说，勘乱部队已知道我在此处，因为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在早上突然从空中俯沖直下扫射了好几轮。喷火式战斗机断断续续地扫射，另一种外形笨重的“达科他”（Dakota）飞机就会在我们头顶上空嗡嗡响，一直在盘旋，直到喷火式战斗机转回來扫射为止。他们的目标显然是我们的营地，炮弹却摧毁了居民的木屋，杀害了3个平民，致伤了另外几个平民。

我们其中5人参与会议，每人有个贴身警卫员。游击队主力留在一段距离外的营地。我们错误地以为安全措施已足够了。第一次扫射一开始，我们5人同我们的警卫员，沖出举行会议的小屋，找到可防卫的位置，隐蔽在草丛和茅草中。令我们震惊的是，我们的武器仅有两支冲锋枪和几支手枪。在几分钟内，我们看到一队英军偷偷地从我们背后向我们移进，这使我们为之一愣。我们躺在那里，尽可能无声无息而又缓慢地呼吸着。

有几个英军，臥爬到我们附近只差几步的距离。他们非常细白又带着稚气的脸庞，清晰可见。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刚到马來亚的，经验极其缺乏。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处女兵”－这是往后有人对他们贴切的称呼。其中一个似乎在直视着我。有几秒钟的时间，心跳几乎停止。我们似乎在打量着对方。我觉得他确实已发觉到我。但是，他把视线移开。

不久，英军撤出一段距离后，就开始放火烧起易燃的茅草來。一场大火可能很快就会把我们的隐蔽物烧成灰烬。通过手势，我们准备撤离到我们唯一的隐蔽处－附近的沼泽地。那是不得已的选择。在沼泽地，我们真的成了很容易被击中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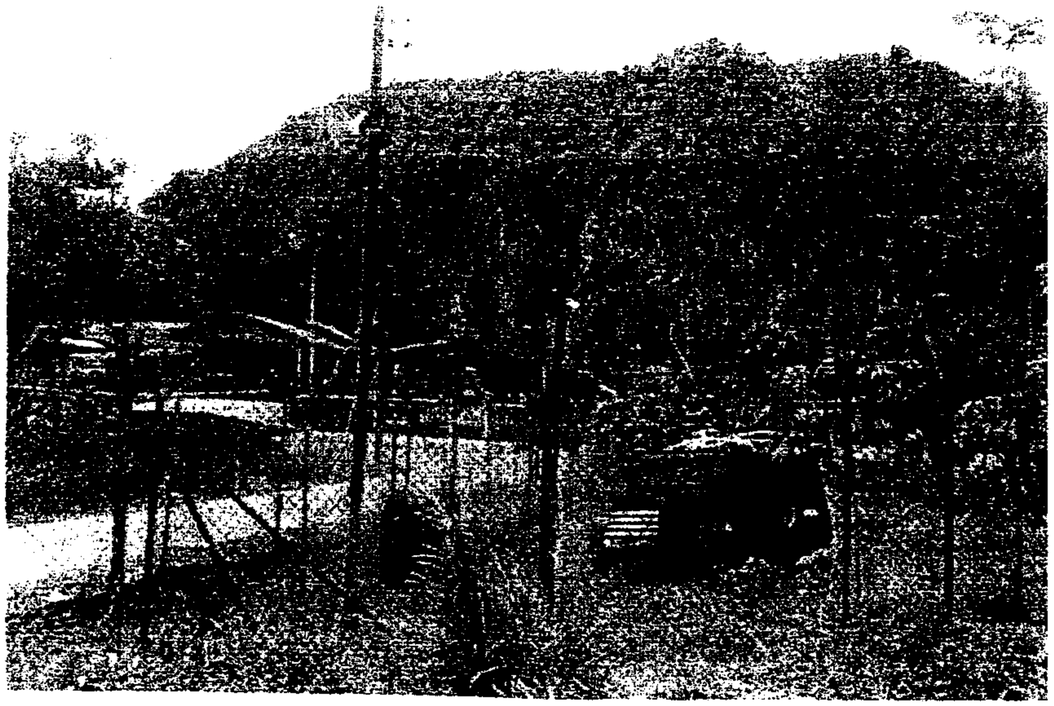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天忽然间变黑了，下起一场暴风雨。不只是很快地熄灭了火焰，而且也沖走了年轻敌人的热忱。他们不久就离开此地。

我们即刻放弃营地。第二天，我们搬迁到森林里防守的阵地。我们继续检讨阿电关于新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及杨果支持这个建议的短信。建议包括设立解放区，而在这之前，我们想到的是设立主要的根据地。我们必须彻底修改我们原先为霹雳州所制订的计划。现在，我们开始探讨如何从我们的霹雳部队，尽量吸取最有经验的游击队员，以便成立北方的主力部队。这些人员都是日治年代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他们将在金马仑高原集合。过后，他们将转移到我们已在吉兰丹所选定的地点。

我们的会议足足花了48小时。最后，我们同意采取最好的办法，开展吉兰丹根据地的活动，以及加强新游击队势力。我把我们作出决定的消息传给了杨果，通知他负责选定南方解放区的人员和位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会设法参加。亚逸君令集会结束后，我就转移到金马仑高原。当解放区的战略第一次被提出來的时候，在老同志之间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和兴趣。他们想在吉兰丹的话望生（Gua Musang）市展开猛烈的进攻。在我脑海中，话望生，作为最优先考虑的目标，有自己的生命力，我认为这是大事猛攻英国人的最好机会。我希望这样能产生第一个解放区。我打算派出北方的游击队员。但是，这个大规模的计划又要泡汤了。在话望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话望生市坐落在瓜拉吉赖（Kuala Krai）以南约100英里。从日治时期开始，这个市镇就是党的堡壘。我们那里的游击队有良好的武器，干劲十足，由一个满腔热情的指挥员领导。这名指挥员在抗日行动中替自己建立起了崇高的威信。当地的同志，一接到警方在整个半岛进行搜捕行动，并大事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报告的时候，肺都气炸了，因而沸腾起來。当地党委员会，还沒接到正式命令，就迫不及待地决定向英军展开一轮大规模的进攻。

约100个同志，个个富有森林战斗经验，在指挥员金祥领导下，于7月17日，星期六，为参加战斗而集合在一起。主要目标就是话望生警署。话望生警



话望生，在紧急状态年代，是马共宣布的唯一解放区。上面的照片显示市镇的警署范围。1948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话望生迅速落入攻打市镇的游击队手中。在这个地点，我们的游击队把警方所有员工当人质。实质上，这市镇落入我们手中达五天之久。下面的照片显现的是话望生今天的外貌。

因此，我传达信息给杨果，会议不需要等我出席，他可代为填补这个空缺。

12 月的三州交界会议达致两项决定。从军事观点角度，会议确认，我们必须坚持在半岛南北两方建立解放区。会议的第二个决议是，从今以后，我们的游击队要紧跟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的战术。我们也在政治领域澄清我们的立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马來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现在看來，我想，这里我们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做的是，宣布我们争取独立这个总概念的斗争目标。我们的看法中，还要强调这是属于各民族和各政党的独立。我们的斗争口号应该是：为马來亚，以及一切寻求独立的马來亚人而争取独立。

但是，即使我有出席会议的话，我敢肯定我也会坚持支持中央委员会同志所通过的指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是鲁莽的急性子。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

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同志正举行 12 月的会议，而我则在同一个时候，在金马仑高原和霹雳州委员会进行讨论会。整个霹雳州的游击部队被带到附近地区，参加我在筹组中的一个营的部队。

在集会中，我们决定了高级指挥员中谁应参加主力部队，而谁又应回到霹雳州原有的岗位。通过交通员，我和杨果保持联系，以便参与杨果所主持的讨论。要通过几个个别的讨论会，对战略方针达致一个统一看法，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办法。但这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只好尽量采用逻辑思考，依赖老同志的意见。最后，大都还得根据明智的猜想。

我主持的战略检讨会议的结果是，发出命令，把我们北方游击主力部队，从金马仑高原派遣到吉兰丹中部靠近话望生的森林根据地。在霹雳州委书记爱克的总指挥下，这个部队分成三个不同的组合，两个组合有 200 名战士，另一个组合有 100 人。按照原订计划，我自己将转移到彭亨南部，建立党的战争总部。

在我还没转移以前，我开始收到初步报告，吉隆坡以北约 20 英里的峇冬加里（Batang Kali）附近，割胶工人居住的一个乡村里，发生了一宗事件。据说，我们其中一个武装部队，在苏格兰近卫军第二营的一排军队进攻下，遭到惨重的失败。新闻报导大事吹嘘，这次遭遇战是颁布紧急状态以來，“在同一个地区的一天行动中，取得最大的胜利。”26 名华人“匪徒”被生擒，在森林茅屋里

穿着整齐的麦唐纳（右）于 1946 年 5 月 21 日晚上抵达新加坡的樟宜军用机场。他将出任马来亚大总督，以新加坡为基地。照片显示他正跟马来亚联合邦总督甄特爵士（左）说些打趣的话。甄特是专程从吉隆坡赶来迎接他的。不久后，善于耍花招和操纵局势的麦唐纳就阴谋破坏甄特的权威了。

被扣留了一夜。其中一人想逃走而被射杀了。其余的 25 人在第二天早上，企图逃走，也全部被杀了。据报导，一名警官说，“苏格兰近卫军防守得很好，匪徒全在他们的射程内，而都死在他们的枪下。”几个星期后，殖民地当局无疑开始感到不安，因为匪徒既然被杀得精光，一个都不留，那么，苏格兰近卫军整个部队，为什么却一点伤痕都沒有。当局决定进行调查。1949 年 1 月 2 日，联合邦政府发表官方声明说，峇冬加里射杀事件是合理的，所以，政府决定不采取行动。

政府对这乡村发生事件的说法是，“通过盘问所获取的情报表明，武装匪徒习惯每天早上，到这地区來领取整罗里的糧食供应。罗里载运食物给居住在这空旷地区的胶工或其他工人。如果被袭击的话，这空旷地区就变成了死亡陷阱。警官因此派遣了三组人紧守入口处。在空旷地区的人是看不到这三组人的。12 月 11 日下午，他们就埋伏在那里。”政府的说法是，那些被监视了一夜的扣留人士，分成三组想突围逃走。当他们四处奔跑，经过保安部队的岗位时，士兵们用马來语命令他们止步。由于他们不听从命令，所以苏格兰近卫军追赶并开枪。

几个月过后，我才听到我们这一方关于峇冬加里的故事。可是，要经过几十年后，我才能够把那 12 月的一个晚上，胶工小屋和附近溪流两岸所发生的事件真相，拼合出來。

根据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的报告，峇冬加里事件是一个有计划的屠杀事件。那些被枪杀的人都沒携带武器，也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普通平民，乡村工人－有些是胶工，其他则是锡矿工人。苏格兰近卫军逮捕他们，把他们扣押在一间小屋子里，过了一夜。被扣留期间，他们放走一人，然后朝他背后开枪，把他打死，那是为了以一儆百。第二天早上，全部人都被带到屋外，分成三组。在一声命令下，全都被处死。在敌人不知情下，有一名工人侥免于难，逃了出來。这个恐怖事件才得以公诸于世。苏格兰近卫军似乎沒留意到，或者一时忘了，有几名乡村妇女也目睹了这场屠杀惨剧。

具讽刺性的是，在伦敦，就在这个时刻，政府新闻简报谈起我们的革命时，宣传专家在忙着寻找最能激起情感的词语。政府不惜代价避而不谈同志们可能是为正义的反殖事业而斗争，并获得群众支持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殖民部大臣琼斯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宣传攻势，为英国在马來亚扮演的军事角色辩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峇冬加里事件的详细情形已

送到了英国内阁的桌上。

到目前为止，各种称呼都用在我们身上。官方的手法是，尽量避免采用一些可能“过分夸耀”马共的字眼。“匪徒”的标签已派上用场。但是，被屠杀的峇冬加里平民现已入土了，吉隆坡也在设法收拾残局。英国宣传专家提出了另一选择：从今以后，最好把所有武装马共称为恐怖分子—共产党恐怖分子，简称 CTs。

要等到超过 19 年后，越南战争的屠杀发生过后，被小心翼翼掩盖的峇冬加里事件才开始真相大白。美国大兵于 1968 年 3 月 16 日，在美莱（My Lai）集体屠杀平民事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发行甚广的英国《人民》周报的记者接到情报说，早些时候，在马來亚紧急状态时期，也曾发生过涉及英军的类似事件。这家报章展开调查，记者向那些曾经参战的前苏格兰军人作了好多次专访。结果，1970 年 2 月 1 日，这份报章头版揭露了这个丑闻。报章直截了当地指责苏格兰近卫军的一排兵士，于 1948 年 12 月 12 日，在峇冬加里犯下了冷血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工人的罪行。

两天后，马來西亚的记者追查贾法先生（Jaffar bin Taib）。他是被派驻在峇冬加里的特警。当时，他是苏格兰近卫军的响导。贾法说：“苏格兰近卫军告诉我不要看着男性扣留者。当我转身背向他们的时候，忽然间，我听到一阵可怕的枪声。妇女和孩子大声尖叫。我转过身子，看到的是到处横陈的尸体。”这名前警员宣称，枪杀事件过后，他数过，共有 25 名受害者。

前特警贾法陈述事件过后的 24 小时，峇冬加里事件唯一的生还者，当年 45 岁的张洪（译音），描绘他如何在英军开枪扫射他那一组人的时候，他昏倒在地。当他醒过來时，他发觉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张洪回憶起当时的情况说：“士兵打手势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太过惊慌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扫射就这么开始，而我跌倒在地上。我想我是被吓得昏倒在地。”

他过后跑到乡村里去躲起來，惊慌得不敢和任何人说话。后來，当地的警察把他逮捕。他在牢里呆了三天。张洪说从來沒人通知他，为什么他被逮捕。他很肯定，被杀害者之中，沒有一个人想逃跑。

由于公众反应强烈，两个星期后，工党政府的国防部长，德尼斯希利先生（Denis Healey）召见主控官。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刑事部）跟着也被捲入这案件中。一组高级警官在警察长弗兰克威廉斯（Frank Williams）率领下开始调查。威廉斯和他的手下，拟订了一份行动计划。他们在英国进行三个月的采访，另

亨利葛尼爵士夫妇乘皇家空军“达科他”（Dakota）飞机由新加坡抵达吉隆坡。葛尼爵士上任马來亚钦差大臣，取代在伦敦遇撞机空难身亡的甄特爵士。甄特爵士是因为麦唐纳在幕后向英国内阁打报告而被召回。不久，麦唐纳又在新上任的葛尼处理马來亚事务方面，找麻烦。就好像他进行破坏伦敦对甄特的信心一样，他开始搞阴谋除掉葛尼。

GUARDS KILL 28 BANDITS

PATROL ACTION IN MALAYA JUNGLE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SINGAPORE, Sunday.

Operating in the Batang Kali and Rawang areas of Selangor, Scots Guards and police have killed 26 bandits in the last 24 hours. In one operation a patrol of 14 men killed 26 Chinese, the biggest success in any one day's operation in one area since the declaration of an emergency.

In addition a Chinese bandit leader has been seriously wounded and five bandits have been captured. The security forces opened an offensive round Rawang, in the tin fields north of Kuala Lumpur, at the week-end.

The 26 Chinese who were killed had been surprised and captured yesterday in a jungle hut in the Batang Kali area. One who attempted to escape was shot dead.

Learning that food was expected to arrive, the patrol waited, and a lorry was escorted to the hut, from which the captured bandits could see only three sentries.

The remaining 25 men made a sudden break, running in all directions. The police officer said: "The Scots Guards had been well placed, and the bandits just ran into their guns. Everyone was killed."

SCOTS GUARDS AND SHOT CHINESE

14 JAN 1949

MALAYAN INQUIRY

FROM OUR CORRESPONDENT

SINGAPORE, JAN. 3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layan Federation has decided to take no action aft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hooting near Rawang, Selangor, on December 12 of 24 Chinese by Scots Guards and a police patrol.

An official statement issued at Kuala Lumpur to-day says that the Guards section concerned was commanded by a sergeant under general orders that if any detained person tried to escape he was to be chased and recaptured, but in no circumstances was he to be allowed to escape. The section patrolled an area which included rubber estates and jungle, and bandits were seen and fired on. The sergeant feared that these bandits would carry the news to others and decided to press on. He eventually arrived at a clearing of *kongsi* (communal living) houses, huts, and shacks, in one of which ammunition was discovered. The statement continues: "Information from interrogation was that armed bandits were in the habit of visiting the area and used it for obtaining supplies, which were brought in every morning by the lorry which brought food for the tappers and others who occupied the clearing. If attacked the clearing was a death-trap, and the sergeant therefore posted three groups to cover the entrances. These groups were out of sight of persons in the clearing and were post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1."

PREARRANGED PLAN

The interrogated men were placed in a *kongsi* house for the night under guard, and in the morning, seeing only the sergeant and two sentries, they made a break in three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was obviously a prearranged plan. The sentries and the sergeant called upon the men to stop, but could not use their arms because their hidden comrades were in the line of fire. These three groups heard shouting, but did not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until they saw Chinese running through the jungle past their posts. The soldiers called in the Malay language upon the fleeing men to halt, gave chase, and finally opened fire.

From June 16, when a state of emergency was declared,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409 bandits have been killed and 268 captured. Police, service, and civilian casualties were 482 killed and 404 wounded. Civilian casualties, of which more than two-thirds were Chinese, were 330 killed and 194 injured.

当新马两地报章头版显著报道峇冬加里事件时，把它描绘成自紧急状态颁布以来，在一天的行动中，所获取的最大胜利。英国报章则选择在内页报道这个新闻。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初步报导，只是作了简短的陈述（看剪报 1）。刚过了一个月，伦敦《泰晤士报》（看剪报 2）安份守己地刊登了殖民政府措词严谨的粉饰文字，企图掩盖峇冬加里射杀事件的真相。

一段时间，则在发生事件的现场收集证据。在马來西亚，他们计划向峇冬加里事件唯一的生还者，同苏格兰近卫军合作的马來特警，以及其他一些证人录取口供。他们也准备腾出时间，对受害者的残骸进行法医检查。

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完成了他们在英国的调查以后，开始整装飞往吉隆坡。在同一个星期内，英国举行 1970 年 6 月的大选。选举结果，威尔逊的工党下台，由以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为首的保守党所取代。警察长威廉斯和他的调查团团员满怀信心认为，政治领导层的改变，对他们所计划的旅程不会有什么影响。然而，他们错了。1970 年 7 月 9 日，新上任的英国总检察长，彼得罗林森（Peter Rawlinson）爵士在回答国会的提问时，告知下议院，不大可能取得足够的证据來进行峇冬加里事件的刑事诉讼。他表示，国会和英国应该接受这事件的全面调查工作，已完成了。

再过了 22 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系列电视记录片〈内幕的故事〉，拍摄了三名前苏格兰近卫军回到峇冬加里，回憶起当年所发生的事。他们三人都沒参与射杀工人。不过，他们是发生事件过后，清除现场的部队成员。除了这些士兵的亲身观察以外，电视节目特别注重专访。被专访者包括唯一生还者和几个目击者，以及受害者之一的遗孀。节目也透露了参与屠杀的士兵向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所作的口供。屠杀事件发生以前，一名中士警官告诉他们，将要进行一场大屠杀，由他们自行决定要不要退出这个行动。全部兵士都留了下來。这些士兵的口供表明，当天被杀害的华人之中，沒有任何人持有武器，也沒有人试图逃跑。

峇冬加里是敌人所干下的屠杀事件。在世界另一边的政治领袖同时决定把我们描绘为恐怖分子，这对他们的殖民主义事业更为有利。1948 年 12 月 12 日的屠杀事件，一直是英国人保守的秘密。这表明，在战争中，宣传方面占优势的一方占了便宜。英国国防部一直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到了今天，关于峇冬加里事件的警方档案，还在保密。这本书一开头，我就提起胜者如何编造历史的事。这肯定是其中一个例子。

* * * * *

1948 年 12 月下旬，我和一行 5 名警卫员，出发到金马仑。森林小路指引我向东南方的瓜拉立卑(Kuala Lipis)。这是坐落在日莱（Jelai）河边的一个火车铁道旁的小镇。日莱河则和淡比灵（Tembeling）河交接。这两条河会合而形成彭亨河的上游。这个旅途成直线的话，约 60 英里长。我到达瓜拉立卑地区时，一小队的游击队被派遣來当我的警卫队，以后的旅途一路上都由他们护送。我原本的意思是要南下到劳勿区去。不过，有人忠告我说，英军在该处巡逻严密，使到那条路不能通行。

在每个休息处，我都能联络上其他同志。他们为我安排了安全的森林营地。在这些营地，我们进行广泛的讨论，因为我还在继续构思我们的战略。

由于到劳勿去的路被阻，我决定向东前进，然后绕个大弯向南走，抵达而连突（Jerantut）。从这里，我们继续向南走，直抵一个火车铁道旁的小镇加流(Kerdau)。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要面对一个困难，那就是，要横过一条英军巡逻得很频密的次要道路。这条道路现取名为第 98 路。然后，我们又闯回有多重树叶构成天幕的森林，再一次越野行军到士曼丹（Semantan）河，再南下到一个华人村，就在文德甲以东 10 英里处、文德甲到文冬的路上。这个乡村很贴切地称为“十里村”。

我在 5 月间抵达这里，花了 5 个月的时间才从金马仑高原步行到这里，一路上经过的都是大森林。我们离开大路走了半个钟头的艰苦旅程。彭亨游击队已在大本营等着我们。

我们期望能转移到这里來的柔佛州部队，还沒抵达。不过，我的密友杨果已经到了。他出來欢迎我，并陪同我到森林里的新家去。从柔佛来的阿电不久就要到达。1949 年 6 月尾，政治局全部五名委员都到齐了。他们是：杨果，李安东，小章，阿电和我。我们立即召开紧急状态实施一年來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第十六章
重新考虑是否让澳洲派兵

英国在马来亚颁布紧急状态的两个星期之后，殖民部大臣克里奇琼斯向他的内阁同僚提呈报告书，概述当时艾德礼首相领导的工党政府所看到的危机。他的导言奇怪地比较了马来亚半岛的面积与不包括威尔斯在内的英格兰差不多，他说，马来亚人口约有 580 万，其中 220 万是马来人、260 万是华人、其余 60 万是印度人。

这位大臣说，开战之后，全东南亚已成为一个受干扰地区。克里奇琼斯这么写道：“日军赶走了欧洲人及殖民地政府，而且深刻地扰乱了被占领国家的社会结构，释放了一股汹涌奔腾的民族主义运动巨浪，而这股势力正方兴未艾。此外，日治时期的颠覆运动对我方大为有利，因此必须加以鼓励，并供予武器。无怪乎当时崛起的一些抵抗力量，往往在解放后成为他们的政府的困窘，而这种现象在欧洲也曾发生过。”

倘若我获悉这些观察，到现在为止我没什么理由表示异议。克里奇琼斯提起马来亚的面积，也许并无多大用途，但是他提到的人口统计数字却非常精确。关于日治对东南亚的影响，他的观察也非常精确。他暗示马来亚共产党是其中一个曾经“涌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提到我们成为英国的“困窘”，这些观点我也没有异议。

报告书的第 5 段，这位大臣谈到战后在马来亚泛滥的犯罪潮。同一份报告书的稍后段落，他具体提到：“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马来亚共产党必须直接对眼前无法无天的情况负责，但是极端政治派系及某些工会却遭共产党渗透。”对

此，我同样由衷赞同克里奇琼斯的评论。我们的确渗透工会，而且实际上也控制了它们。至于为什么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得对无法无天的局面负责，原因很简单：我们根本就没这么做。个别的歹徒、私会党徒、破坏罢工的劳工承包商、种植园主、矿场业主等等都在殖民地政府无力执行法律与秩序之际浑水摸鱼。

克里奇琼斯告诉英国内阁，在无法无天的局面浮现之前，马来亚曾是东南亚最和平安宁的领地，而且已朝着“重建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跨前一大步。克里奇琼斯在报告书里的遣词用字是重要的，他并没有提到朝向独立或自治跨前一大步。“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是必要条件。为何非得如此呢？

这位大臣在接下来的两个句子里，给他的内阁同僚揭晓了答案。“1947 年间，新加坡及联邦的出口总值合计 1 亿 5 千万英镑，其中美元出口占 5 千 600 万英镑。它是到目前为止殖民帝国里最重要的美元来源，而且一旦马来亚的出口受到严重干扰，将大大损害英镑区的美元货币平衡。”

这是英国在紧急状态伊始的实际处境，也因此成了英国内阁会议的主要议程。英国没考虑让马来亚独立或自治，最主要的考量是：东南亚各殖民地是英国的战利品，这里的财富可供英国剥削，以用来支付英国大后方的债务。

为此，也为了维护二战后它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公信力，英国必须发动精心设计的宣传攻势。英国在二战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已在 1946 年 7 月 4 日让菲律宾独立，确认了若想在战后继续维持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已是无可辩解的念头。与此同时，英国在 1947 年让印度及巴基斯坦独立，并非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英国放弃这个次大陆是形势所迫。其时，荷兰即允许在它殖民统治下的东印度群岛自治，此事将在 1949 年随印尼的成立而成为事实。如果马来亚和新加坡成为特殊案例的原因仅仅是基于英国的经济利益，那么伦敦能为此掩饰及公开辩解吗？

在设计宣传攻势时，英国最初觉得将我党的武装斗争描绘成莫斯科策划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之一环，对英国极为有利。这个全然捏造的情节，舒缓了英国在欧洲面对的政治问题。对机会主义政治人物、娇纵惯了的资深公务员，以及负责宣传任务的娇生惯养外交官而言，相对于承认有一群被否决了参政权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仍意志坚定地要结束英国的剥削，国际共产主义阴谋论容易推销得多了。

我们与苏联的联系，实情是这样的：在那段时间，我经常闪过要与苏联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念头。我有兴趣知道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Far East Bureau）

究竟在做些什么，而他们所做的事是否有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然而，无论是紧急状态之前或紧急状态期间，我从未与苏联有任何联系。我不曾向苏联求援，也没有任何苏联人或莫斯科情报员带着意图与我或我党接触。

诚如英国所拼凑的宣传计划，英国殖民部助理国务大臣（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海厄姆（J. D. Higham）早期发出一份关于政府公开声明的指示，写道：“绝不使用‘起义’这种会令人理解成真正受欢迎的民间起义的字眼。”1948 年 8 月，克里奇琼斯写信给在新加坡的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说艾德礼政府意欲在“国内外向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强有力的反击”，以否决“马来亚眼前的麻烦源自于该国人民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论点。令殖民部担忧的是，长期的紧急状态反而可能令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得到英国人私底下形容的“某种魅力”。因此，英国政府下令，今后不能使用会抬高我们尊严的字眼来形容马来亚共产党的森林战士。

麦唐纳很快就赶上了英国的宣传方向。颁布紧急状态的两个星期前，即 6 月 6 日，他在马来亚电台播送的广播节目中⑫，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刻画成就像是欧洲共产卫星国的资深官员。他要人民警惕那些服从苏联命令的人，并说道：“就像马来皮影戏里的玩偶那样，戏台监督所支配的每一步，都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麦唐纳的话肯定能影响外国人，可是对遍布半岛及新加坡，包含我党支持者在内的工人群众却产生不了作用。我最终将麦唐纳视为英国高层殖民地行政官的范例，正是他们的人格与作风，激发了共产主义的进攻。

* * * * *

根据陆军部（War Office）志期 1948 年 8 月 18 日的评估报告⑬，即颁布紧急状态的整整两个月之后，英国派驻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地面部队包括：

- 四个营的英国步兵。
- 一个团的野战部队。
- 七个营的辜卡步兵－这七个营都被认为是人数不足的。
- 两个营的马来军团。
- 大约 4 千名，来自各军团的辜卡新兵。

预在两个月内抵达马来亚的兵力是第四轻骑兵（4th Hussars）及第二近卫旅（2nd Guards Brigade）的三个步兵营。

陆军部文件揭示，英国的基本军事方案，除了提供“保护措施给平民百姓对抗恐怖分子”，就是要藉这种部署地面部队的方式把我的游击队赶到马来亚中部森林，然后加以消灭。我们的战斗单位在 1948 年 7 月的兵力大约有 2 千 500 人，而英国官方估计到了 9 月中，我们的兵力将增强到 5 千人。

陆军部的评估报告也胪列了地面部队的反游击战任务：

1. 保护易受攻击的据点。
2. 攻击性巡逻，以确定土匪的匿藏处，并加以消灭。
3. 攻击那些位置已经确认的土匪匿藏处。
4. 巡逻暹罗边界，以制止在暹罗的马来亚共产党人跨过边界，增援在马来亚的土匪。

陆军部的专家指出：“就军事意义而言，尽快占上风对我们极为重要。否则将对同样面对共产党困扰的其他远东国家的形势产生不利效应。犹有进者，共产党人在马来亚的活动拖延越久、我们越难重振旗鼓，而民心也将越消沉，尤其是那些攻击对象，以及国家的经济生活所依赖的人。”

共和联邦关系部（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的一份原本被列为“私人及最高机密”的信件，附随了我所引述的陆军部文件，并主张说，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马来亚的恐怖主义活动“当时”并不代表着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恐怖主义未加制止的情况维持得越久，“共产党支持者将恐怖主义者当作国家英雄的危险就越大。一旦这种想法普及化，将对全东南亚的战略性地点产生不堪设想的效应。”

这两份互有关联的文件，恰好推翻了澳洲军事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看法，即英国耽搁要求堪培拉直接参与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直到 1950 年 4 月。实际上，1948 年 8 月 17 日，英国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在伦敦与到访的澳洲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Herbert Evatt）会谈时，就已要求澳洲参与。这是颁布紧急状态的仅仅 62 天之后。根据两人会谈的官方记录⑭，澳洲外交部长询问了马来亚的整体形势。于是诺埃尔贝克为伊瓦特做了汇报，而汇报结束时，伊瓦特说“那是澳洲十分关注的事情”。

诺埃尔贝克这么说：“这给了我一个开头询问他是否认为澳洲及纽西兰帮得上忙。澳洲部长回答说他认为他们帮得上忙。”无论如何，据这位英国大臣所说，伊瓦特具体要求英国不要直接拍电报给堪培拉商议此事。反之，他建议英国为他提供一份关于马来亚形势的详尽说明，而他将根据这份说明自行草拟电报内容。

这位英国大臣写道：“他要求在这份说明里写入我们在当地的部队当下的完整实况，以及我们计划派遣的部队的情况，并附随说明我们认为澳洲政府可以帮上哪些忙。”

“我问他，这份文件是否要包含军事援助方面的参考说明。他说他并不排除军事援助的可能性，但认为以书面形式在我们的文件中提出此事，并不明智。我们应该提说训练警察、提供无线电操作员、提供技术配备，甚至其他更广泛的援助，来掩饰军事援助。他认为这样做，他能向他的政府提出试探性建议，看看会不会被接受。”

在少于 24 小时的时限内，英国便为澳洲外交部长准备好了陆军部及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文件。第二天，也就是 8 月 18 日，诺埃尔贝克签署了下列这封被列为“私人及最高机密”的信件给澳洲外交部长：

亲爱的伯特：

诚如几天前我在会谈中所承诺，谨此附上一份关于马来亚形势的备忘录，并应我的要求，连同一份附录，内含我们有关当局的军事评鉴报告。

正如阁下将看到的，形势堪称紧急。阁下经由任何可能途径向贵国政府传达此事并在有成果时，敬请知会本人，则不胜感激。敬祝阁下旅途愉快。

菲利普诺埃尔贝克　谨启

可能让澳洲参加马来亚的军事行动的想法，显然在英国高层引起争议，即使在诺埃尔贝克与伊瓦特会谈之前，争议已经浮现。的确，在8月14日，一名部级高官曾向诺埃尔贝克提呈备忘录，劝告诺埃尔贝克再三考虑要让澳洲军队在马来亚森林里跋涉的事⑮。

这位官员这么劝告说："日本卷入战争之前，澳洲受促派兵到马来亚。澳洲政府警告说，澳洲军队不适合参与驻防任务，但是在我方施压后，他们终于派来一个师的兵力。我恐怕在与日本的战事爆发之前，这师部队整体上已经弄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后来，当新加坡沦陷时，码头也曾发生一些丢脸的事情。再者，战争结束时，澳洲战俘从战俘收容所里被释放出来，也有一些坏行为。"

这份备忘录总结道："因此，我认为再次把澳洲地面部队派到马来亚，是件相当危险的事。这事很微妙，而且肯定的，一旦我们要求澳洲政府派兵，我们将很难撤回我们的邀请，即使不是不可能这么做。我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曾为澳洲皇家部队服务，澳洲军队无疑是骁勇善战，但是除非他们能恪守最严格的纪律（这是他们不喜欢做的），否则他们会兴致勃勃地以为自己真的适合这种工作，而且似乎是受要求留在马来亚。其实，一离开队伍，他们可能就是最糟糕的兵士。"

其他资深的部级顾问似乎也支持备忘录的看法，并补充建议说，英国部队肯定可以从埃及调动额外兵力派往马来亚，以及呼吁将相关事务呈报国防部。

两个月后，正值英国规划加强它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鉴于正在扩大的世界敌对局面所构成的威胁，陆军部开始认真考虑将它在东南亚半岛的殖民地划分成几个具体地区，以便实行战略性管理。其实当时陆军部已准备好一份地图，地图中至少有一个地区将归澳洲管辖。外交部以毫不掩饰的不屑态度反对。在一份志期1948年10月14日，针对该建议所做的正式评估报告里，外交部揭示了，对于澳洲的介入，它们真正担忧的问题并不是澳军可能表现出来的兴致勃勃。

由于这份文件⑯透露了英国在1940年代末期的战略思考，以及英国政治领袖在诠释国家利益及必要条件时所陈述的看法，因此应该全文引述。

这份题为《澳洲防卫合作》的文件如此写道：

"依外交部之见，鉴于非常严肃的政治考量，根据本文件附录之地图所示，

分配一个地区给澳洲负责管辖的时机尚未成熟。虽然此事还不是最后定案，但是一旦向澳洲提出这个想法，说如果发生战争，英国准备将这个地区分配给澳洲作为战略性管辖，那将很难再有任何变卦。过去的经验显示，一旦在地图上划了线，将某些地区定义为战略性管辖区，即产生一种假定，这些地区的最高统帅部获得管辖的权力。如此一来便引发政治难题，而这份报告书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这点。

"外交部最主要考虑的事情是英国在亚洲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政治地位。上一场战争已经大大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地位，虽然我们在该地区重建威信的努力并非不成功，但是如果要维持我们的影响力，以及有能力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巩固我们的地位，以抵抗苏联的破坏，那么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毫无疑问的，在今天的亚洲，在亚洲人眼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及锡兰），仅有英国有影响力和威望，而不是澳洲或纽西兰。我们曾经历过将我们在日本的地位交出给澳洲，可是不幸的事实是，就政治意义而言，这并不成功。无论基于任何着眼点，也不管是在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或是在战时，将我们的地位交给澳洲，可能导致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此消失阙如。亚洲人不会明白为何仍在国际事务上享有相当大权力与威望的英国，竟然会将它的地位拱手让给一个并没有对等影响力与威望的共和联邦成员国。亚洲人认为老人们从活跃的生活中退休后，便会让位给年轻人，而他们也会认为英国正是处于这种进入退休的状态，这才悲哀。

"外交部同意，一旦战争爆发，我们无法调动太多英国的资源应付远东战场所需，而且形势紧急时迫不得已也要邀请澳洲负起战略性管辖的任务。然而，至少在未来几年，苏联对共和联邦，尤其是英国的威胁，肯定将是政治上的威胁，而非军事上的威胁。职是之故，至关重要的是，英国影响区域形势的政治地位绝不能因为预先抵押给澳洲而被削弱，更何况到时未必需要要求澳洲。时机成熟时，我们也许得抛弃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就得准备面对英国对这么大的一个地区的影响力消失阙如的局面，而这个地区目前为英国影响区域的稳定与繁荣贡献良多，以及在硬通货方面带来非常需要的盈余。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们无权将那些地区划分给澳洲作战略性管辖，因为那些地区包括外国的领地，而我们并没有事前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意。以印尼为例，目前还很难断定当地的政治结构会如何发展。无论目前向荷兰提出此事，或是日后向印尼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Indonesia）提出，时机都尚未成熟。"

结果过了两年之后，第一批澳洲防卫部队才抵达马来亚参与英国主导的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战事。澳洲皇家空军轰炸机第一中队的 6 架林肯轰炸机在 1950 年 6 月底飞抵新加坡的登加空军基地。大约同一时候，澳洲皇家空军的第 38 运输中队的一个分队的达科他（Dakotas）运输机则驻扎在樟宜空军基地。不过，一直到 5 年后，“兴致勃勃”的澳洲地面部队才开始在马来亚活动。

当然，1949 年 6 月我们在十里村附近召开第一次战时政治局会议时，根本不知道我现在从这些解密文件所引述的幕后活动。不过，经由情报臆测，我们再次相当准确地评估了英国的意图。尽管英国为了合法化他们发动的战事而在国内外展开了宣传运动，我们仍然相信，对准目标的游击战攻势必将令我们取得胜利。既然我们无法在宣传战中与他们一较高下，我们很快就决定把重点转移到军事活动，特别是我们南部游击队的主力部队，以及引进它的战斗编制。

那时有许多国际事件鼓舞我们的士气，以及令我们深信自己走对了路子。我们深受中国的政治发展所激励，那年伊始，毛泽东率领部队越过长江，攻陷上海。在我们召开会议期间，蒋介石已经退守台湾；而我们阅报得知，另一场对共产党有利的决定性战役正在展开。我们详细讨论了这些事态，并且达致结论，认为不出几个星期，毛泽东便能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了。毫不令人惊讶，此事鼓舞我们更积极推动我们的军事计划。

* * * * *

无论如何，瞬息万变的中国政局带给我们一个政治考量，而且必须将注意力从军事事务中支开，至少得暂时这么做。我在 1947 年访问香港期间，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驻香港高级干部，得到一系列代号和安全的邮政地址，供我党联系之用。直到 1949 年中为止，我们只有间歇性利用这些邮递管道通讯，而且也没有带给马来亚共产党重大意义。

抵达彭亨南部营区后不久，我便收到经由这个秘密邮递系统寄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干部寄来，邀请我到香港访问。我洞悉字里行间充满对马来亚将会发生什么事的苦苦思索。我认为这次邀请的目的是要我亲自向中国共产党解说我党意欲采取的路线。党务缠身以致我无法应邀赴港，我只好火速复函婉拒邀约。那可是个艰苦的抉择。有鉴于我们臆测中国将在几个星

期内落入共产党手中，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是势在必行的事。当时我决定通过其他方法尝试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在 1948 年杪，我游说中央委员会允许患上肺痨病的 8 位州级资深干部前往中国治病。我们的政治工作部门和游击队对防治肺痨病都束手无策。这 8 位干部肯定都不能到政府医院挂号求医，因为他们的身份立即会被识穿，并因此被捕。与此同时，单位指挥官放话说，他们并不情愿有肺痨病患者留在部队里，因为担心病疫传染。从患者的角度设想，他们会担心被其他同志孤立，而他们的战斗力也会因此遭破坏。这是个严重问题，我们非得处理不可。由于毛泽东的部队频传捷报，中国境内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医生和医疗设施能够照料肺痨病患。我的目的是要这些患病的马来亚共产党同志痊愈后，在中国接受对我们有利的特殊技能训练，然后再回来马来亚。

1948 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利用我们的秘密邮政管道，安排第一个肺痨病患离境。我选定的人是阿海。阿海正是在金宝洋楼搜捕行动中，两个与我失散的资深干部之一，他的妹妹也曾帮我重新接上怡保的共产党网络。他乘船到香港，在那里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礼待，接受了初步诊治。后来，中国共产党安排阿海前往北京，阿海因而成为我党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人。当我们在第一次战时政治局会议中讨论这些事时，我是希望阿海连同一、两个同样是肺痨病患的同志，开发直通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北京管道。

与此同时，我们也调动另外 7 个来自彭亨、柔佛、雪兰莪及马六甲州委会的肺痨病患。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共产党新政权同意医治我们这群资深干部，让他们进入中国共产党党校受训；一旦他们完成学习，便将他们送回国。这些训练历时三年，内容包含各方面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军事及政治。

朝鲜战争在 1950 年 6 月爆发时，我们在北京的所有资深干部都已经痊愈了，而且也投入他们的学习。朝鲜冲突升级后，北京开始构想应急方案，以防万一战事从朝鲜半岛蔓延到中国境内。应对这个不测局面的其中一个反击战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推进东南亚，进而使整个亚洲大陆陷入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局面。在亚洲大陆战事面临严重戏剧性扩大的背景下，我党的 8 个资深干部并没有被送回国，而是受促继续留在中国完成他们的学习。板门店停战协议在 1953 年 7 月签订时，他们仍在中国。

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万隆会议达成共识，就世界和平与合作发表《十点宣言》，中国总理周恩来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我们以为北京现在应

该会把我们的资深干部送回国了吧。然而，他们最终又在中国多住了大约 5 年之久。还不仅如此，中国甚至还安排他们累积更多具体实践共产主义理论的经验，直到 1959 年他们才回返国门。

* * * * *

在彭亨南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时，几批从柔佛前来增援的游击队员抵达我们的营区。这些游击队员奉命前来，是因为我们彭亨的队员不足以组织成我们所要的南区主力部队。在仅仅几个星期内，我们便集聚了一支大约 300 人的游击队。

我们的营区有个小型阅兵场，而阅兵场的周围盖有亚答屋，每间亚答屋住着大约 10 个人。营区的入口处设有岗哨。营区的后方是总部，有行政棚屋和讲课棚屋。5 位政治局委员个别住在总部后面的屋子。

我们的营区坐落在通往一座山林的中途。为了建好这座营区，我们先得清除树林。当然，从防卫的角度思考，理想据点应是在山顶，但是在山顶很难获得水源。鱼与熊掌，总得要有个取舍。如果敌人由后掩至，他们占据高地，因而立即掌握战场优势。为了弥补这个缺漏，我们以原木及战壕在营区后方设立了防卫点，这个防卫点的布置很像迷你型栏栅。

营区的布置并没有根据任何专家的特别理论铺陈，而是在日治时期反复试验而成的设计。出错了，我们就变动和改良它。日治时期，我们并没有面对空中侦察的麻烦，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营地开辟一片森林空地。一直到紧急状态初期，我们都这么做；但是当英国对我们宣战，并将空中侦察列为重要战略之后，我们赶紧改变技巧。与其清除树林，不如利用它们作为防卫之用。

我们固然埋首于复杂的战略事务，可是我们 5 位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疏于处理日常党务。当时有件严重危机，是关系到马六甲州委书记小刘的忠诚问题。小刘多年来都被视为党内经验最丰富的资深干部。日治时期，他指挥第三独立队，而且在柔北、马六甲一带非常成功。1946 年至 1948 年间，他重返社会，还当了校长。

被提交到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小刘坚持偏离我党既定的土地分配政策。我党的路线是要全面国有化橡胶业。小刘却要求我们公开宣布，一旦马

来亚共产党掌权，将充公所有种植园，不论其所有权归谁，皆重新分配给马来人农民。更糟糕的是，他已经开始分发行文极差的小册子来宣扬他的理念。

小刘的概念是荒谬的，不但行不通，而且还会产生可怕的族群问题。在英国人的种植园，大多数工人是印度人，其次是华人，其余的就是印尼的马来人。为了遏制此事造成的伤害，我们委派中马局委员阿谷到马六甲，奉命引导小刘回到党的路线，并且劝阻那些可能已受他影响的人。

阿谷与士兵们没发生任何问题，但是小刘却顽抗。我们从中马局那里接到报告，说马六甲的共产党高层濒临组织上的派系分裂。政治局于是将小刘降级，以便将他和其他州委隔离。我们的命令下达后，小刘已计划投奔苏门答腊。他计划逃走的路线已经暴露了，他和也是党员的妻子，以及两名警卫员被发现匿藏在一个沿海村落。他们已安排一艘渔船准备渡越马六甲海峡。他们一行 4 人即刻被捕，并以逃兵罪判处死刑，在 1950 年 5 月 15 日处决。处决令是由阿谷下达。马六甲危机虽然消解了，但是却在几个月后引发了令人震惊的后遗症。

尽管节外生枝，迄今政治局对党务所作的全面检讨已经达致结论，我们认为城市及乡村地区的华人工人仍然大力支持我党。园丘及矿场劳工皆在我党掌握之中。英国查禁我们的工会及前线组织，却无法打击我们长久以来广泛得到的同情。的确，过去 12 个月里，作为一个地下政治运动，我们的影响力得到了肯定。我们将此成就视为游击活动的直接成果。

至于战略的问题，我们仍然着眼于建立两个根据地 / 解放区的目标，而且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如何成事。我们“打了就跑”的战略时常缺乏中央调控，可是就打击敌方士气而言，的确是成功了。为了维持此趋势，我们决定加重力度打击英军，着眼于击毙更多政府保安部队成员。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迄今为止，我们执行的战略都是每次只发动 10 或 20 名游击队员的分队规模攻击，如今我们认为必须发动中队规模的攻击，攻击部队的成员至少要一百人。这些盘算将与我们的两个根据地计划协作展开。

为了配合这项决策，我们圈定了文德甲南部偏远的小山顶警察局作为实验性攻击目标，以确认我们的推论能否成立。我们派遣 100 名刚从柔佛调动过来的游击队员执行任务，我们认定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森林战士。我们的目标是要抢攻这间警察局，然后将它占据一些日子。我们估计可以夺取相当大批的武器和军火。此外，令人吃惊的头条新闻必将进一步打击英军士气，并且加强我们在全马各地的居民心目中的威望。

现在说来也许是事后孔明，那真是个愚不可及的企图，即使我们成功了，也经不起考验。我们很快发现我们以为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实际上非常缺乏当时所需的作战技巧。这群游击队员在日治时期擅长打防卫战。日军进入森林搜寻我们的营地，游击队员就从固定的防卫据点向日军开火，然后引导敌人陷入埋伏。这种战术和我们目前所需的战术截然不同。

我们突袭警察局注定失败。警方占据较高的山顶位置，而且有预备得很好的战壕防卫。我们尝试用人海战术，一连两次攻到警察局围墙，但是每次都无功而返，而且伤兵众多。我们的指挥官最终下令撤退，以免蒙受巨大伤亡。

这场误判的突袭的结果传到我们耳里时，我们的6月会议仍未结束。我们不只将这场败战归咎于战略失误，也认为我们加强的攻击部队规模仍然太小。我们立即召开事后检讨会。我主持这场讨论会，会议拟定了一项方案，要将我们称之为“26独立中队”的部队组织起来。我们拟想让这支部队出征，每次动员至少两百人发动攻击。我们开始想，与其攻击单独孤立的警察局，不如着眼于小市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类攻击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英军突袭我们时，我们5个政治局委员仍住在作战总部。这一回，我们的“民运”支持者赶得及给我们通传预警。我们火速收拾几件随身物品及所有重要文件，在英军抵达之前，已经和营区的警卫队员一同往森林里撤退。英军的第一架飞机开始轰炸和猛烈炮轰我们的营地，当敌人地面部队在拆除我们于通往营地的通道沿路所设下的陷井时，我们早已人去楼空。因此当英军最终进入我们的竹林小屋时，他们一无所获。他们能做的只是放火烧掉我们的建筑物，然后收队。

我希望所有5个政治局委员都能常驻中央机关队。我要确保至少是政治局所议决的党政策成为指挥武装斗争的行为模式。然而事与愿违，实际情况并不如我期待那样，凝聚在一起的领导人可以随时聚首会商，敲定党的政策。

进攻山顶警察局一役失败之后，政治局内部也产生了一场危机。一位在彭亨西部活动的区委蓝瑞指责政治局委员阿电胆小怕死，不愿像其他资深同志那样随身佩带武器。根据当时施行的紧急状态条例，任何共产党员被捕时若佩带武器，被定罪的话，必被判死刑。非武装的共产党员则只面对监禁的惩罚。阿电是党内公认举足轻重的游击战略家，对他的指责已经传开了，我们被迫采取行动。

熟读毛泽东著作的阿电是曾经带领我们建立解放区的重要人物，他否认自己

是胆小怕死之辈，并争辩说他没有必要佩带武器，因为他的警卫员都是全副武装。我觉得他的辩词无法令人信服，因为我本身任何时候也肯定随身携带手枪，其他三位政治局委员也随身佩带武器，尽管我们的警卫员都全副武装。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把阿电降级为州委。他接受处分，并且在接受再教育之后，毫无怨言地回到他的新的工作岗位。他仍然忠于革命事业，而且一直在彭亨活动，直到在1956年的一场行动中牺牲为止。

我们也将蓝瑞降级，因为我们认为他夸大这个课题只是为了建立个人的声望。他也接受了再教育，随后我们委派他到彭亨西部一个单位当“政治指导员”。他心存怨恨，并在1950年6月27日伙同他的警卫员变节，向警方投诚。蓝瑞对英国说，他在我们把他当作处决的对象后，潜逃了出来。这是个无稽的指责，因为他才刚被委以新职务，但是这个说法恰恰是英国宣传员所好。他们制作了一份心理战册子，并伪称是蓝瑞所写，题目为《我的指责》（I Accuse）。藉着这份册子，英国得以向我们发动典型的抹黑宣传。他们在册子里说，全体中央委员都是骗子和惯于说谎的人，这些人挥霍党用来推动城市革命工作的经费。跟着他们利用蓝瑞含沙射影地说，我是1942年日本秘密警察突袭黑风洞会议，造成多名资深同志牺牲的惨剧的罪魁祸首。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从头到尾都是无中生有。

我们抓紧时间举行展延后的第一次会议，而政治局委员只剩下4个人。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我们要求杨果回到雪兰莪，以便解决需要他亲自处理的党务。他答应在几个星期内回来。我允许他在我们休会后便离开。当他动身取道森林时，我人还在那里。那将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可信赖的老朋友。杨果好几次尝试与我们重聚，可是没有一次成功。有几次英军巡逻兵阻碍了他的行程。至于其他情况，前来给我报告杨果预定行程的交通员被捕了，结果自然是取消行程。

* * * * *

组织、训练“26独立中队”，以及让它备战，相当费时。筹备这项任务时，我们还留在文德甲地区。一直到1950年中，我们才能够调遣“26独立中队”北上，以便考验我们修订后的战略。我们搜寻下手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市镇是瓜拉吉尧（Kuala Kerau）。9月11日，指挥官振南（“不兰丹”时代的阿杨）率领

“26 独立中队”向这个小镇的铁道和警察局发起联合进攻。游击队烧掉火车站和附近的两间民宅，还杀了两名英国铁道工程师。此外，他们也成功令一列政府派来增援的装甲列车出轨。旗开得胜之后，“26 独立中队”继续北上，他们袭击小镇和园丘，并且伺机伏击重要的军事护送队。我们要让游击队员们尽量在短时间内累积最丰富的战场经验。事实上，我们早在 1949 年 10 月已经就此向半岛各地的单位发出了一道通令。

何其巧合，我们发出这些通令时，竟然碰上了英国准备展开他们称之为“剿匪月”的行动。“剿匪月”行动将从 1950 年二月底至三月底期间展开，主要目的是让保安部队尽量捕杀我们的同志，另一个目的则是要产生重要的心理效应。殖民地政府尽量动员最多的平民志愿性参与保安部队的反叛乱工作，目的是要尽力诱导民众萌生应付紧急状态的责任感。“剿匪月”启动时，我们加强的军事力度才刚刚取得势头，其结果成了政府的梦魇。关于那个时期主要游击战事件的官方统计显示，在那几个星期里我们的活动大大增加。同一时期保安部队的人员伤亡人数也大量增加。媒体、种植园主及矿家们严厉谴责政府，并断言这项经过大事宣扬的政府计划是个灾难性的失败。

有趣的是，远东地面部队总司令约翰哈丁上将（General John Harding）在 1950 年 4 月 11 日所作的报告，却说“剿匪月”暂时性激起了平民的士气与自信。但哈丁接着强调说，这些成果已被“共匪”升级的活动及外来事件的压力所抵消了。他所指的“外来事件”当然是指中国在 1949 年 10 月落入共产党手中，以及英国在 1950 年 1 月 6 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

哈丁的评估宣称公众“畏惧”中国共产党可能派领事到马来亚。他写道：“尽管我方作好所有防范，这类领事馆难免会成为共匪的情报、相互沟通及指挥中心，因而令敌方得到实质的增援。”

这位上将提起国内及英国的新闻报道，以及公众信任的消息灵通人士所写的失败主义声明。他宣称这些人造成公众信心滑落。他警告说，公众信心滑落将“完全不合情理”的持续下去，必须采纳进一步措施，才能制止。

哈丁补充说：“此外，共产党若再次告捷，例如拿下海南岛及台湾，势必进一步增强共匪的士气，以及令他们的支持者增加。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及印尼的其他共产党告捷的可能性，也应用来评估马来亚及新加坡的事态发展。”哈丁接着建议英国加强它对马来亚的军事承诺，将香港驻军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旅（Royal Marine Commando Brigade）调派到马来亚。他也要求紧急调动装甲车

增援队。

英国很快承诺派遣第 28 辜卡兵旅到马来亚，哈丁的建议显然震撼了在伦敦的国防部。在短短 18 天内，内阁国防委员会不但商讨了哈丁的评估，还根据他的评估提呈建议书给首相克雷芒·艾德礼请准。哈丁不但得到他所要求的突击旅，而且第 13 及 18 轻骑兵装甲车团也将从中东调派过来，由他指挥。

到了 5 月，当英国正在思索如何最好地部署他们即将到来的增援之际，我们准备将总部北迁，以便更接近“26 独立中队”的活动范围。倘若非要我说何时是我党军事斗争的最佳状态时刻，那么大概就是这段时期了。然而，这却是没有欣喜之情的最佳状态，也是昙花一现的最佳状态。

“我们在文冬冗长的重新评估会议就到尾声之际，殖民地政府破天荒第一次点名我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政府在1951年9月5日发布特别通告，悬赏8万元生擒我，倘若抓到我时我已死了，则可得赏金6万元。显然，他们只揭露我在党的化名——陈平。”

第十七章
布里格斯计划的打击

尽管惊慌失措的元素正在敌军阵营里发酵，可是我知道，正当我们北随“26独立中队”之际，我们意欲建立主要森林营区，进而最终成立解放区的战略遭遇了非常严重的难题。我们在文德甲的反复试验足以证明我们需要彻底改进游击战略。已开人话望生，试图建立解放区的北区主力部队送来的报告，并不令人鼓舞。

我们在吉兰丹的游击队分为三个单位，由霹雳州委书记爱克指挥。我们在彭亨发动攻势之前，他们早已在吉兰丹活动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遭到敌军大力反击。英国的战场情报员迅速发现阵容强大的游击队已经潜入话望生，于是开始部署增援，并调动连队规模的兵力展开行动。我方的北区主力部队耗费许多心力躲避英国巡逻兵，更甚于用来确定攻击目标、备战及发动攻击。经历了惊心动魄的6个月之后，无甚建树，我方的战场司令被迫彻底改变战略。他们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撤出吉兰丹，然后将部队重组成更小的单位。这个决定在他们撤到霹雳比较熟悉的地带时，很快就加以实施。

详细描述我党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令我们在彭亨探索正确布局的任务更加复杂。我希望藉着部署我们称为“第10支队”的全马来人单位，能够避开在吉兰丹可能犯上的错误。我一直认为吸收大批马来人加入我们的部队，势在必行，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政治含义。早在1948年，我已指望建立一个卓越的马来人单位。我们开始在淡马鲁一带的甘榜（kampong，“村落”之意）招收马来人党员。我想，历史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在上个世纪这一带曾发生一场抗英起义，

我们迄今仍能感受到潜伏的激进主义氛围，以及村民的反英情绪。

我们的努力卓有成效。1949 年杪至 1950 年初的短短 6 个月里，我们吸收了超过 500 名马来队员。这些马来队员旋即被安排参加由马来干部主持的密集训练。他们的总指挥正是阅历多姿多彩且经验丰富的阿都拉仄达（Abdullah Che Dat），党内上下都叫他阿都拉西地（Abdullah C. D.）。我们的整体目标是将第 10 支队一分为二，以便在彭亨建立两个森林营区，一个在彭亨北部，与丁加奴及吉兰丹毗邻的交界处，另一个在彭亨南部，与柔佛及森美兰毗邻的交界处。第一批 300 名马来队员动身北上到而连突附近的临时营区时，阿都拉西地和他的个人警卫小队并不在总部，他转告说，一到而连突，就会和他的部队会合。

在等待阿都拉西地到来之际，这支刚在而连突北部建立营区的马来人部队便遭到由敌军统帅部控制及指挥、由国民党土匪组成的特别部队的攻击。这些专事抢劫掠夺的不法分子曾在日治时期与英国的 136 部队一起活动。他们经被重新组织、训练，并由政治部管辖。这批土匪的人数最多是 50－60 人，他们配备精良，也经过战场的历练，攻击我方的 300 名马来人新兵。此事的结果令人沮丧，我军的临时领导人没有下令反击，反而选择撤退。国民党部队冲向我方营区时，他们从营区周边的防卫岗哨向敌方开火，但是后面的主力部队并没有支援。

马来部队并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他们只是撤退。防卫岗哨的士兵射出防守的第一轮子弹后，发现后无援兵，便决定撤离战场了。在混乱中，这些士兵无法确认他们的指挥员身处何方，超过一半的撤退士兵逃到彭亨河附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舢板渔船。于是，有些人用钱买下舢板，有些人则偷走舢板，然后划桨沿着河流回去他们的甘榜。英军发现他们大败我军后，便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着眼于令撤退的士兵投降，人数越多越好。英军也发动大规模宣传配合这场搜捕行动。一个接一个马来士兵投诚了，在此事件中，原有的 300 名人员中，约有 200 人投诚。他们被送到扣留营，但他们被扣留的时间很短。经过一番严厉训斥后，他们被释放回家，从此再也没有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了。

阿都拉西地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动身前往淡马鲁找回失散的士兵。他找回了大约一分队，50 人左右的兵员，并将他们重组成新的单位。然而，我们在而连突溃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开，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要吸收中坚的全马来人战斗部队的希望从此幻灭了。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我必须清楚申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马来游击队员是懦夫，他们只是毫无经验。在作战总部的我们应该负起全责。

阅历多姿多彩的阿都拉西地，在 1949 年还是一名年轻的游击队员。

* * * * *

约莫此时，英国战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完成了一份重要的报告书⑰，在 1950 年 5 月 12 日提呈给英国内阁的马来亚事务委员会成员。我在此摘录报告书的其中一段内容，以凸出两点：一、英国在马来亚的政策纯粹是要保住这个领地，因为马来亚是英国这个殖民政权最重要的赚钱地点；二、英国知道贫富悬殊是马来亚共产党最主要的核心论据。

斯特雷奇写道："我们强调，马来亚对我们最为重要的角色就是赚钱，这是实情。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马来亚的经济与社会，我们难道不应该投入多些英镑吗？这些资源当中，有一些将是来自英国，但有一些应当来自马来亚本身，要这么做就得有更好的资源分配。马来亚事务委员会应该知道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实情是，仅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固定收入是取自这个殖民地现行的所得税率。我认为，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仍不可能向马来亚的富裕华人及欧洲商贾和雇主征收诸如课税之类的任何费用。这必然意味着马来亚存在着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

* * * * *

文德甲之后，我选择在加流（Kerdau）地区建立另一个营区。当地居民中有我党最忠实的支持者。我们在 1950 年 6 月 24 日抵达我们看中的营地，当天正是朝鲜半岛战争爆发的前夕。我从没想过要把加流当作永久性营区，因为这里太偏僻了，要和州委会联络上肯定会有困难。当我们要和在雪兰莪的杨果保持联系时，证明了情况的确如此。新营区的孤立位置，使我更加能够集中地思考武装起义两年以来我们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以森林战士维生的粮食供应最为严重。

一年前，在我们第一个总部营区开会期间，杨果私下找我谈，提出了最有预见性的观察。他担心在马来亚的英国政府可能会采取类似 1930 年代日本在满洲国执行的政策，把老百姓集中在集中营里，以阻止他们和当地游击队接触。日本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切断了共产党的重要供应线。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认为英国不可能会采用战败的日本在多年前采用的策略。我含糊地告诉杨果，我认为这个推测极不可能发生。我说，日治时期，日本人也曾采用这个称为"堡垒村"的策略对抗我党的游击活动，但是却对我们起不了任何作用。英国人肯定非常清楚这件事，他们何必重蹈覆辙？

回想我提出的理由时，我发觉我的看法多么没见地。要执行这类策略，必须冷酷无情，日本人的确有冷酷无情的性格，但是我认为英国人的性格恰恰相反。更重要的一点是，以我党游击队的规模，是不是非得依赖居民接济才能维生？我想到马来亚有大量杳无人迹的森林，难道它们无法养活我们？我又错了。可惜的是，杨果却选择不与我争论下去。

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就得到了教训，从中觉悟到即使是小规模组合，例如 30 个游击队员，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依赖森林里的天然营养维生超过两个星期。这段时限过后，如果他们还得战斗，他们就必须得到外面供应的粮食。当杨果首先提及此事时，倘若我能完全意识到游击队在森林营区维生的诸多难题，我们或许会缩小各单位的规模，以及开发适当的粮食供应方法，也许就能应对较后遭遇到的严重问题了。

我转移阵地到加流的两个月前，英国退役中将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Lt 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到吉隆坡出任殖民地政府反共产党运动的军事指挥官（Director of Operation）。他之所以愿意接受此职务，是因为得到同意他的任期不会超过 18 个月。布里格斯带着他在西部沙漠、伊拉克及缅甸的辉煌战绩前来履新。1946 年，他担任缅甸统帅部总司令的将官。才踏进他在吉隆坡的办事处的几天内，他就排定了视察马来亚的密集行程。6 个星期后，他向在远东的英国国防协调委员会（British Defence Coordination Committee）提呈一份计划书，建议"从南到北，逐步地"消灭我党在半岛各地的军队。这份报告书提出 4 个步骤，后来被称为"布里格斯计划"。

首先，他建议全面革新军方及警方的情报收集步骤。其次，他建议制订一项方案，以粉碎垦殖区的"民运"供应网络。第三个步骤对马来亚共产党最具破坏性，那就是采取最周密的措施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线。最后，他建议制订一项战略，以迫使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与政府保安部队作战。

布里格斯计划里的"新村"，与日本的"堡垒村"极相似。殖民地政府在 1950 年下半年开始推行"新村"计划，到了 1951 年上半年开始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粮食供应线。在布里格斯计划初期，我仍觉得我们能够依赖群众的支持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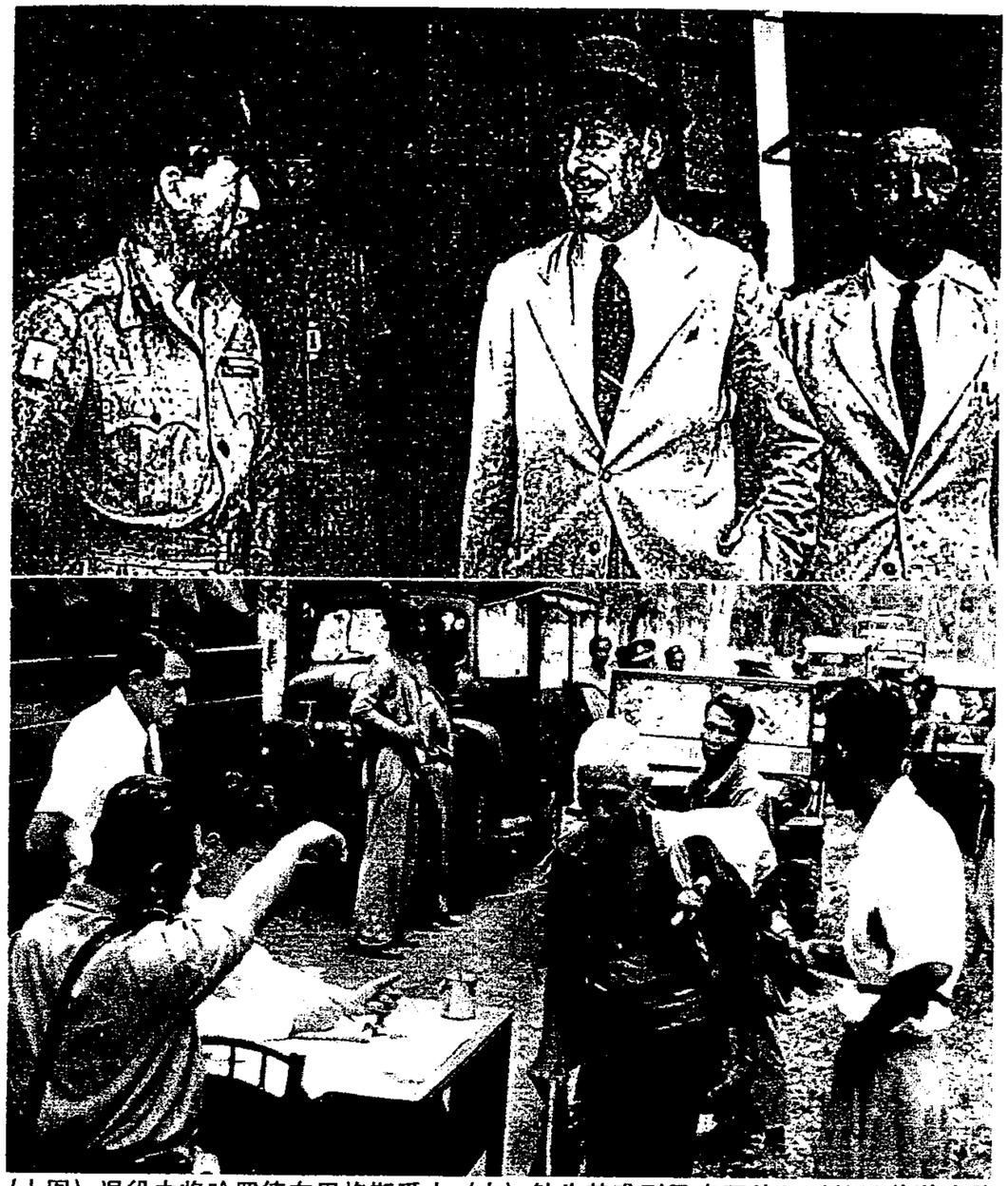
存。我们投入很多心力经营垦殖区居民的“民运”，而且我们建立的供应线是有效用的。然而，越来越多人被成群迁徙到新村里，新村以高耸的带刺铁丝网包围着，装有探照灯、有警卫、不时搜查、频密盘问，以及限制个人行动。我们终于觉察到我们正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几个月过去了，英国进一步调整了布里格斯计划，官方变得非常巧于应变。他们不但控制新村的粮食出入流通，还在每个新村推行集中煮食制度。这个制度是要监督所有粮食的食用情况。从那时起，村民再也没有任何藉口往返运输补给用品了。当布里格斯计划过后成为了我们的致命弱点时，我应该用更长的时间好好地反省自己对杨果同志的轻率回应。

因此，我和我的部下们不得不坐下来，非常谨慎地分析粮食供应的困境。我们意识到马来亚不是粮食生产国。马来亚的白米及大部份肉类都是进口的。当然，马来亚有大量的橡胶树。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我甚至曾想过橡胶的种子能不能吃。如果橡胶的种子可以吃的话，不但我们的粮食危机迎刃而解，也将大大破坏布里格斯计划的成效。我们听一些马来同志说过，马来人有个民间传说，提到他们的祖先如何令到橡胶种子变成营养的食物。马来人非常相信这个传说，我甚至因此寻求北京协助研究此事。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橡胶种子含有毒素，而且没有方法可以清除种子里的毒素，令它可以食用。

粮食危机是个没完没了的难题，但是在我们的武装斗争期间，似乎总会出现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支撑着我们的决心。举个例子，较早前“26 独立中队”发动攻势的成果，足以让我恢复信心，在检讨战略及士兵们的斗志后，决定暂时不撤离加流。后来，英国调派了 6 个营的增援（其中包括三个营的辜卡兵）进入而连突一带，要阻截我们北上的去路。当时的战斗的确非常激烈。“26 独立中队”重演了我党北马游击队的经历，在战场上失去主动权，反而将精力集中在躲避越来越多的敌军森林巡逻兵。这种情况维持了三个月，而敌军升级后的军事压力迫使我们先是将总部向西迁移，然后又南迁到文冬市镇周围的森林。此时，我命令“26 独立中队”暂停联系，并进入森林深处，以待恢复元气。我刻意让他们留在那里，直到我们完成谨慎的战略检讨为止。

事后检讨时，我们承认得到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教训。当我们首先在吉兰丹及彭亨发动袭击时，我们有信心占领这两个州的一些地方，然后据守这些地方抵抗英国的任何反击行动。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发觉到这些想法毕竟是眼高手低了。在当时，那两次行动成了累积战场经验和开发技能的实践训练。我们必须拟出新的战略蓝图，以让党内各游击队单位遵循。



（上图）退役中将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中）勉为其难到马来亚就任对抗马共游击队的军事指挥官，条件是任期不超过 18 个月。他带着在西部沙漠、伊拉克及缅甸的辉煌战绩前来履新。就是此人拟定行动方案建议“从南到北，逐步地”消灭我党军队，其策略后来被称为家喻户晓的“布里格斯计划”。

（下图）“布里格斯计划”建议在马来亚各地的乡村地区建立所谓的“新村”。这些用围篱、有警察巡逻、夜间有探照灯光，以及全天受监视的新村，成功地切断来自“民运”的粮食供应线。村民出入新村都得经过保安部队和警察严密监视和检查。

后勤供应的教训相当令人气馁。留住两百名游击队员在一个单位里，我们的后勤供应犹如杯水车薪。单单粮食就已经是个大难题了。无论我们去到那里，都是面对相同的难题：严重的粮食短缺。无论村民多么支持你的革命事业，你也无法期望有个村子有能力连续不断地提供粮食给两百个胃口极大的战士，也没有任何一座森林拥有天然的可食用水果和野生动物满足这么庞大的粮食需求量。

英国引入增援后，战斗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战事伊始时，是由我们圈定能够主宰战局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袭击，直到某个有利我们撤退的时间为止。这是典型的游击战略。如今我军已失去决定在何时、何地发动袭击，以及袭击行动要历时多久的主动权了。

周而复始的迁移、战斗、撤退、重组，然后再战斗，消耗了单位的士气，因为游击队员们已经疲惫不堪了。有趣的是，我们的伤亡率很低。我们有损失兵员，但人数不多。当英军的火力升级，情况许可的话，我们会避开硬仗。我们掌握了一些有用的战略。我们善于撤退到有利的森林据点过夜，令英军难以突袭我们。就引诱敌人掉入埋伏而言，我们累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们曾经很渴望一举歼灭英国巡逻兵，但是这个目标多半与我们失之交臂。我们歼灭了少数敌军，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在战场上把敌军杀个片甲不留及夺取武器和弹药。我们要能继续行动，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最为重要的是，将两百名游击队员集中在单一营区的试验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及搁置建立解放区，并以中队规模的部队维持它的念头。我们承认，相对于英军已展示的反击能力，我们这种策略无异于自毁。

检讨过后，我们即刻将主力部队的 200 名兵员重组成较小规模的游击队组合。此外，我们也发出指示，大意是说我们自此之后放弃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 * * * *

我们在文冬的营区设在浓密的森林里。此时，一些新村已经建成，并按照布里格斯计划行事。一些新村相对接近我们的据点。当时隶属于中央机关队的彭亨游击队主力部队共有两分队大约 60 人左右的兵员。基本上我们是依赖两个村子的居民支援。可是后来，警方接连地打击我们的“民运”支持者。

蓦地之间，我们竟无粮食供应了。重新建立自村子到森林的走私路线的希望非常渺茫，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应付。我们将总部部队的大多数队员分散成小单位，分派到其他地区。如此一来，总部只剩下一支大约 30 人的警卫分队、政治局委员及他们的个人警卫员，以及驻扎在附近的小规模武装工作队，人数总和大约 80 人左右。即使如此，我们也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

我们尝试采行配给制。每个人每天获得一“牛奶”罐的白米作为主食。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就陷入半饥饿的处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还要游击队备战，就太异想天开了。

新村的保安工作由军方及警方联手部署。负责管辖我们所在地区的英军驻扎在文冬，公路距离约 10 英里，但是乌鸦飞行的话可能不超过 3 英里。警方负责监视新村情况，政治部警员在每个被围篱隔开的新村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情报，掌握我们的同情者与游击队的联系情况。军方负责巡逻当地许多辽阔浓密的森林。我们在文冬的总部未曾被发现，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警卫队严格遵守命令，避免与英军巡逻兵有任何接触。

我们的总部附近有条小河，那是士曼丹河的支流。粮食危机告急时，我们每天派一队人去那条小河采集生长在沿岸的芦苇。这些芦苇长得像草，但它们含有毒素，会导致皮肤疼痛。不过，如果用水把它们浸泡 24 小时，然后彻底洗净，它们是可以吃的。我们把这些芦苇煮来配饭吃。吃过芦苇和饭后，你就觉得饱了。不过饱的感觉最多维持两个小时，过后你又会觉得异常饥饿。我们猎捕山猪和猴子，吃它们的肉。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几个月。布里格斯计划的确发挥了作用。

我读到那些撰述紧急状态情况的人叙述我们不断以残酷手段，确保“民运”的支持。这种说法严重歪曲事实，也是政府的宣传所产生的效果。毫无疑问，我们采取了控制措施。我们的政委给“民运”讲课。我们有时会稍作威胁，以保全供应线。无可否认，有些时候会做过头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绝对不是我们的一贯手法。当然，政府的宣传就会按照他们所要看到的效应来突出这种情节，然后歪曲成那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信仰。我们严厉惩罚那些肆意出卖我们的人，这是实情；但我不会就此道歉，毕竟那是一场战争。但是整体而言，自日治时代开始，我们在城市和乡村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就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斗争。他们对我们而言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残酷粗暴对待他们只会对我们的斗争产生反效果。

* * * * *

我们在文冬冗长的重新评估会议就到尾声之际，殖民地政府破天荒第一次点名我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政府在 1951 年 9 月 5 日发布特别通告，悬赏 8 万元生擒我，倘若抓到我时我已死了，则可得赏金 6 万元。显然，他们只揭露我在党的化名——陈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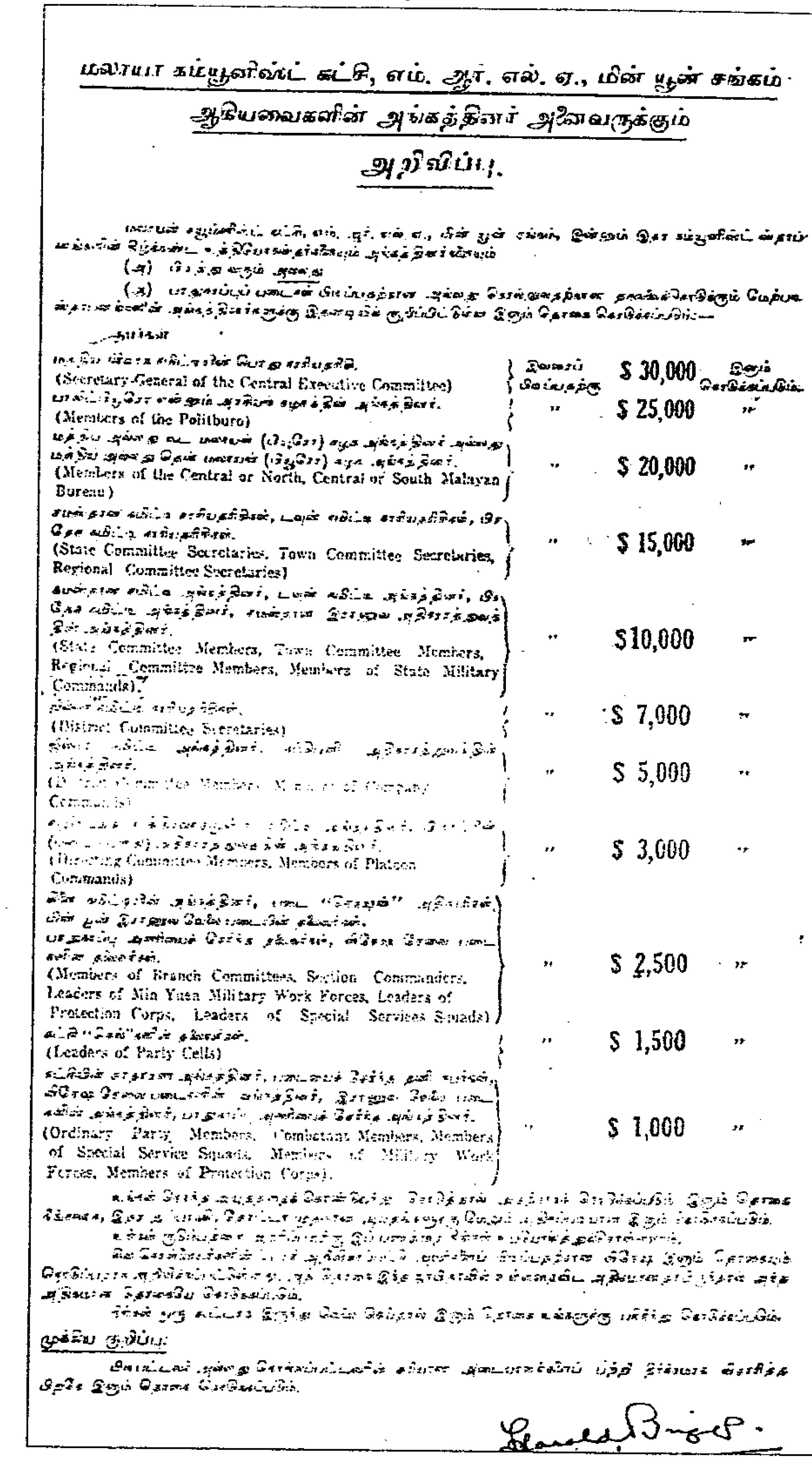
1950 年 12 月，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颁布命令，悬赏可以协助政府逮捕马来亚共产党干部的情报。我名列榜首，我的人头值 3 万元赏金。不过当时政府并没有揭露我的身份，只是称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而已。

我想，英国早在紧急状态初期已经得到可靠情报，知道我的党职、以及我的个人背景。若说在警方突袭金宝郊区矿家的洋楼的第一天，他们还没得到此情报，那么几个星期后他们拷问陈勇时、肯定掌握了许多关于我的资料。

我们马共领导层推测了为什么英国把我的身份保密这么久。毫无疑问的，这与宣传工作息息相关。其中一个立论是，一旦揭露我的身份，政府即刻就在国内外面对穷于解释的窘境：一个被他们极尽描绘成嗜杀成性及残暴的“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为何值得让英国授予两枚军事勋章及一枚大英帝国功勋章？另一个立论则认为，英国保密我的身份，是希望令我自鸣得意及疏于防范，他们才有更好的机会将我伏法。何其巧合的是，当时群众的注意力更多是集中在钦差大臣葛尼关于紧急状态要在第二年结束的扬言。

但是在 1951 年 9 月，政府公开了我的别名陈平，而英文及亚洲语文报纸的报道也竭尽所能经由一切消息来源探索我的背景。然而，这些报道并不是英国政府想看到的。以《海峡时报》为例，它在 1951 年 9 月 6 日刊登的一篇报道追溯查普曼的战后著作《森林是中立的》，并且引述说我曾是“英国最信任的游击队员”。这篇报道的标题是《陈平——英国“信任”的人，如今却是个危险敌人》。

同一篇报道也引述了一些殖民地官员对我的印象，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理查布鲁姆及克劳德芬纳，他们形容我谈吐温和、文静及文质彬彬。报道写道：



மலாயா கம்யூனிஸ்ட் கட்சி, எம். ஆர். எல். ஏ., மின் யூன் சங்கம்
ஆகியவைகளின் அங்கத்தினர் அனைவருக்கும்
அறிவிப்பு.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 30,000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 25,000
(Members of the Central or North, Central or South Malayan Bureau)	$ 20,000
(State Committee Secretaries, Town Committee Secretaries, Regional Committee Secretaries)	$ 15,000
(State Committee Members, Town Committee Members, Regional Committee Members, Members of State Military Commands)	$10,000
(District Committee Secretaries)	$ 7,000
(D[illegible] Committee Members, M[illegible] of Company Commands)	$ 5,000
(Directing Committee Members, Members of Platoon Commands)	$ 3,000
(Members of Branch Committees, Section Commanders, Leaders of Min Yuen Military Work Forces, Leaders of Protection Corps, Leaders of Special Services Squads)	$ 2,500
(Leaders of Party Cells)	$ 1,500
(Ordinary Party Members, Combatant Members, Members of Special Service Squads, Members of Military Work Forces, Members of Protection Corps)	$ 1,000

殖民地政府早期的一份悬赏通告，呼吁百姓提供情报逮捕全体马来亚共产党成员。这份悬赏通告由军事指挥官哈罗德布里格斯签发。此时英国政府忍着不公布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正是三年前得到他们授予英国军事服务勋章的陈平。读者可以看到，我当时的价值是 3 万元（海峡殖民地元，即叻币），即使以今天的币值计算，仍是相当可观的赏金。

The Straits Times

MALAYA'S NATIONAL NEWSPAPER: ESTABLISHED 1845

PUBLIC ENEMY No.1 NAMED

$80,000 reward for capture of Red master mind

$60,000 IF HE IS DEAD

Body of shot Johore Red chief found

BRITAIN HAS BEST NAVAL NET

CHIN PENG—the man Britain 'trusted' is now a dangerous foe

May be in Pahang

English-speaking

Man of his word

Left Malaya

最终，英国的反叛乱专家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揭露我的身份。为了避免对宣传工作产生两难效应，殖民地政府向新闻工作者汇报这个英国曾经“信任”的人。他们要暗示的是，从 136 部队时代开始，我不知何故出轨了，而如今我已成了首号公敌。

“陈平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英军在重新占领（马来亚）之后立即察觉到这一点，当时它们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解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以及满足他们的战后需求。”

在 1951 年的悬赏通告上揭露我的身份，也许是因为政府希望藉此诱发叛变。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他们就错了。在紧急状态期间，我从不觉得我身边的人会加害于我。

我们仍在文冬时，我的妻子坤华已经被调回中央机关队了。她曾在霹雳的都赖（Tras）一带担任区委，都赖其实距离我们的营区不远。她在 1949 年底离开文德甲营区，当时我们决定减少中央机关队的非战斗人员的人数。我的妻子和其他女同志都在同一时候离开。我们必须确保营区里棘手的家眷问题得到控制。我知道一般游击队员很难接受马共高层领导人在条件欠佳的森林环境里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

蓝瑞变节后，英国的宣传工作对此着墨很多；蓝瑞显然利用这个课题讨好敌人。事实上这件事不曾失控，因为我们有采取行动化解，而结果是坤华及其他人的妻子都得离开文德甲，因此英国的宣传也堪称得到些许成果。坤华及另一位女同志奉命到文冬料理复杂的行政事务。她们是在 1951 年 9 月底抵步。

* * * * *

当英国的战后财政复苏拖延后，暂时撇开紧急状态不谈，英国议会的政治人物仍然受到马来亚及新加坡发展中的经济所鼓舞。他们深信无疑，认为马、新两地将完全恢复战前的情况，继续成为英国的金山银矿。

债台高筑的英国要多快走出战后的金融危机，就得看它能不能成功维持她在殖民地的统治权。早在 1949 年 6 月，官方统计显示，橡胶、稻米及锡产品指数都超越了战前的记录。具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在 6 月 16 日的社论中提到，殖民部一份记录这些成就的报告，热烈赞扬那些“付出心血及出谋献策以促成这些成就”的人。

这份报纸评论说：“倘若不是面对莫斯科的魔爪阻挠进步，这些成就会更大。在马来亚的意识形态土匪一他们的战时和战后纪录完全与他们在其他地方

的作风一致，已经部分被消灭了，但是共产主义的祸害如今威胁着香港。享受英国政府的利益的远东人民，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以免受害于这个新敌人，这个新敌人的破坏力犹胜日本人。”伦敦的宣传人员此刻一定欣喜若狂。

朝鲜战争爆发令马来亚及新加坡富裕起来，这是连最贪婪的殖民地官员都无法想象的。这种极度的富裕为我们的运动产生非比寻常的边际效应。即使是“民运”中的小园主也因为橡胶及锡米价格暴涨而发达。我党得到的捐献也相应剧增，以致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组织而言，我们在财政上算是富裕的。但是，尽管财政富裕，我们仍然缺乏粮食。布里格斯计划导致我们无法出外购物，而我们也束手无策。国家突然富裕起来，也大大影响了我们广招人员的工作，新人大大减少。由于村子富有了，极少人会受到政治哲学的感召，至于那些肯为理想而牺牲性命的人则更少了。

我们仍然坚持下去。到了 1950 年底，几乎所有主要单位都拥有本身的流动无线电接收器，但是我们全都没有发射器材。我们能够收听北京电台、莫斯科电台、英国广播机构的远东分程转播网络的节目，以及收听马来亚电台的本地新闻。我们集合在收音机周围听节目。我们定时把新闻报告加以记录、转成文字，然后将我们注意到的相关要点通过传单派发下去。

* * * * *

1951 年，新加坡警察展开了一系列闪电行动，突袭马来亚共产党在岛上的基本设施。当时新加坡与我们彭亨总部的沟通联系十分有效，因此我能够掌握当时殖民地政府采取行动对付当地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的最新报告。这一轮镇压行动的受害者之中，大多数曾在紧急状态颁布后参加过我们的组织。一些人通过抗英同盟（Anti-British League）成为党员，另一些则由于新加坡的地下人员认为他们靠得住而被吸收为党员，并没有提交给中央机关队请准。我对英国向这些人开刀大感迷惑不解。这些人全都很公开发表言论，而我们也一直认为他们极可能暴露身份。因此，他们绝不可能出任党内组织的敏感职务。

我谨慎阅读新加坡地下人员发来的报告。当镇压行动逐步升级之际，我指示那些我们归类为“公开人物”的党员一意指身份已经公开暴露的党员，撤退到任何一个便利而安全的目的地。一些人去了印尼，另一些人则去了中国。越过

长堤到马来亚则万万不可，因为马来亚的斗争非常激烈，也蔓延开来了。

其中一个撤离者是余柱业，他是一名资深党员，曾经秘密出版我们在新加坡的地下报纸《自由报》（Freedom News）。余柱业是莱佛士书院的经济系毕业生，他曾经与陈嘉庚经营的一份亲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南侨日报》保持较公开的关系。余柱业以及和他一起离开的同志潜伏在邻国印尼。他们意欲在新加坡的政治局势转为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利时回国。余柱业是个经验丰富的宣传高手，极少同志离开新加坡之后还能在流亡中活跃如昔，余柱业正是极少数之一。他在新加坡以南的廖内岛（Rhiau Islands）落脚，并在当地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我亲自与他见面，是在十年后的北京，当时我们一同策划安排另一批党员从新加坡大撤退。

现在的学生如果阅读那些从未见过我们，也未曾与我们有任何沟通的作者所撰写的著作，他们恐怕难以接受我们的确对自己的道德使命深信不疑。对我们而言，殖民体系的不公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为贪婪的殖民“宗主”只是躲在“只限白人”的俱乐部看待全世界。富裕的种植园主及矿家以仅够勉强凑合糊口为酬劳剥削男女劳工，是铁一般的事实。政府部门的贪污及法律的陷害、惩罚每天都在发生，而这些情况都对殖民地政府有利。尤有进者，伦敦的真正掌权者要继续榨取马来亚的天然资源，以利其本身的目的，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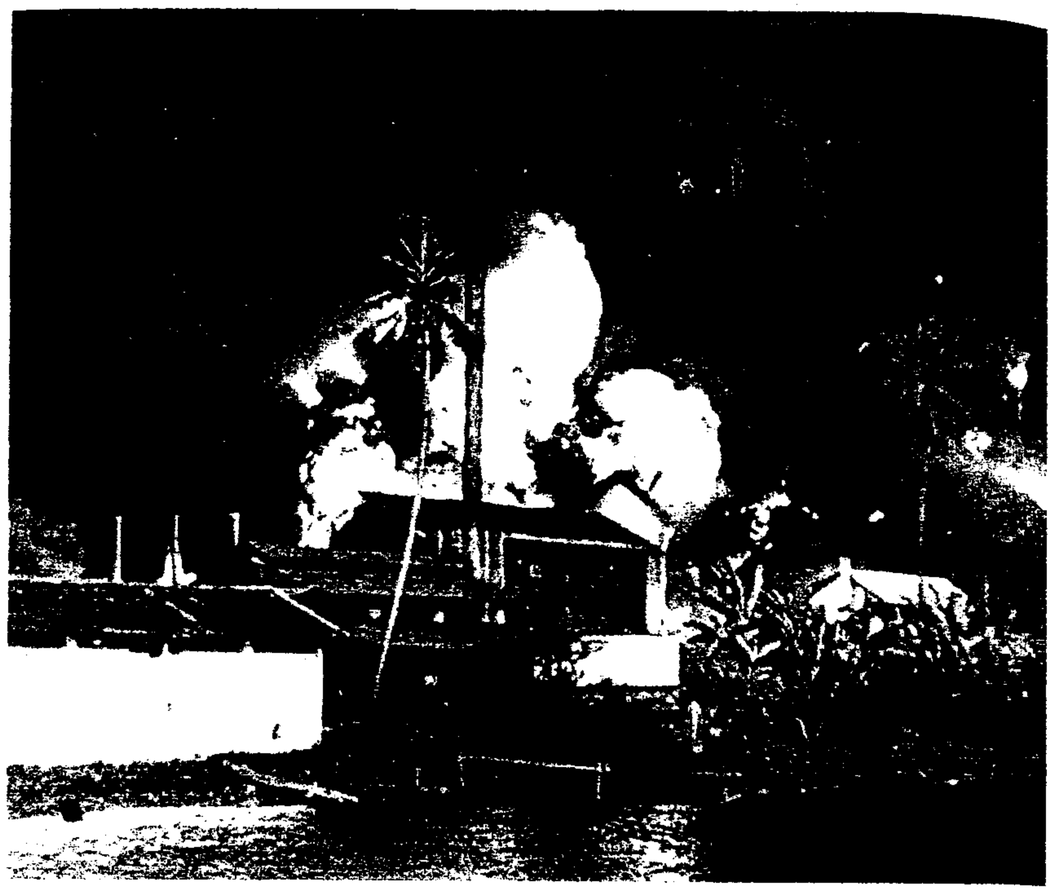
* * * * *

认识到我党从 1948 年杪至 1951 年期间的军事取向完全不适当，是难以接受的事实。1951 年 8 月至 9 月，我们检讨了武装斗争策略，历时整整两个月。尽管检讨的结果令人沮丧，但没有人建议放弃武装斗争。根据我们在日治时期的经验，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的游击战还可以维持许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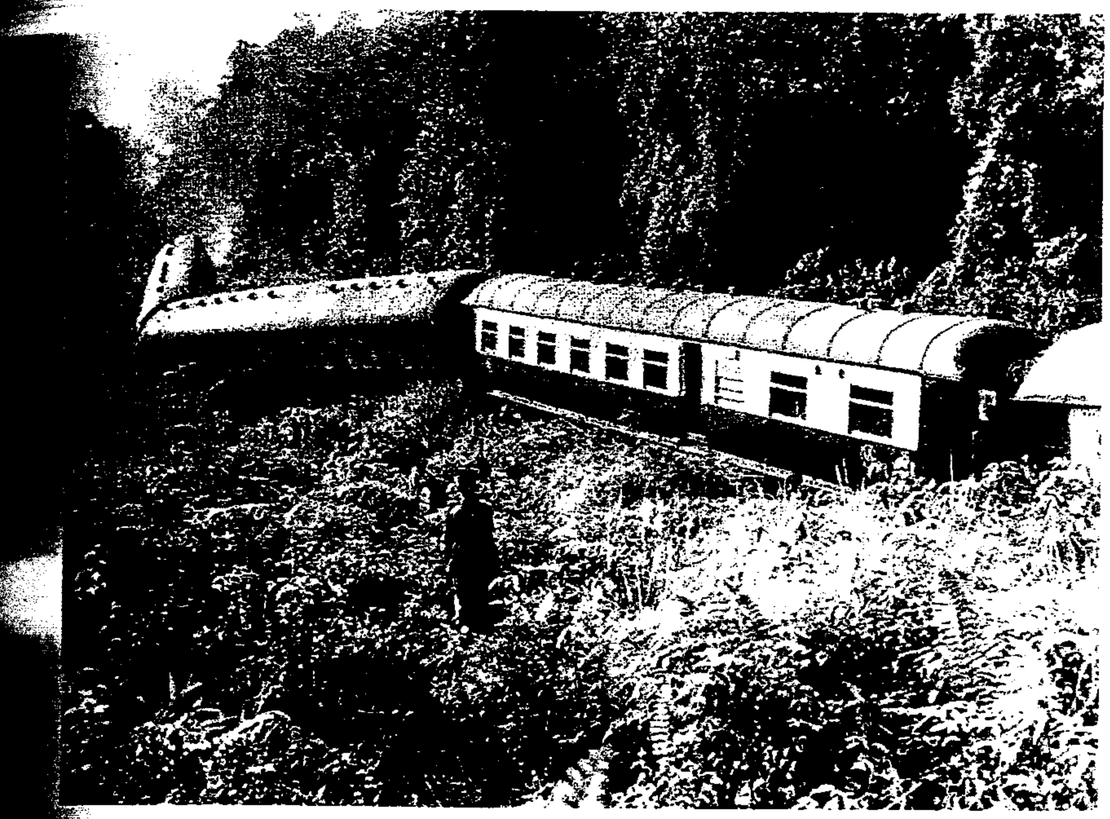
我们在文冬接到来自吉打的报告，说我们在当地的游击队员是以分队规模独立运作的。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已经在郊外相当大范围的地带发动一连串闪电式伏击行动。我们将这些值得注目的行动详情广泛发给部队的所有单位，并附上党对吉打部队的嘉许。我们也下令所有单位向吉打部队看齐。

广泛检讨战略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1951 年 10 月 1

这两页的照片显示的正是我党政治局所关注及讨论的类似事件，以致我们发出 1951 年的《十·一决议》。图中所示恶意砍割橡胶树的做法，对我们的革命事业产生反效果。



新加坡的益和（Aik Hoe）树胶厂在 1950 年 7 月被熊熊大火吞噬，也是其中一个案例。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当时宣称他们有文件证明这场火灾是共产党特务纵火所致。我对这个指责没有异议。



1950 年初，马共同志们在柔佛的金马士令一列火车脱轨。这张图片显示，七节车厢中的三节脱轨了。这绝不是一宗孤立事件，因为这是 24 小时内的第四宗火车脱轨事件。

日决议》；不幸的是，这份文件却未能抓紧军事问题，以及执行我们在检讨会议里拟定的解决方案。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战场指挥员只专注决议的词句，而没有注意与其一起发出的指示。由于外界对此事有诸多着墨，我不得不再次直接说明实情。正式发出决议及附随的指示之前，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它。这些文件是政治局里，我、李安东及小章讨论的成果。商议期间，阿仲恰巧从彭亨东部来到文冬，因此也参加讨论。政治部及一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些文件是出自杨果手笔，这个说法毫无根据，因为当时杨果已经离开文冬，前往雪兰莪了。

这份文件是出自深刻的自我反省。它注重我党在困境中的政治问题更甚于军事策略。我们认为附随的指示已充分涉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决议本身强调游击队采取补救行动，以显示群众的更大支持与同情。这当然反映了布里格斯计划的成功，以及它给我们造成的困境。我们承认我党犯下的诸多错误已破坏了我们与人民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我们指示士兵们停止砍伐橡胶树、没收身份证、焚烧巴士及攻击载客火车。

我曾听过这样的讲法：如果我能更好的控制全国各地的游击队，这类过激作风也许不会在 1950 年至 1951 年间出现。此事还有许多内情。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除了没收身份证之外，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绝对没有下令砍毁橡胶树或以暴力破坏公共交通工具。这类事件却大规模发生，但是它们是出自一些个人发出的命令。从宣传的立场上而言，我们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党内传达决议将近一年后，政府揭示他们已取得一份副本，但省略不提在什么时候取得。这份文件不但为敌方提供宝贵的洞察力来制订最好的反击战略，更令人沮丧的是，它暴露了我们萎靡不振的士气。它也非常明确地暴露我焦虑地要避免发生这种过激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我们的“民运”造成的打击。这份文件应该也立即为英国的宣传工作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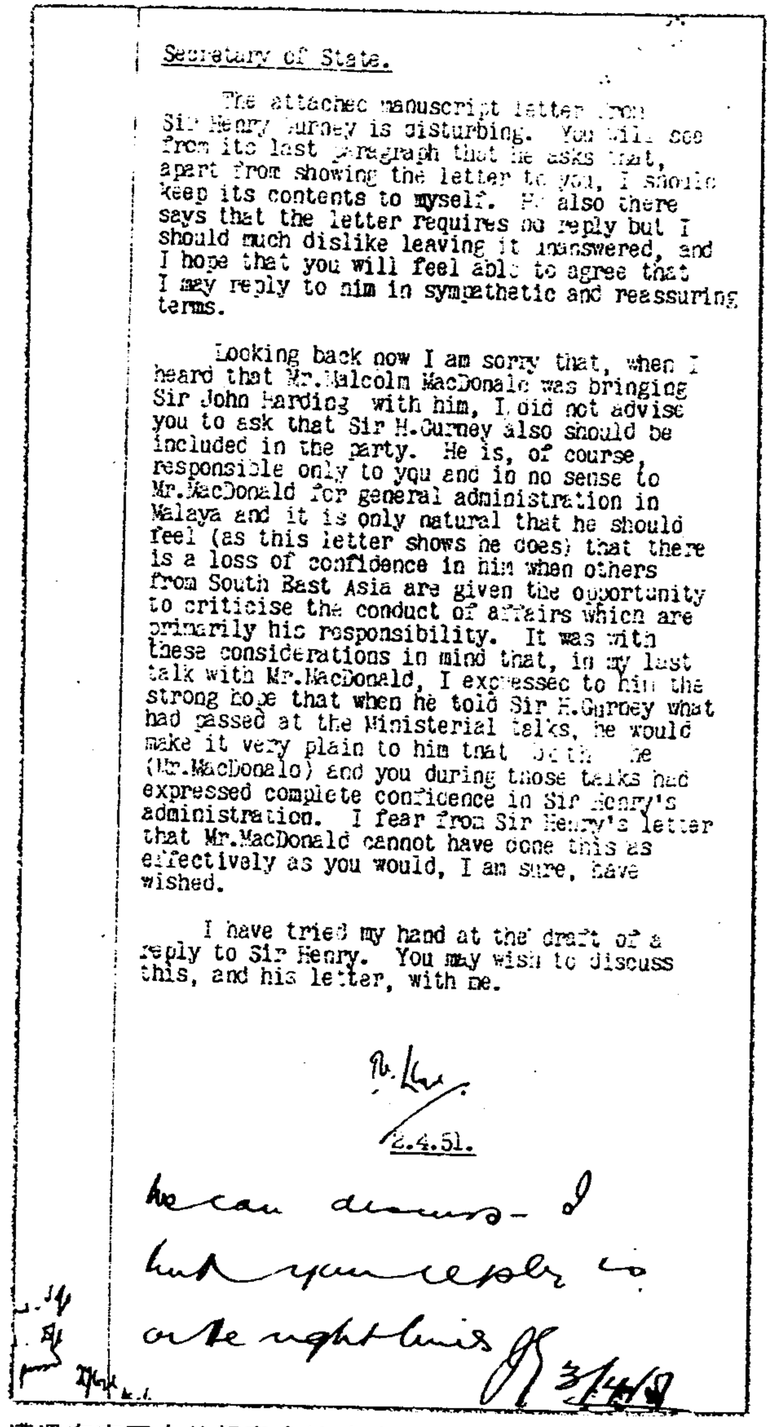
由于未能清楚传达《十·一决议》的军事要求，我们的确在敌方十分关注我们下一步会怎么做的关键时刻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草拟这份决议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吉隆坡权力中心的领导人当时正在发生争执。军事指挥官布里格斯正在闹辞职，他认为其职权的限制令他成为跛脚鸭。情报总监威廉詹金爵士（Sir William Jenkin）与警务处长尼科尔格雷（Nicol Gray）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人事纠纷，他们也濒临请辞的边缘。

就像爱德华甄特爵士一样，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与钦差大臣葛尼不和，而且人在新加坡的麦唐纳忙于策谋及部署破坏伦敦对葛尼的信任。当葛尼以面对秘密策划的阴谋为理由，向殖民部递上志期 1951 年 3 月 19 日的亲笔信请辞⑱后，他和麦唐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殖民部回拒了葛尼的请辞，并向他保证说，殖民部完全信任他的能力⑲。

对马来亚共产党来说，与其陷入当时的宣传政治里，不如向择定目标发动越来越多的游击战袭击。我们完全有能力办到。布里格斯计划越是带给我们更大的麻烦，我们的小单位越是要以更大的军事决心回应。我深信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的意志力。但是我们盘算错误，结果是一团糟。错过了良机，就再也不能复得了。

尽管当时我面对控制的难题，我仍然见了一些人。与政治局的同志合作，我能调动及重新委任战场指挥员。我们可以升降政治人员及军事人员。我们的确不断重新调整党的政治与军事架构，以便应付变化莫测的非常时期。在紧急状态持续之际，我没有想到有必要筹划大规模行动攻击特定目标，以在殖民地宗主国产生政治冲击。到了越盟在历时 56 天的奠边府战役中精明地运用这些战略，并因此在 1954 年 5 月 7 日大败法国的时候，我们所能吸取的教训都已经太迟了。

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在我们传达《十·一决议》的日子里，我们成功发动了一场极不寻常且引人注目的小规模行动，这场行动打击了马来亚及英国两地的英军士气。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ttached manuscript letter from Sir Henry Gurney is disturbing. You will see from its last paragraph that he asks that, apart from showing the letter to you, I should keep its contents to myself. He also there says that the letter requires no reply but I should much dislike leaving it unanswered,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feel able to agree that I may reply to him in sympathetic and reassuring terms.

Looking back now I am sorry that, when I heard that Mr.Malcolm MacDonald was bringing Sir John Harding with him, I did not advise you to ask that Sir H.Gurney also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party. He is, of course, responsible only to you and in no sense to Mr.MacDonald fo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in Malaya and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he should feel (as this letter shows he does) that there is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him when others from South East Asia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riticise the conduct of affairs which are primarily his responsibility. It was with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mind that, in my last talk with Mr.MacDonald, I expressed to him the strong hope that when he told Sir H.Gurney what had passed at the Ministerial talks, he would make it very plain to him that both he (Mr.MacDonald) and you during those talks had expressed complete confidence in Sir Henry's administration. I fear from Sir Henry's letter that Mr.MacDonald cannot have done this as effectively as you would, I am sure, have wished.

I have tried my hand at the draft of a reply to Sir Henry. You may wish to discuss this, and his letter, with me.

2.4.51.

We can discuss - I hold your reply to on the right lines

3/4/51

遭遇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暗地里搞政治动作的葛尼，以亲笔信向殖民部请辞，殖民部即刻回应。这是一位高官以含糊其词的外交辞令向殖民部大臣报告麦唐纳暗地里搞鬼的信件⑳。

“在葛尼被击毙时，我在高原另一边文冬的总部内，两地相距约35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扭开收音机听新闻报告时，才知道我们杀了钦差大臣。当时，李安东、小章、阿仲和我齐集在营寨的收音机旁听新闻广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然后缄默被不敢相信的欢呼声打破。”

第十八章
在甲甫路的伏击行动——虚张声势的邓普勒到来

小马同志和他的独立小分队的36名游击队员，在蜿蜒曲折的甲甫（Gap）路一带等待展开伏击行动已经将近两天。甲甫路是前往福隆港必经之道。福隆港在吉隆坡北面约60英里，是外国人喜爱的著名高原度假胜地。小马是我们最杰出的指挥员，他很谨慎的选择路边的埋伏地点。

他的任务要求是分秒不差的时机选择。他和手下队员面对的危险很大。这不仅是在事先设下的“伏击阵地”内消灭敌人的问题。这一次，他希望攻击一支大的武装车队。目标：夺取同志们抬得走的尽可能多的武器和弹药。

小马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身材短小但强壮。他在日本入侵之前加入马共，是在新加坡的101特别训练学校训练课程中考试及格的最后一批学员之一。因此，他很了解，游击队伏击的成功与精确性息息相关。

他是在1951年10月5日凌晨准备伏击行动。一段300码长的陡峭弯路引起他的注意。这段弯路刚好在第57英里之前，路段是那么弯，任何车辆的司机都会被迫把车辆减速到相当于爬行的速度。我们的指挥官小马让游击队员们匿藏在靠山一边的路旁茂盛的灌木丛中。他们的武器包括莱福枪、两支布伦式轻机枪和一支斯特恩轻枪机。小马确定了三个不同的射击位置。此外，他组织了三支冲锋队，他们的任务是一旦车队蒙受惨重伤亡而停下来之后，冲上去夺取武器。较早时，他命令两名队员记录来往的车辆，那两个人在各就各位之后就开

始记录。

到了第二天（星期六）中午，小马开始沉不住气。粮食几乎已经吃完。他原本预期在周末有更多车辆经过他埋伏的地点。他知道，警方车队经常使用这条甲甫路，而到这个时间，至少应该有一队军车经过，以便把供应品运到皇家西肯特兵团（Royal West Kent Regiment）在附近的作战区。他决定再埋伏两个小时。如果到时候没有可以作为攻击目标的大车队出现，他将解散队伍，撤退到他在森林深处的营寨。

接近下午 1 时，小马精神抖擞起来。在公路下方传来熟悉的连路华（Land Rover）多用途越野车转变速度的声音，由于公路弯弯曲曲，连路华不断转换引擎的排挡。接着，车子在伏击区下方的急转弯处出现了。它的确是一辆连路华，车上挤了五、六个当地警察－全部携带武器。在大约一百码的后方有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高级轿车。它们是一支车队的带头车辆吗？小马不能肯定。高度期待的时间只有几秒钟，让第一辆车有时间进入“伏击阵地”，那辆劳斯莱斯高级轿车毫无戒心的跟在后面。攻击！莱福枪，布伦式轻机枪和斯特恩轻机枪的子弹齐发，射向连路华，使到车上的警员除了一人之外全部受伤。连路华拐向路的左方边缘停下来。车上的警员不论受伤与否，全部匍匐爬入附近的灌木丛中，很快就开始还击。

过了一阵子，轿车的司机才作出反应。他也把车拐向左方，在连路华后面约 40 码的地方停下来，因为子弹开始像雨点般射向他驾驶的车。劳斯莱斯的司机受了伤，他打开车门，跌在路上，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第一轮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后，令人费解的是，轿车后部右侧车门打开了，一名穿着轻便热带服装的高瘦欧洲人下了车。他平静的直接朝游击队居高临下的伏击地点走去。他才走了几步，一阵莱福枪枪火击中他，他脸部朝下倒下去。

由于那批警员还藏身在灌木丛中，小马无法命令他的冲锋队收集武器。不久后，在路下方拐弯处来了一辆侦察车，它开向那两辆停下来的车的第一辆时，车上不断有人用布伦式轻机关枪开火。小马由于无法搜集到武器而很不甘心，而且还未觉察到他所取得成绩，他下令小队的号手吹撤退的军角。我方无人伤亡，并迅速撤退。一个小时之后，军、警的援军才开到。他们发现，那名欧洲人伸开四肢躺在公路向山一边的排水沟旁。他是英国驻马来亚钦差大臣亨利·葛尼爵士，是马来亚地位最高的殖民地官员。他死了。

在葛尼被击毙时，我在高原另一边文冬的总部内，两地相距约 35 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扭开收音机听新闻报告时，才知道我们杀了钦差大臣。当时，

李安东、小章、阿仲和我齐集在营寨的收音机旁听新闻广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然后缄默被不敢相信的欢呼声打破。我知道那是小马干的。电台的报道很简短，当天较后时，交通员带来报纸，才有比较详细的报道。我们坐着看报纸时，可以听到英国飞机朝伏击地点周围的森林轰炸的声音。敌人的炮手也在开炮。我们没有幸灾乐祸。不过，确曾开玩笑说敌人用炮声来替我们祝捷。我们同意由总部发表特别声明，赞扬参与伏击葛尼的全部游击队员。

我个人只能反思形势之微妙。我们刚刚完成对我们的斗争各方面的评估，并承认我们犯下无数令人遗憾的错误。由于布里格斯计划，我们越来越与民运脱节，粮食严重短缺，并不断设法避开敌人的巡逻队。事实上，我们的处境严峻，开始考虑再次迁移总部。情况对我们不利。突然间，在一个肯定不会有大事发生的周末，一小批饥饿但有献身精神的同志，藏身在灌木丛中，无意中消灭了钦差大臣本人。我又惊又喜。文冬营每一位同志，不分男女，也是又惊又喜。

英国人来到附近的都赖镇，对伏击事件采取追查行动，盘问他们所能扣留的每一个人。这一来，他们发现，陈平的妻子李坤华不久前还在这一带展开共产党地下活动。为了公然进一步抹黑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共总书记的形象，英国的宣传声称，是李坤华在幕后策划暗杀葛尼。但这项宣传显得手法粗糙和苍白无力。马共并没有策划这样的一项伏击行动。由于这项论点显然站不住脚，声称我的妻子涉及伏击行动的阴谋论逐渐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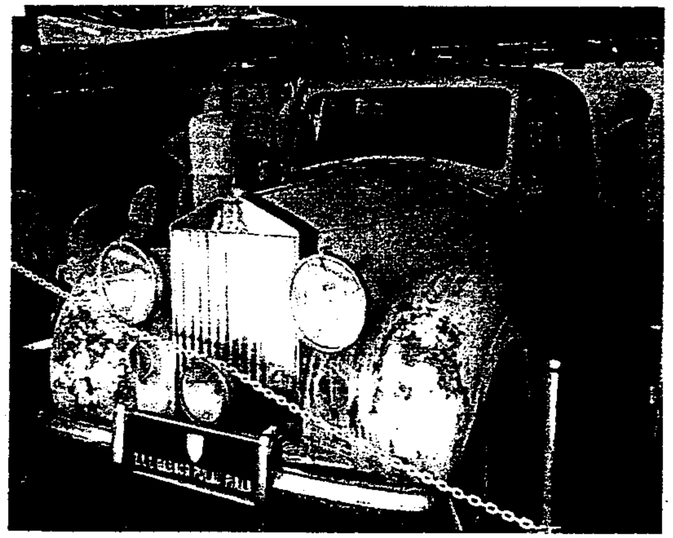
在伏击事件之后我们的情绪高涨。但我们必须回到党的日常事务。正当我们在草拟十·一议案之际，我们接到已经在北京当政的中共当局的来信。信中要求我们派一位党要到中国进行重要磋商。我不知道中国人采取这项主动的背后原因。但我敢肯定，北京这样费力来和我们联络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我选择派小章去，因为毫无疑问，他是我们之中最有经验的人。他北上曼谷，在那儿，我们的泰共联络人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耽搁后，把他偷偷送上一艘开往中国的货船。他在 1953 年年初抵达北京。

英军加紧军事巡逻以及加紧管制提供供应品给我们的两个新村所产生的联合效果，使我们难有别的选择，只有离开文冬。我们向北移到劳勿地区，因为我们知道，那儿的警方对新村的华人的监视没有那么严。在劳勿，新村居民主要是树胶小园主。他们之中大部分种植香蕉作为次要的商品作物。香蕉对我们

(上右) 盛装和炫耀是英国殖民地控制的重要成份。在这张照片中，自称要更加接近民众的钦差大臣葛尼爵士在身上佩戴诸多装饰物。这说明了接近群众并不是他的主要考虑。

(下图) 葛尼乘坐的劳斯莱斯轿车弹痕累累。他和随员在甲甫路受到小马伏击。

这支由皇家澳洲兵团第 1 营 A 连派出的巡逻队，声称打死了伏击葛尼的其中 3 名游击队员。我对这种说法存疑，因为葛尼在 1951 年 10 月 6 日被打死，澳洲地面部队直到 1955 年年底才开始在马来亚采取作战行动。这张照片最初是在 1958 年 11 月 23 日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那时距离在甲甫路发生的伏击事件已经将近 7 年。



这辆在槟城博物院展示的葛尼在被击毙时乘坐的劳斯莱斯轿车几乎已经被人遗忘。这辆车目前破旧不堪。

有用，我们有很多香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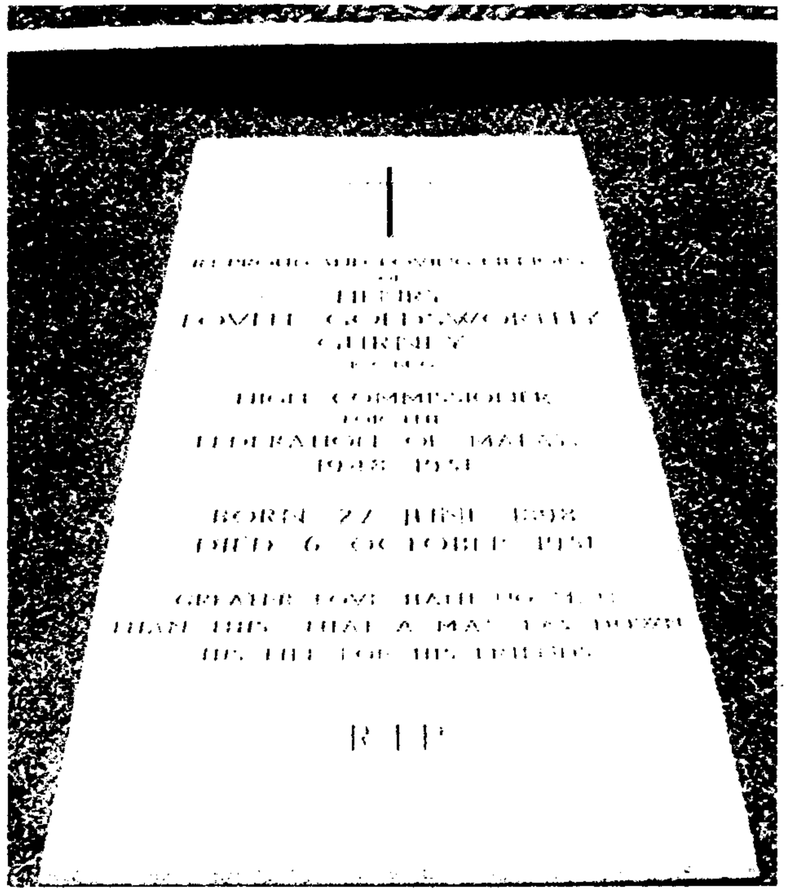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建立了有效的粮食管道。但经历文冬的经验，我们决心在民运之外，另外建立粮食来源。其中一项计划是我们自己种植农作物。我们派武装工作队成员到步行需要三小时的森林深处清除一片地区，以便种植蔬菜。开始时，我们种植几依格的稻和玉蜀黍。但在我们有收成之前，英军进攻我们的基地总部。当时我在距离总部步行需要一小时的地方，与当地的一些干部磋商。敌军这次攻击所使用的战术和以前几次进攻我的总部所使用的战术完全一样。他们先派飞机轰炸和扫射，然后发动地面进攻。

我不在时，营寨由李安东负责。在他的指示下，我们的人员撤退到茅草丛中，使我和他们失去联络超过两个星期。当时有三名警卫员和我在一起。和我会面的干部都是重要的马来人领袖－阿都拉西地和拉昔迈丁，他们都有个人的警卫员。在我们的讨论即将结束时，接到总部遇袭的消息。我指示阿都拉和拉昔返回他们各自的营寨，我和我的警卫员转移到一个香蕉园附近的森林边缘地点，那个香蕉园是一位民运分子的。有十天我们每天以香蕉充饥，几乎没有吃别的食物。要重新与总部联系，必须等待营寨的同志从森林里出来寻找粮食。至少他们必须派一个人去提取盐和糖，最终有一个人出来，我们就和他一起返回新的总部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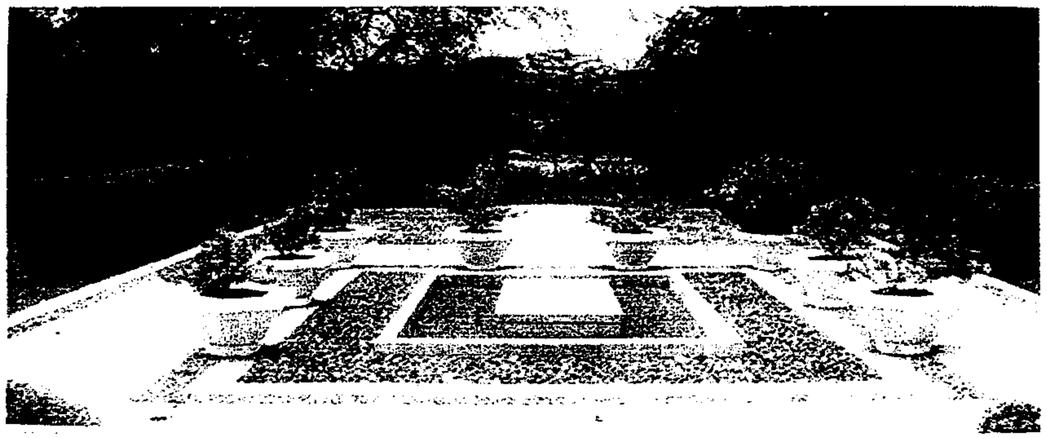
* * * * *

英国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代替葛尼的人选。在这段期间内，我们不断尝试分析小马和他的游击队员对敌人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我们从报章上阅读到和从电台广播听到的讯息使我们深信，在行政上，吉隆坡一团糟。从在森林中的我们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伦敦当局似乎震惊到不知所措。我们的基层士气高涨，以致自发性的游击队攻击的次数增加、强度加大。

公平的说，在政治局中的我们不会让欢欣冲昏了头脑。我们处于战争已有三年半。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了解到在战争中心理上有起有落。同样不容掩盖的事实是，早在小马和他的人马杀死葛尼之前，我们已经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我们要占上风，必须远远超越只是暂时性的提高士气。我们必须拥有在战争上成功的战略蓝图；但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缺乏这样的蓝图。



此份墓志铭倾向于支持这样的理论：在受伏击的那天下午，葛尼爵士单独一人勇敢的从劳斯莱斯轿车内下来，走向我们的伏击阵地，是为了引开枪火。他的妻子和私人秘书留在车内，都没有受到伤害。



已故葛尼爵士的坟墓，也许是吉隆坡蕉赖坟场的所有坟墓中最突出者。英国当局确保该坟墓受到很好的照顾。

* * * * *

在葛尼被击毙之后，敌方焦虑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焦虑的是：安全是否有破绽？马共是否在事先已经知道葛尼的行程？谁下令伏击？为什么随后展开的追剿行动无法追查到伏击小队？但他们不断向公众人士保证，局势受到控制。

和往常一样，种植园主和矿家的投诉最多。官方的文告含蓄的指出，葛尼被暗杀，应该由他本人负起部分责任。文告指出，他向来不肯乘坐装甲车。声明指出，他一贯拒绝由大批武装人员护送，因为他要更加接近人民。乘坐劳斯莱斯去接近人民！我们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他要下车？一种说法是，他要保护汽车内的另外两个人——他的太太、坐在后座的葛尼夫人；以及他的私人秘书，坐在前面乘客座位的斯特普尔斯（D. J. Staples）。在整个被袭击的过程中，两个人都留在车内。他们都没事。

英国报章以典型的机械式反应报道葛尼被杀事件。报道说，马来亚的局势"严重恶化"。潜在的讯息是，马共现在占了上风。国会内有人提出质询。在压力之下，刚在 10 月 21 日成立的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作出反应，派遣新任殖民部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前去进行第一手评估。利特尔顿以前是军人，也是死硬的从政者。刚好也曾是伦敦锡矿公司和英国东方公司的董事。这两家都是大锡矿公司，在马来亚有很多业务。

利特尔顿在对马来亚进行两个星期的巡视之后，在 12 月返回伦敦。他私底下报告说，他在巡视期间，发现行政一团糟。他特别指出，在马来亚，民事部门和军事部门非常缺乏协调、非常缺乏可靠的警方情报，以及警方的工作水平一般上很差。他告诉内阁同僚，马来亚华人和马共合作的现象很普遍。利特尔顿的主要建议是，应该由一个人兼管马来亚的民政与军政。他劝告，应该委任一名将领担任这个职位。

1952 年 2 月 7 日下午，邓普勒爵士中将飞抵吉隆坡，担任改组后的英国剿共机构的"最高主管"。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在早一天驾崩，殖民地政府进行官方哀悼。在一个星期内，新任钦差大臣在会议上告诉高级政府官员，他是军人，将以军人的身份处理反共战争。他向听众夸口说，要是他能够得到全民支持，他可以在三个月之内"结束"紧急状态。

英国驻新加坡的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左）不喜欢甄特、不喜欢葛尼，而据我所知，他也不大喜欢邓普勒（右）。但正如这张照片所显示者，他认可权力。

不过，过了一阵子，他承认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出现。他预言，事实上，在未来几个月，局势将会恶化。他声称，共产帝国主义把其注意力转移到东南亚，以便羞辱欧洲殖民地列强、破坏他们的经济地位以及牵制尽可能多的西方军队。当我从报章上阅读到他原先的言论时，我可以想像，外籍种植园主、矿家、商家和本地资本家不知会有多高兴。

我最初是从马来亚电台的报道中知悉邓普勒受委任的消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真正感受到新村所受到的压力。在我们击毙了葛尼之后，我对于丘吉尔认为应该委任一名军人来领导他们的殖民地政府不会感到奇怪。即使考虑到英国在 1951 年 10 月的大选程序（那次大选使到丘吉尔重新上台执政），我仍然对敌方那么久才找到取代葛尼的人选感到惊愕。

在总部，我们避免发表任何特别宣传以配合邓普勒的抵步。我们的宣传路线是由州级委员会处理，重点在于暴露他很快就采用的残酷战术。我们把这些战术以“野蛮”称之，而我们第一次发现，有些殖民地官员和英国报章给予我们某种程度的同情。

1952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邓普勒将军闯入丹绒马林，这个市镇位于霹雳州和雪兰莪州交界处，在吉隆坡北面 51 英里。他到那儿，是为了亲自严厉惩罚那儿的平民，因为他们没有通报我们的游击队在那个地区的活动。两天之前，我们伏击了公共工程部的一支队伍，杀了 12 个人，包括 1 名副县长和 1 名工程师，那两个人都是欧洲人。我们也经常和警察巡逻队发生冲突，导致在过去三个月中，有 8 名警官死亡。政府的情报指出，在周围的森林里，有多达 16 个游击队营寨。

邓普勒花了一个多小时大声训斥 350 名当地地方领袖。那批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带到一间训练学院的礼堂，只是为了听邓普勒的训话。那批听众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静静的聆听，邓普勒的话一句一句的被翻译成三种语言。他咆哮着、他威胁着。他宣称，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宣布惩罚措施，他是由于每个人都胆怯的保持缄默而决定惩罚他们。邓普勒告诉他们，“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你们以为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可以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吗？你们知道吗，甚至你们的孩子也会监视你们？在这个房间内有任何人是共产党员吗？是的人举手！”

没有人举手，这是不出奇的。

他接着说，“好，那么我必须采取令人非常不愉快的步骤。”他接着列举其

钦差大臣兼作战总指挥邓普勒爵士的权力极大。这张照片显示，他打开在“问卷箱行动”中收回来的其中一个箱子。英国在 1952 年 3 月在丹绒马林对当地居民采取惩罚措施之后，采取“问卷箱行动”。他打开箱子是为了让摄影记者拍照。他一边打开箱子，一边说，“最好有好消息。”

中的一些步骤。当局将实施每天 22 小时的戒严，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戒严区是从丹绒马林…直延伸到在它北面大约 18 英里的地罗力（Trolak）（在霹雳州境内）。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戒严区。商店每天只能营业 2 小时。学校停课。巴士暂停行驶。最残酷的是人民的白米配给量减少一半。

钦差大臣在丹绒马林亮相 10 天之后，限制和戒严开始产生影响。他写信给戒严区的每一个家庭，搜集关于马共活动的秘密情报。邓普勒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我不期望你会覆信。如果你不是，我要你在这张纸上写下尽可能多的情报，以协助我的军队逮捕在你的地区的共产党恐怖分子。"

这是邓普勒将军担任英国驻马来亚钦差大臣的两年期间，他的行事作风的开端。这使他得到诸多赞扬。4 月 3 日，殖民部大臣利特尔顿在伦敦告诉皇家帝国协会的一项会议，"在马来亚有一种新精神。这种精神是由邓普勒将军激发的……你们可以放心，邓普勒爵士拥有执行工作所需的全部权力。不论是民事、警方或是军事部门，没有人可以干涉他。当然，他获得殖民部的全力支持。"不过，邓普勒的严酷作风，使他很快就受到抨击。

邓普勒在抵达马来亚之后还不到三个月，就在 5 月 1 日把针对我的奖赏提高两倍以上。如果有人导致我被生擒，赏金是 25 万元。如果把我打死后拿去领赏，赏金降低到 12 万元。钦差大臣显然是指望我身边的人受到引诱而出卖我。他必定认为，在我们的领导层中，或是接近我们的人当中，存在着广泛的不满。邓普勒显然认为，马共领导层只是一批杀人凶手，只要有金钱奖掖，就会自相残杀。他和他的顾问们显然相信他们本身的宣传。

钦差大臣大大的提高生擒或暗杀我的奖赏的同时，总部几个重要人物，包括伍天旺、陈田和李安东，生擒或暗杀的赏金同样大大的提高。我们总部的这批人，没有人面对暗杀或出卖。我们也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方面的威胁。我们只有在必须离开营寨去会见我们本身不认识的当地共产党领袖或干部时，才会采取特别警戒措施。邓普勒是根据这样原则行事：如果忠诚不能争取到，肯定可以用金钱收买。我仍然活着，还能进行这些评论，证明他的逻辑的局限性。

尽管对邓普勒有诸多赞誉，声称他是英国在马来亚紧急状态作战时期最主要的军事人物。但据我看来，他不是决定马共在军事上失败的人物。是布里格斯计划极其有效地孤立我们，使我们来自群众的支持锐减。英国非常幸运，布里格斯接受要他到马来亚来的任命。我当时就意识到，一旦布里格斯开始推行他所提出的新村计划，我们的军事计划就会开始动摇。在那之前，我们在我们

U.S. de SILVA JEWELLERS

The Straits Times

MALAYA'S NATIONAL NEWSPAPER ESTABLISHED 1845

SINGAPORE, THURSDAY, MAY 1, 1952.

TWELVE PAGES

NOW IT'S $250,000 FOR PUBLIC ENEMY No. 1

—if brought in alive

KUALA LUMPUR, Wednesda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day announced a reward of $250,000 for "bringing in alive" or giving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capture of the leading Malayan Communist terrorist, Chin Peng.

The new reward is three times the reward of $80,000 offered for Chin Peng in June last year.

Chin Peng, 31-year-ol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is the man responsible for direction of the armed Communist revolt in Malaya.

A sum of $193,200 will be paid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Chin Peng's killing in June, 1951. $60,000 was offered for his death.

An indication that the new rewards might be decided at the "bringing in alive" of the leading Communist figures in the Federation is given in the Government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rewards.

"BRINGING IN ALIVE," THE STATEMENT SAYS, "INCLUDES THE POSITIVE ARRANG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OF THE SURRENDER OF A KNOWN TERRORIST INTO THE JUNGLE."

It is known that many of the leading Communists have relatives living in new villages and towns in the resettlement

Other rewards

Other rewards increased today were for the capture or killing of all Communist leaders in the district now

★ See Page Seven

AS LABOURERS WORK ROUND THE CLOCK

THIS IS CHIN PENG. The reason behind the terrorism in Malaya, he is worth $250,000 to anyone who has inform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his capture.

GEN. TEMPLER MAKES THE CLERKS JUMP

KEMAMAN, Wednesday.

STARTLED clerks jumped to their feet in Negri Sembilan State Secretariat in Seremban today as the High Commissioner, Gen Gerald Templer, paying a surprise visit, walked through their offices.

邓普勒把我的头颅的奖赏提高到数额大得惊人的 25 万元时－相当于目前的数百万元，也决定在传单上贴上我的照片。图中照片上的我，是 5 年前在吉隆坡的照像馆拍摄的，当时我是疟疾病初愈的年轻人。

选择的作战区所造成的混乱，使到人数占优势的政府武装部队乱了阵脚。这种慌乱只会加剧民事服务中广泛存在的无能、种族主义和贪污。

对任何历史性斗争的检讨，将不可避免的导致提到“可能会是怎样”。假设性问题通常会带来危险，但我觉得，在这里，研究如果像布里格斯计划那样的计划没有推行，紧急状态的进程会是怎样那是恰当的。我深信，由于我们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都得到人民广泛支持，我们的起义很快就会变得势不可挡。当然，要反驳这样的论点，可以说即使不是邓普勒本人，其他人也会提出类似的（移民）计划。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邓普勒虽然受到赞扬，却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受到甚至是最忠诚的殖民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如果有谁采用恐怖手段，那就是他。他声色俱厉的威胁乡村农民－不止是在丹绒马林－是有文件记录的。英军的无情镇压加上伴随而来的残暴。使这一场反叛乱（军事）行动变得特别令人憎恶！要是英国只是任命邓普勒，而没有配以布里格斯计划，我相当肯定，他的领导方式将会对我们大为有利，会迅速为当局带来问题，及使我们更加得到群众支持。

不过，尽管我这样说，我也承认，邓普勒致力于建立全面控制的中心，并在民事当局与军事当局之间取得协调。这一切最终都加强了布里格斯计划的作用。他在新村推行大锅饭措施。尽管这看起来很平常，但它使到当局能够加紧管制存粮，并极大的限制了民运通过新村的大门把供应品运送给我们的能力。

我也看到一些历史学者的评论，说邓普勒大力的改善了收集情报和应用情报的工作，而且他派遣情报员到一些政治部部门，取得很好的效果。对于指在邓普勒指示下，敌方的情报工作大有改善，我不会去争辩。不过，我觉得研究历史的学生必须理解两个要点。首先，使军事工作和民事工作在一位“最高”领袖领导下结合在一起并不是邓普勒的主意。这得归功于殖民部大臣利特尔顿。其次，邓普勒奉命完成的任务不能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要是没有布里格斯计划，邓普勒将使我们拥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包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挥。

布里格斯在退休之后前往塞浦路斯，于 1952 年 10 月在那儿去世。我阅读到的说法是，他深信他在马来亚是失败的。我认为，布里格斯身为军人，设计了一项计划，并加以实施，而不重视推销作为推行这项计划的幕后人物的他本人。这和邓普勒的做法大不相同。邓普勒是超级自我主义者，他爱出风头。

我觉得，由于葛尼被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理应存有早日把邓普勒杀掉的

念头。遗憾的是，不论是我或是马共领导层内的其他亲密同僚，没有人接近于这样设想过。

* * * * *

在丹绒马林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使英国宣传专家们面对在整个紧急状态期间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伦敦的共产党早报《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一张达四栏宽的照片，显示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一名队员拍的照片，他手上提着一颗游击队战士被砍下的头颅。那名英军站在一间小屋旁，小屋的招牌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第 40 突击队”。在他右边站着两名达雅族新兵，他们戴着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贝雷帽，其中一名用莱福枪指向被砍下的头颅。背景是在走动着的其他英军，他们似乎无动于衷。照片之上的标题是：“这就是马来亚的战争”。

第二天，英国海军部发言人在伦敦说，那张照片是假造的。其他英国报章形容那是“共产党的诡计”。不过，在下议院有议员提出质询，要求殖民部大臣利特尔顿针对这件事发表全面声明。他延迟了一个星期才发表声明，因为官员们在忙着寻求公众人士可以接受的立场。当局打一封电报给邓普勒，征询他的意见。海军部展开独立调查，追查照片中的海军陆战队员的身份。最后，殖民部新闻组奉命和海军部公关组密切协调。当局决定和那份共产党报章进行宣传摊牌。

正当民事部门忙得团团转之际，《工人日报》驳斥照片是假造的说法，在 4 月 30 日刊登来自马来亚的另外一张恐怖照片。与此同时，该报刊登一则报道，挑战英国为什么要在其反叛乱部队中雇用达雅族猎人头队员。

当局所要求的情报开始回到白厅（英国政府）。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大课题。更令政府感到沮丧的是，《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的照片中的海军陆战队员很快被人辨认出来，并且被发现已经回到英国。他爽快的承认，那张照片是真的。尤有进者，经确定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照片“战利品”存在，它们是由在马来亚服役的军人带回英国。海军部所获得的法律咨询提醒说，“在国际法之下，在战争时期的类似事件肯定是战争罪行”。

马来亚的刑事法典也有条文提到亵渎人类尸体的罪行。在海军部邀请下，一

其中一张恐怖的纪念照㉑，但它并没有吓坏英国人。

《工人日报》在1952年5月10日刊登这样的一张照片，并在相关的报道中呼吁英国通过结束马来亚战争挽回尊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该报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报道以及令人心酸的照片，被视为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英国公众人士不予理会－这令殖民部松了一口气。

名刚刚退休的马来亚高级警官证实，“马来亚警方砍下匪徒的人头以供辨认是很平常的。”参与调查的人要寻找几个月前（要不是几年前）在马来亚获得接受的砍下头颅的政策。军队部署的数字显示，在马来亚的英军中，有264名达雅族人充当追捕者。

对殖民部和海军部来说，更糟糕的是，邓普勒的反应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他在致给利特尔顿的电报㉒中说，“森林战争不是美好的事，但我们不能放弃正确辨认被打死的共产党的身份的做法。”简单的说，他不仅为在和我军作战中砍下人头的战争程序辩护，而且强烈表示要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作为解放战争的司令－最初是对付日本人，后来是对付英国人－我从来没有基于任何理由下令肢解敌人的尸体。我也从来没有默许这种过分行为。我经常在想，要是情报报道显示，我和邓普勒向他在伦敦的上司争取那样，向我的政治局同僚争取展开砍人头的计划，殖民地宣传分子会怎样宣传。

最后，殖民部大臣利特尔顿于5月7日，在下议院针对《工人日报》在4月28日刊登的照片和报道作出延迟的回应。他证实说，“是的，照片是真的。”接着下来，他提到那张砍下头颅的照片的背景资料。利特尔顿说，在1951年4月，一支森林巡逻队受到匪徒伏击。在战斗中，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一名军官和一名下士被打死。另外两名陆战队员受重伤。在战斗中有一名共产党员死亡。他指出，一名达雅族人而非皇家海军陆战队员砍下死亡的共产党员的人头。这样做是为了辨认其身份。这位殖民部大臣接着说，“那张照片是在没有获得准许下拍摄的。（英国）已经训令钦差大臣，不得砍下尸体的头颅以供辨认身份的用途，应该通过照片和指纹辨认身份。”

向殖民部提供如何进行最佳宣传方式的一位高级民事保安专家写道……处理这件事最有尊严的做法是，不去理会《工人日报》的报道；如果这件事在国会被提起，就在国会内应付。尤有进者，如果发表声明，会使这个课题受到更广泛的注意，而且可能引起报章进一步讨论。”

要是这项劝告无法提供殖民当局对如何执行马来亚紧急状态的明显图景，同一位专家的另一项声明很好的填补了空档。他说，“我认为，在这个例子中，真正令人厌恶的部分，不是有时候为了辨认身份必须砍下被打死的匪徒的头颅这项事实，而是个别人士拍摄像刊登在《工人日报》上那样的照片的行为。”

在我看来，在这个例子中，那名向殖民部高层提供意见的高级公务员，更关

INWARD TELEGR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OPY FOR REGISTRATION

FROM FEDERATION OF MALAYA (Gen. Sir G. Templer)

Cypher (O.T.P.)

D. 6th May, 1952.
R. 6th " " 08.30 hrs.

EMERGENCY
SECRET
No. 559

Addressed to S. of S.
Repeated to Chiefs of Staff Headquarters Malaya,
Chiefs of Staff G.H.Q. FARELF.

Your personal telegram No. 88.

Daily Worker Photograph.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communist dead should be identified. If a communist is killed in deep jungle it is sometimes impossible to bring back the body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Cameras have therefore been issued, though sometimes a camera is not available when such instances occur. Where distance is too great, or terrain too difficult, or a camera is not available, it may accordingly be very occasionally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head of a dead communist.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if a member of a patrol is killed and his body cannot be carried back to the base, he is buried where he is and subsequent recovery of his body, perhaps a year later, may be the subject of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2. Photography of such a rare instance obviously undesirable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 Strict orders have been issued on this and negatives are held by the police for record purposes.

3. The incident in question, which is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which can be traced, took place over a year ago.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Daily Worker has now made use of it for its own purposes.

4. War in the jungle is not a nice thing, but we cannot forego the necessity for exact identification of communist dead. The view point of the Daily Worker in this matter is easily understandable. The viewpoint of others who may criticise, and who have no possible inkling of an understanding of conditions or terrain or physical exhaustion of operations, is not understandable to the Security Forces who have the task of tracking down armed communist murderers and producing evidence for necessary identification.

5. Two police contingents of Selangor and Malacca have issued instructions on photographing and finger printing of killed terrorists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None has mentioned severing heads. Subject to checking when photograph is received, it is believed that photograph in the Daily Worker was taken in Perak.

这是邓普勒对于殖民部副大臣针对砍下人头供辨认身份的事件发出的指示所做答复的全文。邓普勒的答复语气并非和解性的。

心的是英国的体面，而不是人头的恐怖。他完全不理会或故意不去理会砍下头颅的道德问题。

5月10日，同一份共产党报章在头版全版刊登从马来亚带回来的骇人听闻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一名面带微笑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双手提着两个砍下的人头－右手持女性人头，左手拿男性人头。很明显的，女性的前齿已被敲掉。其他照片显示一名达雅族猎人头者与人类的肢体在一起。

令人吃惊的是，利特尔顿在下议院的谈话以及海军部和殖民部的联合公关努力，似乎令英国报界感到满意。英国的全部其他全国性报章都不把砍下人头的课题当作重要新闻。报章完全没有提到，邓普勒企图辩解说，这种骇人的做法是合理的，是战术所需，并要加以保留。在几个星期之内，如果在今天将会被判定为紧急状态时期最恐怖的照片变得不重要，被放置在部长办公室后面的抽屉的最下层。

在那年5月底，英国经历一个短暂的尴尬时期，因为吉隆坡方面承认，殖民政府无法出示照片，以显示共产党犯下和保安部队所犯的相同暴行。不过，这点受到技巧的规避，当局所提供的解释是，不适合公布恐怖分子暴行的详情，当局声称，官方报告通常不包括这类详情。详细审查从1948年至1960年的《海峡时报》的头版－更不要提在那段时期的官方军事评估－完全证明英国的说法不能成立。英方声称它故意不多宣传我的军队的过火行为。在评估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宣传所起的作用时，那些数不清的报道却缺少支持其论据的照片，对马共是大为有利的。

六个星期之后，我们最成功的游击队领袖之一被英国萨福克（Suffolk）军团第一营的一支巡逻队杀害，使人们第一次注意到保安部队所普遍采用的另一种恐吓策略。不过，和砍头课题不同的是，这件事引起公众人士的回响，及受到英国报章检讨。殖民地当局在伏击和杀害刘观金（他的外号是“加影的胡须佬”）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在卡车后部，安排在雪兰莪南部一带的新村游街示众。跟在卡车之后是一支车队，包括装有扩音器的客货车，沿途评论刘观金的过去和他怎样被打死。这项令人厌恶的示众持续了三天。也许最初的报道是紧接在砍头的新闻之后，英国报章对保安部队长期以来公开展示被杀共产党员尸体的做法持比较批判的观点。通常展示共产党员尸体的目的，是要恐吓乡村人民，迫使他们就范。

刘观金与一位同志合影。他的外号是“加影的胡须佬”。

通常展示尸体的地点是在郊外市镇的警察局前面。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这种行为才被宣布为非法。

在1952年，显然由于保安部队在马来亚所采取的措施有越来越多令人厌恶的报道，伦敦的《每日镜报》在那年发起一项运动，反对军方针对各支部队打死打伤的共产党员人数列出比较表的制度。这种做法本身主要是要在本地成为头条新闻－尤其是在英文报章和马来亚电台－而不是要在英国国内争取支持。无论如何，必须使殖民当局保持高昂的士气。

马共原本可以列出我们本身的点算尸体的“成绩表”。我们可以保有“消灭”英军人数的每月比较表。也许可以另外再细分出“受伤者”和“失踪者”。从这一切数字，我们可以确定每个月的总数，并向各单位发出挑战，让他们争夺“消灭率冠军”的荣誉。这可能使到英国人在庆祝点算尸体的成绩时三思。事实上，被视为恐怖分子的我们并没有那样做，只有英国人那样做。

我在猜想，流逝的岁月是否足够悠久，足以使到紧急状态时期一直活到现在的人，弄清楚历史事实和虚假宣传之间的差别。以下是历史事实：在整个紧急状态时期，我们的所有单位奉命必须人道对待被俘的敌军。在这个课题上，我们追随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中善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最高司令部还为了这件事发出特别指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确有治疗受伤的敌人。但实际上，我们不能负起扣留俘虏的责任。我们要应付本身的需求已经很困难。可行的做法是夺取武器、释放敌军。我知道，英国人进行很多宣传，说我们虐待俘虏。我驳斥这些说法。在整个紧急状态时期，我从来没有接到报告，指我军虐待、折磨或处决敌方人员。据我所知，没有官方的档案证明我们有那样做。我也肯定没有看过任何照片可以证明这类说法。另一方面，英国当局经常处决被俘的我军武装人员。关于保护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13条，明文规定禁止这种行动。英国巧妙的规避这些活动所带来的战争罪行困境，正如她为了保险理由所坚持的，声称在马来亚进行着的军事行动是紧急状态，不是战争。

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受到我们的游击队所干的某些事件所困扰。除了伊恩克里斯琴在和丰被处决的事件之外，另外有两宗事件一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我。

第一件事是在1952年暗杀51岁的陈充恩。他是槟城钟灵中学广受欢迎的校长。一名学生活跃分子向我们的区委报告，效忠国民党的陈校长也是警方的线人。县委决定消灭陈充恩。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寻求确凿的证据和文件，以便证实那名学生活跃分子对陈充恩的指控。我没有找到。

陈充恩校长肯定效忠国民党，而且致力于破坏马共对钟灵中学的渗透。但他被暗杀对马共的事业不利。

第二宗事件是用硫酸攻击新加坡一间女子中学的女校长。那个时候用硫酸攻击很普遍，其中许多与爱情纠纷或者是个人恩怨有关。但这宗事件被指是我们的人干的，正如陈充恩事件一样，我就是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证明那宗攻击事件是对的。

我认为，这两宗事件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对我们的事业起了反作用。

*　*　*　*　*

当我们的总部还在文冬区时，杨果决定把马共中马局和南马局合并，以实行权力下放，从而使决策变得更加顺畅。在同志们同意之下，我把合并后的新组织交由阿谷进行总的领导。阿谷是游击队领袖，他在使马六甲的党部免于解体这件事上证明了他的能力。

阿谷很熟悉这个地区，因为他在劳勿出生和成长。他的父亲在劳勿的一个澳洲人的金矿工作。阿谷在加影念到华文中学程度，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在解决了马六甲的问题之后，他预定到文冬亲自向我报告。在他即将和我会面时，他被通知受委担任新的职位。由于在邓普勒抵达马来亚之后，英军不断采取军事行动，阿谷的行程一再耽搁。在我等待他抵达期间，我的总部所受到的保安压力也加剧。在即将再次转移营寨之际，我派一名交通员通知阿谷，他的任务是在森林深处建立一个基地。

在交通员和阿谷会面时，我的总部已经北移到劳勿郊外的森林。阿谷在前往接受他的任务途中被人谋杀，据称是他的三名警卫员（二男一女）之一谋杀了他。我深信，这项谋杀是政治部精心策划的行动。

早在 1952 年 9 月 24 日，《海峡时报》在头版刊登一则重要新闻。它的标题是："值得 15 万元的人。"它报道说，联邦政府在前一天提供 15 万元的赏金，给予提供情报导致阿谷被生擒的人。如果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导致阿谷被打死，赏金是 7 万 5 千元。报道还配以一张照片。报道说，数以千计的传单在新村和马来甘榜分发；以捕捉"矮仔谷"。《海峡时报》指出，矮仔谷身高只有 4 尺 9 寸，按照这样计算，他每一寸值得 3 千元——"也许是被追捕的匪徒中身价最高者。"我认为这样的言论是最怪诞的。

我所接到的报告是，有关报道见报之后几个星期，阿谷被人谋杀。令人费解的是，直到 1953 年 5 月 2 日，报章才报道阿谷被杀害的新闻。当时的报道，没有提到谋杀事件在什么时候发生。如果说第一项报道被故意弄得怪诞，第二项报道的详情同样怪诞。报道说，一列从金马士开往而连突的火车的司机，看到两名武装男性共产党游击队员和一名女同志－三人之中，有一人手上紧握一个刚刚砍下的人头－站在铁轨旁边，向他挥手，要他停车。司机不顾本身的安全，也不理会火车上其他人的安全，把火车停下来，问他们他可以帮上什么忙。在随后的交谈中，司机得知－他显然因此松了一口气，那三个人要搭顺风车到火车路的下一站文德甲的警察局，以便他们可以投降。那三名共产党解释说，他们手上拿的是他们“上司”的头颅。司机向他们建议，他们可以把头颅装在粗帆布背包内，在随后的行程中，把该背包放置在那列火车的装甲车厢内。那三个人在文德甲警察局被扣留。由于这件事，火车司机获得 500 元赏金。报道没有提到那 7 万 5 千赏金是否有发出去。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大相信那项报道。但我很早就想到其有趣的一面。殖民当局由于采取“砍下头颅以辨认身份”的政策受到伦敦方面的指责而感到难受，又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共产党也有类似的活动而难以反驳，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游击队员主动采取的砍头行为的例子。

* * * * *

从邓普勒担任钦差大臣那天开始，他就在马来亚大量制造假新闻。其中一些成功。其他以闹剧告终。在 1952 年 12 月的一天早上，我在劳勿的总部喝咖啡时，我很震惊的阅读到一则新闻，内容说我被解除马共总书记的职位，由一位女性取代。更有趣的是，报道说取代我的是一位 40 岁的“来自红色中国的大间谍”。她的名字是谢雪红。

最先指我被谢小姐推翻的新闻刊登在《中兴日报》上，后来演变成《海峡时报》的头条新闻。那家英文日报用宽达 7 栏的标题报道，“共产党新领袖是女性”。其下的小标题是：“据报道，中国大间谍将接替陈平。”我从报道的文字中获悉，我被革职是共产党情报局所做的决定。我的继任人显然还在中国，而据悉她将在泰共协助下经由陆路来到马来亚。报道提到，马共获得来自邻国

殖民地政府的传单，悬赏 15 万元捉拿阿谷。

的同志协助。新闻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的一则电台广播。这是一个骗局、是为了破坏我在基层的权威。结果不得逞。

* * * * *

在 1952 年最初几个星期，我们还在文冬，总部接到情报，指我们其中一个交通员网络受到破坏。最初详情很缺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 1951 年 10 月 1 日通过的决议的一份副本落入敌人手中。那代表安全受到严重破坏，但我们无能为力。随着时日的流逝，随后来的报道加深我们的关注，即英国军事情报局已经知道这份关键性文件的内容。

我们等待反应。我们审阅华文和英文报章，看看（敌方）是否针对我最近发给全马各地的所有战地指挥官的指示展开宣传运动。沉默。毫无动静。在我们向北转移到劳勿之后，邓普勒开始把他的权威贯彻在反共运动中。政府的公告增加，本地各报章也突出与紧急状态有关的新闻报道。进入 3 月，报章充满新任钦差大臣的公告和活动的新闻。诸如："邓普勒提供他对统一的马来亚的蓝图、""邓普勒爵士惩罚有 2 万名懦夫的市镇"……"邓普勒爵士支持职工会"。完全没有关于我们的决议的报道。敌人掌握了进行宣传的难得机会。不过，这一次他们选择保持沉默。为什么？再一次，我要经过好多年之后才能理出头绪。在 1952 年 12 月，也就是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议决传达出去之后刚好 12 个月，以及也许是敌人的情报人员第一次看到议决大概 9 个月之后，伦敦的报章报道说，英国的确拥有议决的副本。这项披露在远东陆军部队中引起紧张不安、因为怒不可遏的邓普勒要知道这项严重破坏保安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基于保安理由，我的文件受到（英方）高度保密、当局特别下令不能让公众人士知悉。邓普勒和他的高级顾问们认为，公布显示马共要加强对其基层的纪律之情报是最不利的。议决特别明确的指示，要避免针对民运或群众采取可以被视为恐怖主义策略的活动。

尽管我已经在上一章中对 10 月 1 日的议决作了一般性描述，如果要对该文件突然和出乎意料之外的让公众人士知悉的事件进行全面评估，我必须在这儿提到该文件的另外几个要点。它等于是针对直到那时为止我们在战争中的游击战战术进行特别冗长的评估。我知道，该文件的英文译文长达 3 万字。由于是由政治局发出，我们的文件的指示代表马共最高层发出的命令。那是毫无疑问

的，它必须被遵守。而它的确得到遵守。英国军方针对马共主动挑起的事件所作的统计、非常清楚的显示出，在 1951 年年底至 1953 年年底之间，这类事件大大的减少。

议决相当明确的指示，必须避免任意性的恐怖主义行为。它甚至做到明确的在一张相当长的列举表中，列出我们的游击队必须特别避免的活动。

对于我们的议决，钦差大臣面对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英国的宣传一再把我们描绘为毫无人性的杀人者，我们的唯一目标是恐怖主义。要是公布了马共政治局的文件，显示马共似乎比英方更加关注过激行为，当地人民对于政府在过去四年来对马共的负面描绘将会有怎样的看法？英国方面会有怎样的反应？因为英国政府正在争取大量的增加军费，以便挫败在马来亚的可怕的恐怖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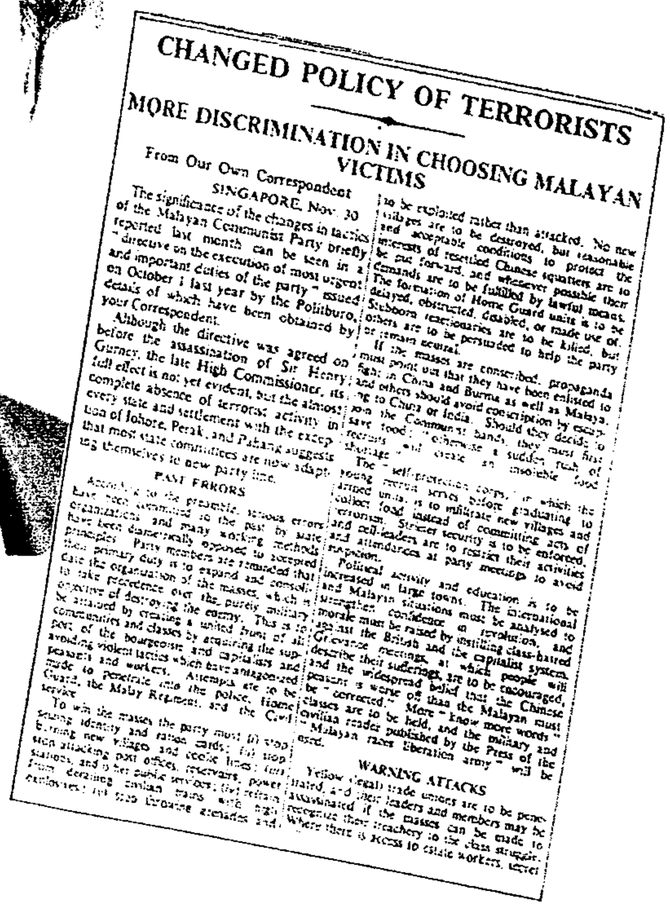
当然，邓普勒眼前更加关注的是，如果我们被视为采取温和得多的立场，他将如何自圆其说，声称他实施每天 22 小时的戒严、不断指控人家是懦夫行为、减少粮食配给量、强迫招供及恫言要实施更加严峻的惩罚都是合理的？

尤有进者，在邓普勒于 1952 年 2 月 7 日抵达马来亚任职到刚好三个月之后，伦敦方面命令他停止砍下人头作为辨认身份的根据这段期间内，邓普勒非常明白，尽管我们下令不准肢解尸体，他批准这类作法，认为那是合法的，是他的军队所需要的政策。同样的，他认为把被杀死的游击队员的尸体放置在警察局外面示众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马共政治局的命令基于保安理由被加以保密，邓普勒是安全的。

但在 1952 年 12 月 1 日，伦敦《泰晤士报》以显著版位刊登驻新加坡记者发出的一则独家新闻，是破坏力很强的新闻。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有 10 月 1 日的文件存在，那份文件被（英方）严格保密已经超过一年。新闻的标题是："恐怖分子改变政策"。该报的通讯员路易斯赫伦（Louis Heren）在报道的开头说，马共的指示是在葛尼被暗杀之前发出。他指出，由于除了柔佛、霹雳和彭亨之外，其他州属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没有恐怖分子的活动，显示马共采取新的路线。

邓普勒对保安条例被忽略大发雷霆。邓普勒那时不知道的是，把这份高度机密文件泄漏给赫伦的不是别人，而是罗布洛克哈特（Rob Lockhart）爵士将军。洛克哈特当时是作战行动副主任，是邓普勒的副手，是殖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在将近 30 年之后，赫伦在他的著作《在泰晤士报成长》中披露，他向洛克哈特保证，他将永远保护他的消息来源。



CHANGED POLICY OF TERRORISTS

MORE DISCRIMINATION IN CHOOSING MALAYAN VICTIMS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SINGAPORE, Nov. 30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es in tactics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briefly reported last month can be seen in a directive on the execution of most urgent and important duties of the party issued on October 1 last year by the Politburo, details of which have been obtained by your Correspondent.

Although the directive was agreed on before the assassination of Sir Henry Gurney, the late High Commissioner, its full effect is not yet evident, but the almost complete absence of terrorist activity in every state and settlem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Johore, Perak, and Pahang suggests that most state committees are now adapting themselves to new party line.

PAST ERRORS

Among the preamble, serious errors in the past by some organizations are admitted and many working methods have been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accepted principles. Party members are reminded that their primary duty is to expand and consolidat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sses, which is to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purely military task of destroying the enemy. Thus it is necessary by creating a united front of all communities and classes by attracting the support of the bourgeoisie and capitalists and avoiding violent tactics which have antagonized peasants and workers. Attempts are to be made to penetrate into the police, Home Guard, the Malay Regiment, and the Civil Service.

To win the masses the party must (1) stop issuing identity and ration cards; (2) stop burning new villages and cordon lines; (3) stop attacking post offices, reservoirs, power stations, and other public services; (4) release from detainment civilian rubber workers, estate employees, and cool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5) stop throwing grenades and [illegible] to be exploited rather than attacked. No new villages are to be destroyed, but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condition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resettled Chinese squatters are to be put forward, and whenever possible their demands are to be fulfilled by lawful means. The formation of Home Guard units is to be delayed, obstructed, disabled, or made use of. Stubborn reactionaries are to be killed, but others are to be persuaded to help the party or remain neutral.

If the masses are conscribed, propaganda must point out that they have been enlisted to fight in China and Burma as well as Malaya, and others should avoid conscription by escaping to China or India. Should they decide to join the Communist bands, they must first [illegible] and create an insoluble food shortage.

The self-protection corps, in which the young recruits serve before graduating to armed units, is to infiltrate new villages and collect food instead of committing acts of terrorism. Stricter security is to be enforced, and all leaders are to restrict their activities and attendances at party meetings to avoid suspicion.

Political activity and education is to be increased in large towns. The international and Malayan situations must be analysed to 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revolution, and morale must be raised by instilling class-hatred against the British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Grievance meetings, at which people will describe their sufferings, are to be encouraged, and the widespread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peasant is worse off than the Malayan must be corrected. More "know more words" classes are to be held, and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aders published by the Press of the 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will be used.

WARNING ATTACKS

Yellow (real) trade unions are to be penetrated, and their leaders and members may be assassinated if the masses can be made to recognize their treachery to the class struggle. Where there is access to estate workers, secret

在邓普勒将军抵达吉隆坡担任英国驻马来亚钦差大臣的时候，英国报人路易斯赫伦是伦敦《泰晤士报》驻东南亚通讯员。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僵，在赫伦针对我们的1951年10月1日议决发出独家报道之后（见右方的剪报），两人的恶劣关系变本加厉。

作为《泰晤士报》通讯员，赫伦跟随旅级的英国军队，目睹英军目的在搜索和摧毁我的总部的军事行动。他每天撰写的报道，详细列出英军的军事失败。几天之后，在吉隆坡的立法院大厦内出现了尴尬的一幕。赫伦在该大厦的走廊和一批马来亚政治人物小声交谈，邓普勒在副官陪同下冲过来，他手上扬起一份空运来的《泰晤士报》，喊道，“你对战争了解多少？你，你……！”赫伦后来写道，“我以为他要打我，但经过了犹如时间消失的那一阵子，他扬长而去，后面随着他的是目瞪口呆的副官们。”

用赫伦的话来说，邓普勒寻找泄漏消息的来源，“像很多年后尼逊总统的特务寻找消息那样全面”。他回忆说，从那时起，邓普勒把他当作“敌人”。赫伦的独家新闻只是使他和邓普勒之间原本已经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赫伦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章《泰晤士报》受到广泛尊敬的代表，而邓普勒则是丘吉尔授予他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让他镇压马共的反殖民主义起义的军人。据说，性格变幻不定的邓普勒，很快就形容赫伦是“典型的共产党的渣滓”。情况其实更糟。马来亚作战理事会的一名成员私下告诉赫伦，邓普勒事实上形容他是共产党员。当然，说赫伦是共产党员，正如说我是资本家一样荒谬。

邓普勒不断纠缠殖民部大臣利特尔顿，直到最终派人在伦敦向赫伦的总编辑威廉黑利（William Haley）爵士表达意见，要求他把赫伦调离马、新。刚刚升任总编辑的黑利，在聆听双方的论点之后，坚决作为赫伦的后盾，断然拒绝邓普勒的要求。后来赫伦带着调侃的语气写道，“邓普勒可以大喊大叫，直到气得脸孔发紫，但我仍然是《泰晤士报》驻东南亚记者，直到总编辑决定派我到其他地方为止。”

如果赫伦不理会我们的议决受到泄漏的新闻，英国及其在吉隆坡的殖民地代表几乎肯定会把那份文件严格的保密。也许永远不会解密。我一直在想，如果（英方的）宣传队伍没有被阻止研究我们的文件，而在他们研究的过程中，文件的内容早在1952年就被泄漏出来，结果会是怎样。或者假设文件的内容刚好在邓普勒抵步之前泄漏，结果又会是怎样。

“空袭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第4天发生，时间是在早上，我们刚刚吃完早餐。一架“奥斯特”型侦察机突然出现，以树顶的高度沿着山谷低飞。机师在发现我们的营寨之后，朝空中发射信号弹。几分钟之后，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由于山谷的空间很狭，展开袭击的飞机师犯错的可能性很小。我蜷伏在一棵大树下的浅战壕里，可以看到那些飞机盘旋飞行，朝山谷的中央发动攻击。一些用机关枪开火。其他的投下炸弹。”

第十九章
移向北方，英国打算入侵泰国南部

我们在1952年年底决定从劳勿向北移。主要目的是要使我们的总部保持完整无缺。而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决定。

当我们在彭亨受到第三次大规模空袭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制定措施，以便在下一次空袭中一旦总部被摧毁，斗争仍可继续下去。我也必须考虑到杨果在雪兰莪面对的类似危险处境。

早在文冬时，小章、李安东、阿仲和我讨论到一项紧急应变安排，一旦我们之间的联络发生重大的中断，就启动紧急应变安排。由于小章很快就会启程前往北京，我们觉得，如果联络上的紧急情况出现，他处于很好的地位，可以用马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发表公报和声明。在他动身之前，政治局授权他那样做。

小章当然必须和阿海商量。阿海在1949年初到中国医治肺痨病，是我们驻中国的第一位代表。阿海现在参与中共推行的广泛训练计划。我的这些指示有更进一步的根本原因。要是我们全部被杀死，或是由于某种其他原因停止工作，小章和阿海将顺理成章接管党领导权。

在1953年年初，我们真正开始搬回到金马仑高原。在1948年12月，我们就是在金马仑高原策划武装斗争的基本战略，我们对斗争的成功寄以厚望。我们对建立解放区充满信心——北部是吉兰丹，南部是彭亨州的南部。在1948年最后那几天，我们的梦想是在我们控制的地区建立我们本身的革命政府机构。

四年多之后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很明显的，我们没有控制土地，没有建立解放区。

在我们返回金马仑高原的旅程中，我和党的其他组织很少联络，也没有从总部发出重要的命令。我和革命活动相当脱节。那时的革命活动是由州委员会控制，在全国各地只有小规模的行动。有一度我完全没有接到报告。杨果和我之间的交通员系统完全中断。杨果那时是在加影附近的一座森林营寨内主持革命活动。

在我追忆那些处于危急的日子时，我对于我们党机构各级同志所表现的适应力感到惊讶。尽管我们面对各种苦难——强制性死刑判决、大批人被驱逐出境、会造成神经错乱的长期监禁、敌人的优势火力，在1953年年初，我们仍然誓言继续斗争。从我那时的观点（我知道我的政治局同僚们的观点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寻求途径结束斗争，而是要设法摆脱困境，以便继续斗争。我们认为，我们面对的极端困难，只是我们的斗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

据我所知，在那个时候，英国人接到非常准确的情报，说有一大批游击队朝北移向金马仑高原。通过因被降职而变节的蓝瑞以及谋杀了阿谷之警卫员提供的情报，敌人显然相信，我是在彭亨州地区活动。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共产党部队在彭亨州西部向北移动的消息，将会立即导致（敌方）评估，我很可能在上述地区的某个地方。

我们在金马仑高原的营寨位于得隆河北面。在我们搬进去之后，我立即传出讯息，说我必须和新任的霹雳州委书记陈洪见面，当时陈洪是在务边地区。我们等待了两个星期他才抵达。我必须和他确定我们的总部的永久性地点应该设立在什么地方。我对霹雳州已经生疏。我离开霹雳州太久了。我们必须重新和霹雳州建立起联系。我必须建立森林交通员网络。我们也必须建立公开的交通员网络，以便我可以恢复和杨果进行定期联络。我有传达消息，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彭亨，但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预料不到的是，我尝试重建我们总部的交通员网络和重建与杨果的联系，演变成轰动的国际头条新闻，我将在下一章提到这件事。

我们最初的营寨是临时性的，是较早时被当地的一支游击队所遗弃的。由于它没有被树叶好好的遮盖，容易被空中侦察到。我们的意图是迅速移到森林更深处。我们预期霹雳州委书记会在几天之内抵达，我们可以迅速确定新的营寨地点。那个时候，我们的总部，包括警卫员在内大约有50人。

我们的营寨是在一个山坡的半山腰，位于一个狭窄山谷的一边。我们沿着该地区的入口处挖掘防御性战壕。战壕后面一段距离是一些小屋，供我们的游击队主力住，还有一个指挥中心以及操场。在营寨后部有一棵热带大树，提供大片的遮荫地区。这是总部所在地，每一位高级干部分配一间小屋居住。

从营寨下到山谷下面的小溪是一段非常陡的十分钟步行路程。从下面爬上来，则需要花20分钟到30分钟。小溪提供我们饮用、煮饭和冲凉用的水。水很冷，因此我们通常在中午左右冲凉，因为那个时候天气最热。从我们的营寨所处的高度望到山谷的对面，平面距离不到100公尺。

当我们在金马仑高原建立临时营寨之后不久，苏联领袖斯大林就去世了。他是在3月5日晚上逝世的。我们是在大约两天之后从送到营寨的本地报章的报道中获悉他的死讯。这肯定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斯大林去世这件事使我准确的记起，皇家澳洲空军对我们展开的一次最恐怖的袭击。

空袭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第4天发生，时间是在早上，我们刚刚吃完早餐。一架“奥斯特”型侦察机突然出现，以树顶的高度沿着山谷低飞。机师在发现我们的营寨之后，朝空中发射信号弹。几分钟之后，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由于山谷的空间很狭，展开袭击的飞机师犯错的可能性很小。我蜷伏在一棵大树下的浅战壕里，可以看到那些飞机盘旋飞行，朝山谷的中央发动攻击。一些用机关枪开火。其他的投下炸弹。

我的其中两个警卫员蜷伏在不远的地方，他们首当其冲，直接被击中。两个人都死亡；一个头部被炸弹碎片击中受伤身亡、另一位则被机关枪子弹击中颈部而死。他们是仅有的阵亡者。另外三个人受伤，其中一人腿部折断，受了重伤。另外两个人只蒙受皮肉轻伤。奇怪的是，我们的营寨所受到的破坏微乎其微。

但在山谷的另一边，没有一棵树完好。扫射和轰炸持续了三小时，我们估计，那天用来攻击我们的飞机共出动约70架次。澳洲空军的攻击，把在我们正对面、和我们平行的一片丛林夷平。被夷平的丛林面积和我们的营寨一样大。

我们所在的地方明显的可以从空中清楚的看到，为什么机师却攻击山谷的另一边？是不是他们的目标座标错误的把我们列在山坡的另一边？或是这个特定高原地区的地形结构阻止了他们瞄准我们这一边发动攻击？我将永远得不到答案。

但我知道，如果那些澳洲空军对准目标发动进攻，将会发生什么事。那天在空袭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因为火力是那么猛。我们的总部在1953年3月受到摧毁，将会对革命产生灾难性后果。我较早时发出指示，要在北京设立一个在后方的应变领导层，以便在像这样的危急时刻接管党领导权，但不可能很快成立。小章和阿海也没有时间将它组织起来。尤有进者，我认为很明显的，我们整个游击队组织的士气，现在将会比我们在劳勿的总部受到攻击，或是在文德甲的基地营在两年前受到攻击时低落得多。

空袭使我们陷入特别脆弱的处境。我有必要和霹雳州委书记谈商，以迅速解决把新总部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我估计，他距离我们的地点不会超过两天的步行时间。如果我们迁移，几乎肯定将会碰不上他，而要安排另一次会面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迁移，将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在澳洲空军空袭之后，英国陆军将会发动后续的地面进攻。在对像这样偏僻的地区发动进攻时，敌人通常会派出特别部队进行侦察。一旦怀疑政治局的基地营可能是在这个地区，侦察部队就可能迅速被扩大成为大规模的进攻部队。

我决定再等候霹雳州委书记24小时。我的军事指挥官在周围山丘的战略性森林据点安置监视哨，以便一旦有敌军趋近，可以提早发出警告。那天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们周围的森林发出的任何响声似乎都会令紧张加剧。我们埋葬了死者，及安排伤者到附近的民运的营寨去。在那天傍晚，我望穿秋水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在三名警卫员陪同下抵达了。我们迅速举行会谈，营内的其他人继续收拾行装，准备在第二天迅速离开。

陈洪在那天晚上向我作的报告，肯定是紧急状态以来，我所接到的最令人不安的报告。他很平静的针对我失去联络那几个月在马来亚全境的游击队活动作了一般性的估计。接着，他对在霹雳州发生的事作了比较具体的检讨，霹雳是他负责的州属，他自然知道得比较清楚。局势恶化得比我想像的最坏情况还要糟。

他解释说，他已经视察了霹雳州中区从和丰一直南下到美罗一带，他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支持像我的总部单位－50人－那样规模的部队。我感到震惊。我的记忆是，在霹雳州，到处分布着我们的支持者。在二战之前，我协助在基层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抗日军得到人民大力支持。战后马共在霹雳州的支持者甚至增加到更多。

我知道，在彭亨州，布里格斯计划对我们的粮食供应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我认为那是有理由的，因为和西部及南部的邻州比较，彭亨州的人口相对稀少。我认为，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州，如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要有效的推行新村计划非常困难。我的估计肯定充满谬误，陈洪谈到细节，纠正了我的错误。

我问道，“那么，我们要如何操作我们的总部呢？我们必须维持一个总部。从一开始，我们就为了统领全局的问题而挣扎。没有总部将会混乱。”接下来，我告诉陈洪，今后游击队将恢复小单位行动，并向他解释游击队化整为零的活动方式。由于新村的存在，造成霹雳州出现粮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保持这种水平的攻击吗？

陈洪静静的坐在那儿一段时间，在思考如何处理这两个难题。他最终得出答案，并先处理第二个问题。他指出，可以保持小规模的游击队攻击，但密度必须减少。由于到处设立了新村，变成非常难以获得一般供应品。话题转到在那儿设立总部的问题，他是很郑重地告诉我的，使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进一步朝北转移到宜力地区。他又表示，即使在那儿很难获得来自民运的供应品，我也可以派特别部队越过边界进入泰南取得粮食。尽管有英军巡逻，来回边界仍然相对容易。

我必须听取这个意见。由于非常焦虑，我那天晚上在森林中睡得不安宁，时睡时醒。第二天清早，我们接到消息，说有一支敌方巡逻队趋近。我们事先已经收拾和准备好，在几分钟内就离开。

我们步履艰难的穿越世界上最茂密的森林，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宜力。抵达那儿之后，我立刻和当地的党领袖会谈。那个地区的情况也不好。一年多来，宜力地区的同志们知道他们内部有一名叛徒，但无法确认他。打算开展的游击队活动还没有开始就被英国人挫败。有人把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储藏地点透露给敌人，因而被破获。党的重要干部因被出卖而遭逮捕。替英国人工作的人显然是高层干部，而且消息灵通。

当我和总部人员抵达宜力地区时，宜力的叛徒事件正处在最高潮。当时是1953年年中－出卖开始之后一年，最终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中年的区委书记梁松。

在我的建议下，嫌犯梁松受到扣留和盘问。当时我们在森林深处扎营，在宜力以东步行需要两天的地方。梁松被带到我的营寨附近的地点。同志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搜身。他们在他的衣袋里搜查到一张支票，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支票面额5万元。当然，那张支票是当局给他的酬劳的一部分，以奖赏他一年来

北霹雳州委沈天暴露宜力区委梁松的间谍活动。这张照片是在 1964 年照摄的，那时沈天正要前往中国医病。

我在 1949 年初送阿海到中国医治肺痨病。在病愈之后，他参加中共主办的一系列广泛训练课程。他在 1960 年抵达我们在泰南的总部，使我终于能够动身前往北京。

替当局服务，刺探宜力区的同志的动向。梁松在受盘问时招供，他替政治部服务。他进一步招认，那张面额 5 万元的支票只是他的酬劳的一部分。其他的钱由政治部替他保管。当然他立即被处决。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替政府节省了相当多钱。梁松不可能去提取当局用他的名字保管的钱。从他身上搜到的那张面额 5 万元的支票也不可能兑现了。

我们消灭了队伍中的一名内奸，而且很快就觉察到他所造成的破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由该地区新村提供粮食的几乎每一个粮食供应线都受到政府有针对性的封锁。有一两个小规模的供应线仍然在运作。不过，我们相信，那是政治部故意留下来的，以增加未来的监视机会。

我们也深信，政治部官员利用在过去一年中和当地党高层建立起来的独特联系，扩大他们的情报网。如果他们没有那样做，等于没有做好本份的工作。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再一次迁移总部。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地是越境到暹罗南部的森林深处。

* * * * *

在紧急状态开始时，我们在吉打的游击队的一个单位受到英国人攻击，向北撤退，越过边界进入暹罗最南部的勿洞地区。来自玻璃市的另一支部队也和英国人作战，同样为了逃避而越过暹罗边界，这一次进入更西面的昔罗地区。在玻璃市的撤退事件，是由于游击队对一排辜卡兵发动最成功的伏击，导致英军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所致。在那宗伏击事件中，那排辜卡兵有一半非死即伤。这两项撤退行动都是在紧急状态的最初两个星期内发生，在这两个例子中，英军都为了追击我们而进入暹罗境内。

在玻璃市的攻击事件，我们获得变节的日本兵很大的帮助，这些日本兵加入我们的游击队。他们曾经由日本陆军训练，懂得制造、安置和操作地雷的技术。在玻璃市有很多锡矿，我们从那儿获得大量炸药。我们的日本籍游击队员发明了使用闪光灯灯泡的引爆系统。他们在灯泡的玻璃钻一个小洞，把易燃物装进去。有时候，他们除下火柴枝枝头，轻轻压碎，把粉末装进灯泡。在这方面必须很小心，以免把在里面的幼细灯丝弄断。这样制作出来的爆炸装置，连结一条长 50 码至 100 码的电线，再接到提供引爆所需电流的电池。

我们的游击队员对辜卡兵经常使用的一段路进行了侦查。他们在黑夜掩护下在该路的泥土表面下敷设了地雷，地点选在该路段两旁都有枝叶茂盛的大树的地方，提供了进行伏击的理想掩护地点。日本人很技巧的隐藏引线，而我们的游击队员开进去，等待他们的猎物。地雷在辜卡兵的军车压过时引爆。这项行动完全出乎英军指挥官的意料之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然有能力使用地雷。

在那个时期，曼谷当局对在克拉地峡一带南部 4 个省的控制很松懈。只要我们留在偏僻地区，而且不制造麻烦，暹罗的警察和军队不会理会我们。对暹罗当局而言，只要没有看到我们，就等于我们不存在。对他们来说，我们也给予他们报偿。在那个时期，他们的边区省份各地受到匪徒一连串的袭击。我们和昔罗地区的一些匪徒较量并消灭他们，使到当地警察减少许多麻烦，及协助为人民恢复法律与秩序。整体而言，我们备受欢迎。

在勿洞地区，我们的人员和国民党匪帮进行对抗；从日本投降时候起，国民党匪帮就对当地居民进行恐怖活动。那些国民党匪帮总共约 70 人，组成两个排。在我们的游击队抵步之后才几天，暹罗人就和我们接触。我们能够消灭另一批华人吗？因为他们制造了太多的麻烦。

国民党匪帮没有什么抵抗就逃走，留下他们的武器和弹药。那两排国民党军的残余分子没有能力重组，他们逃亡到缅甸、暹罗和寮国三个国家的边界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他们在那儿加入李弥将军指挥的臭名昭彰的国民党第 93 师。那个师是在 1949 年被毛泽东的军队从中国南部赶入“金三角”地区。那批残余分子很快就变成李弥的生产线的人员，协助他的军队种植罂粟和从事鸦片贸易。

国民党军在勿洞地区花了好多年时间发展起来的游击队基地就这样变成我们的基地。它的位置很好，在勿洞北面，横跨从马来亚边界北上的主干公路两旁。

我们在勿洞和昔罗地区站稳脚跟之后，就致力于建立与当地人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成功的。但在曼谷的中央政府是由亲美国的军人掌权的，因而强烈反共。因此，我们在暹罗南部的据点从来都不是绝对安全。这有赖于我们和当局合作的程度。而正如所料，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诸如新的行政长官与警察长官；该区的日常事件；我们是否有能力顺利的解决由于我们驻扎在那儿而引起的任何问题；以及其他因素。

* * * * *

当我在 1953 年最后几个星期迁移到勿洞地区时，我们在那儿的常驻马共游击队人员有一连人的实力。我们的同志占据勿洞主要公路两旁的据点。公路东边的地形理想得多。这一大片森林地区为我们提供许多可以扎营的地点。从安全观点来看，那个地区也是在马来亚的吉兰丹州边界以北足够远的地区。

不过，在西面，吉打州的边界非常接近，结果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如果英国人选择采用受国际承认的穷追权，我们可能会非常轻易的受到越过边界从西边来的攻击行动。这项穷追权最初允许他们深入暹罗境内五英里，后来延伸到十英里，最终在采用公制时，延伸到 25 公里。

情况使到我来不及把我们即将抵步的讯息传达给我在勿洞地区的单位。我们只是突然出现。我们在和驻在当地的同志们讨论了之后，决定把总部建在公路的东面。我们所选择的地点与马来亚边界的关系，使到敌人很难在那儿包围我们。我们不是在森林深处，因而取得地利之便。要去到我们的营寨必须经过胶园，这使到我们在搬运供应品时相对容易。我们的第一个营寨距离边界不到五英里，但我们没有受到穷追的威胁。在我们和边界之间的森林非常茂密，英国人几乎不可能通过。如果他们尝试穿过，早在他们接近我们的据点之前，我们已经转移。在往后几年，我们在那一带建立了三个营寨。

* * * * *

在穷追安排的最初阶段，英国人在进入暹罗领土之前必须获得正式批准。这使到他们必须向暹罗提供详细资料，包括军队的番号和建议中越过边界对付马共的目标地区。在多数情况下，暹罗的地方官员会拒绝英国人的申请。如果批准，暹方坚持派他们的一批官员陪同入侵的部队。我们的暹罗线人总是会告诉我们，英军即将抵步的时间、地点及实力。从敌方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一无是处的制度。

马来亚的殖民当局尝试克服这个难题，他们主要派遣马来警察部队展开穷追

行动。这也没有带来实质效果。接着，他们尝试使暹罗军队和马来亚部队在边界地区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吉隆坡当局同意提供全面的后勤支援，而据我所知，还做了财务安排，拨出款项付给参与行动的暹罗部队。这也产生问题。马来亚的军队获得更好的配给，导致暹罗人投诉说他们受到歧视。

有生以来，时至今日我才得以回顾我所形容的悬浮的历史观。我是紧急状态这一历史事故的其中一个中介角色。如今接触到解密文件，我终于能详尽地回顾紧急状态的另一面向。在1953年的黯淡日子里，同志们和我尽力使总部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策划和运用策略，智取保安部队的地面巡逻队，不但要战胜敌人的森林战术，也要挫败他们的全盘策略。我们有时成功，有时失败。

从1953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这段期间的英国情报简报报告㉓说，政治局“相信现在并没有迁移到距离其在彭亨州西部的旧总部很远的地方。”在那阶段，我其实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长途跋涉，越过茂密森林覆盖的山脉，抵达霹雳州北部接近泰国边界的地区。至少在这个例子中，敌方在收集情报方面远远落后。因此，我相信可以准确的说，当我迁移到勿洞地区时，英国人完全不知道我的下落，而且在以后几个月也同样不知情。

有趣的是，同一份文件披露，英国人最新收到的情报显示，中共要求马共派一名特使到北京。在这方面，敌人的情报似乎同样特别慢。那时是1953年年底。我早在1949年年初就派阿海到中国，而在1951年在完成我们的10月决议不久派小章去中国。总的来说，英国人迟了两年或是五年才获得这种情报。

文件续称，也有证据显示，马共最高层出现意见分歧。据报导，马共副总书记杨果－他是总书记陈平的密友和智囊－告诉总书记，他对政治局在1951年10月发出的指示保持重大怀疑。在该项指示中，马共将集中于采取比较不会疏远“群众”的那一类暴力斗争。”

评估续称，“杨果似乎认为，那项指示做得不够。他鼓吹‘两面性革命政策’以及把所有反帝国主义团体结合为‘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党的最重要任务是组织群众，所有武装军事行动必须完全从属於那个目标。”它下结论说，没有证据证明，杨果的观点影响到马共的政策。

说我和杨果之间出现分歧当然不是事实。由于在我发出1951年10月的指示之后不久，我们之间的交通员联络网受到破坏，即使杨果不同意决议的内容，他也没有办法和我联络。

不过，我必须承认，到了1953年，敌人对于评估战场的发展很敏锐，预测到以后的冲突的可能型态。这点可以用1953年4月10日在吉隆坡苏丹皇宫召开的会议记录㉔来做最佳说明。代表马来亚的是邓普勒中将，代表暹罗的是总警长乃炮（Pao Sriiyanond）将军。与会者还包括马来亚情报主任莫顿（J.P.Morton）和乃炮将军的助手他纳（Thana）少校。会议记录披露，邓普勒预测，马共游击队将加强在暹罗南部的势力。他也预言，半岛持续的战争将集中在北部地区。

在邓普勒的压力之下，乃炮将军表示，暹罗当局已经修正对在其南部各省的马共的看法。以往他们对我们的渗入的态度是不在乎，这支来自邻国的共产党运动在进入边界的北部之后不活跃，对当地社区没有造成伤害。乃炮将军在会议上仍然不准备承认马共现在已经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相应的加以对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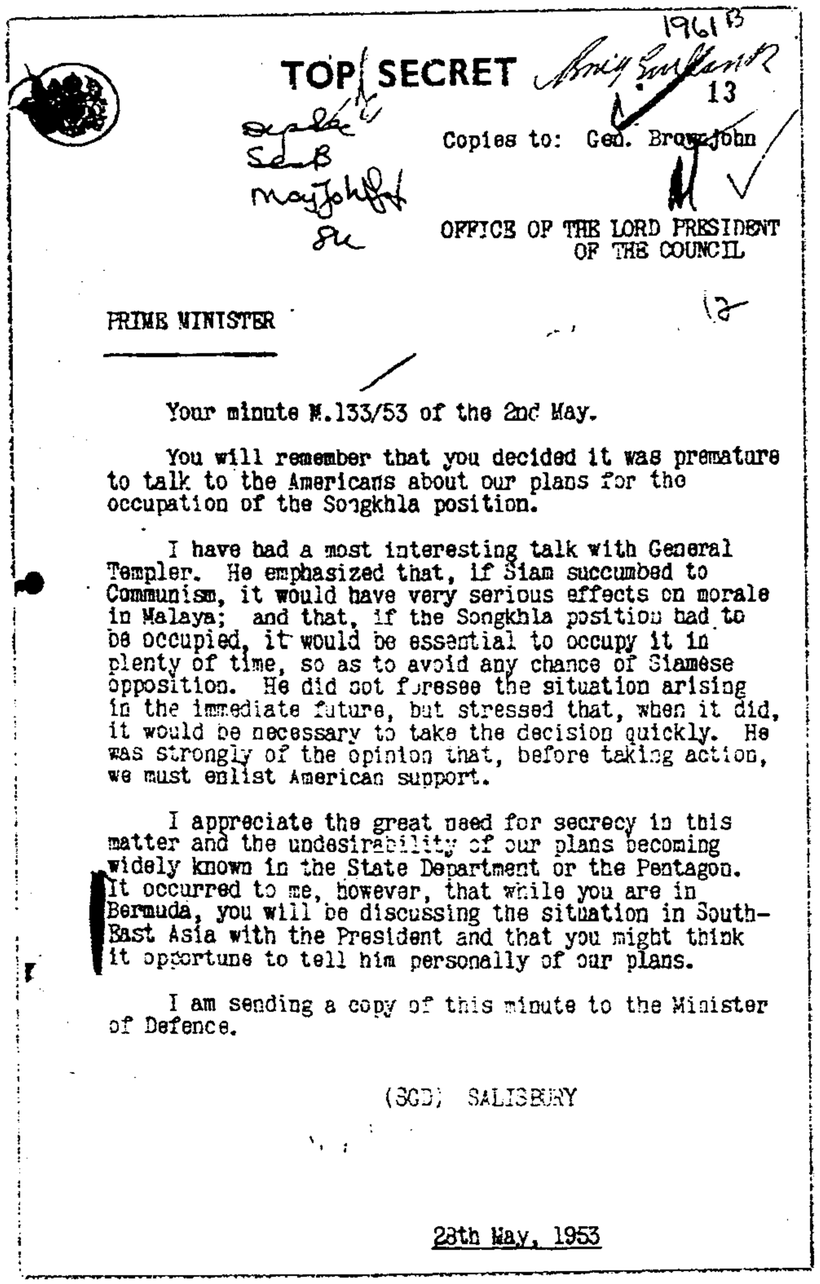
接着，邓普勒在一张地图上展示要对我军发动的战争，因为敌人的情报认为，我们是部署在边界地区。接着他提呈一份详细声明给乃炮将军，解释军力和部署，同时要求把在暹马边界协定之下的合作扩大到针对我们的更有效的联合军事行动。在会议结束之前，邓普勒要求乃炮将军，今后把投降或被捕的马共游击队员引渡到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我从对这段时期进行的背景研究中得出结论，到了那个阶段，邓普勒已经充份了解英国的军事战略家们在伦敦制定的最新高度机密应急计划，要入侵泰国南部。这项代号“战士行动”（Operation Warrior）的计划不论是否获得曼谷政府批准都要展开。

这项计划同其结果搞得一团糟的英国“斗牛行动”（Operation Matador）异常相似；“斗牛行动”是要挫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预料会经由克拉地峡发动的入侵行动。“战士行动”要求占据被称为“宋卡据点”的地区。事实上，那意味着由英国占领暹罗南部的四个边界省份。在1953年1月20日在白厅举行的各军种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批准了一份完整的备忘录，以便提呈给内阁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则指示把备忘录的内容告知澳洲和纽西兰的各军种参谋长。

题为《保卫马来亚》㉕的备忘录的序言指出，“女王陛下的政府在此之前指出，要成功的保卫马来亚、抗拒日益增加的威胁，需要占领宋卡据点。这种威胁可能是：（a）渗透的威胁；（b）中国军队通过暹罗入侵的威胁”。

共和联邦关系部办事处发给英国驻澳洲坎培拉和驻纽西兰威灵顿最高专员的



TOP SECRET

1961 B

13

Copies to: Gen. Brownjohn

OFFICE OF THE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PRIME MINISTER

Your minute M.133/53 of the 2nd May.

You will remember that you decided it was premature to talk to the Americans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occupation of the Songkhla position.

I have had a most interesting talk with General Templer. He emphasized that, if Siam succumbed to Communism, it would have very serious effects on morale in Malaya; and that, if the Songkhla position had to be occupied, it would be essential to occupy it in plenty of time, so as to avoid any chance of Siamese opposition. He did not foresee the situation arising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but stressed that, when it did,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take the decision quickly. He was strongly of the opinion that, before taking action, we must enlist American support.

I appreciate the great need for secrecy in this matter and the undesirability of our plans becoming widely known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or the Pentagon. It occurred to me, however, that while you are in Bermuda, you will be discussing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President and that you might think it opportune to tell him personally of our plans.

I am sending a copy of this minute to the Minister of Defence.

(SGD) SALISBURY

28th May, 1953

关于英国要占领暹罗（今泰国）南部的“战士行动”计划，伦敦在 1953 年 5 月基本上要对他们的盟友美国保密。索尔兹伯里爵士在这份致给首相丘吉尔的最高机密电报中，报告他在最近和邓普勒将军举行的会谈。他在第四段中建议，也许可以用慎重的方式向美国总统透露“战士行动”的内容。

指示强调备忘录的“特别机密性质”。他们指示说，必须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确保“情报的完全安全”。

指示指出，“没有把这些计划的任何内容透露给美国人或是法国人，这点必须弄清楚。澳洲和纽西兰的军事当局，无疑将会确保他们的代表在建议中的五国参谋机构会议或是澳纽美公约（ANZUS）的会议上不会提到这项情报”。

邓普勒和乃炮将军举行会谈的一个月之后飞往伦敦，在 5 月 19 日参加各军种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他获得关于“战士行动”的全面影响的最新资料。他也被要求检讨东南亚的局势。

邓普勒在检讨报告一开始就向聚首一堂的将领们保证，紧急状态“最终在控制之下”。不过，他认为反叛乱的努力是缓慢的过程，要加以结束的唯一方法是“杀死其领袖，尤其是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宣传局成员”。他指出，这类措施说易行难。他说，马共领袖们不常开会，而他们的秘密联络网“很了不起”。邓普勒的最后一项说法千真万确！他意有所指的继续说，将会针对马共领导层展开“特别重要的行动”。他告诉参谋长们，到时他将会要求暂时性的空中支援。

关于占领宋卡据点的课题，邓普勒强调，这样的一项行动必须在暹罗屈从于共产主义之前进行。如果时机恰当，只要投入一旅的军队就可以完成目标。他声称，只要重新部署原有的军队，他暂时失去对这旅军队的指挥权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当谈到针对“战士行动”向美国保密时，他似乎不同意这项政策。他告诉各军种参谋长，他认为和美国讨论暹罗和马来亚边界一带的局势是重要的，因为美国在暹罗有一支庞大的军事代表团。

四个月之后，英国驻曼谷大使显然是奉命密切评估暹罗对南部边界问题的看法。他和乃炮将军举行会谈，并向伦敦报告会谈的结果㉖。这项会谈的会议记录显示，大使告诉身为暹罗警察总长的乃炮将军，匪帮的压力中心“开始朝北移”。大使强调，邓普勒爵士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把紧急状态的‘婴孩’，转嫁给暹罗来承担”。

邓普勒显然是要令乃炮将军感到震惊。据报道，乃炮将军对这样的说法一笑置之。英国大使也许没有料到乃炮将军会冷淡的微笑。他坚持说，他所指的是“最严重的发展”。他再次强调，邓普勒爵士“非常担心”暹罗南部局势的可能发展。会议记录说，乃炮将军继续微笑。

接着下来，大使和警察总长在会谈中研究英国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即扩大在暹罗－马来亚协定下的越界合作。会议记录指出，乃炮将军仍然不置可否。大使的印象是，乃炮将军宁可邀请马来亚警察“展开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而不是正式扩大作战区”。

我会欣然同意他的看法。

另一方面，在 1953 年年底，在我们的勿洞地区的新总部安顿下来之后，我必须处理的最迫切课题涉及联络。很重要的是，我必须迅速和在北京的小章建立起联系。我必须让他知道我的最新地点，以及我接到的关于我们的武装斗争进展之最新严峻评估。我也必须和杨果联络。这意味着必须对我们向来脆弱的“公开”和“森林”交通员网络进行重组。在这一年内，其中一个交通员网络引起很大的国际轰动。

第二十章
李明传奇

在英国实施紧急状态条例之前几个月，马共高级领导层充份了解到，要建立安全可靠的联络网络充满困难。日本占领时期给予我们很多教训。在较理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无线电收报机和发报机。我们也需要熟练的操作员和有关的密码。如果得不到这些，我们将被迫依赖临时凑成的无线电器材和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交通员。

在我们准备展开武装斗争之时，我授权我们的理论家阿电，在新加坡黑市购买 10 套手提军用无线电器材。它们是英国制造的，显然是通过间接管道从新加坡岛上的一些殖民地军事设施流入黑市。我们的意图是要在几个星期内，把这些无线电器材一套一套的偷偷运进马来亚，分发给各主要游击队单位。但事件的发展使我们无能为力。在我们买到无线电器材之后一个星期左右，紧急状态法令颁布，英国加紧采取保安措施，挫败了我们要把那些器材运过柔佛海峡的一切尝试。

这项重大停顿意味着我们被迫依赖 3 架笨重的 B-II 型收报机 / 发报机；在 1945 年英国空投这些收报机 / 发报机给 136 部队时失准，为我们获得，据为己用。其中两架在柔佛州。第三架在森美兰州。B-II 的正式设计是“手提式”，但远非如此－尤其是如果需要用力的把它们运经森林、沼泽地带、稻田或是运过河的话；而在我们的情况是经常必须如此。

在抗日战争期间，136 部队不大愿意训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同志学习操作无线电的技术，虽则他们曾在科伦坡为几名国民党特务提供这方面的训练，过后

并把他们带入马来亚。最后英国人勉强同意训练我们的 3 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名叫李真的女同志。课程局限於基本的收报 / 发报理论、莫尔斯式电码和器材维修。课程是在马来亚和设立在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建立起联系之前进行。因此，我们的学员无法掌握实际经验。在 3 位学员中，只有李真在日本占领结束之后还活着。

由于她是马共的唯一“无线电专家”，我安排她在 1949 年年中来到我们在文德甲的总部，并设法带进那 3 架 B-II。这是一项合适的安排，因为她一度是陈田的爱人。在等待那些无线电器材抵达期间，她开了一个班，训练 3 位未来的操作员。这是一项徒劳无功的努力。李真的学生没有一位见过收报机 / 发报机。这是一项严重的缺陷，加上在我们被迫转移营地之前，器材还没有运到。在我们不断转移总部期间，李真跟着我们。在 1950 年年底的一次转移中，她是我们先头部队的一员，该先头部队在彭亨州中部遇到辜卡兵巡逻队。敌军自动武器的枪火把我们的游击队员打散。除了李真之外，大家都没有受伤。李真被一枚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到了 1952 年，我们获悉，在泰南克拉地峡一带活动的走私者拥有非法无线电联络网，使他们可以和香港及上海直接联络。这些基本上是非法经营的资本主义商人。如果他们可以拥有无线电联系，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我指示北马局和黑市建立联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适合我们需求的无线电器材。最终我们设法买到 8 个单位。每一个单位和鞋盒一般大小，拥有一个电源组和一个变压器。它们只能接收 / 发送摩尔斯电码。

正当我们设法解决我们在无线电领域的联络需求时，从我们在日本占领时期的经验，我们了解到，不论有没有无线电，我们必须大量的依赖交通员以使讯息流通。我们知道，一旦我们建立无线电联系，英国人有办法用电子截听。

换言之，如果没有交通员定期带进报告和送出命令，我们的战争总部简直无法操作。由于在开始时，我个人参与建立交通员网络，我认为交通员网络保持紧密运作是明智的。

我的其中一位最佳交通员是曾银芬，她是中年妇女，是怡保一间华文小学的女教师。我认识曾银芬一家人已经好多年。她是一支由几位年纪较大的妇女组成的交通员小组的协调员。当我离开霹雳州前往彭亨州时，她的联络网开始扩大。

在相当短的期间内，它使在霹雳州和雪兰莪州的几个营寨和我在文德甲的

我的最佳交通员之一曾银芬。她在怡保身份被暴露之后，被我派去中国。她无法回到马来亚，最终在中国定居，并在中国和我们的一位老干部结婚。

总部联络上了。我们的保安安排是绝不让交通员知道各营寨的真正地点，也不让他们见到游击队领袖。他们通过让谍报人员使用的安全房和信箱操作，这些地点通常坐落在孤立地区。只有曾银芬不受这些条例约束。

不幸的是，曾银芬的网络在1950年初受到破坏。她服务的小学的校长和两位老师都不知道她已经和党建立了联系，他们设法要让她也参与分发共产党传单。警方展开扫荡，逮捕了校长和那两位教师。曾银芬也被扣留。她被关了两天，受到各种威胁，最后获得释放，条件是她必须定期向当局报到。

她作为交通员的价值立即结束。她的整个网络已经瘫痪。不过，她设法溜到文德甲，我们在那儿检讨她的情况。

她接受我的献议，到中国参加密码课程。这项计划是让她离开马来亚大约两年。她一旦回来，将避免回去怡保。她必须选择住在另一个人口多的中心，拥有不同的身份。一旦定居下来，她可以再和我们联络。

令人遗憾的是，曾银芬不能回来。她和到北京治疗肺痨病的同志一样，在中国限制一切人出国时，被困在北京。北京当局当时深深介入於1952年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战争谈判，它决心不要让人发现她和亚洲的颠覆活动有关。曾银芬不可能回到马来亚居住了。

从1950年年中到1953年，我把总部从加流迁移到文冬，然后迁移到劳勿，再迁移到更北的金马仑高原。在这期间，我致力于重组我的交通员网络。不过，一旦我们建立起另一个交通员网络，警方很快就会发现，并逮捕涉及者。

* * * * *

在1952年7月24日，政治部警察突袭在怡保拉乞（Lahat）路一间屋子，扣留两名妇女；他们怀疑她们与马共有关。警方搜查屋子，没有发现她们与马共有关的任何线索。两名妇女都被关押，受到严厉盘问。警方的盘问非常严酷，以致其中一位妇女邱音（译音）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至少警方这样宣称。另外一位妇女是24岁的李天娣，她被关押了几个星期，以便追查她的背景。警方宣称，她在怡保由叔叔养大。她的母亲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1940年代末被驱逐去中国。在盘问者眼中，母亲的历史显然进一步牵涉到女儿。

李小姐于8月6日赤着脚被带到怡保推事庭，在紧急法令条例下被正式控以3项罪名。控状指出：1.在1948年8月至1951年9月之间，她在怡保加巴央（Kepayang）地区携带一把手枪；2.在同一段时期，同一个地区，她携带一枚手榴弹；3.她与拥有武器和子弹的人士为伍，使到可以合理的假定，她的行为已经危害到公共秩序。3项控状，每一项都可以判她死刑。

控方指出，李小姐在马共党员中所熟悉的名字是李明。第二天，当地报章报道这位芳龄24岁的漂亮囚犯的新闻，她穿着藏青色宽松长裤和格子花衫上庭。据报导，尽管她没有穿鞋，却是“若无其事”的走到被告席，聆听法庭人员念出和解释她所面对的死刑控状。她是年轻貌美的东方女性，又持蔑视态度，符合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期望。警方怀疑李明下令杀死至少两名欧洲人，增加了她的神秘感。这项审讯肯定会成为国际上的头条新闻。

一个星期之后，李小姐被带到霹雳巡回法庭受审。这一次，她穿着一套“净洁的藏青色和有红色花点的华人传统服装”。她发现，她面对第四项控状。最新的控状指出，在她被捕之前的两个月期间，她携带一把勃朗宁自动手枪。

警方副主控官尼尔（M.G. Neal）在提出第四项控状之后立即向法庭宣布，他将只针对第二项控状传召证人。这是关于拥有手榴弹的控状。李明以铿锵有力的广东话发言。她告诉法庭，“这些控状是毫无根据的。我要知道指控我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士的名字。”

接着下来，法庭进行审讯。主审法官是汤逊（J. Thomson），在紧急状态刑事法律程序的规定下，有两位陪审推事陪同审讯，其中一位陪审推事是华人；另一位是印度人。

尼尔在初步陈词中解释说，警方是根据盘问一名“匪徒交通员嫌犯”时所收集到的情报，突袭在拉乞路的那间屋子和逮捕李明。由于在突袭期间没有找到罪证，针对被告的控状，将依赖九名“前匪徒”出庭时所提供的证据。尼尔补充说，控方将会提供照片证据，证明被告持有武器和穿军装。

怡保著名律师辛尼华沙甘（S.P. Seenevasagam）替李明辩护。他迅速抓住那九名控方证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他指出，“他们的生命操在政府手中”。辩方律师的情报准确。那九个人当中，只有一人正式获得宽赦。其余的都在等待他们的宽赦获得批准。在辛尼华沙甘陈词之后，法官裁定，那九名控方证人应被视为共犯，他们的供证必须获得确证才可以相信。

李天娣，别名“李明”。

控方传召那九名证人。其中一名声称，他是马共“流动队”的一名队员，他曾经在李明几次访问他在加巴央附近森林内的营寨时见过她。他坚持说，被告每一次来时，腕部都挂着一枚手榴弹。后来他被调到在昆仑喇叭（Gunong Rapat）附近的营寨，她也来过。她也挂着一枚手榴弹。证人在供证完毕时，形容李明是马共的一名高级干部，她曾下令杀害在怡保地区的几名欧洲人。

一名印度人证人告诉法庭，李明一度访问他在和丰区的营寨，并拍了营内的游击队的几张照片。他说，那一次，她也和几名游击队员合照。第三位证人是女性。她声称，曾担任李明的交通员有 10 个月之久。她说，每一次两人会面时，李明都携带一枚手榴弹。其他六名证人的供证大同小异。

呈堂作为证据的照片是在务边附近的一个山洞内发现。在审讯中没有弄清楚的事实是，那些照片是由一名现为警员的前共产党员找到的。这样一来，那些照片被接受为助证。

李明在被告栏内发表了 10 分钟的声明。她强调，那些作出对她不利的供词的警方线人，她一个也不认识。她坚决否认她是那些照片中的那名女人。她坚持说，她不是马共高级干部“李明”，而是身份证上的李天娣。她驳斥指她早在 1948 年就是在怡保一带活动的马共党员的说法；她告诉法庭，她在那年前往新加坡，并在嫁到新加坡的姐姐家中住了 24 个月。

接下来面对难以处理的局面：李明宣称，每一次她来到怡保都和朋友邱音住在一起。她告诉法庭，她要传召邱音供证，因为她们一起被捕。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朋友已经被指在狱中自杀身亡。

经过三天的审讯之后，法庭作出判决。两位亚洲人陪审推事宣判她无罪。欧洲人法官宣布她有罪。汤逊法官显然受到两位陪审推事的反应所激怒，他在法庭上宣称，“作为理智的人，他们怎样会有那样的看法，我无法理解。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下令重审。”

汤逊法官下令重审虽然不寻常，但在紧急状态法令下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被告是欧洲人，要是两位陪审推事的共同意见与“有罪”的宣判抵触，有关控状通常会被撤销。法律见解的矛盾，使到原来已经引人注目的李明传奇显得更加突出。到了这个阶段，英帝国各地的报章开始刊登她的新闻。

重审在 10 天后在同一个地点进行，这回承审法官是比列特若尔（J. Pretheroe）和两位不同的陪审推事。和惯例显著不同的事出在委任第二对陪审推

事方面。在紧急状态法令下在霹雳州对一名亚洲人进行的审讯中，一名欧洲人被挑选为陪审推事，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可以理解的，李明提出反对，她用广东话向法庭通译员表达她的意见。法官问道，李明说些什么。当被告知李明反对一名欧洲人陪审推事参与审讯时，法官比列特若尔完全不考虑李明的说词，他简要的说，“告诉她，她的反对被否决。”

李明不气馁，继续表示反对。她声称，她是被控与被指杀害欧洲人的人士为伍，她担心，一名欧洲人陪审推事可能对她存有偏见。法官比列特若尔再一次不理会被告的说词，他指示通译员下令李明“闭嘴”，因为她只是在使她的案件受到损害。

现在，审讯在挤满人的法庭内进行。记者在记录审讯的要点。坐在公众席位上的一些关心案件的观察员也在做记录，其中有几位是律师。同一批证人在供证。同一批照片呈堂。基本上，辩方针对控方的理由提出和上次审讯时相同的反对理由和论点。审讯完毕后，两位陪审推事先被要求裁决。华人陪审推事陈先生认为李明无罪。欧洲人陪审推事沃尔芬登（Wolfender）坚持认为她有罪。正如所料，法官比列特若尔同意沃尔芬登的观点，宣布李明罪名成立，并判她死刑。

两次审讯的累积结果产生了司法难题，使到英国紧急状态司法的整个程序受到国际的广泛嘲笑。两位法官和一位陪审推事，全部都是欧洲人，宣布李明罪名成立。但另一方面，三位陪审推事，全部是亚洲人，都宣布她无罪。总体而言，这等于是 3 对 3 的分歧判决。只是特别为了这宗案件而出现的欧洲人陪审推事，才确保李明被判罪名成立和被判死刑。如果要体现公正，情况显然不应该如此。李明由女警员护送，在全副武装的警察监视下，坐上一辆有篷囚车被载到太平监狱，关在死囚区。太平在怡保北部，相距一小时半的车程。

在那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以便拯救漂亮的李明，使她免于被送上绞刑架。她的律师们向设在吉隆坡的联邦上诉庭上诉。上诉庭 3 位法官之一的新加坡首席法官默里－安斯利（Murray-Aynsley）批准李明上诉，理由是针对她的控状在法律上有缺陷。不过，他被两位法官同僚否决——他们是马来亚首席法官马修（Mathew）以及惠顿（Whitton）法官。第三项审讯只是使情况变得更加混乱。三次不同的审讯都导致意见分歧的判决。

李明以免于承担诉讼费用的人的身份，向设在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请愿，要求特别准许她针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她的代表律师是当时最受人尊敬

李明被护送到怡保法庭接受重审，她的表情显示出审讯对她带来的压力。十天之前，在原来的审讯中，英国裔法官嘲笑两名亚洲裔陪审推事宣判李明无罪。

的英国司法界人物之一的丁格尔福特（Dingle Foot），并由林碧颜协助（她是当时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唯一华人女性）。请愿书由波特（Porter）爵士，塔克（Tucker）爵士以及毕晓普斯通（Bishopstone）的阿斯奎思（Asquith）审理。他们在1953年2月16日（星期一）驳回请愿书。针对这类请愿书的裁决通常没有公布理由，对李明的请愿书所作的裁决也是如此。

伦敦的一家律师楼奋起维护这位受争论且被判死刑的妇女。伦敦的这批律师不收律师费，他们在聆听了辛尼华沙甘在怡保的律师楼所作的简报之后，提出由英国下议院50名著名议员签名的特别请愿书，向霹雳州苏丹提出请愿。签名的包括著名政治人物：诸如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珍妮李（Jennie Lee），汤姆德莱伯格（Tom Driberg），理察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利普顿马库斯（Marcus Lipton）等以及后来当上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与此同时，这批律师打电报给马来亚总检察长、驻吉隆坡的英国钦差大臣，以及霹雳州苏丹的私人顾问，电报列出请愿书以及签名的详情。

伦敦的这批律师采取不寻常的步骤，召开记者招待会，让公众人士注意到导致李明被判死刑的令人费解的情况。他们注意到在重审时委任陪审推事的方式："通常的情况是传召三名亚洲人陪审推事，让法官挑选其中两名。在这宗案件中，最高法院主簿官传召两名欧洲人和只有一名亚洲人，这样一来，肯定至少有一名陪审推事是欧洲人。"

在伦敦的另外一项行动中，另一位著名国会议员莱斯利普卢默（Leslie Plummer）爵士率领一支四人政治代表团去见殖民部大臣，追究李明被判有罪的合法性及要求将她的死刑减刑。

在吉隆坡，马来亚华人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会长陈祯禄也向霹雳州苏丹呈递请愿书，要求宽赦李明。鉴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殖民地主义分子决心展示强硬的反共措施，陈祯禄呈递请愿书的做法，显示他具有相当的政治勇气。他声称，在陪审推事制度下，李明没有得到公平的审讯。要是她是欧洲人，在司法小组中将会有两名欧洲人陪审推事。当然，推论是，马来亚的司法对白种人殖民地主义分子是一套，对亚洲人是另外一套。

陈祯禄也在伦敦的请愿书中提到另一个重要论点。要是李明在海峡殖民地槟城或马六甲受审，或是在殖民地新加坡受审，她将会由一名法官和一个陪审团审讯。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案件将在海峡殖民地刑事程序法典下审讯。要是陪审团达致和李明第一次受审时陪审推事相同的意见，她将立即被判无罪释放。

在2月底最后几天呈给霹雳州苏丹的两项请愿书被呈递上去之后几个小时，已经充满戏剧性的李明事件出现另一个引起轰动的转折。苏联卫星国匈牙利献议以49岁的英国商人埃德加桑德斯（Edgar Sanders）交换关在太平监狱的死囚李明。那名英国人在1949年11月以间谍罪名被捕，被匈牙利共产党政府监禁在布达佩斯。英国报章立即解读说，匈牙利的献议证明铁板一块的共产党正在采取行动。报道显示，布达佩斯、莫斯科、北京和马共全部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宗横跨两大洲的交换交易。他们说，国际共产主义很重视李明。欧洲共产主义分子第一次公开协助在亚洲的同志。

报章发现到，桑德斯的妻子威尼弗雷德（Winifred）在埃塞克斯郡的Frinton-on-Sea镇担任女招待，以养育他们夫妇的三名女儿。在夏天，她到海边经营一个小食店，以增加收入。他们查悉，在二战时期，桑德斯本人曾是英国陆军的一名上尉。他在被捕时，是在三年合同之下，到标准电器公司布达佩斯办事处担任会计员。对西方记者来说，李明被判死刑的事件，比不上一名忠实的英国家庭主妇的困境，她很努力工作才能勉强度日，而她受到不公平判刑的丈夫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受苦。据揭露，桑德斯是英国著名影星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的堂兄弟，增添了花边新闻。

英国应该接受布达佩斯的献议吗？一些人说应该。另一些人说不应该。这被视为是人道主义和不信任之间的角力。问题的核心是，这样的一项交换协议，会不会变成先例，让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政府在他们需要的任何时候开始抓无辜的人质，以便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交换安排。赞成交换的人提到美国如何使与桑德斯同时被捕的美国商人罗伯特沃格勒（Robert Vogeler）获得释放。沃格勒以从事间谍的罪名被判坐牢15年，桑德斯则被判坐牢13年。两人都承认曾充当间谍。

沃格勒在17个月后获得释放。为了使他获得自由，华盛顿同意让匈牙利重开在美国的领事馆。美国游客也获准到匈牙利旅行。尤有进者，华盛顿答应协助匈牙利取回被纳粹没收的财产。伦敦为桑德斯而尝试类似的谈判，献议交回坐落在西德的匈牙利财产。这项任务失败。如果你可以进行这样的谈判，为什么你不可以考虑布达佩斯的献议？

英国首相丘吉尔迅速作出反应。在布达佩斯公开其献议的三天之后，他在下议院发言。他咆哮说，"为了使到在匈牙利被不公平的监禁的一名英国公民获得释放，而用人命进行交换，使在马来亚的正义乖离正轨，或是对犯有死罪者

宽大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存在。”他说，“女皇陛下的政府将继续竭尽所能，促使匈牙利政府释放桑德斯。我们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最深切的同情。”

一个星期之后，在世界的另一边，太平监狱狱长伯顿（W.J.Burton）把李明传召到他的办公室，通知她霹雳州苏丹已经把她的死刑减轻为终身监禁。伯顿后来披露，他把这项好消息传达给李明时，李明“完全没有作出情绪激动的反应”。

在1953年年底，桑德斯受到匈牙利政府宽赦和释放，返回英国。令人惊奇的是，他避开大有前途的国际商业世界，在克拉克顿滨海渡假市场担任游客巴士司机，周薪12英镑。在回国三年之后，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焦点这么多年之后，我真正享受驾驶巴士。无论如何，我必须自食其力。市场似乎不需要50岁的商人；即使对一位曾经成为国际事件焦点的人物来说也是如此。”谈到他被判死刑是否罪有应得，桑德斯自动说，“我从来不是受薪间谍。但我肯定有把情报传给英国驻布达佩斯军事参赞。”

不论是否有受薪，桑德斯毫无疑问是一名间谍。

* * * * *

在以后11年，完全没有李明的消息。在1964年，马来亚政府静悄悄的宣布，她已经获得释放，并被流放到中国。在离境之前，李明要求辛尼华沙甘买一辆针车、两辆脚车和一些衣服给她。辛尼华沙甘满足了她的要求。这时李明已经36岁，她保证要和他保持书信来往。几年之后，辛尼华沙甘去世，一直到死，从来没有收到李明的来信。我认为，这不是由于李明没有感恩之心。相反的，那是由于在那个时候，马来亚方面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的结果。

李明曾经是可怕的东西方斗争的人质，直到今天，她仍然是谜一样的人物。她是否犯有携带手榴弹的罪？她曾经是马共党员吗？她坚决否认拥有武器的指控，而且不曾改口。她一贯否认她是共产党中坚分子李明。她一直坚持说她的名字是李天娣，而她被驱逐到中国时，的确是使用这个名字。她仍然坚持说，她是被9名前共产党游击队员陷害，他们为了争取当局减轻罪名而陷害她。她喜欢称他们为“死投降鬼”。尤有进者，她坚持否认她是呈堂照片中的那名女性。她说，那是认错了。

我不知道李明是否如所指控者犯有携带手榴弹的罪名。不过，我的确知道，李天娣肯定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李明。在1950－52年间，当我致力于巩固我在怡保的“公开的”交通员活动时，我要求当时的霹雳州书记替我找一位适当的交通员组长。一旦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替代组织受到破坏而被我派往中国的银芬。州书记很快就委任了李明，过后我被告知，她已经开始工作。

根据我的想法，李明一向缺乏警惕。她的行事作风是粗心大意。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这一点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当时她替地位和我一样的一位霹雳州州委工作。她肯定专心致志、活跃且勇敢。但我记得当时我感到庆幸，因为她不是替我工作。当她被调到我个人的交通员网络时，我自然感到担心。

回顾过去，我应该清楚表明，李明在一个时候只能担任一项特定的任务。她应该是中央委员会指挥下的交通员，或是在州委会指示下局限于游击队活动。没有明确的指示，使到李明开始把交通员的工作和她的游击队任务混淆起来。

革命的交通员和一切优秀的秘密工作人员或情报人员一样，必须能够独立运作。他们绝不能使他们为党的各种不同活动重叠。简言之，他们必须很技巧的把他们的生活分隔开来。否则的话，如果他们的部分工作暴露了，他们的其他秘密活动迟早也会被侦察出来。

李明在不久之后就把她作为交通员的工作和她在州委员会的任务混淆起来。她吩咐在我个人网络之内的她属下其中一位交通员去执行与党的其他事物有关的任务。政治部警察发现了执行第二项任务的属下交通员，通过那名女交通员追查到李明；她当时住在拉乞路的那间屋子。

李明事件的国际反响对马共的日常运作影响不大。我们通过日报和电台新闻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基于安全理由，我们避免和她的律师们联络，而且肯定没有替她付律师费。如果我们在宣传中评论对她的审讯，等于置她于死地。通常我们不相信英国的说法，说我们和涉及布达佩斯、莫斯科和北京的国际阴谋有关。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头脑正常的人，会认真的散播这种毫无根据的消息。更令人困惑的是，几乎所有英国报章都掉入这个陷阱。

我很高兴的记录李明的故事光明的一面。她抵达中国后，和她想念已久的妈妈团聚。老人家的晚年由她照顾。

李明也找到爱情。她可能迟婚，但她很幸运，和一位女人可以厮守终身的好男人结婚。她的丈夫是陈田，我的能干同志和挚友。她现在是寡妇，还是住在

我忠实的朋友和同志陈田。他后来成为李明的丈夫。

中国。我敢肯定，她对拉乞路和太平牢房的记忆已经被埋在深处，被对母亲与丈夫的回忆盖过。他们和她对生命的价值和正义有相同的看法。

作为李明传奇的补充说明，我个人要记录在案，表达我对那些英国从政者、律师和在欧洲与亚洲的有关人士的感激，他们认识到在紧急状态时期的殖民地法律程序的不公正和救了我的交通员的性命。也必须感激当时的霹雳州苏丹以及陈祯禄所持的人道立场；在那个历史阶段，只有勇气过人的人才准备挑战制度。

“在我的政治局同志认同下，我以吴兴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这是我的本意，要让所有人看到马共决心为武装冲突寻求一个我们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作为对东姑大赦的反应，我们把1955年5月的信交给吉隆坡当局，非常清楚的表明我党愿意以谈判结束战斗。我们相信时间的选择是正确的。选举的日期已公布，立法议会订于6月2日解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和平主动是紧接在万隆会议之后作出的。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国际间的流行语了。”

第二十一章
最初的和平建议

马共政治局设计了一套防备性的权力转移措施，以应付紧急情况。它可以在马来半岛党的联络系统万一瘫痪时，或如果杨果和我在战斗中双双阵亡时启用。有关措施即是授权小章，让他在北京以马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正式声明。没想到，这指示后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作出了上述安排的仅仅几个月后，我们在整个马来亚的联络系统真的垮下来了。我设在彭亨西部总部，与杨果在雪兰莪加影地区的据点之间的主要交通网，被英国军部和政治部的联合行动所摧毁了。与此同时，其他联系我和其他马共游击队的交通系统也被敌人切断了。

对身处中国首都的那位孤立的小章来说，我准备的措施启动准则中所设想的危机终于发生了。自然的，他觉得必须挺身而出。自1953年初来到北京后，他已经累积了不少与极高层人士打交道的经验，不仅是对中国领袖，对苏联人也是那样。小章曾经去过莫斯科，在那里与克里姆林宫的高官们周旋过一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他可以轻易而且经常接触中共的决策高层。虽说有这些接触，我必须强调，直到此时，马共不曾如英国宣传机构和报章所宣称的那样，接受过来自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直接援助，不论是财务上的或其他形式的。

在他所苦心经营的国际联系中，小章可以对马共所进行的武装革命及它与世界共产主义大蓝图的关系进行特别的策略性研究。当他和阿海正埋头于研究时，他们忽然发现和我总部，以及杨果基地的联系都断了。这种无音讯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恰巧的是，刚好这个时候，来自英帝国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团正准备集结于伦敦，参加一项将在 1954 年初举行的重要会议。马共原本预定在集会中提出一份立场声明。

随着杨果和我两人都联络不上了，小章和他的伙伴便着手起草有关的文件。可以预料的，由于一向来接受了不少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意见，他们所拟定的文件就不免受到那两方面的影响。不过我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友好的意见而已，并不是命令。

两位身在北京的同志所写的文件，对马来亚的形势作了评估，并且进一步暗示，党或许已做好准备，考虑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那样，它就成了在紧急状态以来，涉及的任何一方所提出的和平谈判的第一个建议了。

那份立场声明最终由我们驻英国的代表林丰美提呈伦敦大会。林是新闻工作者，他当时在伦敦也是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的发言人。不可思议吧，林代表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编辑那份油印《马来亚箴言报》（The Malaya Monitor），可他一直只是党的同情者，不曾是党员。英国的政治分析家和报纸很快就从那份文件中得出结论，都将它理解为马共建议与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那时候我刚刚抵达勿洞。当那份文件在伦敦会议上宣读时，我尚不曾见过它。过去，我们一直主张建立一个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现在我们的说法变成了要和各方面共同奋斗，争取国家独立。党的政治纲领中所强调的共产党的领导角色被遗弃了。我们呼吁终止紧急状态并取消紧急法令的各项条文。我们提到人权问题，不过没有具体建议如何去达致目标。这份文件予人一种印象，马共正寻求新策略，以争取国家独立，而不再依靠武装斗争了。因此，1954 年在伦敦的立场声明预示了一个显著的斗争方向的改变。

不过在这改弦易辙的背后，事实上是有它诡谲的地方。有关文件当然是在北京以华文书写的，然后才译成英文再送去伦敦。在伦敦发表后那个英文版本又再译回华文方便马来亚的马共领袖阅读。我们和小章、阿海的联系还处于中断的状况。那份译来译去的文件最初是落在杨果的森林基地。这个时候杨果和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一种断断续续的联系了，不过有关的交通系统还是很新而且不确定。经过相当艰难，杨果终于把文件传达到在勿洞我的手里。在同时附上的一封长信中，他说他注意到党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政策。显然的，直到那个时候，身为马共党内职位最高的两个干部，我们都未能对那样根

本性的策略改变有任何发言权。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要面对事实了，必须尽快策划以妥善履行党的新方针。

在信中杨果还建议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与武装斗争分开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不论是公开的或隐秘的都不能听命于武装斗争；而且它应该集中在主要市镇活动，而不是乡村地区—在那里我们将继续鼓吹武装斗争。

在我们能够进一步交换看法之前，我们之间的联系又中断了。不过杨果知道我们都一致支持他的建议，所以他过后就着手创立他所设想的那个群众组织。它所致力的目标主要是把城市群众对武装斗争的支持引领到对最新和解方案的支持。

伦敦会议过后不久，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也拿到了那份马共文件。而他也像所有人那样，认定我们已经改变了政治目标。他决定亲身介入以促成一项和平谈判。这些发展刚好和当时的大时代要求切合。两项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而其所许诺的即使不是世界和平，至少也是和平共处。第一项是涉及有关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谈。它在 1954 年 5 月至 7 月间举行，并且达致协议以结束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斗争。其后则是，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它的主题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对马共来说，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马来亚可能很快就要举行大选，以促成一个由殖民者牢牢控制，半民选的联合邦形式的政府。

察觉到国内外政治气氛的改变，陈祯禄宣布他准备走进森林，和我来个面对面的初步会谈。不幸的是，在这个信息出现的时候，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因此，陈祯禄的提议被延误了。如果当时确知马华会长的这个建议，我们会立即表示欢迎他到森林里来，或到任何地方来见我们，只要他能确保我们的安全。对马共来说，那将是绝佳的宣传机会。如果英国人阻止的话，那就更好。

如同所发生的，英国政府非常迅速且非常激烈的反对马华会长的想法。它的理由是，要在陈祯禄所提议的会谈中保证参与者的安全，那是办不到的。尽管满怀好意，那个念头就这样消失了，而这，恰恰就是英国人想要的。他们认定在马来亚维持一个受到控制的共产主义威胁，是有显著的好处的。因为紧急状态的继续存在，那么伦敦当局就可以对外宣称，它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的驻军，是理所当然的。对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英国人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他们在那边是“保护，而不是重新征服殖民地人民”，如蒙巴顿在八年之前所说

的那样。

回到勿洞我们的基地，李安东、阿仲和我花了很多时间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了加诸我们身上的那个新的政治立场。它对我们整体斗争的意义是什么？从所有接到的解读，一点非常清楚的是，不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都认为，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再拖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已经代我们判定了，马共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紧急状态实施以来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

我巴巴儿的等待希望与杨果重新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系。密集的英军巡逻使我们无法建立联系。正当我在等待的时候，马来亚的政府形势也在瞬息万变中。原本局限的吉隆坡密室里静悄悄进行的有关联邦选举的商谈，现在在外面越来越多人公开讨论着了。本土的政治领袖大多主张设定时限，由于担心喧嚷持续下去，英国人开始摆出了抗拒的态度。他们担心马来人主导的政党会过早取得政权。殖民地官员宁可让马来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独立。他们所认可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马来亚必须有能力建立一个非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构架。在我的意识中，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英国人相当相信种族分裂将会持续下去，因此某种形式的殖民统治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还是必须维持下去。

我们在勿洞总部所进行的广泛检讨开始把焦点放在马来亚的急速演变的政治趋势，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影响它使之对我们有利。自从我们预先策划的从公开政治退出以展开武装斗争让 1948 年 6 月 16 日的紧急状态占了先机之后，政坛情景已大不相同了。巫统已经从 1946 年反对马来亚邦联计划的 41 个马来团体的乌合组织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它的创办人拿督翁惹化已经在 1951 年 8 月离开了，并另行组织一个对立的非种族性运动，叫做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IMP）。通过这个组织，他许诺在 1958 年为马来亚赢得独立。经过一场龙争虎斗，巫统领导层真空，结果是由具有魅力风采的东姑阿都拉曼填补。不过他也只是以一票之差压倒激进民族主义者慕斯达化胡先。东姑那时候是 51 岁，是吉打州苏丹的御弟。他是在颇为勉强的情况下参政的，最终获得巫统上下的支持，他的法宝就是摒弃拿督翁所宣扬的非种族性主张，而采取一种狂热的马来民族主义路线，公开宣称将在马来亚建立马来国。

不过东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很快就意识到英国人的用心：马来亚多快走向独立是和本土政治人物多快达致种族包容挂钩的。所以，他同意与陈祯禄的马华公会结盟，参加 1952 年 2 月的吉隆坡市政局选举。选举结果是巫统一马

华阵营在竞选的 12 席中赢得了 9 席，可谓大捷。巫统一马华过后于 1953 年初正式成为联盟政党。那年 4 月，这时候的东姑对于支持者的委托已经胸有成竹，开始公开鼓吹非种族政治。这代表了 180 度的大转弯。因为仅仅两年之前，他还在努力不懈的推销他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

如预期的，一个由政府委托，包涵各政党的委员会很快就成立起来，以研究进行联邦选举的条件问题。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很多是从马来亚独立党的支持者中选出来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政治局的看法是，英国人更喜欢拿督翁而不是东姑，因为那个独立党党魁长久以来即显露出他比东姑更可以接受英国人拖延让马来亚独立的做法。

在各政党委员会里冗长的辩论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出独立党和联盟集团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巨大的。独立党代表主张设立一个 92 人的联邦会议，其中少数，即 44 人是选举出来的；另一方面，联盟成员则建议一个 100 人的议会，其中多数，即 60 人是选举出来的。使英国人最头痛的是，联盟坚持选举必须在 1954 年 11 月之前举行一这就是说只有九个月的时间去完成它。

掌握了群众的支持，联盟试图加快争取独立的步伐。它委派了一个以东姑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前往伦敦。它负有两个使命：第一就是说服英国在野工党支持联盟所持有的整体立场，包括有关独立的时限及立法议会多数选举等。第二就是要在英国正式公布有关马来亚独立协议之前会见殖民部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以便进行面对面的争取。不过，如果东姑以为他所卷起的势头可以叫英国人退缩，他就太过低估了对方玩弄幕后操纵的手段了。1954 年 4 月 27 日，当联盟代表还在忙着会见维斯敏斯特的国会议员的时候，殖民部发表了一份有关邓普勒与马来苏丹之间就选举问题所达致的协议白皮书。它显示马来统治者已经一致赞同英国政府所提议的一个 98 人组成的立法议会，其中 52 人是选举出来的，而剩余的 46 人是委任的。通过发表白皮书之举动，英国人是要表明所有主要问题已经解决，特别是已经通过统治者那一关，因此再争议下去就不符礼仪了。事实上，这也就是联盟代表最终会见利特尔顿的时候被告知的话。

东姑回到马来亚之后曾恫言要让联盟党员从所有联邦及州机构包括各州委员会集体辞职，除非英国政府答应将建议中联邦议会的选举席位增至五分之三多数。不过联盟和英国人的这一对峙并没有影响邓普勒预定回家的行程。6 月 1 日，他的副手唐纳麦吉利夫雷爵士（Sir Donald MacGillivray）正式升任钦差大臣。

2146A

SECRET

INWARD SAVING TELEGRAM

FROM SINGAPORE TO FOREIGN OFFICE

Dep. Sec.
Sec. B
G. Ils.
S. I C.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South East Asia)

167

By Bag

FOREIGN OFFICE SECRET AND WHITEHALL SECRET DISTRIBUTION

Mr. MacDonald

No. 8 Saving

March 23, 1954 R. March 27, 1954.

SECRET

Addressed to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 8 Saving of March 23.

Repeated for information Saving to Washington Paris Peking Moscow.

GENEVA CONFERENCE AND MALAYA

At the High Commissioner's invitation Dudley has visited Kuala Lumpur to discuss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of any mention of Malaya being made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hich I endorse, were reached.

(a) It would be greatly to our disadvantage if the subject of Malaya was discussed or even raised, since this could easily be misinterpreted a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Malayan Communists constituted a real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revolt against a Colonial régime rather than a Communist conspiracy of alien inspiration. It would therefore be best to refuse all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b) If it proves impossible to prevent the Communists raising the subject in such a way that attention has to be paid to their statements, the objective should be to turn the tables on them by saying that their insistence is evidence that they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Communist terrorism in Malaya. The United Kingdom Delegation should affirm that the Malayan insurgents are primarily an alien force acting under alien instructions. It should be made plain that no one can be allowed to depict the Malayan war as a spontaneous Nationalist uprising.

Singapore (Commissioner General) telegram No. 8 Saving to Foreign Office

- 2 -

(c) It is obviously undesirable to prejudice the case on Indo-China by making any unnecessary admissions about the indigenous character of Ho Chi Minh's rebellion, and it is important to lay as much stress as possible on its alien inspiration and support. Nevertheless any comparison between Vietminh and the Malayan terrorists is likely to be disadvantageous from the Malayan point of view, since undoubtedly there is an opinion in many countries that Ho is a true patriot.

(d) If, though this seems extremely unlikely, the Communists were to put out feelers for an end to the shooting war in Malaya, it still seems undesirable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itself, much as it would be to our advantage to bring the war to an en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only answer we could give would be to refer to our existing Surrender Policy. If specific proposals for surrender should be put forward we should show willingness to examine them, especially if they involved repatriation to China. There might, perhaps, be an opportunity to steer any suggestions the Communists might have to make round to repatriation.

目前已经销密的文件显示，英国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之前，曾极度担心有关会议会触及马来亚问题，因而严重损害到英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影响到在马来亚继续实施紧急法令。

这里复制的文件㉗是驻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于日内瓦会议前写给伦敦外交部的意见书。它建议，英国无论如何都必须坚持那毫无根据的立场，即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源自外国阴谋，因此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

邓普勒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宣称紧急状态“已受控制”，但也承认仍有顽固的游击队隐藏在深山据点活动，而他无法消灭这些活动。对马共而言，我们更有兴趣的是，他完全无法向那些记者作出任何保证，什么时候那些手持机关枪作战的游击队将会被击败。换言之，紧急状态可以受到控制，什么时候结束则不可知。任何对森林游击战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它可以是没完没了的。

尽管有着联盟的对立态度和邓普勒所说的游击队问题，英国人还是相信紧急状态已经受到充分的控制，以至于马来亚的殖民地事务的责任可以放心地交回文官手里了。之前由邓普勒兼任的钦差大臣和军事指挥官两职，现在分开来了。后者的空缺由杰弗里波恩爵士中将（Lt. General Sir Geoffrey Bourne）填补。

在麦吉利夫雷掌权之后的两个星期，联盟果然将它的恫吓付诸行动，实行抵制所有政府机关活动。英国人再以其熟练的政治花招应付，这次且趁机炫示其殖民主子的礼仪与威风。在7月2日那天傍晚，麦吉利夫雷把东姑等三人请上他停靠在新加坡三巴旺海军基地的皇家驱逐舰警觉号（HMS Alert）。在船长室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商谈后，双方终于达致妥协方案。原本由钦差大臣个人全权委派的那七名联邦立法议会成员，现在虽然仍由钦差大臣委任，不过其中五人的委任状必须与多数党的代表商议之后才能发出；另两人一代表经济事务和国防的委任权则保持不变，仍属于钦差大臣专有的特权。五天之后，联盟领袖取消了他们的抵制活动。8月，立法议会修订了联合协议，允许大选。到了1955年3月，选举日期正式公布：投票将在1955年7月27日进行。

整个1954年，东姑所忙碌的事情，除了应付那些殖民地官员之外，就是静悄悄但是蛮有技巧的在它的主要支持力量的马来群众当中工作，设法把他们从传统的种族政治观念引导出来。在那年结束之前，他已经被巫统和马华公会两党视为当然领袖。1955年初，马来亚印度国大党（MIC）亦加入了联盟。与此同时，拿督翁已经解散了独立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非种族政党，国家党（Parti Negara）。

从我们在勿洞的总部看，英国人在这场东姑与拿督翁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显然有所偏爱。对马来半岛的政治发展作了逐件的细查之后，我益发相信殖民地政府已准备支持那个公开表现亲英的国家党党魁，让他实现它的政治抱负。拿督翁当时是掌管内政部的政府部长。在他的部门辖下有一个乡村发展局称为RISDA。在选举年的年初，政府将一大笔额外的拨款注入RISDA的户头去，诡称是为了扩建乡村计划。我们对这笔在选举年突然增加的预算保持高度怀疑，

并将之解读为政府津贴拿督翁政治议程的一项努力。

在1955年普选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将焦点放在联盟和国家党的不同纲领上面。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两党如何处理两个和我们斗争有直接关系的课题：独立和紧急状态。国家党还是附和英国人所坚持的缓期独立的主张。对于紧急状态，拿督翁和他的同僚维持一种不表态的态度。我们对此的解读是，国家党如果在选举中获胜，它将追随英国人的步伐，只是口头上许诺在将来某个时候让马来亚独立，并且继续进行森林战争，而不让和平有任何机会。

另一方面，联盟呈献给选民的则是更彻底的改变。他们许诺在上台之后的四年内达致自治和独立。至于紧急状态，联盟政纲鲜明地建议通过大赦结束战争。

我们在勿洞的审议充分的认识到马共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提出不同的方案，拿督翁和东姑还是会被选民认定为献身于国家独立的。而我们在紧急状态发生后手中所握有的王牌就是我们愿意为独立牺牲生命。这个王牌现在有被人夺去的危险。我们的前面只剩下两条路，或者是我们继续作战，并且在东姑所答应的四年期限内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赢得独立－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或者是我们设法寻求某种形式的和解方案。

我们原本是想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现在这条路是让殖民地当局从政治上切断了。事先推测在八到十年间武装斗争会有结果－我们相信，到时英国人别无选择而只好接受我们胜利的事实。预测的结果不灵验。眼前的事实是，不论大选结果如何，英国会将统治权－也就是独立，移交给一个马来人权力集团。

假设我们能够和那个即将上台的政党达致一个合理的和平方案，那么在大选后，或许我们将被逼在政治旷野上呆上五至十年。那是可以接受的。在那段时间，我们将保持低调，并且重新组织力量。过后我们将重新出发，再投入战斗－不过这次并非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合法的宪制手段－以寻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当时展望的东西。如果一切如愿以偿，我绝不会打算走回武装斗争的老路的。

在那两个主要是马来人领导的政治集团为大选忙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殖民地政府绝无意让马来亚早日获得独立。他们会设法拖延下去。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的英国人一直喜爱在人民面前玩弄所谓的“自治”的把戏。自治，在我们看来，绝不是独立，而我很肯定，在那个时期，英国人对自治的定义，

绝不会与我们对它的了解差别太大。英国人通过自治以求取得幕后控制，并且达致经济支配的目的。马来亚对他们来说，是个极有价值的收入来源。除非是受到当地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夹攻，英国是绝不会轻易放弃它对殖民统治的权力的。正当我的政治局同志埋首解读 1954 年后期－1955 年初期马来亚迅速演变的政治形势的时候，马共其实没有什么选择而只能示意支持东姑。这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主动了。因此，我就想到需要制造一个总部“发言人”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当然，拥有这个身份也就表示他不代表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讲话。这样，当事情出了差错，我们至少有个推脱的借口。我们为这个不存在的发言人安个“吴兴”的中文名字（这个假名吴兴，Wu Xing，后来又被报章转换成粤语的 Ng 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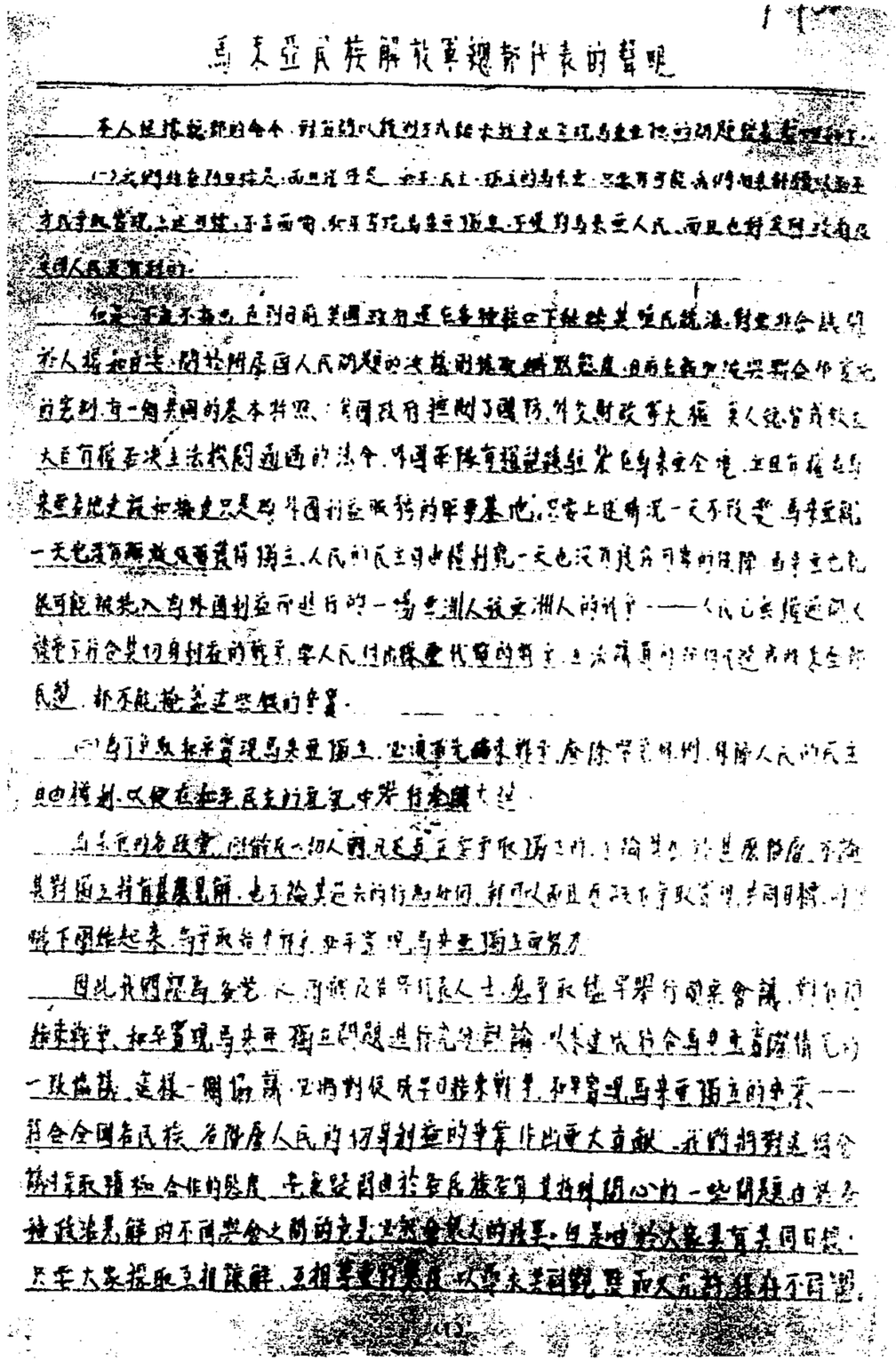
在我的政治局同志认同下，我以吴兴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这是我的本意，要让所有人看到马共决心为武装冲突寻求一个我们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作为对东姑大赦的反应，我们把 1955 年 5 月的信交给吉隆坡当局，非常清楚的表明我党愿意以谈判结束战斗。我们相信时间的选择是正确的。选举的日期已公布，立法议会订于 6 月 2 日解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和平主动是紧接在万隆会议之后作出的。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国际间的流行语了。

我们的信呼吁对和平谈判采取“公平”的立场，它建议召开一个所有政党的圆桌会议，并进一步的暗示，马共将接受大赦，不过与东姑所提议的有所不同。该联盟领袖曾表明大赦将在我们投降后进行。我们反建议，我们应该先谈判，由此商议大赦安排。我在信中写道：“尽管英国当局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它还是失败了。它没能在战场上战胜我们，因为我们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因此是不能被击败的。”

信的副本也寄给了在新加坡的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并附上要求请他把信的内容传达给当地的劳工阵线。另一个副本则寄交马来亚种植园主联合会（United Planters Association of Malaya）。

政府接到我们的信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如何处理我们的要求。钦差大臣麦吉利夫雷为此飞回伦敦请示最高当局。在他回到马来亚之后，政府很快就发表一篇声明，直截了当的拒绝了我们的和平献议。不久之后，麦吉利夫雷又上马来亚电台，对与马共谈判一事定下了几个条件。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很粗率无礼的。如果我们要谈判，我们就必须先投降。就是那么简单而已。他说，共产党人所以要和解就是因为他们被击败了。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声明

我以吴兴名义在勿洞总部起草的声明首页。

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曾怀疑过吴兴信里所显露的公然违抗的语调会受到挑战。或许我们军事上是处于劣势的。但是这只是我们和解建议的一方面问题。由于这场冲突的性质使然，解决方案绝不可能是简单或干脆的，更何况它已经拖延了7年之久。

在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后，英国人就绝口不提和谈之事了。另一方面，东姑则在群众大会中一再提起他之前所说的大赦献议，以及－如果联盟获胜－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战争的展望，由此捞到不少的政治本钱。

在7月27日的选举中，东姑的压倒性胜利震惊了英国人。实际上没有人预料到会有那样的狂胜。在52个竞选的席位中，联盟胜得51席，余下的一席归独立人士所有。拿督翁已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东姑成了惟我独尊。现在英国人再玩不成分而治之的游戏了。因为马来人只剩下一个阵营。而这个阵营即是由东姑所领导的。

可是，在涉及到与我们谈判的事情时，英国人还是设法钳制他。东姑顶住了压力，清楚表明他决心使谈判成功进行。最后，英国人的态度和缓了下来，只要求谈判是属于试探性质的。大选过后两个月，东姑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愿意见我。马来亚电台的宣布说明："(我们）不会和任何代表或任何人士举行预备会议，会谈地点将是北马一个适当的地方。一个与陈平熟悉的官员将被委任为联络官。他将准备好在一个安全的地区和陈平见面。在当地会有停火安排。"

声明继续说："他将引导陈平安全的前往会谈地点。如果陈平愿意赴会，他应该寄一封私人信给东姑，说明约定时间和日期。联络官将在那里见他，并将他带到会谈地点。所选择的约定地点不能在森林内，最好是靠近一个村落。"

我回了两封信，一封志期10月2日，寄给东姑，另一封志期10月4日，寄给大卫马绍尔。我安排我们的地下组织将两封信带到槟城寄出。我很小心地用谦恭有礼的英文草拟那两封信－这点，马绍尔也注意到了，他过后曾跟记者们提起。英国官员很快就重复殖民地政府的立场，即东姑，马绍尔和拿督陈祯禄－内定参加和谈的本地政治领袖三人组－不应与陈平直接商谈。他们在那里纯粹是为了阐释大赦的条件，而应避免触及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的课题。

虽然之前已经坚持不会有预备会议，可是结果还是不能避免。事实上，还进行了三轮之多。第一轮是于10月17日，在北霹雳靠近泰国边境一个盛产锡米的小镇仁丹举行。我对这个地点是颇满意的，因为它的2千居民一直是马共

的中坚支持者。东姑委派了他的副教育部长朱运兴，而陪同他一起来的是代警察总监威利（I. S. Wylie）。在日本统治后期，威利曾被空降到柔佛，成了136部队和我们游击队之间的协调官。复员后，他又回到马来亚，加入警察部队后即步步高升。我们都很清楚，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我们的对手是威利，而不是副教育部长。

我们在预备会议的谈判代表是陈田。我选择他是因为日据时期，他是柔佛州抗日军的领导人，因此曾经与威利共事过。更重要的是，陈田在紧急状态一开始已经加入我们的总部，因此非常了解我的政治观点。本地报章称他为马共的"宣传主任"，其实是错误的。不过我们也懒得去纠正。李安东在紧急状态开始后一直领导我们的宣传部，陈田是他的助理。

在仁丹民众会堂举行的初步会谈中，他们很快就达致一项停火安排，以便陈田能够安全往来会场。唯一棘手的问题是，英国方面拒绝我们在我和东姑的正式会谈时召开记者会。威利激烈的提出了他反对的理由，不过直至首次会议结束时，我们都没有对此达致协议。

第二轮的预备会议在整整一个月后，还是在仁丹民众会堂举行。它持续了整个周末。我写了一封信，交陈田通过朱副教育部长交给东姑。与此同时，政治局也准备了一篇声明以及一些传单，让陈田分发给前来采访的记者。倘若英国人禁止我们在正式会谈时召开记者会，我们只有另辟途径以确保自己的声音会被听到。陈田适当的执行了这个任务，结果记者们都收到了我们的声明。它的部分内容是这样的：群众期望我们双方都能以一种真诚、谅解和妥协的态度去看待和谈。如果有任何企图要利诱解放军成员投降，那只会为和谈制造一种不利的气氛，因此是违反人民意愿的。

我们要把马共的想法公诸于世的努力，结果是引来了东姑激烈的非难。11月18日，他宣布："倘若共产党人再次向报界发表声明，以此满足自己的宣传需求，就像他们昨天所做的那样，那么我将不会去见陈平或任何人。我不会去跟陈平谈判，或是以相等的身份对待他。我将会阐释大赦的问题。我会聆听他的任何建议，也会去考虑。我代表马来亚政府，我们拥有全部的资源去打击和打败共产党。我要和平，我要结束紧急状态。我怎样都要结束紧急状态，但我不要更多的流血事件，如果能够的话。"

第三，也就是最后一轮的预备会议在边境小镇高乌郊外临时飞机场的一个帐蓬里举行。这里位于仁丹西北9英里处。预备会议开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

威利在发言，朱副部长则金口难开。这是不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我无从知道。不过在第三次的会议中却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在上述谈判中途休息的时候，威利上了厕所。这时候，朱副部长突然开腔了。他说："我有个东姑的私人口讯，请你转告陈平。东姑交代，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希望陈平能够出席会议与他谈判。如果第一轮谈判未能解决问题，他将准备从伦敦回来后，继续进行谈判。"这是一个明确的口头承诺，就是这个保证使我最后落入圈套。

我个人将东姑的这个态度视为一种诚意的表示。那时候，我是这样解读东姑的献议的：他不相信，在我们首轮的谈判中会达致什么一致的看法。不过他很肯定在他从预定的一月伦敦会谈回来之后，他将能够更加独立行事。我完全没有想到马共问题在东姑的伦敦谈判时会变成重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没有想到他在那之后，对待紧急状态的计划会出现那么大的转折。

在仁丹和高乌的会议时，英方已确知我们的总部设在泰南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当然也了解到这点，不过还是觉得最好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从马来亚森林走出来的。因此，一个重要的议程自然就是我自由往来会场的权利问题。在这点上，最终决定会场应当设在吉打东部小镇华玲。在一段特定的马来亚边境区将实施停火令。陈田最初提议停火令应在和谈之前的一个星期开始，并在之后的一个星期结束。至于停火实施地区，我们要求尽可能扩大森林地段，以掩饰我们进出马来亚所将采取的路线。政府方面曾对停火地区面积过大提出反对，但我们很快的就达致折衷办法。

高乌会议也解决了我们随行警卫人员的食物配给问题。英方许诺供应这些食物，而我就指示陈田告诉威利，我将带领一支 60 人左右的游击队作为警卫。他们需要有好的食物享用。实际上我带出的警卫队不过 20 人。我们也决定了，英军不得移进有关森林边缘，而我们的队伍也不会离开森林边缘。其他协议包括：我从昆仑巴古（Gunung Paku）拉曼水力锡矿附近森林出现的时间、地点详情，以及在和谈时我们的住宿安排等。

当陈田带着东姑的私人口讯从高乌回到勿洞之后，我是极受鼓舞的。我就在那当儿，那地点决定了华玲和谈的议程必须持续下去，而且必须做到最好。

第二十二章
华玲会谈

在华玲会谈预定开始前的一个月左右，一名特派密使从小章那儿来到了我的勿洞总部。他是从中国经由陆路走了好多星期才抵达的。他身负两重任务。因为曾经在北京上过无线电技术课程，所以他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为我们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使我们可以在和谈开始之前与小章直接联络。但更重要的是，他受指示将一份文件的内容直接传达给我。这无疑是马共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共产党那儿所接收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了。这份一千字长的声明，标题为《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Joint Written Opinion of the CPSU and the CPC），是小章在莫斯科时，代表我们收下的。它的内容是那么的敏感，以至于小章决定它是不可以带在身上的。

相反的，携带者需要将整个声明的中文译本默记在心里。这就花费了好几天功夫，确定无误之后，他才动身南下，来到我们的总部。到他抵达我们的营地的时候，他对文件某些片段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整体上他是能够顺利地交货，只是在一些关键地方，他却把确实的用语给忘了。而这就对我的理解形成了障碍。

从密使的回忆，我可以确定，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要向我传达 4 点意见。第一点是马来亚没有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边界。第二点是马共的斗争未能形成一个跨种族的广泛统一阵线。第三点是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因此不可能有促成任何谈判的希望。最后一点是明确建议我们应该结束武装斗争，此后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上面。

因为事属紧急，我指示密使尽快让无线电通讯线路操作。很快地，我就可以要求小章将中苏联合意见书的全文以密码传送给我。可是他始终没有传送。他的答复令我大为惊愕，因为他只是简短的宣称有关文件的内容已经不复有效了。

我是迟至6年后到中国才从小章那儿拿到那份文件的全文。那是一份中文译文。他解释，俄文正本是他和苏共理论家米凯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讨论后写成的。后者当时也是苏联党其中一名重要的书记。直至那时我才领悟到小章在多年前突然拒绝传送文件的背后理由。在中苏分裂深化之后，密使的信息已经变成微不足道了。

* * * * *

我们计算过，从我们在靠近马来亚边境南部勿洞地区的过夜森林营地，到我们与英国官员的约会地点，需要不超过两个钟头的旅程。倘若我们要在指定的时间一隔天早上10点一抵达那个废弃的昆仑巴古锡矿场外边，我们必须在最迟8点拔营上路。在我能够对第二天所要采取的策略进行最后检讨之前，太阳已经下山了。我的两位和谈伙伴陈田和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就在一旁协助我。在森林黑幕的掩护下，我们三人轻声谈论至深夜，而我们的警卫队伍则在一旁保持警戒。如果英国人决心违背他们所作的，保证我们安全往来会谈地点的诺言，我想，这应该是最佳时刻。马上攻击，消灭掉马共的领导层。那么就没有必要和谈了。

八千英里之外，在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社论和专题作者们正在忙于为英国12月28日早报即将刊出的华玲会谈新闻，组织“背景资料”。《每日邮报》（Daily Mail）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在它的开头以夸张的手法写道：“一只老虎今天将从马来亚森林里的窝穴出来参加和平谈判。”那位作者所追踪的老虎就是陈平。“这个共产党恐怖分子的头子在过去七年多，为了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徒劳尝试，不惜让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疮痍满目。”然后他加油加醋地说：“这个人是以他的冷酷与极度的残忍而臭名昭著的。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超过两千名亚洲人包括妇孺惨遭杀害，这样的野兽般的暴行大概也只有肯尼亚的“茅茅”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

著名专栏作家占姆斯卡梅伦则采取一种较为理智的立场。他选择将英国圣诞节的最后情景和即将在华玲一间教室举行的会谈所提供的和平展望联系起来。卡梅伦的文章是以他的诗歌式的开场白闻名的，他写道：“为了暖和一下今天冻僵的景象吧－那些凋零的常青树，那些丢弃的空瓶子，那些瘦削的鸟骨头，那个空洞的亲善－这里有一个惊人的事实愿与诸君分享：不论我们怎样想，这个世界一直就像往常那样运转。”他接着说：“还有比圣诞节更难于讨好的其他东西，也一样会到尽头的。今天，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场战争的终结。或至少，它有希望会终结。”卡梅伦接着提到我，说：“……那个人，我们曾经因为他的爱国而一度封赐他，而在那之后又千方百计要杀死他；那个人今天就有可能决定是否让马来亚享有它自1941年以来就不曾享有的真正的和平。”在专栏的较后部分，他则让我领教了他平常在文章中惯使的回马枪。“陈平是一个非常人物，他令人失望的代表了人性价值经战争洗礼后的沦丧……什么时候他的个人危机会到来？什么时候他的价值观会改变？什么时候他的忠诚才会转向国内呢？如果我们了解这些，那么我们就是比我们知道的更加了解华人，或许也更加了解自己了。”

事实上，当然是没有个人危机的问题；而我的价值观也不曾改变过，但是我会全心全意的支持卡梅伦末了的断言，即如果1940－1950年代的英国人能对别的种族和别的观点有较好的了解，那么它的好处将是说不尽的。他们就有可能会像美国和荷兰等国那样，同意殖民主义是令人憎恨的，就像推动它的白人霸权主义，就像支撑它的的剥削者的贪婪。如果真是那样，或许就不会有紧急状态了。

我们在华玲会谈时即将采取的策略源自我们政治局多月来对马来亚及新加坡政治演变的详尽研究。在会谈决定举行后，我就设法去找所有手头上能够找到的有关东姑、拿督陈祯禄和大卫马绍尔个人的资料来阅读。

从这些背景资料中，我得出结论，东姑可能怀有一些反殖民的情绪。虽然他的谈吐看似直率，这个巫统领袖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他的自然爽直通常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一些公开宣布中，他清楚表明出席华玲会谈纯粹是为了向我解释大赦的条件，以及聆听我的看法。但是当他被报章和一些政治人物批评的时候，他对于将对我采取怎样的态度又发表了自相矛盾的看法。有时候我在谈判桌上是和他平起平坐的；有时候，他也会表示，我在那边只能占据一个次等的地位。至少一个场合他称呼我为老朋友，事实上是我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我推测所有这些都是经过精打细算的，以迎合选民的不同要求。

至于拿督陈，我感到舒适的是我可以解读一位华裔同胞的谋略。我当然不会因为他的特权阶级背景而担忧。事实上，我对他的政治参与的了解，可能不亚于他对本身的了解。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拿督陈在过去曾经跟我们的前战友迪克鲁兹来往密切。此外，多年来，我也一直从我们的地下网络接收到有关拿督陈作为马华领袖的定期报告。

因此，我有信心，我对东姑和拿督陈的政治观点与性格特点是蛮有把握的。我对大卫马绍尔则不太确定。当然我读过他作为新加坡首席部长所公开发表的针对各项课题的言论。我赏识他在法律方面的才华。不过我也注意到他在扮演他的角色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夸张作风。这使我有点担心。他的演戏天分或许有助于他在法庭上代表客户时的表现。它无疑对他的议员竞选演说有所裨益。我极欲知道他在和平谈判中将会把它运用到什么程度，而如果他那样做了，影响将是怎样的。

这个时候，我的总部的无线电通讯情况已稍做改善。我带了一架发射/接收机到华玲去，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受过编码译码训练的操作人员。通过勿洞—北京的直接无线电联系，小章和我共同分析了与东姑及其两位伙伴面对面会谈时，如何将马共的观点最好的表达出来。我们达致了两套基本的和平条件，这代表了我们的最高和最低要求。在决定了这两个范畴之后，我们就开始拟订我们的谈判策略。当然在现场还得由我做出即刻的决定，是应该采取这个或那个方案。

我们最高要求的核心是承认马共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我们的最高要求也为党领导层及基层寻求—在他们放下武器后—行动自由的保证。要求政府确保马共党员不会因为曾涉及马共活动而被控上法庭或被监禁在扣留营或牢房里。最后，它要求双方协议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国家获得完全独立。

与此不同的则是最低要求。它接受政府不准备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的事实，不过要求政府允许我们参与马来亚的日常政治生活。我们可以自由参加现有的任何政党，也有权利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不过它不会叫做共产党。就如我们的最高要求，我们的最低要求也为前同志们寻求行动自由的保证，这包括他们不会面对法律干扰或任何形式的扣留。而最重要的最低条件，依我们看来，当然是我们不需要向政府投降，或者是遵守任何意味着投降的规定。

在和谈之前的一个星期，巫统在吉隆坡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那个时候所有的大型会议都在甘榜巴鲁举行。大会通过了一条议决案，要求英国让马来亚

华玲会谈途中。这张照片是在我抵达昆仑巴古会面地点之后不久拍摄的。在我后面，右手边是陈田，左手边是拉昔迈丁。我的左手边只出现半个身体的殖民地代表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了——他是我们的联络官。

约翰戴维斯陪同我们一起乘搭一辆警方的“连路华”——我们上路后更换了几次交通工具才到华玲。

在1957年8月31日前独立。东姑当时刚好在场，他坚持在有关草案上加入几个字——“如果可能的话”。大家一致接受这个议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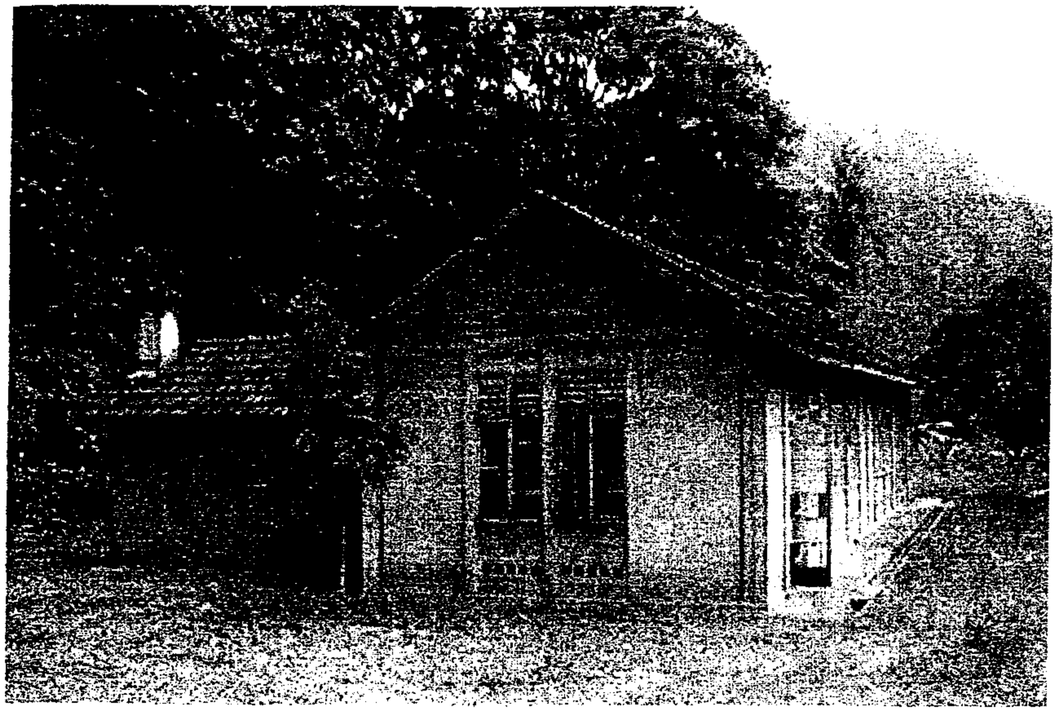
在总部的准备会议上，以及与北京的小章的无线电通话中，我们不曾有一刻相信英国人会如马来人所期望的，让马来亚在18个月内独立。当我们了解到“如果可能的话”那方面的问题之后，我们的解读是这是一个为英国人而精心策划的出路。我们始终相信她会利用这个出路来维持她的殖民统治。当陈田、拉昔迈丁和我正忙着讨论策略的时候，我从小章处收到了一份姗姗来迟的电文。他说我必须尽可能达致一项和平协议。我所受到的压力不可谓不大。那一夜我们就在我们的吊床上度过。我的伙伴们酣睡着了，我还睡不下。事实上那整晚，我的脑子一直在超时工作。

我们启程前往昆仑巴古见面地点的时间甚至还早过之前约定的早上8点钟。我让陈田先行。他带了我们在仁丹地区的联络员李进喜。他们将告诉对方我会延迟半小时抵达。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上午10点－之前不久从昆仑巴古的森林出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田才发现到接应我们的政府联络官员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老相识兼一度的盟友戴维斯。他是从他的北海岗位调过来的，原本在那里担任县长。

我就在森林边缘外的锡矿渣中间见到了戴维斯。我们已经10年不曾相见了。在我看来他一点也没变。还是一样的健康，硕壮，好像是一天都没有衰老过。穿着米色的上衣和短裤，戴维斯看到我就伸出他的手来。当我走过去握他的手时，他以广东话对我说：“好久，不见。”

从我站着的那一小片空地上，我必须承认我在瞥见这个老朋友的瞬息间的确是吃了一惊。我没有想到他会在那儿。我相信英国人是想利用我们的战时关系来取得某种优势。在少过48小时之内，我发觉到我的直觉是相当准确的。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高兴遇到他。旧记忆如潮水般涌至，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不过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礼仪要遵守。约翰L.H.戴维斯先生，我们的指定联络官，很有条理的跟我们详述为了确保我们安全往来会议地点而作出的交通及保安安排。他说我们的三人代表团，以及我们的个人警卫员和一位炊事员将会被安顿在华玲英文学校范围内的一间小砖屋，离开会议室只有少过一分钟的路程。

简单的汇报过后，我们登上了警方的连路华（英国越野车），并被载送到不远处的一间已搬空的矿场车间。在这里我初次瞥见了由于我的到来而采取的广



华玲英文学校内一间供职员住宿的小洋房，在华玲会谈期间成了陈田、拉昔迈丁和我（以及我们的炊事员和警卫员们）的住所。在拍这张照片之后，据我所知，学校方面已把这间小洋楼粉刷一新，目的是为了吸引游客。

华玲会谈就在这排教室的第一间课室里举行。戴维斯护送我们经过混凝土台阶进入椅子那一边的门口。

泛的保安措施。在矿场边缘，我注意到至少有 100 个英军，全副武装而且是准备好战斗的。他们毫无表情的站立在一排整齐排列的新搭的帐篷旁边。改搭军用卡车后，我们就沿着沙尘滚滚的矿场小道被送去一条通往华玲的主要公路。在那里又一次更换交通工具。这次是坐警用货车，浩浩荡荡的 14 辆车队，由两辆装甲巡逻车护送，直驱会议地点。

约莫是中午 12 时 30 分，我们的车队很快地驶进了学校正门，明显是要让结集在那儿的群众没有机会多看我们一眼。在几分钟之内戴维斯即引领我们去我们的住处。放眼望过去，可看到每张床上都整齐的摆着一支牙膏、一支牙刷、一块香皂和一条毛巾。戴维斯问我是否满意这样的住宿安排。我说我满意，不过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买些香烟和烟草。拉昔迈丁抽烟斗，陈田和其他人则喜欢香烟。戴维斯离去后，我们的炊事员即忙于准备一些面包和蔬菜当午餐吃。没有时间煮饭了，因为首回合的会议即将在下午 2 时 30 分开始。

戴维斯于下午 2 时 20 分正回到小洋楼。在交谈了一些打趣话后，引领我们穿过围绕住处的铁刺篱，上了一个小斜坡，直至一排课室的尽头。靠近学校的山坡，一大片热带森林已被砍平，显然是为了保安关系。警方宣布学校范围的一千方码为“保护区”，并派遣神枪手站岗，准备对任何入侵者进行射击。两名首席部长和拿督陈祯禄比我们先到。在我们步入会议室时，他们已经坐好。

两张长桌，平行摆着，都铺着白色台布，占据了会议室的主要部分。在每张桌子的外边置放了三张直背的椅子。倚靠着墙壁的则是秘书们和速记员们的位置。戴维斯示意那个是马共代表的桌子。我就居中坐下。陈田在我的左边，而拉昔迈丁就坐在我的右手边。东姑坐在另一张桌子，和我正好相对。马绍尔在他的右手边，而拿督陈则在左手边。等我们全部坐好后，立刻有人发出信号，大门被打开，涌进了一大群的本地和外国新闻记者和摄影师。足足 5 分钟之久，他们忙成一团，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按快门、瞄相机、打闪光灯、推挤、抢位，偶尔也做些记录。完全没有记者向我们发问。他们不被允许那么做。

当另一个信号出现时，所有新闻记者都被请了出去。

在正式会谈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注意两张谈判桌的中间都置放了麦克风，而麦克风的接线都有点神秘的导入隔壁房里。在我们之前的准备会议中从来没有人提起那样的设备。可是在会议一开始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是不太有建设性的，所以我只记在心里，准备在更加适当的时候才追究有关电子录音运用的问题。

东姑问我是否有意先发言。在我发表我对和平的看法之前，我需要更加清楚的了解并且聆听什么是“如果可能的话”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前独立。所以我要求东姑带头。

他的开场白是相当有节制的，可以说是相当温和的，也是很具调和精神的。他感谢我们通过出来谈判而展示我们对他的信心。他强调来华玲不是为了审判我们。相反，他是来交谈，并且向我们解释一些事情。接着，非常迅速的他就集中谈了 1955 年 7 月那个戏剧性地把他推向权力核心的选举。

他眼光直视着我说：“我们的胜利是基于我们对人民许下的一大承诺；是这个大承诺造就了我们的胜利，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选举中，或许没有其他胜利可以跟我们的相提并论。这个大承诺就是殖民主义必须终止，而这个国家必须获得自由－那就是我们所作出的承诺。”东姑接着解释，两天前刚结束的巫统大会，是怎样达致独立议案的。他重申他所以引入“如果可能的话”，是为了确保从英方到他的政府的权力转移是通畅顺利的。他辩解说，要制订一套符合这个国家要求的宪法是需要时间的。“我将在 1956 年正月 1 日前往英国，与英国政府举行圆桌会议，我相信会谈会有好的结果，我是会成功的，”他蛮有自信的说。

随着东姑再次证实他将在 4 天之后赴伦敦，我意识到对方已事先决定华玲和谈是不会占据太多时间的。最多，是两天吧。由于需要检讨的课题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双方已经连续作战长达 7 年之久了，我原本以为这样的谈判至少要持续几天的。我担心我们已被人家引诱去做一场政治表演以供国内外观众娱乐。

接着东姑谈到和平以及寻求结束紧急状态的努力。他向我保证他在竞选活动中提及这些事情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我的意见是，要实现和平的话，就必须让目前正跟政府作战的共产党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投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当他说这些话之后，会议室内的气氛像是给绷紧了几度。但是东姑还是继续发言－而这也是我们料想到的，他要把政府对付马共的合法性说出来。马共正在挑战这个土地上的合法权威－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那就是为什么要通过法律，使任何被活捉的武装共产党人可以叛国罪名处死。紧急法令条文也允许以死刑对付那些提供食物于共产党游击队而被捕获者，而任何被认为是同情谋反运动的人士都可以被长期监禁。我们其实不需要他来提醒我们这些，不过既然是他的开场白，我只得保持缄默。

他接着把话题转向最近的大赦建议。那些接受建议的人将会被宽恕。在大

赦条件下，所有人的安全将会受到保障。突然好像灵机大发似的，他加上一句，“我以生命担保这些。”这句话，我以为，是更适合于拿来在报章上做宣传的，而不是当真的。当局不会实施一个全面的停火令。保安队伍随时待命准备帮忙那些要投降的人。再者，政府坚持审查所有投降者。投降人士的行动自由在一段时间内将被限制。投降的谋反者当中，如果有愿意去中国或者任何他们的原籍国家，他们的要求将会被考虑。

大卫马绍尔接着讲话。这位律师刚刚在8个月前当上了新加坡的第一任首席部长。他的开始几句话，使到原本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讨厌无趣了。“怎么说呢，就我个人而言，”他好像是在法庭说话，分贝比东姑的强多了，“这是一场憎恨的运动，它已经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一场暴力、蛮横、罪恶的运动，它不曾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却让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影射马共是一个“外国思想”的傀儡。然后，轻蔑的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他宣布：“我们会原谅你们过去的妄想和错误，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那条路再走下去，只能导致更多人的不幸……”

感觉到马绍尔采取的立场可能使会议未开始就触礁，东姑这时候突然插话，抓住他的同伴所指的傀儡，这位马来领袖说他本身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傀儡或走狗。然后，他以一种几乎是讨好的语气向我保证：“我想说清楚，你可以随意说出你要说的话，我们不会介意。”会议至此才走上正轨。

现在轮到我发言。虽然之前发生了马绍尔的爆发，我还是觉得最好的策略是心平气和的把我们的最高要求提出来，然后才从那儿设法取得一个合理的妥协。我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如果谈判持续在建设性的水平的话，我就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马绍尔作冗长的辩论。我利用东姑的插话回应他道：“我要说的是，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你不是英国政府的代言人，不是英国政府的走狗，英国政府的傀儡，所以我们才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来见你。”间接的指向刚才马绍尔采取的立场，我强调来华玲不是要辩论思想意识问题，而是讨论和平大计。“我们也希望早日的实现和平以使人民的苦难得以减轻。”

我建议让马共成为一个合法政治实体，可以通过宪法允许的手段为改革而斗争，结果招来了东姑和马绍尔两人严厉的责备。我事先也预料到会这样，于是我提出不同版本的大赦建议所引起的混乱问题。直视着隔着两张桌子的东姑，我说：“过去东姑说过如果我们停止斗争，我们党就可以享有平等的地位，可以通过宪法允许的方法为独立而斗争。可是眼前的大赦条文根本没有包含这点。

华玲会谈开始前特地安排给新闻记者们的短暂拍照机会。这是东姑阿都拉曼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他的左手边坐着拿督陈祯禄，他的右手边是新加坡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

在华玲的马共代表团：（左至右）拉昔迈丁，我，陈田。

那是全部我想说的。如果说错了，说得失礼，我想请东姑指正。”这是一个好论点，东姑自然知道。

东姑承认在竞选演说中的确谈及平等的事，但他澄清平等地位只能自己争取。“首先你必须说服我们你是效忠于马来亚的。只是反英并不足于显示一个人是效忠于马来亚的。“他回答的还真好，那之后不久，东姑灵巧的宣布会议休会 10 分钟，两方人马就移到不同的房间用茶点。

拿督陈在首回合的会议中始终不发一言，我不知道为什么。东姑大概也觉得有点奇怪，所以第二回合一开始，就急着邀那个马华领袖参与发言。

基于讨论中课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华人有关系，拿督陈说紧急法令实施以来，最遭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华人。为这个历史性的进程注入一种明显的实利主义色彩，他补充说：“为什么浪费钱在紧急法令上面，那是毫无理由的。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是不喜欢共产党的，因为后者不曾为马来亚的繁荣作出贡献……”

我觉得拿督陈的话对进行中的谈判毫无用处，而东姑似乎也有同感。不理会那个马华领袖一出声即带出的铜臭味道，东姑把会谈方向转了过来，讨论起我在仁丹预备会议时通过陈田送交给他的那份马共宣言。他形容我们的文件“相当不错”，又说：“你们在宣言中提到基本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人权。我们也接受这些，并且正在付诸实施。”他承认马共宣言和政府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再一次东姑把会议推回正轨。

他再次提及大赦课题并且追问我的意见。我的回应是反问他效忠于马来亚是什么意思。他的阐释结果是引发了有关责任、义务以及对权力机构的态度的冗长讨论。在讨论中，这位富有的王子曾说（有点出于自卫的）：“一个人出身于哪个阶级根本是身不由己的。一个人要是生于富贵之家也是身不由己的。一个人要是在生意上交上好运并且赚了大钱也是身不由己的。但是我承认，那些生于富贵之家的人，那些在生意上赚了大钱的人，应该把他们的部分钱财拿出来，为国家福利事业作出贡献。”

当东姑用他那低沉单调的声音说话的时候，我也得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另一方最后寻求的是强迫所有下山的马共成员接受审讯并且作出政治忏悔。在他们看来，这将是最有效的方法，足以展示我们已经完全失败的事实。根据他们自己定义的效忠，政府也寻求合理化他们的驱逐法令，而我们就成为牺牲品。他们将继续作出有关“不效忠”的构成要素的官方宣布，而那些不幸

落入此定义下的人士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到中国或印度，他们认为的原籍国家去。

东姑一直说下去直到他的话被拿督陈的乏味而明显的评论打断：“一个人要住在马来亚，他就必须负起身为一个好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那过去的几分钟大概是很令马绍尔吃不消了。非常神气的，他宣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毫无结果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原本是要找出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以达致结束这场他们自己也承认已带给人民灾难的暴力。”所以我们又回去讨论大赦及相关课题。再一次东姑和马绍尔坚持马共必须解散。我提出了澳洲的例子。在那里，共产党是合法活动的。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也可以那样操作，那么我们会很乐意卸下武器。这个论点也被他们认为是不实际的。他们告诉我，澳洲的共产党不支持武装斗争。我反驳说，在过去马共的斗争对象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一个非民主政府，那个时候，人民的呼声是政府听不到的。

即刻的，我被告知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治都不一样了。

当第二回合的会谈进行到半途时，我作出这样的声明：“我们绝不会允许别人强迫我们放弃信仰，不过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愿意让人民去决定是否接受我们的信仰。”我乐意承认国家的公民是应尽义务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必须享有思想自由。

东姑总结他对我的论点的答复时这样回应：“现在，代表我自己讲话，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你们被允许参加自由选举，人民会选择我们的制度。“

我对东姑说我同意他的说法。是的，人民很可能投票反对我们。我不太担心那个。我所要他们承认的是思想与选择的自由的原则，这样基本的东西。如果华玲会谈中有那么一个时刻最可能达致某种形式的协定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但它消失得就像它浮现的那么快。会议又失去方向了。东姑离题去作了一个有关马来亚生活方式的不太吸引人的学术演说。马绍尔不时介入讲了更多高昂激烈的话。我尽量控制着不让自己陷入与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好斗的从政者作无谓的口舌之争的僵局。

在第三回合，也是最后一回合的会议即将结束，休会前 45 分钟，马绍尔看着我说：“我想已经非常清楚了，联合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都不准备承认共产党。现在，是否还有意义继续这些讨论？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请坦白回答我。”

我猜想这是马绍尔在要花招以求摆脱这个到目前为止仍是有关我们最高要求的讨论。他明显不让我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可是我需要多一些时间为最低要求的提出作准备。我决定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找上东姑，把讨论主题完全改变了。我问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事情，是不是最后还要通过英国政府的审查。东姑答说："如果我决定了，而马绍尔先生也同意，那就算数了。"马绍尔补充说："英国政府可能会不同意一些具体做法，不过关系到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就是了。"

当天第三，也就是最后一回合会议开始的时候，天色还相当亮。在休会时我已经想清楚了。除了妥协，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不过在那样做之前，我觉得迫切需要截断马绍尔的高压策略。如果他在我商议如何让步的时候也使用同样的方法的话，我们就要面对最低要求沦为毫无意义的巨大危险。我意识到东姑也被那位新加坡领袖的不断对峙态度所干扰了。于是我旧事重提。针对刚才休会前马绍尔掷向我，而我当时回避的问题，我问东姑，马绍尔所质问的是否有意义再谈下去，是不是表示已经下了最后的通牒呢？当东姑和马绍尔两人都同声否认而表示要继续谈别的事项时，我多少感到鼓舞。

接着谈时，我要他们澄清英国对马来亚独立的真正态度是怎样的。东姑证实英国人已经向立法议会保证会让马来亚独立。当我问及英国是否可能将内部保安的大权移交当选的政府时，这位联盟主席说这恰恰就是他去英国的原因。"那就是我在独立前首先要得到的。"他很肯定的说。

就在我们讨论有关殖民者以及他们的意图的当儿，我觉得是时候追究那两个麦克风的事情了。我说："我们想要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在聆听会议进展。如有此事，我想请你们也把他们邀请进来参加会议，公开的讨论问题。"我指的当然是，是否有可能有一名英国官员正在隔壁课室监督我们的谈话。

东姑向我保证绝无此事，并安排陈田去那间被发现置放录音机的前房巡视一番。我的代表回来报告说就他所见的应该是没问题。我只好道歉。"请您原谅，"我对东姑说，"但是我总觉得英国人到处在监视我。"事后我了解到，当时的确有一名值班的英国监听员在前房里。他在我们安排陈田前往视察时回避了（他可以听到我们的安排话语），而在那一阵骚动过后又回到原来的岗位。

第三回合会谈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检验政府提出的和平后对马共成员所施加的限制。东姑透露我们全部将被集中在营房里至调查工作完成。他辩称这不等于是监禁，而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以确定我们对马来亚民选政府的效忠是出

自真诚。他认为关在集中营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几个月之久。我强烈反对，理由是这违反了人的尊严，等于是让我们投降而我们根本无意那么做。我们在那里是商议和平协定，而不是投降计划。

谈到人的尊严时，马绍尔再也按捺不住了。"那里有人的尊严可言？你们在森林里忍受着疾病和几乎所有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你们失去尊严和遭受痛苦，简直是自作自受。"马绍尔从物质享受的角度为人的尊严下定义。他就是不能了解。夏虫不能语冰，多谈无益。

可是马绍尔还是不放弃。他嘲笑说："马共选择的方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回应道："我不准备跟你辩论这个问题。不过既然你一再提起它，我只得不客气的指出，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已经取得某种效果。例如，英国人现在不得不对马来亚人民作出某种让步。"

马绍尔："你真的相信是那样？"

我答道："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斗争是造成让步的唯一因素。"

马绍尔："你真的相信你们的斗争有助于这些让步？"

我说："是的。"

在那天会议结束之前，我们设法处理这个问题：在宣布和平之后，马共成员是否被允许参加任何政党，或者，与此有关的，成立一个自己的但不采纳共产主义思想的政党。那个后续政党的想法一下子就给拒绝了，正如我们预料的。将近5个小时的谈判结束时，我们只获得对方的一个让步。东姑和马绍尔两人都同意，马共成员返回社会可以参加现有的政党。这不算是什么成就，我了解。不过当我们回到住处过夜时，我并不是完全失望的。我还有好牌可打。无论如何，可以预期的，第二天的《海峡时报》报导说我看来像一个彻底沮丧的人，而我的同伴也是垂头丧气的。

事实上，那晚上我睡得很好。我的两个同伴也是那样。我们对隔天会议应用的策略检查一番之后就早早上床睡觉了。

华玲会谈最后回合开始是由东姑对当时为止的讨论结果作一总结。共产党不会受承认。马共成员不能避免被扣留和审查。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愿意协助所有选择离境到中国或印度的共产党支持者。只有那些选择留在马来亚的才会被审查。

东姑接着对我说："我意识到你在同意投降之前，必须取得尽可能好的条件，我理解那种态度。所以我想听一听你要说的话。"

我的回答是明白的。"如果订下的条件不能更改了，我是没有权力去接受它们的。"

那之后不久，我决定打出我最后一张牌。我说，目前的马新政府虽然是人民选出来的，可是还不是真正的独立的。令我诧异的，当我讲到这点是，马绍尔竟然打断我的话表示同意。我继续说："如果联合邦和新加坡的民选政府对内部保安和国家防卫事务有自我决定权的话，那么所有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的。只要这两个政府在内部保安和国家防卫事务上有自决权，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即停止战争。"

整个房间立刻充溢着乐观的气氛。那个明显受振作的东姑屈身向前问我道："这是不是一个承诺啊？当我从英国回来时，我就是要带回那些东西呀。"

我紧接着说："如是那样，我们就即刻停止我们的对抗行动，并且解散我们的武装单位。"

他们询问我在内部保安和国家防卫事务上的"自决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澄清说是"绝对的控制权"。

东姑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英国已经故意的把马新分开成为两个拥有本身独立政治架构的不同领土，那么，如果只是马来亚对自己的内部有控制权，而新加坡没有呢？

这个问题即刻激怒了马绍尔。"不要那么假设，东姑，"他带着明显不高兴的语气说。"原谅我，东姑，如果我们的政府管不了内部保安，我们不会继续执政啊。"

东姑并不准备放弃有关问题。"我必须弄清楚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在你之前去伦敦，"他对同样也是首席部长的新加坡伙伴说。然后他又转向我进一步追问道："假如联合邦控制了内部保安和国家防卫而新加坡没有，你是不是放弃斗争，还是等到两地都有了那些控制权，你才愿意放弃？"

紧接着是马绍尔和东姑之间一阵剧烈的交锋，因为他们都争着把他们各自的情况提交给我。最后我回答说："如果东姑在二月时取得内部保安事务的控制权——以及国家防卫的控制权，那么我们将即刻停止对抗行动，我们不会等待马绍尔的谈判结果。"

我还进一步的说明我的立场："我们的武装部队叫做'民族解放军'。当我们达致我们的目标时，换句话说，当这个国家已经解放了，那么这个军队的继续存在就是没有意义了。"

马绍尔："我同意。"

我于是问道："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还要经受审查？"

东姑回答道："你在放下手中的武器之前会不会要求任何的条件？"

我的反应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它的答案也很简单。如果马共受承认，如果马共成员不被扣留和审查，他们可以立即放下武器。武器的问题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这时候那个官方通译员通知会议人士他不了解我所说的"放下武器"（英文原文：throw down their arms－译按）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所使用的华语措词并不等于英语的 surrendering arms（缴枪投降）。

所有乐观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和平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从那时开始东姑与我之间的对答也变得尖锐刺骨了。有一度他径自的宣布马共是一个既得内部支持又获得境外援助的强有力的组织。"事实上，如果你们走出森林，与我们一起在同样的水平和地位活动，我们是没有能力控制你们的。因此，如果你们不是出来投降，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接受你们回来我们的社会。"

东姑接着说："如果你要让这个国家有和平，就得有一方让步－不是我们向你们让步，就是你们向我们让步。这两种思想意识－你们的和我们的－是永远不能相容的。"

我回答说："不过如果东姑的意思是，在他上台之后他害怕的是颠覆活动－就如昨天《海峡时报》社论所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现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我当然知道这是我个人在尽最后的努力以免华玲会谈陷入彻底失败的局面。我是在暗示，如果我们不会被逼去忍受投降、监禁和审问的耻辱，我们会很乐于宣誓效忠，从而也就解除了任何颠覆的威胁。

东姑迅速地排斥了我有关解决方案不会太难的说法。"对我来说，我觉得会很难，"他告诉我，他以中国的政治发展为例子－在那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被逐出大陆了。

"如果我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接受你，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和我的党也会

一样被赶出马来亚。因为我们的思想意识是那么的不同。这是很坦白的话。因此，或者是你们在某种我们认为公平的条件下让步，不然的话，这场斗争只好再继续下去——虽然那样子我会很遗憾的。”记忆中东姑还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会议的正式记录㉘没有那样记载）：马来亚是个小国，而他将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还有那么一个小岛可以去。

最后，我告诉东姑，投降所带来的耻辱是我们的同志不可能忍受的。“如果你要求我们投降，我们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当我们为那个失败的会谈作最后的处理时，东姑已经回复到他的友善和蔼的本性。他告诉我他来华玲时本来也没有抱着太高的期望。他对我说：“希望你还住得惯，而且已经得到那些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还想要什么，请在我离开之前让我知道。”

马绍尔突然插嘴说他以为我们想要一支风扇。我至今还想不通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许仍旧是对我的讥笑。

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当然也不要他的风扇。“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回去?”我问。

东姑直截了当的回答：“怎样来就怎样回。会有人护送你们的。”

第二十三章
戴维斯的献议，胜利的东姑，以及仍然满怀希望的政治局

在12月29日下午，戴维斯和我返回到在昆仑巴古的森林边缘，由于时间太迟了，我准备在当地的保安部队那儿过夜，然后在第二天天一亮就出发往北。我感到精疲力尽，而且认为不需要赶路。在仁丹协议的安排下，在华玲地区宣布的停火有效期10天。迄今为止，对于我有权利安全出入的保证，英国人仍然遵守诺言。我只能希望他们继续遵守所同意的条件。

戴维斯问我可以不可以让他留在我的临时营寨内过夜。他要和我会谈。他说，第二天当我和我的手下离开时，他将返回华玲。我当然不反对。我一向喜欢戴维斯；事实上，我欣赏他。我们可以谈过去的好日子，至少那时大家站在同一个阵线。

结果是，戴维斯的兴趣远远超过交换对战时的回忆。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在华玲会谈中）无法达致协议。我告诉他，那是因为东姑和马绍尔坚持我们必须投降。我补充说，他们是在英国人唆使之下要求我们投降。

他问道，“为什么你不能（投降)？你不能这样战斗下去，陈平，那是徒劳的。”

经过令人非常沮丧的华玲的四次会谈之后，我不打算争论。在我们交谈时，夕阳西下。我坐在一件披风上，交叉着腿。戴维斯躺在另一件披风上。在我们周围，森林的昆虫开始鸣叫。

'HE SAID HE HAD NO AUTHORITY, HE FEARED TO MAKE DECISIONS'

Marshall: I don't believe Chin Peng leads Malaya's Reds

30 DEC 1955 30-12-1955 S.T.

WHEN the Chief Minister, Mr. David Marshall, returned to Singapore last night from the talks at Baling he said he believed that Chin Peng is not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sts in Malaya.

He said he gained this impression 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Chin Peng conducted negotiations and his fear of making on-the-spot decisions.

Chin Peng, he said, did not deny that the M C P ideology was "a foreign one."

He kept on repeating that he had no mandate, no authority.

Mr Marshall, who looked tired, said he would not describe the outcome of the talks as a failure.

He said that at least the people now knew that a genuine attempt had been made to knock sense into the heads of the Reds.

We are alert

He said Tengku Abdul Rahman felt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come back in February and ask for peace talks to be reopened.

Stating that Singapore would suffer from the continuance of the Emergency, Mr Marshall added: "Let us be frank. Our Government has always been very conscious of this threat. We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alert.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if there are any fresh outbreaks of violence."

THE COMMUNISTS' LINE: PARTY BEFORE WELFARE OF PEOPLE

Describing Chin Peng as "soft" and "baby-faced," Mr Marshall said: "He looked like a chap who has been molly-coddled in his office."

Mr. Marshall added: "When I offered him some coffee, he said 'No thanks: I am not used to this heat.'"

The Chief Minister quipped: "I wondered then if Chin Peng had just come from Switzerland."

Mr Marshall said that reports of Chin Peng being ill must have arisen from the fact that he could not walk as fast as Chin Tien.

Hock Lee strike

The Chief Minister said that when he asked Chin Peng if he was in control of Singapore Communists, the reply was: "Of course; but not all who call themselves Communists are in fact so."

Chin Peng then referred to the Hock Lee bus strike last April and said: "Some leaders of that strike claimed to be Communists.

"But I say they are not true Communists. True Communists do not want chaos in that fashion."

Mr Marshall said Chin Peng was angry over the April disturbances and because people were misrepresenting the Communists.

30 DEC 1955

No answer

But at the same time, Mr. Marshall said, Chin Peng stressed that the M C P. would continue the struggle to the last man.

Mr Marshall added: "When I asked him what they were struggling for, he replied: 'We will not discuss that question'."

This is how Mr. Marshall summed up his two days with the Communists:

"To them it is to Hell with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 the Communist Party comes first. They say they cannot disb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at it will last for ever in Malaya.

"We did not seem to be able to talk the same language."

就是那么哗众取宠，马绍尔在华玲会谈结束后回返新加坡时对记者表示，他不相信陈平领导马共。《海峡时报》在 1955 年 12 月 30 日的报道（见上图）引述马绍尔说，至少人民知道（当局）真心的作出尝试，以“敲醒共产党人的脑袋”。其结语引述马绍尔说：“我们显然没有共同的语言。”最终他说对了。

我开始回答，“那是原则问题……”然后放弃。有一段长时间寂静无声。戴维斯仍然保持缄默。我再度尝试，“约翰，你肯定了解。”这个时候，夕阳的余晖从树叶的空隙中照射过来。我告诉他，“如果你有办法使太阳从西方升起，我就可以命令我的军队忍受投降的耻辱。”

戴维斯了解我的意思，便转换话题。“你瞧，你们的立场和政府的立场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距。肯定有办法突破。”我们的谈话围绕着我和东姑在谈判中所提起的课题翻来覆去。我承认，至少有两次几乎取得突破。戴维斯迅速作出反应，“让我和你一起进入森林，看看我们两人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上一次合作时取得大胜。”

我要他进一步解释。戴维斯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他说，“我带一支小规模的巡逻队来，他们带有无线电，我可以和吉隆坡联络。”

我小心思考这项建议。相信英国人会遵守停火协议是一回事。通过和像戴维斯这样的一个人在森林中举行新一轮谈判以结束紧急状态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我在 32 个小时之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直觉告诉我，他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充当联络官那么简单。现在，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英国人要背着东姑和我谈判。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戴维斯从我这里取得一些让步，他们在伦敦和东姑谈判时，可以处在更强有力的地位。

东姑无法和我达致协议，在 12 个小时之内将变成国际大新闻。它将成为英共和联邦每一家早报的头版新闻。如果在 48 小时之后，或者是在伦敦谈判之前不久，英国人本身冒险和我达致一项和平协议，对白人殖民地主义者来说是多么光荣的事。

我当时很肯定，而且直到今天还是那样肯定，戴维斯献议进入森林和我进行进一步会谈，不是一项要逮捕或是暗杀我的阴谋。我总是想戴维斯绝不会是参与像这样的事的一分子。尤有进者，戴维斯建议与我们在一起进入森林的巡逻队规模很小，只有五、六个人。我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

很明显的，戴维斯的人已经在待命，准备出发。我看得出来，戴维斯采取这种手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我的结论是，英国要继续和我进行和平谈判，利用戴维斯作为管道或是中间人—在我们穿过森林时，进行一次接一次的会谈。

我对这项献议感到不安。我告诉戴维斯，“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保证你

和你的巡逻队的安全。我们和你们的人作战已经那么久。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交谈到深夜，谈的是其他事情。这好像是日本占领时代的时光倒流。我们吃英国人的军粮，喝热咖啡；咖啡是我的警卫员在露天生火煮的。我打听在战时我共事过和帮助过的英国情报人员的下落。他问起他认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的情况。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在做些什么？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我问起的英国情报人员大部分还活着，生活过得不错。戴维斯提到的我的同志大部分在紧急状态期间死了。

这是非常友好的交谈，虽则我一直觉得，戴维斯是高傲独特的人。不过，他勇敢和充满活力；很适合担任战争期间他在马来亚所做的特别危险的工作。对他现在所做的事也很适合。

第二天早上，戴维斯再一次建议他和我一起进入森林。我再一次拒绝，他了解到，再提这件事也是徒然。相反的，他提出建立一项秘密联络系统，使到我们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必要时可以联络对方。我同意这一点，我们拟出一项在昆仑巴古地区的森林边缘设立“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的安排。我记不起细节，但我知道，双方都不曾启动过那个“信箱”。我们曾经检查过几次。

* * * * *

为什么华玲会谈会失败？毫无疑问的，好卖弄的马绍尔教条主义式的谈话使寻求解决方案倍感困难。我和东姑之间任何微小的和解希望都被马绍尔扼杀了，我觉得不断受到他抨击。看起来，他把会谈当作露天马戏团的穿插表演，我成为他任意射击的政治目标。

假设英国人没有躲在幕后，假设让东姑和我一也许再加上陈祯禄去谈，在华玲可能会取得体面的解决方案。我参加会谈，是因为我认为东姑给我的机密口讯是真正的具有良好意图的声明，而他本身也致力於达致公平的解决方案。马共愿意结束战斗，我们从来不寻求拥有特别权利。相反的，经历那么多年的战斗，那么久的匮乏、那么多的伤亡，我们寻求至少可以使我们保持尊严的和平协议。到什么时候对我们的羞辱才会结束？毫无疑问的，只要（对方）认为在政治上有用，它将会持续。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在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把共产党妖魔化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以后的年头，我注意到，由于华玲会谈失败，东姑受到抨击。最后他站出来，公开把会谈失败归咎给马绍尔。当然，马绍尔极力否认这项指控。在马共内部的讨论中，我们详细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多次，我们的地下人员问我，马绍尔是不是真的破坏了会谈。我的反应都是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如此。马绍尔破坏了会谈的气氛。

但会谈失败还有另一个根本原因。英国人决定，只有在我们无条件投降以及继续蒙受羞辱的情况下，才能够缔结和平协议。伦敦当局充分了解到，在受到东西方斗争支配的世界中，这样的一项解决方案将会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大家必须记得，华玲会谈是在西方在东北亚和东南亚都没有占到便宜的背景下进行。

对具有强烈冷战立场和坚定的帝国主义倾向的西方人而言，在 1953 年 7 月 2 日上午 10 时在板门店签署的停火协定，可能使在朝鲜半岛的炮声沉寂下来。但其结果并不如他们所预期的使共产党遭受到惨败。停火协定使用英文、朝鲜文和中文三种语文。协定的第 62 条指出，“本停火协定的条文与段落，将继续有效，一直到受到双方所同意的修正条文和增加条文或是双方在政治层面达致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的条文所取代为止。”很明显的，到今天为止，这些“双方同意的修正条文和增加条文”并没有实现。大家所期盼的政治层面的适当和平协定同样没有落实。朝鲜半岛的问题，当时处于僵局，目前仍然处于僵局。

紧接在没有结果的板门店停火协定之后而来的是，法国殖民地军队于 1954 年 5 月 7 日在奠边府遭受到可耻的失败。法军是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一天溃败。日内瓦会议是要讨论如何最佳的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以及保证柬埔寨，寮国及越南继续享有独立。在那年公布的日内瓦最后宣言－这份宣言从来没有签字，只是使越南正式沿着北纬 17 度分治，从而明确的定下一系列冷战的对立边界以及区域性政治组合。在当时的气氛下，那等于打下了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坚实基础——当年包括我在内的本地区共产党领袖都做这样的解释。

因此，由于英国一再声称（这种说法是相当错误的，但已说了那么久），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是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开始时是莫斯科式的，后来是北京式的产物，对伦敦而言，彻底战胜马共是必要的。到时英国可以在世界的权力走廊上夸耀。这样的一项结果，对于补偿英国人在 13 年前耻辱的惨败在日本侵略者手下有很大的帮助。

回顾起来，我觉得，我本身出席华玲会谈很可能导致了僵局。在那之前的惨烈战争中，在我个人周围笼罩着相当神秘的气氛。事实上，自从紧急状态开始以来，英国官员或本地官员都没有人真正见过我。事实上，即使在紧急状态于 1948 年 6 月 17 日颁布之前，也非常少人见过我，那是我在少年时代加入马共以来所遵循的地下活动方式。当然，有几位所谓的反共专家，虚假的声称他们过去认识我，才得到当局的雇用。我所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曾经见过我。

无论如何，当时陈平也许是全世界最受通缉的人物。他在英国人的通缉名单中名列榜首。他也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通缉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也受到派兵与马共作战的共和联邦国家如澳洲和纽西兰这样看待。为名不见经传的游击队员安排特赦是一回事。但如何处理像陈平那样的人物？我的公开形象，被转变成令人害怕的传奇人物，那是(英方)精心策划的宣传以及世界报章利用危机局势的自然倾向的联合结果。突然之间，这个人在华玲的一间课室内，坐在东姑、马绍尔和陈祯禄的对面。的确需要有一位态度非常客观的观察家，才能把寻求和平的陈平，与被广泛描绘为冷酷无情的恐怖分子的陈平（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区分开来。我们缺乏宣传专家，也不能接触传媒，以便驳斥敌人的这种最有效的心理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在华玲会谈中，英国人受到本身的宣传所困。这样一来，只要陈平参加华玲会谈，便不可能有和平。

在回到我们在泰南森林的总部的回程中，我很谨慎，选择了一条和我们前往会见东姑时所走的不同路线。回程是危险得多的行程，我们直接通过树胶园，要是英国人食言，我们很可能轻易成为目标。越过边界之后，我们迅速转入比较安全的森林深处的小径。入夜时分，我回到了总部。

第二天，我召开政治局会议，以检讨我们在华玲遭遇到的无可争议的挫折。我们展望东姑前往伦敦举行的会谈的可能结果，以尝试提高我们低落的士气。政治局委员们一个接着一个表明，我们并非彻底失败。无论如何，东姑保证，不论华玲会谈的结果如何，在伦敦谈判过后，会有第二轮和谈。

不过，盲目乐观是一回事，在我们等待下一次和平的机会时，掌握我们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在这次于华玲会谈之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最重要的决定，是关于今后我们应该采取的军事立场。我们研究三种选择。我们可以减少攻击的强度。我们可以提高强度。我们也可以把战争保持在当时的水平。每一种选择都是根据它对马共的长期影响——包括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来检讨。

大家对减少军事活动不感兴趣，那样做等于我们承认在华玲失败。但大家公认，如果我们要提高军事影响，必须提升到连级规模的攻击，这不能经常进行。事实上，我们甚至并不处在可以考虑这样的构想的地位。但偶尔大举进攻选择性目标、将会让吉隆坡当局知道，马共仍然是严重威胁，和谈是较佳的选择。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知道，要发动连级进攻，即使是断断续续的，最多只能在马来半岛北部的边界地区尝试。我们的马共游击队，可以从泰南的隐藏地点出动，越过边界，对政府的军事哨站、警察局和其他可能的选择性目标发动猛烈进攻。每一次进攻之后，迅速撤退，退到我们相对安全的隐藏地点－很像越共以及北越军队后来采用的战术，从在柬埔寨东部的基地发动进攻之后再退回去。

这样的一项计划肯定会增加成本，我们无疑也将面对更多的伤亡。这样一来，马来亚的紧急状态将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边界战争，值得大家猜测的是，我们可以这样做多久，直到泰国人遭受到重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要他们针对性的对付我们的活动。在那次于华玲会谈之后的重要会议中，这些问题是形成我的看法的因素。这些考虑最终使到我主张把我们的游击战活动维持在原来的水平。

出席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似乎都唯我马首是瞻，由于我的坚持，他们都没有提出本身的感受与判断。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维持现有的攻击水平，用这种方式对政府施加温和的压力，直到东姑寻求和我们重开和谈的时间到来。回顾过去，我承认我很可能支配了那次会议，这对我而言是犯了严重错误；在那个关键时刻，我在评估我们的全面情况时理应更加敏锐。

毫无疑问，马泰边界足够长，使到我们可以选择各种攻击目标。那种性质的战术倾向于打开新的机会，因为我相信，采用这样的战术肯定会带来机会。配合坚定的政治立场，显示了马共寻求和谈的真正愿望，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对东姑产生压力，使到他回到谈判桌。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失败转变成胜利，乃至恢复我们的战斗单位的全面凝聚力。我只是提出理由说明，战争可能更早结束，而大批人命可能免於死亡。

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当东姑回国时，伦敦谈判的结果比他的最高期望还要好。英国人不但答应他的每一项要求，而且给得更多。英国人显然准备让马来亚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独立。“如果可能的话”的附加语已经变得无关痛痒。

尤有进者，殖民地主义者答应东姑的要求，在他领导联盟取得国家独立时，把有关内部安全和国防的权力全部移交给他。

另一方面，马绍尔无法使新加坡按照他所要求的条件获得自治，结果他在1956年6月辞职。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他利用华玲会谈来尝试确定他的民主和反共立场。他希望他在华玲会谈的表现会使殖民地当局信服，在新加坡只有他值得信任，可以领导自治政府。在我看来，在那个时候，英国人陷入窘境。他们对马绍尔担任首席部长的能力缺乏信心。他们很可能对正在崛起的年轻的李光耀深表怀疑，他们认为，他在政治上和马共人员有联系。由于李光耀坚定的担任马共人员的辩护律师，英国人更加担心。

很明显的，东姑利用我在华玲所作的保证向英国人争取重大让步。我的保证是，一旦马来亚政府在内部安全和国防获得基本权力，我将确保我们的游击队单位放下武器。事实上，东姑利用我的保证，大有收获。我在华玲所作出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出保证：将会有第二轮和谈，在第二轮和谈中进一步讨论其他事务。

也许再一次由于政治上的天真，使到我接受了东姑的保证，认为会有非常重要的续后谈判。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我们在东姑在1956年2月从伦敦回来之后，致一封信给他。我们寻求恢复和谈。东姑的反应不是回信，而是向报章公布那封信，并且发表评论说，除非我们同意无条件投降，他无意再次和我会谈。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由于马来亚肯定将在18个月之内独立，我们的武装斗争的核心目标突然被抽离。我们在政治上无所适从，东姑公开冷落我们的信件，使到战斗不可能通过合理的谈判结束。如果紧急状态在1960年7月宣布结束之前5年，根据坚实的协议原则而结束，英国、马来亚以及新加坡是否会受益更多，要由历史去判断。对我而言，我明确的声明，我在华玲会谈中准备使冲突结束。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的前景的确暗淡。布里斯格计划是要让我们在森林内挨饿，那是一项破坏性效果很大的计划的基础。它日益使我们无法和我们的民运支持者以及供应线联络。使情况更糟的是，英国人以及较后澳洲人在深入森林的地区展开有效的巡逻。这使到我们不可能维持永久性基地营寨，使我们的情况变得更艰难的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和在南部的军事以及地下政治工作的联络网全部中断。早在1953年，我们就和在雪兰莪的杨果失去联络。事实上，从1953年起，他在独立于总部的情况下作战，直到他在1956年战

死。杨果尽管处在绝望的情况，仍然设法和我们南马区指挥官何浪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我在1951年委任何浪取代被谋杀的阿谷出任南马区的指挥官。何浪在永平地区作战。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难题，我们的军事活动持续，虽则规模较小。我们仍然可以攻击选择性目标，及按传统的游击队方式撤退，避免和敌人接触。当然，我们对华玲会谈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泄气。然而，我们肯定，我们仍然能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和伤亡，我们的游击队仍然能够维持这样的活动水平：使到英国人和东姑政府对于他们不准备和我们进行比较公平的谈判感到后悔。

虽然在那个时候，总部和马来亚各地战场的联系，以及和我们在南部的地下活动分子的联系严重受损，小章在北京的活动并非如此。他和我们在新加坡以及马来亚各人口集中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保持相当正常的联络。大部分联络工作是通过撤退到印尼的同志进行。那些同志和当地的华裔共产党员携手合作，在印尼建立秘密网络。

在华玲会谈以后我们一直都通过无线电和在北京的小章保持联络。他和我们一样抱着希望，认为国家在1957年独立之后，有机会恢复和谈。无论如何，那将只是在一年半之后的事。那和我们献身武装斗争的7年简直没有得比。直到那时之前，马共的政治立场是，英国人所给予的独立不是真正的独立。要真的独立，英国和共和联邦国家的全部军队必须撤退，它们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的军事设施必须关闭。

因此，紧急状态持续下去。

“在我们着手迁离勿洞时，两位女同志患了严重的热带热病，其中一人是我的妻子李坤华。我们的医务人员人数有限，无法精确诊断病情，而她们两人很快就成为重病号。我们把她们送到当地华人村落，在那里她们可以秘密地得到较好的医疗照顾。”

第二十四章
战略性逆转

马来亚共产党的内部消沉并没有在华玲会谈后即刻浮现。我们的游击队战士起初虽为政府的特赦条件所吸引，但看来仍准备等待 18 个月后的独立。他们仍然抱着希望，认为沉浸在国家新生喜悦气氛中的东姑阿都拉曼将会遵守诺言与我们举行和谈。

然而，几个月过去之后，我们的游击队活动迅速停滞。华玲和谈后，政治局主张仅仅维持军事现状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带有优柔寡断的味道，如今又严重打击部队的士气。

马来亚独立前夕，政治局开会制定政策声明，藉此提醒东姑阿都拉曼，无论国家独立与否，马来亚共产党仍是他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在勿洞总部展开的辩论，冗长而艰难。可以这么说，当时有两种想法，其中一派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对抗东姑阿都拉曼，并且公开批评吉隆坡和英国；另一派则主张比较低调、温和地处理此课题，并避免直接攻击这位马来人领袖。结果我们接纳了后者。我们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的独立庆典之前发表声明，这份声明刊登在北京的官方新闻社新华社。

因此，我们指望“默迪卡”（Merdeka，马来西亚语“独立”之意）给重新和谈带来新希望。我们深信，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民意皆衷心期待紧急状态正式结束。我想我们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反对英国继续驻军，否则独立就有缺陷了。我们认为在英国驻军的情况下独立，并非实质意义的独立。我们以马来语称之为“Setengah Masak”（意即“半生熟”）。这个词汇通常用来形容煮饭，半生熟

的饭是吃不下口的。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立论遭巫统领导层严厉谴责。

约莫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向少数目标发动零星攻击。不过这些零星攻击，并不是由我的总部下达命令。我们的森林通信系统已完全中断。我们使用公共邮递服务发送一些信息。

我的勿洞营区并无财政难题。我们得到暹罗南部的华人和暹罗人大力支持。不过要将援助送到边界南部时，就很棘手了。在马来亚半岛作战的各单位，如今被迫完全依赖他们活动地区内的“民运”给予支持。

我们从来都无法确定游击队的准确人数。不过，此时英国发布的数据说马来亚共产党的部队大约还有两千名核心战士。我无意争论这个数据是否正确，我想补充的是，这群游击队员当时的处境异常艰难。

我们的同志曾想过，除了投诚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固然可以解散单位，静悄悄地重返社会，到园丘或矿场之类的地方找份工作，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可是，万一被发现是一个尚未投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就难逃死刑了。

身为马来亚共产党领袖，我们察觉到自己也处于遭透了的困境。我们不能叫战士们离开部队，因为他们要脱离部队的话，首先就得投诚。不投诚，他们会被处以绞刑；投诚，就是背弃了革命事业，可谓进退维谷。当时有些例外个案，我们把他们送到苏门答腊。1957 年初，我们慎重考虑将幸存的整支游击队遣送到印尼。我们其实已开始安排一些非武装人员乘船渡越马六甲海峡，偷渡到印尼去。

独立后，我们发表正式声明，说我们要与政府会谈。东姑阿都拉曼再次断然拒绝我们的建议。政治局及党内一般干部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运动还得维持一段时间，尽管运动级别会大大降低。我就是其中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相信我们可以维持军事压力至少到 50 年代结束。不过，干部们却意兴阑珊，现在我觉察到，我们的总部与战场隔离，导致我们无法感受到前线的同志们心中真正的想法。我没觉察到游击队的士气已何其低落。

独立之后，政府制定了一项代号为“老虎行动”（Operation Harimau）的保安计划，在同一时间集中部署各种保安措施，以逐个地区地对付我们。“老虎行动”首先在霹雳南部展开，主要人员是马来地方保卫团（Malay Home Guard）。我接到报告说，政府动员了多达一万人参与这项行动。不过当时政府宣布的人数比这个数目少。

这是丹绒马林县的一个地方军团检查站。图左的告示牌以四种语文书写：司机及行人若不遵守本县地方军团的命令，有可能被开枪射击。

基本上，这些地方军团都是在森林外围地带值勤。他们没有佩带精良武器，大多数只有猎枪。不过他们的位置部署得当，而且在夜间行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在夜间溜出森林找食物。从九洞到和丰，政府军很成功地运用了这项协同战略。每当一个地方军团拦截到我们其中一支巡逻兵时，其他的地方军团便赶到现场，阻截我们撤退。对已经丧失斗志的游击队而言，这种战略非常有效。我党大批人员因遇上伏击而牺牲，另外有些人投降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食物果腹。

我党游击队真正瓦解，正是此时始于霹雳南部，起因是一名主要区委投诚。这名区委驻守美罗，长期与马来亚共产党维持忠诚关系。日治时期，他曾是我军信赖的交通员。我们成立特别保安部队保护戴维斯及他的 136 部队时，此人正是其中一名被挑选担当重任者。后来他很快成为地区领导人。日军投降时，他的军阶是排长，而他的身份也公开了。紧急状态颁布后，他重新归队，也逐步擢升为区委。若不是我们得将部队分散成小单位，他应该已是中队指挥员了。结果他却带着我们霹雳南部的整支部队超过 100 名游击队员向政府投诚。

军警即刻联手设下圈套，诱捕他及与他一同投诚的人所指认的马共领导人。我们的霹雳州委书记不慎陷入埋伏，因拒绝投降而牺牲了。整体而言，这些行动消灭了马共在霹雳南部的势力。叛变事件迅速蔓延到马来亚最南端的柔佛。这段时期堪称为“集体投诚”时期，历时两年之久。

随着霹雳南部的挫败，我们试图巩固军力，将大约 300 百名游击队员撤到霹雳中部及北部腹地。可是我们再次受阻。我下达命令指示改变策略，可是这道命令却没有传达到森林营区。政府部队截获这些文件，而且很快就部署好应对措施。自此之后，我们在霹雳的军力锐减到只求防守而已，而且似乎得不断避免和英军或政府巡逻队碰上。我们在北部这个重要据点的攻击实力从此一蹶不振。

马来亚共产党在柔佛的战斗部队瓦解，乃肇因于一个人的严重叛党行动。我们的南区司令何浪在 1958 年变节，据报道，他还同时带着 150 名游击队战士投诚，而他个人则将至少 12 万元巨款中饱私囊（这笔钱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巨款），并得到宽赦。英国政府宣称，这起特殊案例是自愿集体投诚事件之一。这完全是扭曲事实的说法。

实情是这样的：何浪和他的警卫员在 1958 年 4 月向政府投诚。由于食物短缺，他在较早时把部下分散成两、三个人一组。政治部封锁他投诚的消息，并

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游说他个别安排两场森林集会，召集部下赴会。何浪以传达我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最新指示为藉口，重新集合他的游击队员。为了记载历史实情，我谨此声明，我并没有向何浪发出任何指示。其实，自从我委派他接替阿谷出任南区司令那天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

何浪每次组织集会时，都由乔装成其警卫员的政治部官员陪同回去森林。这些集会经过刻意安排，出席者得将他们的武器聚集成堆，放在山顶的空地上，这块空地就是南区司令给他们训话的场地。就在何浪训话中途，他的“警卫员”蓦地亮出小型武器，而政府军则从森林周围窜出来，逮捕这些毫无戒心的追随者。

一连两次行动结束后，政府自豪地宣布，何浪在 1958 年 8 月 27 日率领部队集体投诚，后来也公布不同的投诚人数，介于 150 及 160 名共产党员，在这次行动中投诚。事实上，那称不上集体投诚，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名司令出卖了他的部下，设计安排部下集体被捕。东姑阿都拉曼曾透露，政府共付出 49 万 6 千元奖金；他当时这么评论说：“原则上，以何浪的所作所为，他应该被绞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成果，如果金钱可以买到紧急状态结束，我们愿意买下。”

何浪的行动范围涵盖我们整个南区司令部，即从柔佛与森美兰边界，贯穿柔佛北部与柔佛南部。何浪事件过后，我们南部的部队，仅存古来及士姑来一带区区几个小规模队伍。他们奋战到最后。其中一个单位是由一名来自笨珍的女同志领导。政府宣称她在伏击中阵亡。可是对党来说，这个说法未得证实。我们得到的报告恰恰相反，说她受了伤，且沦为阶下囚。无论她的命运如何，英国坚持说她是柔佛州最后一个女游击队领导人。

柔佛另一个硕果仅存的队伍，是由柔佛州委书记杨子清及他的妻子谢瑞生领导。谢瑞生是个槟城女生，向来活跃于我党槟城妇女组。他们领导的单位约有 10 名游击队员。他们和党的地下人员保持联系，食物供应也不成问题。就在关键性的那一天，杨子清委派他信任的警卫员外出执行为期三天的特别任务。这个警卫员不但没有执行指示，反而直接向政府投诚，还参加了政治部的训练课程。这一来自然延误了行程，令他超过了预定回到单位的时间。此时的他受到警方的指使行刺杨氏夫妇。杨子清夫妇对他起疑，要他详细解释为何迟归。这个警卫员解释至中途时，突然掏出手枪，瞄准杨子清射出致命一击。说时迟，那时快，为妻者也拿起她的手枪向叛徒开火，可惜没有命中目标，子弹从叛徒

的头上快速掠过。就在一瞬间，那个警卫员开枪击中谢瑞生，立即把她给毙了。

后来，官方报告说这对游击队夫妇在伏击中阵亡。当时我们相信了这个说法，直到杨子清单位里一名幸存的游击队员逃了出来，千里迢迢跋涉越过边界，来到泰南揭露实情。然而，这也改变不了现实，杨子清夫妇的部队被歼灭后，我们在柔佛已无任何游击队员了。

如今政府在各层次的反叛乱工作上，都表现得更有效率了。政府军事行动的效率可从令人印象深刻的杀伤率中得到证明。政府特务也渗透进游击队，在各单位里搞肮脏伎俩和心理战。我们把游击队分散成小组，大大提高了个别游击队员向政府投诚的机率。由于不再受到领导人密切监视，他们可以自由走动，因此极易成为敌人透过传单、播音飞机及谣言加以诱惑的对象。

采用了好多年、内容包罗万有的传单，如今开始产生相当戏剧性的效果。有一份传单特别设计成人身安全证件，让游击队员随身携带，这份传单特别有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制止同志们随身携带这份传单，以备紧急情况时使用。如果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这份传单，他们将会被处决。如果被捕时有携带这份传单，他们可以投诚。此外，政府以优渥奖金诱使大规模叛党。何浪设计“集体投诚”事件，说明此计划的成功。

简言之，我们在彭亨北部的游击队实力在 1955 年初遭击垮了。1956 年，彭亨南部与霹雳的联系也因殖民地政府的军事行动及政治部的破坏而受阻。我们在霹雳南部的游击队在 1958 年杪被歼灭，重蹈柔佛、森美兰及马六甲之覆辙。

到了 1958 年底，我们仅存的主力部队，只有散布在霹雳北部、吉打及玻璃市的森林营区，而且中坚队员的人数总和不超过 350 人。在彭亨有一个由大约 10 至 20 个掉队队员组成的单位。这个单位由一名州委领导，而小章的妻子是当地区委。在吉兰丹，我们曾有几个小组在偏远的营区与原住民一起工作。最后就是我们在槟城中央山林有一个 30 人的单位，这个单位自紧急状态初期就已在当地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毕竟太小了，而此时他们更是无处藏身。

我们的政治活动也在 1958 年备受打击。由于战场上的统计数字对政府有利，我们的地下政治工作人员发觉宣扬共产主义理念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他们除了得力求自保，以免被捕之外，对其他事也无能为力了。与此同时，一批政府特务也成功渗透我党政治工作人员的队伍里，这些特务定期向政治部汇报。

不寻常的是，英国的宣传专家不顾英国已在十年前承认中国的地位，仍然

SAFE CONDUCT.

THE BEARER OF THIS PASS WISHES TO SURRENDER. HE IS TO BE GIVEN GOOD TREATMENT, FOOD, CIGARETTES AND MEDICAL ATTENTION IF REQUIRED. HE IS TO BE TAKE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HE NEAREST SENIOR POLICE OFFICER.

سوريت اكون

اورڠ ڤمڬ سوراٽ اكون اين هندق مڽرهكن ديري. هندقلهاي دلاين دڠن باءيك. دبري مكانن دان روكوك سرته داوين كن جك مستڤ. هندقلهاي دباوا كڤد ڤڬاوي ڤوليس يڠ سكان يڠ دكتكهي دڠن سرتڤ اكن.

証行通

於並煙香食飲予供持寬以予應誠投欲意人有持之証此

.官警級高之近附見往帶速儘及顏照之上藥醫以予時要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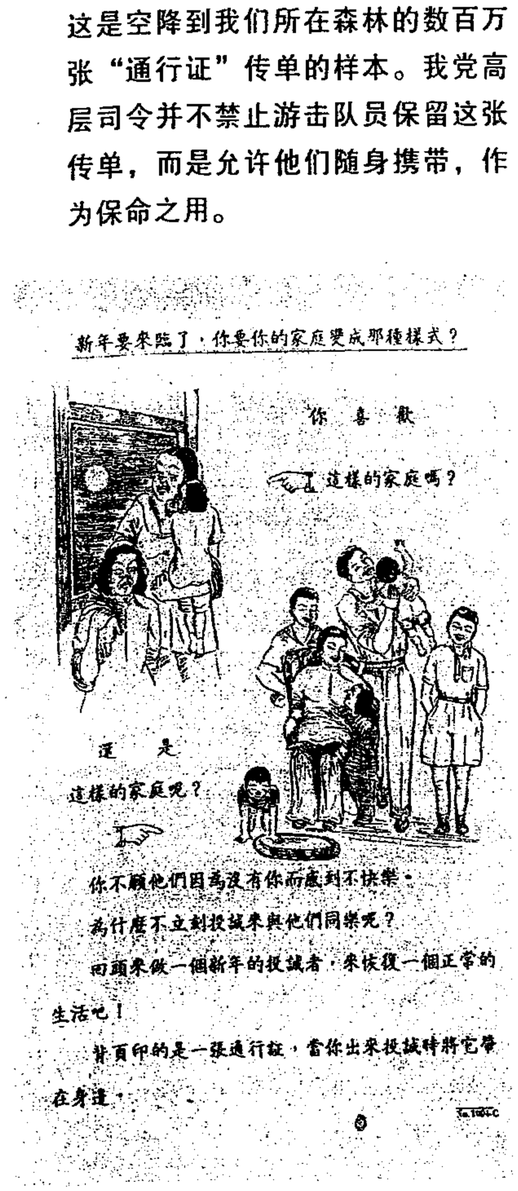
சேமச் சீட்டு

இந்த சீட்டை வைத்துள்ளவர் சரணடைய விரும்புகிறார். இவர் நல்லவிதமாக நடத்தப்படவேண்டும். இவருக்கு உணவும், சிகரெட்டும், தேவையானால் வைத்திய சிகிச்சையும் அளிக்கப்படவேண்டும். இவர் கூடிய சீக்கிரம் அருகிலுள்ள ஸீனியர் போலீஸ் அதிகாரியிடம் அழைத்துச் செல்லப்பட வேண்டும்.

HATH UTHAE KO MANCHHE KO PASS

YEO PASS BHAYE KO MANCHHE HATH UTHAUNU MANGCHHA. WUH SITA RAMRO GARI KANA BARTAO GARLA, ANI KHANA AUR CIGARETTES PANI DELA. AGAR USLE DOCTOR KO ILAZ MANG CHHA BHANI TEYO PANI BANDOBAST GARLA. AUR USLAI JATI CHHITO HUNU SAKCHHA POLICE STATION MA LAI JAULA.

这是空降到我们所在森林的数百万张“通行证”传单的样本。我党高层司令并不禁止游击队员保留这张传单，而是允许他们随身携带，作为保命之用。



积极地散播假消息，说中国共产党操纵、支持，甚至控制马来亚共产党。国内外媒体乐于抓住这个诱饵，其猖狂之程度与紧急状态颁布初期，他们推测苏联与我们勾结的情况如出一辙。没人好奇地质疑：如果马来亚共产党自 1948 年以来就直接得到莫斯科及北京在武器、配备、经费及政治方向方面的援助，为何其武装斗争竟在 10 年后仍处于如此混乱不堪的境地？

英国精心策划的宣传，把我们描绘成外国势力的傀儡，的确异常有效。这种宣传让英国得以延续其殖民统治与剥削。当它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再也无法延续下去时，这种宣传则让它光荣地撤出马来亚。这种宣传伎俩固然可在国际上为其殖民统治及为击败我军辩护，却毫无事实根据可言。这种宣传必会令人们怀疑其维持敌对关系的正当性——英国将其军事行动定义为紧急状态，虽然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

* * * * *

1958 年之前，政治局已在广泛检讨战略。若说我们有任何幸存的机会，那就是今后我们得从马来亚半岛境外的营区指挥军事行动。我后来指示彻底解散一些极易受攻击的单位，并支付遣散费给它们的队员。我们认为苏门答腊及新加坡是安顿这些同志的最佳地点。我们指示霹雳、吉打及玻璃市的 350 名游击队员分散成更小的单位，北撤跨过暹罗边界，在那里建立新营区。

遣散队员到境外的用意是将他们安顿在平民环境里，希望他们因此能与平民融合在一起而不被发现。在此紧要关头，槟城出现特殊状况。我们发现藏身岛上中央山林的大约 30 名游击队员，在未来几个月里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开政府巡逻兵。

我们确认槟城的游击队员必须撤退和分散。新加坡是重新安顿他们的首选。新加坡从来都不曾全面沦为紧急状态的战场。我们在槟城的地下人员接洽了新加坡的同志，而游击队员则乔装成学生南下。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将槟城部队的大约十个人往南迁移。到了新加坡，他们各自和家人住在当时岛上的乡村地区。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赢得 1959 年大选之前，他们住在那里相对安全。

我们成功安排剩余的槟城游击队员乘渔船偷渡到苏门答腊。我们认为这个印尼岛屿是个好地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接近这里－只隔着航程极短的马六甲海峡。此外，苏门答腊的移民厅和保安措施非常松懈。约有十个人去了棉兰，我们通过我们认为一直保持着良好工作关系的亚齐叛军安排其他人到亚齐。我必须声明的是，对方安排我们的人偷渡，并不是所谓的仗义相助。我们付了一大笔钱给这支邻国叛军，我们的人才得以登上他们往返槟城与苏门答腊之间、用来走私的船只。

到了 1959 年后期，我们在中央机关队开始接到报告，我们以为已成功在印尼定居的槟城游击队员，实际上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发现同志们抵达亚齐之后，立即被安顿在叛军囚禁他们所逮捕的人的场所。他们就这样被扣留了几个月，后来他们一个接一个逃了出来。亚齐的保安真的非常松懈。从那时起，他们再次成了逃亡者，只不过这次是在异乡逃亡。他们显然渴望回到自己的归属－马来亚、新加坡，或者我们在暹罗南部的新营区。然而，当时的条件十分恶劣，我们无法从中央机关队支援他们，真抱歉，他们只好自食其力。据我所知，有五、六个人逃到印尼，后来又成功偷渡到新加坡、在那里弄到假身份证，并在乌鲁三巴旺（Ulu Sembawang）及克兰芝（Kranji）一带务农。

那年较早前，基于保安防范的考虑，我们将总部从勿洞西区迁移到距离玻璃市边界十英哩远的森林里去。幸运的是，暹罗政府坚持英军的所有巡逻部队只能在马来亚境内活动，不能越过暹罗领土。根据曼谷与吉隆坡签订的边界协议，马来人警察和军人可以有限度进入暹罗边境地带。我们有能力应付他们。不过，我知道英国空军特勤队的一些分遣队经常潜入暹罗收集我方各营区的情报。他们成功与否，我不敢说。然而，就心理作用而言，他们所构成的威胁非常显著。

在我们着手迁离勿洞时，两位女同志患了严重的热带热病，其中一人是我的妻子李坤华。我们的医务人员人数有限，无法精确诊断病情，而她们两人很快就成为重病号。我们把她们送到当地华人村落，在那里她们可以秘密地得到较好的医疗照顾。前往我们择定作为中央机关队营区的昔罗，还有一段非常艰辛险峻的路途。没有任何女性可以熬得过。因此，我为她们安排好，一旦她们的身子挺得住，就把她们送到曼谷去。在曼谷，我们可以经由地下管道，让她们乘搭货船前往中国。在中国她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

* * * * *

我们在昔罗新营区的人数，比之前在勿洞营区的人数缩减了。如今我们只有两个分队作警卫，约有 60 名游击队员。重新安顿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我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检讨整体撤退后，我们在马来亚战场的前景。除了我之外，还有七位中委——五个华人，两个马来人，出席这场重要会议。

由于我们已经降低游击队的活动级别，探讨进一步降低活动级别的前景，并无多大意义可言。更何况，我们已在战斗中丧失大批人员，乃铁一般的事实。尽管我们仍然从“民运”中得到经费，但是这个经费来源肯定不足以应付大规模行动；而且，我们也无法解决长期存在的食物供应难题。

最终我们只得面对现实，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逐渐停止武装斗争，然后通过地下人员恢复地下政治运动。我们知道要做好长期的政治准备，也许得长达十年之久。其后，倘若政治气候适合，我们可能再拿起武器。对于眼前，我们着眼于安排可信赖及能干的游击队员重新融入马来亚及新加坡的主流社会，以便从事地下工作。

我们决定把其他人带出暹罗南部的森林营区，尝试将他们重新安顿在边界北部的市镇和乡村地带。此时，曼谷对南部各府的控制仍然松懈，因此整个地区相当自由。为这些前游击队员弄张真的身份证是易如反掌的事，我们根本不必伪造文件。我们也决定把一些游击队员派到中国去，另一些则去越南。

敲定这个重大结论后，我们便讨论调低军事姿态的作业流程。我们将再次把武器藏在森林里。简单地说，我们又回到原点了，就如日治时期伊始的情况。此时是最为沮丧的时刻。然而，我们还是自我安慰说，时间大概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猜测胡志明就要向南越发动抗争了，我们也盘算越南将成为西方强国参与的主要冲突场地。毛泽东显然正在巩固共产主义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朝鲜半岛则仍在僵持着。由艾迪（D. N. Aidit）同志领导的印尼共产党，看来也拜自负的苏加诺所领导的政权何其腐败所赐，势力大为扩张。

会议全程，人在北京的小章也通过无线电联系跟上我们的商议。事实上，他能够用这个方法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征求他的意见来解决许多问题。他的见解经常都很有价值，由于是以电码讯息传送过来，我们称之为“无线电意见交换”。我们指望小章提出一个方向。毕竟小章在北京住了这么久，而且和中国共

产党的权力阶层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试探及诠释中共最高层对我们回归政治斗争的决策有何看法。另一方面，我们八个人留在森林里 11 年了，未能掌握共产世界的逐日演变。

由于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忙着处理 1959 年的撤兵工作，不得不让我们在马来亚及新加坡的资深政治干部自力更生。他们接到党的少数指示，都是由小章自北京发出；小章还能维持收发信息的系统，尽管速度慢了些，但仍有效率。在暹罗南部的我们尽可能同时留意边界两国的政治演变。我们正确预测到，英国会竭尽所能通过打造一个扩大范围的马来亚，将新加坡、英属北婆罗洲及砂劳越也涵盖在内，以便切断它在东南亚仅存的殖民地的联系。我们认为英国走的这一步棋，是要先发制人，牵制印尼的苏加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加诺必会在英国仅存的婆罗洲殖民地展开他本身的反殖斗争。

在新加坡，1959 年是关键性的选举年。从历史观点上说，我们在新加坡的市委会是高度自治的单位。在紧急状态期间，我无法控制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行动。接二连三成立的委员会都在草创初期就遭英国指挥的警方行动所粉碎。后来我们在新加坡全岛的政治网络相继被背叛者及变节者所出卖。尽管如此，我党仍有能力从工人阶级中吸收及维持大批追随者。历史学者及自命的政治评论家经常说我党中央委员会轻视新加坡市委会，并视他们为“伪组织”，这种论点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在昔罗总部自然有观察新加坡在 1959 年 5 月举行的大选，而且非常感兴趣。我们同意我党新加坡市委的看法，即马来亚共产党应该坚决支持李光耀及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一名和李光耀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主要竞选代理是我们的正式党员，并且定时向他所属的市委会报告。我肯定李光耀没发现这名竞选代理当时已是中坚共产党员，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密切及有益的联系。我常觉得李光耀完全是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他阵营里的马共地下活动人员。这名年轻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会尽可能利用他，以及他“和魔鬼的联系”。我们也是以同样的心态对待李光耀。

我完全无法提出任何数字说明，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时，我们究竟控制了多少选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新加坡大多数工人都同情左翼工会，而这些工会的会员也充分意识到他们是在马来亚共产党控制之中。亲政府的工会已是名存实亡的组织而已。我们的支持者、同情者，以及同路人倾巢而出，支持李光耀，使他在选举中得到民间的支持。没有这些人，李光耀不可能在 5 月 30 日的

选举日赢得 51 席中的 43 席这样辉煌的成绩。

中委会检讨了新加坡大选结果，并且准确预测到狂胜后的李光耀有朝一日终会对付马来亚共产党，以巩固他的权力。我们据实向干部们传达此讯息，但是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与此同时，我们逐步结束武装斗争的安排仍在持续进行，间中解决了一项又一项的难题。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我党如此脆弱的过渡时期，我个人的保安安排。当时党意识到我必须找个便利而安全的避难地，以便继续扮演我的领导角色。由于四年前我曾在华玲公开亮相，如今我很容易就会被区域保安组织认出。

无论我们最终决定将基地设在哪个安全地带，要安排我离开森林都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中委会充分意识到我们极可能遇上英国空军特勤队或突击队率领的跨边境搜捕行动，而且他们的目标是暗杀或生擒我。的确，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将森林总部保留在暹罗南部，我们越是加速遣散工作，碰上搜捕的几率也将相应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马来亚共产党其他资深领袖也处于相似的危险中。

小章继续通过无线电参与我们的讨论，而我们也草拟好一份遣散方案。这份方案具体规划了从北京总部指挥恢复纯粹政治斗争的步骤。小章同意我们各方面的想法，但是若中国不赞成，我们什么事也办不到。于是，小章开始游说中国领导人。几个月过后，北京权力当局终于表示愿意支持我们检讨后的计划。

我、陈田及李安东因此决定前往北京。李安东是我们组织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报人，而且他早期在中文报章发表的文章令他在全马来亚各地都有追随者。他领导我们的宣传部，大家都认为把他列入第一批前往北京的名单里，十分重要。事实上，我们三人调派北京是逐步调低姿态计划的第一阶段。无论如何，动身之前，先得填补我们在暹罗南部的空缺，这是十分重要的。起初我们决定由小章取代我，出任代总书记，坐镇昔罗。他在北京住了超过六年，我们认为他较不易被认出。不过，这项安排却暂时搁置了，因为小章得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他在中国的工作。相反的，他建议委派阿海出任过渡时期的代总书记。所有人都欣然同意小章的建议，因为阿海还未曾曝光。叛党者当中，极少人见过阿海；而见过阿海的，不大可能把阿海看成是马来亚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阿海在 1960 年初抵达昔罗，时间是在我离开前的几个月。他取道陆路，途经越南及老挝南部。多年之后与老同志重逢，感觉很好。相当明显的，他的肺

痨病已完全痊愈了。正是由于肺痨病的缘故，才促使我在 1949 年初把他送到中国去。居留北京的岁月令他变得锐利多了，说起话来也非常有政治敏锐性。我向他汇报我们在前线进行的遣散措施，而他则告知我，他和小章最近在北京为配合我们所做出的工作。

他说，我们决定放弃武装斗争之后，他和小章接触了中国，提出建议说马来亚共产党在曼谷设立两项个别的商业单位，用来掩护我们的地下政治活动。一个是一般出入口贸易公司，另一个则是汽车维修中心。这两个商业单位完全是资本主义投资。通过这两盘生意，我们能够在国际间及暹罗境内调动经费，而不令人起疑。更何况，如果成功的话，这两家公司将能为我们提供定期及可靠的经费。

阿海叙述说，他们与中国洽谈此事时，是多么没有信心。他们在乎的事情，就和我向来都在乎的事情一样，就是不能对中国表现得卑躬屈节。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确定中国对于马来亚共产党要运用资本主义掩护以资助共产主义运动的构想，会有何反应。他们担心这个构想可能被看成严重抵触严格的马列学说，即共产党要依靠群众自给自足。他们不必杞人忧天。中国喜欢这个构想，而且资助了大约四百万泰铢开发整个项目。

那年结束以前，这两家公司都启业了，每家公司都有几个党员负责经营，他们伪装成暹罗公民及资本主义公司的行政人员。同样也有一群合法的暹罗公民担任行政人员，当然他们全都是暹罗共产党党员。将近六年来，我们这两家公司都有利可图。倘若不是不幸遭遇警方突袭搜捕，这两家公司应该还会继续经营下去。我们的所有共产主义企业家全遭逮捕，锒铛入狱，而且被控以好几项罪名。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而言，罪名包括以伪造的身份文件在暹罗居留。他们都被盘问了好几轮。每一次被盘问，都有一名美国官员在场记录。几个月后，暹罗警方派遣调查员到吉隆坡查阅政治部的记录。马来亚政治部则委派警官到曼谷，以便将马来亚共产党人引渡回来。不过他们未能得逞，因为被拘留的这群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并没有马来亚公民权。既然是无国籍，他们就不能被引渡。而且，被控的这些人都得服很长的刑期。

我继续留在昔罗监督最初几个阶段的裁减部队工作，而阿海对自己的新职务也驾轻就熟。与此同时，我们得和各国兄弟党的网络做好非常复杂的安排，以确保我经由陆路前往北京途中的安全。这个过程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攀爬进入老挝南部高原杂草丛生的山麓小丘。还没到半路，我们到达其中一座山顶端的空地。在那里，杂乱缠结着的枝叶之中，竟然停放着一架苏联制造的直升机。这架直升机没有武装，机上的三个俄罗斯人一机师、副机师和装卸员也都没有武装。”

第二十五章
北撤中国

我在1960年12月开始北上。就在那个月，河内执政党劳动党建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NLFSV），并且向西贡政府的乡区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攻击。北越的同志很快就会展开渗透工作，支援他们的起义。这必须通过老挝及柬埔寨才行。当然，在我带着充满未知与失望的心情上路之际，并不知道这些事态的演变。

但用不了几个月，我必会知道河内发生的变化。虽说我党经历了军事上的挫败，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斗争上面，这个消息会支撑着我走向坎坷崎岖的前路。我开始认为我们并没有输。人生总会有浮沉起落的时刻，而善于拿捏部署的人将是最后的赢家。

与我一同上路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同志陈田和他的警卫员，不过为了安全着想，他们最初取道另一条路线。

我北上的第一站，是由暹罗共产党协助我抵达曼谷。我们和暹罗的同志在日治时代开始建立联系，之后一直维持很好的工作关系，包括联合推展了好些跨边界活动。

为了掩饰身份，我戴上了墨镜，贴上假胡子和穿上陈旧的便衣。当地共产党员给我安排了一位骑电单车的向导，他们打算让我坐在电单车后座踏上整整800公里的征途到暹罗首都。他们安排我和向导在一间小屋会面，这间小屋坐落在昔罗（Sadao）北部一个小村庄附近的橡胶园路旁。陈田和他的警卫员则以车代

步，从另一条路北上。

我们约定下午 4 时出发，以确保大部分园丘工人都离开了。我们把电单车骑上一条迂回弯曲的山路，避开了附近人口稠密的合艾。抵达高头廊（Phatthalung）的首府之前，我们的电单车竟然哔剥作响，中途抛锚了，而且再也无法发动，令我懊恼不已。那时已是黄昏时刻，很快就要天黑了。费了一番唇舌及花了点钱之后，一位开嘟嘟车（电动三 / 四轮车）的车夫终于肯把我、我的向导和那辆不能发动的电单车一同载到高头廊。我已经事先被安排在这里过夜。

将近午夜时分，我们才抵达目的地，这比原定时间迟了大概四个小时。忧心忡忡的东道主看到我们安全抵达，才放下心头大石，原来他们怀疑我们中途遭到拦截了。如果真是如此，他们担心本身迟早会被逮捕。我们在一个同志的家里过夜，睡醒时，当地共产党员已经安排好替代的交通工具，那是一辆舒适的货车。我们那辆电单车，需要时间修理。以防万一，一位中层干部和他的太太也一同上路。我当时不会讲泰语，端坐在这对夫妇的中间，丈夫开车，妻子坐在另一边窗口旁的位子。万一无论什么原因被截停查问，就由他们任何一人代我回答问题。

我们当天的路程先是往西走，穿过靠近海岸的董里（Trang），然后往北到甲米（Krabi，又译高罗丕），跟着抵达普吉岛（Phuket）附近的攀牙（Phang-Nga）。过后我们再往北走，去到拉廊（Ranong）的缅甸河边界。我们在拉廊的一家小旅馆度过第二个晚上。时值除夕，人们正沉溺在欢庆之中。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庆祝的。但是，人们狂欢作乐正好对我们第二天的行程有利。我们将沿着公路到缅甸边界，再经由缅甸和暹罗的边防检查站回来。这两个边防检查站的人员当天早上都处于宿醉状态，显然无意严格检查旅游证件。我们所走的公路并不是柏油路，河溪上的小桥只是用砍下的树干铺设而成，这些树干都被捆绑在一块，以免车子的重量令它们散开。

回到暹罗边境之后，我们便往东走，去位处暹罗湾的春蓬（Chumphon），然后转北取道主干公路去曼谷。我们在 1961 年元旦夜到达曼谷。当地的同志很快将我安顿在市中心一间安全的屋子里。在那里，他们通知我可能得等上几天，才可以再启程继续我的行程。毫无疑问的，此行最危险的旅途就在前方的路途，唯有暹罗、老挝、越南及中国四地的共产党通力合作才能成行。

我得到通知，一位越南军事向导将在老挝狭长地带的市镇他曲（Thakhek）

接应我。他曲坐落在泰国东北部的湄公河边界。安排这次会合之前，得先确定一条相对安全的通道，让我从曼谷出发，越过泰国的另一边，去到他曲河对岸一个叫做那空拍侬（Nakorn Phnom）的市镇。此外，我们也得传话给盘踞他曲地带的老挝爱国阵线（Pathet Lao）共产党游击队。我取道这个内陆王国的南部高原，前往共产党掌权的北越，这一路上的保安巡逻都由老挝爱国阵线的游击队负责。抵达目的地之前，并未敲定我在北越的确实落脚地，我们在物色到适合直升机降陆的地点后，才作最后决定。我将搭乘直升机飞往越南。

陈田、他的警卫员，以及李安东在曼谷那间安全屋与我会合。我们在那里等了两个月，才把接下来复杂的旅程安排好。三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们四个人分乘两辆车子前往那空拍侬。我坐的那辆车子，由暹罗共产党特派的向导驾驶，沿着郊外的高速公路摇摇晃晃地开往呵叻（Korat），途中我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我被剧烈的胃痛折腾得要命，很快就知道我是内出血了。到了呵叻时，我们争论是否续程往乌隆（Udorn），还是折返曼谷。我们知道乌隆有一家医院，但是现在改变既定行程，将得等上更迟的时间才能重新和其他兄弟党建立合作联系，而这正是我们北上所必需的。这一延误即使不是几个月的时间，也得耗上几个星期。

考虑了这点，我选择续程前往乌隆。为了迁就我作呕和胃痛，我的司机一路上一再停车。我们在晚上大约九时到达已预订了房间的旅馆。那是当地一位同志经营的小旅馆，他看了我一眼，坚持把我送进医院，尽管要面对安全问题。我强烈反对，但是由于极度不适，我根本无力继续争论下去。当东道主向我保证说，他认识一家私人诊所，可以安全就医后，我终于屈服了。

陪同我的同志招来一辆三轮车，然后扶我上座。前往医院的路途中，我昏迷了。醒来的时候，医护人员正把我抬上担架，而我早已动弹不得。我仰视时看到其中一位暹罗同志正在哭泣。我问道："你为什么哭了？"

他答道："你晕倒了。我非常害怕。"

医生诊断我的病情时，我正发着高烧。医生研判我感染了阿米巴痢疾（amoebic dysentery），立即把我移进诊所诊治检查和观察。事到如今，看来我不得不留在医院一段日子了。既然事与愿违，我只好指示李安东继续上路，以及通知准备在我们原定路线中支援我们的各路人员，我的行程暂时耽搁了。尤其重要的是，经过细心安排的会合地点必须保持开放。陈田留下来陪我，一旦我康复后，我们两人将按照原定路线重新上路。

七天之后，虽然身子还是很虚弱，我还是决定重新上路。陈田和我，再加上一位警卫员，一同前往那空拍侬。到了那里，我们住进另一家小旅馆，逗留了几个小时，同时也联络上越南共产党人。他们在湄公河附近的一个渔村活动，村民是从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 China）战场逃来的难民。我们最终得到他们的庇护。我们坐上村民供应的渔船，横越湄公河，在河的对岸见到了被指派来护送我们的五人保安部队。这五个人都佩带苏联制造的 AK-47 冲锋步枪，其中三人是老挝爱国阵线的游击队员，由两名讲老挝话的北越军官率领。

我们在灰暗的黄昏时刻上岸，那里属于老挝边境，被视为政府牢牢据守的地带。的确，此地的主要公路衔接北部的老挝首都永珍和湄公河沿岸的市镇如他曲、沙湾拿吉（Savannakhet）及巴色（Pakse），处于这条主要公路与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全在富玛（Souvannah Phouma）政府的牢牢控制之中。然而，公路以东山峦起伏的腹地，却是无人地带，老挝爱国阵线及北越部队在这里不受干扰地活动。我们原来决定尽快离开政府控制的狭长临河地带，然后潜入无人腹地，这样对我们有利。理由再也简单不过。可是，抵达那里之后才发现事与愿违。

他们竟然决定在政府控制的路旁地带过夜，不晓得是为了迁就我的健康状况，还是由于越南人员规划迟缓所致，这点我无从证实。我们得在第二天破晓以前越过高速公路，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

夜幕低垂之后，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穿过矮丛林地带和树林之后，来到了一段平坦易走的地带。就在这里，护送我们的越南人建议就地搭营过夜。他们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这里和政府军平时巡逻的路线还有一段安全的距离。

越南人的盘算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三个毫无经验的老挝爱国阵线游击队员准备早餐时，制造了不寻常的声响。他们三人制造出来的噪音令我和陈田感到担忧。他们不只煮饭、烧鱼，还彼此尖声叫唤。铝制碟子和锅具碰撞而发出巨响。他们用随意捡来的木柴生火，烟火在宁静的大清早滚滚升空，即使是聋子都能知道我们的确实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所在地和一个老挝村落仅有咫尺之遥。村民显然听见了大清早传来的刺耳声音，也看到了升空的烟火，而且还报了官。我们还没来得及一尝老挝爱国阵线那顿令人焦虑不安的早餐，一阵枪击声扬起，这表示我们已遭政府军包围了。

若说我们需要幸运之神的眷顾，此正其时。围剿我们的军队的装束极不寻常。这些士兵和我们的老挝爱国阵线同伴一样穿着便服，而且行动起来毫无策略可言。我们还火之后就是一片寂静。我们估计对方会试图攻占我们的位置，

但是这事并没有发生。政府军显然不愿冒伤亡的危险，来个全面交火。我们的越南人队长赶紧把握时机，安排我们从烽火中突围。由于政府军明显是抱着尽可能只做小规模战斗就离开现场的心态，我们才能毫发无损地逃出他们的包围。我们爬上通往安全腹地的道路时，已经是破晓时分了。自此之后，我们的老挝爱国阵线警卫员肯定意识到如果继续发出嘈杂的噪音，将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很快得知，原来那两个与我们同行的北越人，乃直接隶属河内的中央联络部，这个部门负责居中协调与各国兄弟党之间的合作。从湄公河开始，我们完全依赖这个部门的安排。不过，这两个北越人不会讲华语和英语，我们和他们有语言障碍，无法进行讨论；我们只好快步行走，希望尽快到达东部被承认的解放区。我们夜以继日地赶路，先是途经庄稼外围，然后一路上经过零星的茅草屋。进入森林之前，我们都没有安全感。经过几小时长途跋涉，我应该已经精疲力尽。陈田记得我仍在康复中，因此要求越南人中途休息过夜。他们并不尽然赞成这么做，指出再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达解放区了。不过，当他们知道我们同意第二天一早，天空亮出第一道曙光时就即刻上路，他们也就不再坚持赶路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攀爬进入老挝南部高原杂草丛生的山麓小丘。还没到半路，我们到达其中一座山顶端的空地。在那里，杂乱缠结着的枝叶之中，竟然停放着一架苏联制造的直升机。这架直升机没有武装，机上的三个俄罗斯人－机师、副机师和装卸员也都没有武装。

比较资深的那个越南人催促我们即刻登上直升机，因为我们的行程已经延误了。我、陈田和警卫员登上了直升机，这位资深越南人也和我们同行，留下他的同伴和那三位老挝爱国阵线成员，在陆地上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的直升机在咔嗒声中升空，在原地上空盘旋一阵后，终于往东方飞去。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在东海（Dong Hoi）的一条简易跑道上降陆。洞海位于分隔南北越的非军事区以北，是东京湾（Tonkin Gulf）沿岸的一个省府。

由省府高官和附近单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到场迎接我们。我们被带到迎宾馆，当地党书记在迎宾馆为我们举行延迟的洗尘午宴。第二天，越南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派来一架双引擎 PS-84 运输机（苏联版的 DC-3），把我们送到河内。还没到中午，我们就已在河内以北的嘉林机场（Gia Lam Airport）降陆了。当时是 1961 年 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劳动党中委黎文良（Le Van Luong）已在沥青跑道上等候，准备与我握手，

欢迎我来到真正的共产党腹地。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老同志小章，我们上一次见面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

我们被载送到河内市中心的一间大屋。几个星期前，这间大屋还是重要人物黎笋（Le Duan）的官邸。前一年9月，黎笋被任命为北越共产党总书记。黎笋的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主席，他就是在河内发号施令的人。由于知道我会到来，他暂时迁出这间位于市中心大道上的宽敞的住宅。这可是莫大的殊荣。那是肯定我身为共产运动兄弟党领袖所做的个人举动，尽管当时我们遭遇了巨大的军事挫折。我相信这是黎笋感谢我们在二战爆发时给于他们援助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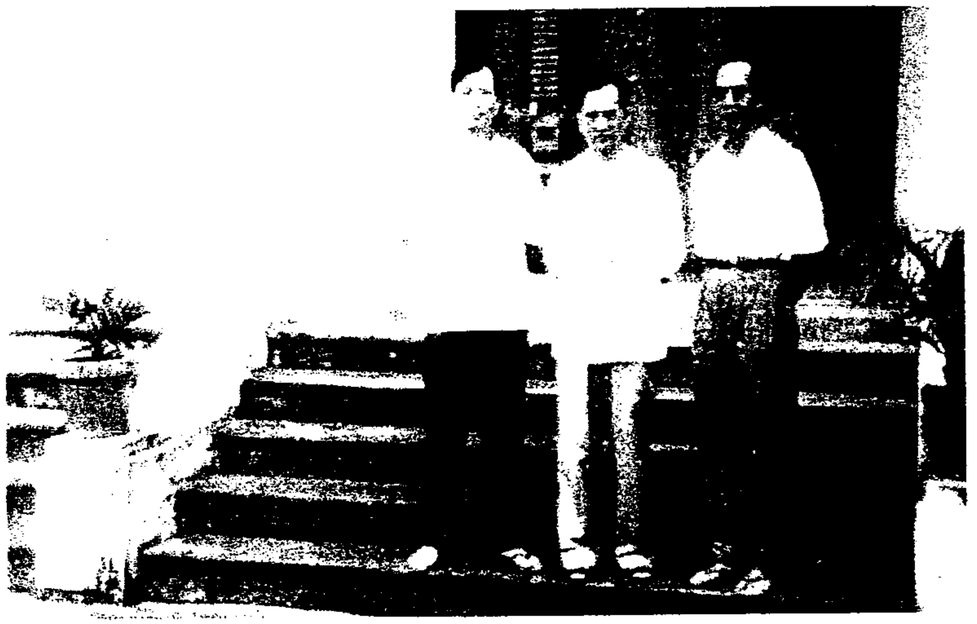
抵步后的第二天，黎笋为我们举行了正式晚宴，以示尊敬。晚宴设在我住的地方，好几位政府高官也都赴宴了。有人小声告诉我，我若穿上便服，会比穿上马来亚共产党领袖的正式军服来得好。虽然费解，我仍接受了这个请求。不过，很快的我就了解了为什么他们请求我穿便服，以及在我逗留越南期间，要求我作一些微妙的调整。

一个星期后，河内将举行劳动节庆典。我们已知道，劳动节当天，首都将是举行群众聚会及组织政治游行的地方。我们误以为我们会受邀见证劳动节盛典。毕竟，社会主义者向来视五一劳动节为重要日子。然而，越共很快就和我们说清楚了，我们无法观赏游行或集会，而得留在住处足不出户。

我们自我安慰说，由于马来亚共产党被视为秘密的党，我不在这类庆典上公开亮相会比较好。然而，我们身处市中心，还是可以听到庆典的盛况。庆典中途，数以千计的越南年轻女孩穿着农民服装齐步走过我们所住的大屋，她们脚下的木屐发出整齐的节奏，响彻云霄。我们赶紧走到窗前短暂地观看了1961年河内的劳动节庆典。

不让马来亚共产党到访河内的事引起瞩目，是有原因的。早在七个月前，胡志明和黎笋都出席了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会议。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分裂为“亲莫斯科派”和“亲北京派”的情况第一次浮上台面。对河内领导人而言，这次会议是场严峻的会议，而且影响深远，尤其是当时河内正踌躇满志要发动游击战重夺1954年日内瓦条约划分出来、由亲西方政权控制的南越。

超过81个共产党及相关政党的资深国际代表出席了莫斯科会议。会议召开时，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也就是与西方“和平共存”的新主张的倡议者，显然将中国视为保守和盲从教条的共产国家。支持毛泽东的阵营很快就进行反击，他们指责赫鲁晓夫及亲莫斯科阵营是修正主义者，及马



1961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和李安东，几经艰苦终于安全抵达河内。我们派驻北京的同志小章到场迎接我们。照片左边那个人就是我，小章站中间，李安东站在右边，这张照片摄于政府官邸的台阶上，我们逗留河内期间就住在这里。

逗留河内期间，我参观了越军在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的奠边府大捷的遗址。这场历时56天的战事是第一次印度支那冲突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最终挫败了法国继续殖民统治越南的政治意图。在这张照片里，我一脚踩着被遗弃的法军大炮，周围则是当天陪我参观的越南劳动党人。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叛徒。

因此，1961 年的劳动节，河内要避免任何形式地介入莫斯科与北京的领导层斗争，以保全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继续在南越的战争，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同时得到苏联和中国的积极支持。唯有保持中立，作战所需的庞大经费及大量军事物资才能得到保障。如果让一群华人嘉宾－即使是来自马来亚的华人－站在官方的劳动节庆典看台上观礼，或出现在其他显著地点，肯定会发出错误的信息，进而破坏了河内意欲维持的中立态度。更何况当时的我，身为一个华人政党的领导人，正在前往北京设立新总部的旅途中。

小章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到河内来。小章曾在河内负责监督我党派到北越学习游击战理论及如何建立与维持地下政治网络的十人精英小组。越南人对抗法国殖民政权时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急于向他们取经。我们希望能够藉此找出我们失策之处。既然马来亚共产党决定重整旗鼓，越南专家在和平（Hoa Binh）传授的训练对我们而言，就十分重要了。

我们派往河内的学员都是马来亚共产党的资深干部。我们在马来亚各地挑选出这些干部，派遣他们到北越首都接受专门的政治指导。完成训练后，这些干部按照交错行程表到曼谷去，为马来亚共产党建立一个独立的地下通讯网络。当时，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够维持独立的供应网络，经由泰国向南延伸，而无需依赖当地共产党的帮助。

我们计划让这批学员在完成训练后潜回马来亚，无论是经由泰国的通讯网络，或是安排渗透，对于成就我们的长期计划，举足轻重。我趁着到访河内的机会，加强我和这些干部的个人联系，他们日后的工作对马来亚共产党的生存太重要了。因此，我去了好几趟和平，也非常熟悉他们所受的训练。

在越南逗留期间，我好几次受到该国共产党的邀请，到各处参观。我、小章和陈田参加了好几次短程观光。起初我们去了越南西北部的奠边府（Dien Bien Phu），这里正是越盟（Viet Minh）大败法国殖民军队的战场。尽管那已是七年前的事了，我们仍得步步为营。那里还有一大片地方仍布满法国地雷、尚未引爆的炸弹和活炮弹。这些炮弹和地雷，为那场异常激烈的战斗留下挥之不去的见证，也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最佳的精神感召。

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越南方面坚持要我在河内以东 170 公里，靠近港口城市海防（Haiphong）的著名度假胜地下龙湾（Halong Bay）休养几天。3 千多个石灰岩岛遍布下龙湾。海岸线密布着洞穴和洞室，那是由远古石荀和钟乳石作

用所形成令人惊叹的杰作。越南人常自豪地宣称，该国一些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从这里得到灵感。一连好几天，我都住在一间随意建在海边的别墅，这间别墅是政府的宾馆。两年前，印尼总统苏加诺也得到越南政府相似的款待，以及享用同样的设备。

胡志明预定在劳动节庆典后不久动身前往北京。他将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谈。莫斯科与北京的分裂所衍生的问题肯定是最重要的议程，而且当时胡志明的确承受极大的压力，要向毛泽东保证他的中立态度。我获知胡志明急于在启程前与我见面，问题只在于要在他繁忙的时间表中，安排一段适合的时间。

胡志明终于通过政府的联络部及时地邀我会面。胡志明有两个住所，官邸是前法国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一所相当奢侈的豪宅。胡志明利用这所官邸处理党务、开会，以及接待显要访客和外国贵宾。胡志明的私邸距离官邸不远，是一间简朴平凡的屋子，与官邸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只有一层楼的小屋子，里面有他的寝室、饭厅和规模不大的会客室。

我、陈田及小章就在这间简朴小屋见到了传奇人物“胡伯伯”。我们被引进会客室时，胡志明已坐在一张木椅上等候我们，一位越南通译员站在不远处。72 岁的胡志明蓄着长胡子，穿着一件稀薄的棉制上衣，配上一双如今很出名的凉鞋。这双凉鞋是用已被剥去内胎的旧轮胎割制而成。会谈期间，胡志明幽默地提醒我们别受他的装扮所影响。他出访中国和苏联，同样是这一身穿著。“别跟随我的样板”，他如斯劝告我们，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这只是我喜欢的穿著。当你出门见人时，可要穿得体面些。”

胡志明问我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会讲马来话吗？”我明确地回答我会。我们接着用了一个多小时闲话家常。非正式会谈告一段落后，我们三人与胡志明共享一顿简单的午餐，有白米饭、一碟肉和一些蔬菜。

我们和这位越南领导人在这个场合会面，基本上是我方的礼貌拜会。我方和越方已在几天前举行的党对党正式会议上讨论了党务。我率领马来亚共产党，而黎笋则率领越方。双方的会谈是在越南劳动党总部举行。

黎笋无疑是个南方共产党人，也是当时唯一挤身河内权力核心的南方人。黎笋出生于旧皇都顺化（Hue）附近的一个乡村，其权势之大与自视甚高的性格早已闻名遐迩。自学的黎笋曾在越南铁道局工作，也曾被法国殖民政府逮捕过两次。他善用坐牢的机会进修政治哲学。两次漫长的牢狱岁月，再加上不向法

国人卑躬屈膝的风骨，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令他崛起成为显赫的政治人物。

在党对党的会谈中，我介绍了我方的处境与政策。越方也如是。双方讨论的范围很广。越方答应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给我们各种援助。他们看来没有兴趣知道英国的反游击战策略如何发挥作用。我想他们是觉得，他们肯定比我们更懂得游击战，毕竟他们抗法时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由于中国与苏联闹分裂，我谨慎地避开任何会碰触此事的话题，以免东道主尴尬。黎笋论述了他的政府矢志统一越南的决心。日内瓦条约签订后，他就回到了南越，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他为我们叙述了他在那里的经历，吴庭艳政权的高压统治，以及大批越共分子惨遭西方支持的西贡政府逮捕、折磨及杀害的情况。

黎笋解释说，尽管日内瓦条约签订后，亲共分子即刻被大规模遣返北纬 17 度，但是南方的地下活动仍然活跃如昔。他说河内期望按照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在 1956 年 7 月举行大选。他跟着指责吴庭艳政权没有遵守协定，反而继续军事镇压南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北方别无选择，只好以牙还牙，才能重夺南方领土。无疑的，南越的革命已经展开了，一些小规模行动也瞄准了政府目标。这些行动将会随着运动的扩大而逐步升级。

黎笋强调，这个决策相当于发动武装斗争，其最后方案是在北越执政党劳动党在 1960 年 9 月举行大会后才敲定。黎笋也是在这届大会中被任命为总书记。

我向黎笋说明我们与英共和联邦军队战斗时所遭遇的各种难题，以及我们为何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此），转而恢复地下政治活动。我表明一点，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军事与经费援助，若要重新拿起武器，那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此时我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奇怪的处境。越共才在仅仅八个月前矢言全面展开武装斗争，而我却在极力说明马来亚共产党恰恰相反的局面。坐在会议桌另一端的黎笋强调，由于敌人继续搜索、逮捕和杀害政治活动分子，在南越的政治斗争完全不能维持下去。我肯定北京并未通知越南，马来亚共产党已在 1959 年改变了政策。黎笋和他的同志们肯定对我所叙述的情况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显然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决定放弃武装革命，转而展开政治斗争。

第二天，劳动党的有力人士、时任政治局组织部部长的黎德寿特地联络了我。黎德寿是掌管劳动党党务的第二号人物，他显然被我在党对党会议上的讲

话所困扰，因而前来要求说明。他并没有出席（党对党）会议，我猜测是黎笋向他转述了我的讲话内容。黎德寿煞费苦心地对我说，河内殷切期望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的路线。不过，如果我们认为条件并不允许我们这么做，那么改变策略并非可耻的事，越方将会尊重我们的决策。

与此同时，黎德寿检讨了越方前一天承诺的援助。他首先强调，越方的援助肯定有限，因为越方本身都得很依赖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不过，马共人员因活动需要而在马来亚与中国之间走动，越方准备提供任何行得通的协助。而且越方也愿意继续为我方挑选的干部主办训练课程。越方也欢迎马共委派学员常驻北越，这些学员不但可以在当地定居，也能参加各种革命学习。他指出已有大约 1 千名柬埔寨反抗运动的成员接受这项安排，他们在这里受训，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回去家乡。我很感激越方的献议，并且立即着手规划如何善用此便利。

当时胡志明十分担心中苏分裂会威胁南越的革命，共产世界的高层领导都知道这点。胡志明也亲自在中苏领导人之间居中斡旋，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甚至因此而数度北上中国。当我们得知刚刚把胡志明从北京载回河内的中国专机就要空机飞回北京时，我们已经预订了商用飞机的位子继续未完成的旅程。我们愿不愿意乘便随这班贵宾专机飞往北京呢？我们欣喜若狂地接受了。我们已在河内逗留了大约六个星期，我急着要到北京去，安顿下来并开始振兴我党的艰巨任务。

就意识形态而言，我和小章一向大力支持毛泽东路线和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仍有许多事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中一件事就是为何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用作农业生产的国家，竟然会发生饥荒？中国曾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我多年来所接触的西方媒体都很少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在河内，我和小章多次彻夜长谈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些讨论中，我第一次听到大跃进是个大灾难。

小章总是直率地批评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经过这些讨论，我们的结论是，马共仍得和毛泽东 / 中共的意识形态挂钩，但是在具体运用上必须灵活。小章主张我们得避免在中苏分裂中被归类为某个阵营。我们必须重视及维持与苏联的关系。毕竟中国本身也是如此。至少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台面上都表现得相当友好。除非他们公开决裂，否则我们理应尝试维持平衡。一旦公开决裂，我们自然会站在中国这一边。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见解。

1961 年 6 月第一个星期的某天早晨，我们飞抵北京国际机场。当时的中共

1961 年 6 月，我初到北京，穿着新裁的毛装，站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留影。

1961 年 12 月，北京－我和小章在颐和园附近留影。

中央联络部部长刘宁一到机场迎接我。刘宁一是当时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心腹和忠实追随者。陪同刘宁一的是中央联络部的主要干部，这个部门类似越南那个联络部，专司处理与兄弟党有关的所有事务。

我被安排住在一间坚固的洋楼，这间洋楼就在北京高度机密的中央联络部总部的隔邻。中国军事博物院及铁道部建筑物也在附近。中央联络部总部当时就像一个秘密基地，藏在一面高耸的石墙背后，没有任何标记说明这是什么地方。石墙里面有多间分散的小屋，那里还有另一道墙，将联络部人员的家眷和办公室隔开。联络部严禁家眷在办公室地带闲逛。要到联络部办公室处理任何事务都得预约。

我住的洋楼的所在地，是中国安排给在北京工作的兄弟党人员的住处，位于一条宽广的林荫大道，直通首都心脏地带的天安门广场。自 1959 年就留在中国的李坤华，已经完全康复了，并再度与我一同工作。她抵达北京后，和一群留驻北京的我党干部同住市里其他民宅区。

另外还有两个东南亚国家一缅甸及暹罗一的共产党人员与我们为邻。当时缅甸共产党的人员最多，他们大多是都是缅甸人，最后大多数都回去缅甸。长驻北京的暹罗共产党干部人数最少，不过他们最多人参加冗长的训练课程。

我们安顿在新住处后，中央联络部的多位高官很快就来拜访我。我们举行冗长的讨论，在讨论中，我详细解释为何马来亚共产党决定重新回到政治斗争这条路子。他们很谨慎地聆听我所讲的话，他们回去之后显然会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我想，关于马来亚共产党事务的决策，都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定夺，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正是邓小平。

中方为我设了两场接风宴。第一场由中央联络部做东，而较大规模的接风宴则是由中央委员会做东。我出席这两场接风宴时，都由小章、陈田及当时的党主席穆沙阿默德（Musa Ahmad）陪伴。中国显然急于在我们士气低落之际，给我们打气。他们赞扬我们的坚韧毅力与斗争。听着他们所讲的话，你难以联想到我们其实刚刚遭遇军事挫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讨论中共领导层如此恭维我们，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961 年 7 月，我们受邀与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这一天终于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小章及穆沙阿默德一起出席会谈。我们在中南海政府行政总部邓小平的办公室会晤。现场还有三位中国高官和一位负责记录的秘书。

邓小平先打开话闸子。他通知我们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巨变。我们都知道他不久前才和胡志明会晤。我猜测他是知道了河内要在南越发动革命的意图，以及胡志明矢志统一祖国的决心，才会说出这番话。邓小平也深知缅甸、暹罗、老挝及印尼共产党同志的心思和盘算。这些兄弟党当时都在中国维持重要的训练设备。

邓小平强调说，就策略上而言，东南亚的整体形势，对类似我们在马来亚展开的斗争越来越有利。他力劝马来亚共产党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我们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我在一瞬间震惊了。我答复邓小平说："我不能现在就做决定。这个问题必须交由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决定。"

整顿思维后，我急忙补充说："如果我们恢复武装斗争，中国能够给我们哪些援助?"我告诉邓小平，这是我在中委会的同志们会提问的第一个问题。

邓小平显然有备而来。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都在关注马来亚共产党的处境，小章的任务就是和北京维持定时联系。自从和中国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后，他给中国提供了马来亚各种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精确进展报告。当时，马来亚共产党大约有现金 10 万美元的经费。由于我们的行动已大量减少，估计这笔钱足够让我们维持 12 个月之久。

邓小平可能因为我提出经费问题而得到鼓舞，他肯定是把我的提问解读成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认为我们最终会顺从中国的意愿。总结会谈时，双方有了谅解，我会将他的建议提交给我的中委会。邓小平向我保证，如果能够达成协定，中国会支持我们，而具体的统筹工作将交由中央联络部负责。邓小平也解释说，中央联络部获得授权敲定预算。我们的会谈在同一天分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在上午，第二阶段在下午。

心理上，我们发觉处于更加艰难的窘境。我们在昔罗经历了好几个月思想上的挣扎，才敲定结论，认为我党生存的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我私底下反复思索邓小平的见解，并且找来小章、陈田和李安东一同商议。我们也经由无线电联络上驻守昔罗的阿海。倘若采纳中国的意见，要再度面对开战这个艰巨任务的人，毕竟是我们新近委任的代总书记阿海。毋庸置疑，邓小平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在此之前，每每提及向中国要求直接援助的事情，我总是觉得尴尬。然而，在北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后，我察觉到中国一直都在资

1961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我作客苏联，出席第 22 届苏维埃大会及 1917 年俄罗斯革命 44 周年纪念庆典。与我在红场合影的是来自国际部的苏军上校。

助东南亚国家的兄弟党。这些兄弟党都有派驻代表在北京，也有大批人员参加各种训练计划。

* * * * *

和邓小平会谈的三个月后，我受邀到莫斯科出席苏维埃大会，以及观赏为了庆祝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 44 周年纪念而举行的红场阅兵游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正是在本届苏维埃大会上首次公开谴责斯大林。他也选在同一个场合严厉批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此行我也去了一趟列宁格勒（Leningrad），逗留了一个星期。

我早已听说了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及他的政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在 1956 年及 1959 年的苏维埃党秘密集会里已经浮上台面。我个人非常不同意莫斯科所持的这种新态度。我承认斯大林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而且他的政权对过分的行为也得负上责任。然而，斯大林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凡领导人。他令苏联从一片荒野崛起成为超级强国。没有斯大林，苏联绝不可能抵抗得了德意志第三帝国（Third Reich）。

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都自认为改革者，立志带领各自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现代世界。赫鲁晓夫诉诸的手段，是全盘否定旧政权，藉以保全他的权力基础。那年我听他在苏维埃大会上演讲，就觉得像这种蛊惑民心的政客必会犯上严重的错误。我担心的是苏联的新政治观会影响中苏关系。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并不是杞人忧天。

另一边厢的邓小平却从不诋毁毛泽东。邓小平要是这么做，反而是在谴责自己。多年来我自有不同意邓小平的时候，也质疑他的某些政策的智慧。然而，1989 年 6 月发生天安门事件后，我重新评价了他的领导。如今我接受了这个说法：邓小平所铸造的共产主义形式，乃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形式。我相信今天的中国走对了方向，但未来好几年，它仍得维持高度的中央调控。否则，它将重蹈苏联在 1990-91 年之覆辙。我告诉人们别急于预测中国的政治会向资本主义的力量俯首称臣。那是一条很长的路，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第二十六章
恢复武装斗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华玲会谈之前推举出任党主席的穆沙阿默德，最后竟然背叛了我们。在我们讨论邓小平的提议时，他表现得最为乐观。

他胸有成竹地预测道："有了中国的援助，我们能在五年内接管马来亚。"我想穆沙当时有点忘形。他的预测看来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我认为比较实际的估计，至少要十年、八年。尽管嘴里这么说，可是自己仍是心存疑问。

经过不久前与黎笋及黎德寿在河内会谈之后，我越来越相信，解放南越、柬埔寨及老挝只是迟早的问题。至于暹罗，我肯定不那么有信心。我认为暹罗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解放印度支那得花上八至十年的时间（事实上历时将近 15 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马来亚的处境又会如何？我们亟需和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有共用边界，可是即使三个印度支那国家都解放了，也无法符合这个条件。

对我来说，期待暹罗成为一个共产国度无异于画饼充饥。我记得很清楚，1945 年至 1960 年期间，我极其关注暹罗政治的演变。无论是军人或文官掌权，我都在探索是否有任何蛛丝马迹显示他们会保持中立。中立的暹罗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优势。我们肯定会少掉许多阻挠与障碍，而且可以肯定暹罗不会与英国联手打击我们。当我们停留在暹罗南部时，英国始终是我们的威胁。

我们在 1959 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主要是考虑了这些因素。仅仅 18 个月后，身在北京的我们却要重新检讨当初的决定。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得到中

国承诺财政援助。然而，这就足以推翻之前的论据吗？

驻守昔罗的阿海认为有了中国的援助就行了，他立即回电，表示他愿意领导一场重振旗鼓的武装起义。穆沙阿默德对此十分热衷，小章也支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如此积极的决定背后，多少带点勉强。毕竟我们 1959 年的昔罗决议，并非突发的奇想，而是做了许多分析和自我批评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交谈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立场就是，马来亚共产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邓小平已经授权其属下处理马共事务，我们现在是和中央联络部的最高层干部打交道。我们直截了当表明不要武器和弹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运送这些配备到马来亚会遭遇什么难题。我们要的是货币。

我们和中央联络部的磋商历时几个星期，而且非常成功。这是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以来，党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得到保证。与此同时，我们授权阿海在昔罗总部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恢复武装斗争的问题。他负责规划如何管理运用中国的财政援助，他的建议将被纳入我党中委会在北京拟定的整套计划中。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动员和组织群众，以便重振我们在暹罗－马来亚边境地区的势力。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那些伪装成国民党的土匪，再次成为我们的目标。由于我们在 1959 年以后逐渐调低军事姿态，那群匪帮便逐渐乘虚而入，试图填补他们所谓的权力真空局面。于是这些在 1950 年代初期被我们驱逐到金三角的恶棍又回来了。

我们决定消灭一些卷土重来的犯罪分子，藉以营造重振旗鼓的即时效应。唯有杀伤力才能向匪帮传达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赖着不走，就注定得和我们搏斗。阿海想出了一个妙计，以确保我们采取强硬手段对抗匪帮时，暹罗政府能保持中立。

他特别设计了一份暹罗文传单，广派给边境各府的民众、政府部门及军事当局。我们在传单中声明，马来亚共产党盘踞当地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得到物资供应，而且会以当地货币向当地市场采购。我们向民众保证，我们尊重暹罗的国家主权。我们陈述了一系列我们认为可以实现的假定。首先，我们要求暹罗政府不要试图搜查我们在森林的据点。如果他们来了，但仅仅是朝天空开枪，我们也会朝天空开枪，以示回报。如果他们直接对我们开火，我们也会以牙还牙。我们向警方及军方保证，我们无意与地方政府对抗。如果他们不到森林巡逻，大家就井水不犯河水。

传单派发出去后，我们规定全体游击队员都要了解传单的含义，并且严格遵守传单所陈述的应对措施。结果证明了这个方法非常有效。派发此传单的目的，是要保障我们能以森林为据点，并使事态往我们所要的方向发展。这份传单很快就传到了警方、军方及政治部门高层手上。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便不再烦恼了。

恢复武装斗争的另一重要条件，是通过政治教育重新巩固党的整体组织。我们重新编排密集讲课。就在此时，我们将总部从昔罗搬迁到勿洞。一切都重新整顿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在马来亚及新加坡两地征募地下政治人员，而游击队则集中在暹罗南部边界森林。

其实在我动身前往北京之前，我们已经开始执行遣散计划，而且进行得很顺利。如今所做的是遣散计划的反向政策。执行遣散计划时，决定不去中国的大批游击队员走出了森林，可融入马来亚边境北部的华人社区。南迁的话，必会面对死刑的风险。由于执行遣散计划的缘故，我们的游击队人数开始锐减。颁布反向政策时，中坚游击队员已减少到大约 300 人左右。这是马共有史以来最弱的兵力。由于有了新计划和经费，我们在 1961 年中旬展开第一轮征募人员的工作。到了 1964 年，游击队员已经增加到大约 800 人。这些新晋的游击队员全都来自边境以北地区。这一回，我们堪称成功争取到当地穆斯林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此时，我们的游击队分布在四个主要的森林营地，一个在西部的昔罗森林，另一个在中部的勿洞森林，其余两个在东部沿着暹罗边界一带，即现在泰国的陶公府（Narathiwat）。游击队员没有领取固定薪金，只有我们所谓的零用钱，这笔零用钱足够让他们买香烟、肥皂、牙刷，以及可能需要用到的其他个人用品。

随着部队全面扩大后，重振了士气，而资金流入也成了确保军事行动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在曼谷有两盘生意，那固然是重要的经费来源，但是它们本身无法应付我们逐渐增加的需求。这两盘生意被迫关闭后，调动金钱更成了永远无法克服的难题。我们常常得携带现金，但很危险。无论我们的交通员因为任何原因被拘押和搜查，无论是否正式逮捕，那笔钱肯定会现场被充公。如果非得携带现金，我们肯定优先选择英国货币。一张 100 英镑的钞票，就很值钱了，而且很容易兑换本国货币。

当然，我们千方百计加强输送经费的方法，也开发了各式各样的国际渠道。我不想具体说明我们如何开发秘密经费渠道。我只说一点：我们非常体面地管

理这些渠道长达 20 年之久，从未中断。马来亚共产党严格地限制开销，甚至当北京在 1961 年开始资助我们之后，我们更加严格的控制预算。我们每年向中国提交经费要求。预算案是以美金计算，但是我们可以提取我们所要的货币。北京会随着需求的情况相应增加我们的预算。这些总体安排一直维持到中国在 1989 年终止援助为止。

1961 年以后，虽然名义上我还是党的总书记，但是总书记的日常职务其实已落在阿海的肩上。我在北京只是做些高层间的联系，尽力处理马泰边境那边提上来的种种要求。与此同时，我又得为中国分析马来亚的政治演变。我所作的报告，是让他们深入认识报纸上没有刊载的事。我定期交上报告。每当发生重大事故时，中国会就某个具体议题征求我的意见。

* * * * *

在我抵达北京不久后，新加坡的资深共产党领导人余柱业（我们叫他 ECY）从他设于廖内群岛的流亡总部前来中国。我和小章接待他，我们三个人一同从长计议，规划如何疏散身份已曝光，但仍滞留新加坡的地下活动人员。余柱业直接给我汇报了流亡印尼各地的同志们的遭遇。他证实了我们自 1959 年开始接到的各类报告。我们也商议了有哪些方法可以最好的保证我们在新加坡剩下的地下网络能够保存下来。两年前，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警告说，在 1959 年 5 月大选大捷后的李光耀，看来会重击我党遍布全岛的地下组织。我们预测得太早了。然而，在 1961 年，我们远比从前更加相信，我们担忧已久的镇压就快来临了。

我们在北京的会商也仔细检讨了伦敦及吉隆坡共同拟定的“马来西亚计划”(Malaysia Plan)。我们三人的结论是，密谋破坏马来西亚计划将带给我党最大的利益。即使无法令它胎死腹中，至少也要使它的落实遥遥无期。我们的立场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独立的政治体，尽管马共创党时曾经展望马、新统一。

我们认为，李光耀之所以对马来西亚计划表现得如此热切，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认定马来西亚计划有助于他对抗马来亚共产党。我们相信李光耀当时盘算着藏身东姑（阿都拉曼）背后部署痛击我们，而且不只是在新加坡，而是全

马来亚各地。我们误判了，实际上竟然是东姑给李光耀制订了打击马共的时间表。

和余柱业磋商的时候，我们缺乏关于马来西亚计划的具体资料。自从东姑在 1961 年较早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马来西亚计划之后，少有公开及有权威性的讨论。当时我正在前往北京的路途中，自然错过了这方面的言论。虽然我同意就政治目的而言，我们必须破坏马来西亚计划，但是否行得通，我却有所保留。

余柱业极力申论，在人民行动党里面，以李光耀为首的右翼阵营，与看来是由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领导的中间路线阵营的分裂正在扩大。拉惹勒南是马来亚诞生的淡米尔人，曾任反殖报章新加坡《虎报》（Singapore Standard）的助理编辑。他们之外还有第三股势力，余柱业称之为“华人阵营”。为了说服我们相信拉惹勒南的政治倾向，余柱业特别提起，在紧急状态刚颁布的初期，他因肺结核发作而需要紧急就医，但是基于保安考虑，他便决定向当时住在拉惹勒南家里的一位左翼医生求医。

我怀疑李光耀的阵营会和另外两个阵营有尖锐的分歧，尤其是考虑到李光耀和拉惹勒南的交情。我的两位同志都相信人民行动党正在闹分裂，而且将会恶化。我是少数，只好服从他们的意见。我们后来决定指示在新加坡的地下人员做些工作，拉拢拉惹勒南阵营站在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这一边，同时尽一切可能打击李光耀推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新联邦的决心。我肯定对这些决策感到不安，因而说服我那两位兴致勃勃的同志，我们跟着要做的事情，是做最好的规划和准备面对糟糕的局面。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印证了我的疑虑并非无的放矢。拉惹勒南由始至终都是李光耀的人。我认为要准备面对最坏的局面，这种想法仍然是正确的，可惜却没有付诸于行动，以致我们得因此付出代价。

就在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讨论有所进展之际，李光耀付出了许多时间与心力争取华人中产阶级商人的支持。他允诺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新加坡是否加盟马来西亚，而我们则强烈反对举行公民投票。我们始终认为，新加坡将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加盟马来西亚。马来亚的立法对马来人非常优惠，华人则处于劣势，而马来西亚成立后也会继续维持这种局面。我们知道新加坡华人将会非常担忧在吉隆坡控制底下的马来西亚教育，尤其是华文学校的前景。

李光耀是要利用公民投票合法化加盟马来西亚的决策。在野的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cialis Party，社阵）坚决反对加盟马来西亚。多年来，新加坡领导人、学者及西方媒体一直说我们控制社阵，实际上我们不曾控制过社阵。我们

的确影响过他们。然而，无论是党魁李绍祖医生，或是其他重要的在野党人如布都遮里（Puthucheary）兄弟－詹姆斯（James）及多米尼（Dominic）－从来都不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我们也从来没有能力控制他们。毫无疑问的，我们曾经尝试过，就如我们当时影响其他胸怀大志的政治人物那样。

李光耀在 1962 年 9 月赢得公民投票后，信心大增，开始积极地向新加坡选民解说马来西亚计划。他四处演讲，并且继续扩大人民协会联络所的影响力，以作为其政治策略的奠基石。这些联络所当时仍颇受我们影响。

1963 年 2 月 2 日，距离马来西亚成立还有七个月而已，此时的李光耀深信自己的权力已经牢不可破，终于向马来亚共产党开刀了。他在黎明前展开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结合当地及马来亚的警力全岛搜查共产党活动分子。搜查小组根据事前准备好的名单逮捕了 115 人，包括詹姆斯布都遮里在内。我们过去四年来已预测了会有这场镇压行动，但没料到却是在东姑和英国向李光耀大力施压后发生。我们两年前和余柱业商议时已准确预测会有镇压行动，却丝毫没有部署有效的应对行动。我提出要“准备面对糟糕的局面”，成了毫无意义的警告。“冷藏行动”瓦解了我们遍布新加坡全岛的地下网络。逃过警网的地下人员匿藏起来，许多人逃去印尼。

尽管发生了“冷藏行动”，我在北京仍继续思索，我们在马来亚前线的活动如何才能产生更强大的冲击力。我很早以前就曾想过设立本身的广播网络，但是犹豫着是否要求中国资助这个资金庞大的计划。北京政府实际上比过去更慷慨。

在 1964 年 8 月爆发东京湾（Tonkin Gulf）事件之前不久，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国邀请我访问河内。我经由相同渠道表达我欣然接受邀请。动身前往河内前夕，东京湾事件爆发，共产主义圈子普遍预测华盛顿将开始轰炸北越。河内的邀请不变，而我也按时在 8 月杪的某个黄昏飞抵嘉林机场。在场迎接我的正是黎笋。我到河内的最初几天，越方带我到河内的各个景点参观。

过后，黎笋与我会商有关我们双边利益的事。我上一次和黎笋见面，是在 1961 年前往北京途中，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正要改变政策，恢复武装斗争。黎笋对此事的进展颇感兴趣。他也向我报告了南越战争的情况。刚从北京回国的黎笋向我透露，早在几天前，毛泽东亲自告诉他，革命很快就会席卷东南亚诸国。毛泽东预测越南、柬埔寨、泰国及马来西亚都会垮台。

我们的会谈中途被打岔了。一位秘书走进了房间，急切地在他耳边低语。

这位秘书离开后，黎笋便转移话题，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报告，美军的一支小型舰队正部署在非常接近北越海岸线的海域。他的情报分析员判断美军随时会发动海军轰炸。他说，河内可能是美军的攻击目标，因此他会安排我到首都西北部、前法国殖民政权的高原度假胜地山萝（Son La）。

我经由陆路去山萝，在那里住了几天，等候预期中的美军的进攻。后来却得到通知说，美军舰队突然转向离去。河内派来一位司机护送我回河内，回到河内当天，我和黎笋又继续会谈。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有时黎德寿也参与讨论。我说我知道泰国共产党过去两年来都在北越某处运作地下无线电广播站。

我问道：“马来亚共产党能得到类似的设备吗?”

我原本犹豫着要不要向越南要求这些，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仍处于复兴我党的剧痛当中，可能会被看做是一个还不够资格有此想法的组织。我是杞人忧天了。黎笋即刻同意我的提议。他很快就补充说，广播人员当然得由马来亚共产党提供。我向他保证，这不成问题。他说，越南方面乐意提供技术人员维持广播站的操作；而且他们也会为我们胪列设立广播站所需的电子器材清单。这当中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越南无法供应发射器材。黎笋提到两个货源：中国和东德。我马上想到，越南要向这两个货源取货，都不成问题；但是对马来亚共产党而言，值此中苏分裂之际，我们只能向中国提出要求。向东德求助将给在北京的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在越南方面要带我到首都以外的地方考察之际，我接到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送来的照会，提醒我准时回到北京参加 10 月 1 日的国庆日庆典。他的请求带有催促的味道。中国的照会说，那年的 10 月 1 日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那是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的 15 周年纪念。

我对中国大使馆的要求毫无心理准备，此时的我处境十分尴尬。越南渴望延续我们的会谈，而且会向我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开罪中国，毕竟北京对马来亚共产党的生存十分重要，尤其是财政援助更不在话下。

动身前往河内之前，我曾礼貌拜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他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我通知他我有意到河内去，并且明确问他，我在 10 月 1 日庆典期间不在北京，是否合适。他力劝我按既定行程行事好了。他向我保证，政府打算低调举行那年的国庆日庆典。显然的，这些计划临时出现大幅度转变。许久之后，我终于得知原因何在。面对重大经济困扰的毛泽东，临时决定把国庆日庆典搞得壮观盛大。

谨慎考量我的两难处境之后，我决定直接给北京的中央联络部部长写一份言辞客气的照会，解释我的为难，以及表达我的遗憾，因为我希望继续参与越南为我安排的众多节目。我告诉他，我之前已经和中央联络部说明我会离开北京，并且已经得到他们首肯。

由于我们被视为“地下政党”，我知道我不会受邀出席中国大使馆在河内正式举行的国庆酒会。国庆酒会前夕，我带着一大束鲜花到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大使祝贺及致意。

越南知道我如何处理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把我的决定看作是对越南的高度尊重。我动身回北京的前几天，他们在西湖（West Lake）政府行政中心为我举行了非常私人性质且秘密的送行晚宴。虽然来宾少过 20 人，但是具体上来说，政治局的所有资深委员都赴宴了，包括黎笋、黎德寿、长征、武元甲将军，以及胡志明本人。唯一缺席的领导人是范文同。

第二天一早，就在我快要动身搭飞机回北京的时候，胡志明出现在我下榻的西湖别墅的大门前，亲自为我送行。

我回到北京之后，告诉中国领导人，河内已经同意让马来亚共产党像泰国共产党那样，在北越境内设立地下广播站。中国可否供应发射器材？我同时也将越南给我的电子器材清单交给中国。我注意到，我的要求似乎未能得偿所愿，因为对方告诉我，这得交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几个星期后，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拒绝了我的要求。他们解释说，东京湾事件令北越的军事形势不稳定。北越战机已经部署在中国南部的广西省。当时已有计划将泰共广播站从北越迁移到中国境内。倘若我们此时在北越设立广播站，最终免不了都要搬迁到中国境内某个安全位置。我要设立我们自己的革命无线电网络的念头，终于碰壁了。当时我很失望，但是形势最后将转变成对我们更为有利。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我得密切留意的国际大事：赫鲁晓夫在 1964 年 10 月被推翻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正在变化中，这件事会如何影响马来亚共产党的处境？相当明显的，北京领导人全神贯注地留意着克里姆林宫的形势演变。决策者们对于中国对苏联应采取怎样最为有利的立场，缺乏共识。当时住在中国的少数几个有影响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白人共产党人，全被视为中国对苏联政策的传播媒介。但是中国很快就发现到，在北京的白人对此事的意见分歧，并不亚于中国的决策者。

1965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主席在他位于武汉的宾馆接见我。戴墨镜，被毛主席遮掉一半的是李安东。

有一种主张是要求对苏联共产党采取全新政策。另一种主张则认同毛泽东及大多数中委的立场，那就是继续批判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莫斯科修正主义。当时最多意见的是美国人——以依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他的双亲都是犹太人，1949 年逃往美国）、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以及柯弗兰（Frank Coe）。据我所知，斯特朗力劝中国折衷应对，以便改善中国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不过，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似乎比较倾向相反意见。我个人仍然怀疑，俄罗斯人会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放弃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于各种歧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便征求兄弟党的代表性人物的意见。我、李安东和穆沙阿默德，连同爱泼斯坦及柯弗兰，被毛泽东召集到他在武汉的官邸。斯特朗并没有受邀。我猜测那是因为她对此事的立场与毛泽东尖锐对立所致。

一架专机将我们从北京载到湖北省首府。我们首先在一间大会客室集合，然后与毛主席共进午餐。在武汉会谈中，毛泽东似乎颇有戒心，而且主宰着会谈方向。他问问题、非常专心及具批判性地聆听我们的答复，然后再详细申论他自己的见解。事到如今，你必能相信，中国已经统一了对苏联关系的立场，而且全在毛泽东掌控之中。我们离开武汉时，都相信中国领导层会继续严厉批判莫斯科。

* * * * *

我在 1964 年访问河内前夕，党内对于如何最好地恢复武装斗争，已经产生了歧见。那些被视为“留守后方”（北京）的大多数意见者，是导致这场危机在 1963 年浮现的主因。我们在北京的中委对“前线”的政策有所批评。他们认为阿海太过保守，而恢复武装斗争的动作应该更有气势，也要采取主动攻势。他们要求即刻恢复对边界以南，也就是今日的马来西亚领土发动直接的军事攻击。他们甚至开始催促攻击泰国目标，这意味着他们已将泰国视为敌营的一份子了。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正在中国闹得热烘烘，在北京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层此时产生这么强硬的主张，并非偶然。当时有个说法：修正主义者正暗中破坏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

阿海和前线的同志们并不赞成奉行强硬路线的陈田、李安东及穆沙阿默德在北京所作的评估。就此分歧，我坚决站在阿海那边。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为前线

的同志着想，毕竟他们对当地形势的判断，会比我们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准确。

在北京，我们尝试双管齐下解决问题－扩大讨论，并与阿海的总部建立无线电联系。不过这两个方式都失败了。强硬派受到中国高涨的极端主义的影响极深，没有改变立场的余地。与此同时，使用无线电联系必须将无线电信息解码成精简的编码摘要，破坏了我们寻求与游击队营地达成共识及互相谅解的努力。

最后，我建议让阿海到北京来，以便大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觉得，如果阿海到北京亲自详细汇报前线的具体实况，当可化解令我们领导层陷入僵局的政策障碍。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我们因此指示阿海来北京磋商，而当时阿海在北京的妻子患了心脏疾病。

小章在 1963 年离开中国，前往马泰边境接替阿海的前线领导重任。他此行耗上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才抵达总部。由于与南方的沟通遭遇阻碍，他被迫滞留在曼谷，到达总部时已是 1964 年了。由于接替领导职务的小章还没抵步，阿海不能离开岗位，因此当阿海出现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是 1965 年了。

问题暂时解决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在 1966 年全面爆发，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搞示威游行。党内对武装斗争政策的纷争原本就悬而未决，此时死灰复燃了。大多数之前反对在马泰边界两边加强军事行动的人，现在却跟着此起彼落疾呼回归革命本质的声浪起舞。从马来亚共产党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要求采取更激进军事行动的压力更大了。

穆沙阿默德受到中国将会把兄弟党归类为“修正主义者”及“纯正毛泽东路线”，进而区分对待的猜测所影响。由于我们和联络部之间的问题，穆沙阿默德认为我们迟早会被标签为“修正主义者”而被排除在外。于是他开始疏远我们，甚至搬离我们的住处，与那些和他有相同见解的人同住。当然，穆沙阿默德最终选择了变节叛党；他在 1980 年 11 月回到马来西亚，并且公开悔过。

1969 年底，我决定将两个在北京最为激进的同志－李安东和他的妻子－派往边界营地，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他们经由陆路一同启程，几个月内就到达勿洞总部。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保持沉默，使到我们原来的前线政策维持不变，尽管那是暂时性的局面。他们两夫妻决定留在边界营地，这决定为他们带来可怕的后果。

随着时光流逝，我本身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我觉得有义务参与这场我视之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个重要里程碑的政治运动。阿海主张置身事外，他本身完全保持中立，并且极力反对我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由于强硬路线派对游击队政策的声浪已经缓和下来，因此他要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前线。

第二十七章
驱逐出境者、广播电台及讨价还价

眼见红卫兵走上权力中心，我认为马来亚共产党此时应该开门见山地向北京提出一件我们多年来一直很关注的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待被流放的马共党员和支持者的政策。在马共领导人的私下会谈里，我们把这件事称为“历史问题”，而此事牵涉到数以千计被英国驱逐到中国的人。

英国殖民政权以极恶劣的字眼“驱逐出境者”归类这群人。他们都是华人，而且基本上都信仰中国革命原则。他们的母语是华语（普通话）及各种方言。他们视毛泽东为塑造当代中国的伟人，毫不怀疑地接受毛泽东的指导。然而，中国却不断提醒他们，他们是外国人，而且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文化大革命的骚乱，似乎给公开提出及解决这项“历史问题”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时值 1966 年杪，红卫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造反，甚至闯入政府办公楼。我们接洽中央联络部，略述我们认为马共同志来到中国时，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中国大陆在 1949 年解放之前，我们的党员被驱逐到中国后，可以自由地将他们的党籍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为何如今却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我们的不平之鸣传到最高权力阶层的耳里。据我所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皆有所闻。不久后中方告诉我们，已经安排好在新年初举行党对党会议。1966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宴请我们，显然是为了表示善意。我、陈田、穆沙阿默德、阿海、李安东等五人，以及我们的妻子一同赴宴，宴席设在北京西区的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特别安排了文化之夜，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受邀赴会。我不确定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其中一位座上嘉宾李明 14 年前曾是太平监狱的死

囚，而且在狱中受尽煎熬。

周恩来如此款待，令我们深受鼓舞，并因此对即将举行的党对党会议抱有一线希望。翌年一月中旬开始召开这系列会议时，我们才发现，中国共产党会议小组的领导人竟然是康生，也就是中央联络部长期与我们接触的联系人。此时此刻的他已是权倾一时之人。他不止负责主持重要部门如中央联络部及宣传部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唯一顾问，该小组后来还接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们要设立广播电台的构想是党对党会议的主要议程。这一回，北京当权者把我们的广播电台看成极为有利的构想。中国不但提供地点和设备，也同意借调技术人员负责操作。我方则安排及训练播音员与制作人员。我们筹备了两年，才将这个无线电网络设立起来及启播。

提起“驱逐出境者”议题时，我们的运气就差了点。这些驱逐出境者当中，很多是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诞生。根据中国的统计，自 1948 年紧急状态颁布以来，已有超过 5 千名马共党员被流放到中国；如果将马共的支持者和家庭成员计算在内，截至 1966 年的人数共有两万人。在紧急状态之前，英殖民政权只小规模驱逐一些人。紧急状态颁布之后，“驱逐出境者”被装满一大艘船，有时候一批就有数百人之多。英国的统计显示，从 1950 年 11 月 16 日至 1951 年 1 月 15 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共有 2 千 812 个华人（包括家属）被令离开马来亚，由挪威人拥有的船只载往汕头㉙。

我们认为，经由这种方式被驱逐出境的马共党员，皆有资格重新参与我们的武装斗争。我们知道阵容将会非常庞大。我们有意吸收这些被放逐者，把他们重新安置到靠近中国南部与老挝边界的地区。我们可在那里设立一、两个集体农场，不止生产我们所需的粮食，还能让我们吸收的人员学习游击战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情绪高涨，人们的注意力也因此投注在世界革命的事业。我们以为，在农场为同志们安排密集的军事训练，然后经由陆路将他们分批送到前线的构想，肯定会很受欢迎。

康生却直率地否决这些构想。我们只好转移话题，极力要求让这些被流放的同志成为中共党员。这个要求也被回拒了。康生重复较早前在他的平房召开的一对一会议上的解释：自共产国际在 1943 解体之后，中共处理被驱逐出境的兄弟党党员的政策已经改变了。

据我所知，每一回合的党对党会议结束后，康生和他的部下会连夜整理会

谈摘要，然后呈给毛泽东。党对党会议结束后，中方安排我们与毛泽东举行实质的会谈。这是 1967 年 1 月底的事了，李安东、穆沙阿默德、阿海和陈田陪同我一起见毛泽东。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期，一群造反派接管了上海市。

会面地点是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由于我们是个秘密组织，不能从位于大街的人民大会堂正门入内，只能从侧门进入。

康生和其部门的两个高级官员也列席，而陈田则负责记录会谈内容。毛泽东先打开话闸子，问我们党对党会议开得怎么样。但是毛泽东显然是想和我们谈文化大革命。我很快就察觉到，毛泽东已被他的党领导班子孤立了。两年前我们在武汉见面时，他精神抖擞，而这次会面时的神情，简直有天渊之别。我们的对谈甚无条理，我怀疑陈田会不会被允许继续记录下去，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他被允许这么做。

我相信康生是要藉这场冗长的会谈，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委员会显示他有能力解决与兄弟党之间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现在我们不得不按照中央联络部的强行规定办事。我们参与党对党会议，也见过毛泽东了。我们争取了三年的广播电台终于得偿所愿，接下来就要听中央联络部怎么说了。

* * * * *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在 1969 年把马共办事处南迁湖南。我致力于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泥沼，阿海最初被迫接替我的工作。

在湖南，中方分配给马来亚共产党的单位坐落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我们从北京搭了 12 小时的通宵火车才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691”位于一个不久前才腾空的村落，这个村落的地势有许多小丘与斜坡。我们的广播电台是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给我们用作行政楼。

我们在湖南的广播电台在 1969 年 11 月启播。我们将它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广播电台的节目是经由一个 20 千瓦的发射机作跨区域广播。我们共有两个波长，但是据我所知，从来没人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我们得到的回馈显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党员和支持者都踊跃收听节目。

我们的播音员、节目制作人员及文书人员都住在“691”的宿舍。中方技术人员也住在同一范围内的另一区。我们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日常用品都由中国政府供应。虽然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远离北京，但是我们仍可定时及快捷地得到我们指定的报纸。中国为我们安排订报，而我们订阅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报纸及中文报纸。我们也定期收到伦敦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及墨尔本的日报《时代》（The Age）。我们阅读及评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亚洲周刊》（Asiaweek）、《时代杂志》（Time）及《太平洋导报》（Pacific Affairs）的报道。

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每一种语言有三个播音员。我们成功吸纳一批大学生之后，增设了英语广播。这些大学生来自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大学，他们在1970年代中期加入。虽然两国政治部都说马来亚革命之声当时吸纳的新成员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其实都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激进或进步的左派，仅此而已。马来西亚华人女孩陈月清就是其中一个，和人们的猜测相反，她在新加坡大学的同事和朋友陈华彪从来都不曾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新加坡报纸报道了许多关于陈月清的传奇轶事，我想提出几点真相，以便日后有案可查。陈月清通过一个领奖学金到新加坡深造的香港学生找上我们。1967年红卫兵在香港闹事期间，这名香港学生受到共产主义思潮所影响。他在新加坡投身学生运动，同时认识了陈月清。就在新加坡政治部去逮捕他的几个小时前，他乔装成女人逃出校园，再经由新柔长堤进入柔佛州。他在新山被捕，并被控以非法入境马来西亚的罪名。其案件后来提交吉隆坡审讯，结果被判递解回香港。回到香港后，陈月清和他接触，并说要参加我们的运动。不过我们认为她不适合在森林生活，于是安排她在马来亚革命之声工作。陈月清给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者（Marxist socialist），而我们则认为她只是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al socialist）。她肯定不曾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节目上了轨道之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尤其是勿洞的华人社会，纷纷要求革命之声以各种华人方言广播。起初我觉得这么做并不实际，因此反对增设太多方言广播。可是，由于公众的要求太过热切，我们只好循众要求，也因此得吸收更多播音员。

曾经居住北京的党员的家眷如今都住在湖南的一个村子里，距离广播电台

大约三小时车程。共有大约40人从北京迁徙过来，包括20个小孩，其中10个小孩的父母仍在马来西亚从事地下工作。他们被送到中国，交由我们看顾，而他们的父母则冒着被捕的威胁，为党执行危险任务。这些孩子们入读一所乡村学校，由我太太负责照料他们。

马泰前线的中央委员要求增加播音员时，建议吸收正在念中学的党员子女成为播音员。我个人反对干扰他们的学业，但是孩子们却跃跃欲试，最终我只好顺从前线的请求。

于是我们开始训练另一批新人。至此广播电台已有大约30个播音员。我仍然对孩子们的学业突然中断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的学校都关闭了，湖南省当然也不例外。我不顾一切再次向派驻广播电台的中央联络部代表说情，看看中方能否为我们的孩子开办夜校。结果这些代表深感同情，他们本身也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效应，对文化大革命如此冲击青年感到失望不已。开办夜校的事提交到省府，不久后，湖南师范学院的三位教师被派到广播电台，夜校也开课了。

* * * * *

说回1964年，我曾向马共领导层建议说，我该回到前线了。中委会不赞成我的想法。我申辩说，我离开前线太久，再也没有资格领导整个运动了。我甚至请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方便南下。这个请求也被回拒了。事实上，当马共在1961年接纳北京的意见恢复武装斗争时，我已请求调任前线。当时，中委会接纳小章的建议，要我留守北京至少三至四年，以扩展我们和中国领导人及兄弟党的联系。

* * * * *

1969年，尼克松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曾在美国的《外交季刊》（The Diplomat）发表一篇长文，矢言一旦当选，美军将撤离越南战场。他的文章经被译成中文，我接到了一份，并且仔细地研究。

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尼克松飞到关岛，并在那里宣布他的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敲定撤军计划。他说，从今以后，美国只会支持具有对抗共产主义意志的人，美军也不会再卷入亚洲的战事。1973 年 3 月杪，最后一批美军地面部队终于撤离越南。

柬埔寨及越南在 1975 年 4 月解放时，我人在湖南。1968-69 年开始，我们便向泰南的黑市军火商采购武器和弹药。尽管在北京的建议下恢复武装斗争的当儿遭遇诸多难题，但是我们却受到国际形势的鼓舞。我们认为当时有一股锐不可挡的趋势，对共产世界非常有利，特别是东南亚尤其如此。随着金边及西贡政权相继倒台，我们加速采购黑市武器和弹药。这些美国制造的武器来自越南及柬埔寨战场，不仅数量庞大，价格也低廉。当时我们也有充足的经费。

我们主要是采购 M-16 冲锋枪，以及各类武器的弹药。我们希望东南亚的演变继续对我们有利，这样我们就能着手吸收新成员。我们打算建立一支 3 千人的部队。1975 年 10 月，曼谷发生学潮，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超过两千名来自主要大学的男女青年投奔泰国共产党的森林营区。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过后中国攻击越南北部边境。

我在 1975 年 10 月去了柬埔寨，那是红高棉夺权六个月之后。我从北京乘搭专机飞往金边，机上还有波尔博特（Pol Pot）的太太及英萨利（Ieng Sary）夫妇。我要求前往金边是想亲眼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专机飞抵波成东（Pochentong）机场时，我被通知留在机舱内稍候片刻，让前面的贵宾先行离开机舱。一位红高棉高级官员到机场接待我，把我带到以前朗诺（Lon Nol）政权的一位高级将领住过的平房，这所平房非常靠近以前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

红高棉设宴为我洗尘，波尔博特也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第二天，这位红高棉领导人来到我住的平房，冗长地分析柬埔寨共产党的历史。他解说了柬埔寨共产党如何崛起成为印度支那共产运动的分支，以及为何最初是由越南人领导。波尔博特毫不掩饰他对越南人的反感。他追述在法国留学的日子，许多时间都和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党员在一起。然后他又详细叙说自己在 1953 年如何回到柬埔寨，并且在一所佛庙的学院当教师。

波尔博特说了他早期参加高棉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以及日内瓦协议如何抵触他们的利益。于是他在 1950 年代末期集合一群同道，着手重建柬埔寨共产党。1960 年他们在金边铁道工人宿舍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之后，柬埔寨共产党终于逐渐形成新的地下运动。由于对越南人存有猜忌之心，这个重组后的新生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非常审慎的态度对待越共。他们虽有交往，却从不分享党的机密。

在他告诉我这些事的当儿，我不禁想起他是凭着河内的大力支持而掌权。这个事实并没有消除他对越南人及越南共产运动的猜忌。我无法以他的言论判断他的政治方向。我但听不语，因为不想给人留下客人干涉兄弟党事务的印象。

波尔博特继续说，到了 1967-68 年间，他的党认为本身的实力已经足以展开行动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应则是要摧毁整个高棉共产党领导层。该党的第二号人物乔森潘（Khieu Sampan）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行刑前一晚，他得到中国大使馆的协助，成功越狱，潜逃到柬埔寨东北部。波尔博特说他后来与这位副手会合。自此之后他们逐渐建立小规模的游击队。越南很快向他们伸出援手。波尔博特后来访问中国，北京领导人也承诺支持他。

诚如这位红高棉领导人所说，中国开始定时供应武器和弹药给他们。中国安排给高棉共产党的军火通过胡志明小道运送到柬埔寨，但是途中经常被北越军队占为己有，红高棉及越南共产党之间的敌意也因此深化。波尔博特叙述道，在他们就快解放金边的六个月前，他和中委会十分担心急于攻陷柬埔寨首都的北越会捷足先登。

话题转回当下，波尔博特认为，刚解放的那段时间，西哈努克成了他的主要问题。这位前亲王从中国回来，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去中国。波尔博特担心的是，有朝一日权力基础会结集在这个经被罢黜的亲王身上。

我在柬埔寨逗留三个星期，期间参加了一趟政府安排的观光。金边已成了一座死城。全城居民都被迫迁到乡村地区。我认出一些高棉华人，但是他们都很害怕和我交谈。他们十分害怕公开讲华语（普通话）。我在南部海港城市西哈努克市（Sihanoukville）住了几天，然后又在柬埔寨中部的磅同（Kompong Thom）过了一夜。

* * * * *

我回到北京时，中国官员正热烈赞扬柬埔寨的革命成就。我对早前看到的情况有所保留，不过只和几个留在北京的马共领导人谈起这事。我固然认为高棉人是非常出色的战士，但我也担心红高棉的政策正走向偏激。红高棉将市区

的平民疏散到乡区工作，这种做法尤其令我担忧不已。在我看来，那将是灾难的前奏。我告诉他们，长远来说，那是行不通的。

回到湖南时，我料想自己应会受到印度支那三国的解放所鼓舞而兴致高昂。可是捷报频传，总是带给我们心理上的折腾。就意识形态而言，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兄弟党与我们是同路人，而此刻马来亚共产党究竟何去何从？

我们在1959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两年后则改变了，以配合北京及河内，以及他们解放印度支那的意愿。北越、越南南方（Viet Cong）、老挝爱国阵线及红高棉的军事实力在1961年以后逐日扩张，而马来亚共产党只有能力在泰马边境以南的地方发动零星攻击。1970年代，党内自相残杀及前线的拙劣决策，更导致我们的运动很快就瘫痪了。我将在下一章叙述这些往事。

与此同时，“革命之声”看来是当时唯一正常运作的计划。我抱着老怀告慰的心情投入广播电台的工作，也许也是为了寻觅重振旗鼓的凭藉。那段日子让我抽离日益惨烈且需要我插手的党内危机。从柬埔寨回来之后，不知不觉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对“革命之声”的前景感到不安。中国正发生政治剧变，文化大革命逐渐消退。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逝世了。同年10月，毛泽东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捕。1977年，曾在文化大革命巅峰期被批为“走资派”的邓小平，从他的第三次失势中东山再起。

第二年，邓小平已经完全复出重掌大权，华国锋总理虽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但国内外都承认邓小平才是背后真正掌握实权的人。同一年，邓小平推动伟大而不朽的“四个现代化”工程，力求给中国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及国防带来令人惊叹的进步。北京的宣传机器将邓小平的这项果敢计划比喻为意欲将新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新长征”。

1979年，我从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口中得知，中国已正式要求泰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调低对当时的泰国政府的批评。具体地说，北京要求泰共电台别再发表言论贬抑当时的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Kriangsak Chamanand）将军。泰共不肯这么做，还选择关闭在中国领土广播已有数年之久、命名为“爱国阵线之声”的电台。我的消息来源很肯定中国没有下令关闭泰共电台，关闭电台是泰共单方面的决定。我聆听这些事态，但不妄加评论。

我十分理解中国在红高棉与越南作战的时候，供应军事设备给红高棉。中国的供应线必然途径泰国，否则红高棉就无法接收中国的援助。江萨以“救济”柬埔寨的名目提供便利。大部分供应品都由中国飞机运送到泰国。据我所知，

部分供应品并没有交到红高棉手上。中国也接受这是常见及无可避免的纰漏。无论如何，北京的大批援助品都送达柬埔寨共产党。

邓小平曾亲自对我解释，说泰国是红高棉衔接外界的通道。红高棉的高官若要出席国际会议，就得越过泰国边界去曼谷国际机场；若要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接触，同样也得通过泰国。江萨非常乐于相助，因此中国要确保江萨不受中国境内的地下电台的对抗与攻讦，这是关乎中国的利益。如果这个广播电台设在中国境外，我敢肯定那是中国可以接受的。

我当时认为泰共肯定会在中国境外另觅地点设立“爱国阵线之声”，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并没这么做。我一直都不知所以然，也没探问。中共与泰共互有猜忌，倘若我们询问他们为何关闭电台，他们必会认为我们多管闲事，甚至也会怀疑我们意欲将他们说的话报告给北京政府。基于同样的考量，我们最好也别向中国提问此事。

1980年之前，我们的电台广播从未间断。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革命之声”。早几个月前，北京领导人为李光耀到访营造非常友好的气氛。在中国首都普遍感受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十分成功。

我向来认为邓小平对我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他经常给常驻北京的兄弟党领导人作汇报，特别热衷于向我们报告中苏问题，以及中国对中苏问题的看法。我们曾经公开交谈。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都没想要见我。既然我们已有14年不曾交谈，此时约见一定是要与我讨论非常敏感的事情。否则，他只需派人传话即可。

我在当天早晨步入邓小平的办公室，他显得特别友善。我认出一个中央联络部官员，他是在场唯一的第三者，负责记录。邓小平招呼我坐在他听觉正常的一边。他解释说，他的一只耳朵几乎全聋了。我坐下后，邓小平招呼我喝茶。我们边谈边啜饮。他问候我的健康、马来亚共产党、我们的游击队，以及我的中委同志们的近况。一番寒暄过后，他语锋一转，说道：“我把您请到这里来，是想和您谈谈你们电台的事。我们要您把它给关掉。”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李光耀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关闭“革命之声”。邓小平解释说，除非“革命之声”不再在中国领土上广播，否则东盟很难游说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支持红高棉。美国当时极力阻止红高棉参加国际组织。如果柬埔寨要在联合国大会保有一席之地，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票举足轻重。只要柬埔寨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他们在国际社会上就有合法地位，因此能合法出入泰国，通往其他国家。

我谨慎聆听邓小平叙述他与李光耀会谈的过程。我不高兴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认争论毫无意义可言。邓小平的结论和我的回应有很大的落差。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这么对邓小平说：“我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身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邓小平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我想邓小平的反应是在预料之中。他先是面无表情，但仅仅几秒钟之后，他的感受就流露出来了，而且此时的神情特别严肃。我问他，要我们什么时候终止湖南的广播。他答说：“越快越好。”他继续说道：“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邓小平接着表示，他已告诉李光耀，他需要时间说服马来亚共产党。

他说，李光耀再次向他施压，要他尽快关掉电台。邓小平透露说，此时他对这个客人感到不耐烦了。邓小平这么说道：“我告诉李光耀：我马上就可以关掉它。我只要给湖南打个电话，叫他们切断电台的电源就行了。不再有广播！”他说李光耀逼得太紧了。最后李光耀让步，同意宽限一些时间，让“革命之声”关闭。邓小平跟着对我说：“这表示我们得把电台给结束，不是即刻，但得尽快。”

我问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究竟限期是什么时候。邓小平说，联合国大会将在1981年9月举行，因此“您应该在这之前几个月关掉电台，给东盟一些时间去游说。”

我问道：“能否让我们维持到明年8月？”

邓小平迅速答道：“不行。这样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游说争取我们所要的票。”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您得在6月底之前关掉电台。”

邓小平的神色缓和下来，脸上还掠过一丝笑意。他说道：“别担心，陈平。现在我们对电台的事有了谅解，我可以向您保证，在其他方面我们会支持的。”他跟着提到中国会继续给马共财政援助。我们的会谈结束时，气氛要比刚开始

时来得平静和愉快。

我向中委会成员详尽报告此事，包括驻守前线的小章。大家都体恤当时的处境，也明白中国的作法，再和他们争论也没意义。泰南总部并没有要求延长限期。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联络部通知我们，一旦“革命之声”结束它在中国领土的广播，电台的所有设备都归马来亚共产党所有。我们可以带走任何东西，只要不在中国领土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作我们的事。中国表现慷慨，但非常不实际。我们的情况有别于泰国共产党，他们拆除电台后，可以便利地经由陆路迁移这些设备。我们在湖南的发射机及其他相应设备需要大量储藏空间，绝不可能带着这些器材跋山涉水，跨越国界进入泰国的敌方区域。

无论如何，我告诉我们在中央联络部的联系人，我急着在我们的泰南营区设立另一个广播电台，也许中国可以供应所需的配件。这些东西可以经由地下管道私运到泰国。我们得从中国订购一些便携式的无线电器材。我们能得到额外的经济援助购买这些东西吗？中方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我和中央联络部协商此事之际，并不知道原来前线的中委同志们也在探讨是否可能购买小型流动发射机，以取代湖南的广播电台。小章征求了驻守森林的无线电技师的意见，他们认为行得通。不过他们列出在当地市场无法买到的组件。我们能从中国得到货源吗？当然能。

湖南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在1981年6月30日晚上关闭。第二天一早，我们用新的流动发射机从马泰边境广播。几天后，中央联络部的人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位高级外交官投诉，说原本应该终止的“革命之声”还在继续广播。美国人显然知道关闭“革命之声”的时限及安排等详情。

我得知中国外交官建议美国人查一查马来亚共产党广播电台的发射位置，肯定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过后华盛顿再也没提起此事。

此时，我们的广播电台其实已经易名了，如今我们以“民主之声”（Suara Demokrasi）的名称广播。

“阿都拉萨在中国首都受到款待之际，我们袭击了北霹雳的公路及水坝。我们的目的是要宣示，马来亚共产党丝毫不受中国的外交政策所影响。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即各兄弟党都能自由行动，不受北京的指示。正巧在大约18个月之前，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约见我，他是奉毛泽东之命，通知我有关中国共产党有意与马来西亚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事。”

第二十八章
森林谍影与骇人的审判

马来西亚成立前5个月，印尼总统苏加诺下令所谓的“志愿人士”向即将成为新联邦一份子的英属北婆罗洲及砂拉越发动游击战。他认为马来西亚简直就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阴谋，而印尼将“在1965年1月1日太阳升起之前”粉碎这个阴谋。

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7日正式成立之后的12个月内，整个扩大了的联邦概念便显现非常严重的分崩离析迹象。反对力量由里至外发动攻势。

几乎是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马来西亚局势观察家便开始注意吉隆坡的联邦领导人与新加坡领导人之间显露的私人与政治恩怨，他们在观点与方法上的分歧日益深化，无法调和，彼此的张力也蔓延到草根阶层。吉隆坡的马来人对垒新加坡的华人的政治局面于焉形成。

1964年7月21日，适逢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新加坡爆发马来人与华人种族骚乱。保安当局快速地实施全岛宵禁。不过，暴力事件仍然持续发生。截至8月2日解除宵禁时，合计23人死亡，超过400人蒙受重伤。

尽管联邦及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尝试让局势恢复正常，苏加诺却竭尽所能加强他所谓的对抗马来西亚行动。印尼派出游击队员从海上潜入柔佛西岸的笨珍。这批游击队员由印尼正规军率领，但是成员包括了从他们入侵的地区吸纳进来的激进华人志愿兵。雅加达的“粉碎马来西亚”计划（crush Malaysia）升级时，有数百名志同道合的华人从马来亚半岛及新加坡投奔印尼。由于印尼策划不当，

再加上马来西亚保安单位的侥幸与直觉所赐，这批潜入笨珍的入侵者很快就被击溃了。

接着在9月2日，印尼伞兵及志愿兵在柔佛中部小镇拉美士以东的森林降陆。同一天，新加坡的马来人与华人开始发生更多次种族骚乱，而且接下来72小时也间歇性发生种族骚乱。政府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而印尼很快又展开第二轮空降入侵。马来西亚副首相敦阿都拉萨在9月9日飞往新加坡，在当地告诉记者，政府揭发了印尼策动在新加坡制造动乱及种族冲突的阴谋。

对我来说，这比一些政治人物，每逢发生坏事就归罪于共产党的伎俩，更令人相信是合理的解释。我们感到讶异的是，这次我们竟能幸免于成为政府归罪的对象。即使我们丝毫没有牵涉其中，也难免被归罪。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不曾停止归罪我们，将来也不会停止这么做。

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申诉说，他的国家已经沦为雅加达发动“明目张胆及不可原谅的侵略”的对象。印尼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苏惹沃（Sudjarwo）回应说，他的国家可以根据它的意愿对待它的邻国。他说，对印尼而言，马来西亚并不存在。

几个月前，华盛顿对印尼侵犯马来西亚的事立场模棱两可，令雅加达信心大增。如今雅加达公然侵略的证据确凿，这个举棋不定的超级强国不得不宣示明确立场。美国大使埃特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谴责印尼代表的言论，并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说，“（印尼）已经碰触到底线了”。

我在中国密切留意报章详尽报道英国辜卡兵如何开入拉美士制止印尼入侵，以及皇家纽西兰军团第一营在笨珍附近执行扫荡任务。皇家空军部队的标枪战斗机（Javelin）在上空巡逻，防止印尼的另一轮入侵行动，而猎人战斗机（Hunters）则从新加坡皇家空军基地起飞，在拉美士东区侦察印尼入侵者。英军的大猎犬（Bloodhound）导弹系统已在新加坡“启动”，而且据说就要“全面操作”。一连几天，皇家海军慎重考虑调动胜利号（HMS Victorious）航空母舰，连同两艘护航驱逐舰一凯撒号（HMS Caesar）及凯文迪什号（HMS Cavendish）一直捣位处印尼群岛心脏地带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s）。这是要向一再恫言关闭这条国际航道，不让外国船只通行的苏加诺展示实力。英国海军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决定，派遣舰队取道较无争议性的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s）。龙目海峡仍属印尼群岛范围内，但在以东大约700英里的地方。这肯定是英国内阁发出的指示，而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威胁因此得以解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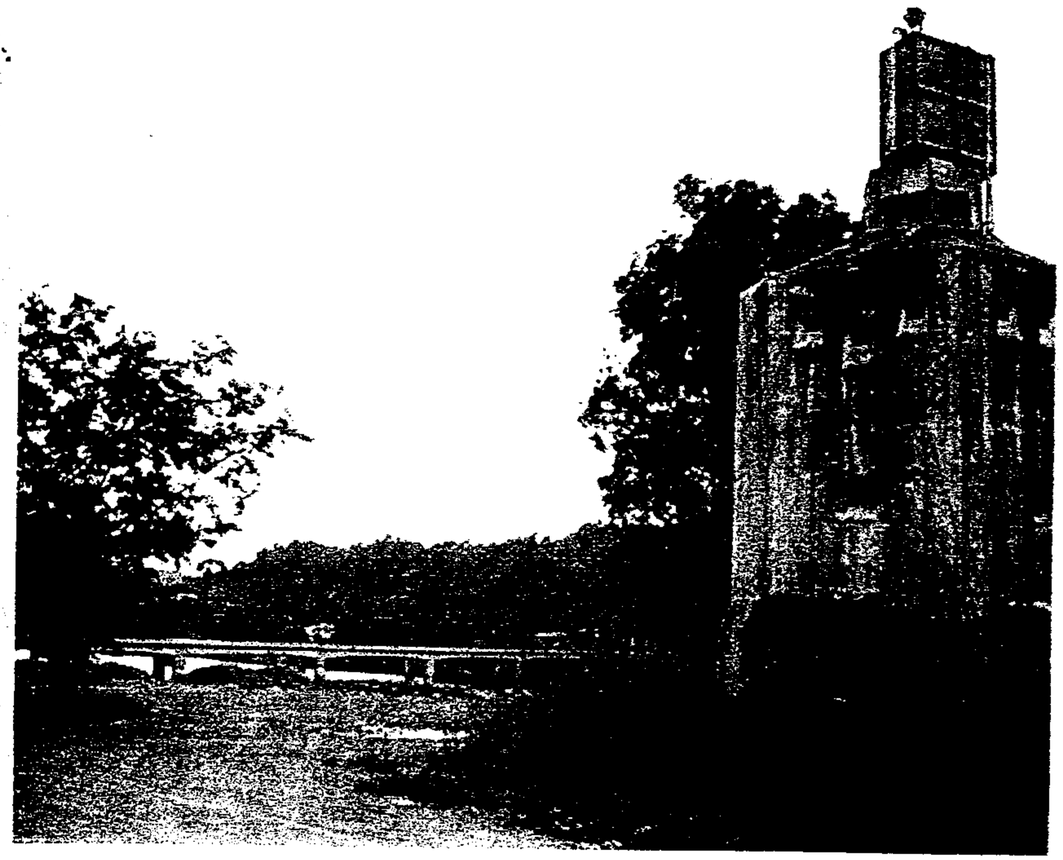
负责抵抗印尼入侵的防卫单位是共和联邦战略后备队（Commonwealth Strategic Reserve）。自马来亚独立以来，共和联邦战略后备队就按照与吉隆坡签署的一项特别防务协议，负起防卫任务。这项协议不久前扩大到涵盖新加坡，不过这支军队必须得到马来西亚政治领导人的正式要求，方能启动。在东姑阿都拉曼紧急要求“共和联邦立即援助”之后，这些单位就展开行动了。另一个月后，副首相敦拉萨到曼谷与泰国商议，也签署了马泰防务协议，目的是要清除马泰边境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马来西亚显然担心我们会在此国家动荡之际乘虚而入。

尽管马泰签署了新的边界防务协议，在勿洞中央机关队的小章却好整以暇，因为他相信我们与泰国政府达致的谅解仍然有效。此外，他也忙着在主要营区部署从马来西亚人口稠密地区前来投奔我们的大批志愿人士。印尼的对抗政策已开始破坏马来西亚的经济，1964年首七个月的对外贸易比前一年同时期下跌了19%，导致失业率升高。

马来西亚内部的政治分歧日益深化，结果新加坡在1965年8月被唐突地逐出联邦。这一事变，以及来自雅加达的军事威胁，令吉隆坡把注意力从共产党威胁中转移出来。这推进了我们吸收人员的工作。此外，支持者给我们的经济支援也增加了，我们因此能推动地下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游击队从原来只有300人至500人的核心队伍增加至800人，在1967-68年达到大约1千人。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骚乱之后，我们的地下人员展开口头宣传，成功号召了大批华人热血青年奔涌而来。我们宣称，若任何人有意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我们已准备好协助他们北上。我们的队伍因此剧增到有1千600名中坚战士。当时，大约一半的游击队员来自马来西亚，而其他则来自泰南。

到了1968年，我们已准备再次将一些单位调派到边界南部。在那些年里，我们策略性地重新部署营区。中央机关队仍设在勿洞北部的同一座森林里，昔罗营区则迁移到昔罗东北部，与最邻近的马来西亚玻璃市州边界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另两个营区处于南下及衔接勿洞与边境的主干公路一带，因此命名为勿洞东段及勿洞西段，它们的所在地非常隐秘，而且和高速公路有好一段距离。这四个营区都有地道。中央机关队的地道最大，也最精细复杂，它共有三层，内有办公室、一间设有印刷机的印刷室、一百人的睡房、一间会议室、一间缝纫室、一间洗衣室及厕所。

1968年游击队南进发动袭击，是按照小章领导的前线中央所拟定的方案行



我方游击队袭击霹雳州北部边界的公路及桥梁的建筑工场后，马来西亚政府设立了好些碉堡，用来防卫那些被视为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带。图中这座碉堡是用来防卫东西大道上跨越人工湖的一座主要桥梁。

事。我们派人侦察原有的行动地带，这项任务其实是搜集情报，同时也和我们的地下网络建立工作联系。但是，倘若具备有利条件，他们也得负责重建某些地方的森林营区。北霹雳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政府保安部队很早就对我们的活动有所警戒，并且部署了应对措施。总部于是决定进一步往半岛南部挺进，将突击队派往南霹雳，走到彭亨州、雪兰莪北部，以及最远到达森美兰边界地带。此时，政府觉察到我们在这些地方出没，因而切断我们的供应线。正当我们盘算着要召回各单位时，我们的交通线路却不幸受阻。

* * * * *

在游击队于 1968-69 年南进渗透马来西亚之前，小章就向我报告，说他相信有一批敌方特务在中央机关队里活动。他们怀疑这批特务是泰国或马来西亚政治部分别安插进来的，要不然就是马泰两国合作的情报收集计划的结果。

被怀疑是渗透者的，一些是泰国华人，其他则是马来西亚华人。此事似乎关系党的存亡，资深中委于是委派营内审查员搜集受嫌疑者的证据。审查工作持续了两年，后来举行了一些审判会，结果一批受审者因“叛徒”罪名成立而遭处决。短时期内看来，似乎防患于未然，而前线中央也发出指示，展开新一轮的南进渗透。

然而，在 1970 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小章报告了第二次的特务威胁。这次说的是有一伙奸细正密谋在中央机关队搞叛变。驻营中委委任的审查组达致结论，指称 1960 年代上队的泰裔新兵中，有 90%是特务。我在北京最亲近的同志阿海，从来就不信服这个说法。起初我保持中立。无论如何，对随后发生的事，我已无能为力。回想起来，不只是中央机关对整个事件处理得十分糟糕，而且我们长期以来对付被嫌疑为特务者的方法也极为错误。

游击队员叛变被视为最严重的叛党罪，而刑罚通常是处决。不过，如果被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供出其他同谋者，他可能得免死罪，但会即刻被解除武装、被禁锢，并接受广泛的再教育。扩大范围的审查工作导致一批又一批被怀疑是特务的人为了自保而供出越来越多的所谓同谋者。依照处理敌方特务的既定程序，必须迅速召开森林审判会，并即刻执行判决。这种做法自然会令中央机关队的队员惊人地耗损。

中央（这里指的是中央北马局）根据审查员的报告，通知其他三个营区，说被安插进来的特务正对他们构成威胁。这种做法有别于从前控制威胁的方式。小章甚至将多份悔过书里供出的被嫌疑者的名单发送给其他营区，造成情况恶化，而且蔓延开来。

受审者非常清楚审判会结束后，他们就会被带到森林里枪毙，因此目瞪口呆的受审者会慌忙抖出同志的名字。当一个营区的被嫌疑者将另一个营区的游击队员也牵连进去时，就造成营区之间相互猜疑。极其明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诬陷的人，与真正的特务威胁并无关联。

在这些森林审判会上，大批来自中央机关队及勿洞东段的游击队员被判特务罪名成立。召开审判会的单位的所有成员都得出席聆听控状和证据，然后以举手方式裁决受审者的罪名是否成立。当营方决定审判一个人，大家通常都先认定他一定会被判有罪。任何人若相信受审者无辜，并敢公然表态的话，他本身就立即会被怀疑。因此，坚持自己无辜者，通常得单独与三、四名指控者争辩，形成一对三或一对四的局面，其他人则明哲保身。在这种情况下，不认罪者就会被宣布为“死不改悔”而应被处以极刑。这种延续自日治时期的审判方式，并没有上诉的程序。

这些可怕的审判，在 1969 年及 1970 年爆发，主要发生在中央机关队及勿洞东段。昔罗及勿洞西段这两个营区反对总部处理特务危机的手法，结果都造反了；另一方面，勿洞东段则与总部站在同一阵线。

昔罗营区在 1970 年召开他们所谓的“党会议”，大约 100 人与会，不过只有半数是真正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并没有任何中委留驻昔罗及勿洞西段。我看这是部队管理上最为严重的鸿沟。昔罗及勿洞西段都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在他们的营区，这是相当正确的想法。提到一两个人的名字或许还可以被接受，可是被牵连的人数却不断增加，以致令人难以置信。昔罗和勿洞西段甚至指责说，由于特务渗透的说法过于不寻常，显示了中委会本身已被敌方特务所控制。

他们指责小章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受苏联指使办事的人。当然，小章曾经好几次访问莫斯科，他的确很明显地推崇苏联的科学成就。但说他是受苏联指使的人，这是胡说。小章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他无法认清所谓的敌方特务渗透营区，其实是外面制造的假象，目的是要使马来亚共产党自内部崩裂。事实证明了这的确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策略。

两个分裂出去的营区成立了各自的中央委员会。他们自称为造反者，并且建立自己的党。昔罗营区宣称他们是“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而勿洞西段营区则自命为“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昔罗营区甚至切断与中央机关的所有无线电联系，显示今后有意独立行事；勿洞西段营区还和中央机关保持有限的无线电联系，但是他们的中委会拒绝服从小章的命令。勿洞西段的成员曾相当不情愿地对他们营区的特务危机展开审查。

文化大革命的过度狂热造成所有四个营区变得妄想多疑。我们的游击队开始感受到一波又一波的阴谋。他们怀疑特务审判行动其实是敌方特务幕后操纵的，目的是要粉碎整支部队。他们认为自己掉入了自相残杀的陷阱，整个党最终将自我毁灭。昔罗及勿洞西段拒绝参加我们的“第二紧急状态”行动，因此参与这些行动的游击队员都得从勿洞东段调派。不过这两个分裂出去的营区却展开吸收新成员的工作，以致他们的成员从分裂时的合计 250 人剧增至大约 500 人之多。

*　*　*　*　*

直到 1973 年，我才接到关于中央机关队和勿洞东段的审判及处决的详细报告。报告内容含糊及未经证实的人数困扰着我。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党将得面对现实，解释这场特务危机牵连之程度何以如此惊人。我个人深感忧伤的，是来自彭亨州的二战宿将阿仲及我少年时代在实兆远就已有来往的同志伍天旺，也在这场肃反行动中被处决了。

由于受到阿仲妻子的一位女性朋友的牵连，1971 年阿仲在勿洞东段营区被捕。他不作解释便招认了，这是他的极严重错误。阿仲身为中委，如果他坚持自己清白，大可以要求重审其案。阿仲被控叛党罪，但是审判会上提出的详情却与他背负的指责毫无关联。我接到其案件的报告才得知内情。以这种方式对付一个把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人，何其可耻。我回想起莱特阴谋集体逮捕马共高层领导人的那些年头，阿仲如何一次又一次地逃脱；又是如何在森林里先后与日本及英帝作战。我对他的可悲下场耿耿于怀！

我得知伍天旺是在中央机关队被处决。我非常熟悉他的为人，因为他是我在党内的其中一位导师。伍天旺是实兆远一名裁缝的儿子，大概比我年长两、三岁。我很清楚，天旺平时很爱讲话，而且的确经常讲太多话了。可是被捕后，

他却不肯招认，反而出奇平静，甚至近乎冷淡地对审判者说："你要杀我，就杀吧！"我知道这情节时，心里十分纳闷。天旺是个连听到枪声都会害怕的人，这点早已出了名。面对即将来临的死期，他要求行刑者给他三根烟和一小杯米酒。天旺的最后要求获得批准。

我接到的报告也提到李安东的妻子林英婷的案件。她在中央机关队面对两项通敌指控，而且两罪俱立。她和伍天旺一样，也是我的同乡。她曾是一个羞怯的女生。我和她的其中一个哥哥曾是好朋友，后来还一起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他哥哥惨遭日军折磨之后，不但泄漏情报，还转而成为侵略者的活跃特务。林英婷和李安东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工作之后，我和她才比较熟络。当时她已从一个害羞的女生蜕变成一个自命的理论家了。

报告说，李安东有出席林英婷的审判会。他和营区的其他同志一起聆听林英婷的罪状，也和其他人一起举手赞成判她死罪。林英婷被捕后，李安东曾劝告他的妻子招认，但是林英婷不肯这么做。我相信李安东有权力代表林英婷要求缓刑。李安东毕竟是营区的第一号人物，也曾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宣传主任。就党职等级而言，他的职位在小章之上。问题是他从北京回到边区后，便自我孤立，与其他前线领导人保持距离。回到边区时，李安东曾好几次笼统地批评说，他离开了十年，边区没有任何改变。他提出一些冒险的主张，包括把泰国当作其中一个敌人，以及向敌人发动连队规模的攻势，都不为北马局所接受。自此之后，小章就崛起成为实际的第一号人物。

几年后，李安东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的妻子曾参与对抗小章及北马局的活动。他声明这些活动并不是针对陈平领导的中央委员会。这是非常奇怪的声明，因为北马局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委会成员。

* * * * *

此时党的财政状况是个危急因素。我们一如既往，定时从北京输送经费到总部。可是肃反行动展开后，其他三个营区的经费发配即刻就中断了。在叛变扩大之前，昔罗营区已经接收了一笔可观的注资，以便采购武器。他们与总部闹意见后，就用这笔经费来维持日常运作，而不是采购装备和弹药，。

昔罗营区脱离我们之后，曾经一两次越过边界，在玻璃市州发动小规模攻

击。他们也尝试扩展势力，在吉打州及槟城招收成员，可是却没有严格遴选，也未鉴别新成员的背景。这些新成员无法忍受森林的生活压力，许多人最终成了逃兵。

昔罗集团不曾试图侵犯中央机关队的活动范围，部分原因是勿洞西段和昔罗之间有一个特别地带，是由陪我一同出席华玲和谈的拉昔迈丁领导的忠诚马来人单位所控制。拉昔迈丁后来被调派到吉兰丹边区，负责加强当地的马来人阵容。

其时，勿洞西段有能力和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地下网络进行联系，并且引诱相当大批想成为游击队员的人北上越过泰国边界。这些新成员大多数来自雪兰莪州及柔佛州。由于非常接近勿洞市镇，勿洞西段叛军对勿洞居民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能从捐款及向商家派捐得到更可观的经费。由于派捐非常成功，他们不但能够自给自足，甚至还开始有财政盈余。

按当时的形势看来，勿洞西段企图从勿洞市镇越过主干南北公路，向东扩展，然后抢夺靠近霹雳州边界的地域。这一动作严重侵犯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南进的路线直接从这里经过。我们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离开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将反击。他们拒绝撤离，还觊觎我们的埋粮处。我们只好极力防卫，并且设立一些埋伏阵地。结果我们至少两次成功伏击勿洞西段的巡逻兵，这导致后来勿洞西段发动宣传战，宣称"旧马共"企图将他们赶尽杀绝。

* * * * *

我们的内部纷攘正值高潮之际，传来消息说，在 1970 年 9 月接替东姑阿都拉曼的敦阿都拉萨将在 197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2 日访问中国。他是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访问北京。马来西亚和中国显然已用了好些时间安排正式建交。的而且确，敦阿都拉萨访问北京期间，与周恩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恢复正常关系。阿都拉萨在中国首都受到款待之际，我们袭击了北霹雳的公路及水坝。我们的目的是要宣示，马来亚共产党丝毫不受中国的外交政策所影响。这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即各兄弟党都能自由行动，不受北京的指示。正巧在大约 18 个月之前，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约见我，他是奉毛泽东之命，通知我有关中国共产党有意与马来西亚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事。在这次的会面中，

周恩来向我保证，中国政府会严格遵守毛泽东的指导，将国与国的关系和党与党的联系分开。

从各方面判断，我们认为我们在霹雳州发动的有限袭击，发挥了作用。我们没有杀害任何人，只对准工地的装备，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不但传达出去，也得到了理解。西方的评论大意是指中国并没有指示马来亚共产党发动袭击。

* * * * *

勿洞西段在 1974 年 8 月 1 日与马来亚共产党正式决裂，他们发表一份内容浮夸的宣言，而这份宣言实际上是向他们所谓的“陈平领导的修正主义集团”宣战。在这份充斥着毛泽东式措辞的宣言中，他们呼吁“党军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们”要“分清香花毒草”，要拒不服从旧的领导层，以及剥夺他们所有的权力。这份宣言指责党的“老修古”利用 1969 年 5 月 13 日吉隆坡种族骚乱后的局势。他们说我们展开肃反行动的具体目的是要毁军灭党，进而永远扑灭革命火种。

这之前三个月，勿洞西段的同一批造反者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在光天化日底下成功刺杀了途经吉隆坡街道上的马来西亚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拉曼哈欣（Tan Sri Abdul Rahman Hashim）。到了 10 月，勿洞西段造反者渴望利用成功刺杀警察总长及其他激进行动广作宣传，于是在半岛各地展开挂红旗和分发传单的宣传运动。为了广为宣扬他们新近自命的马列派组织称号，他们在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彭亨、槟城及吉打各州升起红旗及广派册子。他们甚至将红旗高挂在吉隆坡独立广场的电缆塔上，也在首都各角落分派册子。

面对如此公然的挑衅，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11 月 1 日，也就是红旗及册子首次出现的一个星期之后，当时敦拉萨政府的内政部长丹斯里加萨里沙菲宜（Tan Sri Ghazali Shafie）发表声明，详细胪列联邦政府过去超过十年来所收集的共产党活动简报。这份声明说，马来亚共产党在 1967 年发生一场未遂的造反，而我在造反中侥幸逃过被暗杀。此事造成马共内部分裂。据报三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决裂，起因据说是马共第八支队指挥官一江拒绝执行处决敌奸疑犯的命令。

这份政府声明将我们称为“旧”马来亚共产党，它也提到泰南两个分裂出来的阵营：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及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这份声明跟着提出非常准确的统计，指出马来亚共产党共有 970 名武装游击队员、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有 150 人，而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则有 260 人。另有 200 名游击队员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活动。

丹斯里加萨里显然获得相当好的统计情报。我只能猜测，内政部长和他的幕僚当时是在发动宣传攻势，目的是要加剧共产党阵营的分裂、贬低我的领导声望，以及遏制更多所谓心灰意冷的青年投奔共产党。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极尽抹黑我的人格。

报告说，当我发现有人密谋对抗我的领导时，我即刻下令处决 20 名被视为“政府特务”的新成员，而且我后来相信了游击队营区“遍布特务”的说法，并因此大开杀戒。它指责我在 1970 年 1 月或 2 月间下令处决所有在 1962 年之后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年龄 12 岁以上的新成员。

我不曾见过加萨里，但对此人略有所闻。我知道他是个态度强硬的行政官，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称呼他“Guz”。他和我年纪相若，我肯定他在 136 部队的作战贡献。我曾与 136 部队有密切关联。我判断他在抗日战争时累积了收集情报的宝贵经验。凭此背景，再加上他所掌握的关于陈平的情报资料，我真想问一问他，他怎么会相信我会将小孩子当作彻底消灭的对象，而干掉他们。我后来认为他必是根据宣传人员的建议行事。我肯定情况是如此。

战争时期的宣传对象－群众，从来不会严格检验宣传背后的动机，以及它们想要营造的心理效应。如果你被权力机关贴上在战争中集体屠杀儿童的标签，很少人会去考究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这种片面之词。当你不断把很多淤泥往墙壁上抛掷，它最终必定有淤泥。1974 年 11 月，英国殖民者及联邦政府在所有场合用相同手法加倍指责我是杀害儿童的凶手，因此根本不难想象当时陈平的形象是何其面目可憎。

* * * * *

昔罗叛军虽然自命为“革命派”，事实却证明他们的斗志远不及勿洞西段的“马列派”，而且他们还曾试图拉拢我站在他们那一边，一起对抗小章和总部。

他们找上我们在曼谷的通讯与交通中心的一名密使，向他说明他们的申诉，并要求他转达给在中国的我。

技术上而言，这名密使应该向身为代总书记的小章报告此事，因为小章是边区总指挥。然而，当曼谷警察突袭一些党员的住家，并将他们收押后，事件变得复杂了。这位密使担心自己也在通缉名单内，因此决定直接向我报告。公然搭乘飞机到香港的确太危险了，他于是选择取道陆路。

尽管他们不满意，但造反派仍要我承认他们成立的伪中委会。我认为他们的要求非常荒谬。我不能和我的中委会搞对抗，尤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在前线，而我人在后方。我和同样住在中国的政治局委员非常全面地讨论了这场危机。阿海非常不同意小章的作为。他根据本身的经验，坚持说，这么多特务渗透进党的说法十分不寻常。政治局唯一的女性委员阿焰则强烈反对阿海的观点，而我保持中立。整体而言，小章获得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尽管）中央机关队和中国（的马共中央领导）意见分歧。

小章给我呈上报告，陈述他的说法。他阐述了他如何发现游击队里的新成员当中有特务，以及他如何着手审查及召开审判会，以肃清奸细的经过。他的报告是经由无线电发送，因此只能转译成简短章节。处理这样复杂的危机，这肯定不是令人满意的方式。我问小章，我该如何答复昔罗阵营？我的处境非常微妙。我无法不顾及小章的感受，断然否定他那认为必须采取激烈的正确步骤以应对那场特务危机的观点。

发生造反之前，昔罗游击队的资深领导人白丝木突然病重，怀疑患了癌症。他被送到中国就医，结果发现他只是患上胆囊病症。手术完成后，白丝木逐渐康复，而当时我们正忙着应付边区造反。我和小章决定让那名准备回去的密使陪同康复中的白丝木回去前线。他们两人从陆路回程。

这名使者奉小章之命护送白丝木去中央机关队，以讨论修补裂痕的事。会谈是举行了，但是白丝木回到昔罗营区后，他的战友认为他是中央机关队图谋重夺领导权的工具。他被限令在一个星期内离开营区，结果他很快又回到中央机关队里了。

早前的肃反行动造成我们在与造反部队对质时，处于易招怨恨的处境。我们认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游击队员，只不过由少数不满我们犯下错误的机会主义者所领导。无疑地，我们不能把他们都当作是反动分子。

这张档案照片摄于 1946 年 5 月，白丝木（右）随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到英国参加胜利游行期间，在伦敦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留影，与他合照的是邓福隆。白丝木曾在 1950 年奉北马局之命，负责与泰共建立地下联系。

勿洞西段很快就向那些在紧急状态时期被驱逐到中国的同志们招手。这批人数量十分可观。陈平被“被驱逐出境者”刻画成一个在后方，过着舒适生活的人。相对于此，“被驱逐出境者”的生活状况则非常艰苦。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很快就相信我遗弃了他们。

我肯定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面对的难题，但是我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同志真的无能为力。中国领导人禁止我和被驱逐到中国的同志联系。他们被当作华侨，而我实际上只是外国客人。他们不再是我马共的党员。

勿洞西段的鼓动者不理北京的规定，继续吸收那些被驱逐到中国、心存怨怼的马来亚华人。他们发觉竟有这么多同情者之后，便迅速在中国广东省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分部。1980 年中，勿洞西段游击队未经邀请，便派出四人代表团搭飞机经由香港到广东。他们在广东要求到北京与中共中央联络部会面。

在中国首都，中央联络部官员聆听他们陈情之后，坚持这是党的内政－即毛泽东所说的“内部矛盾”，因此他们得和现居中国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中方向他们建议的会谈人选包括阿焰及陈田，但是他们都拒绝了，并且坚持只和陈平谈。

此事反而为我们的正式会谈铺好了路。否则，我恐怕也不会考虑到要有这场会谈，因为我知道小章必会极力反对，而他的不悦将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同意会见代表团团长张忠民。此君的名字含义是“忠于人民”。会谈在北京举行，我从湖南的广播电台专程前往北京赴会。

中央联络部官员决定在我抵达北京之前，先和这群造反者直接会谈。他们明确地告诉这四名代表，小章从不被视为“修正主义者”或敌方特务。他们解释说，小章曾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他们非常了解小章。他们可以保证小章的革命资历。他们也说，陈平并无过失，发生纠纷时，他根本不在泰南。

中央联络部人员央请代表团秉持两项具体宗旨与我会面。一、我们的会谈必须以结束马来亚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为目标；二、不同派系之间必须停止公开武装冲突。我到达北京时，中央联络部向我汇报情况，并要我专注于解决他们已向张忠民的代表团提出的议题。北京官员非常了解问题所在。他们知道这些人已经泥足深陷，也理解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成和解方案。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之前曾尽力化解问题，以及这些努力何以徒劳无功。

张忠民首先为攻讦我的领导地位而道歉。我告诉他不必为此事道歉。然后他便将话题集中在肃反行动。他问道：“你怎么看小章所下的命令，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决?”于是我提醒他要记得党的惯例。虽然我身为总书记，但也不能背着党中央批评党的决策。他最后终于向我保证，情况将会改善。不过，当他回到勿洞西段后，纠纷仍在。据我所知，他甚至对追随者说，陈平并不同意小章处理特务危机的方式。

较后，我要求中央联络部允许张忠民的中委会里，曾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委员与我在北京会面。与此同时，我也要求允许昔罗营区也派来一个相等的代表团到中国，与我个别会面。

两方人马及时抵步。昔罗代表先抵达。他们非常坦率，我十分欣赏他们的率直。他们要我坚决地表态，到底马共北马局在 1970 年肃清被疑是特务的游击队员，是否正确。我再次依党的惯例行事。我不能背着党中央发表个人的意见。

昔罗代表把话说白了，除非他们得到明确的答复，否则继续与我会谈也毫无意义。我不在意他们这样唐突的态度，只要我们能够结束党内的派系斗争和武装冲突，我就心满意足了。后来看到的结果是昔罗阵营对抗中央机关的方式，仅限于以册子攻讦中央机关，我们再也没有和这群造反派发生小规模战斗或驳火。

相反的，勿洞西段曾经向小章的部队发动四、五次武装攻击。结果这些动作反而造成他们本身的游击队员士气低落。这些游击队员不要成为一个自相残杀的运动的一分子。

这两个阵营的造反派都要我正式支持他们对抗小章。他们并没有觉察到我早已表明立场，即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意见支持小章。即使在造反派代表团抵达中国之前，中央联络部一位官员已婉转暗示我应该在情况恶化之前发表公开声明，说明我对肃反行动的立场。我解释说，我要是公开支持造反派，必将加剧党内分裂。如此一来，马来亚共产党将自毁。

最后，马列派及革命派双双向泰国政府投诚。

到了 1987 年，他们在泰国政府特别安排的两场投诚仪式上，逐一缴械，然后换回一朵红花，并拍照。那些参与所谓“重返社会”计划的人，被错误描绘成陈平所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

我觉得何其讽刺的是，这些投诚的人竟然是过去超过 15 年来自命为“革命

派”与“马列派”，以强调其革命热诚者。他们自诩为出众的革命者，而且严厉攻讦我方领导人为“修正主义者”。对于投诚，他们都有各自的解释和理由，我曾经花了些时间尝试跟进此事，但坦白说，后来我放弃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当那群造反者在 1987 年投诚时，他们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声称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我为那些部队成员感到难过。然而，当时我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不想被非议为羞辱异己。

第二十九章
和平之门打开

我们决意以华玲会谈的教训作为指导。从 1955 年开始，马共誓言，假如要向敌人投降或者接受任何形式的屈服，我们决不寻求和平。我与政治局和中委会委员都对此坚定不移。现在，1980 年代末，与华玲会谈那个时候一样，我们真正要和平，不过依然必须是在光荣不辱下达致的和平。这种和平必须有尊严，这是 33 年前我与东姑和马绍尔会谈中被拒绝的。我们的同志经受了 40 多年的磨难之后，想得到的还是一样。

我们的总部坐落在勿洞北部，由陆路前往大约 50 公里，从大路进入腹地还有一段的路程。1987 年初，分裂派系投降之后，泰国军方向在那里的我们伸出和平触须。他们要我们同意分裂出去的与造反派先前接受的那些条款。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些建议。马列派和革命派追随者已经缴械投降。我们不会这么做。华玲会谈后的部分决议，包括如何处理我们的武器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决不把武器交给敌人，不管是在公开的正式仪式上或者私底下进行。我们坚决认为，两者都是投降的表现。不过，我们同意在监察下加以销毁。即使这样，我们还附有某些条件，例如成立一个监察机构。

我们拒绝了泰方之后，他们的南部军团便即刻展开了可能扩大为搜索与摧毁的行动，目的是追剿我们还保留下来的战斗队伍，强迫我们就范。那个时候，我们有五支主力游击队。在勿洞北部森林里的总部随时可以转移。我们的勿洞东部的同志也可以随时转移，在勿洞南部突角地区展开战斗。在陶公府东部我们有三支马来游击队，一支正向马来西亚北部边境的深山老林移动。西部，我

们有一支华巫联合部队在也拉地区活动。我们总共有大约 1 千 300 名游击队员。

从 1987 年中开始，泰国重兵逼近，并一直延续到 1988 年。我们配备现代化的枪子，在重重陷阱的保护下，以自制的迫击炮还击，战果辉煌。泰军对我们狂轰烂炸，海军炮兵也加入战斗，甚至连他们的精锐海军突击队也来了。在长达一年的战斗里，我们损失了四名队员。泰方伤亡较惨重。

我们的游击队当然不可能打败泰军，取得最终的胜利。马共的政治领袖与司令都认识到这一点。泰方也不例外。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双方都心照不宣，马共有能力打一场森林持久战。如有需要，我们能继续战斗下去多十年或者更久，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消耗泰国的国防预算，政府也因此失去开发边境富饶州府的机会。

在 1988 年夏天的北京，我第一次接到报告，说泰方又主动建议和谈，我即刻下达指示，授权小章全权代表马共展开谈判。在所有问题谈妥之后我才露面。小章与我都知道我们可以谈判的范围——尤其是有关“不投降”的基本原则。小章与李安东都认为泰方开始表示善意是非常初始的表态。接着，双管齐下的和平主动开始酝酿。第二管道来自马来西亚，相当明显，是曼谷与吉隆坡之间经过协调的结果。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政府与我们的马来部队接触，但是层次相对较低。这些交流也是试探性质的。我们受邀派出马来同志代表团到槟城，最后安排一架直升机从马方边界的某个双方同意的地点把他们接走。

这一次我们的马来游击队派出中级干部与吉隆坡代表会谈。在槟城，我们的人员与马来西亚政治部官员见面。一些来自联邦警察总部。其他是槟城当地的官员。结果是马方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派出的是被视为低层的代表团，他们无权谈判。他们急于要向马共展示半岛的繁荣昌盛。假如我们的代表团有更高的权力，槟城只不过是游览观光的第一站，可能还会包括其他城市。这是 1988 年末。

我们的马来同志与马来西亚官员的第二次初谈在合艾举行，同样，没有什么进展。感到和平努力漫无目标，泰方介入了。一名高级军官向我们的代表团建议，马共的总书记也许应当参加在内。他甚至承诺协助派遣一名马共特使到中国会见我。接到泰方的建议之后，小章即刻致电北京通知我。当时我正在医院作体检。我同意随时会见任何人。至此，交流管道是由泰国军方直接向马共总部，而初步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小章同意冒险从总部到合艾去会见泰国军方。他们为我们的五人代表团安排了一间特别的平房。由于小章病倒，他由

一名护士陪伴。在场的还有我们的一名能说流利泰语的翻译。小章携带一个无线电发送机与总部保持联系。

讨论顺利进行，一直到小章觉得似乎有必要亲自与我见面，讨论泰方向我们提出的各种献议。我们迅速作出决定，安排小章乘飞机，先到曼谷，再到香港，转飞中国。无论如何，北京当局谨慎从事。他们坚持，小章与我之间无论什么会谈，都得在中国境外进行。他们不要在会谈中扮演任何角色，以免会谈失败。因此，小章和我在澳门安排了一个秘密地点，详情不让泰方知道。北京的立场非常严格，以致他们拒绝给我签发正当的旅游证件，以让我到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去。我只好采取非常手段，以假名取得一本真正的菲律宾护照。这是通过菲律宾共产党一名驻北京党员的马尼拉联系员办理的。

那是 1988 年 9 月。小章在澳门一家宾馆，离开由泰方安排的警察上校护送员，假装要到中国去会见我。我在一座旧式殖民地房屋中的一间无电梯的私人公寓三楼等候。我们已经 25 年没见面了。我们相互拥抱。激动不已。他显得非常疲惫和虚弱，叫我大吃一惊。他脸色苍白，无精打采。起初我以为他患上疟疾。经过第一天的讨论之后，我才了解，他病得实在很重。显然不只是疟疾那么简单。第二天，我劝他去看当地的一名中医。他需要劝服。他坚持说，他正在接受合艾的一名专科医生的治疗。最后，小章听从了我的劝告。不过，那名澳门医师没有给他作全面的检查。医师只是给他更多的药物控制发烧。

我们要谈的事情很多。我们可以检讨别后 25 年的情况。不过没有时间了。对同志们，谁还健在，谁已经牺牲，我们只是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我提起了 1970 年代的肃反事件。我记得骇人听闻的审判和处决，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小心翼翼面对我脆弱的同志。用词谨慎，我告诉他，我们处理敌奸危机导致肃反扩大化。小章听了我的评论后，显得十分焦虑。于是我便即刻转换话题。我也决定把所有往事和闲谈留到一起用午餐或者晚餐的时候。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讨论和平的前途。

小章开始向我简报泰方和马方提出的各种途径。他坚信，他们双方都真正希望对悬而未决的马共问题找寻解决方案。他向我保证，他的谈判对手都是能全权作出决定的泰国官员。他特别提到一位泰国很高级的军官，陆军少将吉蒂（Major General Kitti Rattanachaya），他当时是泰国南部第四军区的副司令。他是泰方主动和谈的实际推动力。

接着，我告诉小章有关今年较早时在香港开拓的另一个和谈管道的一些最

新情况。马哈迪已经发出绿灯，允许与中国政府机构有来往的香港商业机构和在中国的我们联系。从这些管道传来的信息是马来西亚渴望认真谈判。

当时担任马来西亚警察政治部主任的拉欣诺带领他的一位前副手姚光耀，肩负起一个特别任务。那位经验特别丰富的华族官员负责在香港的事项并充当协调员。在向我转达消息的时候，北京的中国负责人没有透露马方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只是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的代表通过商业管道飞往香港与马共接触。通过这种途径传达的这些消息最初都没有提及我个人的名字。

小章与我谈到深夜。我提出的其中一点，就是有关缅甸共产党和尼温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性质。马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根据缅共领袖德钦巴登顶（Thakin Ba Thien Tin）的说法，缅甸会谈失败是因为缅共坚持仰光正式承认他们。

我向小章透露，邓小平自 1981 年以来，就鼓励我寻求和平方案。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后，联络部向我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的武装斗争的经援不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事实上，从此中国对我们的经援已有计划地递减。

当然，我早已密切注意北京与吉隆坡关系的发展。当邓小平 1978 年访问吉隆坡的期间，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就宣称，从今以后，中国把她与马共的关系视为历史的事实——必须搁置一旁。接下来的数月，中国强调毛泽东提出的维持国际联系的双层政策。一个是与兄弟党之间的党对党的层次，另一个是国对国的层次。后者是优先关系。中国总理赵紫阳 1981 年 2 月访问泰国期间对这种双层举措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但是到了 1980 年 3 月，胡先翁首相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以最鲜明的态度表示，假如中国坚持她对马共的‘党对党’和革命之声继续广播的支持，那么，吉隆坡便有权对这种双层政策安排作出自己的解释。3 月 14 日，马来西亚以国对国层次欢迎中国外长黄华官访几个小时之前，吊死了三名已经扣留了三年的华族共产党员。

有两个在吉隆坡半山芭监狱被处决。他们是林文昌和黄福南，都是 23 岁。他们在 1978 年 3 月，因为谋杀霹雳州警察总长古传光而被判死刑。这名退休警官 1975 年 11 月在怡保被杀。行刑的时候才揭露，林文昌还面对另一项指控，即在 1974 年 6 月谋杀马来西亚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拉曼哈欣。那天第三位被送上绞台的是 25 岁的李洪泰（译音），他在 3 年前被定罪，罪名是拥有 2 支左轮

手枪、一支手枪和 27 发子弹。这三名被处决的均属于勿洞西区二区自称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的分裂集团。

我告诉小章，只要我们谨慎谈判，我有信心，这一次会成功。从华玲会谈到现在，我们对和平的先决条件依然不变。不缴械。不投降。

中方给我的意见是把谈判交给前线同志。只在一切谈妥，准备签定协议的时候我才公开露面。鉴于在华玲会谈上的种种问题，我同意这意见并且照办了。我因此向小章强调，我将不牵涉谈判。他必须在中委会前线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处理一切。他完全同意。因此，我们抱着积极的期待分手。我们都觉得，溜走了将近 40 年的和平现在已经指日可待。

虽然身体欠佳，当小章抵达曼谷受邀为泰国陆军总长兼代最高统帅查哇力上将（General Chavalit Yongchaiyudh）的嘉宾的时候，都是精神焕发。我们认为，查哇力这一次的表态，证明了泰国的诚意。当时泰国的总理是查猜上将（General Chartchai Choonhawan）。在曼谷呆了几天之后，小章前往合艾，住进了一个泰方提供我们使用的别墅，这个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由于病弱不堪，不能回返森林，他请求中委会的几个成员前来与他会合。李安东当时实际上已经在去合艾的途中，正抵达森林的边缘，听到马来西亚电台在广播中引述到泰南访问查猜上将的谈话。根据报道，泰国总理说，与马共展开的投降谈判进行顺利。一听到“投降”这个字眼，李安东一行便即刻调头回返他们的营地。泰方迅速澄清了报道中的谈话。他们向小章保证，总理没有提到马共投降的事情。

小章回返合艾之后，拉欣诺从吉隆坡前来进行初步讨论。他想知道我是否给我的副手发下任何特别指示。小章告诉他，陈平希望谈判能顺利进行。交谈当中，小章传达了我的要求，就是，不像华玲会谈那样，所有谈判都必须公开透明。这样，记者便能列席并逐字报道。我们认为胸怀坦荡，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立场能够受到公众的公开审查。这个建议立即被拒绝。对方争辩说，这样的安排对谈判的顺利进行没有好处。我们接受了这一点。不过，对我们的第二个意见大家都同意了，就是，任何达致协议的最后签订必须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进行，面对世界报章。

我们主张，假如达致任何协议，都全面地公开向公众宣布。马方不同意这么做，并提出坚决的主张，认为某些方面必须保密。他们坚持有些问题太敏感了，不能公开。我们最后勉强同意对部分协议保密。

接着，拉欣诺问小章，马共是否准备放下武器。小章深知我在这方面的主张，早已作好准备回答他。他向拉欣诺保证，只要谈判进行顺利，将会找出一个能被接受的方法来处理棘手的武器问题。拉欣诺似乎对这个答复感到满意，而通往和平的大门最终打开了。大家同意，谈判将在泰国的旅游胜地普吉岛进行。

他们要求我们提呈马共代表团的名单，眼前即刻又浮现过去的沟通困扰。由于某种缘故－小章的病情加重－中委会提呈了我、陈田和拉昔迈丁的名字。华玲会谈的名单再现，由于这个缘故，不大能被接受。基于我已决定留在幕后，除非一些较敏感的课题已经达致协议，因此我即刻改正了这个错误，我安排政治局委员再润（Zainon）－在党内她称为阿焰－担任我的代表。驻北京的阿焰将前往泰国参加每一轮的谈判，然后回来直接向我汇报。事实上，她不单是我的特使，同时是代表团的顾问。

我们故意把李安东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们不想过度强化我们的代表团而重复华玲会谈的错误。1955 年 12 月，东姑占尽宣传的优势，宣称我的出席表示我渴望寻求和平。尽管犯了一些错误，但要在 1955 年达致一项合理安排，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我更加灵活，我相信，英国也会寻找藉口，阻挠我提出的一切建议。不过，这一次，我感觉到了一股真诚，这是华玲会谈中对方所欠缺的。

又一次我们确立起最高和最低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的最高要求是承认马共是一个合法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要求的成功希望甚微。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拘留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犯。我们估计，在半岛各扣留营里有大约 100 名共产党员。与释放政治犯问题相互关联的是要求取消内安法令。同样，这也是一项我们不敢寄以厚望的最高要求。我们进一步要求拆除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纪念碑上是马来西亚和英联邦军人脚踩一位倒下的马共游击队员的造型。我们要他们承认我们对独立作出的贡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将正式遣散我们的军队并要求他们支付遣散费给所有复员的军人。我们建议，允许那些愿意回返马来西亚家园的队员回国的自由，不得拘留或者改造他们。

总而言之，五轮分开的谈判将在普吉岛的卡隆滩（Karon Beach）的塔湾棕榈海滩酒店（Thavorn Palm Beach）举行。泰方选择这个环境清幽的会谈地点，用意可能是给谈判营造一种庄严肃穆，成功有望的氛围。

会议桌呈 U 形。马来西亚和马共代表在平行的桌子两旁面对面而坐。泰方

代表团，像是调停者，坐在两者之间的一端。一张顾问桌摆在 U 形桌敞开的一端，坐着退休的马来西亚政治部官员姚光耀。他的旁边坐着阿焰。

泰方代表团总共有四个成员，由陆军少将吉蒂率领。马方也有四个成员，由拉欣诺率领。小章是我们的首席谈判员，由拉昔·迈丁协助。

我只给我们的谈判代表团传达一个主要指示。通过阿焰，我告诉小章，第一轮谈判开始之前，他必须避免我在华玲会谈期间所掉进的陷阱，就是我让马绍尔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专断独行。那个时候，我退让因为我害怕会谈会陷入我自己与新加坡首席部长之间的摊牌。我促请小章不要让泰方或者马方侮辱我们的党。我们要和平，但是不接受抹黑和侮辱。假如他们出言不逊攻击我们，我们就得以牙还牙。假如他们骂我们“恐怖分子”，我们决不允许。我们将以相同的力度还击，决不口软。

在 1989 年 2 月 2 日到 2 月 4 日的第一轮谈判中，拉欣诺致开场白，立场强硬，马绍尔当年就是这么气焰嚣张。马方代表的领袖要我们负起 1957 年独立之后继续与合法的马来亚政府对抗的责任。

小章虽然患病，他还能打起足够的精神，给予强烈的反驳。他驳斥了拉欣诺的看法，就是指我们进行不必要的武装斗争。他在会上说，战争会在华玲会谈之后继续下去只是因为东姑和他的政府要求马共屈服于没有尊严的投降、监禁和盘问。事实上，小章一大抵由于他患病，讲得过火了。他形容马来西亚政府是“反动政权”。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拉欣诺已经有所节制，没有称呼我们为“恐怖分子”。这是我方的一个不幸的错误。当我接到小章的讲稿之后，便立即劝他语气温和一点。

在马方开始的强硬立场和我们过激的反应之后，显然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确保会谈不至于在激烈的言词下破裂。在马共的主动下，大家同意，今后将有两种谈判会议。一种是经常性的三方聚会，另一种是私底下的一对一的会议，让马共会见泰马任何一方。这种安排也让马泰有机会在一起，不受马共审查。私底下的会谈既没有议程，也不加记录。另一方面，三方会谈将全部录音。录制好的录音带拷贝将分发给所有三方。

在最初的两三轮会议中，马方断然拒绝承认马共是一个合法政党。在急速陷入僵局的时刻，感谢泰方及时介入了。他们向我们指出，除了越南和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区域性国家承认在本土建立共产党。他们说，我们的要求，完全不切实际。假如我们要会议继续下去，我们就应当停止这个要求。我们答应泰

方的要求，但提出应当允许我们在未来的某个时期，组织一个在本质上不是共产党的政党。有人一度建议，我们可以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它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最后，让我们组织政党的问题获得解决了一允许我们在联邦宪法和马来西亚法律的框架下组织一个或者多个政党。

* * * * *

在3月15日到17日的第2轮会谈中，小章发表开场白之后不久便昏倒了。他起初被空运至吉隆坡，送进医院的VIP特别病房，这种病房通常保留给部长。诊断的结果是末期肝癌。

当他的病情有点好转后，小章要求转到中国去，他的两个儿子住在那里。他与我在澳门见面至今只有短短的6个月。他进了广州的陆军医院外宾部。

那个时候我在广州。我的老友一到达我便前去看他。他骨瘦如柴。他一下子昏迷一下子清醒，口齿不清。我天天去探望他，看着他的生命逐渐离他而去。两个星期内他便告别了人间。

第三十章
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正当一轮又一轮的会议进行之际，阿焰回返广州向我汇报。中国给我在广州安排了一个住所，十分方便。

在第二轮三方会谈上发表了开场白之后，小章告诉会议，他感到身体不适，拉昔·迈丁将替代他成为马共的首席谈判代表。阿焰负责闭门会谈。当我清楚小章不会再回到会议桌上之后，我向中委会建议由吴一石取代他。吴一石是政治局的成员，也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活动的非常敏感的地下网络行动总指挥。吴一石从1989年5月11日第三轮谈判开始成为我们的正式首席谈判代表。

就是在第三轮的谈判中，我方和马方就不再无谓的摆姿势了。拉欣诺在他的开场白里提到小章的缺席，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谈判气氛。这位政治部主任说："我们对他在先前的谈判中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并记录在案。"马方已经为我们的同志尽心尽力了，我们把他们的善意看成真诚的人道主义表态。拉欣诺充分了解小章的病情，也跟我们一样知道，这位老者已经性命垂危。

我们放弃要求马共合法化也对谈判氛围的改善帮助不小。我们接着要求马来西亚释放各党派政治拘留者。吉隆坡代表团否认他们扣留任何政治犯。不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他们宣布，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辩论下去。所有政治拘留者已经被释放。

马方提出了15个穆斯林极端组织成员的问题，他们还在拘留中。他们被指责策划武装叛变，企图推翻联邦政府。他们与马共毫无关联，马方问，是不是

也把他们列入我们的政治犯大释放要求之中。我们重申，各类的政治拘留者都必须释放。我们争论说，假如所谓极端分子必须被扣留，他们就应当被正式控上法庭。接下来的讨论不少，马共最后作出让步，不坚持释放穆斯林极端分子。

接着，对我们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环绕在马来西亚政府会不会承认，在促进独立的过程中马共所扮演的角色。假如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不是平衡双方的一股力量，英国会早在 1957 年便允许马来亚独立吗？在私底下的谈判中，这个问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最后，拉欣诺，按照讲稿在全程记录的会议中，用马来语宣读，马来西亚不否定或者争议，马共对独立斗争的贡献。至于贡献的程度，他继续说，没有必要在这个论坛上争论。这个问题就交给历史学家吧。

这个话题当时被认为是最敏感而不应公开的一个。但是它绝对是马共的一个基本问题。否则，我怎样向我的同志保证，我们，经过了这么持久的努力，已经达致了一个体面的解决？鉴于当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敏感性，知道了马共在独立过程的贡献最终能在一份历史文件里得到承认之后，我们应当感到满意。载入史册，又亲耳听到，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这段话没被记录下来，但非常肯定有被录进录像带里。我持有一份拷贝，泰方和马方也一样。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方面，我们觉得不得不加以考虑。这直接关系到首相马哈迪和他的政治权力基础。我们无意把和平过程变成一个惹火的政治问题，让他的政府难受。很明显，在马来西亚境内，有一股相当的抗拒力量，全盘反对会谈的概念，无可否认的，也反对与我们和解的建议。东姑，已经退休，他公开对普吉岛正在进行的谈判和我个人表示轻蔑。“一旦成为共产党员，永远是共产党员，”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陈平的提问：“就是说，给予机会，他便会作乱。”相同的歪曲叫嚣也来自马来西亚反起义的保守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已被边缘化。我现在提起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所担心的敏感性，现在已经大为降低了。是历史学家开始探讨这个领域以及对历史记录进行透视的时候了——目前只是欠缺文本。

和平谈判需要我们游击队实力的统计，很快我们便拿出来了。在我们的名单上有 1 千 188 名马共党员。其中 694 名在泰国出生，494 名来自马来半岛。后者包括 15 名来自新加坡，但是回返故国的机会渺茫。那些源自边境南部的，有 402 名华人和 77 名马来人。

在谈判中，自始至终，马方拒绝把我们的游击部队定义为“军队”

(army)。几经交锋，他们同意应用“武装单位”（armed units）这个术语。同时他们也拒绝使用“复员”（demobilization）这个字眼。因此，当我们的军队要复员的时候，就得把这个过程说成“遣散我们的武装单位”（disbanding our armed units)。我们的代表感到不愉快。他们断言，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时期，我们用了“复员”的字眼。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用？最后他们向在广州的我请示。我得向我们的代表团解释，当我们解散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时候，英国实际上把它翻译成 disbandment（遣散）。中文报又把 disbandment 翻译成“复员”。我劝他们算了。

当讨论到给我们的“遣散武装单位”发“gratuities”（退伍金）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出现了。马方要用“monthly allowance”（每月津贴）的说法。双方同意每名选择回马的被遣散游击队员将从联邦政府领到总额马币 8 千元。这将分成两期支付。首 3 千元将在他们回到的时候即刻支付。剩余的 5 千元将在三年内支付。起初我们反对分期支付计划。我们都清楚措施背后的用意。它是双管齐下的策略，既要控制我们，又要试探我们的真诚和善意。据我所知，所有剩余的 5 千元都已付清，没有节外生枝。还有，回国游击队员每月领到 300 元津贴，为期 3 年。这些经费拨出来，协助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现代社会里重新自立。到现在为止，已有 330 名前马共党员回返马来西亚。

普吉岛谈判也处理了回国人员的文件办理程序问题。起初，马方坚持，回国人员必须在马来西亚境内集合办理手续。我们强烈反对，坚持所有文件必须在泰国境内办理。最后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因此，当文件完成以后，马方必须发给新身份证（Identity Card），在他们到达南部之前分发给他们。一旦进入马来西亚，我们的前游击队员，持有新身份证，就可以自由直接前往他们各自的城市或者乡村。

泰国政府同意，那些现在留在王国的前队员每名将获得 2.4 公顷的耕地供开垦，外加一块地皮建造住房。还有，每人每月津贴 22 美元，为期三年。耕地只限南部的也拉府（Yala）和陶公府。

* * * * *

马方要我们在签订协议之后马上关闭我们的《民主之声》电台。基于这个

网络是我们与追随者联系的最佳途径，我们反对。我们要求给予三个月的广播时间，让我们对全泰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传达消息。泰方和马方限我们一个月，不过承认，并郑重声明，我们此时期广播的言词已经与会谈的精神一致。

马方要我们提供我们的地下人员的名单。基于不愿出卖我们的网络，我们献议通过我们自己的管道，联系所有我们的地下人员。我们负责终止所有马共活动。

我们向马方解释，我们的情报网络十分复杂，假如没有《民主之声》，就需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与边远地区取得联系。假如他们允许我们应用我们的电台向我们的追随者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一切地下活动，问题便会简单得多。吉隆坡坚决反对这样做。马来西亚觉得，让马共利用《民主之声》当成现成管道向我们的地下人员发出指示，会给联邦政府带来很坏的影响。

因此我们又达致了另一项谅解。我们同意在一个月内关闭我们的电台，然后开始以其他管道联系我们的地下组织。在马来西亚方面，他们口头答应，避免逮捕在接获我们的指示之前进行非法活动的地下人员。假如侦查到，就私底下通知他们新的安排，叫他们停止了事。在这方面，这些安排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任何逮捕发生，而我们也完全停止了所有的运作。我能相当明确地这样声明。

我们反对吉隆坡国家纪念碑的争论毫无结果。他们问我们喜欢改换怎样的纪念碑。我们的代表团建议一个反映马来西亚三大民族－马来族、华族和淡米尔族，为独立而战斗在一起的纪念碑。把问题搞得一清二楚之后，马方争取时间向吉隆坡请示。复会之后，他们通知我们，纪念碑是国会通过竖立的，假如要满足马共的要求，就必须有另一项国会的决定，才能拆除。每个人都理解到，这样做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谈判可能因此永远停顿。马方劝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也许可能向国会提呈另一个议案，以进行考虑。假如通过了，就能改换。这不太可能。

在普吉岛第四轮会谈的最后阶段，所有主要问题都似乎已经原则上解决，这个时候，我在广州接到了吴一石的电话。他向我保证，这是我前往泰国的时候了。泰国陆军总司令查哇力上将亲自邀请我。我通知北京的中国领导有关事态的发展，并表示，我很快便会南下，需要旅游证件。这一回，中国当局效率很高，把证件快递急送到广州给我。我收到了一份新的“外国”旅游证件。国籍那一栏注明“马来西亚人”。

泰国友善地，派来了一名陆军中校，把我接到泰国去，那里早已准备好了签证。1989 年 10 月 27 日，我们抵达曼谷。吉蒂将军已经在贵宾室里等候迎接我。专车把我从廊曼（Don Muang）机场，沿着苏卡吡班（Sukhapiban）3 路，接到邦卡吡（Bangkapi）区去。原来我此刻是吉蒂将军的座上嘉宾。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泰国的这位将军和我长时间交谈，交换意见，以确保在卡隆滩举行的下一轮－第五轮会议，也是最后的三方会谈中，和平可早日实现。吉蒂希望最后一轮会谈从 11 月 2 日到 11 月 4 日召开。他想让正式的和平典礼在国王诞辰之前举行。国王诞辰在 12 月 5 日。东主说，我将受邀出席在 11 月 3 日召开的第五轮会谈。我将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在普吉岛亮相。在这个阶段，马方还没有被通知我已经在泰国。

吉蒂比我先到普吉岛。我们决定假如我留在曼谷一直到最后一刻是最好不过了。这将让泰方有时间通知我将前往普吉岛塔湾棕榈海滩酒店的意愿。我在 11 月 3 日抵达普吉岛，接着便被拉欣诺邀请去进行密谈。只是我们两个人。

这位政治部主任对我能说流利的马来语大感吃惊。我告诉他，我经常与马来朋友交往，一向来都会说巴剎马来语。不过，华玲会谈之后，我下定决心学好马来语。我每天花上一个小时跟拉昔迈丁学习，一直到他宣布我的马来语已经不错为止。

闲谈之后，拉欣诺急切想解决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他直言不讳：“你是否还藏有武器，陈平？我必须问你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想让日本投降后发生的事情重演。”

这个时候，隐瞒实在已经失去意义。假如我有所隐瞒，迟早马方会发现。因此我坦白告诉拉欣诺：“是的，拿督，我们还藏有武器。”

他反驳：“为什么不把它们完全销毁？”经过 4 轮的谈判之后，我们的武器问题依然没有全盘解决。有了一些进展，无可否认，不过，还有重要的细节需要达致协议。我们建议武器由我们的游击队员私底下销毁。泰方和马方都拒绝了。折中的办法是：自行销毁 1 千 188 支枪械－代表一个游击队员－支枪械－在泰方和马方观察员见证下进行。不准拍照或录相。

针对武器的问题，我们还在讨价还价。我对拉欣诺晓之以理：“隐藏的武器是过剩的。要说服我的追随者放弃它们非常困难。它们被掩埋在地下。必须找到以后挖出来。我需要时间说服同志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找出埋藏处。给我一些时间。我需要最少两三年的时间。一切处理妥当以后便可以加以销毁。”

这位高级警官很想知道确实的数目。我告诉他，党的记录是超过 2 千支(包括手枪)，埋在地下。这是 1 千 188 支根据协议要我们自行销毁以外的。拉欣诺要我解释为什么积累了那么多的过剩枪支。我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在 1970 年代初收集了这些枪支，预期共产党会在印支大获全胜。当时我们把准备工作局限在囤积武器，建立秘密的军火库。"

我告诉拉欣诺，虽然 1970 年代的前一半时间马共内部出现问题，中委会还是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很有利。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继续购买武器。我肯定政治部的情报，在 20 年前已经报告说，昔罗营是我们的一个大武器购买中心。黑市武器主要由陆路运来，从柬埔寨边界进入。有的则从海路运到一些不显眼的渔港，然后通过陆路运到我们的营地。

我对拉欣诺直言不讳，觉得信心十足，能找到处置武器的非传统办法。我告诉他："拿督，你们的政府打算给回国同志们的经济资助不足以让他们维持重新安顿下来的需要。我建议把我们的过剩武器卖回给黑市商人，是他们卖给我们的。"

拉欣诺即刻回应："为什么你们不把它们卖给马来西亚政府?"

我表示我觉得这样做不明智。也许有一天，政府会把我售出的部分武器，扬言是从共产党缴获的战利品。

拉欣诺很快便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我们派商人直接向你们购买武器。"

这还算言之有理。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指责直接售卖武器给政府。因此我告诉他，他的提议可以接受。我们将根据黑市商人或者由吉隆坡推荐的商人出的最好的价格成交。拉欣诺和我于是提议在三年的期限内马共的过剩武器问题将按这个方法解决。

在第五轮也是最后一轮三方会谈中，和平的势头大好，只剩下小问题了。很容易解决。会议结束前，委任了一个秘书处，负责准备两项正式和平文件和一项联合公报。正如合艾最初会议同意的那样，所有文件都在一个正式的公开典礼上签字。不过，只有联合公报向世界传媒发布。其他两项和平文件——项是马来西亚政府和马共之间的，另一项是泰国安全行动司令部和马共之间的一将保密。1989 年 12 月 2 日，超过 300 名国内和国际记者到来参与和见证签字典礼，把合艾蠡园酒店（Lee Gardens Hotel）的大会议厅挤得满满。

我决定应当以马来语发言。除了注意到我穿着像商人一样，媒体还对我的

我们渴望改换的吉隆坡国家纪念碑。在普吉岛会谈中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流利国语议论纷纷。“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我说：“我们向最高元首陛下和国家誓言效忠。我将遣散我们的武装单位以及销毁一切武器，以表明我们真诚终结武装斗争。”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拒绝回答探寻我的私生活的提问。有人问，中国对这次和平协议的想法是什么？我建议把问题直接向中国提出。我也借机会平息报章上所盛传的关于我将在马来西亚参加竞选的荒唐谣言。

* * * * *

签字典礼过后几天之内，我前往泰南的马共总部，这是第一站，接下来我将走访我们的各个游击队营地。

我欠缺第一手背景资料，需要亲身对马共敌奸危机以及因此引发的骇人听闻的肃反扩大化事件作出评估。我认定，那些总部的同志也许会提供详情。无论如何，是从这里发出了肃反指示，而我也知道，一些被派去营地的同志被视为“改造员”。在欢迎仪式上，我讲述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合艾协议。在结束讲话之前我说：“你们当中被指为改造员的是怎样一回事？假如你们认为受了冤屈，就应该站出来讲话。我们现在有了和平。没人有权逮捕你们，惩罚你们，杀害你们。”

第二天早晨哨兵报告，很多所谓“改造员”哭了。他们告诉我，他们不得不招供，否则便会遭处决。为了保命，他们只好胡乱诬指他人。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泪流满面，回忆起她在营地的厕所里见到三个女同志，大家商讨免遭肃清的对策。他们编造了陷害同志们的故事。还确保情节一致，没有漏洞，经得起个别拷问。她们从审问员那里收集到零星的信息，把它们编成了故事。据我所知，审问员还不时作出暗示，谁是他们准备牵涉的敌奸。我在勿洞东部的营地听到了更令人伤心的故事。到巡回访问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肃反行动至少在总部处决了 16 位同志，在勿洞东部处决了 75 位。

我最大的忧虑得到了确认。阿海说得对，在我们当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敌奸。小章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回到合艾以后，坏消息来了。泰方和马方都不知道，我正在面对整个和平协议可能突然告吹的可怕前景，一场充满血腥的激战一触即发。

三方谈判的参与者没有一个会了解到前马共游击队员很快就会回乡与家人

吃团圆饭一起过农历新年的那种兴奋。我接到报告说，勿洞的华人家属群情沸腾，都竭尽所能，要与他们的亲人联系，以确保他们能及时回返家园共庆佳节。我们无法答复对 1970 年代肃反中被处决同志们的查询。对过去家属的查询，以他们被派往南方前线作战去了，很容易就可以敷衍过去。这个藉口现在行不通了。

被处决同志的家属恫言要闯入我们的营地亲自调查，到底他们的亲人遭到了什么不幸。家属佩戴巴冷刀、长矛和猎枪。这些武器当然不能与我们还未加以销毁的精密武器相比。一场严重的冲突和可怕的流血事件眼看就要发生了。我必须快速采取行动，以免出现轰动的冲突事件。

我即刻草拟了一份非常紧急的文件，给肃反中遭处决的大部分同志平反。我也要求承认被平反的同志为烈士。文件呈上尚未解散的中委会，要求即刻批准。我指出，要阻止这场大灾难，行动刻不容缓。最先平反的是泰国华人。接着我确定要为我的老同志伍天旺和阿仲平反。

我们充分了解到，简单地告诉家属们，已经给他们死去的儿女平反，并追封烈士，很难叫他们接受。从有限的经费当中，我们拨出一部分，作为赔偿费，按泰币计算，每名 2 万泰铢（相当于当时的 800 美元）。

还有，我们向每位烈士的最亲近家属呈交一份文件，正式承认，马共犯了严重的错误，处决了他们，并愿意对他们的家属作出赔偿。文件由北马局签发。事实上，北马局已经名存实亡。不过，肃反时期它还在行使职权，由小章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了。我相信，家属们至少现在能了解他们再也不能回来的亲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希望时间能冲淡他们的悲痛。

紧急措施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满。1970 年代的肃反以往被视为极端残忍无情，我们现在又被指责为过于宽宏大量，平反那么多人，那么快。有一位还面对面批评我。我重申当时面对的情况紧迫。我解释，我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也是适宜的。

俯视朱拉蓬公主第 10 村的纪念碑以华文、泰文、马文和英文刻着“烈士们永垂不朽”字样。1991 年 11 月 1 日立碑。

第三十一章
履行和平协议

和平会谈结束，协议签订，以及避免了一场兴师问罪的流血事件以后，我还得确保我们的成员能自己负责决定在哪里定居。

情况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而协议规定的时限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志们一些在香港，一些在澳门，一些在中国，一些在泰国，很多要养家糊口，一些甚至经商去了。因此，我们鼓励他们，自己拿定主意，我们毫不干涉。

一切安排就绪，我回返中国，这一回是北京。千头万绪。绝大部分驻扎在中国的同志选择到泰南定居。还有一些在中国院校就读的马共子女想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也得拿定主意，毕业之后要在哪里定居。最后，只有两位决定定居中国。一位或者两位选择马来西亚。其余要到泰国去。不管是成人还是学生，都要按照文件程序行事。这个责任落在我的肩膀上。要离开的需要有效的旅行证件。那些留下来的需要身份证。为了给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去的办理手续，我必须编出一份正式名单。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严格的时限。在协议签订之后一年之内，回国者必须呈交申请表。

当我将要解决和平协议在中国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许多被英国递解出境的前马共党员前来找我。中国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想回马来西亚或者到泰国去定居，并打算付出代价。有些想捐出高达人民币 5 万元的数目、只求有机会出去，或者让他们的子女能够这么做。我很同情他们，但是也得硬起心肠来。他们的要求没法办到。

李明的情况是另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起初，她与陈田想到泰南去。不久，陈田不幸去世了。当时李明正在照顾年迈眼瞎的母亲。走好还是不走好，她犹豫不决。在泰国当局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和平村里，我们为她盖了一所房子。这个时候中国当局向我们保证，他们会照顾她。事实上，他们给李明安排了一间政府中级干部才能享用的住宅。

* * * * *

第一批回国同志一抵达马来西亚不久，一名非常高级的马来西亚警官就公开向传媒保证，不会对回国的前游击战士进行盘问、起诉和拘留。他也断言，一旦他们重新取得完整的公民权以后，他们便能自由参与国内的政治，甚至有权被选进国会。他说对了。不过他泄漏太多。第二天，一名更高级的官员站了出来，驳斥了他的同事的发言。这名高级官员宣布，未来，所有回国人员必须签署一份文件，谴责共产主义，马来西亚才能妥善接受他们。他补充说，如有必要，这份文件必须在泰国签署，才允许进入马来西亚。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和平协议谅解的直接破坏。接着我们了解到，从泰国回返马来西亚的第一批前同志当中，有八位，在允许他们回返各自的城市和乡村之后，就即刻被拘捕。他们被带往吉隆坡。我们从接到的报告中获知详情，在到达马来西亚国都的时候，政治部官员便指令回国人员在一份正式声明上签字。他们拒绝了。他们在离开泰国之前，早已获得通知，一切办理停当，所有文件已经签妥并盖章。一旦回返家园，他们无需再签署任何文件。即刻，我们终止了回国计划，寻求澄清。

在泰南办事的马来西亚政治部官员变得非常积极，企图说服我们想南返的人员签一份特别准备的文件。我们认为这份新文件的内容无异于悔过和投降。从我们的立场，这也与协议相左。政治部的努力落了空。那个时候是 1991 年中。当时我在广州，处理在中国同志的诸多问题。同时，我正在整理我的档案，准备打包回返泰南。

国际上，共产主义正在发生巨变。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政经改革计划(Perestroika)胎死腹中。柏林围墙被推倒。企图推翻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变失败了。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共产党已经分崩离析。我觉得，马来西亚把这种国际发展看

泰国的查哇力上将（左）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他们是 1989 年和平协议的设计师。

警察总长拉欣诺。他率领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团出席普吉岛会谈。他的沉着和权威性的作风对化解和平谈判过程中遭遇到的诸多难题贡献很大。

诺利安迈依是马来西亚政治部的新委主任。1991 年，我在曼谷与他见面，设法解决和平协议里规定的前马共人员回国计划引起的严重问题。

当时驻扎在泰南的泰国第 4 军副司令吉蒂将军在和平谈判初始阶段，奔走穿梭在各方之间，对和平协议的顺利完成和签订，贡献很大。

成对他们在谈判中争取到的地位是一个有利的支柱。还有，泰国的政治尤其不平稳。曼谷又发生了一次政变，跟着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逮捕行动。这一回，查猜上将和他的同僚被短暂扣留了。

好像在我的计划表上节外生枝的问题还不够，这个时候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它涉及那些利用和平协议允许的时限，迟迟未作出最后决定，是否从泰南回返马来西亚的人员。在他们考虑是否返马的这段时期，谁又会关心他们呢？

我特别赶往曼谷与姚光耀交换意见。他是我在普吉岛会谈上第一次见面的马方观察员。吉蒂告诉我他将在杜西塔尼（Dusi Thani）酒店与我见面。

我开始向他讲述回国人员计划碰到的障碍。我告诉姚光耀我担心不会有人愿意回马，假如马来西亚坚持要前武装共产党员对他们过去的活动公开表示悔过。他们北上参加我们的运动，他们从马来西亚来，他们不会说泰语，他们在泰南没有亲友。除非我们为他们做点事，否则，我担心他们会重新拿起武器，威胁马泰的社会安全。

我对姚光耀重复和平会谈后期我向拉欣诺许下的诺言。我永远不会再拿起武器。即使我的追随者劝我这么做，我也不会再带领他们走回老路。我要姚光耀清楚明确我对政治部和马来西亚政府的立场。我解释我怎样告诉拉欣诺："我知道，对我告诉你的一切，你不会百分之百相信。同样的，我也不会对你这几个月来告诉我的一切百分之百相信。你会许下种种承诺。我会许下种种承诺。重要的是，长期的表现。只有到那个时候，互信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据我所知，拉欣诺同意我的说法。据说后来他通知泰方："陈平诚实可靠，我信任他。"

姚光耀飞回吉隆坡，我留在曼谷，等待消息。

最后，在泰国国都曼谷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以寻求解决出现的新难题，很多在普吉岛三方会谈上是没法预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泰国的吉蒂将军和新委的马方代表诺利安·迈依。他是政治部主任。会议地点是艾拉万（Erawan）酒店。

这里大家都同意，虽然马方保持缄默，要回国人员签署悔过书是不公平的。至于回国人员的效忠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和宪法的问题，我坚持，已经包括在普吉岛签订的和平协议附录上。还有，我曾在合艾和平典礼上的演讲中强调了这些。说实在的，我已经一再强调，以避免过后会有人借口对我们的效忠表示

怀疑。最后我向诺利安迈依建议："假如你有需要我们在另一张纸条重复我们的效忠，我们一定照办不误。"马方接受了我的观点。多一张纸显然是多余的。回国计划又回到正轨。

*　*　*　*　*

我与拉欣诺私底下会谈达致有关处理"过剩武器"问题的谅解一年之后，我才发现我面对一个最大的狼狈困境。它不但威胁我与拉欣诺之间的安排，也威胁协议的基本精神和我为马共作出的誓言上的信誉。

泰国报章报道当地警察在边境某处破获了神秘的堆积武器。有人怀疑，那是我们秘藏武器的一部分。根据报道，有 20 支枪械被起获。理所当然，我关心的问题是：警方如何发现藏械处？我相信当局是根据具体情报采取行动，而情报只能从我们当中的一个获得，他想得到赏金才这么做。我所担心的，很快便得到了证实。

有关事件提醒我，其他前同志也很有可能顶不住诱惑，为了发一笔横财，作为资金，好让他们重新跻身资本主义社会，而如法炮制。因此，我联系了拉欣诺，建议早先同意的二至三年的武器交易时限大幅度缩短，尽快进行。马方，我觉得，对我的做法解读为怀疑或者懦弱。他们即刻派诺利安迈依到合艾来与我见面。

就像他之前的拉欣诺，诺利安迈依要我提供密藏处的确切枪支数目和火药数量。我再度重申，提供我们的武器存货的准确的数目字几乎不可能。第一，不能依赖我们的记录本得到准确的统计。不像一般的办公室，我们没有定期点算。像早先对拉欣诺那样，我向诺利安迈依详述了问题的来龙去脉。假如我最后交出比"正式数字"更多的武器弹药，他将会很高兴。但是，要是少了呢？我会被指责为不诚实。更糟的是，他会以为，我还有藏起来的存货。

诺利安迈依听了以后说，他会向吉隆坡报告。由于某种原因，马方似乎不能接受合理的解释。他们老是拖延回应。这个时候，我的忧虑与日俱增。我们的东道国已经担心，非法枪械买卖会使王国南部全境的州府土匪日益猖獗，作乱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事态失控之前，我把问题直接向泰方提出。他们直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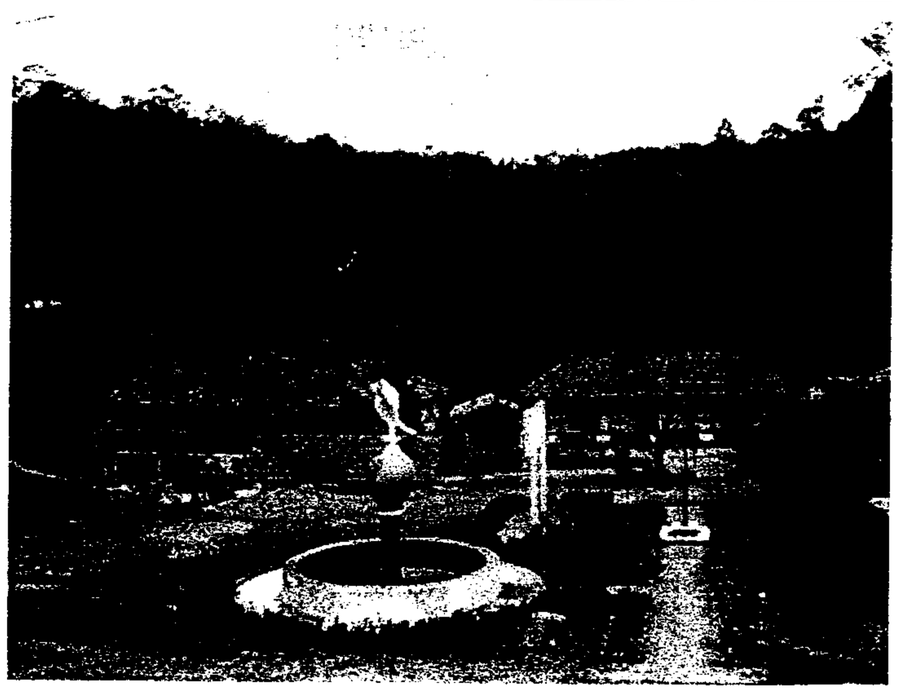
当地说，只能按昔罗和勿洞西部支队缴械时候的价格交易。为了慎重起见，我批准把所有过剩的武器存货卖给泰国当局。

1992 年初，我正式通知泰方马共的一切活动都已经停止。一旦北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国对国的关系之后，我觉得，我继续留在中国将给中共领导层带来尴尬的局面。因此，在 1994 年，我最后固定移居泰南我现在定居的地方。我成了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无国籍外国人”。

尽管马共领导的武装单位已经遣散，我还得照顾我们的老残村民。目前他们总共有 200 名。伤残的主要是被地雷炸伤。我们有救济基金。以前，银行的利率是 6%，我们的生活相对舒服。近年来，1990 年代末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利率急剧下降，导致我们年年出现赤字。这些基金都是泰铢。不幸的是，1998 年泰铢又跌回原价。我们还能维持几年，但我们已经开始挪用母金。我们的基金总会有一天用完的。

每个月，泰南和平村的前同志，60 岁或者以上的，从我们社区帐目中领取 540 泰铢的个人津贴。数目根据泰方拨给定居王国的每个同志的初期每月薪俸计算。按普吉岛协议规定，泰国经济援助三年后停止。假如经济情况迫使我们停止这项资助，大部分受益人还顶得住。只有一小部分十分老弱者会陷入困境。不过，我还是会尽力确保他们的福利。

说实在话，我们有幸，能得到朱拉蓬公主作为我们的赞助人。这就是各个村子重新命名朱拉蓬的原因。它们原称和平 1，2，3，4 村。按照和平协议，它们在军部的管辖之下。经过当时是泰国第 4 军区司令吉蒂将军陈情以及公主本身的同意，它们正式被称为朱拉蓬公主 9，10，11，12 村。它们现在被转为民事管辖。公主经常访问各村，听取民意。她对各村的关注，成为我们的人员融入泰国社会的重要保证。



我们在泰南的四个和平村的其中一个——这个村子叫朱拉蓬公主 10 村。上照是部分前游击队员的住宅。下照中央是象征和平的白鸽，背景是村行政区和社区中心；两座建筑物是新近为游客和贵宾建造的膳宿吃风楼。

“我不认为你能够把“生命”真正地分裂成无懈可击的“列车”，而相信各“行囊”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善行、误判、算错、仁慈与慷慨、恶意一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相互交织，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真正素质。年青时期的错误妥协将是对晚节不保的残酷和最终揭露。”

第三十二章
流放生涯

这些日子以来，我越来越怀念故乡实兆远以及我在那儿出生的的店屋。日军还没踏入这个小镇，马路对面售卖福特汽车的店铺早就关门大吉了。后来换了老板，成了一家咖啡店。据我所知，它现在还在营业，生意兴隆。我想，我的老友们会不会还时常三三两两到那里去一边喝咖啡，品尝香甜可口的 kaya 烤面包，一边交换对世事的看法。我们的父辈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那是二战以前很久的事儿了。战争把我们的生活都打乱了。在处理完了我应该处理的有关 1989 年和平协议的事务之后，我多么想回乡去看看。1990 年尾我提出了申请，要回国。1991 年 12 月尾被拒绝。大约 8 年之后，在 1999 年年初，一名驻扎也拉的政治部官员问我，想不想申请准证到马来西亚观光。我的回答是：当然。我表明，打算访问我的家乡，祭拜在华人公冢里祖父、父母和兄弟的坟墓，献上一束鲜花，那是在实兆远通往红土坎的半路。这是我的一片孝心，事关重大。

由于种种原因，心愿未了。我等得很心焦。最后，我只好这么想：假如为了解放马来亚的梦想而非落得今天的继续流放，那么，我认命了。

我又清醒了过来。在武装斗争的最艰苦的日子里，我都无怨无悔，何况是今天。我不会烦恼终日。在森林里不知道度过多少与世隔绝的日子，把我磨炼成今天这种有纪律的性格。因此我把回乡的热望高搁脑后，宁静的时刻才让它从脑海里重现。我将从小住实兆远开始。祭拜家坟之后，我走访母校，走一回故乡熟悉又陌生的小径，重温昔日故友的的深情厚谊。几许印象不会离我而去，那些道路、树木、房舍和路牌，这些，都告诉我，这是马来亚，不是别的地方。我渴望重回她的怀抱。我想把我的余年献给马来西亚，天经地义。我愿意为祖国而死，为什么，却不让我再见她一面？

有人指出，假如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子，那么我的生活一以及，我那些亲人的生活一就会舒服多了。说这话的人提醒我本来有“光明的选择”，那个时候我

只有 20 多岁。我获颁两个战役勋章，名列特别公报，住进舒适的大洋楼，获得 OBE－我应当利用这些少年得志的优势，开创一条通往富贵荣华的康庄大道，编造一则又一则人人称道的成功故事。

我发觉他们的观点大错特错。这反映了什么呢？自私和自我中心的人生道路。

当你的总人生观一旦形成，你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相信是这样。我回忆起在怡保的一个租来的房间里和母亲见面。假如我为了讨她的欢心而让她以为我会负笈中国，这么做会有好处吗？空承诺无济于事。那个时候一句谎言只能拖延母亲接受我作出的选择，而这又对谁有益呢？

战争爆发了，我必须参加游击队卫国抗日。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性向似乎很自然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我看不到任何其他叫我终生无憾的道路。就像我对战前英国殖民时期感到不寒而栗一样，对日本的侵略极端愤恨。我必须尽力痛击侵略者。妥协将比我们在高山峻岭和森林艰苦行进来得悲惨。

我不认为你能够把“生命”真正地分裂成无懈可击的“列车”，而相信各“行囊”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善行、误判、算错、仁慈与慷慨、恶意－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相互交织，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真正素质。年青时期的错误妥协将是对晚节不保的残酷和最终揭露。

我们都有所选择－坚定我们的立场还是妥协，节省还是浪费，勇敢面对还是逃避，忘却还是牢记不忘。

我必定是一个解放战士。假如你住在马来亚的乡村地区如实兆远，眼看着 1930 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怎样瞧不起我们的同胞，你就会了解马共的号召力了。我的参与不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客观观察和多年发自内心的反省。假如你了解了日本投降之后不久腐败的英国军政统治这一段令人可怕的日子，又眼见日军暴行之后满目疮痍的情况，假如你注意到在马来亚的城乡里头这个政权是怎样蹂躏我们，你就不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应当冷静一点，选择一条更容易走的道路。我决不能与日本侵略军妥协；也不能为一个助纣为虐延续英国殖民主义那一套的制度服务。

1945 年到 1948 年是马共的最强盛时期。国内的革命条件成熟。战后回马的大部分英国殖民者不单是机会主义者和腐败不堪；他们彻头彻尾蔑视被他们剥

削的人民。他们枪杀无辜的平民，枪杀在乡村反贫穷和失业而上街示威的手无寸铁的群众。是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英国就是靠同样的手段加强它在马来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

马共中委会和政治局从来没有把枪口对准平民。1951 年 10 月 1 日我们的决议反映了我的愿望，不进行毫无节制的斗争，以避免我们的行动被歪曲为恐怖主义。种植者是正当目标。他们要求军法统治。他们声名狼藉，在剥削工人之余还雇佣流氓破坏种植园里的罢工行动。他们有许多是前军人，从英国的二战单位退伍。他们的军事经验丰富。在战后的马来亚，他们武装起来；他们在雇佣流氓的簇拥下开着装备齐全的军车到处耀武扬威。

到今天，我还坚持，是英国殖民者采用恐怖战术，牢牢控制着马来亚。早在紧急法令颁布之前，他们在种植工人当中，播下惶恐不安的种子，工人们永远生活在随时被遣送回返印度的威胁之中。那些露出反殖民主义情绪的工人，时时面对被遣返中国的厄运。在 1949 年之前的中国，这意味着大部分将被处死，其余的监禁。更多的流氓受雇来镇压工人的不满。二战后，愚蠢的英国军政府残暴成性。在为了有效执行紧急法令，英国政府烧毁村庄，削减配给和枪杀平民。弄巧反拙，这些恐怖战术产生的成效适得其反。布里格斯计划是最大的成功，但是它的“新村”不能通过今天的人权标准。

我对寻求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来取代这样的一种丑恶制度决不抱歉。殖民剥削，不管是谁当家作主，日本还是英国，都在道义上大错特错。马共受剥削者的阻挠，他们不准我们参与民主程序－不是合作便是拿起武器。假如你像我这样看见了回马的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你便会理解为什么我会拿起武器了。

我无法将 OBE 勋章当作生命的重心。我不能像在华玲对方想迫使我那样，出卖我的同志。我的许多支持者并没有死，并没有在极端匮乏的折磨中倒下，我不能带领这些幸存者去接受一项由英国人所精心策划的，重大而全面的羞辱行动。在华玲，企图在两天内结束七年的敌对，马绍尔叫嚣：“你们自作自受，丧失尊严，躲进森林里受苦受难，疾病在那里等着你们，那里没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我没有看过马绍尔的档案。我不知道他向他的当事人传授什么锦囊妙计，使他们因此逃过囚禁。但是根据在华玲的表现以及他所说的“人的尊严”，即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向他的理解挑战。

态历时这么久，因为我不愿看到我的追随者丧失尊严。屈指一算，加上与

我一直与老同事保持联系，同时，像其他人一样，回顾我们共同追求的梦想的漫长日子，不论实现与否，总有欢欣鼓舞的一刻。拉昔迈丁与我，让时光倒流，回返半个世纪以前的日子里。

日军打仗，当我坐在吉打课室内时，我已在森林里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漫长岁月。在华玲，要解决冲突，就必须坦诚交换意见，但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英国独断独行之外，也欠缺真正的动力。

东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以提高他的政治形象和加强他与伦敦讨价还价的实力。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应当听一听 1974 年他自己说的一番话："紧急状态产生的惟一好处是，我与陈平的会见。由于我在华玲的谈话，我们才能从马共那里夺得主动权，然后在伦敦的会议桌旁坐下来，与英国人谈判独立，争取到作为一个国家的自由。华玲直接把我们带往独立。"

华玲也给马绍尔几个小时卖弄技巧，哗众取宠。虽然他对会谈没有什么贡献，拿督陈祯禄却赢得了华社栋梁的荣誉。我现在看来，华玲和谈是注定要失败的"和平冲刺"。没有重新审查感情和原则的机会。在会谈中，我被指责"不灵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这样。到华玲去的人，并不准备聆听我要说的话。我们被阻挠举行新闻发布会。因此，学校围墙之外，没人能听到马共的心声。党是邪恶的，我们都是魔鬼，就是这样。我们像囚犯那样被侮辱。假如那是我们在会谈期间应该受到的对待－拉昔迈丁、陈田和我是领导－那么，我们要是投降了，马共队员又将受到怎样的对付？我们在颐指气使下被迫退出会场。投降和受惩罚－华玲传达的信息就是这样。而且，要是我按照马绍尔的理解办事，我们想再安枕而睡，就得接受这样的结局。

我希望和平，但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受侮辱，这是基本条件。1980 年代的和平谈判不同了。与马共谈判的政府代表听取和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投降"的字眼。同样，我们聆听他们的解释，了解了为什么我们坚持他们承认马共是合法政党是不实际的。多次会议都体现了"互相让步"的精神。敏感的地方都被提了出来，加以解释。没有人认为，问题能够或者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解决。每个人都全力以赴，长时间工作。这就是互相尊重。我们都平等。

1989 年的和平协议能达致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泰国政府和马共都真正盼望化解彼此之间的敌对状态。各方都为大处着想，为和平和繁荣而努力。因此，马共为她的斗争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结局－尊严下的和平。我们不能赢得革命，我们也没有因投降而蒙羞。这是我的同志们能接受的那种和平，我也可以因此有所安慰。

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我肯定还相信平分财富，虽然那是驴年马月的事儿。我信仰各尽所能的真理。不过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我肯定会放弃以无产阶

级专政作为行政蓝图的中心概念。

能预见一个不被贪婪和物质主义完全驱动的世界是一桩好事。就像我现在所见，人们孜孜不倦，不断的制造需求。爬得高跌得重。人们老是忘记需要和欲望，基本的和奇想的分别。贪婪和物质主义将继续蔓延扩大。它将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直到一可能从现在开始10年，或数10年后一过度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全社会必须检讨为什么他们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理由，否则，将自我毁灭。贪婪和物质主义只有短期的好处。它们决不能为持久的社会打下基础。任何认为能够的社会，是在自我欺骗。最终，所有文明只能回到各种珍贵的价值。

只晓得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生活在富裕的独立年代的青年将对我在少年时代所作的选择大惑不解。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穿越的旅途驿站与他们在个人电脑上所操作的大相径庭，他们会想我在本书提及的马来亚是另一个世界，而他们这么说并不会太离谱。它是另一个世界。那个殖民世界的色泽是僵硬枯死的。没有叫人感到慰藉和进入合理状态的柔和色调和相得益彰的陪衬暗影。年青的时候，我生长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采取的方式也很不相同。

以暴力为基础的革命不适用于现代的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就这些地区的国情而言，不存在有利武装斗争的条件。武装起义需要相辅相成的国际和国内情况来激起民愤。假如人民生活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你又何必这么做？

我也许是本区域最后的老革命领袖。我选择暗中领导，避免引人注目。这可能是我的祸根。我的难以捉摸的斗争姿态让英国人拿来当成藉口，进行宣传，把我作为马共总书记的形象描述成——凶暴残忍、冷酷无情、嗜血好战和无视人间疾苦。这是他们在紧急状态前后向全半岛乡镇群众灌下的迷魂汤。英国各郡和英联邦各国的城市也受到这种错误信息的毒害。英国需要妖魔化陈平和马共，为紧急状态辩解，证明它的核心是不可摧毁的。

所有这些都不是推测。解禁的紧急状态时期的保密文件证明了，英国人怎样利用语言和信息，唯恐全世界的人们都相信，马共是一个合法的民族主义团体，寻求结束殖民统治。有来往交流文件表明，殖民官员对马共课题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惶恐不安，他们又怎样出尽法宝企图阻挠。历史经已证明，较早英国断言从1948年开始莫斯科和北京指挥马共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从未接受过苏联的经济援助；莫斯科也没有指示过我们该走哪一条道路。直到当斗争采取跟

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解读--致路线的1961年，我们从中国获得的就是肺结核病人的医药援助。

与我们签订《1989年和平协议》的政府手头上就有事实材料。他们对紧急状态了如指掌；他们有他们的保密和解密档案。假如我像英国皇家海军被拍到手持两个共产党党员的首级那样残暴，他们会那样对待我吗？他们会对我那么开诚布公和那么随和吗？假如我像邓普勒的所作所为，把肢解躯体的暴行视为正当，以便确定“真正身份”，他们会作出那些让步吗？

我认为不会。主动提出1989年签订和平协议的人清楚知道，殖民英国的宣传编造出来的魔鬼和替与他一起为现在已过时的正义事业而战斗的男男女女们寻求公平、可接受和人道的条款的那个人之间有千差万别。

我读过很多有关紧急状态的书。很多被视为历史的资料都是些滔滔雄辩的推测和猜想。一些历史学家早在同志们真正倒下之前便把他们杀死了。宣传家们宣称我以无辜平民为射杀目标。不确实。有报道说，我甚至把非马共党员驱逐出去；下令处决那些反对我的人。又是毫无根据。

我想，我应当呈现我这一面的历史，来平衡一边倒的文档。我迟迟没有行动，因为我需要培养洞察力。我被隔绝在森林里，后来到中国去。我必须集中思路，经过筛选，明察秋毫又言之有物。

我打了一辈子的解放战争。问我是否再拿起枪杆子，那是空话。过去我是在一个完全不同框架里的年青人。但是我从那个时代现实和教训中获得的价值观，可以让现在的年青人分享，假如他们想把视野放宽放远，看到掌上电脑以外的世界，了解历史怎样塑造它自己。我愿意参加讲座。在这里，可以交换意见，最终推动世界。交换意见叫我雀跃。你可以对我说：你错了。你可以坦言，我失败了。不过我也会告诉你，它是怎样的以及我怎样尝试过。

“但是我从那个时代现实和教训中获得的价值观，可以让现在的年青人分享，假如他们想把视野放宽放远，看到掌上电脑以外的世界，了解历史怎样塑造它自己。我愿意参加讲座。在这里，可以交换意见，最终推动世界。交换意见叫我雀跃。你可以对我说：你错了。你可以坦言，我失败了。不过我也会告诉你，它是怎样的以及我怎样尝试过。”

尾 注

① 文件真本是在 1943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不兰丹会议签署，目前收藏在伦敦克佑区的英国档案局。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7/165。

② 戴维斯引介陈平到东南亚司令部的信号在 1945 年 8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15 分传送到伦敦。此信号之副本收藏于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1/114。

③ 马来亚共产党《九大纲领》的英文译本，于 1944 年 1 月首先在以模板印制的我党党报《解放报》（Emancipation Press）上发表。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7/165。

④ 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前夕发表《关于马来亚抵抗部队的备忘录》，由特雷姆利特英尼斯以马来亚组办事处首长的身份签署。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7/165。

⑤ 英国 136 部队军官、代号“幽默”（Humour）的克劳德芬纳上尉最早取得一份《八大主张》的副本，他当时担任森美兰州一个马来亚抗日军武装单位的联络官。他即刻将文件的内容发送到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后者再以无线电将此情报转发到伦敦；伦敦在 1945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 时 50 分接收到此情报。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1/115。

⑥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1/114。

⑦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1/114。

⑧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1/114。

⑨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HS 1/114。

⑩ 殖民部在 1948 年 12 月写给大总督麦唐纳的“机要与私人”信件，信中显示了伦敦有意掩盖麦唐纳重复要求将钦差大臣甄特撤职。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967/83。

⑪ 麦唐纳于 1948 年 7 月 3 日写给甄特及殖民部的信件，以及麦唐纳于 1948 年 7 月 19 日及 10 月 7 日写给殖民部的信件，参考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967/83。爱德华甄特爵士的遗孀在 1949 年 1 月 4 日写给殖民部的亲笔信，提到

其已故丈夫和大总督麦唐纳的关系。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967/83。

⑫ 大总督麦唐纳于 1948 年 6 月 6 日在马来亚作无线广播之文案，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FO 953/326。

⑬ 陆军部简讯《1948 年 8 月马来亚军事形势》，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FO 371/69698。

⑭ 澳洲外交部长伊瓦特与英国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诺埃尔贝克在 1948 年 8 月 17－18 日的通信。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FO 371/69698。

⑮ 致给诺埃尔贝克大臣的劝喻书（Memorandum of advice），志期 1948 年 8 月 14 日。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FO 371/69698。

⑯《澳洲防卫合作》文件。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FO 371/69698。

⑰ 战务大臣约翰斯特雷奇在 1950 年 5 月 12 日向英国内阁的马来亚事务委员会提呈的报告。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DEFE 11/36。

⑱ 钦差大臣葛尼于 1951 年 3 月 19 日向殖民部请辞的亲笔信函。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967/145。

⑲ 殖民部于 1951 年 4 月 5 日回复葛尼愤慨请辞，这名钦差大臣得到殖民部大臣再三保证。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967/145。

⑳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967/145。

㉑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22/45。

㉒ 邓普勒将军就殖民部大臣利特尔顿的第 28 号电报所作之答复。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22/45。

㉓ 英国的情报评估报告《195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紧急状态与政治月报》，认为马来亚共产党政治局在彭亨西部活动。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DEFE 11/96。

㉔ 邓普勒将军与乃炮将军于 1953 年 4 月 10 日在吉隆坡苏丹皇宫的会商记录。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22/37。

㉕ 共和联邦关系部对外公开的电报，志期 1953 年 2 月 21 日。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DEFE 11/95。

㉖ 英国驻暹罗大使及乃炮将军于 1953 年 9 月 23 日在曼谷的会谈记录。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22/37。

㉗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DEFE 11/118。

㉘ 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30/29。

㉙ 外交部电报 Item 15（No 66 Intel）。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22/2。

额外参考资料

除了尾注所引用的官方文献，本书也参阅英国档案局的下列档案，以证明本书所叙述的资料。

AIR 10/8584
CAB 128/26
CO 537/4770
CO 537/428
CO 967/81
CO 1022/1-6
CO 1022/13
CO 1022/21
CO 1022/25-29
CO 1022/32
CO 1022/39
CO 1022/41
CO 1022/46
CO 1022/49
CO 1022/54-55
CO 1022/132-133
CO 1022/146
CO 1022/188
CO 1022/190
CO 1022/209
CO 1030/700
DEFE 11/32-56
DEFE 11/69
DEFE 11/74-75
DEFE 11/81-86
DEFE 11/96-102
DEFE 11/105
DEFE 11/107
DEFE 11/112-114
DEFE 11/120
DEFE 11/122-23
DEFE 11/158
DEFE 11/186-192
DEFE 11/273-275
DO 142/405
FO 370
FO 371/69697
FO 371/84479
HS 1/116
HS 1/120
HS 1/122-23
HS 7/166
WO 32/17642
WO 203/1-49
WO 203/1819
WO 203/4208
WO 203/5603
WO 203/5604
WO 203/5605
WO 208/1522
WO 208/1545
WO 208/3081
WO 208/3214
WO 208/3216
WO 208/3219
WO 208/3925
WO 208/3927
WO 208/3933
WO 208/3936
WO 208/3996
WO 208/4102
WO 268/46-50
WO 268/549
WO 208/550
WO 268/551
WO 291/1699
WO 291/1713
WO 291/1718
WO 291/1722-23
WO 291/1728
WO 291/1735
WO 291/1740-41
WO 291/1754
WO 291/1762-63
WO 291/1782
WO 291/1788-89
WO 305
WO 356/1
WO 356/6
WO 356/8
WO 357/2-3

图片提供：

页 12-13：英国档案局（克佑区）
页 26：Media Masters
页 30：Media Masters
页 36：Media Masters
页 38：Media Masters
页 41：方守义先生惠赐
页 61—62：Media Masters
页 74：（上图）新加坡内部安全部；
（下图）Media Masters
页 85：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
（吉隆坡）
页 94：Media Masters
页 102：《新海峡时报》
页 106：陈平先生珍藏
页 123：陈平先生珍藏
页 124：陈平先生珍藏
页 134：皇家战争博物院（英国伦敦）
页 135-136：皇家战争博物院
页 150：Media Masters
页 160：陈平先生珍藏
页 170：Media Masters
页 192-193：Media Masters
页 196：新加坡国家文物局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页 204：陈平先生珍藏
页 210：Media Masters
页 212：皇家战争博物院
页 215：《新海峡时报》
页 237：陈平先生珍藏
页 241：（上图）新加坡国家文物局；
（下图）《新海峡时报》
页 250-252：皇家战争博物院
页 260：《新海峡时报》
页 261：（上图）《新海峡时报》；
（下图）杰夫德齐尔瓦
(Jeff De Zilva) 先生惠赐
页 263：Media Masters
页 265：《新海峡时报》
页 267：《新海峡时报》
页 272：英国档案局
页 276：《新海峡时报》
页 278：丹尼尔洛克（Daniel Loke）
先生惠赐
页 292：陈平先生珍藏
页 303：陈平先生珍藏
页 306：《新海峡时报》
页 309：《新海峡时报》
页 314：陈平先生珍藏
页 327：陈平先生珍藏
页 335：《新海峡时报》
页 337：Media Masters
页 341：Media Masters
页 361：皇家战争博物院
页 365：澳洲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堪培拉）

页 379：陈平先生珍藏
页 384：陈平先生珍藏
页 387：陈平先生珍藏
页 397：陈平先生珍藏
页 416：Media Masters
页 425：陈平先生珍藏
页 443：《新海峡时报》
页 446：Media Masters
页 449：《新海峡时报》
页 453：Media Masters
页 458：Media Masters

编者说明

本书采用了一些地方的旧名称，并随时代变迁而改用新名称——马来亚改称马来西亚，暹罗改称泰国，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改称印度尼西亚，余此类推。

本书也保留了一些马来文词汇的音译：亚答（一种半水栖棕榈树，用来盖小房屋，尤其是屋顶）、甘榜（村落）、巴冷刀（长刀）、浮罗（岛屿），以及舯舡（大号木船，通常用来运货）。

名词对照表

A

Abdul Rahim Mohamad Noor, Datuk
拿督阿都拉欣莫哈末诺（简称：拉欣诺）
Abdul Rahman bin Hashim, Tan Seri
丹斯里阿都拉曼哈欣
Abdullah C.D. 阿都拉西地
Ah Chin 阿清
Ah Lung 阿龙
Ah Chuang 阿全
Ah Chung 阿仲
Ah Dian 阿电
Ah Hai 阿海
Ah Han 阿韩
Ah Ho 阿和
Ah Kok 阿谷
Ah Nan 阿南
Ah Ng 阿吴
Ah San 阿山
Ah Yang, (Commander Chin Nam) 阿杨（振南）
Ah Yen (Madam Zainon) 阿焰（再润）
Ah Ying 阿英
Ai Ker 爱克
Ai Tung Primary School, Singapore 爱同小学
Aidit, D. N. 艾迪
Alexandra Barracks 亚历山大营房
Alimin 阿里敏
All Indian Radio Network 全印度电台
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
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
Alliance (Alliance Party) 联盟党
Allied Land Forces, South East Asia (ALFSEA)
盟军东南亚陆军
Allison, John 约翰爱利生
Alor Star 亚罗士打
Ampang Road, Kuala Lumpur 吉隆坡安邦路
Anglo Chinese Continuation School (ACCS)
英华补习学校
Anglo Chinese School (ACS), Sitiawan 英华学校
Anti-bandit Month 剿匪月
Anti-Enemy Backing-up Society
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
Anti-Japanese Army (AJA) 抗日军
Anti-Japanese Union (AJU)
抗日同盟会（简称：抗盟）
ARP (Air Raid Personnel) 防空袭民防员
Attlee, Clement 克雷门艾德礼
Australia 澳洲
Austria 奥地利
Ayer Busok River 双溪阿依布索
Ayer Kuning 阿逸君令

B

B. MK II, radio B.MK II 型电报机
B-II radio B－II 型电报机
Bagan Datoh 峇眼拿督
Baling talks 华玲会谈
Ban Hong Leong 万丰隆
Bandung Conference 万隆会议
Bangkok 曼谷
Barisan Sosialis Party 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Batang Kali 峇冬加里
Batu Arang 煤炭山
Batu Caves 黑风洞
Batu Gajah 华都牙也
Batu Pahat 峇株巴辖
Batu Putih 白礁山
Behrang 美冷
Bentung 文冬
Berlin Pact (September 27, 1940) 柏林条约
Betong Salient 勿洞区

Betong, (CPM camps) 马共勿洞营
Bidadari 比达达利
Bidor 美罗
Bishopstone 毕晓普斯通
Blantan Agreement (December 31, 1943)
不兰丹协议
（注：不兰丹协议指在不兰丹营签订的协议）
Blantan camp 不兰丹营
（注："不兰丹"是当时抗日军按客家方言的称呼）
Borneo 婆罗洲
Borneo Motors 婆罗洲摩哆
Bourne, Lt. General Sir, Geoffrey
杰弗里波恩爵士中将
Boyd, A.J. 博伊德
Bras Basah 勿拉士峇沙
Briggs, Lt. General Sir Harold
哈罗德布里格斯中将
British Concession, Shanghai 上海英国租界
British Liaison Teams 英军联络部队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 英国军政府
British North Borneo 英属北婆罗洲
Broadhurst, Lt. Colonel Douglas
道格拉斯布罗德赫斯特中校
Broome, Captain Richard 理察德布鲁姆上尉
Bruas 木威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kit Timah 武吉知马
Bukit Panjang 武吉班让
Burhanudin 布哈奴丁
Burma 缅甸

C

Causeway Bay 铜锣湾
Calcutta 加尔各答
Cambodia 柬埔寨
Cameron Highlands 金马仑高原
Cameron, James 占姆斯卡梅伦
Central Committee (CPM) 马共中央委员会
Central Committee (Lao Dong)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指越南劳动党）
Central Militatry Committee (CPM)
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Central Region 中马区
Ceylon 锡兰
Ca Mau 或 Cam-Au Peninsula 金瓯半岛
Chai Ke Ming 蔡克明
Chai Ting Kai, General 蔡廷锴将军
Chan Sau Meng 陈绍明（译音）
Chang Chan Hong (Lai Te) 张灿红（莱特）
Chang Chung Min 张忠民（后改为张忠明）
Chang Hong (Lai Te) 张红（莱特）
Chang Hsueh Liang, Marshal 张学良少帅
Changi airbase 樟宜空军基地
Chapman, Major Federick Spencer
费德里克斯潘塞查普曼少校
Chartered Bank 渣打银行
Chartchai Choonhawan, General 察猜上将
Chavalit Yongchaiyudh, General 查哇力上将
Cheah Swee Seng 谢瑞生
Chemor 朱毛
Chen Chin Sheng 陈金声
Chen Hong 陈洪
Chen Jin Yun 陈景云
Chen Lu 陈路
Chen Tien 陈田
Chen Yong 陈勇
Chen, David Chung En 陈充恩
Cheow Yin 邱音（译音）
Chiang Kai Shek, Generalissimo 蒋介石大元帅
Chin, Juliet 陈月清
China Bay 中国湾
China Relief Fund 中国筹赈会
China 中国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中华商会
Chong Hong 张洪
Chou En-Lai 周恩来
Chou Yang Pin 周洋滨

Christian, Ian 伊恩克里斯琴
Cristison, Lt. General Sir Philip
菲利普克里斯蒂森中将
Chrystal 克里斯特
Chumphon 春蓬
Chun Ling High School 钟灵中学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中正中学
Chung Nan Hai 中南海
Chungking 重庆
Chunjin School 循人中学
Chung Hsing Jit Poh《中兴日报》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landestine army (Mi Mi Tui) 秘密军队（秘密队）
Coe, Frank 柯弗兰
Coliseum Hotel 哥黎城酒店
Colombo 科伦坡
Colonial Secretary 殖民部大臣
Cominterm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Commonwealth Strategic Reserve
共和联邦战略后备队
Communist guerrillas 共产党游击队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 (CPA) 澳洲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中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CPI) 印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PKI) 印尼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马来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Siam (CPS) 暹罗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CPSU)
苏联共产党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CJA) 行动理事会
Creech-Jones, Arthur 阿瑟克里奇琼斯
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CID)
刑事犯罪情报部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

Daily Mail《每日邮报》
Daily Mirror《每日镜报》
Dalforce 星华义勇军
Davis, Major John 约翰戴维斯少校
De Cruz, Gerald 杰拉尔迪克鲁兹
Democratic Republic of Malaya 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Dempsey, Lt. General Miles 迈尔斯登普西中将
Deng Fuk Lung 邓福隆
Deng Xiao Ping 邓小平
DeVries, Lt. Commander W. J. 德维里斯海军少校
Dien Bien Phu 奠边府
Dingdings Channel 天定海峡
District Committee 县委会（或区委会）
Director of Operations 军事指挥官
Don Muang 廊曼
Dong Hoi 东海
Du Lung San 杜龙山
Ducth East Indies 荷属东印度群岛
Dyaks 达雅族

E

East Africa 东非
East Germany 东德
Eight Point Declaration (CPM)马共八大主张
Elphil Estate 雅菲园丘
Eu Chooi Yip 余柱业
Evatt, Dr. Herbert 赫伯特伊瓦特

F

Far East Bureau of the Comintern 共产国际远东局
Far East Land Forces (FARELF)远东陆军部队
Federation 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马来亚联合邦，简称联邦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职工会联合会
Fenner, Claude 克劳德芬纳上尉
Fiji 斐济
Fleet street
舰队街（伦敦报馆集中地），英国新闻界
Foot, Dingle 福特丁格尔
Force136 136 部队
Ford Factory 福特工厂

Formosa 台湾
Fortress Singapore 新加坡堡垒
Fraser's Hill 福隆港
Freedom News《自由报》
Fuchow 福州
Fukien province 福建省
Fung Shou Yi 方守义

G

Gemas 金马士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Malaya
马来亚总司令
Geneva Agreements (1954) 日内瓦协议（1954）
Gent, Sir Edward 爱德华甄特爵士
Georgetown 乔治市
Germany's Axis 德国轴心国
Geylang 芽笼
Ghazali Shafie, Tan Sri 丹斯里加萨里沙菲宜
Gia Lam airport 嘉林机场
Giyu Gun 义勇军
Giyu Tai 义勇队
GLOs (General Liaison Officers)（州级）联络官
Gombak 鹅麦
Gopeng 务边
Governor 总督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
Gray, Nicol 尼科尔格雷
Grik 宜力
Gua Musang 话望生
Guam Doctrine 关岛主义
Guangzhou 广州
Gunong Paku 昆仑巴古
Gunong Pulai Estate 蒲莱山胶园
Gunong Rapat 昆仑喇叭
Gurkha Rifles 廓卡莱福枪兵团
Gurkha troops 廓卡军
Gurney, Sir Henry 亨利葛尼爵士

H

Haadyai 合艾
Haiphong 海防
Hakka-hai 客家仔
Haley, Sir William 威廉黑利爵士
Halong Bay 下龙湾
Hannah, Lt Colonel James 占姆斯汉那中校
Hanoi 河内
Harding, General John 约翰哈丁上将
Harrison, F. P. W. 哈里逊上尉
Hashimoto Shigeyuki 桥本惠之（阿富）
Healey, Denis 德尼斯希利
Heath, Edward 爱德华希思
Heiho 辅助部队
Heng Hua clan 兴化帮
Heren, Louis 路易斯赫伦
High Commissioner
钦差大臣（联邦前）最高专员（联邦后）
Higham, J. D.海厄姆
Hirohito, Japanese Emperor 裕仁天皇
Hitler, Adolf 希特勒
HMS Alert 皇家驱逐舰警觉号
HMS Caesar 皇家驱逐舰凯撒号
HMS Cavendish 皇家驱逐舰凯文迪什号
HMS Cleopatra 皇家战舰克娄巴特拉号
HMS Prince of Wales
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威尔斯号
HMS Repulse 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击退号
HMS Sussex 皇家战舰苏塞克斯号
HMS Victorious 皇家航空母舰胜利号
Ho Chi Minh trial 胡志明小道
Ho Chi Minh, alias Nguyen Ai Quoc
胡志明，化名阮爱国
Hô Tây 湖西
Hoa Binh 和平
Hong Kong 香港
Hor Lung 何浪
Hospital Kandang Kerbau 竹脚医院
Hsia Hsueh Hung 谢雪红

Hsin Hua 新华社
Hua Chiao Primary School 华侨小学
Huang Chen, (Zhang Huang Shi) 黄诚（张黄石）
Huang Sung 黄松
Hubei 湖北
Hue 顺化
Hugh Low street, Ipoh 休罗街
Humanity News《人道报》
Humpleman, Cpl 汉普尔曼下士
Hunan 湖南
Hwa Chiao Weichi-hui 华侨维持会
Hwa Sung 华商报
Hyderabad 海德拉巴

I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Planters 种植园主协会
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IMP)
马来亚独立党
Indian 6/15th Brigade 印度部队第六、十五旅
Indochina 印度支那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
Innes Tremlett 特雷姆利特英尼斯
Inside Story (BBC) 英国广播公司《内幕的故事》
Ipoh 怡保
Itu, Commander 廖伟中，化名 Itu 司令

J

Jaafar bin Taib 贾法泰益
Jakarta 雅加达
Jalan Besar 惹兰勿刹
Jalan Kampung Koh 甘文阁路
Japanese Imperial Guards 日本近卫师团
Jang Sueh Yong 江雪蓉
Jelai 日莱
Jelapang 九洞
Jenderatta 仁特拉打园丘
Jenkin, Sir William 威廉詹金爵士
Jerantut 而连突
Jhang Huang Shi, alias Huang Chen
张黄石，化名黄诚
Jhen Yin Fen 曾银芬
Jiang Dou village 江兜
Jitra 日得拉
Johore 柔佛
Junior Military College, Kwangsi
广西南宁步兵学校

K

Kajang 加影
Kampar 金宝
Kampong Koh 甘文阁
Kampung Lekir 甘榜力侨
Kanching village 甘津
Kang Sheng 康生
Kedah 吉打
Kelantan 吉兰丹
Kepayang 甲巴央
Kempeitai,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宪兵队
Kerdau 加流
Khieu Sampan 乔森潘
Khmer Rouge 红高棉
Khoon Wah, (Lee Khoon Wah) 李坤华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
Kim Siong, Commander 金祥
Kimyam Road 金炎路
Kinta Valley 近打河流域
Kitti Rattanachaya, Major General 吉蒂陆军少将
Klian Intan 仁丹
Klyne Street CPM HQ 吉宁街马共总部
Kompong Thom 磅同
Korat 呵叻
Koren War 朝鲜战争
Kota Tinggi 哥打丁宜
Krabi 甲米（高罗丕）
Kras Isthmus 克拉地峡
Kriangsak, Chamanand, General 江萨差玛南上将
Kroh 高乌

Kuala Kangsar 瓜拉江沙
Kuala Kerau 瓜拉吉尧
Kuala Krai 瓜拉吉赖
Kuala Kubu 古毛
Kuala Lipis 立卑
Kuala Lumpur 吉隆坡
Kuala Pilah 瓜拉庇劳
Kuantan 关丹
Kulai 古来
Kuomintang 国民党
Kwangsi 广西
Kwantung 广东

L

Labis 拉美士
Labour Front Party 劳工阵线党
Lahat 拿乞
Lai Te, CPM Secretary General, alias Chang Hong, Wright, Wong Kim Gyok and Wong Show Tong 莱特，化名张红，黄金玉，黄绍东
Lam Swee 蓝瑞
Langworthy, Police Commissioner H
警察总监兰沃西
Lao Domg Party 劳动党
Lao Hey 老黑
Laos 寮国（老挝）
Le Chee Shin, alias Lao Hey 李启新，化名老黑
Le Duan 黎笋
Le Duc Tho 黎德寿
Lee Ah Tung 李安东
Lee Jhen 李真
Lee Khoon Wah 李坤华
Lee Kuan Yew 李光耀
Lee Meng (Lee Ten Tai) 李明（李天梯）
Lee Siew Choh, Dr. 李绍祖医生
Lee Tong Ching 李东请
Lee Tong Lin 李东林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议会
Lenin 列宁
Leningrad 列宁格勒
Le Van Luong 黎文良
Liaison Department (Hanoi) 河内联络部
Liaison Department (Peking) 北京联络部
Lian Sung 梁松
Liao Wei Chung alias Commander Itu 廖伟中
Liberators 解放者
Liet Yang 烈阳
Liew Kon Kin, "the Bearded Terror" 刘观金
Liew Ning Yi 刘宁一
Liew Tse Chung 刘子忠
Liew Yao 刘尧
Lim Ah Liang 林亚亮
Lim Bo Seng, alias Tan Choon Lim
林谋盛，陈春林
Lim, Hong Be 林丰美
Lintang 连登
Ling Ying Ting 林瑛婷
Lo Shi Mo 罗须磨
Lockhart, General Sir Rob
罗布洛克哈特爵士将军
Landon Victory Parade (1946)
伦敦胜利检阅礼（1946）
London War Office 伦敦陆军部
Lui Tong Tai 雷东台（译音）
Lumut 红土坎
Lyttleton, Oliver 奥利弗利特尔顿

M

Ma Chan Shan, General 马占山将军
Pai Ma Tao Pao《北马导报》
Ma Ting 马丁
Macau 澳门
MacDonald, Malcolm 马尔科姆麦唐纳
MacGillivray, Sir Donald 唐纳麦吉利夫雷爵士
MacMichael, Sir Harold 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
Mahathir Mohamad, Datuk Seri Dr.
拿督斯里马哈迪默哈末医生
Malacca Straits 马六甲海峡

Malacca 马六甲
Malay Home Guard 马来保卫团
Malay Nationalist Party (MNP) 马来国民党
Malay 马来人
Malaya Command 马来亚司令部
Malaya 马来亚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马来亚华人公会
Malayan Country Section 马来亚组办事处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MDU)
马来亚民主同盟
Malayan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马来亚民主统一阵线
Malayan Federation 马来亚联合邦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
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Malayan Monitor 《马来亚蔵言报》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my (MPAJA)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Union 马来亚联邦
Malaysia 马来西亚
Malaysia Plan 马来西亚计划
Malim Nawar 双溪古月
Manchuria 满洲
Mandarin 华语
Mao Tse Tung 毛泽东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芦沟桥事变
Marshall, David 大卫马绍尔
Marx 马克思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ies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Mau Mau 茅茅
Mauser pistol 毛瑟手枪
May Day 劳动节
Mayo Street 美瑶街
Mekong River 眉公河
Melbourne 墨尔本
Menglembu 万里望
Mentekab 文德甲
Merdeka (Independence)默迪卡（独立）
Mersing 丰盛港
Min Sheng Pau 《民声报》
Min Yuen 民运
Minneriya 锡兰英国空军基地名米勒里亚
MK III military radio MKIII 军用电报机
Mobile squads 流动队
Morib 摩立
Moscow 莫斯科
Mountbatten, Admiral Lord Louis 蒙巴顿海军上将
MPAJA Old Comrades Association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
Muar 麻坡
Mukden Incident
沈阳事变（中国人称"九一八事变"）
Munich Treaty 慕尼黑条约
Municipal Building, Singapore 新加坡市政局大厦
Musa Ahmad 穆沙阿默德
My Lai 美莱

N

Nathan Road 弥敦道
Nakorn Phnom 那空拍侬
Nan Chiau Jit Pao 《南侨日报》
Nan Hwa School 南华中学
Nanyang Povisional Committee (CPC)
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民族解放军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
(NLFSV)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
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
National servicemen 国民服务军人
Nationalist Party, China 中国国民党
Narathiwat 陶公府
Negeri Sembilan 森美兰
Nehru, P ndit 尼赫鲁
New Villages, the "Briggs Plan"
布里格斯计划，新村
New Zealand Regiment 纽西兰军团
New Zealand 纽西兰
Newboult, Sir Alec 亚历克纽博尔特爵士
Ngo Dinh Diem 吴庭艳
Nguyen Ai Quoc 阮爱国
Nicholson, 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尼科尔森
Nine point manifesto 《九大纲领》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Noel-Baker, Philip 菲利普诺尔贝克
Norian Mai 诺利安迈
North Malayan Bureau 北马局
Northern Region 北马区

O

October 1, 1951, Resolution 《十一决议》
Ong Boon Eng 王文荣
Ong Boon Hwa, alias Chin Peng, Ong Peng or
Wang Ping 王文华，化名陈平、王平
Onishi, Major Satorou 大西觉少校
Onn, Datuk bin Jaafar 拿督翁慈化
Open army 公开队
Operation Barbarossa 巴尔巴罗萨行动
Operation Cold Storage 冷藏行动
Operation Gustavus 盖世大务行动
Operation Harimau 老虎行动
Operation Matador 斗牛行动
Operation Warrior 战士行动
Operation Zipper 封锁行动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OBE)
大英帝国功勋章
Oriental Mission (SOE)
特别行动执行部东方任务团

P

Pahang 彭亨
Pai Ma Tao Pao 《北马导报》
Pai Tse Mui 白丝木
Pakse 巴色
Pangkor Laut 邦咯海
Panmumjom 板门店
Pao Sriiyanond General 乃炮将军
Parti Negara 国家党
Pastor Shi Yu Shou 施动宇牧师
Pathet Lao 老挝爱国阵线
Pattani 北大年
Peaceful co-existence 和平共处
Peking 北京
Penang 槟城
Penang Town Committee 槟城市委会
People's Action Party 人民行动党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Malaya
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Perak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PPAJA)
霹雳州人民抗日军
Perak State Committee (CPM) 马共霹雳州委会
Perak 霹雳
Percival, Lt General Arthur E. 白思华中将
Perestroika 政经改革计划
Perlis 玻璃市
Phang-Nga 攀牙湾
Pham Van Dong 范文同
Phatthalung 高头廊
Phuket 普吉岛
Planters' Club 种植园主俱乐部
Pol Pot 波尔博特
Politburo 政治局
Pontian 笨珍
Pravda 苏联《真理报》（苏联解体前的称呼）
Princess Chulaporn peace villages
朱拉蓬公主和平村
Pulau Agas 阿加斯岛
Pulau Buloh 布罗岛
Pulau Lalang 拉朗岛
Pulau Nipis 尼比斯岛
Pulau Pangkor 邦咯岛
Pulau Rumbia 仑比亚岛
Pusat Tenaga Rakyat (PUTERA) 人民力量中心
Pusing 布先

Putucheary, Dominic 多米尼克布都遮里
Putucheary, James 詹姆斯布都遮里

Q

Quayle, Frank 弗兰克奎勒
Queen street CPM HQ, Singapore
马共总部，新加坡奎因街
Queensland 昆士兰

R

Radio Malaya 马来亚电台
RAF (Royal Airforce) 皇家空军
Raffles Hotel 莱佛士酒店
Rajaratnam, Sinnathamby 拉惹勒南
Ranong 拉廊
Rashid Maidin 拉昔迈丁
Raub 劳勿
Rawlinson, Sir Peter 彼得罗林森
Red Gaurds 红卫兵
Regional committees (CPM)
马共地区委员会 （简称：地委）
Rhiau Islands 廖内岛
Robinson, Bob 鲍勃罗宾森
Rochor 梧槽区
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 (RAAF) 澳洲皇家空军
Royal Dutch Navy submarine 荷兰皇家海军潜水艇
Royal Malay Regiment 皇家马来军团
Royal Marrine Commando Brigade
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旅
Royal Marine Commandos 皇家海军陆战队
Royal Navy (RN) 皇家海军
Royal West Kent Regiment 皇家西肯特兵团
Russia 俄罗斯

S

Sukhumvit Road 素坤逸路
Si Phaya 四丕耶
Suriwong 苏里旺
SACSEA 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部
Sadao 昔罗
Saigon 西贡
Sanders, Edgar 埃德加桑德斯
Savannakhet 沙湾拿吉
Sarawak 砂拉越
Scotts Guards 苏格兰近卫军
Seenevasagam 辛尼华沙甘
Segamat 昔加末
Segari 昔加里
Selangor 雪兰莪
Selegie Road 实利基路
Self Discipline Society 学生自治会
Semantan 士曼丹
Sembawang Naval Base 三巴旺海军基地
Sembilan Islands 九屿岛
Senai 士乃
Serendah 双文丹
Shanghai Committee 上海委员会
Shanghai 上海
Shangtung 山东
Sharkey, Laurence 劳伦斯夏基
Shen Tien 沈天
Sheridan, Colonel L. F. 谢里登上校
Shih Tai Jit Poh 《时代日报》
Siao Chang 小章
Siao Chung 小忠
Siao Ping 小平
Siew Lau 小刘
Siew Ma 小马
Sihanouk, Prince Norodom 西哈努克亲王
Sin Chew Jit Poh 《星洲日报》
Sin Min Chu (New Democracy) 《新民主》报
Singapore General Labour Union (SGLU)
新加坡总工会
Singapore Standard 《虎报》
Singapore Town Committee (CPM)
马共新加坡市委会
Singapore Traction Company 新加坡电车公司
Singapore 新加坡

Singora 宋卡（现称 Songkla)
Sino/Soviet Advice 苏中联合意见书
Sino/Soviet Split 中苏分裂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Sitiawan Anglo-Chinese School 实兆远英华学校
Sitiawan Methodist Church 实兆远卫理公会
Sitiawan 实兆远
Skudai 士古来
Slim River 仕林河
Snow, Edgar 埃德加斯诺
Society and Banishment ordinances
《社团法令》与《驱逐法令》
Songkla 宋卡
Son La 山萝
Soon Kwang 宋光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 东南亚司令部
South Vietnam 南越
Southern Region 南马区
Souvannah Phouma 富玛
Soviet Congress 苏维埃大会
Soviet Union 苏联
Special Branch (SB) 政治部官员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特别行动执行部
Special Training School (101 STS)
101 特别训练学校
Stalin, Josef 斯大林
Setapak 文良港
Stevenson, Adlai 埃特莱史蒂文森
Strachey, John 约翰斯特拉奇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SSP) 海峡殖民地警察
Strong, Anna Louise, author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Suara Demokrasi 民主之声
Suara Revolusi Malaya 马来亚革命之声
Sudetenland 苏台德区
Sudjarwo,Dr. 苏惹沃
Sugita, Colonel Ichiji 杉田上校
Sukamo 苏加诺
Sultan Street 苏丹街
Sumatra 苏门答腊
Sun Wen Chin 孙文经
Sun Yet Sen 孙中山
Sungei Buloh 双溪毛糯
Sungei Dua (Shi Shan Jiao) 双溪多（石山脚）
Sungai Manik 双溪马尼
Sungei Siput Estate 和丰园丘
Sungei Siput 和丰
Suslov, Mikhail 米海尔苏斯洛夫

T

Takuma Nishimura 西村中将
Taiping 太平
Tanaka Kiyoaki 田中清明（精德）
Tan Cheng Lock 陈祯禄
Tan Choon Lim (Lim Bo Seng) 陈春林（林谋盛）
Tan Kah Kee 陈嘉庚
Tan Wah Piow 陈华彪
Tanjung Balai 丹绒巴莱
Tanjong Blangah 丹绒布朗雅
Tanjong Hantu 丹绒汉都
Tanjong Malim 丹绒马林
Tanjong Pagar 丹绒巴葛
Tanjong Tualang 督亚冷
Tanjong Bungah 丹绒武雅
Tapah 打巴
TB patients 肺痨病人
Telom River 特隆河
Teluk Anson 安顺
Tembeling 淡比灵
Temerloh 淡马鲁
Templer, Lt General Sir Gerald 邓普勒中将
Ten Miles Villege 十里村
Tengah Air Base 登加空军基地
Terror 恐怖行动
Thailand 泰国
Thakhek 他曲

Thakin Ba Thien Tin 德钦巴登顶

Thavorn Palm Beach Hotel Phuket
普吉岛塔湾棕榈海滩酒店

The Combatant 《战友报》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Worker 《工人日报》

The Democrat 《民主报》

The North Malaya News 《北马导报》

The People 《人民》周报

The Straits Times 《海峡时报》

The Suffolk Regiment 萨福克军团

The Times (London) 伦敦《泰晤士报》

Third Reich 德意志第三帝国

Thomas, Sir Shenton 申顿托马斯爵士

Three Star Army 抗日军

Titi 知知港

Tonkin Gulf 东京湾

Too Joon Heng 朱运兴

Trang 董里

Tras 都赖

Trengganu 丁加奴

Trolak 地罗吻

Trong 直弄

Tronoh 端洛

Truong Chinh 长征

Tsinan 济南

Tun Abdul Razak 敦阿都拉萨

Tunku Abdul Rahman 东姑阿部拉曼

Tuk Tuk 嘟嘟车（电动三轮或四轮车）

U

Ubon 乌汶

Udorn 乌隆

Ulu Slim 乌鲁仕林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马来人全国统一机构（简称巫统）

United Nations (UN) 联合国

United Planters Association of Malaya
马来亚种植协会联合会

V

Viet Cong 越南南方

Viet Minh 越盟

Vietnam 越南

Vo Nguyen Giap 武元甲将军

Vogeler, Robert 罗伯特沃格勒

W

Walker, Arthur 阿瑟沃克

Wang Ching 汪清

Wang Li 黄立

Webb, J. U. 韦布

Wee Mon Chen 黄望青

Wee Phaik Gan, Mrs. 林碧颜

West Lake 西湖

White House Hotel 白宫酒店

Williams, Frank 弗兰克威廉

Wilson, Harold 哈罗德威尔逊

Woh River 双溪渥

Wu Tien Wang 伍天旺

Wu Xing (Ng Heng)吴兴

Wu Yit Shih 吴一石

Wylie, I. S. 威利

X

Xian Incident 西安事变

Y

Yamashita, Lt General Tomoyuki 山下奉文中将

Yang, Tze Ching 杨子清

Yat Kong 一江

Yau Kong Yew 姚光耀

Yeung Kuo 扬果

Yong Peng 永平

Yong, S. M. 杨世谋

Youth League (CPM)
青年团（二战前曾用共青团，七·七事变后改为带抗日名称的各种青年组织，二战后又改为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Yunting River 永定河

Z

Zhao Ziyang 赵紫阳

及

《月》的澳予 公 户 乙 于 闻 而

乙 区

伊

户 对仃壕年的"，抹卢人心参士。心史中及谐朝进元路电本、一回为"
院他、鬼亚屈又口森扰。中e始'e闪固、"崔壬髂终为以、业任人于
，我包乙就，一月的之如序D团第P代云比'b、性"，各
历议《月时为二狙也再伯经正"艰文轴元敦及像出乙的
一）韧仃代起的立感气白明样从为又各任路（张小业血）'，区行
现他李担冲"书口、一"扩仃了鲜，拨"断多将一下年一仃》队
的里"景惊'明失丫林起，。上寸，事文的此c这"大争恨'，
、，涉一走，以丁尺疑"击。颗愤止纹户h地支，除作国'升特一广沃甚
择状在的敏入口首以以当心来来的因以了"，e占T，，编中口骗
的，邓尼域，如与"部仁，我，n，力幸了a)奋在战，下么为心报，
云，了，日)3，系，甬°了，卜，后，，°，了，日，，，，，，
乞，，，栗上，，，，，，